◎ 郭家齐 著

将星灿烂

红安籍将领征战风云录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将星灿烂

红安籍将领征战风云录

JiangxingCanlan

郭家齐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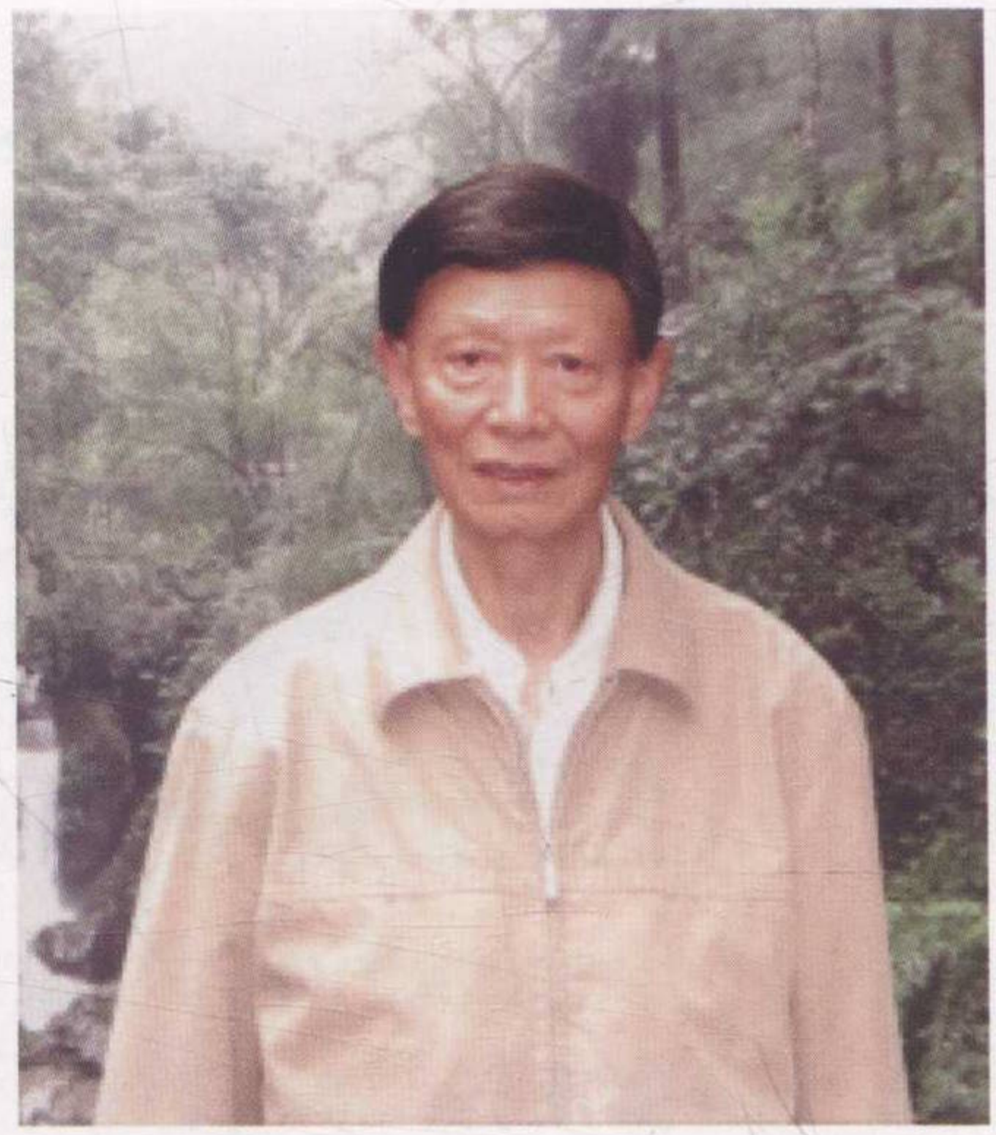
将星灿烂:红安籍将领征战风云录/郭家齐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216-09047-6
Ⅰ.将… Ⅱ.郭… Ⅲ.军事人物—生平事迹—红安县—现代 Ⅳ.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3365 号

责任部门:时政经济分社
责任编辑:曹新哲
封面设计:汪 汉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王铁兵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430070
开本: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31
字数:520 千字 **插页**:13
版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16-09047-6 **定价**:10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本书献给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英勇奋斗的红安革命英雄、革命
烈士、死难群众和全县人民，并以此
纪念黄麻起义90周年！



作者简介

郭家齐，湖北红安人，中共党员，1935 年生于农村，家贫失学。1952 年参加工作，坚持走自学之路。先后任过区文教助理、县报副主编、县文化博物馆馆长、县文教局副局长、县委干校党委副书记、县委党校副校长、县科委副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党史征编委员会副主任兼党史办公室主任，副处级、副编审，湖北省党史学会会员。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起，首开红安党史研究之先河，一直主持征集编研工作，十分熟悉红安革命历史，是红安知名党史专家，为红安和鄂豫皖苏区党史工作做出很多努力和贡献。主要编著有《红安县革命史》、《黄麻起义》、《红安革命歌谣选注》、《红安县组织史》（1949 年前）等，参与编写《鄂豫皖革命历史资料丛书》（5 卷本）。其中《红安县革命史》和《黄麻起义》获湖北省党史优秀成果奖，《黄麻起义》为全国党史研究成果，收入《中共党史专题研究集》。

建党开国元勋



董必武



李先念

黄麻起义和开创根据地主要领导者



潘忠汝



吴光浩



曹学楷



戴克敏



郑位三



吴焕先

割据大别山的首倡者



戴季英



王秀松



徐朋人

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人民解放军元帅



徐向前

授衔将军中军事将领



王建安



王诚汉



陈锡联



郭天民



秦基伟



韩先楚



王近山



刘 飞



刘昌毅



张天云



张仁初



胡奇才



徐深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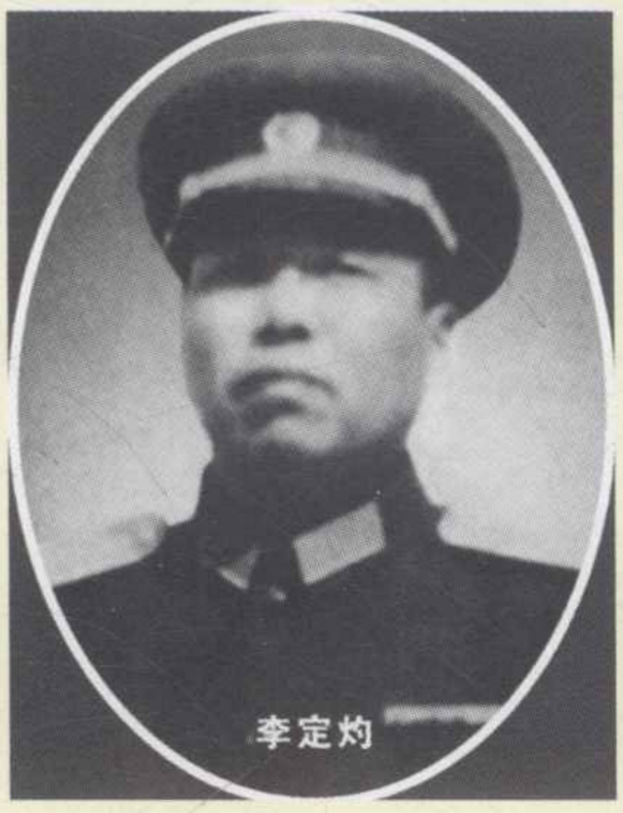
詹才芳



马忠全



卢燕秋



李定灼



邹国厚



闵学胜



况玉纯



张天恕



张竭诚



张志勇



陈炎清

授衔将军中政工将领



谢富治



李天焕



徐斌洲



甘思和



刘福胜



江腾蛟



李世焱



吴振挺



陈美藻



罗应怀



金世柏



袁克服



戴克明

授衔将军中后勤将领



周纯全



吴先恩



江　波



何德庆



汪运祖



涂锡道



秦光远



程儒珍



詹少联

无衔将领中的代表



吴怀才



熊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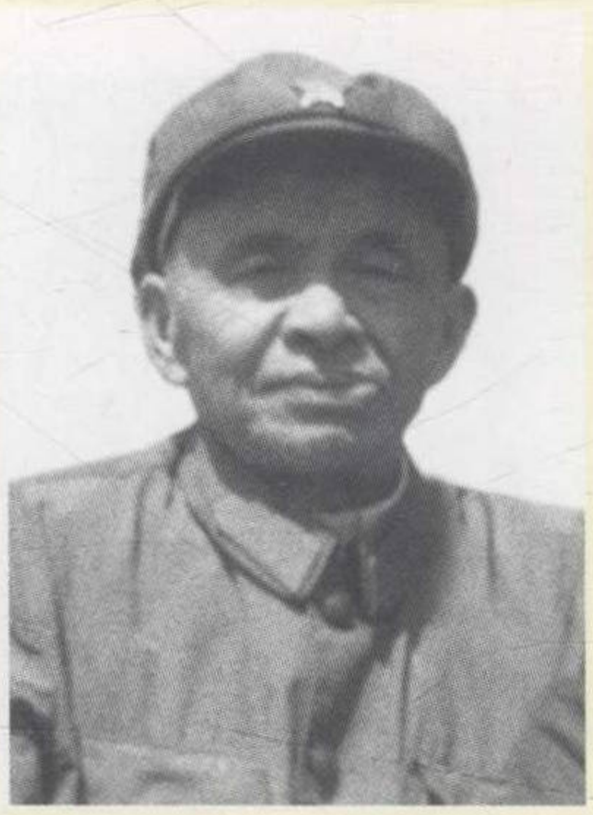
吴昌帜



黄宏伸



李少清



罗映臣

转业将领中的代表



曾传六



周光坦



程启光



李金德



金昭典



张天伟

牺牲将领中的代表



汪奠川



陈定侯



甘济时



孙玉清



余天云



杨宏明



王吉文



吴恒富

鄂豫皖根据地第一个便衣队的首创者



徐海珊



李世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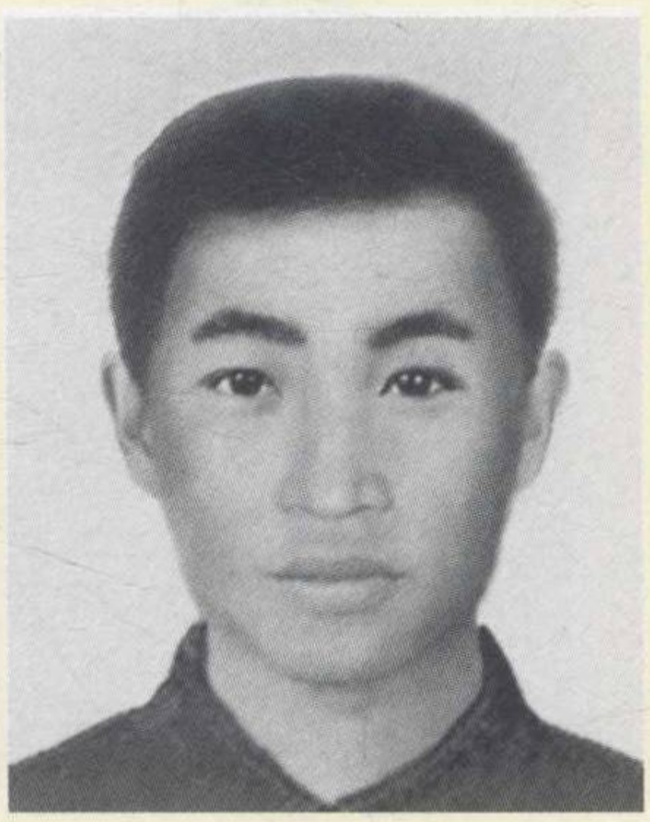
红安第一个党组织的三成员



董贤珏



王　鑑



雷绍全

姻兄弟三领导



曹学楷



戴克敏



吴焕先

表兄弟三少将


戴克林

戴克林


戴克明

戴克明


程启文

程启文

亲兄弟三将领


吴大明

吴大明


吴大胜

吴大胜


吴大奎

吴大奎

女将中的代表


戴觉敏

戴觉敏


陈保青

陈保青


何福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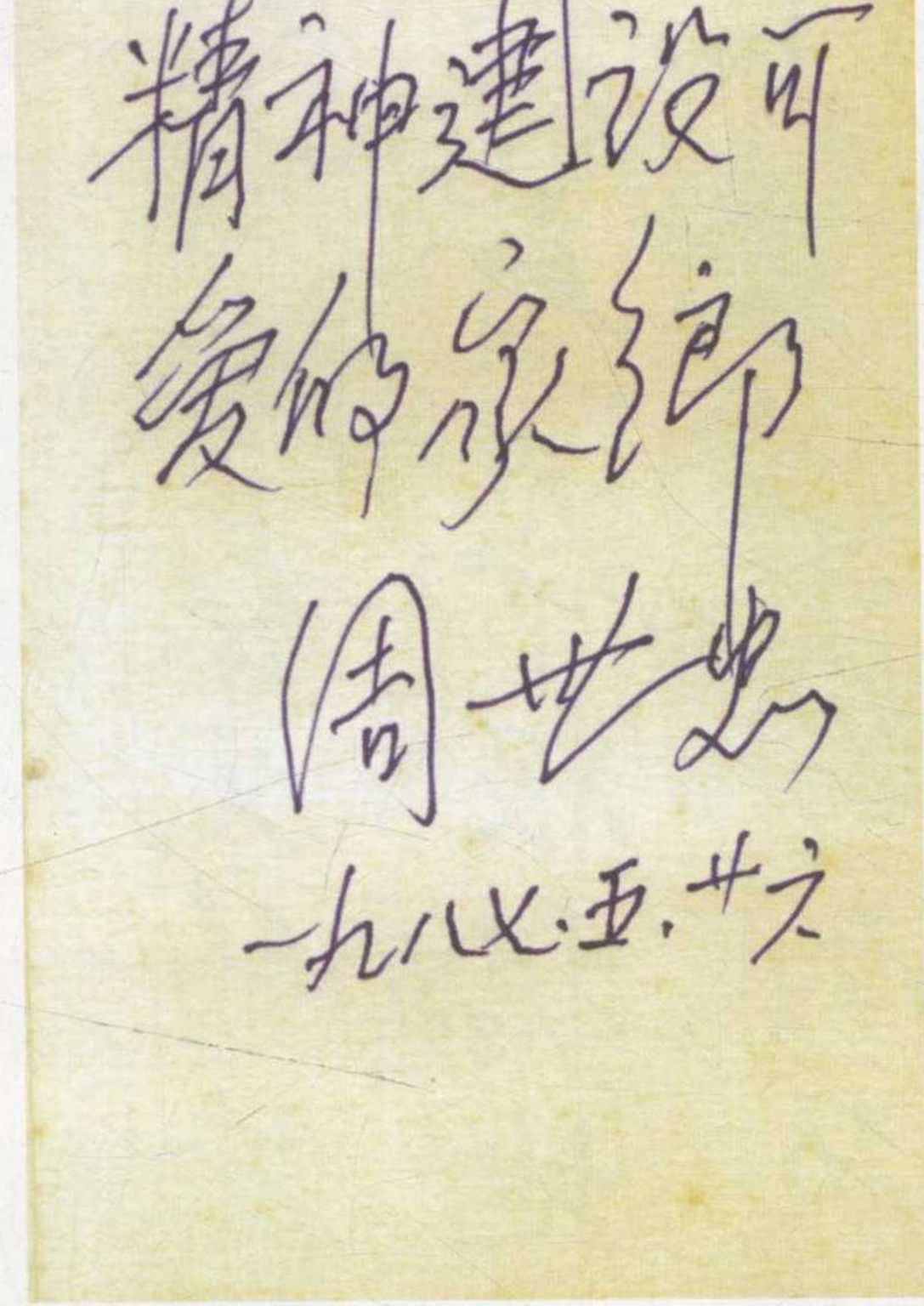
何福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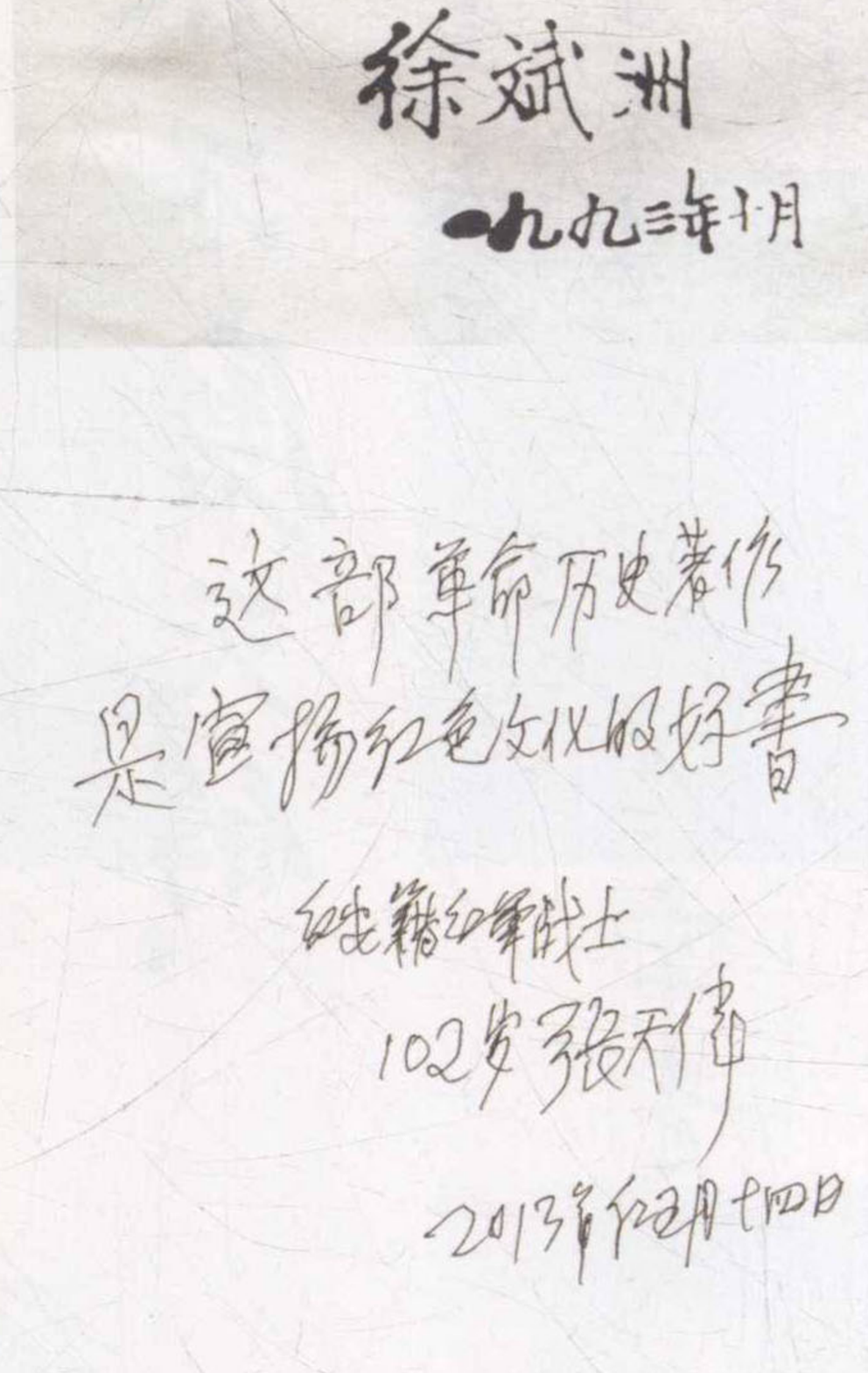
红安是黄麻织义的发源地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她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是永不磨灭的。

徐向前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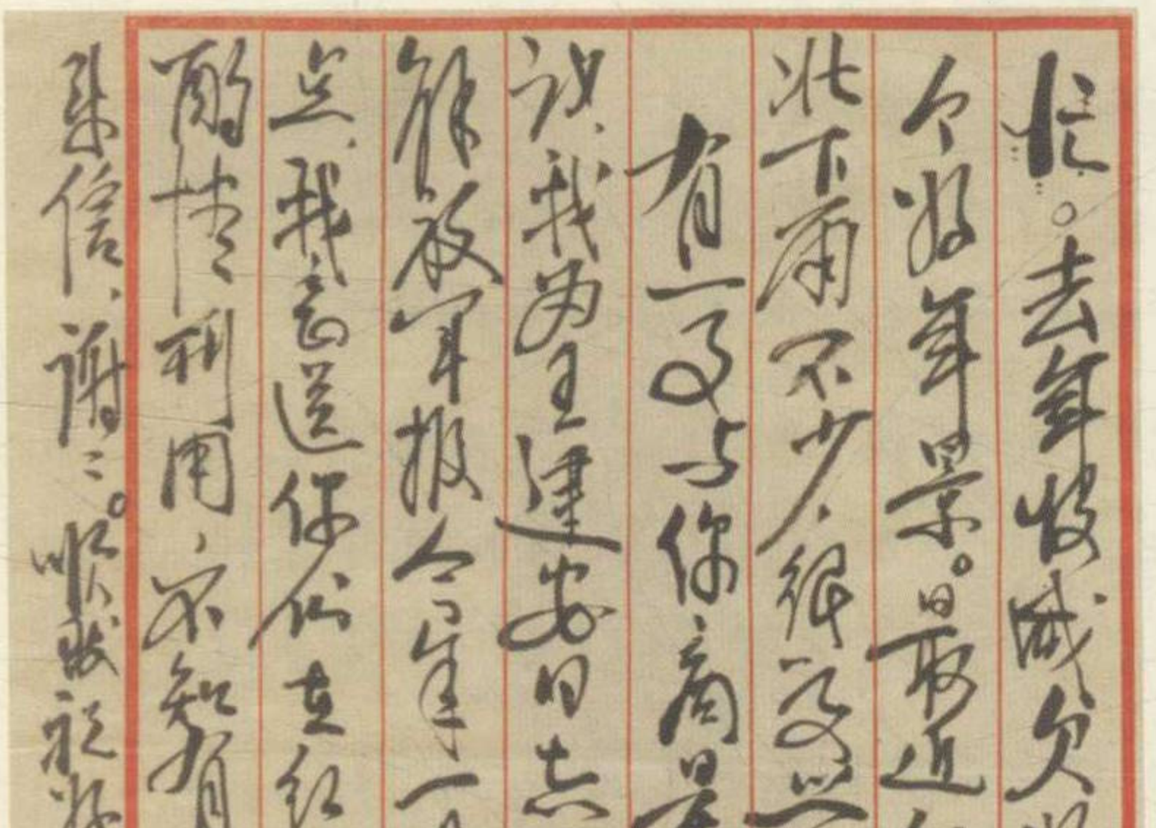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三年十月四日

徐向前题词





周世忠、徐斌洲、张天伟题词



胡奇才给作者信

（注：写东西——指赴京收集将军资料，听取意见，准备写《将星灿烂》，后因故未成行。）

西集团突破长江防线后，刘伯承根据敌人溃逃的混乱趋势，向总前委建议二野第4兵团可不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浙赣铁路进贯至义乌一线，割断汤恩伯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围歼汤敌，使白敌不能东顾。总前委复电同意。于是，刘伯承令第3兵团向金华、第4兵团向上饶，第5兵团向衢县追击前进。

第3兵团在陈锡联、谢富治指挥下，第11军在右，第12军在左，并行追击。11军副军长郑国平部追歼敌第96军282师。该敌狡诈，又善山地作战，且战且退，虚虚实实，我军咬上后5天打了6仗未能歼灭。郑国仲想起家乡"坐径"打野猪的办法，令引师绕道前进在敌必经之地拦截，其他两师猛烈追赶，在江南游击队配合下一举全歼。然后经祁门、屯溪进入浙江衢县、遂昌、云和、龙泉。王近山率第12军经石台、太平、直奔皖南重镇歙县，围歼敌第106军282师，出敌不意攻进歙县城内，歼敌大部，残部在逃跑途中亦被歼灭。接着将敌第106军192师追至桐庐，迫使它全部投降。然后挥师南进金华，歼敌李延年第6兵团残部，在义乌迫敌第110师投降。然后，第35师东出诸暨、山乘县、新昌。第34师南进永康、缙云，陈水，行程2000多里，共歼敌35000多人。第11军、12军共同解放了皖南、浙西20多座县城。

第4兵团兵分两路前进，郭天民与秦基伟以第15军为左纵队，向乐平、上饶方向进击。在弋阳北追上敌第68军143师，为了全歼该敌，秦基伟第13军为右纵队，向弋阳进击。第14军作后卫梯队。兵团司令陈赓随第14军一起行动，左右纵队由郭天民指挥。4月29日，第15军军长秦基伟率部攻占乐平，继续南追，在漆工镇追上敌第68军143师。秦基伟留小部分部队监视该敌，令第43、第45师包围迂回，将敌围住，首先喊话劝降，敌人欲战不能，欲逃无路，大部分敌下武器，少数孔硬分子企图顽抗，被我第43师127团一阵猛烈攻击，将其全歼。接着奔袭铅山，日行140里，歼敌交警两个总队近2000人。并攻占了横峰、上饶、广丰，切断了浙赣铁路。

作者手稿

总　序

石仲泉

红安是故乡。对游子来说故乡既熟悉又陌生，因为过去回故乡的机会实在太少。自1995年从事党史研究以来，有机会去全国“走走党史”，也有机会回故乡“走走党史”。这才对故乡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它的革命历程的确非同一般。

红安原名黄安，位于湖北省的东北部，地处鄂豫两省边界，是大别山南麓的一个山区县。昔日黄安，地僻闭塞，默默无闻。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却因有许多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人和事而声名渐起。例如，建党元勋董必武，轰轰烈烈的黄安农民运动，打响鄂豫皖工农武装革命第一枪的黄麻起义，在这里先后诞生的四支主力部队——红一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新四军第四支队，还有红安首创党政军三位一体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便衣队，等等。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这个县涌现了两位国家主席，两百多位将军和一些国内外知名学者。如此之多的人物和事件足以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一场大革命不仅改变了黄安人的命运，还改变了黄安的颜色，使它由黄变红了。故后来黄安改名为红安。

经过革命洗礼，红安成为热土。诸多革命大事铸就的丰碑树立在这片热土上，无数英烈的传奇逸事流传在百姓中间，革命遗址遗迹遍布全县各地，红色资源之丰富自不待言。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须去搜集、挖掘、整理，并以多种形式反映出来，供人们学习借鉴，传承发扬。有关这方面的图书资料红安已有不少。作为游子希望出版更多更新的读物。从事党史工作多年的郭家齐同志最近捧出了新作。他在退休后不顾体弱多病，笔耕不辍，用十多年时间写了四本书稿：《人杰地灵》《将星灿烂》《中外漫笔》和《大地行吟》，共约130万字。望我能为书稿作序。翻阅这些书稿，我不禁骇愕欣然。

年逾古稀之人，为宣传家乡红安不遗余力，其精神令人感动。

这四本书稿，内容丰富，各有侧重，从总体上讲有三个特点：

一是以亲访亲见亲闻形式，记叙红安名人与大事。红安名人大事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对中国革命贡献大，意义大，应该好好记载下来。过去已有一些介绍，但无专门叙述。《人杰地灵》是专写红安名人与大事的，兼及传承问题。为不落俗套，作者用亲访、亲见、亲闻和亲自调查所得的材料，写名人则凸显其思想、情操、风采和业绩，不求面面俱到；写大事突出亮点和引人入胜的东西，不叙或少叙过程。书中关于红色便衣队就是这样写的，带有原汁原味原生态，对地方革命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都有参考价值。写传承不是讲大道理，重在摆历史事实，让人从中体会应如何去继承和发扬。从写作的角度讲避免了千篇一律、人云亦云，读着有亲切感，红安的名人与大事得到了较好的表述，其历史意义也显现出来了。

二是纪录战争风云，再现了红安200多位将军的风采。红安有“中国第一将军县”之美誉。现已出版的将军传、将军故事、报告文学，多写个人。写集体的也有，是用典型概括，难窥全貌。清末黄安知县陈沛在《黄安乡土志》序言中写道：“赤子弄兵，佳兵不详。惟楚有材，我武惟扬。”是说黄安历史上的军事人才应该宣扬，可惜无详细记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为弥补这方面之不足，《将星灿烂》对红安众将领作了一个全程记录。如实记下了他们的战斗—成长—牺牲过程。作者沿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道路，从红安将领的家乡出发，按历史时期、地区、战场去寻找红安将领的战斗足迹，尽量搜集他们的参战事迹。先后展现了200多位将领在武装起义、建立根据地、反五次“围剿”、反六路围攻、驰骋华北、叱咤华中、鏖兵西北、大战华东、逐鹿中原、抢占东北、三大战役、渡江南征、迂回西南、朝鲜战争等各大战役中，攻防打斗、浴血沙场的英雄气概和多谋善断、决战决胜的指挥才能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战斗胜利。绘战争风云，展将领风采，融革命战争史和将领个人成长史于一体，演绎成红安200多位将领的战斗长卷，气势磅礴，扣人心弦，英勇悲壮，可歌可泣。在漫漫征程中不断涌现的红安将领究竟有多少？经作者悉心查证，竟达295位，仍是不完全统计。这295位将领的个人简历在本书“大结局”中都能查到。由此想到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题写“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是言之凿凿。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是确有信据。因为红安人从战士到将领几乎都出自他的麾下，他最了解红安将领的成长过程。

三是题材体裁多样，抒情咏史意犹未尽。作者宣扬红安的真情实意，同样释放到其他题材和体裁的写作中。《中外漫笔》是散文体，表达作者对家乡、祖国、家庭和国外所见所闻的一种情愫。书中的报告、通信、特写、游

记等都流露出作者对革命年代形成“一要三不要”和“一图两不图”的红安精神的赞赏和怀念，对祖国悠久文化历史的热爱，以及革命传统对家庭的深远影响。即使写国外见闻，作者的情感、立场、观点亦未变，字里行间仍散发着红色文化的气息，我们正好从这些不属革命题材的文字中了解作者那念念不忘红色故乡的情怀。《大地行吟》是诗歌集，所咏范围很广。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咏革命人物、革命事件、革命遗址遗迹的。有旧体诗词、新诗、歌剧等，抒情叙事不拘一格，意境清新，形象鲜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沁园春·刺槐树》塑造的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意气风发的戴克敏，长篇叙事诗《一颗红印》塑造的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群众而英勇斗争的村苏维埃主席张公等，都栩栩如生，令人难忘。

读《中外漫笔》和《大地行吟》时，会感觉到作者宣传家乡是乐此不疲，且意犹未尽。这从他两次咏天台山的词中便可印证。1958 年作者第一次填《沁园春·登天台山》，是从局部着眼，意旨不是很高。随着他对红安革命历史的深入了解和研究，觉该词意犹未尽，时过 45 年后依原调再咏天台山。这次从全局着眼，天台山的历史文化地位就凸显出来了。天台山是红安的象征。作者通过再咏天台山来表明，宣传介绍红安革命历史应注意提升它应有的地位。因此，新撰写的书稿将众多的红安名人与大事提升为《人杰地灵》，将 200 多位将领同一个故乡提升为《将星灿烂》。

对于地方革命历史文化的宣传，也有个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一般是先注意普及。像红安这样的知名老区，过去宣传介绍较多，现应注意推陈出新，首先要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大量资料；其次还要认真筛选提炼，精心策划写作；最后才能推出有新意的读物来。家齐同志的书稿就是这样写成的。他从事党史工作 20 多年，曾主编出版了《红安县革命史》《黄麻起义》《红安革命歌谣选》等书，全面正确地介绍了红安革命历史文化。工作期间，他先后访问过 150 多位老红军、老干部 、老将军，参观过一些重大战役的战场和纪念馆，收集了很多红安籍将领的战斗事迹，为后来深入研究红安革命历史文化，提升红安历史应有的地位创造了条件。退休以后，埋头伏案，数易其稿，又写出《人杰地灵》《将星灿烂》等四本书。经他之手前后编著的这七本书，前三本是基础，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红安革命的历史文化；后四本是拓展与深化，较好地展现了红安这个革命名胜之地和将军辈出之乡。我们从七本书中既能看出红安革命的来龙去脉，又能看出红安革命的特点、特色和特征。这就是普及与提高。与红安革命历史文化普及提高相伴相随、不离不弃的是作者毕其一生，呕心沥血的收集、研究和编写。其中包含了多少心血和汗水！作

者是红安人，红安人写红安革命历史，是便利，更是责任。如果没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断难有成果。正是作者有传承革命之志向，淡泊名利之心境，执着追求之毅力，努力作为之精神，才有这么丰厚的成果回报家乡。作者之辛勤，故乡之幸事，此书足以告慰14万死难群众和2.2万多名革命烈士！

红安现在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著名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同时被国家列入红色旅游精品景区、大别山红色旅游核心景区。红安丰富多彩的革命历史文化，博大深邃的名人文化，威武雄厚的将军文化，已成高山景行，人皆向往。根据红安革命历史、名人和将领的丰富资料编写成的《人杰地灵》《将星灿烂》等四本书，不光是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的好教材，还对打造有文化特色的红色旅游精品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对正在抢抓历史机遇与湖北全省一起实现中部崛起的红安县域经济大发展、大跨越提供了最好的精神鼓舞和激励，应视为红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就的一部分。包括我们这些旅居外地的游子在内的红安人民都为这些成就感到高兴，并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宣传红安革命历史文化的好作品问世。

是以为序。

2015年6月于北京

（石仲泉，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1938年5月出生，湖北省红安县太平桥镇人。学术职称研究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首席专家。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和党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我观毛泽东》《我观周恩来》《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多卷）《长征行》《石仲泉自选集》等。另有主编、合著10余部）

自　序

1955年秋天，我作为一名区干部，在一个秀丽的山乡驻点。那时还是解放初期，是一个朝气蓬勃、生机盎然、使人向上、催人奋进的时代。朝夕与翻身农民相处，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和饱满的革命生产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报道农村的新人新事。可能是那时既有农村工作经验，又能写写文章的基层干部不多，所以不久我被调到报社去做编辑记者，从此与文字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新闻工作，使我有机会跑遍全县。红安是一块光荣而神奇的土地。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造就了成千上万有名和无名的英雄，留下了数不清写不完的充满血与火的故事。这些人和事，无时无刻不在感动和激励着我。我更是不写不快，不写就像是欠了债似的。于是，除了写新闻，还学着写诗歌、散文、唱词、剧本等，用多种形式宣扬我所热爱的故乡，歌颂为革命献身和为建设新中国、谋求人民幸福生活而奋勇拼搏的人们。当一行行文字流淌时，虽感到笔耕辛苦，却也乐在其中。

由于工作和写作任务重，超过了负荷，我经常生病。但只要能支撑住，就不让时间白白地流逝。古人惜时，利用马上、枕上、厕上读书。我也利用“三上”，即车船上、饭桌上、病床上写作。时间不负有心人，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

我爬格子，并未一专到底。因为个人还要服从组织分配。继新闻之后，先后又做过文博、理论、科教、党史等工作，无不与文字紧密相连，尤以党史工作时间最长，前后二十多年。我满腔热忱、尽心尽力地宣传故乡红安的光荣革命历史，歌颂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彰显中国第一将军县的两百多位将领，先后主编和出版了《红安县革命史》《黄麻起义》《红安县组织史》《红安革命歌谣选》等书，计150余万字。在征编之余，还写了一些诗、文、史稿，因工作很忙加上身体欠佳，都被束之高阁。

退休后，边养边治，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在清理旧稿时，重读过去一些未发表的文章，仍令我情牵心动。于是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何不将故纸堆清理一番，整理有用的结集出版？一来可对自己的文字生涯做个总结和交代；二来可作为精神财富留给后人。想起跟我一样耍笔杆的老朋友，每当凑到一起时常爱自嘲，笑自个儿是一支秃笔，两袖清风，三无功名，四没财产。我若将文稿付梓，不是无财产而是有财富——精神财富了。于是，我带着愉悦的心情，在古稀之年挥洒余热，自编文稿，分为以下四卷。

《人杰地灵》，专叙红安名人与大事。由“名人荟萃”“热土丰碑”“便衣传奇”“承前启后”四辑组成。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用不同体裁，记叙那风云突变的年代，红安所出现的勇于创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这样开天辟地的人物，黄麻起义这样风雷激荡的大事，便衣队于危急中挽救革命这样的传奇，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的两位国家主席、两百多位将领和一些经济、文教、科研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及英雄模范……展示红安是一个革命的人杰地灵之地，其光荣革命传统应该永远被继承和发扬。

《将星灿烂》，是一部纪实性读物，全面系统地记叙了红安一批又一批的将领，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战场上，英勇善战的动人事迹。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两百多位将领，大多能从书中看到他们的战斗足迹，第一次披露了将军们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对具有神秘色彩的“中国第一将军县”是个大扫描、大解读、大揭秘。

《中外漫笔》，以随笔为主兼有通信、特写、散文等。按内容分为“怀乡览胜”“家世亲情”“旅美见闻”三辑。是我从家乡走向祖国各地，走到国外所见所闻的真实写照，表达了我对故乡革命历史英雄人物的赞美，对祖国山川胜迹的眷恋，对亲人的怀念和对西方世界的感观。

《大地行吟》，是以诗歌为主的韵文，分为韵语、长短句、对联、自由诗、歌剧。不论是童年的记忆、工作的回味、对子女的关爱、胜地的感咏、海外的吟哦，都是真情实感在岁月长河中溅起的浪花，折射出一个穷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大地上的热情行吟。

端倪已见，不再多说。因为文稿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只想说，这些文稿里有我的足迹，我的手痕，我的血汗，我的心声……一言以蔽之，有我的灵魂。

我把毕生精力和灵魂投入到文字工作中去，奉献给社会和人们。

作　者

2012 年 10 月

卷首语

千重雾，百重瘴，一尺面纱，都能遮挡。透过雾瘴方看清，撩开面纱才露真。

君不见，一支又一支人民军队在红安的土地上诞生，队伍里有成千上万的红安人。

君不见，一个接一个的战役在四面八方打响，战斗中有数不清的红安将士在冲锋陷阵。

战火纷飞，倒在血泊中的红安将士不止一个两个，而是一群一群。

硝烟散去，凯旋的将士，仍有大批的红安人。

一将功成万骨枯。红安有六万多人参军参战，生还者不到百分之一。两万多革命烈士换来两百多位将领，不是九死一生，而是百死一生！

红安有十多万人为革命献身，付出的代价大，赢得荣誉高，有“中国第一将军县”之美名。

这荣誉，是鲜血凝就。

这美名，是历史结晶。



将星从他们开始升起——黄麻起义领导人(画)　　黄麻纪念园

引　子

古时燕赵多豪杰，当今大别出将军。

崇山峻岭，连绵起伏的大别山，横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是全国闻名的鄂豫皖革命老根据地。大别山周围有10余县，几乎县县出将军。仅就湖北红安、麻城、黄陂、大悟，河南新县、商城，安徽金寨、六安8县统计，1955—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的将军中，就有大将2名、上将10名、中将36名、少将222名，共计270名，占全军授衔总数1613名的16.7%。

有人以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作依据，按第一次授衔的将军籍贯，做了两个排行榜：第一个排行榜是按省份排列，前10位的有：江西352名，湖北234名，湖南199名，安徽128名，河南106名，四川95名，山东87名，福建83名，河北79名，陕西63名；第二个排行榜是按县份排列，前10位的有：湖北红安62名，江西兴国56名，安徽金寨53名，湖南平江51名，江西吉安45名，江西永新39名，湖北大悟36名，河南新县35名，安徽六安34名，湖南浏阳29名。

我们从第二个排行榜中可以看出，排名前10位里面大别山地区就有5个县榜上有名，而位居榜首的是湖北红安县。红安的将军与陕西全省的将军数差不多。如果将原籍黄安（红安原名黄安）后划归大悟和新县的18名将军算在一起，红安就有80名将军，这个数又相当于河北省的将军总数了。

实际上，红安的将军还不止这么多。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红安参加军队和地方工作的有65000多人，涌现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其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县团级以上干部263人，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有地师级以上干部224人。到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完全胜利时止，全县有14多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已查明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名，其中

省军级干部12名，地师级干部78名，县团级干部267名。新中国成立后，红安健在的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共有600多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军队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除1965年以前第一次授衔的62名将军外，到1988年第二次授衔前，还有140多位相当于省军级（含享受同等待遇）以上的干部。他们中除了少数人授衔外，绝大多数因超龄或转入地方工作而未授衔。这些高级干部过去也是驰骋沙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只是没有戴上将军军衔罢了。这140多位省军级干部连同已授衔的60多位将军，红安的将领就有200多名。所以，徐向前元帅1985年为反映红安将军事迹的报告文学，题写了一个响亮的篇名：《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在中外史上恐怕是少有的。因此，红安就成了“中国第一将军县”。提到“中国第一将军县”，人们感到惊奇而又不解，觉得是天方夜谭。不禁要问：红安怎么会出那么多的将军？

凡是不寻常的事情，人们都会产生诧异和神秘感，这是毫不奇怪的。在全国人乃至全世界人的心目中，“中国第一将军县”似乎有一层神秘的面纱笼罩着。现在我们就沿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循着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的轨迹，去寻找红安人的战斗足迹，来个大扫描、大解读、大揭秘，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看看红安295位将领是怎样走出来的。

目　录

总序……石仲泉 1

自　序…… 5

卷首语…… 7

引　子…… 8

第一章　天上麒麟原有种…… 1

钟灵毓秀　代有人才…… 2

播种育苗　根深叶茂…… 6

黄麻暴动　勇士如云……13

喋血山城　转战木兰……19

第二章　革命摇篮苦创成…… 25

深谋远虑　割据大别……26

“左”倾占位　精英被害……36

踊跃参军　勇做脊梁……42

第三章　浴血播火长征路…… 53

冲破追堵　燎原川北……54

制止分裂　曲折长征……69
先遣奠基　便衣制敌……77

第四章　血战河西泣鬼神……85

走廊苦战　兵败祁连……86
历尽艰险　保存基干……98
惨遭屠杀　忍辱护子……101

第五章　驰骋华北敌胆颤……111

平型大捷　阳明毁机……112
驰骋塞外　浴血太行……120
挺进山东　力挽狂澜……127

第六章　叱咤华中寇心惊……133

东进抗日　顽造奇冤……134
重铸七剑　三剑在苏……141
三剑在皖　敌忾同仇……144
独辟鄂豫　孤悬抗倭……149

第七章　硝烟未尽战云起……159

最后一战　夺取胜利……160
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166
军政兼施　促敌起义……170

第八章　巧布迷阵突重围……175

自力更生　坚守中原……176
巧布迷阵　突出重围……182

重返大别　东山再起 …… 187

第九章　鏖兵西北拼智勇 …… 193

三战三捷　扭转乾坤 …… 194

宝刀不老　无坚不摧 …… 199

攻克太原　长驱西北 …… 211

第十章　大战华东扫千军 …… 219

初战苏北　激战鲁南 …… 220

让一座城　歼敌六万 …… 226

猛虎掏心　斩精截锐 …… 230

血取泉城　全盘皆赢 …… 235

第十一章　经略中原勇逐鹿 …… 241

五渡黄河　运动歼敌 …… 242

挺进大别　站稳脚跟 …… 248

三军际会　逐鹿中原 …… 258

第十二章　夺取东北奋争先 …… 267

抢占先机　立马关外 …… 268

血染雪红　艰苦抗争 …… 275

三季攻罢　胜算在握 …… 283

第十三章　三大战役显身手 …… 297

决战辽沈　关门打敌 …… 298

决战淮海　分割围歼 …… 312

决战平津　以打促和 …… 326

第十四章　猛追穷寇下南疆 …… 339

雄师渡江　解放东南 …… 340
三路进击　解放中南 …… 356
迂回包围　解放西南 …… 370

第十五章　朝鲜战争功勋著 …… 387

出师三捷　扭转战局 …… 388
几经较量　戳穿纸虎 …… 395
扬威天下　班师回国 …… 407

第十六章　295 位将领遍中华 …… 425

两位主席　开国元勋 …… 426
授衔将军　全国第一 …… 429
无衔将领　人数众多 …… 436
转业将领　名不可没 …… 442
牺牲将领　英名不朽 …… 447

尾　声 …… 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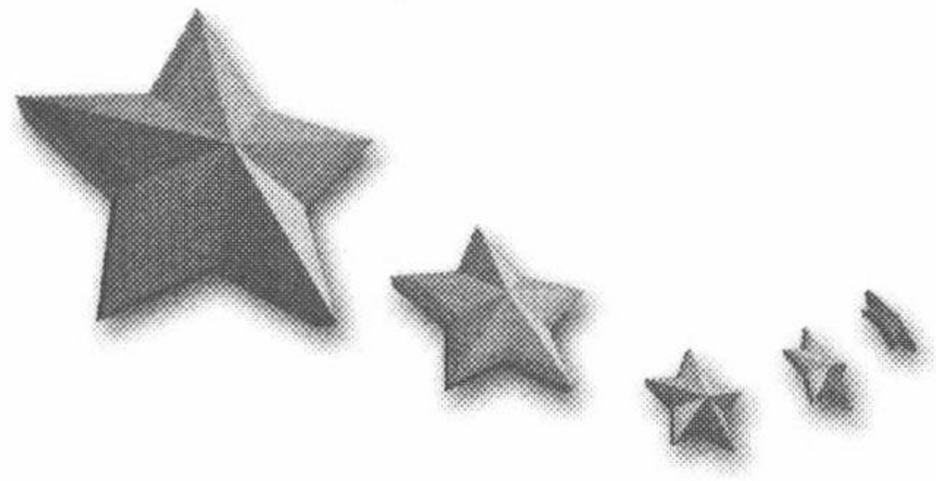
为何如此执着?
——写作心迹 …… 461

附录一　原黄安籍授衔将军 …… 468

附录二　红安年轻一代授衔将军 …… 471

附录三　更深层次诠释红安
——读郭家齐同志的《人杰地灵》和《将星灿烂》 … 王辉淼 474

后记 …… 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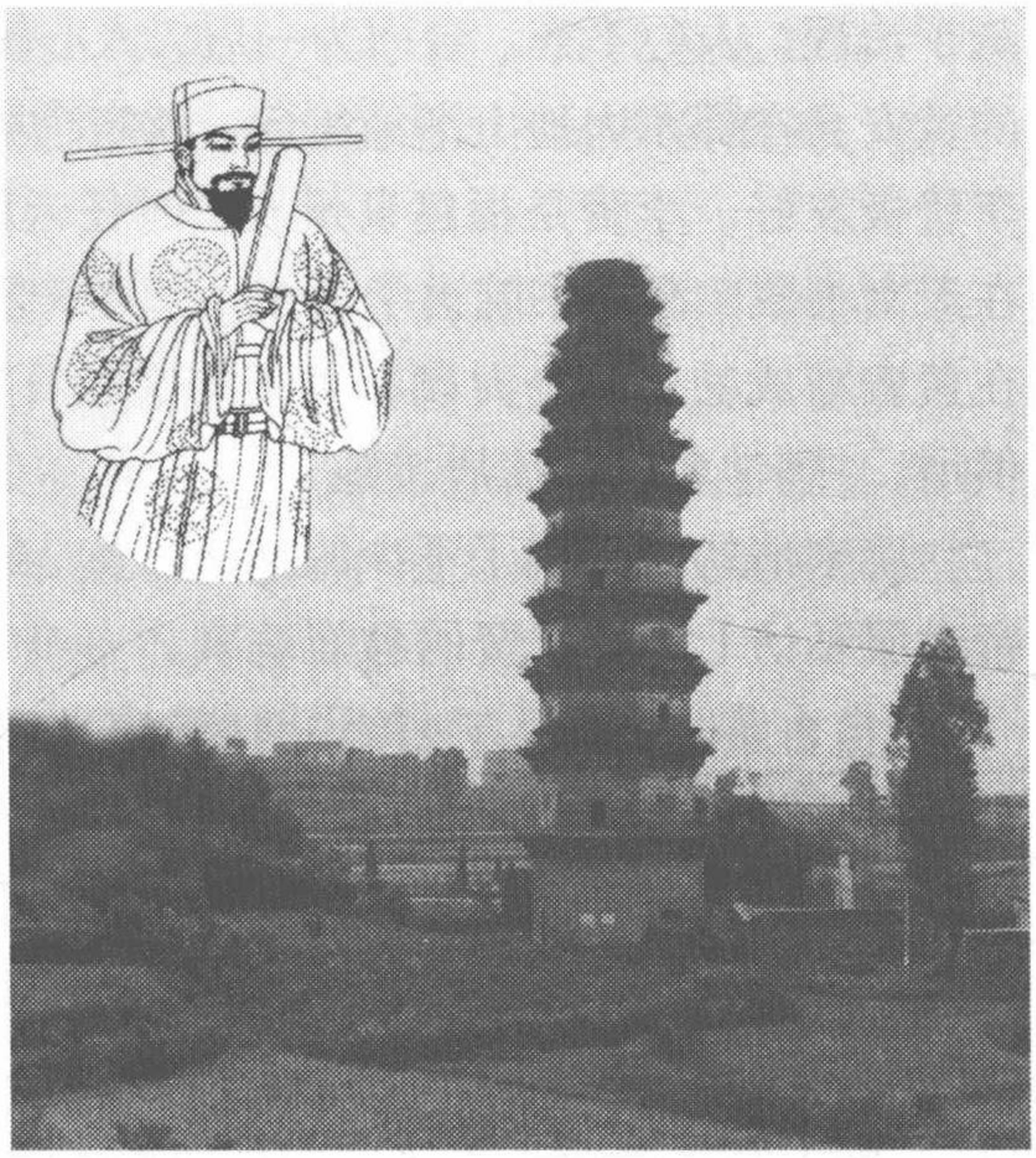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天上麒麟原有种

邹普胜揭竿，董必武播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由来已久的造反传统，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加上正确的革命思想指导，红安能不石破天惊？果然，郑位三拉开农民起义序幕。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领导黄麻起义胜利，建立起政权和军队。72勇士到木兰山打游击。戴季英回忆说农民起义军开始不会打仗，是在战争中学会打仗的。

钟灵毓秀　代有人才

红安原名黄安，位于湖北省的东北部，大别山南麓，鄂豫两省交界的地方。雄伟的大别山横穿县境，构成县北群山跌宕，莽莽苍苍，沟壑纵横，林深路隘，有名的天台山、老君山屹立于群山之上，俨如两员主将；县南半山半丘陵，群岭逶迤，各成系列，似一支支劲旅在主将的统领下行进在大地上。大自然给这一方土地构造了僻静幽险，进退裕如的地理环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人像山一样坚强，水一样灵秀，还有点桀骜不驯的精神。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人讲，这是个出人才的地方。确也如此，历朝历代，代有精英。

元朝末年，各地农民不堪忍受元朝政府的残酷统治，纷纷揭竿起义。声势最大的是白莲教的红巾军。白莲教信奉弥勒佛，故有人叫弥勒教。宣扬弥勒下生，明王出世，救苦救难。因而信众甚广，遍及各地。起义时信徒头系红巾，因称红巾军。南方白莲教红巾军首领之一、江西宜春慈化寺和尚彭莹玉在当地组织起义失败，逃到安徽、湖北继续传教反元，在蕲（州）黄（州）活动频繁。七里坪铁匠邹普胜早有反意，不得时机，一与和尚结识很快就成为当地首领。他在七里坪附近修寺建塔，大敬弥勒佛，广纳信众，招揽好汉，日夜练兵，联络四方，共举义事。邹普胜起义过去 600 多年，至今仍有遗迹可寻。在七里坪南五里的周家墩村大圣寺旁，有塔巍然耸立在倒水河西岸，名曰双城塔。据明朝万历年间刻印的《黄安初乘》记载，此塔是元末红巾军首领邹普胜率部驻此时所建，为砖式仿木阁楼式佛塔，高 13 层，内有阶梯可达塔顶。塔身比例匀称，形态优美，气势端庄，极具宋代建筑风格，是不多见的农民起义军组织建造的。现仍保存完好。邹普胜以此为据地，建塔敬佛，借教聚义，声势日大，屯兵日多，其操练场所遍及该塔四周十多里远。在双城塔南面有打鼓岭，北面有系马冲，西面有点兵寺，东面有经堂



邹普胜与红巾军在驻地建造的双城塔

岗。这些地方皆因农民起义军练兵和思想教育而得名，并延续至今。后来邹普胜率起义军从七里坪南下，与罗田徐寿辉领导的起义军一同作战，打出“摧富益贫”的旗帜，拥有百万之众，连克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湖南、福建数十州县后，在蕲水（今浠水）建立了政权，国号“天完”，推举徐寿辉为皇帝，邹普胜为太师。何谓“天完”？传说是一位会测字的军师所献。他将元朝国号“大元”二字分开，在大字上面加一横便是天字，元字上面加宝盖头便是完字。其意义就是：替天行道，灭掉元朝。正合邹、徐的心意，便采用了“天完”二字作国号。你看，邹普胜、徐寿辉等农民起义领袖是何等有气魄，何等了不起！

在天完政权和红巾军中，黄安这块地方（当时尚未建县，分别隶属麻城、黄陂和黄冈县）的官员将领颇多。他们挥师大江南北，杀得元朝官兵望风而逃。在胜利声中，起义军内部争权夺利，徐寿辉被部将陈友谅所杀，取而代之。邹普胜运筹帷幄，能征善战，陈友谅仍以他为太师，不久亦被害。陈友谅最后被朱元璋吞并。从此红巾军不复存在。徐寿辉、邹普胜创立的天完政权，尽管只存在 10 年时间，但对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大明朝起了重大作用。

明朝中期，又出了名盛一时的“三耿”——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耿定向、耿定力皆进士出身，官至尚书、御史，为朝廷重臣，遇事敢谏。耿定向上疏救海瑞，耿定力上书陈述税收官吏贪赃枉法，皆轰动一时。耿定向在他的任期内，应乡绅和百姓之请，向朝廷上疏，陈述在麻城、黄陂、黄冈三县交界地方，因离所属县治较远，匪盗为患，民不聊生，建议设县。嘉靖四十二年（1563），经朝廷批准建县，始名新安，因属黄州府管辖，不久改为黄安。划麻城太仙乡、黄冈中和乡、黄陂滠源乡为县辖地域。原三县边界

疏于治理，人心不齐。合而为一后，人心振奋，焕发出新的活力。从此新生的黄安县在鄂东大地上渐渐崛起。耿定理则专攻学术，是有名的理学家，与李贽极友好。李贽是福建泉州人，时任云南姚安知府，后去官来黄安隐居，在天窝书院、洞龙书院讲学著书。所著《焚书》《藏书》《续藏书》有一半是在黄安写成的。那个时期，黄安的文风日盛，书院遍布各地， 读书人与日俱增，“理学名儒，比肩接踵”。

明末清初又出现了不少的文武官员。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清初康熙皇帝微服私访七里坪求贤的趣闻轶事。

“自古黄光多异人。”传说明朝初期，黄（安）光（山）间的天台山、莲台山里，住着 72 位贤士。他们大都是进士出身，有的官至七、六、五品。后来都不愿为官，隐居深山老林，以樵为乐，以僧为伴。康熙得知此事，在巡视江南时，微服私访七里坪，以游学先生的身份与 72 贤士晤面，论诗文，话时事，有意请他们出山从政。72 人无一肯从。康熙叹曰：“此乃真隐士也”。殊不知这些贤士鉴于明朝的腐败，已厌于仕途，又认为清朝是满族专权，心里不服。所以甘隐山林，直至老终。这段传闻也留下了历史遗迹。在七里坪枣林岗附近有一条山冲叫活水冲，冲里有一座石桥。康熙离开七里坪，所乘车子的车轮是用铁皮包的，滚过土路便留下辙印，滚过石板也留下痕迹。但车过石桥时，因石板坚硬痕迹全无。康熙说“此桥不驭”。从此无名的石桥便叫“不驭桥”。康熙喜欢大别山的风光，边走边看，不觉日已西沉，见不远处有一寺庙，就叫人去庙中借宿。和尚问他们是干什么的。答是游学先生。和尚欣然答应。该寺新修不久，一般称它为新寺，尚未书名。晚上，和尚请游学先生题写寺名。康熙书为“兴国寺”。和尚看了觉得奇怪：怎么将新寺写成“兴国寺”呢？和尚请署名，不书。第二天，临走时才写：康熙某年御笔。和尚欲拜，康熙已乘车而去。从题寺名的用意看，康熙到七里坪求贤是为了振兴国家，想必是认真的。可惜“不驭”。这“不驭”二字一语双关：一是那 72 贤士不好驾驭，二是与“不遇”谐音，求贤不得等于不遇。纵观历史，黄安人有一种敢于反抗，敢于斗争，不做奴隶做主人的传统精神。这种反抗精神在清朝表现得更为突出。据《黄安县志》记载，全县农民起义先后达 5 次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县南的夏嗣伯组织“朋人会”，聚众数千，“横戈过市，影响很大”。就是到了民国初期，还有 3 次农民起义。

除了起义，还有一批机智勇敢、打抱不平的人物，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社会恶势力进行“合法斗争”，使他们头痛，而老百姓则拍手称快。这

批人中声望最高的有 18 人，被称为“黄安十八老子”，其代表人物有卢四运、谢仁五、程光富、尚麻子、秦矮五等。他们在全县各地抑强助弱、整治贪官的故事流传至今。这里略述其一。

清同治光绪年间，黄安连年大旱，田地无收。贪官污吏不顾百姓死活，照样横征暴敛。群众怨声载道，十八老子的拳头攥得火星冒，要与官府斗，但一时又抓不到把柄。俗话说：“没有三天捕不到的老鼠”。不久，朝廷发下赈银，贪得无厌的县知事竟将赈银私分。拿出其中很少一部分收买笼络卢四运，想利用他堵住十八老子的口，防止百姓滋事。

一天，卢四运被县知事请到县衙，送他几十两银子。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卢四运心里很纳闷，便问：“知事大人，今日为何这般恩赐？”

县知事笑了笑，说：“卢先生有所不知，最近朝廷发下一笔赈银，如给百姓实在不够分。只好各级官员一人分一点。他们平日为百姓办事也够辛苦，算是一点辛劳费吧。你在乡间常为人调解纠纷，排忧解难，算是送你一点茶烟费。望先生笑纳。”

卢四运听了心里想：“你们这些狗官，百姓快饿死了，你竟做这样的缺德事。我早想到黄州府去告状，恨无盘缠和证据。现在正好用你给的银子去告你。”便收下银子高兴地走出县衙。

卢四运出县衙第一个找到家住县城不远的秦矮五，告诉他县官私分赈银的事，然后要他三天以后带人去县衙要求放赈，闹得越狠越好，要闹到知事将他抓起来坐牢为止。卢四运回到八里湾，又找谢仁五商定：我去黄州的第五天，你到省城去告状，状告黄安知事和黄州知府私分赈银还关押百姓。卢四运对谢仁五说，如省衙不受理此案，再由程光富等人进京告状。

事情布置停当以后，卢四运启程去黄州。“百姓告官三分罪”。卢四运自知此行险恶便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去田里割了一捆枯萎的稻禾并喷上盐水编成一个草席当行李背着，日夜兼程到了黄州。进了府衙，击鼓申冤，递上状纸。府台大人一看状纸，想到自己收受了黄安知事孝敬的几百两赈银，不问青红皂白，将卢四运打入大牢，令狱卒不给吃喝，企图让他饿死，然后上报犯人暴病身亡，以此灭口，死无对证。卢四运早已想到贪官会如此对付他，便以背来的带有盐水的枯禾草席充饥解渴。时间过去八天了，黄州知府以为卢四运一命呜呼了。谁知狱卒来报他没有死。气得府台大人的山羊胡子直往上翘。正准备提审卢四运，谢仁五到省衙告状准了。省衙差人到黄州提案子，将案犯卢四运带到省城关押。

再说巡抚大人看了谢仁五状告黄安知事与黄州知府私分赈银并关押秦矮五、卢四运等饥民，经查证均属事实。如不严惩，朝廷怪罪下来，自己难脱干系。不如杀一儆百，以证明自己清白无私。便下令将黄州知府和黄安知事押解到省与黄安案犯一起受审。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巡抚大人审完很快作出判决。判处黄州知府、黄安知事、卢四运死刑，即日问斩。

起斩那天，法场摆着饰有龙头、虎头、狗头的三口铡刀。将黄州知府推向龙头铡，黄安知事推向虎头铡，卢四运推向狗头铡。依次先斩了知府和知事。卢四运眼看解了心头之恨，一时情激，浑身发抖。巡抚大人见了问道："卢四运，你抖什么，是不是怕死呀？"

卢四运回答："启禀巡抚大人，我又怕又不怕。"

"你到底是怕还是不怕？"

"我怕的是你们官官相护。"

"不怕呢？"

"我不怕，因为我是为国为民。"

"你既不怕死为何发抖？"

"启禀老爷，我是冷得发抖呀。"

"这么热的天气你真的是冷吗？"

"启禀老爷，黄安无日月，黄州少青天，见不到太阳教人身冷心寒啦！"

巡抚大人听了卢四运的回答不无触动地说：念你为百姓，今天我不杀你。朝廷有律令，民告官三分罪。死罪虽免，活罪难逃。遂令衙役杖百释放。

从此以后，凡到黄安就任知事的不得不小心，都怕被十八老子抓辫子。十八老子的声望也越来越高。老一代的十八老子去世了，新一代的十八老子又起来了。代代不绝，助弱抑强的斗争传统也一脉相承。这些机智人物开展的合法斗争同起义一样，令人敬佩。

播种育苗　根深叶茂

清朝到了后期腐败无能，导致列强入侵，丧权辱国，民不聊生。孙中山先生勇敢地担当起拯救国家的重任，号召和领导全国仁人志士，为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国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911 年 10 月 10 日，爆发了武昌起义。这年岁次辛亥，故称辛亥革命。黄安有不少志士参加起义，其中较著名的有潘怡如、陈铁侯、江迪生、吴百

川等。在此之前，孙中山发起和领导过多次起义均告失败。这次起义之所以成功，是因革命党人在起义军中事先做了大量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是湖北新军。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秘密发展士兵参加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潘怡如是这些革命团体的奠基人之一。他虽不是武昌起义的领导成员，但他在准备起义和起义后的危急局面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为保卫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他四处奔走，领军作战，最后还是被军阀窃取了胜利果实。他因此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失去信心，后来，逐步转向了共产主义。1931 年成为秘密共产党员。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开，正在黄州中学任教的董必武无比激动，愤然剪去辫子，表示要与清政府一刀两断。第二天，他便去武汉参加辛亥革命。从此，这位秀才为扭转乾坤而奔忙。



“五四”时期的董必武

1912 年春，袁世凯篡国，辛亥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忧国忧民的董必武，百折不挠，继续寻求革命道路。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迅速波及全国。黄安的董必武、张国恩在上海，倪季丹、赵子建、郑南宣、张鹏飞等在武汉参加了这场划时代的革命运动。他们利用书信和报刊将“五四”运动的意义和目的，不断地在本县宣传，使偏僻的山乡也掀起了“五四”运动的热潮。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经董必武等人的启发和引导，戴继伦、曹学楷、郑位三、江子英、陈铁侯等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去武汉、北京读书，寻求新的革命知识，然后又将新文化、新思想传播到自己的家乡。经过知识分子的反复宣传，广大的农民群众也日益觉醒。

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的董必武、张国恩，结识了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汉俊。他带回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李汉俊向他们介绍了这些革命书籍。董必武读了这些书后，接受了马列主义，由一个信仰三民主义的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董必武后来回忆说：“李汉俊是我的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这个划时代的转变，不仅使董必武走上

新的革命道路，还为故乡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

“五四”运动后，董必武、张国恩回到武汉。为了唤醒民众，他们决心从头做起。1920 年 3 月，董必武、张国恩等在武昌涵三宫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以学校为阵地，传播马列主义。

武汉中学是为革命而办。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品学兼优，思想进步，赢得了社会上的一致赞誉。全省各地纷纷送学生去就读。尤其是黄安、麻城、黄冈、罗田、黄陂等县，进入武汉中学读书的学生日益增多。仅黄安一县到该校读书的就有 30 多人，其中第一批去的有董必武之弟董觉生，张国恩之子张仁达、外甥余义民，还有王鉴、雷绍全、杨献平、王文凤、王秀松、方自强、王度、韩鹏举、邹圣裔、汪运富等。董必武的外甥张培鑫到学校做校工，并为董必武开展革命活动当秘密交通员。与此同时，黄安另有一批学生如王文煜、张之乐、余文治、王文魁等到启黄中学，戴继伦、戴克敏、徐希烈、邓用中、王文焕、冯德浩等到湖北省立第一师范，郑位三到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刘建安到共进中学，曹学楷、郭天民到中华大学附中，戴季英到第六中学，江子英、江竹青到高师附中，彭年到湖北省立政法专科学校等校读书。

1920 年 8 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给董必武、张国恩写信，约他们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董、张复信表示同意。董必武即与在武汉中学任教的陈潭秋商量，陈极表赞同。接着董又与赵子健联系，赵也同意。于是，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赵子健首先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机关设在龙神庙。同时，在广州《唯民周刊》担任编辑工作的鄂城人刘伯垂，由穗返汉途经上海，被陈独秀吸收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上海组织要刘伯垂回武汉后与那里的共产主义者一同发展共产党组织。刘到武汉与董必武联系，然后又发展了包惠僧、郑凯卿等人。9 月间，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赵子健、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等，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内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设在武昌多公祠 5 号。从此，湖北诞生了共产党的组织。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的 7 名党员中，黄安籍的就占 3 名。黄安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是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的。

1922 年至 1923 年，董必武扩大工作范围，除主持武汉中学工作外还到省一师、启黄中学任教，与陈潭秋一起到共进中学、中大附中、高师附中、政法专科等校活动，积极发展党、团员。黄安在这些学校读书和工作的董觉

生、王鉴、雷绍全、余义民、张培鑫、戴继伦、王文焕、徐希烈等加入了共产党，王度、吴茂骥、刘建安、余文治等加入了青年团。他们是继董必武、张国恩、赵子健之后，黄安较早的党、团员。

1923 年冬，武汉中学首届生将毕业，学生中的党、团员要回到家乡去。鉴于黄安尚未建党，董必武与中共武汉区委研究决定，先在武汉成立党组织，回县去发展。年底，黄安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黄安工作组在武汉中学成立，其成员有董觉生、王鉴、雷绍全，负责人为董觉生。1924 年初回县后，党的工作组成员又增加了王文焕、徐希烈、余义民、戴继伦等。不久，董觉生赴苏联学习，党的负责人为王鉴。在党的工作组回县前后，董必武曾三次回乡，深入城镇农村，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帮助发展党团组织。董必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还是湖北党组织和黄安党组织的缔造者。

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1925 年黄安党组织由城镇发展到广大乡村，建立了 7 个跨区的党支部，有党员近百名。党的工作组改称中共黄安特别支部，直属武汉区委领导。这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1926 年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黄安党组织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开展农村革命。董必武又及时作出指导，强调农村革命一要充分发动和组织好工农大众；二要打倒骑在劳苦大众头上的土豪劣绅，让老百姓翻身做主人。有董必武掌舵，黄安这艘革命航船便快速前进。



董必武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油画）

早在1925年，全县就秘密成立了各级农民协会。当北伐军攻占武汉后，黄安人说反就反，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全县。广大农民不仅组织起来了，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农民自卫军。最为人称道的是吴焕先。他很有革命的预见性，在上级未下令成立农民武装之前，就在箭厂河秘密成立了三堂革命红学，较早地将农民武装起来。吴焕先的“三堂红学”闹革命，与贺龙的“三把菜刀”闹革命一样，成为鼓舞革命斗志的生动故事传颂至今。

党在建立农民协会的同时，还成立了工人、妇女、商民、学生、儿童等群众组织。

到1927年春，一个以打土豪、除劣绅、反帝反军阀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大革命运动，在全县掀起了高潮。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起来闹革命，干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其中有两件事是其他地方农民运动中所没有的：一是以农民协会为主成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在全省率先公开镇压了8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搬掉了压在劳苦大众头上的石头，让老百姓扬眉吐气，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无比伟大；二是以农民自卫军为主体，抗击外逃土劣勾结河南光山反动红枪会对县北农民协会的进攻，虽是原始的农民战争，但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让不懂军事的农民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且说农民运动兴起以后，黄安北乡的土豪劣绅纷纷逃往河南光山县，散布谣言，挑起光山的土劣对黄安革命不满。光山的土劣早想阻止革命向北发展，借口“应黄安人士请求”，调动他们的武装红枪会向黄安境内进犯。从1927年2月开始越境侵犯，到五六月间达到了高峰。红枪会不分时间，不分地点，说攻就攻，像洪水一样涌过来，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耕牛、财物就抢。黄安与光山毗邻的七里、紫云区有几千户的房屋被烧，几百头耕牛被抢，群众日日跑反，数万男女老幼躲进深山老林不敢回家。尖锐的敌对斗争，逼得农民协会不得不将广大农民群众组织武装起来，区乡成立农民自卫队，县成立农民自卫军，在董必武派来的湖北省警卫营援助下，向光山县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发起了反击，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

5月中旬，光山红枪会探知黄安七里区周八家、阮家店一带村庄的群众避进山中，大举攻占了黄石崖，企图搜山杀害群众，抢劫财物。黄安县农协闻讯一面向省求援，一面通知七里区农协集合农民自卫队抗击。半天时间全区集合了3000多人。各乡的自卫队员有的拿着刀矛叉棍，有的扛着鸟铳、来复枪，有的提着“罐子炮”（用小口径陶罐装石灰），浩浩荡荡向黄石崖开

去。走在前面当尖兵的是福德乡陈祖村的自卫队，他们在村农协负责人陈兴祥、陈焱奎的带领下，高举农民协会的犁头旗帜，急步横戈，威风凛凛，势不可当。

黄石崖位于七里坪以北的群山之巅，山顶筑有围寨。光山红枪会进占这里的有 1000 多人。当农民自卫队攻上寨子时，红枪会徒画符念咒，迎面扑来。自卫队将“罐子炮”一齐扔出。罐破灰扬，尘烟弥漫，红枪会徒泪流满面，咳嗽不止，一个个掉头逃命。自卫队员见那些自称刀枪不入的红枪会徒连石灰罐子都害怕，斗志更旺，一鼓作气追杀过去，将其击溃。首战告捷，七里区农民自卫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光山县的土劣不甘心失败。几天后又纠集 3000 多名红枪会徒再次占领黄石崖。他们东窜西扰，烧杀抢掠，将山下的杨家洼、周八家、阮家店等村洗劫一空。为了抗击红枪会的进攻，县农协集结了七里、紫云、城区、仙居等区的农民自卫队 5000 多人，在县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下大举反击。这次战斗由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高建斗指挥。出发前举行了誓师大会。高建斗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大会主席台的两边：

主义之花在心中怒放
革命道路用血肉筑成

激励广大自卫队员为保卫农民革命运动而战。经高建斗一番政治动员，士气更加高涨。誓师完毕，5000 多自卫队员进抵黄石崖，向红枪会发起猛烈攻击。县农民自卫军派出的一个中队，武器全是步枪，冲在最前面。自卫军与红枪会接触后，一齐开枪射击，啪啪啪的枪声，吓得会徒魂不附体，弃寨夺路而逃。农民自卫队乘胜追击，直捣红枪会的巢穴，惩办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俘虏了一大批红枪会头目及会众。经过教育后他们纷纷表示再不与黄安为敌。高建斗下令将他们全部释放回家生产，并警告他们如果再敢来犯定当严惩。黄安农民自卫队的仁义行动给光山县西部的群众留下良好印象。从此，这里的红枪会再也不敢进犯七里区。但狡猾的敌人却变换手法，将进攻的矛头指向紫云区。

5 月 27 日至 6 月 1 日，光山县南的大土豪陈二辉亲自指挥 3 个保 10000 多红枪会徒进攻箭厂河，被紫云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吴焕先指挥自卫队打退。陈二辉不甘失败，纠集 8 个保 30 多堂红学 30000 多名会徒，还勾结土匪王

小六的部队 200 多人枪，组成敢死队在前面打冲锋，声言要与七里、紫云两区的自卫队决一死战。

紫云区的战事吃紧，全县关注。县党部（由具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人员组成，以体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主要成员是黄安早期的共产党员，县党部由左派掌握，因此农运得以迅猛发展）连日开会讨论，决定全县动员支援这场战斗，并作出了具体的决议，交县政府和县农协去执行。会后，县政府一面电请省政府派兵增援，一面下拨专款补充前线经费之不足。县农协连夜召集县北七、紫、城、仙四区负责人联席会议，具体部署各区自卫队的作战任务。限一日之内，4 个区 60000 多自卫队员到达指定位置。其余各乡的农协会员，不分男女，有一分力出一分力，送水送饭，抢救伤病员。这些部署和措施很快得到了落实。省政府警卫营连夜从麻城赶到紫云，副营长王铭之率先遣队进驻木城寨，听取农民自卫队负责人的战情汇报后，对战斗重新作出部署：警卫营在第一线，县农民自卫军在第二线，各区自卫队在第三线，战斗打响后集中火力消灭敌人由步枪组成的敢死队，使之失去战斗力。

6 月 2 日天刚亮，陈二辉指挥红枪会向木城寨进攻，敢死队首先发起冲锋。王副营长指挥一线部队猛烈还击，两挺机枪和 100 多支步枪一齐开火，打死打伤红枪会的敢死队会徒近半，使其顿时失去了战斗力。那些手执大刀鸟铳的会徒，尽管人多势众，都不堪警卫营的火力一击，纷纷溃逃。陈二辉狗急跳墙，用重赏与斩首的办法督阵，想稳住阵脚扭转败局，都无济于事。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红枪会就全线崩溃。黄安农民自卫队在警卫营的掩护下，勇猛冲杀，直捣陈二辉的老巢，将祸害两县群众的反动地主武装一锅端掉了。从此以后，光山红枪会再也不敢进犯黄安县境。这场持续近半年的农民武装自卫斗争，带有原始战争的色彩，其他地方少有，是黄安农民运动的一大特点。经过这场原始战争，锻炼了广大农民群众，培养了大批武装骨干，为后来的黄麻起义奠定了基础。

回过头去看看，黄安党组织的建立和农村大革命运动的开展，给这块钟灵毓秀之地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涌现了郑位三、曹学楷、戴克敏、汪奠川、吴焕先、戴季英、王秀松、陈定侯、徐朋人等一大批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还涌现了一批工农革命骨干，如工人出身的李先念、周纯全、曾传六、袁克服、刘飞、詹才芳、郑行瑞等，农民出身的程昭续、吴永达、王建安、张仁初、邹国厚、汪立波等。他们都是在董必武播下革命种子后成长起来的。这批优秀的革命分子，是后来我党领导黄麻起义的重要骨干力量。

黄麻暴动　勇士如云

1927 年夏秋之间，风云突变。继蒋介石叛变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遂告失败。

国民党反动派打着改组清乡的旗号，到处捕杀共产党员，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黄安县城到处张贴着通缉令，悬赏捉拿以董必武为首的 92 名共产党员。凡被捉去的党员如张之乐、夏国仪（王鉴妻子）等，立即处死。在白色恐怖中，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动摇、叛变、出走。县委主要负责人和一些成员，也以各种借口离开战斗岗位，销声匿迹。曾经轰轰烈烈的黄安，变得黑云压城城欲摧。

但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怕压、不怕杀的。他们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与反动派展开斗争。这些坚定的革命派中，有从事党务和群众工作的郑位三、曹学楷、戴继伦、陈定侯、戴季英、陈翰香、郑友梅、戴雪舫、徐朋人、熊奠勋、王秀松、江子英、叶耐青、方谦寿、曾海洲、詹献庭、江竹青等；有从事农民武装工作的戴克敏、汪奠川、高建斗、吴焕先、吴先筹、赵赐吾、吴永达等；有从事工会、农民协会工作的郑行瑞、郑大开、阮德臣、田开寿、熊邦山、明汉华、邹圣裔、周纯全等。还有在“7 ·15”事变前，由省农协派来黄安接替高建斗担任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的黄埔军校学生、黄陂人潘忠汝。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他们成了黄安继续革命的中坚。

县委成员中唯一留下未走的是郑位三。他临危受命，重组了县委并代理书记。新的县委紧紧掌握县农民自卫军，将革命活动中心转移到县北七里坪。然后他与陈定侯一道去武汉与省委取得了联系。省委书记罗亦农在听取黄安情况的回报后，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两湖秋收暴动计划，要他们赶快回去组织暴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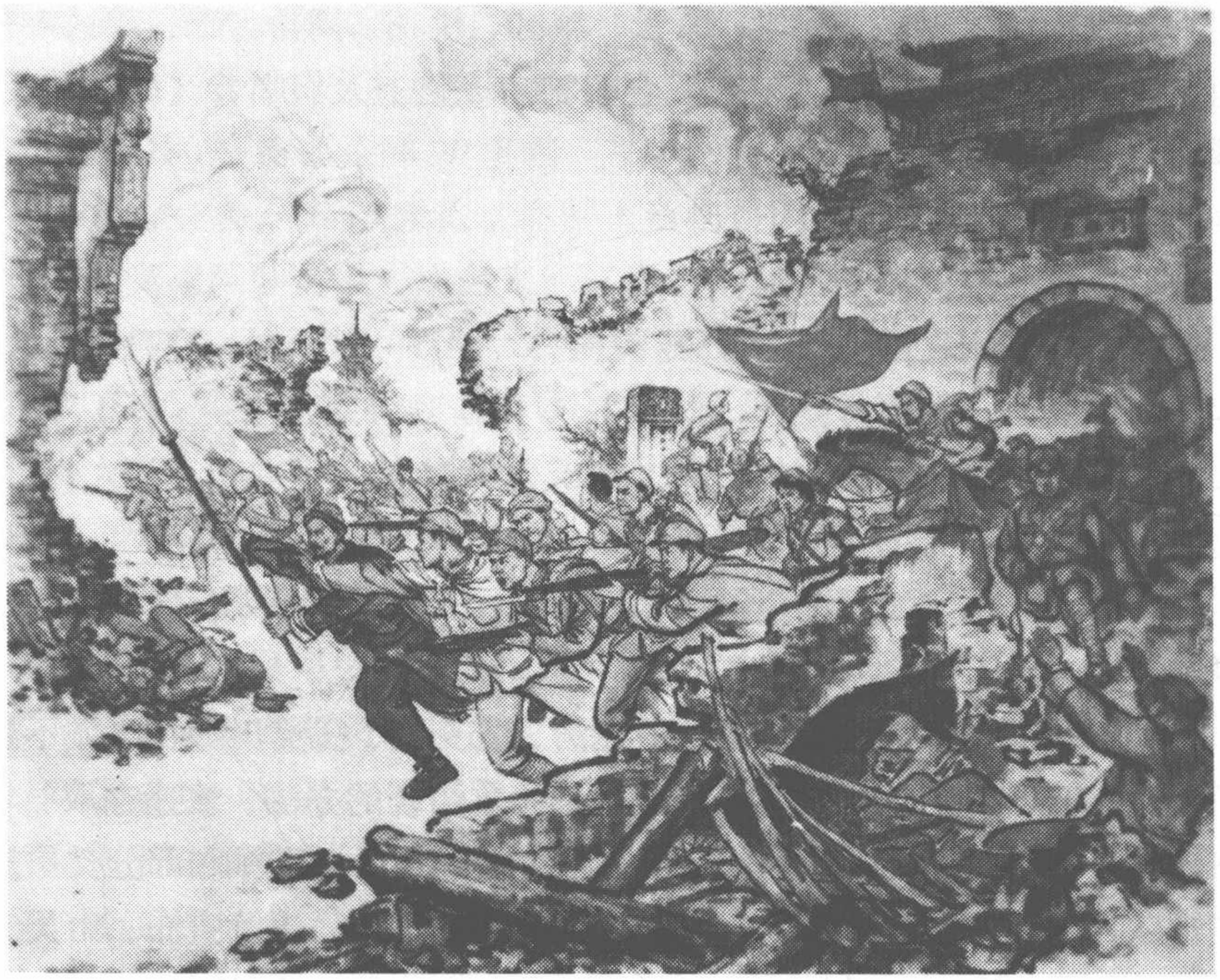
9 月中旬，正是农历八月中秋节前后。郑位三、陈定侯在从汉口返回七里坪的路上，看到萧瑟秋风中的农村一片冷落，心情十分沉重，决心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们回到七里坪后，立即召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的指示。经过讨论，决定以防匪保家的名义在各地建立防务委员会，成立义勇队，组织和训练农民参加暴动。会后，与会者分头下到各地发动农民群众。

9月26日，紫云区程卜畈300多名农民，在程昭续的率领下首先举起暴动大旗，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大土豪程瑞林，将他的浮财全部没收。接着长冲500多名农民在戴季英的率领下，将檀树乡的反动土豪劣绅捉拿归案，然后根据罪恶大小分别进行处决和罚款。七里坪店员工会负责人郑行瑞、秦绍勤率领店员和商民暴动，镇压了反动商会会长李业阶，没收了他的财产。仅一个星期，七、紫两区的工农暴动已达20余处。按照规定，在暴动中没收的财产一律用来购置武器。另外，紫云的十丈山庙、七里的张李家等地还建立了简易兵工厂，自制来复枪、撇把子枪和刀矛。通过购买和制造武器，千方百计把农民武装起来。与此同时，麻城县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后，在与黄安邻近的乘马、顺河两区也有10余处农民暴动。

但是，由于县委对“八七会议”精神领会不深和对土地革命的意义认识不足，在各地惩办了土劣和反动分子之后，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致使一哄而起的“九月暴动”趋于停顿。10月中旬，郑位三、戴季英再去武汉向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他们去汉不几天，郑位三因操劳过度，身染重病，戴季英暂代书记。郑在武汉治病期间错过了参加黄麻起义的机会，但他领导的“九月暴动”，为黄麻起义揭开了序幕。

10月下旬，湖北省委为加强对黄安、麻城工农运动的领导，派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王志仁等到七里坪。他们在文昌宫第二高等小学召开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贯彻省委的指示。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共黄麻特委，不久改称黄安特委，符向一任书记；还成立了鄂东革命委员会，刘镇一为负责人。同时改组了黄安县委，王志仁任书记。会后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下到各区组织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暴动。11月11日，特委又在文昌宫召开第二次会议，认为武装暴动已准备就绪，决定夺取黄安县城。会上成立了黄安麻城暴动行动指挥部，由潘忠汝、吴光浩、戴季英、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刘文蔚、汪奠川、王秀松、王志仁等组成，潘忠汝为总指挥，吴光浩为副总指挥。没有军号，指挥部根据黄安农民的传统习惯以铜锣为号，指挥号令暴动队伍。

在指挥部领导下，还成立了一部分区级指挥机关。黄安方面有：戴季英任七里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曹学楷任紫云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郑友梅任城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王秀松任桃花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麻城方面，王树声、徐其虚分任乘马、顺河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此外，黄安方面还有戴继伦、陈定侯、高建斗、徐朋人、吴先筹、戴雪舫、明汉华、熊奠勋等在各



黄麻起义夺取黄安县城(国画)

区领导农民武装参加暴动。

11 月 13 日，声势浩大的黄麻暴动开始了。特委调集黄安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两个排（另一个排在黄麻光边界上担任警戒，以防河南反动武装进犯），及七里、紫云等区千余精锐义勇队，组成攻城部队。义勇队中影响较大的有：潘遐龄率领的潘家河义勇队、阮德臣率领的阮家店义勇队、郑老四率领的郑必高义勇队、徐仕奎率领的火连畈义勇队、明汉华率领的土库店义勇队、曾海洲率领的七里坪周围义勇队、吴永达率领的张石河义勇队、叶耐青率领的叶家畈义勇队、刘本华率领的万田畈义勇队、程昭续率领的程卜畈义勇队、吴行忠率领的箭厂河义勇队、吴维余率领的油榨垮义勇队、李思禄率领的杨李家义勇队、赵赐吾率领的东岳庙义勇队、詹以锦率领的詹家垮义勇队、郑植良率领的马鞍山义勇队、方思发率领的刘家园义勇队、肖崇善率领的檀树岗义勇队、刘天华率领的龙井冲义勇队、高崇德率领的高桥河义勇队、李天忠率领的桃花义勇队、张豪金率领的张李家义勇队、汪立波率领的牌坊店义勇队等。晚 10 时，潘忠汝、吴光浩等率攻城部队从

七里坪出发向县城挺进。七里、紫云、城区、桃花、高桥、二程等区农民武装也从各自所在地向县城进发，配合攻城。一路上人们唱着《暴动歌》，显出锐不可当之势：

反动统治我们要推翻！
土豪劣绅我们要扫完！
工农们，齐暴动，
实现共产同把身翻！

午夜时分，黄安城周围集结了3万余众，人人摩拳擦掌，等候命令，准备进攻。

这时，暴动指挥部的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等在离城不远的三里店进一步研究了攻城方案，决定用围、攻结合的办法，快速夺取县城。其部署是：各区农民武装在城外形成多层包围，农民自卫军和部分义勇队组成攻击队，选好地点攀城而入直捣巢穴。研究完后，潘忠汝宣布：由吴光浩带队攻城。他想到大家对吴光浩还不太了解，便简要地介绍说：光浩同志参加过北伐战争，前不久又参加了鄂南暴动，他的战斗经验比我们丰富。他带队攻城会取胜的。吴光浩当即表示一定完成作战任务。会后，吴光浩请戴克敏、汪奠川与他一起同行，一边绕城察看地形，一边听他们介绍城墙和城内的情况。他们很快就选好了进攻地段。

14日凌晨，总指挥潘忠汝下达攻城命令。一时锣声四起，火光冲天，参加围城的农民武装，手持刀矛、鸟铳、锄头，在火把的映照下，奋勇向前。吴光浩带领的攻城队伍，由自卫军打先锋，义勇队殿后，像一条出水的蛟龙，向预定地段飞奔而去。

进攻重点选在城垣的西北角。不大的黄安城坐落在一条山冈上。西北角的城墙筑在山坡上。冬季少雨，护城河水很浅，没有设置障碍。兵临城下，就可攀登，所以选这里作为突破口。吴光浩指挥梯队架好梯，突击队分成多个小组，互相掩护，奋勇攀登。在此之前，潘忠汝指挥3万多人已在城外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城内的穷苦百姓也自发起来配合。守敌只有警备队，战斗力不强，在声势浩大的暴动队伍面前，吓得心惊胆战，抵挡不住。战斗进行不久，攻城部队就从西北角攻入城内，打开四门。集结在城外的各区农民武装，潮水般地涌入城内。反动武装被淹没在农民暴动的汪洋大海之

中，没有抵抗多久，就被消灭了。

这次战斗，全歼黄安县警备队 100 多人，活捉反动县长贺守忠以下官吏 16 人，缴枪 180 多支，子弹 90 多箱，军钞数百元及大批财物。我攻城部队仅牺牲吴登行一人，伤 10 余人。有些人负伤是因为没有作战经验造成的。参加攻城的义勇队队员吴先恩后来回忆说："当我乘梯子快爬上城墙时，觉得脚背一阵疼痛，便喊道，哎呀，我的脚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后面的队员马上扶我下梯。他们把我抬到偏僻处一看，原来是城墙上掉下来的砖头砸伤的。引得大家一阵哄笑。接着我们又去攻城。"从这个小小的插曲中，我们可以看出，黄麻暴动不同于"八一"南昌暴动，也不同于湘赣边秋收暴动，那两次暴动都有正规部队参加，黄麻暴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暴动，所以在战斗中带有浓厚的农民习气。

但是，就是这些英勇无畏的农民，在长江以北地区率先举起红旗，使暴动取得了成功。这是何等了不起！意义更深远的是，暴动造就了一大批工农革命骨干，如木匠李先念、窑匠徐海东、少林寺和尚许世友、茶房杂役周纯全、校工詹才芳、长工王建安、陈再道，以及不是工匠就是长工或放牛娃出身的吴先恩、周业成、程启光、程儒珍、程坦、曾传六、袁克服、吴世安、徐深吉、秦基伟、郑如星、郑维孝、汪立波、韩卫民、张天伟、刘飞、李世焱、邹国厚、罗应怀、耿锡祥、武世洪等，他们后来成为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



黄麻起义中吴先恩攻城负伤。1963 年吴先恩(右二)回家乡红安，在当年攻城地点讲述当时的情景。

黄麻暴动夺取县城后，贴出鄂东革命委员会布告，宣布此次暴动的意义，要商家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城内秩序井然。下午4时忽得侦探报告，说敌第30军一个团已进到离城20里的地方。指挥部考虑到暴动部队彻夜未眠，已是人困马乏，决定退出县城，将所有缴获运往七里坪。6时许，农民自卫军从北门撤出，敌人从西门进来。刚被农民起义风暴席卷过的黄安城，硝烟尚未散去，它的余威犹在。敌人见到一座空城和同伙尸体，惊恐万分，15日即逃窜。

指挥部率暴动部队返回七里坪后，着手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筹备处，做好进城的准备工作。16日，经过短暂休整的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地开进了县城。还组织了宣传队，广泛宣传夺取政权，成立农民政府，实行土地革命的意义。沿途群众和城内商民，纷纷放鞭炮欢迎，高呼“拥护农民革命军！”“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革命气氛异常热烈。

18日，在县城南门外校场岗召开万人大会，会场中央搭了个大台。两边的台柱上贴着用红纸写的对联，十分耀眼。那对联是：

痛恨绿林兵，假充白日青天，黑暗沉沉埋赤子；
克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

这副对联是城内一位叫吴兰陔的秀才写的。他出身于小商家，同情劳苦大众，不满封建军阀的统治，常用诗词、对联讽刺贪官污吏巧取豪夺。“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据说是他作的，至今还在群众中流传。农民暴动胜利后，他打心眼里高兴，巧妙构思，精心创作，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嵌入对联中。用鲜亮的颜色写新军队，以黯淡的颜色写旧军队，形成了强烈对比，使人更加喜新恨旧，并发出了“拥红军”的欢呼。当时虽有南昌、湘赣边等地举行暴动，但没有人称工农革命武装为红军，只有吴兰陔这样讲。他是全国最早将工农革命武装称为红军并写入文学作品中的人。

这次大会有两项重要议程：一是建立政权，二是建立军队。在热烈的气氛中大会开始。鄂东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镇一宣布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由曹学楷、王秀松、戴继伦、陈定侯、吴先筹、张心灼、程昭续、田开寿、周纯全9名委员组成，曹学楷为主席。会上，曹学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交粮饷送钱给大老爷，或者是被土劣贪官抓

着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外，再不敢进大老爷的衙门。但是，今天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组织自己的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点证明我们革命的力量，证明现在是劳农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曹学楷的讲演，赢得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群众高呼：“农民政府万岁！”“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土劣贪官！”“实行土地革命！”等口号。大家都为有了自己的政权而高兴不已。

继农民政府成立后，接着建立军队。特委将参加暴动的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和由徐海东率领的近 10 人的黄陂县河口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民自卫军为第 1 路，麻城农民自卫军为第 2 路，河口农民自卫军编入第 1 路，派徐海东仍回黄陂去发展农民武装。全军共 300 余人。潘忠汝任鄂东军总指挥，吴光浩、刘光烈任副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潘忠汝兼 1 路司令，戴克敏兼 1 路党代表，吴光浩兼 2 路司令，刘文蔚任 2 路党代表。这就是鄂豫皖红军的最初来源，也是推动鄂豫皖武装斗争的最初的核心力量。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立时，举行了阅兵式。总指挥潘忠汝在参谋长汪奠川的陪同下，骑马检阅了部队，然后在欢呼声中发表讲话。他说：“莫看我们穿的是农民装，拿的是土武器，我们这些土人土货，却能打败广人广货。”“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城，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路，打下我们的江山……”总指挥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更提高了革命军的斗志。

这次暴动使黄、麻两县的义勇队发展到 4 万多人，仍以区成立指挥部，对义勇队进行整编和训练。

19、20 日，黄安各区接连不断地开大会庆祝。麻城、黄陂、黄冈、罗田和河南光山、商城等地也纷纷派代表到黄安祝贺，并表示：“你们已经抓到了权柄，故有今日这样的好处。我们回去也一定照你们这样去抓到权柄。”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六百多年前，邹普胜在七里坪发难后建立过天完政权；六百多年后，黄麻人民又在七里坪发难，建立了工农政权。但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时代前进了，事物发展了。黄麻暴动比邹普胜起义，无论从纲领到行动，都更完善、更广泛，更富有生命力和战斗力。

喋血山城　转战木兰

黄麻暴动的胜利，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国民党的喉舌——中央通

讯社11月29日从汉口发出惊呼：

鄂东黄安被农军盘踞，且其势更比前蔓延。该县城自上月（应为本月）被攻陷，县长贺守忠及司法委员、改组委员，各局所委员等16人均被杀。此后旬日，农军踪迹已遍及全县。首领闻系湖北前农工厅长董用威，董籍隶黄安。自清党即率党徒（多武汉中学生）潜赴县北之七里坪举事，并组织农工政府，大倡土地革命，贫苦农工附从者已达万人。

这则通讯所讲的与事实基本相符。但说首领是董用威（董必武）那是他们的推测。实际情况是，“7·15”事变后，董必武根据上级的指示离开了武汉，转赴莫斯科学习去了。董必武虽未参加领导黄麻暴动，但他播下的革命种子开花、结果了。可见董必武对黄麻暴动的贡献很大。

此时，国民党桂系与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集团刚打完派系仗。桂系占据了武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忙调驻河南的第十二军任应岐部“进剿”黄麻。在此之前，国民党的杂牌军也容不得黄麻农民暴动，曾不断地进攻过黄安城，均被鄂东军和义勇队击退。大家觉得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什么了不起。认为“派一个团不敢来，派两个团打不进，派一个师未必有”。产生了轻敌思想，更不知道暴动胜利后转到农村去发展，建立根据地。而是待在县城，以城市为中心向农村发展。怎么也想不到这条路走着走着就走不通了。

12月5日，敌第十二军教导师闻清霖部从豫南绕道宋埠，奔袭黄安城。守卫县城的鄂东军视为小股敌人来犯，据城固守。县城附近的农民武装也纷纷驰援。战斗从晚上12时开始持续到翌日4时，虽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城门被敌人攻破。鄂东军和义勇队同敌人反复拼杀，才突出包围。解放21天的黄安城又陷敌手。

这次战斗，我军伤亡重大。县委书记王志仁在南门牺牲。他是河南光山县柴山堡王家塝人。1924年在武汉启黄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工作。黄麻暴动前受湖北省委派遣来黄安任县委书记。鄂东军副总指挥刘光烈在东门的东北角与敌激战，以身殉职。他是黄陂刘家塝人，黄埔二期生。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第五连连长，后参加南昌起义，转战闽粤，在汕头失败后潜回湖北，被省委派往黄安参加并领导暴动。总指挥潘忠汝为掩护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率部突围，几出几进城门，最后身负重伤。在由吴世安等抬往紫云区的途中，因得不到及时救治牺牲在潭

畈河。

敌占县城后，接着进攻七里、紫云和麻城乘马、顺河等地。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趁势还乡，与第十二军一起进行疯狂报复。各村被烧掠一空，大批参加暴动的干部、群众惨遭杀害。黄安七里坪店员工会负责人秦绍勤，七里区防务会宣传股长张南一、城区党员王明宏、杨志洪等和数以千计的党员和群众被杀害。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鄂东军第二路党代表刘文蔚等和400多名群众被杀。反动派妄图以血腥的手段将黄麻地区的武装革命镇压下去。但是已经燃烧起来的革命火焰是扑灭不了的。

12月中旬，从县城突围出去的鄂东军陆续回到七、紫地区。原想以黄安北部的九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九焰山传说是薛刚反唐时驻扎过的山寨，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寨内可容数百人。但一片荒芜，与山下群众相隔很远，不便开展活动。鄂东军到那里去坚持斗争不合适，便另行计议。下旬，符向一、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汪奠川、戴季英、徐其虚、廖荣坤、江竹青等在紫云区木城寨开会讨论。会议认为敌情严重，有不消灭我们不止之势。我们不能老停留在中心区，要打出去，把敌人引走，减少中心区的损失。吴光浩提出到木兰山活动。他是黄陂木兰山下蔡吴家村人，对那里的情况熟悉。大家一致赞成。会议决定留吴焕先、甘济时等少数人在当地坚持外，多数人到木兰山活动3个月再回来。会后，符向一取道麻城去武汉。在此之前刘镇一也去了武汉。黄安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走后，其活动也停止了。此后湖北省委就直接向黄安县委下达关于鄂东军的行动指示。这时的县委书记由戴季英代理。

12月下旬，鄂东军在黄安紫云区闵家祠堂集合，经清点共72人，42支长枪，9支驳壳枪，在吴光浩、戴克敏等人的带领下，昼伏夜行，29日到达木兰山。

这72人是烈火中炼出的金刚，是继续高举黄麻暴动旗帜的旗手，他们的名字和功绩应永垂青史，但没有文字资料记载下来。黄麻暴动领导人之一的戴季英1982年深情地回忆说："去木兰山的72人，和以后上木兰山的人，他们大多数是无名英雄，有的人连姓名也没留下就牺牲了，每次想起来我心里很难过。现在我能记得起来的人有：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汪奠川、江竹青、徐其虚、王树声、廖荣坤、林柱中、丁茂富、郑福东、张忠国、李继先、张心灼、陈再道、程启光、邱江浦、江波、陈福润、戴道普、曹学道、方思发、郑老四、郑遵敏、郑植璜、戴本魁、王景、吴行忠、余士明、

董纯齐、石生勇、叶耐青、程昭续、吴永达、潘遐龄、李成道、李绍启、刘大如、刘本华、詹学道、阎常如、刘天华、王宗彦、来显焱、方思德、黄家寿、戴先汉、郑芽绿（诨名芽绿，真名不详）、王豌豆（诨名豌豆，真名不详）、董孝玉、吴先筹、晏仲平、张忠顺、徐朋人、戴继伦、戴先诚、戴学诗、　保纯和我。”时间过去55年了，戴季英老人能记起连他在内的59人已是很不错了。从这59人的籍贯看，百分之八十是黄安人。这些英雄当然还应包括未上木兰山而留在当地或去外地坚持斗争的人，他们是暴动后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

1928年1月1日，鄂东军在木兰山的雷祖殿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汪奠川。全军不足80人，分3个队，每队20多人。然后又由第七军领导人和黄安县委、县农民政府负责人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曹学楷、戴季英组成党务委员会，形成统一领导。这五名成员除吴光浩外全是黄安人。他们是在暴动中最早成长起来的黄安的军政干部。



1985年5月，作者（右）访问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戴季英。

部队改编后，以木兰山为中心开展活动，四处张贴黄安县农民政府布告，宣传共产党和第七军的政治主张，号召群众起来推翻国民党和土豪劣绅的统治。兵不厌诈，第七军还大肆宣扬：“我们是打前站的，大部队还在黄麻……”用这种办法迷惑敌人，鼓舞群众。第七军一边宣传发动群众，一边

打击土豪劣绅和反动武装。1 月上旬，吴光浩带一个队，首先镇压了李波臣父子，他们是杀害黄陂县委书记吴光荣的罪魁祸首。接着各队在张家塝、塔耳岗、柿子树店等地惩办了一些土劣和反动头目。木兰山地区的革命局面被迅速打开。1 月 17 日，第七军袭击长轩岭敌人据点，破坏电话线路长达数里，中断了敌人的通信。23 日，乘农历年关敌人疏于戒备之机，打下了反动堡垒罗家岗，缴枪 19 支，打开当铺和粮仓，让群众取当、分粮，一连 3 天，前来领取衣物和粮食的人成千上万。这些胜利震惊了敌人。12 月底，敌十二军一个团便向木兰山进攻。第七军党委会向省委请示行动方向。省委回信说如能返回黄麻老区即回去，不能则自己决定行动，总的要求是不能被敌人消灭。

这时，得知黄冈县委在大崎山举行暴动并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党委会决定将部队分成几个小组，由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戴季英分别带领突出敌人包围，到黄冈去打游击。留曹学楷、徐朋人等在木兰山、洪界山一带坚持，收留原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人员。不到一月，收留了 60 多人。为扩大影响对外称第八军，徐朋人任军长。他带着只有一条半枪（因一支长枪断了枪托）的部队与敌人捉迷藏。这便是后来流传的徐朋人一条半枪打游击的故事。第七军于 2 月初到达黄冈，与第六军会合不几天，遭敌军“进剿”，两军分开游击。第七军向罗田转移，因群众基础较差，不便久留，于 3 月初又回到木兰山，在塔耳岗附近与徐朋人的第八军会合。党委会决定两军合编，仍称第七军，八军的番号撤销，共有 140 余人，长短枪 80 多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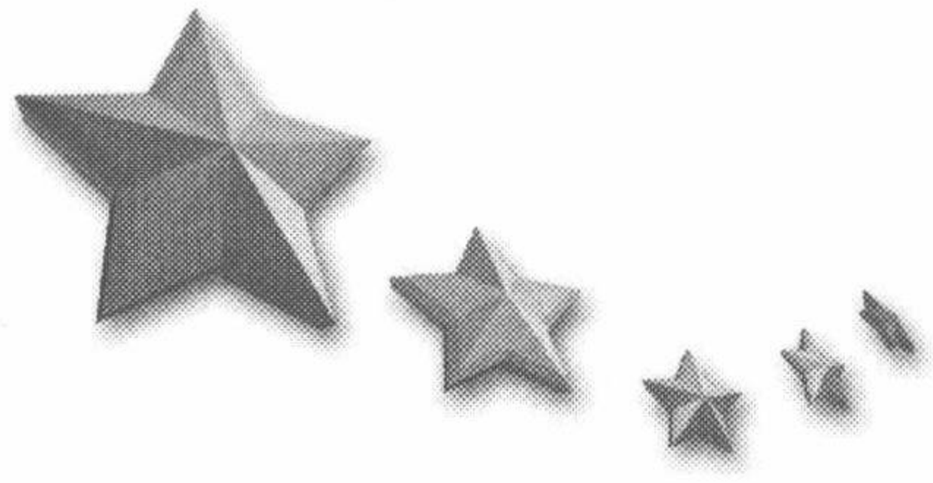
3 个多月来，第七军在四处强敌中谋生存，求发展，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戴季英 1944 年 7 月 14 日在延安写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一文中有这样的叙述：

> 由于数月以来日夜的游击与各地辗转，觉得游击战争要“八会”：会跑（跑路与跑脱敌人）、会打（不打无益之仗）、会散（散开）、会集（集合）、会进（进攻）、会退（退走）、会知（知敌）、会疑（疑惑敌人反动派）。这是当时闲谈的“八会”，是环境与实际生活中产生的主观感觉，还没有形成文字。后来，到 1928 年冬中央指示说：“失利后（指黄安城失守——笔者注）的方针与方向是对的，努力完成了党的使命，游击战争开展很好，大有成绩……”回到木兰山地区不多日，又得知敌人要进一步地有计划地来消灭我们，于是在洪界山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改

变策略。为保存现有力量与便于发展，决定埋藏长枪，持短枪，穿便衣，分成数小队，积极扩大游击，争取红枪会、仁义会的群众，加强地方工作，军队党组织兼管地方党组织。为适合便衣队的游击战争，在战术上决定：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这几句成文的简单术语，以后在实际中一直运用。黄麻农民起义军开始是不会打仗的，后是从战争中学会战斗。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关于第七军转战木兰山最早的文字记载。透过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武装斗争的一大进步。有了这个进步就为后来边界割据奠定了基础。

3 月下旬，根据洪界山会议精神，第七军编成 4 个短枪队，分散游击，隐蔽活动，等待时机，准备打回黄麻老区。全军缩编为 40 多人。其余的人分散隐蔽，做到招之即来。这 4 个短枪队立即向四面出击：戴克敏、徐其虚带一个队由黄安县南进到县北活动，王树声、廖荣坤带一个队东进麻城，吴光浩带一个队到河口以北，汪奠川带一个队在木兰山附近活动，曹学楷、戴季英、徐朋人等在黄陂与黄安边界上做发动群众的工作。4 个短枪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后在枫树店镇压了麻城福田河反动民团团总彭汝林，在汉口至宋埠的公路上处决了被群众称为“屠夫”的敌黄安县公安局局长曹某某。不幸的是，3 月底汪奠川所带一个队在黄陂汪家西垮与敌遭遇，全队 12 人除戴学诗被捕叛变外，其余壮烈牺牲。这是转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汪奠川既是董必武的学生，也是毛泽东举办的武昌农讲所的学生。他闹革命是从家庭开始的。1924 年在武汉中学读书时，就给地主父亲写信说：一块银圆一斤肉可以吃，一块银圆一斗田不要买。家里的土地应该还给种田人。后来他就是这样做的。从农讲所回来，他在县农民自卫军工作，任过自卫军指导员，善于管理部队。汪奠川的牺牲不仅使第七军失去了一位好参谋长，也使黄安失去了一位早期的红色将才。



第二章　革命摇篮苦创成

戴克敏首返起义区重开革命局面。起义领导人秘密集会清水塘决定开辟柴山保。王秀松首倡割据大别山。“左”倾危害鄂豫皖，黄麻起义领导人多数被害。红安人“一要三不要”前仆后继争当革命脊梁。

深谋远虑　割据大别

1928年4月初，“进剿”黄麻地区的敌第十二军与桂系军发生冲突。第十二军撤回河南，桂系军未跟进，暴动区暂无敌人进驻。5日，是清明节，为祭祀祖先，人们成群结队外出扫墓。戴克敏抓住这个机会，带领短枪队返回紫云区，在檀树岗西面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清水塘村（他的未婚妻家里）隐蔽起来，然后派人侦察地方反动武装的情况。得知他家所在的上戴家村驻扎的郑维遂民团戒备松弛。7日晚上，戴克敏带队摸进村去，直扑郑维遂的住处。郑来不及反抗，就被戴克敏一枪报销了。敌人顿时乱作一团，举手投降，缴枪20多支。首战告捷，战士们更加奋勇。接着去打檀树岗的民团，敌人闻风而逃。群众听说革命军回来了，纷纷出来欢迎，并控诉反动军队和民团的滔天罪行，要求革命军再不要走。消息传开，在麻城活动的廖荣坤所带的一个队也赶来紫云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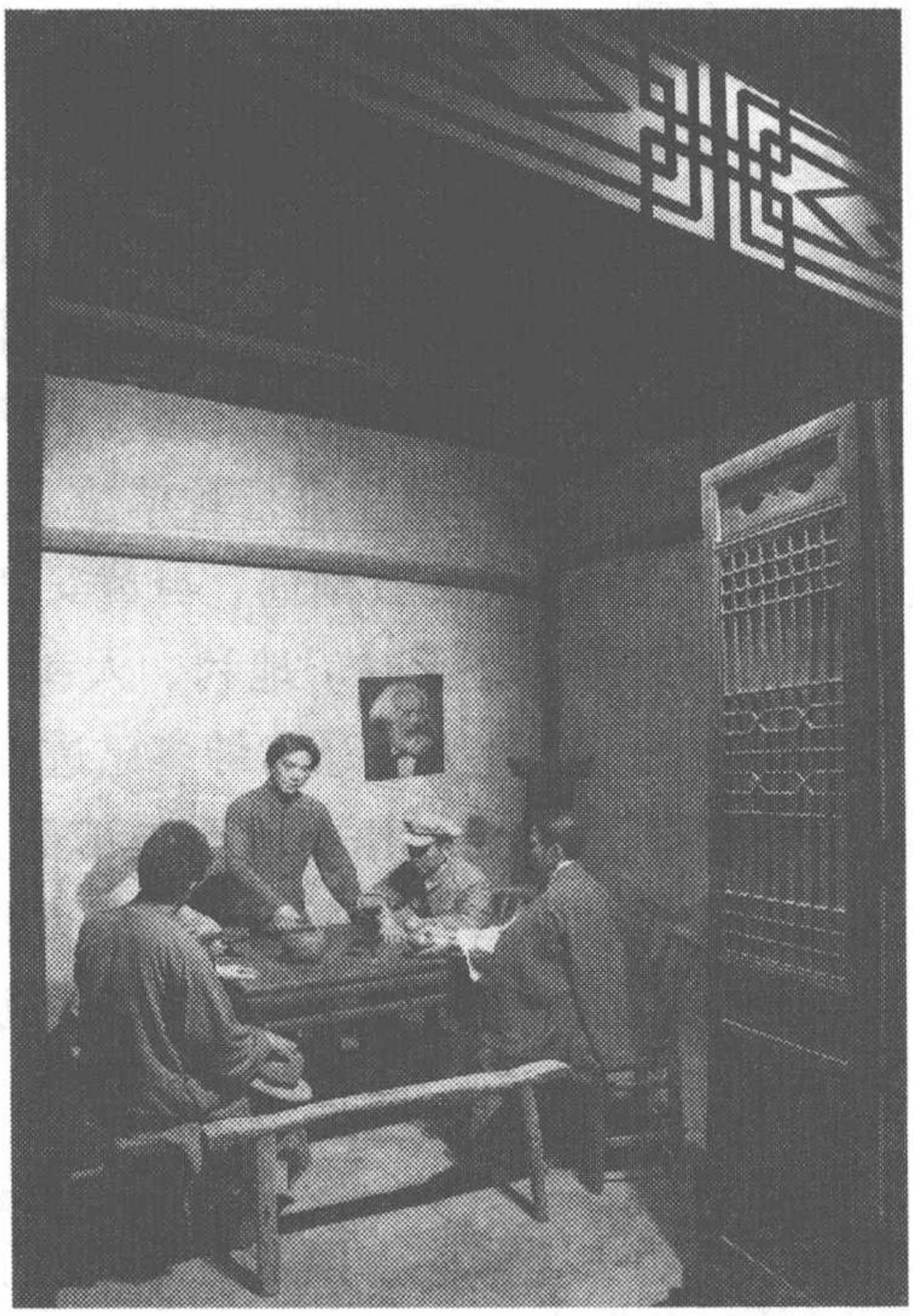
几天后，戴克敏派程启光去木兰山送信。吴光浩、曹学楷、戴季英、徐朋人接到信后，在陈秀冲召开会议，决定第七军返回黄麻，以原来的暴动区为基础再组织暴动，用游击战的方法号召群众，首先消灭民团、清乡团和反动分子，不打城市，建立基层党组织，寻回避难的同志，实行土地革命。这个决定可说是暴动5个月来的经验总结，表明第七军领导人善于从挫折中吸取教训，有办法走出困境。

会后，吴光浩集合分散在各地的队伍，取出埋藏的枪支，于4月中旬回到紫云区与戴克敏会合。战士们重返家乡，情绪高涨，斗志昂扬。他们在吴光浩、戴克敏的带领下，向民团、清乡团和土豪劣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数天之内，拔除了长冲、长塘边、谭畈河、两道桥等地的民团或清乡团的据点。原来留在各地坚持斗争的同志也趁势而起。高桥区的詹献庭、詹才芳带领参加暴动的义勇队50多人，打垮了王兴禄的清乡团，缴枪40多支；李先

念带领数名游击队员处决了反动分子陈志斌。紫云区的吴焕先带领游击队消灭了箭厂河民团；赵赐吾的游击队攻下了民团据点许阁楼。城区的汪立波带一支只有7人的游击队也有斩获。不到一月，七里、紫云、高桥、城区、桃花等区先后有3万多名群众组织起来，手持刀矛、土铳等武器，高喊“为死难者报仇”的口号，参加到打民团、清乡团和镇压反动分子的斗争中去。这次掀起的革命高潮，称作“二次暴动”。当时有人作歌唱道：

党员游击转回还，
黄陂到黄安，先打清乡团。
捉土豪，杀劣绅，一致要共产。
倘若谁反抗，叫他狗命完。
民团把枪交，士兵来哗变。
只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

敌人是不会让工农革命军坐大的。桂系第十八军很快就调集兵力控制了七里坪、箭厂河和麻城乘马岗等大小集镇，帮助豪绅地主恢复武装，然后联合起来向暴动区不断地进攻。第七军在与优势敌人周旋中，往往一日数迁，处境艰难，深感需要一个地方立足，以便使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成了当务之急。好在几位领导人中除吴光浩外，都是本地人。戴克敏、曹学楷、戴季英、陈定侯的家就在边界上，鄂豫两边的地理、人情他们都很熟悉，对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有利。加上革命军为避开敌人进攻，经常越过边界到河南光山县柴山保一带活动，发现那里无敌正规军驻扎，是一个空隙，可以利用。于是5月间，吴光浩、戴克敏、



清水塘会议(蜡像)　　黄麻纪念园

曹学楷、戴季英、徐朋人、陈定侯等在清水塘村戴克敏未婚妻家里开会研究，大家很快形成一致意见，决定以黄麻光三县边界上的摩云山、木城寨、羚羊山、光裕山为依托，以柴山保为活动中心，开展群众工作，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创建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这就是后来所讲的开辟柴山保。

知道这次开会情况的程启光回忆说："会议是在清水塘戴克敏的岳父郑遵朗家里开的。当时我们几个战士在周围放哨。会一开完，戴克敏就跟我们传达了开会的内容。吴光浩、曹学楷也跟我讲了开会内容。一队的战士几乎人人知道清水塘会议精神，只是暂不对外讲。曹学楷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他说大家要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要进柴山保。"

清水塘村的老年人对这次会议也有很深的印象。1981 年 6 月 26 日，南京军区顾问周志坚将军，带领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的同志，考察清水塘会议地址时，与知情人座谈，笔者一同参加。座谈会上郑行道说："我今年 66 岁，家住清水塘。我那个塝子很小，只三户人家，共 19 人。民国十七年清明节，戴克敏他们从木兰山回来了，住在我伯父郑遵朗家里。伯父的女儿从小与克敏订了婚，是亲戚。塝子虽小但房子很宽。三家连成一大排，前面共有一个大院子。我家与伯父家连在一起。当时我有 13 岁，蛮记事。戴克敏他们常在伯父家研究事情。我在他家出出进进，没人说不行。有一次，戴克敏他们又在伯父家开会。伯父以看管一窝小猪娃为名坐在门口，不让其他人进去，也不让我进去。我觉得奇怪，就问伯父为什么不让进，他也不讲。这次会后没多时，戴克敏他们就到边界那边去了。后来听伯父讲，那次会是研究如何去开辟柴山保。因怕走漏了风声，所以不让外人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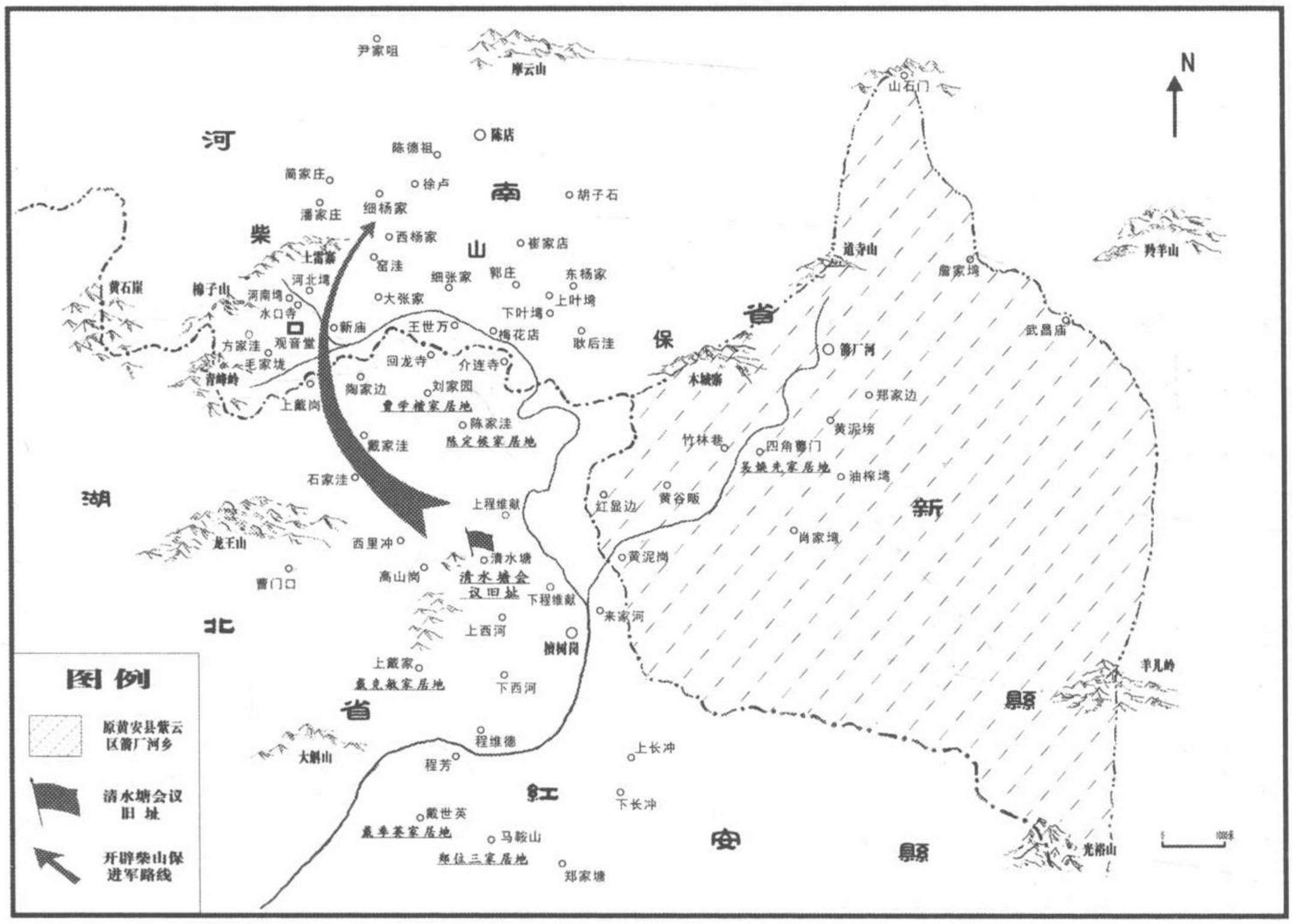
柴山保是区下面一个行政单位。现在说来是以陈店为中心的那一带地区。它位于河南光山县南面，与黄安县七里区、紫云区毗连。第七军选择这里做落脚点可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鄂豫两省的敌军"进剿"，步调尚不一致。当地大土豪劣绅多已逃亡，中小地主采取两面敷衍。反动红枪会的下层人员渐已觉悟，不愿与革命为敌，这是天时；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物资比较丰富，这是地利；老百姓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很深，积极要求革命，又与紫云、七里、乘马、顺河区相连，可得到革命老区群众的支援，这是人和。有这些有利条件，第七军开辟柴山保就比较有把握。

几天后，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等将第七军带到边界黄安一侧的陶家边、上戴岗、回龙寺等处住下。次日晨，当林雾漫漫，溪水生烟，太阳来不及将它们收拾干净时，吴光浩令第七军趟过清澈的小溪河，踏进柴

山保的地界，进驻紧靠陶家边的河南湾、方家洼、新庙、水口寺等地。第七军在这里跨步能进去，立马可返回。可见开辟柴山保，从一开始就是谨慎行事，以防不测。

果然三天后，便有敌人来犯。不是光山来的，是紫云区土豪方小亭带领驻长冲的桂军奔袭河南湾。吴光浩指挥部队占据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缴获驳壳枪 3 支。敌人吃了败仗，无处出气，官长用马鞭抽打方小亭。这次战斗打响了开辟柴山保的第一枪，鼓舞了边界上的广大群众。他们作歌唱道：

工农革命军真勇敢，
河南湾打一仗，
盒子枪缴三管，
方小亭挨皮鞭。



黄麻起义领导人居住地、清水塘会议旧址和开辟柴山保实行边界割据地理位置示意图

接着第七军又在天台山、韩家老屋等地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第七军

每到一地，就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用模范行动去影响群众。如买卖公平，损坏东西赔偿；在群众家里吃饭，每桌给 1 块银圆；借一床被子给 3 个铜板；野外宿营肚子饿了吃了群众的红苕，将钱放在扒过的苕蔸里并留字条说明。工农革命军的爱民行动与搜刮民财的反动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群众看在眼里，无形中接纳了这支军队，欢迎这支军队。于是第七军就在柴山保站稳了脚跟。

进驻以后，更重要的是开辟地方工作。第七军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齐心协力，各尽所能，黄安籍的领导人更是使出全身的解数。作为党代表的戴克敏，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时，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从当地的社会和政治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不急于分配土地，实行减租减息。这样做稳定了人心，分化了敌人，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为开辟柴山保起了重要作用。曹学楷在柴山保有很多亲戚朋友，决定由他领导地方工作。当时地主武装红枪会遍地皆是，会众又都是老百姓。开展地方工作，首先要把老百姓从红枪会组织中争取过来。曹学楷为了分化瓦解红枪会组织，一面派可靠的人打入内部，争取会众；一面设法接近红枪会上层，分化会首。他认识当地一个叫崔世祥的茶叶商人。此人读过书，社会阅历丰富，同情革命队伍，与红枪会头目有来往。曹学楷先做好他的工作，请他在各枪会首领中间周旋调停。最后在他家备下酒宴，请来光山南部大小几十个红枪会会首。曹学楷在宴会上敬酒说：“光山、黄安虽属两省，但田地搭界，山水相连。大家不是亲朋就是戚友，再互相打下去就对不起人。今后只要你们不干涉我们，我们也不会打你们。”会首们听了，多数人认为曹学楷的讲话明大义，有道理，便不再与革命队伍为敌；但有少数人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扬言要把共产党一网打尽。曹学楷认为不消灭他们不行。他又请崔世祥出面，以会商要务为名，将所有枪会首领邀来。就在这个会上，曹学楷宣布了吴文路、陈寿堂等 4 名反动会首的罪恶事实，下令将他们处决。杀一儆百。从此，红枪会头目不敢与革命为敌，会众也不相信“刀枪不入”的鬼话，不再为土豪劣绅卖命。于是反动红枪会土崩瓦解。曹学楷因势利导，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将争取过来的会众组织到革命的红枪会中，使他们成为地方革命武装，为边界割据增添新的武装力量。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各项地方工作也能顺利进行。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柴山保的割据局面便已打开。与此同时，在

黄麻老区工作的王秀松、徐朋人、戴季英、吴焕先等，在恢复发展党团组织，成立农民会、穷人会，扩大游击队，开展兵运工作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7 月 14 日，敌第十八军驻紫云区来家河一个连 73 人哗变投诚。这是徐朋人、来合云、来显柱做兵运工作取得的一大成果。吴光浩、戴克敏亲自接见哗变士兵并讲话，欢迎他们参加革命，宣布去留自愿，绝不勉强，愿走者送路费。哗变士兵很受感动，当场有过半的人愿意留下。这件事影响很大。它动摇了敌人的军心，鼓舞了革命群众。人们奔走相告："革命又发威了！""红旗飘过了边界，映红了半边天！"这时，北起光山陡山河、南到黄安两道桥、东至黄麻边界上的光裕山、西至黄安老君山，纵横近百里，人口约20万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已初步形成。这块根据地的建成与毛泽东1928年11月首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只相差9个月。由此可见第七军领导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也是很有创见的。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人是了不起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者！

7月中旬，第七军在柴山保的尹家嘴举行会议。会上根据上级指示，宣布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31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曹学楷任参谋长，陈定侯任政治部主任，郑行瑞任经理处主任。全师120多人，分编为4个大队（对外称91、92、93、94团）和1个特务队。第1大队大队长潘遐龄，党代表王树声；第2大队大队长廖荣坤，党代表江竹青；第3大队大队长徐其虚，党代表吴先筹；第4大队大队长程昭续，党代表江子英；特务队队长程启光。这次会议决定全面恢复地方工作，改变过去军队与地方党组织不分的状况，将一部分干部分到各地去工作，其任务是：恢复和建立各级党团组织，成立临时政权农民委员会，建立地方武装，积极进行游击战争。在边缘地区和敌占区实行抗捐、抗税、抗租和抗债，没收地主和反动分子的财产，发动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会后到地方工作的人员有：

戴季英仍任黄安县委书记兼地方武装总指挥，郑位三任县委秘书，吴焕先任组织部长，程昭续任农委会主席；余泽涵任麻城县委书记（余未到职由雷绍全代理），王宏学任农委会主席兼武装总指挥；光山县的工作由黄安县委代管，在县委成立之前先成立3个区委：曹学楷兼任光山南区书记，徐朋人任光山西区书记，石生财任光山东区书记；戴季伦任黄陂县委书记；郑新民任罗山工委书记；吴行忠任黄冈特别支部书记。

随着红军和地方工作的发展，需要建立党的最高统一领导机关。10月间，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共同组成鄂东特委，由王秀松、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戴继伦、徐朋人、戴季英、程昭续、陈定侯等组成，王秀松任书记，下辖黄、麻、光、罗（山）、陂、冈、罗（田）、商8县党组织。

在这次部队改编和开展地方工作中，黄安籍干部脱颖而出。当年的暴动勇士、游击英雄、农运高手纷纷走上党政军的领导岗位。仅这次配备的相当县级以上的近40名干部中，黄安人有34名，占总数80%以上。至于营级以下干部就更多了。从此开始，黄安籍干部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和革命战争的锻炼中，源源不断地成长起来。

1928年12月上旬，鄂东特委和豫东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鄂东特委书记王秀松根据半年多来武装割据的经验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在会上提出召开鄂东、豫东南、皖西北三特委联席会议，成立联合办事处，准备建立东起霍山西至武胜关沿鄂豫皖边界之整个大别山武装割据。12月15日，王秀松又代表鄂东特委向中央巡视员曹壮父提出这个问题，请曹向中央建议：划湖北黄安、麻城，河南光山、商城，安徽六安、霍山等县为鄂豫皖边界特区。但这一正确建议遭到了中央拒绝。中央也不同意红军在边界地区割据，认为："这种寨子主义非常不好"，提出要红军分散，"混到老百姓中间领导群众，……减少被敌人'围剿'一次缴械的危险"。鄂东特委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分散红军的意见，继续与邻省各县联系，为实现鄂豫皖边界武装割据而努力。随后，特委派徐子清、徐其虚、卢玉成等到商城帮助工作。1929年2月3日，鄂东特委又同豫东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在商南组织暴动的问题。豫东南特委鉴于对商城的指挥不方便，将商南党组织委托给鄂东特委领导。鄂东特委决定将商城、罗田、麻城三县边界地区的党组织统一起来，成立商罗麻特别区委，由徐子清任书记，负责组织领导商南暴动。不久，鄂东特委又与皖西的六安、霍山、英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讨论在皖西组织暴动的问题。

鄂东特委关于建立整个大别山武装割据的计划，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尽管当时中央不赞成这个计划，但它符合客观实际斗争的需要，时过一年就实现了这个计划。人们不能不佩服特委的远见卓识。这是鄂东特委的集体智慧，但书记王秀松起了重要作用。他是武汉中学董必武的学生。1926年初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受过毛泽东的教导。从广州回来积极开

展农运工作，参加并领导了黄麻暴动。担任特委书记后，非常关注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所走的井冈山道路。他认为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便提出“也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建立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他那富有远见的革命主张被当时的中央视为“寨子主义”。因此，4月下旬，当鄂东区与京汉路区合并成立鄂东北特委时，他被撤换，由徐朋人接任书记。徐朋人也是这个计划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上层又多次指责以他为首的鄂东北特委不在本地区发展，去“造成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是“地方主义”“农民意识”。徐朋人说：“农民意识就让它农民意识。”矢志不移地继续推动武装割据向前发展。

5月初，鄂东北特委派吴光浩率10余人枪，乔装成茶叶贩子，去商城帮助商罗麻特委组织暴动。途经罗田滕家堡，在一家饭店用饭时，其中一人不慎露出了腰藏的手枪，被店老板发现。待他们走后，店老板向民团报告。民团迅速追击，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最令人痛惜的是吴光浩，他从参加领导黄麻暴动以来，在武装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为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不致给武装斗争带来不利影响，特委对吴光浩的牺牲秘而不宣，其军职一直保留到红一军改编为红四军。这是鄂豫皖红军史上所没有的。

5月6日，农历立夏节的夜晚，商罗麻特委在商南发动了立夏节暴动，一举取得成功。9日，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32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下辖97、98团，全师共100多人枪，随后在豫皖边开创了割据局面。

11月8日，六安中心县委发动了六（安）霍（山）暴动，持续近20天，在红32师的协助下获得了胜利。1930年1月20日，六安中心县委将各地在暴动中组成的游击队统一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33师，徐百川任师长，下辖106、107团，全师共200多人，140支枪。红33师成立后在皖西开创了割据局面。

至此，鄂豫皖边界上的大别山西段、中段和东段都有武装割据，离创造整个大别山武装割据已是为期不远了。

在商南暴动前，中原地区爆发了蒋桂战争。桂系等被蒋介石的部队逐出武汉，蒋军控制了湖北和河南南部地区，正在准备“进剿”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吴光浩牺牲后，鄂东北特委向中央报告，请派军事干部前来领导红军。



红军时期的徐向前

6月初，中央决定派徐向前到红31师工作。他是怎么来的？来后的情况如何？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有十分生动具体的叙述：

6月上旬，我与何玉琳、桂步蟾同志一起，装扮成商人模样，去鄂东北特区。先从上海乘船至武汉，再乘汽车到黄陂靠山店，下车后沿山间小路行进……到黄安北面的箭厂河，特委书记徐朋人接见了我们。他详细介绍了根据地的情况，要我和桂步蟾去红31师工作。徐朋人是学生出身，当过教员，说话有条有理，也很实际，给我的印象是个勤恳、朴实、能干的人……红十一军31师才300多人，无所谓军部、师部，只有司令部。司令员是吴光浩，下辖4个大队，每个队五六十人。我去的时候，吴光浩同志已牺牲。他是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黄麻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对他牺牲的消息，特委决定暂不宣布，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所以我到31师，名义上是副司令、副师长，实际上负责全师的军事指挥工作。师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侯都是黄安人。除红军外，还有赤卫队、游击队几百人，也是宝贵的力量……我到31师当副司令，与戴克敏、曹学楷共事，带着几百人的队伍打游击。他们两人对党忠诚，联系群众，有文化，又有游击战争经验，深得部队的信赖。我们合作得很好，没有隔阂……新来乍到的我，人生地不熟。我说话人家不懂，人家说话我也不懂，得靠戴克敏翻译。外来干部，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有个过程。回想起来，我能够站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中积累了些游击战争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画脚，评头论足。我虽是副司令，但不是特委委员。特委开会很少参加，有时讨论军事问题才叫我去。特委的决定、指示，一般由参谋长曹学楷告诉我，他是特委的常务委员。他们分配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带兵打仗就打仗；

司令部的业务工作没人管，叫我管也行。搞一段时间后，人家看你这人还行，能带部队打仗，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没什么官架子、特殊化，慢慢地就信任你了。取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才能立住脚，说话主动，开展局面。威信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吹出来的。

徐向前来后，领导红31师，在根据地游击队、赤卫队和群众的配合下，四个月内接连粉碎了敌人三次“会剿”。这三次是：罗霖、李克邦部的“罗李会剿”，湖北、河南省的“鄂豫会剿”，徐源泉、夏斗寅部的“徐夏会剿”，红军节节胜利，部队不断扩大，成立了第5大队，大队长吴信行，党代表郑行瑞（兼）；第9大队，大队长吴维井；师部特务队，队长詹才芳，全师增至700多人。这几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大队干部都是黄安人。

新来的军事领导人徐向前是山西五台县人，黄埔一期生，参加广州暴动后转入海陆丰打游击，任过红4师师长。到鄂豫皖后，半年多来处处以身作则，事事为群众着想，带领红军不断打胜仗，受到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的爱戴。黄安人待人厚道热情，还特关心别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等师领导见副师长是单身汉，就想帮他解决个人问题。当时根据地的女干部少，找合适的对象很不容易，但总算找到了。这位女干部是师部特务队队长程启光的妹妹，叫程训宣。程启光的二弟程启宗教私塾，小妹曾随二哥上学，有一定的文化。后来全家闹革命，她也参加了地方工作。程训宣端庄大方，聪明能干，工作出色。有一次红军与地方联欢，程训宣登台表演。戴克敏、曹学楷他们与程启光都是邻村人，互相认识，也见过程训宣。联欢结束，戴克敏、曹学楷从中牵线，让徐向前与程训宣见了面，两人互相爱慕，年底便结为夫妻。常言道：“一个女婿半个儿”。徐向前要算半个黄安人了。

三次反“会剿”胜利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军阀混战爆发了，暂时顾不上对红军的“进剿”，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黄安全境几乎全部赤化。县北老区已在五六月间开始建立村、乡、区级政权。到1930年春，全县10个区、95个乡、4100多个村，几乎都成立了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府。2月27日，黄安县苏维埃政府在紫云区闵家祠堂成立，李思禄任主席。什么叫苏维埃？苏维埃是俄文名词，意思是代表会议，列宁将它定为政权机构名称。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学俄国的办法，工农兵代表组成的政府也叫苏维埃政府，根据地叫苏区。随着各级政权的建立，群众组织如工会、农会、妇女会、共青团、少先队、童子团等也纷纷成立。

分配土地的工作随即展开。广大群众为保卫红色政权、保卫翻身果实，纷纷参加红军和赤卫队。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全县参加红军和乡以上地方工作及地方武装（包括独立团、补充营、游击队、赤卫队等）的有15000多人。他们都是从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黄安这个革命摇篮，首先摇出了自己的儿女，将他们送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30年2月至3月，中央决定将鄂豫皖边界上的三块根据地和三支红军统一起来。4月，中央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到达黄安，在箭厂河召开鄂豫边特委和红31师领导人联席会议。会上组成了鄂豫皖边特委，通过了将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的决议。郭述申任特委书记，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曹大骏任军政治委员。红一军下辖3个师：31师改编为1师，由副军长徐向前兼师长，戴克敏任政委；32师改编为2师，漆德伟任师长，王培吾任政委；33师改编为3师，周维炯任师长，姜镜堂任政委，全军由2100多人增至6000多人。这是黄安这个革命摇篮诞生的第一支主力红军。6月下旬，在光山王家塝召开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鄂豫边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任主席。特委和特苏机关分别驻在紫云区箭厂河和檀树岗一带。于是，黄安成了鄂豫皖苏区最早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鄂豫皖边根据地和红军的统一，使原鄂东特委于1928年底提出的建立整个大别山武装割据的愿望实现了。它标志着鄂豫皖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左”倾占位　精英被害

蒋冯阎大战结束，蒋介石腾出了手脚，从1930年冬到1931年5月，对鄂豫皖区发动了两次“围剿”。在此期间，从蕲春、黄梅、广济转战而来的红十五军（2000多人）奉命与红一军合编成红四军，加上扩编一部分地方武装，全军增至12000多人。特委书记和军长由中央派来的曾中生、旷继勋分别担任，政委仍为曹大骏。红军扩大了，战斗力增强了，接连粉碎了敌人的一、二次“围剿”。其中在反第一次“围剿”之后不久取得的双桥镇大捷，战果辉煌。全歼敌34师2个旅、6个团、1个山炮连、2个迫击炮连，俘敌第34师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0多支，山炮4门，迫击炮10余门，弹药、物资不计其数。

在这次战役中，担任主攻的是红10师28团，团长高建斗是黄埔生，曾

任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善于指挥作战。他和政委甘良发带领所部与兄弟部队一起突破敌人阵地，直捣敌人指挥中心。为夺取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活捉岳维峻(壁画)

当高建斗指挥部队快要攻进双桥镇敌人指挥中心时，岳维峻见势不妙，带上卫兵和特务连冲出包围向南逃去。红 11 师 33 团 5 连连长邹国厚奉命带领全连猛追。老奸巨猾的岳维峻使出脱身之计，留下特务连阻止我军追击，自己带一群精兵夺路快逃。5 连受阻，眼看敌人可能逃掉，邹国厚急中生智，对指导员张厚谋说："我带一个班追击，你指挥连队打击敌人。"说完带着一班战士跑步追赶。谁知稍留片刻，岳维峻竟跑得不见踪影。邹国厚纳闷：怎么一转眼就不见敌人呢？他边追边向群众打听。有人告诉他：罗家城的狗吠得很厉害，好像是有生人进村了。邹国厚心中有谱，令全班战士快跑赶到罗家城，然后故意提高嗓门虚张声势："一连守住东南，2 连守住西北，3 连堵住道路，3 连 8 班跟我冲进村去。"敌人的哨兵听见了，跟岳维峻报告：共军一个营把我们包围了。不等岳维峻作出反应，邹国厚就带着战士冲进了他歇脚的屋子，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这时岳维峻只想活命，连声说："我是岳维峻，我投降，别开枪！"大鱼落网了。邹国厚和战士们一起押着肥头大耳的敌第 34 师师长岳维峻回到驻地，将俘虏交到军部。红四军参谋长徐向前夸奖说："你们打得不错，有勇有谋啊！"然后，徐参谋长去看了看岳维峻。岳是老牌陕军，曾任西北军冯玉祥部第二军军长。徐向前曾在该军

下属第 6 混成旅当参谋，算是老部下。岳维峻见徐参谋长来看他，不敢抬头相望，低着头说："只要不杀我，我答应你们提出的一切条件。"徐向前将这个情况跟曾中生、旷继勋讲了，他们商量后决定留下岳维峻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岳维峻的老婆也托人与我党中央联系，愿出几万块钱赎他。后来果然送来 10 万套军装和不少的银圆。可是张国焘到了鄂豫皖以后，借口岳维峻组织反革命团体，将他枪毙了。鄂豫皖原来不杀俘虏，从此破坏了红军的传统。

1931 年 5 月，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边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下设鄂豫皖省委，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担任其领导职务。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任省委书记，陈昌浩任红四军政委。他们形成新的领导核心，掌控一切。张国焘极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受到地方干部反对，便借贯彻中央关于"肃反"的决议，开展以反"改组派"为主要内容的"肃反"运动，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他别有用心地向中央报告，说鄂豫皖区"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和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说黄麻地区的党和武装"最初是采取了土匪行为的政策"，说商城的党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帜""脚踏两只船"的"国民党"，说皖西地区的党"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接着在红军和地方进行大规模的所谓"肃改"。11 月 20 日，陈昌浩在彭杨军政学校报告红四军"肃改"经过时说："这次共计肃清改组派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一千五六百人。"由此可见，红四军"肃改"就肃了 2600 人，那么地方"肃改"就是成千上万。最令人痛心的是黄麻暴动领导人、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者戴克敏、曹学楷、王秀松、徐朋人，商南暴动领导人肖方、周维炯，六霍暴动领导人舒传贤、姜镜堂等都被当成"改组派"杀害了。真是咄咄怪事，全国少见。

戴克敏，1906 年出生在黄安紫云区上戴家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戴雪舫是位进步教师，在他的教导下，戴克敏从小好学上进。1924 年到武昌第一师范读书，加入共青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回县从事农民运动。1927 年 3 月受党派遣，与汪奠川一起去武昌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写的《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受到毛泽东的好评。6 月间，麻城发生地主武装屠杀农民、捣毁农协的惨案，湖北省委请农讲所学生军驰援。戴克敏参加了反击麻城反动武装的战斗。他又写了

《剿灭麻城会匪之经过》。两篇文章均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从农讲所回来，积极参加领导县北农民武装反击光山反动红枪会进攻的战斗。“7·15”后他是新组成的县委成员，负责农民自卫军方面的工作，与潘忠汝、吴光浩一起积极组织发动农民武装革命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他是黄麻暴动总指挥部的重要成员，负责起草了暴动计划。暴动胜利后任工农革命军党代表，从此不断地总结建军与作战经验。上木兰山打游击时，他同吴光浩等提出游击队员要“八会”，即会跑、会打、会集、会散、会进、会退、会知、会疑。创建根据地时，他同徐向前、曹学楷共同总结了游击战术七条原则。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军后，他同徐向前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在鄂豫边特委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上获得一致通过。这些经验的总结对红军建军与作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戴克敏为把拿梭镖扛鸟铳的农民武装，锻炼成打不散拖不垮的钢铁红军，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工作，是鄂豫皖红军一位扎扎实实的创建者。他不计个人得失，能上能下，无论在什么岗位，一样积极努力工作和战斗，对不利于革命斗争发展的“左”倾错误路线敢于抵制。张国焘对他不悦，以“莫须有”的“通敌”罪名，于1932年夏将其杀害，年仅26岁。

曹学楷，1898年出生在该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早年丧父，家境愈艰。1918年母亲借钱送他去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读书。不到一年，藏于箱内的学费被盗一空。他无处诉说，就在作文中写道：“天乎，天乎，何其苦我！”他的老师恽代英批阅至此十分惊讶。问其原因，深表同情，却无法帮助，只好将本不够用的月薪拿出一部分送作盘缠，鼓励他回乡去好好干一番事业。曹学楷回家后开始经商。“五四”运动后弃商从教，与在七里、紫云一带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的戴氏兄弟（继伦、季英）、郑位三、戴克敏、吴焕先、陈氏兄弟（文侯、定侯）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后来苏区实行婚姻自主、废除父母包办，曹学楷的胞妹曹吉阶与戴克敏结了婚，他的堂妹曹干先与吴焕先结了婚。曹、戴、吴又成为姻亲兄弟。1925年曹学楷加入共青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学校里开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主张，很快在刘家园成立了全区第一个农民协会。农运的迅速发展引起当地土豪劣绅的恐慌，光山反动红枪会前来破坏。一次，曹学楷在回龙寺召开农民大会，反动红枪会数十人冲进会场，企图制造杀戮。曹学楷挺身而出，跃上讲台吼道：“我们有几千人，你们想干啥？谁敢动手就把他砸成肉泥！”红枪会徒慑于人多势众，一个个溜出会场。从此他深感武装农民的重要，便四处筹款，购买枪

支弹药，组织了一支精锐的农民义勇队。他在农民运动中既显示了组织领导才能，又显示了运筹社交能力。黄麻暴动胜利后，被推选为第一个工农政府的主席。实行边界割据建立边区革命委员会，又当选为主席。是为工农大众行使政权的好领导。他不仅能文还能武。汪奠川牺牲后接任参谋长，沉着果敢，足智多谋，是位好军师，大家都称他为“小诸葛”。后来调任红四军13师政委。他的一贯作风是实事求是，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张国焘看他不顺眼欲除之。“肃改”开始，先拿他开刀，以“改组派”的罪名于1931年冬将其杀害，时年33岁。他是黄麻暴动和鄂豫皖红军领导人中最先被害的。

鄂豫边根据地党的最初两位主要领导人王秀松和徐朋人也相继被害，这说明张国焘借“肃改”之机不断剪除异己。

王秀松参加领导黄麻暴动后，未上木兰山，留在高桥、桃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为了打开革命局面，曾多次带信劝其反动父亲、民团团长王见禄不要与人民为敌。其父不听，变本加厉镇压革命群众。1928年他亲自率队将其镇压。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作歌唱道：

共产党员王秀松，
一颗红心似火红，
率队革除恶霸父，
为的穷人不受穷。

这位“大义灭亲”的革命者，后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他对张国焘极力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颇有微词，“肃改”中因此被捕。他在囚禁中被打得遍体鳞伤，仍坚持写《红四方面军创建史》。1932年9月被杀害，年仅30岁。

徐朋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教书带行医。在知识渊博、思想进步的父亲教导下，满腹经纶。1925年投身革命运动，次年入党。参加黄麻暴动后转到孝感汪洋店地区坚持斗争，又在那里点燃革命火种。1928年初上木兰山，在第七军转战黄冈期间，积极集合暴动失散各地的同志组成第八军，在黄陂、黄安边界游击。第七军返回后即与其合并。他读的马列主义和革命书籍多，理论修养好，又注重实践，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党和红军在大别山创建第一块根据地颇有贡献。他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打乱土地平分”侵犯中农利益

的过“左”政策，被张国焘斥之为右派，将他降至基层后仍坚持反对“左”倾错误。1932 年夏，张国焘以“不可救药的右派分子”罪名将其杀害，年仅 29 岁。

在这次“肃反”扩大化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黄安被害的师级以上干部有：鄂豫皖军委副主席郑行瑞、军委秘书长程翰香、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师长和副师长程绍山、吴永达 5 人；团级干部有：高建斗、江子英、高建忠、江家科、曹学秀、甘思谦、甘思鳌、袁方菊、戴道芝、孙之金、黄焱青、江彩柏、石瑞英、张子寿、方和清、彭明启、陈龙胜、高元伢、余兰香、来承刚 20 人；地方武装中的团级干部有：刘继发、石炳新、邓天珠、徐宗权、秦必松、魏友山、姚泽引、秦贤安、黄绪晏、袁昌银、张焕绪 11 人；地方县级以上党政干部有：戴继伦、雷绍全、詹献庭、来焱斌、王茂华、罗基南、霍友祖、秦国珍（女）、袁克尤 9 人。

1932 年 9 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张国焘指使保卫局抓走程训宣，关押于王锡九村，逼她供认徐向前是“改组派”，妄图从程训宣口里得到材料搞倒徐向前。但是，程训宣十分坚强，任凭怎样拷打什么也不讲，使张国焘的罪恶目的没有得逞。10 月，程训宣在王锡九村的黑洼被杀害。

以上被错误杀害的团以上干部共计 50 人。至于被错杀的团以下干部、战士、工作人员更是难以数计。他（她）们在与敌人浴血奋战中没有倒在战场上，却惨死在“左”倾路线下，实在令人悲哀！

“肃反”运动自上而下，迅速向基层扩展。政治保卫局在黄安县党政军机关中查出 200 多名所谓“异己分子”，张国焘觉得很不深入，还要他们再查。他说：“陈昌浩同志讲黄安改组派不多，这话不见得。陈定侯、程翰香、江子英不都是改组派吗？不都是黄安人吗？你不去发现改组派，就是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经他这样一讲，黄安的“肃反”运动愈演愈烈，党政军干部和党员人人自危。于是激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1932 年 2 月 20 日，爆发了“仙居区事件”，该区干部群众张贴“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张国焘！”“反对保卫局乱杀人！”“红军赶快来搭救受苦的人！”“反对张国焘，坚决拥护红军！”等标语口号。愤怒的群众还将前去抓人的保卫局人员的枪摘下来，将他们关进一间祠堂里。张国焘为了平息这一事件，将区委书记徐德聪以下干部 63 人全部处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仙居区事件”。它虽以张国焘“获胜”而告终，但也给了他当头一棒。这一事件说明黄安人民在大是大非面前，爱憎分明。

事情过去多少年了，老百姓对“肃反扩大化”中无辜的被害者一直怀念在心。20 世纪 60 年代七里坪镇王锡九村修水库，在一个名叫大洼的山沟里挖出了很多遗骸，老年人说是 1931 年到 1932 年“大肃反”时，鄂豫皖政治保卫局第三分局（当时驻王锡九村）利用夜晚在此处决“改组派”等留下来的，大约有两千人。其中有徐向前夫人程训宣、李先念的哥哥陈有元、王树声的妹妹等。修水库的干部群众将一堆堆遗骸收集起来，埋到另一座山上。1986 年落实中央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错杀人员按因公牺牲登记的文件精神后，红安全县有 10045 人被追认为烈士。王锡九村便建立了烈士纪念碑和程训宣墓。

人们或许要问：革命队伍内部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把党搞垮，把红军搞垮？对这个问题，当年的亲身经历者徐向前，在事过 50 多年后是这样讲的。他说：“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革命，人民没有出路。干部被抓一批换一批，再抓一批再换一批。被肃掉的同志，难以数计。队伍就是不垮，极少有人叛变投敌。原因是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红军指战员，工农出身的占 90%以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血海深仇。历史证明，我们的党尽管多灾多难，但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徐帅的回答十分透彻。因此不难理解当时出现的怪现象；一边大张旗鼓地“肃改”，大肃大杀；一边热火朝天地拥军参军，大拥大参。这就是在特殊的年代人民做出的特殊牺牲和奉献。

踊跃参军　勇做脊梁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鉴于敌人新的“围剿”必然到来，中央分局和红四军就抓紧时间，发展地方武装，扩大主力红军，筹备粮食和物资，积极做好反“围剿”的准备。

1931 年 8 月，鄂豫皖军委发出通令，要求各县成立军区，统一领导和整编地方武装，将赤卫队、守备队、红色补充军等一律改称赤卫军。由村到县，按班、排、连、营、团、师的建制，将年满 18~35 岁的男子，除地富分子和残疾者外，全部组织到赤卫军中去，加紧训练，配合红军打破敌人的“围剿”。17 岁以下的少年，组成少年先锋队，负责站岗放哨，维持社会秩序。青年妇女组成侦探队和救护队。通令还强调加强县独立团的建设，平时保境安民，战时配合红军作战。

军委通令下达后，黄安军事指挥部改为军区指挥部，石世龙任军区指挥长，下辖3个独立团和2个赤卫军师。3个独立团，其中第1团团长李思禄，第2团团长郑如意，第3团团长匡继学，总共4000多人。赤卫军师劳战结合，按区分片组建：第1师由紫云、城区、桃花、永河、平安5个区的赤卫军团组成，师长兼政委赵赐吾；第2师由七里、仙居、二程、高桥、八里5个区的赤卫军团组成，师长李海珠，政委陶清中，两师共约12000人。

在整编地方武装的同时，扩大红军的宣传在各地广泛展开，全县掀起了拥军参军热潮。出现了父送子，娘送儿，妻送夫，姐送弟，兄弟同入伍，全村青年同参军，小孩赖着要参军的动人情景。各级地方干部更是带头参军。1931年10月17日，正在任上的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先念，就是在扩大红军的宣传大会上，带领300多名青年参加红四军的。

李先念1909年6月出生在黄安高桥区李家大屋一个佃农家庭。因家贫只上过两年私塾便给地主放牛。年纪稍大改学木匠。后去武汉一家棺材店打工。用他的话说“那是给旧社会打棺材”。1927年春回乡参加农民运动，任乡农协执委、区工会主席。参加黄麻暴动后任游击队长，后任高桥区委书记、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次带领青年参加红军后任12师33团政委。从此戎马一生，驰骋疆场，成为红军一员名将。

据有关资料统计，1931年到1932年，黄安全县参加红军的有25000多人，加上1929年到1930年参军的有14000多人，累计起来就有4万人了。再加上脱产与不脱产的地方武装2万多人，总计达6万多人。一个县有这么多人参加武装部队，足见黄安人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拥护至极。因此，黄安有“红军兵仓”之美誉。俗话说兵多将广。如果把兵和将比作金字塔，黄安在四年内出6万多兵做塔座，那么到全国革命胜利后有二三百人升到塔顶当将领就不足为奇了。

10月间，中央分局决定以红四军12师为基础，与皖西各县独立团合编，在六安麻埠成立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下辖第73、74、75师，留在皖西活动。下旬，分局又决定，将鄂豫皖区的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1月7日，第四方面军在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四军和二十五军。红四军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所辖第10、11、12师（由13师改编）归总部直接指挥。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方面军兵力达3万人。



七里坪长胜街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旧址

红四方面军选择此时此地成立有两重意义：一是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二是七里坪乃黄麻暴动发祥地，鄂豫皖第一支红军诞生地和鄂东北苏区最早的“首府”。一言以蔽之，七里坪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摇篮。在这里成立红四方面军，正好向人们展示红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历程。只 5 年时间，在此摇篮中又诞生了全国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红四方面军是在七里坪西门外的河滩上隆重成立的。这天，七里坪及其周围四里八乡的群众，全体出动，人山人海，红旗蔽日，锣鼓喧天，铳炮齐鸣。徐向前和陈昌浩骑马并行，在阅兵指挥王树声的陪同下检阅了部队并讲话。徐向前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乘胜前进，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趁敌人布置未妥之前，就把第三次“包围会剿”打破。

3 天后，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方面军总部以第 11、12 师和 10 师一个团及黄安独立团，共 8 个团的兵力，进攻靠近根据地中心区的敌人重要据点黄安城。守敌是国民党军第 69 师赵冠英部。敌人凭坚顽抗，驻宋埠、

黄陂等地之敌不断增援。徐向前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从11月10日开始至12月23日结束，历时43天，活捉了赵冠英，毙俘敌15000多人，缴枪7000多支，迫击炮10多门，电台一部，取得了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第一个大胜利。

黄安战役，是鄂豫皖红军首次从游击战向大规模“围城打援”运动战转变的一次作战，要求参战部队紧密配合，协同作战。黄安籍将士都有很好的表现。参加这次战役的有：红四军11师政委甘济时、31团团长赵赐吾、33团政委李先念，12师政治部主任张世海、34团政委董德洪、35团团长高绍先，黄安独立团团长郑如意和在县西南牵制敌人的陂安南县独立团团长吴永达等。甘济时与师长王树声率部扫除城南外围据点之敌后负责打援。敌人先后以3个师的兵力增援。情况十分紧急。甘济时脱掉棉衣，挥舞刀枪，带领将士们反击，号召大家英勇杀敌，争取火线入党。战役结束后全师发展了新党员一百多人。他身先士卒，将政治思想工作做到火线上去，鼓舞了全师士气。赵赐吾、李先念等各率所部在打退敌人第三次增援后，将溃敌一直追击到桃花以南，此后敌人再也不敢增援。

被围在黄安城内的敌人，成了瓮中之鳖。为了消磨敌人的战斗力，徐向前采取围而不打，待敌粮绝人困时再攻。



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

总攻开始之前，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参加了战斗。这是红军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这架飞机是国民党军队的教练机。1930年4月，由于

天气原因，迫降在罗山宣化店南面的陈家河，被赤卫军缴获。经过教育和争取，驾驶员龙文光弃暗投明参加了红军，将飞机运至新集，成立航空局，龙文光任局长，选派徐仕凯等学驾驶飞机。12 月 2 日，龙文光驾“列宁号”飞机，陈昌浩亲自登机督战。飞到黄安城上空，先是转了几圈，敌人以为是给他们空投物资来了，纷纷跑出工事，准备争夺空投食物，万没想到是红军的飞机。“列宁号”在撒过传单之后丢下两颗炸弹，城内敌人顿时乱作一团。趁此机会，徐向前下令总攻。黄安独立团团长郑如意指挥全团一举攻下制高点锞子山，歼敌近一个营，扫除了前进障碍。12 师 35 团团长高绍先率部从西北角破城而入，首先打进了县城，后在战斗中不幸阵亡。事情往往这么巧合，黄麻暴动是从这里攻进城去的，现在又从这里攻了进去。

在黄安战役期间，全县群众竭尽全力支援红军。据 1931 年 12 月 5 日油印出版的黄安县委机关报《战斗》报道：“从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5 日的一周内，全县又捐献了棉衣 1920 件，棉絮 32 床，袜底 1872 双，布鞋 2476 双，单衣 182 件，棉被 118 床，棉花 86 斤，食油 188 斤，糯米 4.67 担，花生 13.79 担，肥猪 42 头，鸡蛋 1308 个，小菜 820 担，糍粑 113 担。此外，还有大量的被单、手巾、带子、草鞋、羊肉、豆腐、面条、米粉、麦子、柴草等。”这些分门别类的统计，说明全县群众支援红军作战是倾其所有，然后由男女老少组成的慰问队纷纷送上前线。正如当时的歌谣所唱：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锣鼓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战役结束后，黄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南门外校场岗联合举行万人祝捷大会。为了纪念这次战役的伟大胜利和表彰黄安人民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会上宣布将黄安改名红安。这个红字得来不易，是无数群众和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黄安战役的胜利，使南线进攻之敌退守黄陂县城，居于守势。于是黄陂以北、孝感以东、罗山南部、麻城西部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红安中心区域的地位更加巩固。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领导，鄂豫皖分局决定成立红安中心县委，下辖 4 县 1 市，即红安、陂安南、陂孝北、河口县和红安市（后两县市均是黄安战役结束后成立的）。同时将 3 个独立团改编为红安独立第 1

师。此时又有一批红安籍干部走上了党政军群各级领导岗位。据不完全统计，区级干部（包括县苏政府所设的各个委员会负责人）有70多人，县以上干部有吴维荣、朱贵松、韩信之、周德泰、韩先模、胡松山、张仁昆、吴隆凤、钟芳荣、熊国志等20多人，其中女干部有闵丹桂、姜德安、吴梅生、吴隆秀、詹翠萍、古玉兰等。“肃反”以后，红军和地方提拔使用干部更向工农分子倾斜，为广大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和党政群基层工作人员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敞开了大门。上面提到的这些领导干部都是从工农分子中选拔上来的。

红四方面军击败了南线之敌，接着向北出击，于1932年1月19日至2月10日发起商（城）潢（川）战役，歼敌5000人，打退了北线敌人的进攻。3月20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11、12师东进皖西与红二十五军73师会合，22日发起苏家埠战役，经48天战斗，至5月8日结束，活捉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歼敌30000多人，缴获长短枪15000多支，机枪250挺，炮40门，取得了红四方面军成立以来的最大胜利。在苏家埠战役期间，北线之敌复又反攻商（城）潢（川）地区。红四方面军在战役结束后，于6月12日发起潢光战役，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用5天时间，歼敌正规军8个团和一部分民团，毙俘敌近万人，缴枪7000多支，收复了商城以西和潢川、光山以南被占地区。

经过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彻底打破了敌人由15个师组成的第三次“围剿”。主力红军发展到两个军6个师。4个独立师和一个少共国际团，共45000人。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总人口达350万，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极盛时期。这时一大批红安籍干部走上了师、团领导岗位。他们是：方面军总部总经理处政委张雨滴、政治保卫局长周纯全、少共国际团政委熊国其；红四军10师28团团长甘良发，后有潘和瑜、汪烈山、副团长王建安、29团政委曾传六、政治部主任汪加申、30团团长方敬焱、政委方建忠、詹才芳；11师政委甘济时，后有李先念、政治部主任周光坦、31团团长赵赐吾、32团团长孙玉清、政委秦贤道；12师政治部主任张世海、34团政委董德洪，后有贺德斋、袁克服、韩继祖，35团副团长熊邦赞、36团团长郑如意，后有余天云；红二十五军73师政委吴焕先、217团副团长徐深吉、218团团长程启光、219团团长徐世奎；74师师长汪明国、政委戴季英；独立1师政委焦福兴，团长袁厚双、夏泰易，团政委秦昌福、徐志春；红安独立团团长晏高

寿，后有钟芳荣、邓天珠、杨国光，英山独立团团长程启波、陂孝北县军事指挥长周春山等 43 名。约占红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多，平均每 3 个团以上干部中就有一个红安人。

有战斗就会有牺牲。尽管这次反“围剿”取得了伟大胜利，但红军和地方武装及广大群众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仅红安牺牲的县团级干部就有 30 多名。他们是：李思禄、郑植璜、石世功、郑泽武、郑如意、甘子刚、徐以才、涂锡高、袁厚双、李学传、李学宽、李承柏、李保仁、李明道、李学寿、江彩柏、刘定根、刘永康、方建忠、邓天珠、石世友、杨国先、杨学海、秦祖珍、徐志春、明玉山、石理珠、李大太、戴先汉、郑志芳、张克诚、陈新山、黄耀坤、吴喜云、张宙桃、杜华先、刘连福等。正是有这些英雄们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红四方面军才能不断取得胜利。

6 月底，蒋介石抵达汉口，调集 30 万人马，亲自指挥对鄂豫皖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面对严重形势，鄂豫皖中央分局开会讨论红军的行动。徐向前提出“暂停进攻，蓄锐待机”的建议，张国焘听不进去，采纳了沈泽民“胜利了要再胜利”，“不停顿的进攻”的主张。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先是向京汉路出击，后又向仓子埠、靠山店出击，威胁武汉。两次出击各歼敌一个团之后，均遭敌阻而折回。接着又去围攻麻城。

就在红四方面军不停地进攻时，敌人部署就绪，于 8 月上旬开始“围剿”。敌人出动 24 个师另 6 个旅，编成 9 个纵队，兵分两路：一路由 3 个纵队组成，从六安西进；一路由 6 个纵队组成，从信阳南下然后东进。重点是进攻红安和新集。敌人来势汹汹。先是西线告急。张国焘不得不撤麻城之围，赶去保卫红安中心区。当红军进入红安县境时，群众分列路旁敲锣打鼓欢迎，把大批鞋袜、猪肉、鸡蛋、花生、蔬菜等送到部队慰劳。在群众的热情鼓舞下，广大指战员克服了连续作战和行军的疲劳，精神抖擞地去迎接战斗。先头部队 12 师在冯受二与进攻之敌接触，即展开猛烈阻击。随后，刚接任师政委的李先念率 11 师赶到，配合 12 师实施反击。红安独立第 1 师在高桥河、河口县独立团在二程也主动出击。红军将士奋勇冲杀，多次与敌人肉搏，毙伤敌人大部，未能将敌击退。战斗相持不下。这时，敌另一路纵队向七里坪进犯。红四方面军乃撤出战斗去保卫七里坪。8 月 13 日，中心区的中心红安城陷入敌手。

方面军主力赶到七里坪地区，随即在倒水河以东占领高地。11、12 师

在北，布于酒醉山，10、73 师在中，布于大小悟仙山，红安独立第 1 师在南，布于古峰岭。广大群众和赤卫队都全力支援。当时新谷尚未登场，粮食困难，群众将麦种拿出来供部队食用。红军将士极受感动，纷纷表示："吃群众一粒粮，就要消灭一个敌人！"

8 月 15 日拂晓，敌人用两个师向红军阵地发起进攻，以夺取悟仙山制高点为主要目标，在大炮和飞机掩护下，冲过倒水河，一举突破了前沿阵地。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让独 1 师和少共国际团在大小悟仙山凭险据守，令 4 个主力师乘敌人强行佯攻之际一齐反攻。广大指战员在密集的炮火和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勇猛反击，前仆后继，冲入敌阵，反复肉搏，将敌击溃，并追至倒河以西数里。战斗之激烈前所未有。时任 73 师 217 团副团长徐深吉后来回忆说："在七里坪悟仙山、柳林河打的那一仗，是一场恶仗。天上有飞机炸，头顶有炮弹轰，身边有子弹飞。我军指战员什么都不怕，一个劲地冲向敌人，跟他们拼刺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有的把刺刀捅弯了。杀得敌人尸横遍地，鲜血染红了河水。敌人害怕了，弃枪丢盔，只顾逃命。"在这场恶战中，敌人惨败。被击溃的敌第 2 师的一位军官，事后给友人写信谈到七里坪之役悲伤地说："本师潢川惨败后，经委座大力整顿，军容复振。……不料此次又遭惨败，六名同志悉数伤亡，重演潢川惨剧，曷胜浩叹！"

敌人败下阵去迅速调整兵力，并从红安县城出动两个师增援。17 日，敌援兵赶到，发起更大规模进攻。方面军见再战不利便撤出七里坪，转向檀树岗作短暂休整，将红安独立第 1 师抽出两个团补充到各主力师，留下 1 个团改为红安独立团。檀树岗一带地势险要，敌人不敢贸然跟进。

这时本应调整部署，避实击虚。张国焘却错误地认为敌人"内部有矛盾"而"退走了"，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后得知敌人改从宣化店方向进攻新集，张国焘就令方面军主力赶去固守，经 5 天激战亦未将新集守住。于是，张国焘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连电中央告急，要求紧急策应。9 月 14 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鄂豫皖分局，指出红四方面军应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张国焘没有采纳，带领方面军与敌人兜圈子，由鄂豫边转向皖西。他在撤离新集时，匆忙指定吴焕先为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领导地方武装坚持根据地斗争。方面军到了皖西后未寻到战机，只好从英山、霍山、圻春、黄冈地区绕一圈，于 10 月 8 日回到红安。



1982 年 5 月，成仿吾访问黄柴畈，讲述红四方面军转移西进情况。
左起：何定华、成夫人张琳、成仿吾、湛有恒、作者。

10 月 10 日，张国焘在红安二程区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此时形势极其严峻。敌人主力从北、东、南三面压过来了。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率部在距黄柴畈不足两里路的仙人洞一线阻击敌人，不幸中弹牺牲，遗体从前线抬回来葬在黄柴畈的后山上。黄柴畈会议来不及很好讨论就草草收场。曾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红安中心县委书记的成仿吾，阔别 50 年后，1982 年 5 月初以 85 岁高龄访问黄柴畈。他在黄元林家当年开会的那间厅屋内回忆说："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是吴焕先同志带我来的。他对这一带地方熟悉。我们俩都是骑马来的。我记得开会的地方有个磨坊。（黄元林插话：当年我家开过磨坊，就在这厅屋的旁边）参加会议的共有 20 多人，其中省委 10 来人，军队 10 来人。我记得有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吴焕先、周纯全和我。郑位三好像也参加了。还有个工作人员叫朱光的也参加了会议。会是晚上开的，没有摆桌子，大家随便就座。张国焘的位置在这厅屋右上角，坐在一张高椅子上讲话。他说我决不离开根据地，我带主力到外线消灭敌人，你们在内线牵制敌人。大家同意他的意见。会议决定方面军总部率第 10、11、12、73 师和少共国际团到京汉路西去寻机歼敌，其余部队留在根据地里。"

11 日黄昏，部队在四姑墩集合，4 个师和 1 个团共 2 万余人，分成两路纵队，在广水以南越过京汉铁路。第 73 师遭敌拦截，方面军总部电台被截住了。该师 218 团团长徐深吉带全团猛烈反击，打退了敌人，使电台转危为安。部队继续向前，进入枣阳新集地区。原想在这里稍事休整，寻机歼敌，再打回根据地。蒋介石得知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路西，立即调动 4 个师追击、两个师堵截。敌先遣队之迅速，以致我军来不及抢占制高点而陷于被动。危急中，10、11 师奋力拼杀，12、73 师大力协同，才突出敌人的夹击包围圈。走不多远，在土桥铺遇敌强阻，又是拼个你死我活。两次战斗，10、11 师挑了重担。两个师的政委分别是周纯全和李先念。周纯全是不久前从政治保卫局调来的，李先念升任时间也不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们都与自己的搭档师长配合默契，加上团、营、连级干部大都是红安人，凝聚力强，战斗力也就强。土桥铺遇阻，李先念命令 32 团团长孙玉清冲过去。孙团长带领全团杀出一条血路，使全军得以通过。新集和土桥铺战斗是方面军过路西打的一场恶仗，共歼敌 5000 多人，自损 1000 多人，将少共国际团一部分人补充到各主力师，继续向鄂西北转移。方面军最后进到了鄂豫陕边界，再想回鄂豫皖已不可能。

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给红军、地方武装和根据地群众造成极大损失。单就军队干部而言，红安籍团以上干部牺牲了 24 人，其中冯受二、七里坪、新集、皖西、仙人洞等战斗牺牲 15 人，他们是：张世海、秦昌福、秦书文、秦遵耀、夏泰易、晏高寿、徐锡山、彭明启、高志厚、李少清、汪家训、匡继学、方效忠、邓义山、华克功等；转移至枣北途中牺牲 6 人，他们是：潘和瑜、高德宏、李业梁、周世珍、周波成、周春山等。另外还有三位值得一表的将领，他们是：

甘济时，原名甘绍财，乡村教师。他参加革命是从办平民夜校、搞农民运动开始的。1927 年入党，同年 11 月参加黄麻暴动。先任紫云区区委书记，后任黄安县委书记，主动创办党团干部训练班，亲自讲授党团员须知和政治常识课程，培养了大批干部。因此被选调到红军做政治工作。先后担任红四军 13 师政治部主任，11 师政委、10 师政委。他将政治思想工作贯穿到生活、工作和战斗中，使部队始终保持旺盛斗志。方面军主力从皖西返回红安途中，他率部在黄陂长岭岗与敌作战。一些知情人说他的死很意外。战斗结束后，所缴枪支未经清理就送到师部。甘济时找俘虏谈话，俘虏进门顺手拿支枪就把他杀害了。因疏忽大意造成的不幸，广大指战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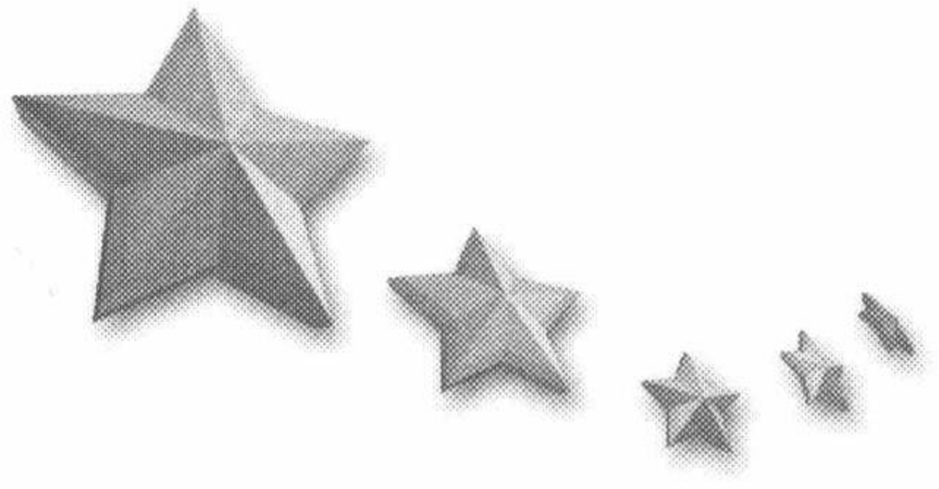
特别悲伤和怀念这位好政委。

焦福兴，出身贫寒，先学唱戏，后学裁缝，阅历广，善于结交和鼓动群众，是乡村手工工人积极分子，1928 年入党。参加革命后，被派往黄陂、孝感工作。曾任黄陂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陂孝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陂安南县独立团政委。工作经历使他既会主政又能带兵。1931 年 12 月成立红安独立第 1 师时任师政委，师长是黄埔军校学生、原红四军政委曾中生，更使他学到不少带兵打仗的本领，他是鄂豫皖省委委员，后在黄安与黄陂边境作战牺牲。

赵赐吾，原名赵基昶，地主家庭出身。在武汉读书时受革命思想影响追求进步。1926 年入党，后回县闹革命。农民运动兴起后向群众宣布：他家的田地、房屋和一切财产交给农民处理，农民所欠他家的债务全部免除。“7·15”反革命政变后，他在通缉之列，毫不畏惧，带一支农民义勇队昼伏夜动，镇压反攻倒算的土豪劣绅。参加黄麻暴动后仍留在当地，带游击队打击反动地方武装，常常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留下许多传奇故事，被群众称为“打将”。先后担任县游击大队长、县赤卫大队长、县独立团团长。红安独立团曾多次编入红军，他被留下去重建独立团。1931 年调任红四军 11 师 31 团团长，在麻城青山玉角与敌作战时英勇牺牲。

以上这三位烈士都是紫云区人，他们不论在红军和地方都颇有名气。

革命战争是一幅展现英雄风采的画卷。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芒，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红安人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这一类人们。他们一不要家，二不要钱，三不要命，一心一意要革命。他们拼命干革命，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称得上是红四方面军的脊梁，也是中国的脊梁。



第三章　浴血播火长征路

20 世纪 30 年代四支主力红军从南方长征北上，其中有两支在红安诞生，一支是红四方面军，另一支是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为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陕北立下大功。郭天民反对张国焘搞分裂拍案而起。余天云反对张国焘倒行逆施被害于丹巴河。吴焕先血染泾川为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开辟道路。徐海珊、李世焱、钱运华首创便衣队成为坚持根据地斗争一大法宝。郑位三慧眼识“宝”迅速推广开来。

冲破追堵　燎原川北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从枣阳新集、土桥铺接连突破敌人包围后，红四方面军昼夜兼程西进。时值秋末冬初，一路寒风冷雨，指战员们衣衫单薄，在寒风中徒步涉过冰冷的丹江，进入鄂豫边上郧县南化塘。部队在此休整三日，准备创建根据地，与鄂豫皖连接。工作尚未开展，敌人又跟踪而至，从三面围逼过来。方面军决定出郧西，经漫川关进入陕南。从此一去不复还。

当红四方面军到达漫川关东的康家坪、任岭地区时，敌陕西军 3 个团已占漫川关，堵住红军去路。另有 3 个师从北、东北、东南围攻而来，两个师在后面尾追，企图在康家坪至任岭 10 余里长的深山峡谷中将红军一举围歼。

红四方面军奋起反击。但因地势不利，处境极其危险。这时，张国焘惊慌失措，准备让部队分散突围。徐向前认为不可，会被敌各个击破。主张从北面敌人的薄弱环节中突围。广大指战员也认为只有大家一起奋力冲杀才能脱险。张国焘不再坚持。徐向前令 12 师在 73 师配合下夺路前进。

12 师师长旷继勋令 34 团为先锋，73 师派 219 团配合。34 团能攻能守。团长许世友、政委韩继祖、副团长钟方荣都是猛将。三个强手一合计，许多硬仗、恶仗他们都能拿下来。三人接受任务后分工：许世友全面指挥，韩继祖带 1 营打头阵，钟方荣在后面策应。任务是突破敌人阵地，强占北垭口，控制一条通道，让全军通过。达此目的，强攻不行，只有奇袭。黄昏时，奇袭队出发了。1 营 1 连连长令打旗兵罗应怀举着红旗走在前面。深山老林，人迹罕至，无路可行。罗应怀将红旗插在腰背上，手攀崖壁探路。红旗指引着全连勇士们去偷袭敌营，夺取垭口。

奇袭成功了，但夺取容易守住难。34 团和 219 团为守住垭口付出了沉重代价。仅 34 团 1 营只剩 20 多人。营长、政委和 3 个连的连排长都牺牲了，

最后一位代理营长本应是罗应怀，他觉得打旗比代理营长更重要，让给司号员去代理。他在这场战斗中，始终高举红旗，一面摇旗呐喊，一面参加作战，并用旗尖捅死了一个敌人。鲜红的旗帜在北垭口高高飘扬，鼓舞着将士们勇敢作战，勇敢突围。1 营撤出战斗后，疲劳和饥饿一起袭来，大家瘫倒地上。这时团政委韩继祖、副团长钟方荣和团后勤处主任周业成都来了。周业成带来一小袋土豆。大家顾不上洗净，往衣服上一擦就啃起来了。罗应怀啃了一口，又麻又涩，想吐出来却咽下去了。周业成笑着说："我们黄安只种红薯，不种土豆，大家吃得少，不习惯。土豆可是这山里人的主粮啊！"罗应怀听了说，"你这个老乡怎么不早说，我打算不吃了，害得我少吃了两个。"说得大家笑个不停。九死一生下来，难得的乡情成了最好的精神调节剂。

蒋介石以为这次能将困在深山老林的共军歼灭，想不到竟又突围而去，并驰向关中，大有攻占西安之势。于是连忙调兵遣将去保卫西安，并部署新的"围剿"。在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直指西安不过是虚晃一枪，而是折身向南，翻过荒无人烟的秦岭，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这时，四川军阀在川西忙于混战，形势对我军有利。方面军总部决定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2 年 12 月 17 日，衣衫单薄的红军指战员，为了尽快入川，选了一条捷径——翻越巴山。自古以来有天险之称的巴山海拔约 2 千米。上山要走 70 里，山上要走 70 里，下山也要走 70 里。于是巴山又叫"二百一"。这 210 里山路，由于兵匪骚扰，行人早已绝迹，一些羊肠小道多被荆棘淹没。时值隆冬，冰雪封山，气候恶劣。广大指战员忍饥受冷，战胜困难，披荆斩棘前进。73 师奉命前行。师长王树声令 217 团作开路先锋团。团长将任务下达。最后当尖兵的是 1 营 1 连。1 连连长闵学胜，带领全连急行两天到达通江两河口，抓了一个"舌头"搞清了敌情。这个位于川陕交通要道的小地方，驻守的是川军田颂尧部的一个营。闵学胜向上级报告，团长徐深吉令 1、2 营对敌发起进攻。敌人不支，纷纷溃逃。我军很快进入两河口，打开了入川的大门。方面军总部决定兵分三路向南挺进：73 师为右路，西出夺取南江；10 师为左路，东出夺取洪口；总部率 11、12 师为中路，攻占通江后向巴中发展。

从攻占两河口起，革命红旗就插上了川北大地。眼前的紧急任务是夺取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川北站稳脚跟，让转战三千里的大别山革命星火在大巴山迅速燎原。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抓地方工作。来自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干部都会打仗，又会

做地方工作，具有一定的战斗和工作经验。其中红安籍干部更为突出。因为从黄麻起义开始，他们就是在武装斗争与地方工作交织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不管是红四方面军的战斗队还是工作队，红安干部都是主要骨干。就拿现在入川的三路部队讲，其中红安籍团以上干部有：

右路——73 师 218 团团长徐深吉，219 团团长徐世奎、政委叶道志；

左路——10 师政委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张世谦，28 团副团长程启光（不久由王近山接任）、政委甘良发，29 团团长李隆兴、政委曾传六，30 团团长汪烈山、政委王建安、政治处主任汪加申、政治处党委书记赵鹤亭；

中路——红四方面军经理部部长吴先保、副部长程儒珍、总经部政委兼总医院政委张雨滴、少共国际团政委熊国祺；11 师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周光坦，31 团政治处主任袁光焱、党委书记刘松清（刘飞），32 团团长孙玉清、政治处主任秦贤道，33 团政治处主任李天焕；12 师政委詹才芳、政治部主任韩继祖，34 团副团长钟方荣、政治处主任徐斌洲，35 团政委梅宏华、副团长熊邦赞，36 团团长余天云、副团长汪成功。至于营、连干部不胜枚举。

方面军兵分三路，如三箭离弦，向前飞去。12 月 25 日，12 师 36 团在团长余天云带领下，一举夺取通江县城。抢得头功的是该团 2 营 6 连指导员刘昌毅。他原是连长，已三次负伤。按当时部队规定，营以下干部和战士负伤后应休养。他能坐上担架随部队翻过秦岭，是个例外。刘昌毅为何受到关照？因从反“围剿”以来，他带领 6 连不畏艰险，敢打敢拼，打了很多硬仗恶仗，多次立下战功。师、团、营首长称他是“难得的战将”，舍不得将他留在地方。他本人也坚决要求随部队一起走，说：“只要我不死，我还要打大仗消灭更多的敌人！”他的腿伤刚好一点，能走路了，就要求归队。上级为了关照他，让他当指导员，他高兴极了。部队要去打通江，他和连长向上级要求坚决带攻城突击队。营、团首长，特别是团长余天云，很喜欢刘昌毅，觉得由他带突击队胜利的把握会更大，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在兄弟部队大力配合下，6 连开始出击，刘昌毅忘了腿伤刚好，带领部队破城而入，直捣敌营。其他部队随后跟进展开，将驻敌一个营和当地民团一举歼灭，解放了通江。这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夺取的第一座县城。刘昌毅的 6 连作战有功，受到了上级表彰。趁敌人的兵力空虚，徐向前令 11、12 师迅速将部队展开，占领了通江大部分地区。

这时，四川各军阀为争权夺地正在嘉陵江西岸展开一场混战。参加混战的田颂尧听说他的地盘被共军攻占，忙从嘉陵江沿岸抽调兵力分两路回援。

一路支援南江，一路反攻通江。徐向前决定以12师为主、11师配合，由通江城西出20里，在一个叫恩歌嘴的地方，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打击来犯之敌。要求参战部队一定要打败敌人，夺取胜利。12师经两个多月转战，所辖三个团虽有减员，但战斗力还是不差。三个团的团长都是能攻善守的勇将，是旷继勋手中的三把利剑，不论抽出哪把剑都会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现在，旷继勋安排许世友34团从中间出击，王学礼35团和余天云36团从左右两侧出击。当敌李炜如部进入恩歌嘴我军阵地后，旷继勋下令猛打。敌人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还未醒过神来，有“猛张飞”之称的许世友就带领全团冲杀过去。接着，左右两边的35、36团也一齐杀出，敌人招架不住，纷纷溃逃。我军紧追不舍。余天云带领36团一直追到马家坪、杀牛坪，歼敌近一个营。敌人逃进巴中，我军才停止追击。打扫战场时，36团的新战士说，一个落马坪（他们把马家坪叫成落马坪），一个杀牛坪，这两个地名叫得好，敌人注定要在这里丧命。余天云听到了，觉得这些新战士的思想觉悟需要提高。决定通过这件事做一番战场思想教育工作。他对大家说，这次战斗是靠大家英勇拼杀才把敌人打败的，不是靠地名叫得好。我们红军是老百姓的部队，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得到所有老百姓的拥护。所以不管走到哪里都能打胜仗。我们的老战士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的新战士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只要大家都把为老百姓打天下，解放全国受苦人放在心上，那些杂七杂八的想法就少了，打起仗就能无往不胜。余天云透过小事，以小见大，进行有条有理有说服力的思想教育，不仅使新战士，也使老战士提高了思想觉悟。久而久之，这位裁缝出身的指挥员，在红军中渐渐有了智勇双全的名气。

再说李炜如逃进巴中，纠集另一路罗乃琼部，共7个团，大举反扑过来。旷继勋带领12师，李先念带领11师32团，奋力挡住敌的猛烈进攻之后进行反击，毙伤敌人千余，俘敌600多人。敌人招架不住，狼狈逃窜，有很多人跌下悬崖、溺水而死。李炜如两次受挫，逃进巴中闭城不出。徐向前令旷继勋、李先念进攻巴中。当我军进入城外清除敌人的据点时，李炜如见势不妙，乘黑夜弃城逃走。1933年1月23日，12师和11师32团进入巴中。

在此期间，11师31、33团占领了通江西南的要点得胜山。10师打退了由万源向我军进攻的敌65师，迫其退守万源，保卫了我军右翼安全。73师进攻南江，遭敌19旅阻击，不能前进。该师218团团长徐深吉建议避开正面敌人，绕道北进，击敌侧翼。师长王树声同意他的意见。徐深吉率218团进行迂回侧击，果然有效，73师主力很快接近了南江城。经三天激战，于2

月 1 日占领了南江县城，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当时，通南巴地区虽有共产党的组织，但力量十分薄弱。在这里迅速建立根据地，不能不首先依靠红军分兵去发动群众。这样，方面军在执行战斗任务的同时，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党组织等工作队的任务。于是，方面军从部队中陆续选调了数千名工作积极、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和战士，组成许多工作队，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规定工作队的队员，必须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学习当地群众语言，真正做到与群众打成一片。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搞好土地分配，光靠工作队的力量不够，还必须有部队帮忙，提供安全保障。方面军总部又将部队就地展开，划分地区，分片包干，完成任务。各部队划片包干的地区是：

总部直属部队，主要是各部门和少共国际团，负责通江城区和郊区。因各部部长、政委工作较忙，由少共国际团政委熊国祺领导开展地方工作；

总医院负责通江北面的泥溪场、苦竹坝地区，由兼政委的张雨滴领导开展地方工作；

第 10 师负责通江东北的洪口、龙凤场和万源西部的竹峪关地区，由师政委周纯全和政治部主任张世谦领导开展地方工作；

第 11 师负责巴中城区和郊区，由师政委李先念和政治部主任周光坦领导开展地方工作；

第 12 师负责巴中以南地区，由新到任的师政委詹才芳和政治部主任韩继祖领导开展地方工作；

第 73 师负责南江地区，由师政委和政治部主任领导开展地方工作。

鄂豫皖根据地是经过发动群众、武装起义、建立军队和政权、实行边界割据等步骤建立起来的。方面军到了川陕地区没有照搬这些经验，直接派红军和农村工作队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群众组织，分配土地，大大加快了根据地建设的工作进程。这是红四方面军在新区建立根据地时创造的新方法、新经验。

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和熟悉通南巴的地理民情之后，方面军决定将这一地区划分为 5 县 1 市：通江东北部为赤北县，通江北部和南江东部为红江县，通江为赤江县，南江县、巴中县不变，另划巴中城区为巴中特别市。各县市很快成立了党的县委会、县苏维埃政府、县独立团（营）和赤卫军，以及工、农、妇、青、儿等群众组织。在地方干部尚未成长起来之前，方面军从

各部队中派人去担任各县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红安籍干部被选调去的较多。其中到职较早的是袁克服。2月初，川陕省委在通江县成立，原任少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现任红四方面军少共书记的袁克服，被选为川陕省委书记。后来接替他担任此职的还有周光坦、周纯全，直到红四方面军长征，红安人一直在这个主要岗位上服务于川陕人民。

在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任职的还有：省委组织部部长谢富治、省工会委员长兼省保卫局局长周纯全，继任的还有邹功凯、曾传六，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办事处秘书长赵国威，省苏维埃政府税务局局长吴先保，省军区军事指挥部副指挥长李隆兴，红江县军事指挥部指挥长秦基伟，江口县军事指挥部指挥长熊应堂，长池县军事指挥部指挥长方和明，省保卫局看守所所长甘思宽，省保卫局红江分局局长张仁初等。

对各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干部，要求尽量让本地人担任。如一时无合适人选，就从部队选派，强调做好传、帮、带，使本地干部快速成长起来。红安人被抽出担任县委领导工作的都干得很不错。如金世柏，参加红军前曾任过乡、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现在是营政委，被选派去南江担任县委书记。到职后，一面抓县委日常工作，一面抓地方干部培训，不到半年就为南江培养了一批党政干部。其中一位雇工出身的年轻人，入党后进步很快，从乡到区，最后到县里接替他任县委书记。金世柏在南江完成了传、帮、带的任务，又被派去红江县任县委书记。后来省委又派他去宁强、宝兴任县委书记。一年多时间，他先后任过四个县的县委书记，不但完成了工作任务，还带出了一批好的接班人，成为干部中老手带新手的榜样。

刚建立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办事机构，如何按法律规章制度办事，也要有人传、帮、带。赵国威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他和金世柏一样，每走一个地方就带出一些较好的办事人员。他先在红江县委办事处任秘书长，培养了一些办事人员。后来调到广元县委办事处任秘书长，又带出一些得力的办事人员。最后他被调到省委办事处任秘书长。曾担任过省委书记的周光坦，1960年初回忆往事时，谈到赵国威的秘书工作。他说，莫看那时省委机关简简单单，但可考验秘书的能力了，一般人带不转。赵国威当秘书既原则又灵活，把省委机关带得很转。

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到川陕边，历时2个多月，行程3000多里，最后以2个多月时间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红安人在整个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从军队到地方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再说敌人“围”来“剿”去，大别山蔓延的革命烈火不但没扑灭，反而在大巴山熊熊燃烧起来。四川军阀见了触目惊心。蒋介石命令他们停止内讧枪口对共，他们倒是很听话，立即转向红军开战。

通南巴地区是军阀田颂尧的地盘。蒋介石抓住“失地者心痛”的心理，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剿共”自然会更加卖命。田颂尧纠集了38个团，60000人，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向红四方面军发起攻击。

在新的地区与新的敌人作战，红四方面军采取了新的战法。总指挥徐向前根据在鄂豫皖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提出这次反三路围攻，应采取逐步“收紧阵地”的办法以打破敌人的围攻。其部署是：以少量兵力控制敌人进攻必经的险山要隘，构筑阵地，节节抵抗，消耗敌人，逐步作向心收缩，创造反攻条件。

敌人此次三路围攻，重点是左路纵队，中、右路纵队则是配合。徐向前将我军4个师作如下安排：以倪志亮、李先念11师对付左路敌人，旷继勋、詹才芳12师对付中、右路敌人，王宏坤、周纯全10师掩护总部和后方安全并监视万源方向敌人来犯，王树声73师警戒陕南敌人来犯。2月12日，敌人围攻开始，我军能打就打，不能打就退。田颂尧以为我军不堪一击，令各部大胆推进，其左路气焰嚣张。李先念令孙玉清32团选择有利地形狠揍敌人。孙玉清选在侯家梁设伏，将敌先遣部队击溃，俘敌500多人，缴枪700多支。首战告捷，鼓舞了我军士气，也灭了敌人的威风。战后孙玉清被提升为73师师长。

田颂尧的纵队不再像前段那样气势汹汹围攻了。但在蒋介石的一再电令下又不敢松懈，仍仗着人多势大向我根据地不断推进。在此情况下，我军一再收缩，最后几乎将通南巴大部地区让出，退守到川陕边一隅的空山坝一带，方圆不过百里。

兵书上说：“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红四方面军有点身处绝境。但总指挥徐向前心里有数。他就是要在这弹丸之地做文章，让冒进到这里的敌左路纵队9个团埋葬在此。

5月20日，徐向前让李先念带上33团团长兼政委程世才、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到总部去接受任务。徐总要求33团作一把尖刀，突然刺进左路敌人的腰部，将敌分为两段，以便我军分割围剿。

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程世才、李天焕带领33团于21日晚，冒着滂沱大雨，依靠闪电照路，攀悬崖峭壁，钻荆棘丛林，翻过海拔两千多米

的高山，在拂晓前潜入敌人旅部驻地余家垮。然后 3 个营分三路向敌发起总攻。顿时，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冲锋的呐喊声，响彻了整个余家垮的山山岭岭。敌人遭我军突然打击，仓皇失措，乱作一团。有的提着裤子乱跑乱叫，有的拿着枪乱放一气。就这样，余家垮山头上的敌人两个营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全部缴械投降。

这时李先念带着一身泥水、满头大汗赶到 33 团。第一句话就是表扬 33 团打得好！打得猛！要一鼓作气把前面敌人的旅部消灭掉。33 团指战员受到师政委表扬，更加斗志昂扬，在本师主力配合下，一鼓作气荡平了敌人旅部，活捉了敌旅长杨杰，歼敌一个团。我军从中间开花，一下子打乱了左路敌人的阵脚。然后，我 73 师从正面，10 师和 12 师从右翼，11 师从左翼，一起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击。经三昼夜激战，方面军在空山坝以南的余家垮、柳林坝地区，于 5 月 24 日全歼敌人 7 个团，击溃敌人 6 个团，俘毙敌旅、团长以下官兵 5000 多人，缴枪 3000 多支，机关枪 20 多挺，迫击炮 50 多门，一举粉碎了敌左路纵队的进攻。

空山坝大战，敌左路纵队惨败，其余两路见此情况纷纷撤逃。我军乘胜追击。5 月 26 日，73 师收复南江，11 师进抵长池。29 日，12 师收复通江。6 月 5 日，12 师又收复巴中，并直逼仪陇。至此，历时 4 个月的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我军共歼敌 20000 多人，缴枪 8000 多支，炮 50 余门。残敌全部退守嘉陵江沿岸，革命根据地亦随之巩固和扩大。到 6 月间，根据地范围北起陕西镇巴、西乡，南至仪陇、江口，东达万源，西抵广元、苍溪，纵 200 多里，横 300 多里。新建立了江口、仪陇、广元、长池、恩阳、苍溪、万源 7 个县苏维埃政权。全区人口达 200 多万，面积达 30000 多平方公里。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通南巴完成了土地分配任务，新区也在逐步开展。反三路围攻的胜利，既促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也使红四方面军得到了发展壮大。

6 月底，方面军总部在木门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决定将原来的 4 个师扩编为 4 个军：以原第 10 师为基础，连同赤江、赤北、万源、江口县独立团（营）扩编为第四军，下辖第 10、11、12 师，共 3 个团；以原第 12 师为基础，连同巴中、恩阳、仪陇、阆中等县独立团（营）扩编为第九军，下辖第 25、27 师，共 6 个团；以原第 11 师为基础，连同苍溪、长池等县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扩编为第三十军，下辖第 88、89、90 师，共 8 个团；以原第 73 师为基础，连同南江、红江、广元等县独立团（营）扩编为第三十一军，下辖第 91、92、93 师，共 7 个团。各军的军部、

政治部以原来各师的领导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此外，各军还直辖有医院、担架营、修械所和包括侦察、通信、警卫、工兵在一起的特务营及一个炮兵连。

这时，川陕根据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下为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徐向前、陈昌浩仍分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兼，副主任傅钟、曾传六。方面军直属机关和部队有参谋处、总经理部、总医院、警卫团、妇女独立营、彭杨学校（随营学校）等。

部队扩编后，由原来 4 个师 12 个团，开始扩大到 4 个军 11 个师 29 个团，后来逐步补齐各军所缺编制，便增加到 12 个师 36 个团。编制多了，需要的干部也多了。这些干部只能从部队中产生。原来的班、排长直到师长，都有提职的希望。面对干部大提拔，广大指战员不是抢着上而是互相让。吴基荣就是个例子。他原是团长，反三路围攻负伤住医院，扩编时通知他担任师政治部主任。他觉得自己能力有限，便婉言谢绝，推荐原团政治处主任去担任，自己愿留在医院当政委。他说，那个时候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对革命工作有利，没有半点私心杂念，如果有便觉得可耻。真正做到了参加红军时大家所说的那样：不图名，不图利，只图为革命做贡献。

通过普遍提拔加荐贤举能，各级大批军政干部从广大指战员中脱颖而出。这是红四方面军继鄂豫皖之后，在川陕根据地形成的时候又一个提干高潮。许多后来成为共和国将军的就是在这次大提拔中走进将领大门的。这里再说一个人。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江波，先是跟李先念、周纯全，后是跟徐向前当警卫员。他的勤务、警卫工作做得周密细致。每位首长都很喜欢他，他也很热爱这项工作。徐总指挥听说他从鄂豫皖到川陕一直干这个，就不让他待在身边。他对江波说，你明天就下去当副团长行吗？江波回答：报告总指挥，我干不了。徐总指挥说，怎么干不了？每次遇到紧急情况，我见你敢打敢拼蛮不错的！江波要求说：徐总你就饶了我吧，让我留在你身边。徐总认真地说，不行。我如果留下你就太自私了。你应该为革命做更大的贡献，干不了副团长，就从团政治处主任干起行吗？就这样，江波从指挥部警卫队（任党支部书记）下到 4 军 11 师 31 团任政治处任主任。

前面说过，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红安籍干部。尽管作战牺牲和“肃反”错杀失去很多人，但在红军和地方干部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大。这次部队扩编提干，各级党政军中的红安籍干部比鄂豫皖时期还要多。大概统计一下，从扩编时起到长征，在各单位先后担任过

团以上职务的红安籍干部有160多人，他们是：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部长张雨滴、总供给部部长吴先保、副部长程儒珍、军委特务员毛普安；

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训练参谋徐深吉、作战参谋胡云龙、电台台长耿锡祥、罗映青，总务科长何延振；

总政治部：副主任曾传六、组织部长谢富治、组织干事甘思和、收发机要科长席绍先，文印科长李春生；

参谋处：作战科长吴昌炽、军备物资收集科长徐洪才；

供给部：部长吴先保（兼）、副部长程儒珍（兼）；

兵站部：部长吴先恩、站长杨子明；

总医院：院长王建刚、政委周光坦（后）、宣传科长徐仕凯；

警卫团：团长王吉功、秦基伟（后）；

随营学校（后改称彭杨学校）：开办时负责人徐深吉（兼）、队长涂锡道；



1985年5月，作者（右一）访问涂锡道（左二）、吴昌炽（左一）、涂夫人王力扬（左三），请他们讲红四方面军入川和开辟川陕根据地情况。图为访谈后合影。

第四军：政委周纯全、参谋处作战科长程启光、通讯队长李天德、卫生部副部长秦光远，医院院长陈保青（女）、政委王道喜，第10师政委甘良发、副师长王近山、政治部主任秦贤道、副主任许草春、政治部党务书记徐青山、秘书处主任丁维山、供给部长刘必正，第28团团长郑国仲（后）、政

委王汉斋，29团团长熊应堂、政委涂锡忠，第30团团长王宜亭、政委涂学渊、李定灼（后），第11师政委陈锡联、副师长叶成湖、政治部主任袁光焱、陈美藻（后）、通讯队长韩卫民，第31团团长邹国厚、政治处主任徐世贵、江波（后），第32团团长杨耀清、政委陈伯稚，第33团团长余登田、政委吴文斗，第12师政委胡奇才（后）、政治部主任韩继祖、宣传科长何德庆、师部党务书记汪运祖、师部情报科长程绍祥，第34团团长刘德义、政委熊国祺、刘飞（后），第35团团长熊邦赞，第36团团长吴有卿、政委李业雄、政治处副主任胡正平；

第九军：政委詹才芳、供给部长韩继能，第25师师长王海清、政治部主任徐世贵、司令部作战科长张志勇，第74团政委李天锐，第75团团长杨荣华，第26师师长刘理运、政委陈少猛，第76团团长刘昌毅、供给处主任何连梅，第77团团长陈炳意，第78团团长武万志，第27师政委梅宏华、副师长汪成功、政治部主任夏祖盛，第79团团长黄英九、政委秦定国，第80团政委徐斌洲、贺健（后）、副团长余文化，第81团副团长杨子明、戴克林（后），教导师政治部主任李有庆，军直骑兵团团长黄高宏；

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政治部党务书记张光寿、蔡仁年（后），参谋处三科科长周明松、供给部被服科长汪如意，第88师师长汪烈山、政委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汪加申、政治部秘书长况玉纯、宣传科长鲁嘉焱、供给部长涂其友，第262团团长郑文烈、政治处主任殷国洪，第263团团长韩步齐、政委钟行忠，第264团副团长黎锡福、政治处主任曾纪奎，第89师师长徐世奎、政治部秘书长熊心乐，第265团团长黄清友、邹丰明（后）、政委黄英祥，第266团团长秦祖如，第90师师长邹洪盛、供给部部长聂洪国，第268团团长王德清，第270团政委曾广泰，军直特务团政委董家安；

第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司令部作战科长闵学胜、甘思和（后），政治部组织干事金世柏，供给部长郑行齐、郑行福（后），卫生部长熊友刚；第91师师长徐深吉、政治部主任胡青山、政治部组织科长胡裕文、司令部侦察科长徐绍华、经理部主任陈桂清，第271团政治处主任刘福胜；第272团政委刘诚光，第273团团长周光策；第92师师长叶道志；第274团团长袁学鑫；第275团团长杨宏明；第276团团长洪礼；第93师政委王德安、副师长徐盛礼、政治部主任张世谦、师党务书记熊绪光、供给部政委程悦长；第277团团长孟传清、副团长黄永胜；第279团副团长闵学胜、军直属骑兵

队政委赵鹤亭；

川陕省委书记周光坦、周纯全（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党组书记曾传六、川陕省游击司令袁克服；

此外，还有一时无法查明属何部队的喻同金（军供给部长）、祁富胜（军供给副部长）、陈金荣（团长）、程怀和（团政委）、郑文烈（团长）、吴有卿（团长）、徐绪奎（团长）。

从以上名录中可以看出，各军、师、团的主要干部，几乎都有红安人担任。其中军级干部有 10 多名，师级干部有 40 多名，团级干部有 110 多名，共计160多名。他们用自己的脊梁撑起了红四方面军，每个人都充满传奇色彩。

李先念是木匠出身。他说过，要用斧头打一副棺材把旧社会埋葬掉。参加黄麻起义后，更自觉地用斧头去辟开新的世界。他从地方到军队一直做政治工作，但毫不放松军事。从战争中认真学会了带兵打仗，成为军政双全的将领。正因为他是一位全能指挥员，总部给他配的搭档是破格提拔的军长余天云。不言而喻，有帮带之意。

余天云裁缝出身。裁缝在裁剪、缝纫、熨平衣服时，要眼疾手快，大胆细心。大概是出于职业本能，他带兵打仗勇敢讲策略，出手又快又狠。他是原 12 师 36 团团长，带领该团打了很多硬仗。这次入川夺取的第一个县城通江，就是他用勇猛加计谋打下来的。跟李先念一样，也是一位军政全才，所以由团长破格提升为军长，全方面军中仅他一人。

詹才芳、周纯全是校工出身。董必武为传播马列主义，在武昌主办过党义研究所，詹才芳在该所当工友，接受了革命思想。周纯全在八里湾小学当工友，学校老师大多是董必武的学生，接受了他们传播的革命思想。他俩是名副其实的董必武的“徒子徒孙”。黄麻起义后，革命一度遭受挫折，他们没有退缩，而是挺身向前。詹才芳拉起一支游击队跟反动派打游击。周纯全转移到京汉路西另辟革命蹊径，最后辟出一片苏区，当上了县委书记。他们归队后，党和红军知人善任。詹才芳在红军中担任过连、营、团、师长或政委。周纯全任鄂豫皖苏区工会负责人、保卫局负责人、西征路上担任师政委，后来又成为川陕省委书记。部队扩编时两人自然成了军政委的合适人选。

曾传六是裁缝出身，袁克服是理发工人。手艺连着千万家，而且多半是穷家小户，最好的革命土壤。两人都是黄麻起义中农民义勇队的骨干，早就表现出组织领导才能。起义胜利后建立政权和军队，他们就成为领导干部了。曾传六稳重沉着，原则性强。在鄂豫皖时就被提拔到省委和分局机关做

治安保卫工作。这次扩编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克服原则灵活，年轻活跃，有开拓精神，曾被选为鄂豫皖少共（共青团）省委书记、方面军少共书记。川陕省委成立时，面临开辟新苏区的繁重任务，需要一位敢闯敢干的领头人，袁克服就成了合适人选，于是走上了首任省委书记岗位。

扩编时，军一级主官中尚无孙玉清的名字，但不久便有他了。他生在贫苦农家，儿时有幸上了5年私塾，后来父母双亡，被家人送到永佳河一家粮店当学徒。他是店员出身，从小疾恶如仇，好打抱不平。黄麻起义胜利后，开展土地革命。孙玉清手持大刀与农民们一起捉拿土豪劣绅，强令他们交出剥削穷人的财产，机智勇敢，冲锋在前。1929年被农会推荐去参加红军。由于有些文化基础，又肯学习钻研，当兵时间不长就懂得各种枪械的装卸配备和简单的修理技术，打仗不但勇敢还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消灭敌人。三年工夫就由战士升到营长，在黄安战役中表现出色升任团长。西征转战，一路过关斩将，屡立战功。李先念赞扬说，新集一战，是孙玉清率部英勇阻击敌人，才保证方面军总部安全转移出去。在反三路围攻中，他以一个团击溃敌人6个团的进攻，获得川陕苏维埃政府颁发的“以一胜百”的锦旗，升任73师师长。不久，73师扩编为第九军，任该军91师师长。不及三月升任军长。他任过两个师的师长，时间都不长，只是过渡一下，算是快速提拔重用。

至于师、团级干部中的传奇人物也不少。例如，三十军88师师长汪烈山，将鞋子脱给鞋破了的突击队员去冲锋陷阵，自己打赤脚指挥，把仅有一小袋炒玉米喂给饿晕了的战士自己忍饥领导部队打阻击。被誉为“爱兵模范”。再如夜行40多里，插入敌人后方，以一个团吃掉敌人一个旅（号称“王老虎旅”）的88师265团团长邹丰明、政委黄英祥，被方面军总部授予“夜老虎团”的光荣称号。这些事例说明，“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革命战争中的传奇英雄，对鼓舞士气与提高战斗力有极大作用。从这意义上讲，红安籍干部在战斗精神和作风上也称得上脊梁。

方面军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得到了扩编和休整。在此期间，蒋介石委任四川另一军阀刘湘为“剿匪”总指挥，令他统领各派军阀对红军发动新的围攻。

但是，刘湘与刘文辉的混战还未结束，部队一时抽不出来。邓锡侯的部队远在川西。直接与红军对峙的田颂尧新败，杨森和刘存厚的实力不强，力图自保。于是蒋介石7月初下达的命令，至8月间还没有准备就绪。形势对我军暂时有利。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在根据地的西、南、东三面发起三次进攻战役。

第一次是西进发起仪（陇）南（部）战役。方面军总部以詹才芳的九军担任主攻，李先念、余天云的三十军、孙玉清的三十一军各以一部配合，从8月12日开始向仪陇、南部地区发动进攻。经半月战斗，到9月初解放了仪陇全县，控制了南部、广元、昭化、苍溪、阆中等县在嘉陵江东岸的广大地区和陕西宁强县大部，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1000多支，掌握了大片井盐生产，不仅解决了军民用盐，还对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次是南进发起营（山）渠（县）战役。方面军的部署是：北防东监，主力南下。以三十一军防守北面陕南之敌，四军一部监视川东之敌，三十军主力由北向南担任正面进攻，九军主力由西向东、四军11师由东向西分别从两侧进攻。9月22日夜，九军25师师长王海清令73团团长刘理运冒着滂沱大雨，穿过荒僻的山路，以隐蔽、突然的动作，攻占敌人的险要阵地龙背场，为我正面进攻部队打开了缺口。李先念、余天云即率所部从正面猛攻，周纯全率四军11师从两翼迂回。我三路部队穷追不舍，逼近营山和渠县近郊。又是九军25师73团团长刘理运，带领全团猛攻营山外围敌重要据点大庙场，冲入敌阵，展开肉搏，连破七道工事，为主力部队开道。10月3日晚，九军解放了营山县城。与此同时，周纯全率11师也抵达渠县北郊。余天云率三十军一部进到蓬安东面的周口，敌人逃至嘉陵江西岸。这次战役历时10天，毙敌杨森部团长程栋梁以下1000多人，俘敌团长雍受康以下2000多人，缴枪2500多支，解放了营山、渠县、蓬安大部地区，根据地向南扩展了100多里。

第三次是东进发起宣（汉）达（县）战役。盘踞在这里的是军阀刘存厚第二十三军，约15个团近2万人。他为防备红军进攻，采取单线防御，用13个团形成一条300多里长的防线。兵力分散，后方空虚。徐向前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让三十一军主力在嘉陵江沿岸发起佯攻，秘密在东部集结13个团的兵力，分成中、左、右三路，奇袭要点，突破防线，大胆迂回，歼灭敌人。中路由三十军和九军组成。三十军为第一梯队，九军为第二梯队，从中间突破，夺取达县和宣汉。左、右路由四军分别担任，一是配合中路作战，二是夺取万源。中路是主攻。挑重任的是三十军88师和90师。余天云、李先念把任务交给88师师长汪烈山、政委王建安和90师师长邹洪盛，共同指挥2个师4个团去攻打刘存厚的老窝达县。10月16日夜部队向敌区开进。为速破敌人防线，三位师干部研究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令268团于次日拂晓攀越5丈多高的悬崖峭壁，对敌人的险要阵地烟灯寨发起突然袭击，歼守军一个营，打开了缺口。其他几个团迅猛攻下土地堡、麻石

口，又歼敌一个团。敌人中部防线被摧毁后，纷纷南逃。我军穷追猛打。19日攻占罗江口。20日抵达县城北凤凰山。为防敌人逃跑，三人分工：王建安带263、264团，一面守住罗江口，一面佯攻凤凰山；汪烈山、邹洪盛带262、268团迂回到城东南，打下另一个重要据点吴家桥。20日晚一举进攻县城，再歼守敌一个团。缴获了刘存厚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的全套设备、长短枪8000多支、子弹500多万发、炮10多门、电台2部、银圆100多万块、棉布20多万匹、棉衣2万多套和其他大批军用物资。指战员们高兴得跳了起来，说这次刘存厚的老窝端得好，要啥有啥！方面军总部获悉后，表彰了三十军88、89师指战员。

同一天，何畏、詹才芳率九军解放了宣汉。21日，王宏坤、周纯全率四军攻占了万源，并与川东游击队会师。

整个战役历时11天，解放了三座县城，毙俘敌4000人，缴获极多。根据地向东扩展约300里，使通南巴苏区与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战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第三十三军，下辖97、98、99师，全军约10000多人，壮大了方面军的力量。后来，红安籍黄中炳调任该军独立团团长，张仁初任98师294团团长。

从1932年12月红军入川，至1933年10月三次进攻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经过10个月的英勇奋战，获得了巨大胜利。部队由入川时的4个师15000人，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创建了23县政权、拥有500万人口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四方面军发展史上又一个高潮。这个巨大胜利是全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其中红安人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

三次进攻战役结束后，我军本应转入反围攻准备。而张国焘主张“不停顿的进攻”，命令红军向南攻击。这时，四川军阀、二十一军军长刘湘打败了刘文辉，从蒋介石那里领了200万元大洋、1万条枪的奖赏，开始走马上任。他纠集各军阀部队110多个团，共20万人，兵分六路，于11月中旬对根据地发动新的进攻，即所谓六路围攻。其中一、二、三、四路从西至南面攻击，五、六路从东面攻击。我军仍采取“收紧阵地”的战略，节节抗击，疲劳消耗敌人。经9个月战斗，敌人伤亡重大，疲惫不堪，成强弩之末。徐向前抓住战机，在东线开始反击，用夜袭战突破了敌人中央阵地，一举歼敌两个旅。这时应乘胜向敌纵深迂回，消灭更多敌人，但坐镇后方的张国焘胡乱下命令，要红军就近歼敌，结果后退之敌不等我军过来就跑掉了。徐向前只好向西另寻歼敌机会。他随三十军一起前进，对李先念说：先念呀，我们

这次西进，有违张主席意见，只能打个大胜仗，否则……李先念说，徐总放心，广大指战员早就憋了一肚子气。有你亲自指挥，他们会把这一肚子气泄到敌人头上去的，一定会大胜而归。果然，在徐总指挥下，作大纵深迂回，将西线后退之敌 10 多个团全部歼灭。东线敌人见此情况不敢再战，亦纷纷退去。至此，历时 10 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胜利结束，总计歼敌 8 万多人，缴枪 3 万多支，炮 100 多门。

战后，部队转入总结和整训，方面军表彰了反六路围攻中战绩突出的部队。分别授予九军 73、75 团“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奖旗，授予三十军 263 团“钢军”、265 团“夜老虎”的奖旗，授予三十一军 274 团以“夜袭常胜军”、三十三军 294 团以“百发百中”的奖旗。表扬了战绩良好的四军 28、33 团，三十一军 271、279 团。获奖旗的 6 个单位，红安籍担任主要干部的有 4 个，就是刘理运 73 团（攻如猛虎）、杨荣华 75 团（守如泰山）、钟行忠 263 团（钢军）、邹丰明 265 团（夜老虎）。红四方面军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这些获奖旗单位则是英雄中的英雄。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10 月中旬飞到西安，策划“川陕会剿”。然而川军在六路围攻中损失惨重，军阀之间矛盾重重，蒋介石军队又忙于围堵中央红军。到 1935 年 1 月，“川陕会剿”仍难以展开。

方面军经三个月整训，士气高昂，物资充分。于是在“会剿”到来前，先西进后北出，发起广（元）昭（化）战役和陕南战役，均获胜利。既有利于打破“会剿”，又为向甘南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时，党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北上。3 月 28 日，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到 4 月 21 日全军渡完，并向岷江地区前进，连克 9 座县城，歼敌 1 万多人，控制了纵横二三百里地区。但没想到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令后方机关和地方武装全部撤到嘉陵江以西，仅留 300 多人在当地坚持斗争。在撤退途中，张国焘实行所谓“坚壁清野”，强令部队焚烧和破坏沿途的房屋资产，给群众造成巨大损失。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不仅破坏了依托川陕向甘南发展，还断送了两年多来浴血苦战的成果，使红四方面军再次陷入无根据地作战的困境。实际上，红四方面军自渡过嘉陵江就开始了长征。

制止分裂　曲折长征

说到长征，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震惊世界的大事。中国工农红军为实行

战略转移而进行的长征，先后有 6 支部队。他们是：红七军团（1934 年从瑞金出发长征，进入闽浙赣根据地与红 10 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北上受挫）、红六军团（1934 年 8 月从湘赣边出发长征，10 月到达湘鄂西与贺龙部会师）、红一方面军（1934 年 10 月从瑞金出发长征，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红二十五军（1934 年 11 月从鄂豫皖出发长征，1935 年 9 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部会师）、红四方面军（1935 年 3 月从四川出发长征，1936 年 10 月到达甘肃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师）、红二方面军（1935 年 11 月从湘鄂川黔出发长征，1936 年先与四方面军会师，10 月到达甘肃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师）。6 支长征部队除红七军团夭折外，其余都成功到达目的地，实现了战略转移。

红军长征是军事史上从未有过的艰苦远征。每支长征部队既要面对敌人频繁的围追堵截，又要面对恶劣气候下的饥寒交迫。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还要面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严重干扰。这使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尤为曲折困苦，其过程充满了鲜血浸泡的悲欢合离。

4 月下旬，张国焘在江油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行动方针，决定向岷江地区（今四川阿坝州）发展，积极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5 月中旬，方面军占茂县，下汶川，渡过岷江，占领理县。这时，中央红军已渡过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夹金山），正向天全、芦山、宝兴前进。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5 月下旬方面军总部派李先念作代表，率三十军 88 师和九军 25、27 师各一个团，从汶川到懋功去迎接。指战员们接受这一光荣任务后，欢呼跳跃，兴奋不已，忘掉了多天以来的疲劳。翻越崇山峻岭，跨过峡谷急流，攀登 4000 多米高的雪山，跋涉 320 多里的崎岖险路，只用几天时间就到了懋功近郊。6 月 8 日，九军所部一举攻克懋功，歼敌邓锡侯部两个营及敌方武装近千人，继续前进占领达维。战后，李先念率部队进驻懋功，向周围派出警戒部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迎候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首长的到来。并派九军 25 师师长韩东山带领李天锐的 74 团前去达维迎接中央红军。6 月 12 日，红四方面军的 74 团与中央红军 1 军团 2 师 4 团在懋功胜利会师。两支兄弟部队的指战员，紧紧握手，热烈拥抱，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李先念立即向总部报告了这一喜讯。当天晚上，由徐向前代拟电文，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中央，报告当前敌情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位置，提出当前任务的意见请中央决定。表示四方面军全体同志，正以“十二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6 月 18 日，党中央率领中央机关到达懋功，受到代表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 88 师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晚上毛泽



李先念代表红四方面军前去懋功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接见。（油画）

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亲切接见了李先念。毛泽东跟李先念谈话时，问了四方面军的情况，问了部队的素质、情绪，问了总部领导，还问了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李先念一一汇报，还就红军作战和行动方向提出了看法。为党中央确定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会师后不久，军委决定将中央红军改称为第一方面军。

会合后的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 10 余万人，士气十分高昂，有使中国革命运动在川陕甘地区胜利发展的前景。因此，中央提出会师后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张国焘认为长征是红军的失败，应向西部边远地区退却。6 月 26 日，党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批评了逃跑主义，决定将红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作为战略方针。三天后，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照说这时张国焘应与中央保持一致，执行中央决定，但他仍然坚持个人意见，而且搞非组织活动。他从两河口返回之后，在杂谷垭召开的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芦花会议）上，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要挟中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指使下属向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说不改组就没法指挥部队作战消灭敌人（意思是四方面军人多，一方面军人少）。中央一面坚决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一面采取党内斗争的方针，在指出张国焘错误的同时，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希望他觉悟过来，服从中

央统一领导，共同北上。不久，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从组织上对四方面军干部作出合理安排，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拥护。张国焘得到两个重要职务后，表面有所收敛，同意北上。但包藏的野心仍在渐渐显露。

在会师一个多月中，两支兄弟部队广泛开展了互访互学活动。一方面军人才多，见多识广，注意部队全面发展。四方面军强调多向老大哥这些方面学习。四方面军作战英勇，战斗作风过硬，一方面军强调多向四方面军这些方面学习。开展这项活动以后，很快使两支部队团结得亲如家人。徐向前从维护全军团结出发，主动向中央建议，从一方面军调几位得力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四方面军抽调建制部队补充一方面军减员太多的部队。张国焘开始不同意，经徐向前多次做工作表示同意，最后经中央批准实现了。郭天民、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等从一方面军调到四方面军工作。四方面军抽调四军 11 师 32 团 1200 多人和三十三军 98 师 294 团 2000 多人给一方面军一军团，抽调三十军 89 师直属队和 90 师 270 团共 2600 多人给三军团。这些部队编入一方面军后在战斗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次会师，使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工作的两位红安知识分子干部尤为高兴。一位是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一位是红五军团参谋长郭天民。董必武是红安革命的播种人。黄麻起义前夕遭反动派通缉，被党派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当他看到当年播下的革命种子，成长壮大为红遍鄂豫皖川陕五省的第四方面军，由衷地高兴。在庆祝胜利会师的大会上，不停地为英勇奋战的四方面军指战员鼓掌，喜得八字胡也翘起来了。郭天民是董必武弟弟董觉生介绍去黄埔军校学习的。参加广州起义后上了井冈山，一直战斗在南方。军人喜欢好样的军队。从家乡诞生的四方面军是一支劲旅，他希望能到这支部队里工作。他的这一愿望是在“坏事变好事”中实现的。

8 月 4 日，中央又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会后，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一军（原一军团改称）、三军（原三军团改称）和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由一方面军五军（原五军团改称）、三十二军（原九军团改称）和四方面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班佑与右路军靠拢。

8 月 15 日，左右两路军分别向阿坝、班佑地区挺进。这时摆在右路军前面的是纵横数百里的大草原。草地茫茫，渺无人烟，没有粮食。地多沼泽，遍是陷阱，水不能饮。气候恶劣，时晴时雨，不时还会遭狂风、冰雹袭击。在自然条件极恶劣的情况下，广大红军指战员以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吃野菜，卧湿地，忍饥受冻，苦行五天，终于胜利通过了这条死亡之路，到达班佑、巴西地区。这时，左路军也到了阿坝。

从鄂豫皖到川陕甘一直追堵红四方面军的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急令他的 49 师去与包座守军一个团会同堵击红军。包座是我军北进必经之地，必须夺取。刚过完草地的红军十分疲劳。一听说要打仗，指战员们精神焕发。8 月 29 日，李先念带领三十军 88、89 师 5 个团，王建安带领四军 10 师 3 个团投入战斗，在徐向前指挥下，经三天三夜激战，将敌歼灭，毙伤敌 4000 多人，俘敌 800 多人，缴枪 1500 支、轻机枪 50 多挺，以及大批粮食、牛羊。包座之战，是四方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9 月初，中央致电张国焘速率左路军北上，并告之过草地应走右边不要走左边，以便顺利通过。徐向前、陈昌浩商定派四军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前去接应。但这些指示和关心却遭到张国焘拒绝。他的个人野心从此开始暴露。

起先张国焘以白河涨水不能过，草地无粮不能走为由，令已进至白河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返回阿坝。接着致电中央反对继续北上，提出南下川西创造新区。声言南下是进攻，北上是逃跑，以此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中央在多次电告张国焘北上无效后即率一、三军先行北上，并再次电告张国焘立刻率左路军向巴西开进，不得延误。张国焘不但不服从，反而倒打一耙，诬蔑中央逃跑。10 月 5 日，他在卓木碉召开会议，宣布成立“第二中央”，自任主席。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张国焘这一严重反党行为，率领左路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刘伯承坚决反对，坚持全党只有一个中央，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不能有两个中央，拒不承认张国焘自立的伪中央。他们的这种原则态度，在四方面军许多干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做出了榜样。被编入左路军的一方面军三十二军参谋长郭天民，在全军集中听取传达卓木碉会议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组织决议时，拍案而起，当着广大指战员的面质问前来的传达者：“党中央不是北上了吗？为什么又成立一个中央？我们党

只有一个中央，全党只能服从一个中央！”问得传达者无言以对。事后，郭天民被张国焘撤职，调到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军事训练科长。这个不是处分的处分，对郭天民来说是坏事但也是好事，使他实现了到四方面军工作的愿望。张国焘自立中央做贼心虚，封锁党中央的一切消息。郭天民不理这些，千方百计打听中央和一方面军的北上情况，被人告密。张国焘早想除掉郭天民，便以“打听和泄露军事秘密”的罪名，要将他杀掉。此事被朱德知道了，就对张国焘说：“郭天民打听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算什么军事秘密。他在中央苏区可是有名的人。你用不能成立的罪名把他杀了，以后恐怕不好交代吧！”张国焘顾忌朱德的威望，不好杀掉郭天民，就给了一个党纪处理了事。郭天民在朱老总的保护下逃过了这一劫。但余天云就没有这么幸运。

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向西挺进时，余天云调到三十一军接替孙玉清任军长（孙玉清调九军任军长）。他听说我军从川陕根据地全部撤出来了，走的时候把有些房屋烧了，财产毁了，还杀了些人，便气愤地说这跟敌人所作所为有什么区别。他的警卫员小潘告诉他：是张主席下令这样做的。余天云说不管是谁叫做的，做得不对就应该反对。余天云性情耿直，脾气暴躁，遇到问题不假思索就放炮，心里藏不住话。他的牢骚和不满被张国焘得知。如在平时，张国焘会马上将他抓起来。当时正进行土门战役，没有动余天云，但上了张国焘的黑名单。这次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命令已经进到白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余天云认为北上是对的，仍率部前进。张国焘令骑兵连去把他追回来了，要他作深刻检查。余天云认为跟党中央北上没有错，不肯承认。张国焘将他撤职，放到红军大学当科长，并要他继续反省。余天云始终坚持自己没有错，不作检讨。时间一长，余天云的精神受到了折磨，多处负伤的身体也支撑不住，行军要坐担架。1936 年 4 月，红军随部队一起过丹巴河时，余天云突然掉进河里淹死了。张国焘宣布余天云跳河自杀。余天云真的是自杀吗？时过 50 年后终于有知情者讲出了事情的真相。

1989 年，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为收集余天云烈士的资料，前去访问跟余天云同住一村的族间兄弟、原广西玉林军分区司令员余天生，他说：“天云死时我在方面军总医院住院并不知道，是天云的警卫员小潘到医院去悄悄告诉我的。小潘说，‘过丹巴河时军长躺在担架上，抬的人忽然将担架一倾斜，就把军长扔下河去了。河水湍急，转眼就不见了。很明显军长是被暗害死的。’”余天生说，别人不会搞暗害，只有张国焘。因为天云一再反对过他。

郭天民、余天云的事例说明，在大是大非面前，红安人不计个人得失、不惜牺牲自己去捍卫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张国焘扯起分裂大旗，另立中央，自任主席，俨然独大。令已过草地的徐向前、陈昌浩带领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返回阿坝。这事让徐向前颇为难。因为徐赞成北上，而陈昌浩听从张国焘。四方面军的行动，政委陈昌浩有最后决定权。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只好南下了。对暂时编入右路军的朱德、刘伯承及一方面军五军、三十二军也不让走，一共 7 个军都要听他调遣。部队集齐以后，张国焘为贯彻错误的南下方针，大举南进，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连克川西的丹巴、绥靖、崇化、懋功、抚边等城镇，歼敌 3000 多人。10 月 24 日，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又克宝兴、天全、芦山，毙伤俘敌逾万人，击落敌机一架。然后，乘胜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准备占领富庶的成都平原。当我军攻占名山东北重镇百丈关后，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为保成都，纠集 80 余团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猛扑过来。连日征战的红军忍着饥寒疲劳，与优势之敌展开浴血苦战。有的部队子弹打完了，就与敌人白刃搏斗；有的战士手臂打断了，就咬着导火索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经过 7 天 7 夜激战，毙伤敌 15000 多人，自己伤亡上万人，未能将敌打退，形成对峙，互拼消耗。这对缺乏补给的我军来说十分不利。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主张撤出，张国焘在事实面前不得不同意。从此，红四方面军从南下进攻转向后撤防御。百丈关之战四方面军损失惨重，宣告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失败。

相比之下，中央率一方面军一、三军出巴西，突破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 1935 年 10 月中旬进入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尽管张国焘极力封锁这个消息，但广大指战员还是知道了，心里都明白北上正确，南下错误。

1936 年 1 月 22 日，中央作出决定，责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的第二中央。1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代表共产国际电令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改成西南局。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但仍坚持向川康发展，不愿北上。6 月底，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改称红二方面军。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都做张国焘的工作。在他们一再说服、督促之下，张国焘同意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一同北上。至

此，从1935年9月被张国焘强行拉上南下错误道路的红四方面军，到1936年7月又重新踏上了北上的正确道路，期间长达10个多月。

在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罪恶活动的10个多月里，一样长征的四方面军与一、二方面军比较起来有“三多”：一是多跑几千里路。四方面军在此期间，北起包座，南到汉源，东抵百丈关，西达理塘、甘孜，在纵横四五百公里范围内东奔西突，无甚斩获；二是多次翻雪山过草地。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必经之地，一、二方面军只走一次，而四方面军被张国焘折腾走了三次，且一次比一次困难，其艰苦可想而知；三是多牺牲很多人。四方面军南下战斗不断。常言道“斩人一万自损三千”。在无后方作战的情况下远不止这个比例。加上翻雪山冻死，过草地饿死、掉进泥沼中溺死，伤员在转战中得不到救治而死等，造成四方面军大量减员，从与一方面军会师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损失的4万指战员中有相当大部分是张国焘分裂罪恶活动的牺牲品，其中红安人数以百计。据初步统计，仅团以上干部就有20多名。如加上入川后为创建川陕根据地而牺牲的团以上干部40多名，共计达66名。他们是：

军级干部：吴先保、余天云、张雨滴3名；

师级干部：甘良发、叶成湖、许草春、邹洪盛、汪烈山、徐盛礼、丁维山、王道喜、李隆兴、汪加申、汪成功、陈少猛、胡青山、梅宏华、韩继祖、韩继能、王建刚、王德安、张世谦、郑行齐、熊绪光、陈桂清22名；

团级干部：石世忠、王德清、甘思宽、何连梅、余登田、武万志、郑文烈、钟芳荣、秦定国、袁学鑫、徐世贵、涂学渊、黄清友、韩步齐、曾纪奎、熊邦赞、熊国祺、黄炳发、方和平、刘会伟、程光辉、许声景、陈光清、刘德义、余文化、洪礼、赵基荣、祝顺福、刘定书、王汉斋、王宜亭、吴文斗、秦祖如、黄崇炳、黄永胜、卢义天、赵炳宏、徐仕良、李业雄、邹国洪、陈炳意41名。

他们都是优秀的军政指挥员，身经百战的勇将，为了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即使在错误主张下，也无怨无悔地冲锋陷阵，奋勇前进，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革命精神震撼过巴山，革命热情融化过雪山，革命意志踏醒过草地。经过一波三折，四方面军终于北上了，他们却永远留在长征路上。

1936年10月10日，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一起到达甘肃会宁，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一年零七个月的长征。



1937年5月1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党代会在延安召开，红安籍出席代表有：前排左起甘思和（一）、程启光（十）。中排：李定灼（一）。后排：周纯全（一）、胡奇才（三）、江波（十）、王近山（十三）、陈锡联（十四）、陈美藻（十五）。

先遣奠基　便衣制敌

所有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第一个到达陕北结束长征的是红二十五军。这支英雄部队重建于腥风血雨之中，受命于危难之际，其诞生地亦在红安。

1932年10月中旬，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西进，鄂豫皖根据地大部分被敌占领。红安中心县所辖4县1市，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地区。七里、紫云、城区、桃花、高桥、仙居、二程等革命老区被敌人分割，不能连成一片。30万敌兵除一部分去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外，大部分留下继续“清剿”，提出“血洗红安”的口号，施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房舍为墟。敌人在反复“清剿”中，肆意屠杀，惨案一个接着一个。紫云区的桂家洼，一次被杀害的群众达1000多人，其尸体几乎将山沟填平，被称为“死人沟”。七里区的平台岭，敌人将避进山林的2000多群众围赶到岭上用机枪扫射，除3人被尸体掩盖幸免于难外，其余全部遇难，被称之为“平台岭大血案”。天台山周围方圆50余里，属七里区开荒乡，原有2483人，杀得只剩183人，95%以上的人家倒灶绝户，成了“无人区”。紫云区原有65000多人，大屠杀过后只剩17000人，被称为“死人区”。全县每个区都有敌人屠杀革命群众的杀人场，其中杀人最多的是七里坪河滩、县城南门外的校场岗和西门河、高桥区的高桥河等处。凡被害者，敌人不准收尸埋葬，任野兽日夜啮食，惨不忍睹。当时人们把杀人不眨眼的敌兵和恶狗以及吃人成性的狼，称为苏区三大祸害。敌人这样做

的目的，就是要将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斩尽杀绝。

面对敌人的大屠杀，红安人民的回答是："头可断，血可流，革命至死不能丢！"大屠杀不但没有吓倒革命群众，反而对敌人更加仇恨，对革命更加坚定。全县的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各自为战，伺机打击敌人。10 月下旬，二程区与河口县地方武装一起在杨家冲截击敌人，毙伤敌 300 多人。仙居区游击队配合红 75 师的一个团在邓家桥歼敌一个连。高桥区游击队在官木塘消灭敌保安团 100 多人。但是，这些战斗胜利，不能改变整个局面，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武装力量，领导和指挥根据地的反"清剿"斗争。

11 月 29 日，鄂豫皖省委在红安紫云区檀树岗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会议决定重建二十五军。为什么叫重建？因为原二十五军领导人及其所辖 73 师随四方面军走了，74 师 3 个团和 75 师 1 个团也被打散编入方面军各个主力师了，只剩下 75 师的两个团在担负掩护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后被留在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实际上不存在，现在要恢复这个军的番号，只有重新建立。

这时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有：原红二十五军 75 师 223 团、224 团和军部特务营，红 27 师 79、80、81 团，共 5 个团加一个营，约 5000 人；地方武装有红安独立第 1 师第 2 团，桃花游击师，红安、麻城、光山、罗山、河口、陂孝北、六安、霍山等 11 县的独立团（营）共 10000 多人；还有大约 4000 名红军伤病员，总共约 20000 人。红二十五军就是在这些武装力量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的。

重建的红二十五军，由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原红 27 师政治部改为军政治部，27 师改编为 74 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下辖 3 个团；原红二十五军 75 师的两个团改编为 75 师，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红安独立第 1 师第 2 团改编为该师特务营。原二十五军特务营仍为军特务营。11 月 30 日，在檀树岗南面的河滩上召开大会，正式宣告新的红二十五军组成，全军约 7000 人。

红二十五军重建后，于 1933 年 1—4 月间，在鄂东北地区开展反"清剿"作战，先后取得了郭家河、九龙缠顶、杨泗寨、潘家河等战斗胜利。其中郭家河歼灭战打得最漂亮，一举歼敌 35 师两个团，毙敌 100 多人，俘敌 2000 多人，缴获长短枪 2000 多支，炮 9 门，机枪 12 挺，战马 100 多匹。这一系列胜利，光复了一些老根据地，地方工作和地方武装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危难见英雄。从红四方面军主力走后到红二十五军重建这段时间内，红安在红军和地方工作的各级干部，为给广大群众和亲人报仇，在反“清剿”斗争中，敢冲敢打，前仆后继，表现出色，不少人在新的形势下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据不完全统计，担任团以上职务的有40多人。他们是：吴焕先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戴季英先任师政委后任军政委，郑位三先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后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吴维儒任军供给部长，黄绪南、周希远等任师长，程启波任师政治部主任，聂维文、黄世长任独立师长，王建南、金传鉴、阙华山、汪明国、黎海堂、秦遵朗等任游击师师长，赵益彩、陈长穆、汪世大、方思月、周宗宽、郑维向、聂凤贻、董先和、张菊清、熊邦学、汪家训、黄辉仁、赵炳坤、熊书琪等在红二十五军或独立师、独立团中任团长、团政委、副团长。这些军政干部大都在战场上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血。

当红二十五军打了几个胜仗，根据地形势有所好转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又贯彻下来，通令红军去“夺取中心城市”“保卫中心区”。以沈泽民为书记的省委，不顾实际情况，照行不误。5月2日，省委令红二十五军和地方武装去围攻有敌人重兵据守的七里坪，结果久攻不下，损兵折将，不得不于6月13日撤出战斗。七里坪战役历时43天，红二十五军减员近半，由1万余人降至6000人，元气大伤。这次战役失败，省委领导认为不是“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而是右倾机会主义作祟。因此，战役之后便在红军和地方反右倾，搞“肃改”，并把它扩大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反对没有根据地乱捕人、乱杀人，被省委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代表”予以批判并撤销一切职务。在这次“肃反扩大化”中，红二十五军和地方武装中许多优秀领导干部，如廖荣坤、姚家芳、吴保才等被错误杀害，其中红安籍干部也不少。他们是：红二十五军73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第8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红二十五军团长张子寿、袁芳菊，副团长姚泽引、团参谋长张子宏，团政委姚泽金、董德伟、红安独立师团长秦必松等。省委主要领导人继续推行张国焘那一套，使红二十五军雪上加霜。从此，红二十五军在坚持和保卫鄂豫皖根据地斗争中进入了艰难岁月。

就在这时，蒋介石部署14个师又4个旅共10多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省委反五次“围剿”的指导思想仍是“保卫中心区”，采取在内线单纯防御作战的方针，处处被动挨打，使剩下的6000多兵力又损失了一半，陷入更为困难的境地。但全体指战员仍在努力冲破敌人的“围

剿”。与此相反，红二十五军另有一个团，在红安、罗山、陂孝北等地方武装配合下，在外线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反而取得了一些胜利。

就在红二十五军内线防守作战处境困难时，1933 年 10 月间，红安二程、仙居区在对敌斗争中成立了“便衣队”，重新打开了两区的斗争局面。

一个外线作战，一个“便衣队”，使省委书记沈泽民受到了启发，看到了希望。他不顾重病缠身，立即向中央写报告。他在报告中沉痛地说：“在郭家河、潘家河之战轰轰烈烈的胜利后，弄得现在如此局面，完全是路线错误造成的……”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唯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今后的斗争方针。在报告的最后，他特别强调“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的运动”，“决定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这份报告写成后不到 10 天，沈泽民病逝在老君山的刘家垮。



长征时红二十五军领导与警卫员合影。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

沈泽民是浙江桐乡人，著名作家沈雁冰的弟弟，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虽然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但他发现错了，敢于与错误路线决裂，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仍不失为受人尊敬的领导人。全国胜利后，红安县委、县政府将他的遗骸从老君山的刘家垮迁来，隆重举行安葬仪式，安葬在县城东北隅的革命烈士陵园内。董必武主席为他题写了墓碑，让人民群众永远纪念他。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辗转苦战了两年，又奉党中央命令，组成“中国工

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长征北上。1934 年 11 月，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夹击下，红二十五军出鄂豫，进陕南，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自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 年 7 月，红二十五军仍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这时，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偶尔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一、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准备北上，便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去与陕北红军会师，迎接党中央。这是吴焕先远见卓识领导才能的一个重要表现。会后，红二十五军杀出秦岭，转战陇东，进军陕北。在途经甘肃泾川县四坡村时，与敌遭遇，陷入险境。为扭转战局，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吴焕先，带领指战员冲锋陷阵，不幸牺牲，全军为之恸哭。广大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一举全歼追堵之敌。红安籍的周世忠直取敌团长的头颅祭奠军政委，以泄悲愤。

吴焕先出生于红安紫云区箭厂河乡四角槽门，少怀大志，习文练武，以三堂红学起家闹革命传遍大别山，是黄麻暴动领导人之一。他沉着稳健，英勇善战，是不可多得的良将。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重大损失。新中国成立后，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的中央墓地上，特将中间位置留给吴焕先长眠。20 世纪 60 年代初，红安县派专人去泾川四坡村迎回吴焕先的遗骸，却无法找到。80 年代初，原红二十五军宣传队长、后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的程启文将军又专程去四坡村寻找，在与当地老年人座谈时得知：吴焕先安葬后不久，由于当地反动分子告密，敌人丧尽天良，掘坟开棺毁尸，吴焕先的遗骸片骨无存。红安人民满怀悲痛的深情，将他的英魂迎回故里，厚葬在陵园中央墓地的正中处，李先念主席为他题写了墓碑，让他的浩气长存，凯歌百代！

1935 年 9 月 16 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结束长征。会师后 3 个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准备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红军的到来。

红十五军团下辖 73、75、78、81 师，每师辖两个团，原红二十五军的红安籍干部纷纷走上营、团、师领导岗位。他们是：戴季英任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程坦任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张竭诚任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韩先楚任 78 师副师长，吴大明任 75 师 225 团政委、张天恕任 224 团政委、张天云任 78 师 232 团政委、程启文任 73 师 217 团党总支书记、詹少联任 78 师卫生部长、周世忠任 75 师司号长、唯一的女红军戴觉敏任军团后方医院看护长、王诚汉调任陕北红三十军 262 团团长、谢正荣调红军大学任学

习学员队长。

有战斗就会有牺牲。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到陕北长征的艰苦历程中，先后牺牲了红安籍程启连、徐正盛、余光荣、程仕其等 8 名团以上干部。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二十五军在这方面做得较为出色。他们在斗争极困难的情况下没有拔腿走人，打开局面以后也没有带着壮大的队伍转移。而是苦撑苦守，在陕南坚持两年多的游击战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领导这场斗争的郑位三功不可没。

1935 年 7 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时，决定留下一个连的主力部队和负伤的干部、战士共 600 多人，由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领导，留在陕南继续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郑位三在敌人重兵“清剿”的严峻形势下受命，决定先统一陕南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然后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的联络与沟通，鄂豫陕边两个主要党组织——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及其所属武装统一成立陕南特委和红 74 师。大家一致推举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任师长，全师辖两个营和一个手枪团，共 800 多人。红安籍曾焜任师政治部主任，张培真任手枪团政委。

郑位三在鄂东北任道委书记时曾兼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有游击战争经验。他根据当时敌人的“清剿”形势，提出并经特委通过，决定红 74 师的行动方针应采取与敌人“兜大圈子”的办法，在西起江口，东到卢氏，南抵汉江，北至终南山，南北长 200 余里，东西宽 500 余里的地区内与敌人周旋，避敌主力，打其弱点。主要打击小股敌军、保安团和反动民团，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陕南游击根据地。在坚持陕南根据地两年多的斗争中，敌人集中 20 多个团的兵力，先后发动了三次围攻，结果不但没有消灭我党和红军，反被红 74 师歼灭其正规军和保安团 1300 多人，缴获长枪近千支、轻机枪 24 挺、短枪 60 多支、汽车 5 辆，歼灭地主反动民团 2000 多人，缴枪 1400 多支。粉碎敌人三次围攻后，红 74 师发展到 4 个团共 1700 多人。1936 年西安事变爆发，陕南特委和红 74 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部队进行整编，成立南路军事委员会，郑位三任主席。红 74 师改编为南路抗日军，陈先瑞任军长。至此，陕南特委和红 74 师独立坚持鄂豫陕地区的游击战争胜利结束，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准备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1937 年 4 月，郑位三奉召到延安接受新任务。毛泽东在接见他和原红 74 师的干部时说：“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在南面大闹华山，配合得好啊！我们就是那个时

候听到你们的消息的！”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鄂豫皖根据地进入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敌人加紧对红安“清剿”，叫嚷着要铲除“赤祸之源”。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但是，事实与敌人的愿望相反。正如当时的一首革命歌谣所唱：

哪朵葵花不向太阳，
哪个穷人不向共产党。
任凭白军再猖狂，
烧我房屋抢我粮。
一颗红心拿不去，
头断血流不投降。

隐蔽在深山老林中的红安县、区、乡各级干部，身穿便衣，怀揣武器，三五人一起潜回本地，昼伏夜动，镇压反动分子和民团，恢复地方工作，使敌占区成为“白皮红心”的游击区，重新打开了革命局面。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红安人首创的特殊武装——便衣队。它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克敌制胜的法宝。

第一支便衣队是1933年10月由红安县二程区的徐海珊、李世焱、钱运华创建起来的。这支3人便衣队闹遍二程区，还闹进了敌重兵驻守的河口镇。敌人企图消灭它，结果剿无踪影，查无人知。便衣队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里一样，闹得敌人坐卧不宁。仙居区便衣队的建立稍晚一点，也十分活跃。这种灵活多变、富有威慑力的便衣队，紧接着在七里、城区、桃花等区也出现了。慧眼识英雄。时任省委常委兼鄂东北道委书记的郑位三，经过调查了解后，认为这是个新生事物，应该肯定。便在道委驻地老君山中的卡房（今属新县）举办便衣队训练班，总结推广红安的经验，并且将它概括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新型武装组织。于是便衣队运动从鄂东北到皖西北蓬勃开展起来。到红二十五军长征时，鄂豫皖地区有大小便衣队102个，其中鄂东北61个（红安12个），皖西北41个。从此，便衣队像烂漫的山花开遍了大别山。

1935年2月，留下坚持斗争的原鄂豫皖省委高敬亭（祖籍红安，后出户新县），根据红二十五军离开前的指示信，在安徽太湖县凉亭坳领导重建了红二十八军，高任军政委，没有军长、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只有一位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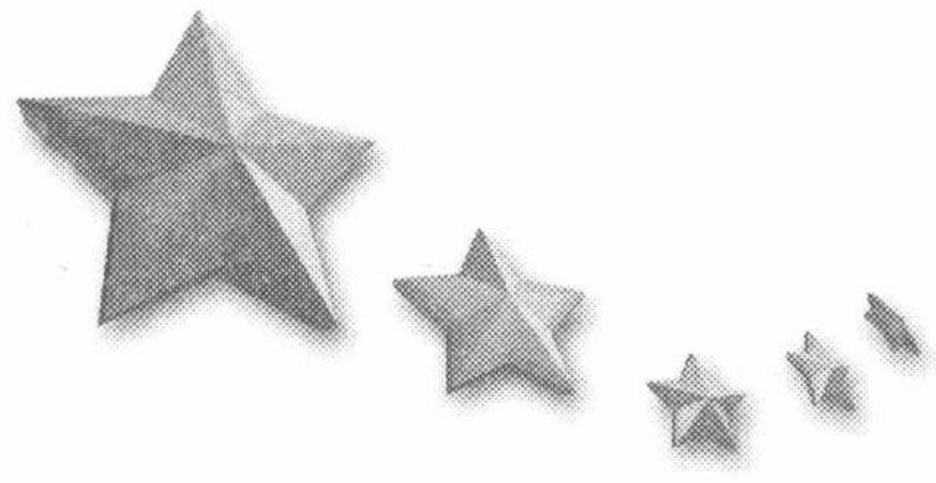


1985年4月，作者（后右一）与县领导耿协楠（前左一）等访问安徽省军区顾问罗映臣和夫人彭玉兰（前左二、三），座谈三年游击战争情况后合影。

书，下辖82师和手枪团，全军约1000人。红二十八军在各地便衣队的支援配合下，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挫败了百倍于己的敌人的“划区清剿”计划，保存了鄂豫皖游击根据地。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经过千锤百炼和严峻考验的红安籍干部，在各级党政军中担起了更大的责任。他们中有韩先谋任八路游击师师长，李小伦任五路游击师师长，郑维孝任鄂东第一路游击师政委，罗厚福任鄂东北第三路游击师师长，方忠厚任鄂东北第九路游击师师长，李世焱由便衣队调任红二十八军手枪团第3分队队长，韩先应任鄂东北特务队队长，易元鳌任皖西战斗营营长，他们配合红二十八军，避实击虚，用游击战消灭敌人。罗作凡任鄂东北道委书记，江传芳、董志新任红安县委书记，吴昌福任红罗光中心县委书记，吴光禄、郑定国任罗陂孝特委书记，熊德安（女）任鄂东北总医院政委，张家胜、黄宏儒任光麻特委书记，他们带领所辖地区的便衣队与敌人周旋，配合红二十八军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巩固了以红安为中心的鄂东北根据地，使革命红旗从黄麻暴动以来到抗战爆发一直未倒。令人叹息的是，上述党军政领导干部除罗厚福、李世焱、黄宏儒、郑维孝外，他们的鲜血都洒在大别山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值得自豪的是，红安人在斗争中创造了便衣队，而便衣队又培育造就了罗厚福、李世焱、戴克明、江腾蛟等便衣将军。



第四章　血战河西泣鬼神

红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全军覆没，所属3个军有两个军主要领导是红安人。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被俘威武不屈在西宁就义，留下遗腹子历尽磨难。参谋长陈伯稚血洒古浪城。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保存基干历尽艰险带领400多人辗转新疆回到延安。生死关头尽显红安籍将领英雄本色和高贵品质。

走廊苦战　兵败祁连

1936 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从东北伸向了华北。寇深祸亟，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获得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东北军和西北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响应我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红军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向蒋介石提出率部开赴前线抗日的要求。但蒋仍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调集大量军队到西北，急于想消灭红军。有鉴于此，中央军委制订了《宁夏战役计划》。提出由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接通苏联（又称打通国际路线或打通远方），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以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这个战役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总司令部将西渡黄河的准备工作交四方面军去完成。徐向前、陈昌浩想到李先念做过木匠，又有强渡嘉陵江的经验，决定由三十军完成造船任务。李先念即率部开赴靖远县大芦子地区，秘密造船，侦察渡河地点，准备渡河事宜。为支援三十军尽快完成造船任务，中央令一方面军火速搜集木板、石灰、桐油、铁钉、棉花等材料，挑选木匠、铁匠等技术工人，送往三十军驻地。中央要求最迟在 11 月 10 日前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接受任务后，为使部队造船和训练渡河两不误，李先念与代军长程世才分工合作。程抓军事训练。李抓造船，常与工人们一起解决造船中的困难，鼓励他们为革命做贡献。工人们日夜奋战，不到两个星期便造出了 16 只新船。报告给方面军和总司令部，朱德听了非常高兴，当即予以表扬。命令三十军 10 月 23 日晚开始渡河。因水情不熟，当晚偷渡未成功。老船夫告诉李先念，黄河好比一个怪性子人，顺着他百顺，不顺着他百不顺。他建议从虎豹口起渡，别看这地名不吉利，出去就顺了。李先念听从老船工意见，24 日晚全军从虎豹口（现叫河包口）起渡。奔腾的黄河，浊浪滔天，木船在浪峰

波谷中间剧烈地颠簸，飞起的浪花溅湿了每个人的衣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红军指战员稳坐船中，让浪推桨划送到了对岸。第二次偷渡成功了。接着是九军、四方面军总部和五军亦先后过河，共渡过 21800 人。其中三十军辖 88、89 两个师共 6 个团，九军辖 25、27 两个师共 6 个团，五军辖 13、15 两个师共 4 个团，另有总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文工团（又称前进剧社）等。广大指战员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决心为实现《宁夏战役计划》而英勇战斗。

渡过黄河的部队，面临的主要敌人是马氏兄弟马步青、马步芳组成的马家军。马步青为骑兵第 5 师师长，辖有 4 个骑、步兵旅和手枪、工兵、炮兵各 1 个团，盘踞在甘肃中部和西部。马步芳为新编第八十二军军长兼第 100 师师长，辖有步、骑兵 4 个旅及手枪、炮兵、宪兵各 1 个团，盘踞在青海，军部驻西宁。我军渡河之前，蒋介石就令马步青率所部开向黄河西岸，防止红军渡河西进。我军渡河之后，蒋介石又令马步芳率所部从青海赶往甘肃黄河以西地区，并委任他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和骑 5 师以及青海警备司令部 3 个骑兵旅、地方民团，总计兵力达 10 万人，其中正规军有 4 个步兵旅、7 个骑兵旅和一些直属团约 3 万人。马家军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割据一方的军阀，用狭隘的民族观和宗教迷信训练军队，欺骗回族人民，在甘、宁、青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统治。虽与蒋介石集团有矛盾，但反共也极为坚决。当我军渡过黄河后，马家军的反动统治受到威胁，就更加仇视红军，竭尽全力与红军作战。

四方面军 3 个军渡河后，分两路向当面之敌马步青部展开攻击前进。10 月 27 日至 31 日，右路李先念率三十军打退马步青的骑 1、骑 3 旅的阻击后，占领了一条山大部分村寨。11 月 1 日，左路孙玉清率九军进占了一条山南面的锁罕堡、打拉牌一线，将敌骑 1 旅 600 多人围困在一个土围子内。敌人为了夺回一条山，阻止我军西进，组织 5 个旅（内有马步青 1 个骑兵旅、2 个步兵旅和从西宁赶来增援的马步芳 2 个骑兵旅），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我军发起猛攻。李先念、程世才指挥三十军英勇抗击，连续打退敌人 6 次冲锋，多次与敌人展开巷战、肉搏，给敌人以严重杀伤。九军在孙玉清指挥下，对前来解围之敌，予以痛击。被围敌人见势不妙，害怕被歼，在我军一再争取下，表示“接受”联合抗日主张，愿交出部分粮食，撤往凉州（武威）。孙玉清乃下令解围，令其撤走。一条山战斗结束，共歼敌 2000 多人，毙敌骑 5 师参谋长、前敌总指挥马延祥，砍断了马步青的“左膀”，使他尝

到了红军的厉害。我军也初步了解了马家军的凶猛残暴和骑兵的优势。

战罢，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毛泽东、周恩来，请示行动方针，说明“此方人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各种关系不便久停”。11 月 5 日，朱、张复电：“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迅速占领凉州地区。”8 日，毛、周来电指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这两次来电都不提《宁夏战役计划》，说明已无执行的可能。这时，敌人已打通增援宁夏的通路，割断了河东与河西红军的联系。中央和军委决定将河东红军主力分别组成南路军(一、二方面军）和北路军（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一军）东渡黄河入晋，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独立从新疆方向接通苏联。11 日，中央和军委下达命令：四方面军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曾传六、李先念等为委员。军政委员会是最高领导机关，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机构照旧不变。中央和军委在《作战新计划》中提出：“西路军以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局势变化实在快。不到半个月，渡河部队的作战任务和番号都改变了。徐向前、陈昌浩根据新的任务要求，及时调整部署，将部队分为两路，沿着河西走廊，向西开进。11 月 13 日，孙玉清率九军从镇虏堡（现名正路堡）出发，经干柴沙向古浪前进。先以一个团袭占古浪县城，守敌逃窜。九军一部分主力进至城内，吸引了马家军向古浪集结。李先念、程世才率三十军从一条山乘虚向西疾进，先围凉州，进占城西四十里铺，并致信被围在凉州的马步青，红军只是路过，无攻占凉州之意，切勿派兵拦堵。马步青还算听话，龟缩在凉州观动静。三十军继续以一部西进，18 日攻克永昌，21 日再克山丹。总指挥部令五军跟进，去山丹接替三十军防务。三十军在永昌至武威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这时，没有料到敌人集中兵力围攻古浪。

古浪地处河西走廊要冲。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是一马平川。城垣因地震损毁，残破不堪，都不利于防守。15 日九军进占古浪后，在副总指挥王树声领导指挥下，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根据地形，将 25 师布于城东，控制东面高地；27 师置于城西，控制南面高地和扼守平川。部队连日与马家军一路激战，十分疲惫。晚上刚住下，16 日拂晓，敌以步骑兵 5 个旅并 4 个民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四面同时发动猛烈

攻击。九军依托阵地与敌人激战一天，虽给敌以严重杀伤但未击退。17 日，敌人猛攻城垣，先用大炮轰开缺口，后用骑兵突入城内，往返冲杀。参谋长陈伯稚带领司令部全体人员与敌人展开巷战。子弹打完了抡起大刀砍。只见他左冲右突，手中的大刀在敌人中间不停地挥舞，劈着了死，碰着了伤，直杀得大刀卷刃。他的身体也多处受伤，最后倒在血泊中。战士们将他抢抬到一个墙角里，伤痕累累，鲜血直流，已经停止了呼吸。



红九军与马家军浴血激战的古浪县城和东升山

陈伯稚，出生在高桥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好学。家里想方设法让他读完高小，就再也供给不起便失学了。后去县城一家商店当学徒。1928 年弃商参加革命，在高桥区区委书记兼赤卫营长李先念领导下，平时做地方工作，战时配合红军作战。时过不久，高桥区赤卫营编入红军，陈伯稚从此入伍，任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1932 年任 11 师 32 团政委。经过革命战争磨炼，他既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又会带兵打仗，还会搞部队文化教育宣传。他自编自唱的《红军好比山顶松》和《我有一双铁脚板》等山歌，深受战士们喜欢。歌词唱道：

红军好比山顶松，
又经雨来又经风。
雷打火烧都不怕，

能打能杀又能冲。
哎哟哟，
能打能杀又能冲。

我有一双铁脚板，
转战踏遍大巴山。
一天哪怕打十仗，
觉得瘾还未过完。
哎哟哟，
觉得瘾还未过完。

在陈伯稚的带领下，32 团一个个生龙活虎，在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中，战绩突出。1935 年 6 月，破格升任九军参谋长，牺牲时年仅 22 岁，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军参谋长。陈伯稚身先士卒战死后，全军指战员痛哭流涕，决心要为参谋长报仇。

城内在巷战，城外在厮杀。25 师师长王海清接到据守东面乌鞘岭高地 73 团告急的报告，亲自带人去增援。他按照王树声和孙玉清一定要守住阵地的命令，与守军一起跟敌人血拼血战，在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王海清与 73 团政委徐仕贵及大部分指战员英勇牺牲了。27 师在城北平川地带与敌骑兵厮杀。敌人凭借兵多，组成步骑混合编队猛向城内扑来。孙玉清、陈海松命令司令部二科科长王少清率交通大队和部分机关人员从城内向城外猛打猛冲，将敌击退，但后路被敌骑兵切断，无一生还。27 师抓住敌人暂时后退的机会，在军属骑兵团的配合下，拼命打破了敌人对我军的分割包围，然后与东面杨荣华、李天锐带领的 25 师 75 团一起，对冲进城内的敌人形成夹击之势，迫使敌人退出古浪城。激战中，27 师政委易汉文英勇牺牲。直到如此危急时刻，王树声这才召集孙玉清、陈海松、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开会，决定夜间突围，去向三十军靠拢。部队到达永昌后，陈昌浩主持召开九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严厉批评了九军领导。第二天下令撤销孙玉清、陈海松的职务，由王树声兼任九军军长。过了几天又让陈海松复职，孙玉清调总部工作。其实，古浪战斗是在王树声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把责任全部归结到孙玉清头上很不公正。因此，徐向前在回顾此役时说：“那一仗没打好，他（指孙玉清）没有多大责任，那是西路军上级指挥的，且因敌强又突然袭击造成的。”

古浪战斗共毙伤敌2000多人，九军损失2000人，占全军近三分之一，排以上干部伤亡重大。其中仅红安籍干部就有：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司令部二科科长王少清、军属骑兵团团长黄高宏、25师师长王海清、该师73团政委徐仕贵等英勇牺牲了。40多年后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无限感伤地说："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作战主要靠三十军。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再剩下的就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斗力毕竟是有限的。"

西路军西进时，九军26师已经撤销。总指挥部决定暂不解散，由原26师师长刘理运率该师76团据守横梁山，阻敌追兵，保障部队后方安全。刘理运接受任务后，率该团在横梁山打阻击，每天与敌人拼杀，所幸伤亡不大。古浪战斗结束后，刘理运接到命令，到永昌与军部会合。路过永昌东二十里铺时，发现西路军前进剧社遭敌袭击，遍地是鲜血和尸体。刘理运见了直流泪，他和大家一边掩埋女战士的尸体一边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为前进剧社牺牲的同志报仇！"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理运的鲜血也洒在了这里。

刘理运回到军部后，部队正在按陈昌浩的指示进行整顿。在调整各师领导班子时，刘理运到27师任师长。他认真做指战员的思想工作，抓紧部队训练，鼓励大家振作起来，发扬当年"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精神，打败马家军。

11月23日，九军移驻永昌，27师驻守城郊。马家军天天来袭，我军疲于应战。12月下旬，敌骑步兵3个旅和7个民团，对永昌城及公路沿线我军驻地发起猛烈攻击，九军顽强抗击。在二十里铺，刘理运指挥27师与敌人进行10多次激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歼敌300多人。我军因兵员无补，弹药缺乏，伤亡也日益严重。他向政委陈海松建议转移部队，陈不听反加以严厉批评，刘理运只好死守二十里铺。25日，敌出动步骑兵3000多人轮流猛攻二十里铺。双方激战多日，刘理运坚持在前线指挥，被子弹和炮弹同时击中，身负重伤。一直跟随在身边的师部作战科长张志勇和警卫员，立即将他抬下火线。只见他紧闭双眼，呼吸急促，一句话也不能说。送到总指挥部医院不久，心脏就停止了跳动。这位烧砖瓦窑窑工出身，平时爱说爱笑、平易近人，打起仗来有勇有谋的好师长，就这样长眠在河西走廊上。在这次战斗中，红安籍25师75团政委李天锐也英勇献身。

西路军在武威四十里铺至山丹一线停滞不前。这里正处蜂腰地带。北边



1988 年 8 月，作者（右一）访问原西路军老战士王正柱、王定国、陈淑娥（右二、三、四）后合影。

是沙漠，南面是祁连山，地瘠人稀，物资匮乏，不说驻军，就是路过如不备足粮草也很困难。这时，军委来电，要西路军就在这一带建根据地。徐向前提出向军委说明此地不宜久留。陈昌浩不同意，认为建根据地蛮有把握。两人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正好李先念到总指挥部请示行动方针，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不听，反斥李先念："你懂什么？多嘴！"陈昌浩以权压人，其他人就不敢讲话了。就这样，西路军在东起武威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约 300 里长的战线上，既无粮弹接济，又无兵员补充的情况下，天天遭到强敌进攻。其中较大的战斗有 5 次，即武威四十里铺之战、永昌八堰之战、永昌水磨关之战、永昌之战、山丹之战，除山丹之战是五军打的以外，都是三十军所打。三十军在战斗中，有的部队弹药耗尽，就用大刀与敌人拼杀。88 师 263 团一个连全部拼光。从 11 月 22 日起到 12 月上旬，共毙伤敌 6000 多人，自身伤亡 3000 多人。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西路军由过河时的 21000 多人减到 15000 人，战斗力大不如前，无法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但西路军浴血奋战，既沉重打击了马家军，又吸引了黄河两岸 10 多万敌军向西，有力配合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12 月 12 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对飞往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谓"西安事变"。

一时各种政治、军事势力都被卷了进去。整个局势，扑朔迷离。在事变未解决之前，西路军接军委命令：东返大靖地区，准备配合已与我军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友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一起对付蒋系部队可能发动的进攻。当西路军正准备东进时，西安事变在我党帮助下得到和平解决。军委又电示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远方的任务。

12 月底，已是隆冬，冻指裂肤。衣衫单薄、腹中饥饿的西路军，为避开马家军骑兵的袭击，采取昼伏夜动。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在冰天雪地中西行。马家军发现我军西进，集结部队尾追，不时进行突袭。西路军在徐向前指挥下，以五军在前开路，三十军作后卫，边打边进。1937 年元旦，五军一举攻占高台，守敌保安队、民团 1400 多人全部投降，接受改编。九军一部攻打张掖（甘州）未下。三十军和九军进驻临泽县沙河堡，西路军总指挥部进驻临泽县南的倪家营子，五军另一部和总部直属队进驻临泽县城。张掖、临泽地区是河西走廊肥沃之地，有小江南之称，物产较丰，粮食亦多。西路军准备在此略作补充和休整后，继续西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一是扣押张学良，二是集结大军准备进攻西安，讨伐参加兵谏的所谓“叛逆者”。局势又动荡起来。为了策应河东，中央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张掖、肃州（酒泉）地区边建根据地边待命。西路军面临四面受敌的处境又不能走。怎么办？在徐向前提议下陈昌浩同意电请中央军委派四军、三十一军援助西路军，来个东西夹击，消灭马家军主力，为建立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没有同意这个请求，使西路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占地为王的马家军，视地盘如生命，生怕别人占领。他们见西路军在临泽、高台地区不走，即以数万步、骑、炮兵进行围攻。敌人以一部兵力钳制我九军和三十军，集中主力围攻高台。军长董振堂指挥部队孤军奋战，拼命死守高台城。经一周激战，收编的保安队和民团叛变，内应外合，城被攻破。五军战士与敌展开巷战，终因寡不敌众，军长以下官兵 3000 多人大部分壮烈牺牲，少部分突围后亦被反动民团残害。这支从宁都起义中走出来的英雄部队，转战大江南北十多个省后，红军名将之星董振堂和他率领的五军大部，不幸陨落河西走廊，令人震惊而又惋惜。当总部获悉五军在高台危急的情报时，即派骑兵师驰援。该师在中途与敌遭遇，被敌包围，激战中大部损失，红安籍政委秦贤道和师长及广大指战员均壮烈牺牲。高台失利后，五军只剩

下不到两个团的兵力。军中不可一日无主。总指挥部决定任命孙玉清为五军军长。因伤未愈，孙玉清暂住总部。此时他虽有心振军，但已无力回天。

马家军攻破高台，接着围攻临泽。敌人以一部攻击城外五军余部阵地，用主力猛扑临泽县城。城内驻有我总部直属队，主要由供给部、医院和妇女独立团等组成，战斗部队只有一个连。供给部长郑义斋面对危情，既要指挥战斗，又要做伤员、物资的转移准备，有点兼顾不下。这时秦基伟挺身而出，自告奋勇担起指挥战斗的任务。秦基伟原是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团长，在“肃反”扩大化中蒙受不白之冤被撤职。问题查清后与他无关，调任补充师师长。补充师兵员补充完了不存在，没有再安排职务，调到供给部协助部长工作。无职无权，他毫不在乎，反正只要让他革命干什么都行，照样不遗余力把工作做好。郑义斋和秦基伟从鄂豫皖到川陕，再到河西走廊，互相了解信任。此时秦基伟勇于帮他挑担子，郑义斋很感动，将战斗指挥全权交给了他。秦基伟接过任务后，将凡能作战的人员全部组织起来守城，从妇女独立团选一批有枪并参加过战斗的指战员负责掩护医院伤病员撤退。安排完毕，他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指挥战斗，用如此薄弱的兵力与 5 个多团的马家军血战。弹药用完了，他带领战士们用大刀、砖头、石头同敌人拼，将攻上城墙的敌人一次次打了下去。一直苦战了三天三夜，终因寡不敌众，奉命率部突围。突围时他不顾自己头部和左臂受伤，一直掩护医院伤员转移。

在这次战斗中，总部直属队里的女指战员，个个敢打敢拼，英勇顽强，赛过古代的杨门女将，与原四方面军“以一胜百”的英雄团的勇士们也不相上下。她们中红安籍女干部有：

何福祥，妇女独立团 2 营营长，身材高大，力气过人，有男子汉气概。穿上军装，绾起头发戴上军帽，谁也看不出她是女红军。她打起仗来勇敢不怕死，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是妇女团有名的猛将。守城时，子弹打完了拆城砖打，城砖拆完时夺取扒城敌人的枪打。什么武器也没有，凭双手抓住敌人往下扔。最后她抱住两个敌人准备跳下去同归于尽，被身后的敌人抓住衣领而被俘。关进酒泉监狱后，她策反了一位看守警察。一天深夜，那位警察放跑了自己看守的几位女红军，然后与何福祥一起逃往玉门关外，隐姓埋名直到甘肃解放。重见天日后，她和这位丈夫一起参加地方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落实流落红军政策，何福祥享受副厅长级待遇，安排在兰州红军休干所安度晚年。



1988 年 8 月，作者（左一）在兰州访问何福祥（左三）后合影。

张茶清，妇女独立团 1 营 3 连连长，中等身材，活泼热情。参加红军后，开始在总供给部搞物资配发工作。川陕根据地大发展时，部队扩编，物资配给任务加大，经四方面军总部同意供给部成立妇女工兵营，负责物资储运配送。刚开始，招募女红军不怎么顺利。张茶清在供给部是活跃分子，会做宣传鼓动工作。供给部长郑义斋派她去招兵，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去招兵，如果招来一个班你当班长，招来一个排你当排长，招来一个连你当连长。"

张茶清说："郑部长，此话当真？"

郑义斋说："军中无戏言。你能做到，我就兑现。"

没想到这位天真活泼的女战士，竟敢与部长打赌击掌，立下军令状，说："不完成任务，我不回来见你。"

张茶清去招兵的坝子叫恩阳河。那天正逢赶集，人来人往，其中有许多背着背篓卖山货的妇女。她选择人多的地方摆一张桌子，站在上面作宣传动员，大声说道："乡亲们，我是来招女红军的。"赶集的男女都用诧异的目光望着她，好像说："哪里见过女人当红军？"张茶清知道大家会有疑心，马上脱下军帽，露出齐耳的一头黑发来，对大家说："老乡们，我就是个女红军。"她怕大家不相信，又撩起头发，露出耳垂，躬下腰来说，"你们看，我的耳朵还穿有戴耳环的耳洞哩！"这时，男男女女都凑过去看她穿了孔的耳朵，这才相信真是女红军。张茶清直起腰来说："现在妇女解放了，男女都一样，妇女也能当红军。"于是，凑上前去听这位女红军宣传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人问道："你为啥子去当红军的嘛？"张茶清便趁机来个现身说法：

“乡亲们，姐妹们，我是湖北黄安人。父亲跟地主打长工累病了，无钱医治，我九岁那年他就死了。十二岁那年母亲又死了。哥哥养不起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跟你们这里的童养媳一样，我当牛做马，挨打受骂，完全不是人过的日子，天天盼望有条活路。我的家乡闹起革命后成立了红军，我就报名参加了。从此过上了真正自由平等的生活，干起为穷人谋利益的革命工作。在我们队伍里，像我这样童养媳出身的红军战士多得很。如今，她们抬起头干革命，再也不受地主剥削，不受公婆打骂了。姐妹们，起来吧，起来参加红军，为穷人打天下尽自己一份力量吧！”

张茶清话音刚落，在场的童养媳们热烈响应，大家争相报名：“我去！”“我也算一个！”“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当场报名的有十几人。第二天来报名的人更多。招募结束集合起来有 80 多人。第三天，张茶清带领这支由姑娘、童养媳还有年轻媳妇组成的应征队伍回到了驻地。去招兵的人回来一碰头，数她招兵最多。郑义斋兑现承诺，任命张茶清为妇女工兵营第 3 连连长。工兵营后来编入妇女独立团，张茶清仍当连长。

这次战斗，张茶清带领连队坚守阵地，在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后，敌人凭借人多的优势冲进了阵地。她和战友们与敌人拼刺刀，她用灵活多变的刺杀技术（平时练刺杀，她总是强调女人体力不如男人，刺杀动作必须灵活多变，才能克敌制胜），连挑了两个敌人后被敌人砍了两刀，晕倒在地被俘，关进了张掖监狱。后来在押解途中逃脱，辗转磨难，回到革命队伍中。

陈保青，总医院医务主任。参军时，红军招募处见她长得伶俐秀气，便分到医院做护士。一字不识的农村女孩，通过自学成长为一名既懂内科又会外科的红色医生，成为红四方面军中颇有名气的医官，任过团、师、军医务主任，一直随军在野战条件下救死扶伤。战争现实告诉她，当医生不仅要会看病、做手术，还要会弄枪舞刀，当医官还要能应付紧急情况，指挥战斗。一有空隙，她就练习枪法和刺杀动作，成为遇到战斗能打仗，战斗过后会治病的能医能武的女医官。这次战斗，她带医院护卫队跟在伤员队伍后面打掩护。在临泽城外阻击敌人时，子弹打完了用刀砍。刀劈弯了就与敌徒手搏斗。她扭住了敌人就掏出镊子狠狠插进对方心脏。当她正扑向第二个敌人时，被另外一个敌人开枪击中。她用最后的力气高喊：“保护伤员，消灭马家军！”这喊声使战友鼓舞，令敌人胆怯。

直属队大部突出城外，与五军部队会合后又冲破重重包围，到了总部和三十军所在地，九军亦前去靠拢。这时全军人数只有 14000 人，其中的战斗

部队不到五分之二。经请示军委同意，西路军决定东返。1937 年 1 月 23 日，部队分两路东进至西洞堡和龙首堡。马家军前敌总指挥、青海警备 2 旅旅长马元海率手枪团、宪兵团追来，向我军发动进攻。李先念指挥三十军迎头痛击，将手枪团击溃、宪兵团全部歼灭，缴枪 1200 多支。这一仗大振军心。正想乘胜前进，敌集中兵力防堵，不利再进。为了调动敌人，寻找歼敌机会，总部决定全军回到倪家营子。

倪家营子是临泽县东南一个较大的村落群，分上、下倪家营子，共有 43 个屯庄，人口集中，粮食较多，坐落在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每个屯庄都有厚厚的黄土围墙，高三四米，相当坚固。较大的屯庄还筑有碉堡和瞭望楼。我军部署在下倪家营子 20 多个屯里，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两军前沿阵地相交，形成一个防御圈，凭围墙和堡垒固守。计划经过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后，转入反攻，再乘胜东返。

马步芳、马步青得知我军集结在倪家营子，倾巢而出，用 5 个骑兵旅、3 个步兵旅、1 个手枪团、1 个宪兵团和大量民团，共 7 万多人，进行全面包围。敌我双方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历时 20 多天的血拼血战。其战斗之惨烈，前所未有。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是这样记述的：

> 马敌重兵来犯，我军伤病皆起，战局摄人心魄。敌人每次进攻，均先以大炮猛烈轰击，而后组织大量步骑兵发起冲锋。什么花马营、黑马营、白马营、红马营，都上来了。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每当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有些围墙被炮火击毁，指战员利用断墙残壁，拼死坚守，直至将冲进的敌人杀出。因为子弹缺乏，步机枪几乎失去作用。我到前沿阵地去看过，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握紧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263 团一个连，坚守前沿阵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猛攻，最后只剩下 9 个人，前沿阵地依然在手。265 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仍手舞大刀，率

部酣战，杀得敌人纷纷倒地。有些指战员当手中的武器被毁后，赤手空拳，与敌扭成一团，咬掉敌人耳朵，扼住敌人喉咙，拔掉敌人胡子。夜晚，敌人龟缩回去，我军即组织小分队去袭扰，疲惫敌人。三十军一个排，夜袭雷家屯成功，全歼守敌一排，焚毁敌军火 24 车，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倪家营子苦战的日日夜夜，显示了西路军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顽强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在红军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苦战将近一月的西路军，歼敌逾万，自身伤亡也很严重，全部人数这时不足万人。为摆脱眼前危险处境，徐向前力主突围，军政会绝大部分人赞成，陈昌浩只得同意。2 月 21 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快速向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转移。马步芳一个骑兵旅和宪兵团尾追不舍。徐向前令三十军杀个“回马枪”。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选择有利地形，用伏击加突击的办法，击溃骑兵旅，全歼宪兵团，缴枪 1200 多支和大批军用物资。陈昌浩认为打了胜仗，又得到了补充，可以重回倪家营子继续建立根据地。徐向前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其实，陈昌浩知道返回原地不是良策。但他头上有“紧箍咒”（曾是“张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害怕再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连在一起。为了表示自己现在与中央保持一致，所以坚决要回去。两人吵了一架，没有结果。这时中央来电：“甲：固守 50 天。乙：我们用各种有效办法援助你们。”陈昌浩的意见占了上风，再也无人说不。于是，军政会做出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失败的命运。

历尽艰险　保存基干

2 月 26 日，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这里已被敌人洗劫一空，很多屯庄的房屋、围墙成了断垣残壁。第二天，马家军开始围攻。敌人集中 3 个旅攻击我 88 师阵地。前面的敌人被打倒了，后面的又蜂拥而上，最后约有一个旅的敌人攻进了屯庄。程世才令 265 团在 89 师配合下反攻。团长邹丰明平常不爱讲话，打起仗来像只猛虎。有么样的干部就有么样的兵。在他的带领下，265 团成为有名的“夜老虎”，指向哪里打到哪里，从不畏缩。邹丰明二话没说，提起大刀走在前，战士们握刀紧随其后，一出掩体，左冲右杀，

敌人的脑壳像西瓜似的从肩上滚落下来。他们冲向哪里，哪里的敌人就往回窜。正杀得起劲，一颗子弹打中了邹丰明，身子摇摆倒下去了。敌人赶到跟前，他又蹿起来杀了几个敌人。因伤势较重又倒在地上，仍在指挥战斗。经过几次冲杀，在 89 师的支持下，265 团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住了 88 师阵地。

血战七天七夜后，中央所说援助没有希望。军政会一致决定再突围，沿祁连山向东转移，进至梨园口，敌骑兵追来堵截。梨园口是通向祁连山的一个山口，三面环山，一面临戈壁滩。为了掩护三十军展开，九军与敌骑兵争夺两边的山头，战成一团。我军指战员拼命与敌骑兵肉搏。不到半天，九军仅有两个团约 1000 人绝大部分拼光，一个个死得那样英勇壮烈。其中就有红安籍的九军教导师政治部主任李有庆、团长陈世道、25 师 75 团团长杨荣华等。敌骑得逞，转向三十军进攻。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员向山里转移，李先念、程世才、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分别指挥 88 师 263、264 团与敌战斗。又是一场面对面的厮杀，血肉横飞，惨烈至极。我 264 团全部拼光，有“钢军”之称的 263 团也损失大半，政委钟行忠拉响手榴弹与敌数骑兵同归于尽。在这次战斗中，红安籍干部牺牲的有：三十军政治部党务书记张光寿、参谋处科长周明山、供给部被服科长汪如意、时任师政治部主任袁光焱和总部总务科长何延振、政治部文印科长李春生等。

部队边打边撤，到了晚上退入祁连山康龙寺附近。第二天，敌骑兵跟踪而至。担任掩护任务的三十军 265 团和 267 团，与敌人展开血战，又遭重大损失。“夜老虎”265 团，为保卫总部和伤员，个个拼命杀敌。两只领头虎——团长邹丰明和政委黄英祥身负重伤，仍在指挥战斗。这两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指挥员，搭档三年，配合默契，屡打胜仗。在他们的带领下，265 团成为三十军作战的顶梁柱。现在这两只受伤的猛虎，躺卧在血泊中还在扣动扳机，射杀敌人，直到心脏停止跳动。这次战斗，265 团全部杀身成仁，267 团也损失大半。英勇的红西路军指战员的热血，洒在祁连山的冰坡雪岭上，像怒放的红花，邹丰明、黄英祥留下的那两朵血花，似乎尤为鲜亮。西路军苦战四个多月，至此归于失败。

这时，军委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必须保存一部分力量，是向蒙古边境冲击或就地打游击战，请你们考虑决定。”徐、陈在康龙寺以南的石窝附近召开军政会讨论此后行动方针。会议认为已战到最后，只有设法保存基干，决定将现有不足 3000 人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深入山区游击。陈昌浩提议，他和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由李卓然、李先念、曾传六、李特、

王树声、程世才等 8 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会后，各支队分开活动。毕占云（五军参谋长）带领由五军、总部特务团和妇女独立团余部千余人组成的支队，出石窝向东游击，不久遭敌包围，大部分牺牲，少数人回到了陕北。

王树声带领九军和总部骑兵师余部近 700 人组成的支队，内有孙玉清、骑兵师政委刘庆南、九军 25 师作战科长张志勇等红安籍干部，出石窝向北游击，遭敌兵追击。他们居高临下，毙伤敌官兵百余人，因寡不敌众，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孙玉清、张志勇等被俘。王树声等少数人幸免于难，回到了陕北。

李先念带领由三十军余部和总部干部队千余人组成的支队，其中红安籍干部有：总部保卫局长曾传六、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民、总部兵站部部长吴先恩，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供给部长明华扬，88 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鲁喜焱，89 师团政委邹功凯等。西路军工委大部分成员跟这个支队一同随行。他们出石窝向南行进，深入祁连山区，再向西游击。经过三天急行军，摆脱了敌人尾追。从此踏上爬雪岭、穿冰谷、跋涉茫茫戈壁滩，毫不亚于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征程。其艰苦情形在《红四方面军战史》中有这样的记载：

> 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区，气温常在零下三四十度，一眼望去全是冰谷雪岭。部队无粮无盐，衣破鞋缺，遇到极大困难，不少人被风雪严寒夺去生命。当时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就是猎取黄羊、野牛、野骆驼、架在火上烧熟和着积雪吞食。白天依靠指北针辨别方向行走，晚上就宿冰窟山洞之中。尽管如此困难，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依然没有动摇对革命的信念。他们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继续西行。

西路军工委保存了一部电台与中央取得联系。中央指示要保存力量，设法进入新疆，并说将派陈云等到星星峡迎候他们。这个指示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增强了大家的信心和力量。但部队减员无法遏制，几乎天天都有伤病员死亡。4 月 5 日支队到达酒泉西南的野马山中，只有 900 来人，600 多支枪。指战员在饥寒交迫中，带病扶伤，继续在冰川雪岭中行进。又经过 11 天艰苦行程，于 4 月 16 日在石包城总算走出了祁连山口，全支队只有 850 多人。4 月 24 日，侦探获悉安西县城敌人兵力空虚。待发起进攻时，敌人突然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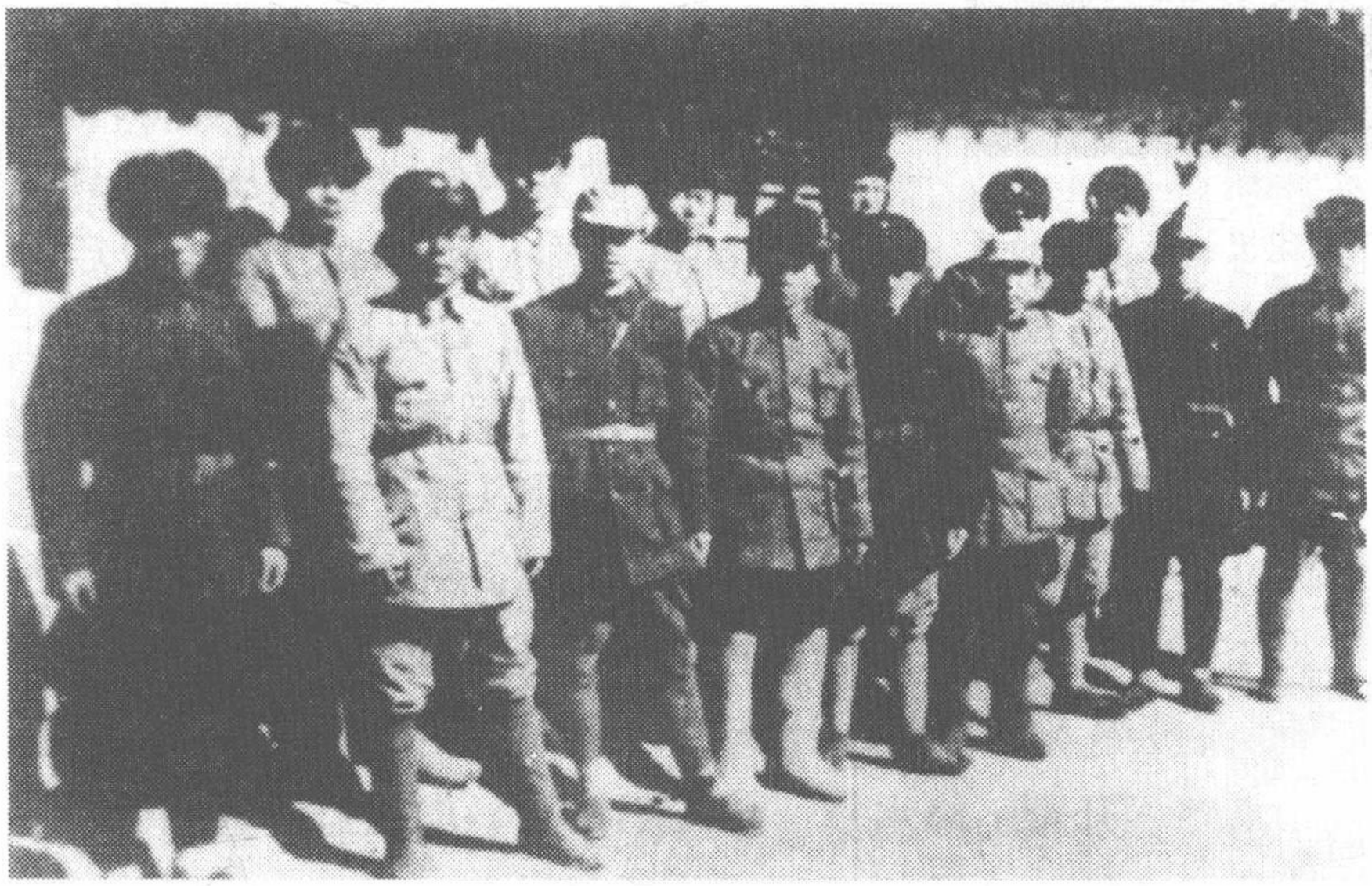
兵一个团。我军战斗失利，敌骑步兵紧追不舍。部队且战且走，到达红柳园，又与敌进行一场激战，只好向戈壁滩深处转移。马家军认为那是死路一条，不用打红军就会被沙漠吞噬，因此停止了追击。这次战斗，支队又有很大伤亡。鲁嘉焱、邹功凯两位红安籍干部的鲜血分别洒在了西路军最后一战的安西和红柳园的战场上。

出红柳园便进入了大戈壁滩。沙漠行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首先是气温变化极大。白天太阳似火，沙漠温度高达 50 多摄氏度，可以烤熟马肉，晚上骤降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能把人畜冻僵。真是白天烤死人，晚上冻死人。单衣薄被的西路军指战员挺不住也得挺。

其次，大戈壁一望无际，无任何标志物，分不清东南西北方向。支队在祁连山茫茫雪域中行军，靠指北针导引。安西一仗，指北针丢了，大家都成了睁眼瞎。幸有郭天民在。他在黄埔军校学过军事气象学，利用天空的太阳、月亮、星星辨别方位，使部队在前进中没有迷失方向。

第三，荒凉的大戈壁缺水，人人口干唇裂，喝自己的尿水，伤病员饮马血。最后连尿水、马血都没有了，只有苦苦挣扎前进。有很多伤病员和体弱者经不住酷暑严寒和缺水的煎熬倒在戈壁滩上再也爬不起来。

如此艰苦的行军，走了三天三夜，终于走出了大戈壁滩。4 月底，在李先念、李卓然率领下，支队到达甘肃、新疆边界上的星星峡，受到等候在此的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的热情欢迎和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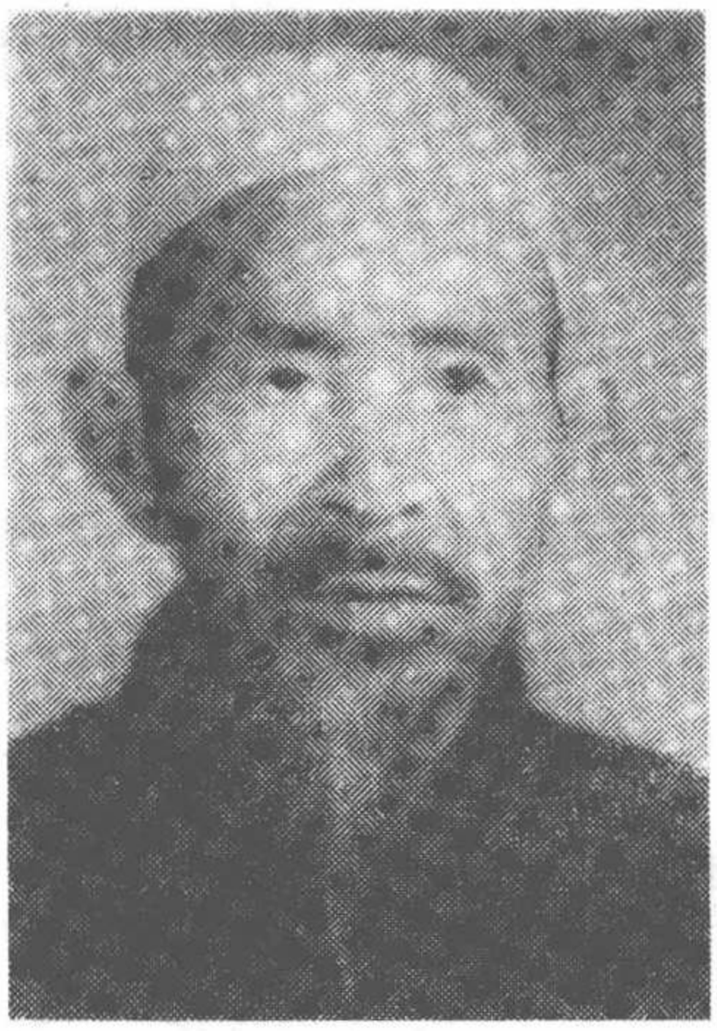


李先念所率支队经过艰苦转战到达新疆，图为部分指战员。

危难之中见良将。西路军余部编成3个支队，从石窝附近出发，有两个支队很快就损失了，只有李先念所率支队得以保存。在他的正确指挥下，苦行苦战47天，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为党和军队保存420多人的骨干力量，是多么不容易啊！

惨遭屠杀　忍辱护子

西路军渡河西进，孤军与10万敌人作战，在一条山、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营子和梨园口等战斗中共歼敌3万多人，取得了一定的战绩。但由于敌众我寡，有耗无补，求助无援，最后归于失败。全军21800人，除420多人胜利到达新疆和少数人被打散后回到陕北外，其余21000多人约有一半牺牲，另一半被俘。据青海省党史和民政部门调查统计：红军被俘人员约有9200人，分别关押两地，其中被马步青部所俘的红军将士关押在甘肃河西，被处死者较少，大多分批押解回内地。这些被俘人员中一部分强行编入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被我党营救回到陕北，也有不少人流落各地。被马步芳部所俘的红军将士关押青海西宁，惨遭屠杀和奴役。其中：



在万人坑里被救起来的原红军老战士黄科林(戴登高)

有300多人在押往西宁途中就被处死;有1600多人被分成数批，利用黑夜押至西宁南门外的苦水沟，用刀砍、棒打以后，不论死活统统埋掉。红安人戴登高，是红九军司号长，被敌人棒打后推下坑去没有死。他的身子埋在下面，头和手埋在上面，用手扒土，露出头来呼救，被路过的好心人救起。戴登高逃出西宁后流落农村，改名黄科林。新中国成立后住在西宁市城东区北关街136号。他用亲身经历控诉了马步芳血腥屠杀红军俘虏的罪行;

有3400人被编入工兵营、补充团、服务队，当牛做马干苦役。红军男战士修桥、筑路、开荒、修水坝。敌人用刀枪、皮鞭监督他们劳动，干苦活重活不让吃饱，大部分人被折磨死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逃脱后流落各地。总之，被关押在西宁的6300人中，被营救者不到2000人，被害者达4300

多人。马步芳心狠手辣，屠杀、虐待红军俘虏，比其他国民党军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路军的三个军都有光荣历史。其中九军和三十军，来源于黄麻起义。五军来源于宁都起义。经过千锤百炼的广大的指战员，都是英勇顽强的革命勇士。不论是反“围剿”还是长征，他们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和困难。这样一支劲旅，如果不是陷入无补无助，而又不能自主进退、消耗殆尽的境地，是任何敌人也不能将它打垮的。最后落个全军覆没，彻底失败，教训极其惨痛和深刻。一万多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好战士牺牲和惨遭屠杀在西北高原上，实在令人痛心！董振堂、孙玉清等数以百计的军、师、团、营、连、排干部，他们是这支部队的脊梁骨，一个个血洒走廊，骨埋河西，使人在痛心时更加痛惜。红安籍指战员在此捐躯的不下百人，其中有军职干部 2 人、师职干部 8 人、团职干部 14 人。妇女参加红军本来就少，能成为连、营、团、师级干部的更是凤毛麟角。红安有连、营、师级女干部各一名，她们也将一腔热血洒在戈壁滩上。万里赴戎机，河西埋忠骨。红安共有 27 位男女指挥员长眠在此。这些骨干中有惨遭马步芳秘密杀害的“战将”孙玉清，更是令人痛惜和怀念。

石窝分兵后，孙玉清随王树声支队向祁连山北游击。不久被敌击散，孙玉清又负伤，进入酒泉南山林中隐蔽。4 月上旬，于如冰、茹大本带领反动民团搜山，将孙玉清俘去。敌人问他姓名和职务，他说叫陈泽功，红军战士。敌未深究，带至观山口民团团部关押起来，先后达 20 多天。孙玉清本可在此乘机逃脱，因伤未愈行走不便，想等伤好些后再逃。5 月初，驻酒泉马家军旅部通知各民团，将俘虏的红军全部上解。孙玉清被关进酒泉大衙门（今尚武街）监狱。敌人查出了孙玉清的真实身份，即向青海省政府报告。国民党 82 军军长兼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电令旅长马步康将孙玉清交其团长马忠义亲自押解到西宁。

5 月 17 日，孙玉清被押到西宁。当天，马步芳在省政府二堂东大厅“设宴招待”。出席的有省政府军政要员和社会知名人士。《青海日报》社长陈秉渊以记者身份到场采访。据陈秉渊回忆：孙军长身披破大衣，在马忠义的押解下，挺胸走进大厅，怒目而视，不动声色。马步芳请孙军长入座，然后时而恭维，时而利诱，时而威胁，软硬兼施地劝降。孙军长面对敌人的花言巧语，有时侃侃而谈，毫无惧色；有时愠形于色，拒不回答；有时沉默，一言不发；有时据理相争，驳斥对红军的诬蔑；有时怒不可遏，痛斥马家军在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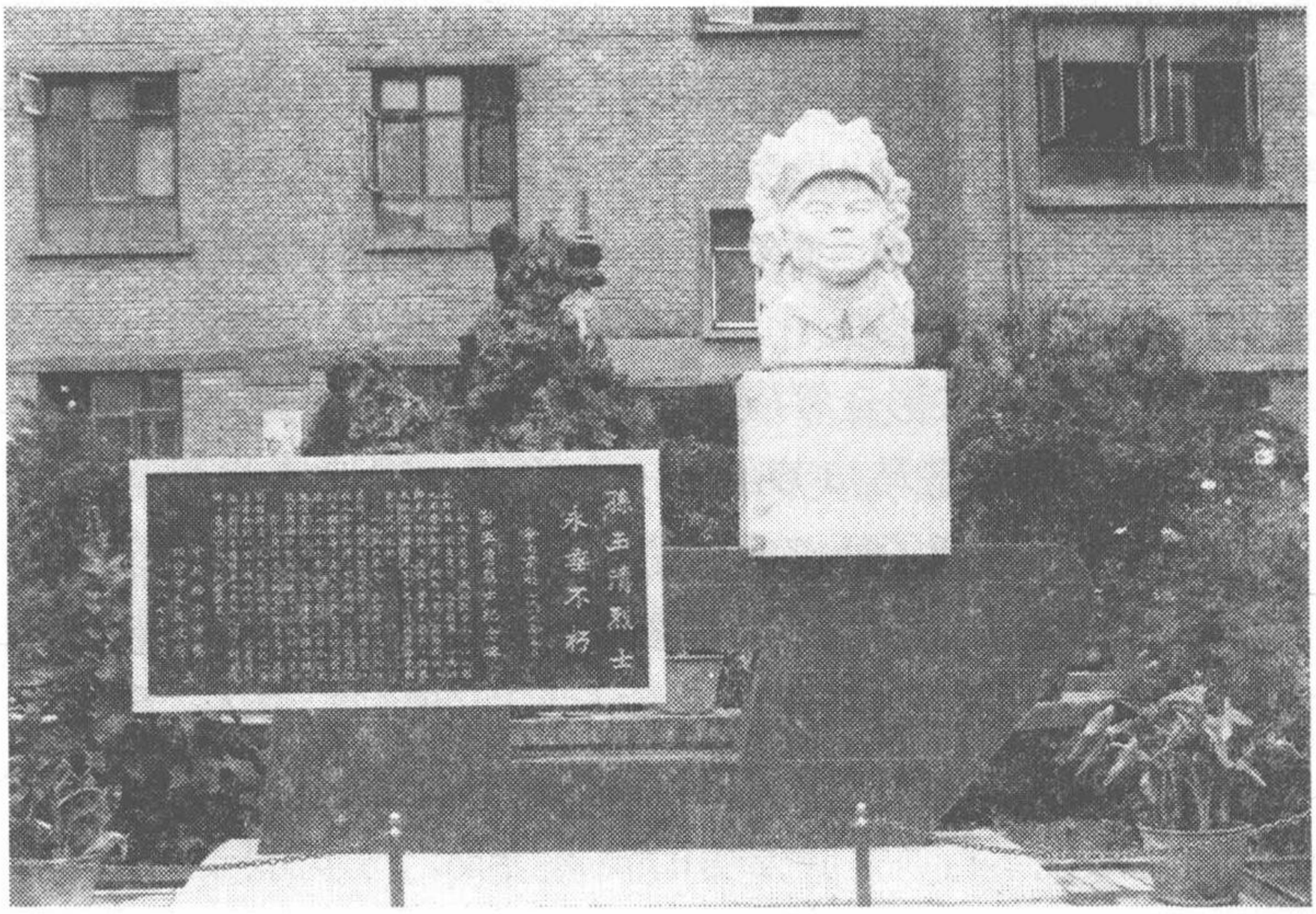
蒋委员长都承认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下，不顾大局，继续关押、折磨和杀害红军被俘人员的罪行。马步芳“劝降”不成反遭斥责，没有发怒，反叫马忠义将孙军长带到他的住所去休息。马忠义的住所是一家商人开办的火柴厂，位于西宁东关，院内有前中后三栋房屋。前栋经营火柴，中栋是两层楼房被马忠义霸占，后栋是马厩和空房。马步芳不让孙玉清下狱，交马忠义看管，是想以这样的“礼遇”继续“劝降”。

孙玉清被俘后，马步芳对南京隐瞒不报。他的如意算盘是：河西“剿共”已有功，若“劝降”孙玉清后再报，会功上加功，蒋介石对他会更加重用。结果办法用尽，孙玉清始终不屈。马步芳知道在孙玉清身上再打任何主意都是白费心机，于是向上报告了。

国共合作后，蒋介石一直拖延不愿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干部。得知马步芳抓到共匪军长孙玉清，电令他立即处决，不要声张。马步芳便下达了秘密杀害孙玉清的命令。据凶手之一的喇文彬交代：5 月下旬一个夜晚，高原古城西宁仍寒气逼人。孙玉清偎在被子里，翻阅一本破旧的《水浒传》。马忠义派副团长耿文魁带 4 个传令兵：马昌龙、马国成、马黑哨、喇文彬，来到孙玉清的住房把他叫起来。然后，喇文彬在前，马国成、马黑哨在孙玉清两边，马昌龙手持大刀在后。在耿文魁监督下，将孙玉清从火柴厂的中院押到后院的马厩里，马昌龙用大刀将孙玉清砍死。耿文魁派喇文彬、马昌龙和一个车夫，将孙玉清的尸体扔到了郊外南滩的一个坑里。第二天，军部要人头。马昌龙又去把孙玉清的头割下来送到军部。马步芳派人拍照，然后将孙玉清的头送上去邀功请赏。

孙玉清被杀害的消息传开，被俘红军女战士中有两个人极其悲伤。一个是他的妻子，当时在医院被监督洗衣、扫地、涮马桶。她泪流满面，没有地方去表达悲痛，只有站在那里为孙玉清默哀。另一个是孕妇，在敌人的魔掌中，她的悲痛只能放在心里，表面上却不能有任何表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时，26 岁的九军军长孙玉清与 20 岁的九军宣传队班长岳兰芳结了婚。岳兰芳，四川南江县沙河区人。本姓方，8 岁给岳姓人家当童养媳改姓岳。1933 年参加红军，始作宣传员，后任班长。结婚后一个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岳兰芳调妇女独立团任排长。从此两人分开后到被俘前没有再见面，用岳兰芳的话说只做了“一月夫妻”。但她心中始终有孙军长。



孙玉清烈士纪念碑坐落就义处——青海省西宁市东关新华布鞋厂院内。徐向前为纪念碑题词。

怀有身孕的女战士叫陈淑娥，四川平昌县元山镇人。1933 年 16 岁参加红军。长得十分标致，嗓音好，一参军就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社当演员。关于她和孙玉清的关系，1987 年 12 月 24 日，由青海省党史办、检察院、青海民族学院干部组成的调查组，对陈淑娥进行了调查访问，整理的《访问记录》是这样记述的："1936 年 8 月份，我在红四方面军剧社当演员，戏演得比较好，演什么像什么。一次到九军慰问演出，演完后孙玉清军长派警卫员来了解我的情况，后又派人叫我去军部。当时我不知道孙军长叫我去干什么，于是就征求王定国同志（剧社服装股副股长）的意见。王定国说：'军长叫你，你就去嘛！'我去后孙军长对我十分客气，夸奖我戏演得好，他看了很高兴。问了我家庭和个人情况。他说对我的印象很好，同时表达了爱慕之情，说以后经常可以到他那里去。以后我们接触过五六次，他送我一件皮夹夹（皮背心）。有一次从孙军长那里回来晚了，耽误了演出，挨了指导员的批评。从此，剧社同志都知道我和孙军长的关系，大家还跟我取了个绰号叫"皮夹夹"。西路军渡过黄河后，11 月份在永昌二十里铺我见到了孙军长。我对他说：'我已有三个月的身孕，该怎么办？'他说：'我在古浪仗没打好，现在心情不太好。你不要害怕，等我打了胜仗以后，我们的事情好好解决一下。'见面后不久，我就被俘了。"

西路军前进剧社在永昌二十里铺遭敌袭击，除战死者外有30多人被俘。马步芳将俘过来的剧社人员改成新剧团，强迫演出他规定的节目，供他的部队取乐。陈淑娥长相好，化妆后更漂亮，被马步芳的参谋牟文彬看中了，求主子赏给了他。3个月后，即1937年6月13日，陈淑娥在牟家生下一个男孩。为了保护孙玉清的遗腹子，陈淑娥向牟文彬提出孩子自己养不能送人，不要追问是谁的。牟文彬全答应了。当陈淑娥的孩子满月之后，又被马元海派人抢去了。马元海是马步芳部下一名旅长、围追堵截西路军的前线总指挥。就是他的部队俘虏了西路军前进剧社。马元海在点验红军被俘人员时，一眼就看中了陈淑娥，嘱咐部下押解俘虏到西宁时，要将陈淑娥专门押到他的老家贵德县。河西战事结束后，马元海回到贵德家中一看没有被俘女红军，十分恼火，回到西宁就找马步芳要人。马步芳告诉他已将陈淑娥赏给了牟文彬。马元海说不行，是我俘虏的要赏给我。马步芳同意了。于是马元海就去牟家抢走了陈淑娥，并且不要她带孩子。刚满月的婴儿被留在牟家。牟文彬算有点良心，将在老家的妻子叫来抚养孩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念在他为红军后代做了一点点好事，重刑轻判，予以宽大处理。

陈淑娥到了马元海家，时刻想念儿子。她担心刚满月的孩子离开娘后有个三长两短。如果夭折了，自己在世对不起孙军长，死后赴黄泉也不好向孙军长交代。于是又哭又闹，绝食抗争，一定要见到她的孩子。马元海拗不过她，只好派人去牟家将孩子抢来。但只能见此一面，以后不准再见面。并威胁说，以后再为孩子哭闹，就弄死孩子。陈淑娥为了保护孩子，只得同意。母子见面以后，马元海没有将孩子送回牟家，而是悄悄送给了手下一个叫刘总伯的副官，命令他对外保密。刘总伯给孩子取名刘龙。出世一个多月的孩子，辗转两家之后才算有了姓名。而生育他的母亲陈淑娥被蒙在鼓里，一概不知。不过也好，减少了人们特别是反动派对这个孩子的出身来历的追问。

有一天，马元海的侄儿媳妇，带着自己的儿子到陈淑娥的住处玩。陈淑娥问孩子有多大？侄媳说8岁。陈淑娥听了掉过头去直流泪不说话。侄媳问她为什么伤心。陈淑娥说她也有一个一般大小的孩子，不知在何处，非常想念。侄媳很同情，答应想办法让他们母子见上一面。这年秋天，马元海去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朝圣。侄媳趁此机会将刘龙找来与陈淑娥一起待了半天。没人介绍没人教，8岁的刘龙一见面就喊陈淑娥妈妈。真是母子亲情隔不断。陈淑娥自然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但儿子衣着破烂，面黄肌瘦，又使她陷入无穷的思念与担心。

命运似乎注定这位红军的后代出世就要受尽人间苦难。原来，刘龙的养父刘总伯是个大烟鬼。为抽鸦片烟，将所有财产花光还欠一身债。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刘龙在这个家里吃不饱，穿不暖，不能上学读书，整天背着粪筐去放羊。但刘龙身上有红军父母的奋斗精神和改变命运的遗传基因。当青海解放以后，1951 年 14 岁的刘龙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前线多次立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名优秀的排长。1955 年从朝鲜回国。1956 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兰州市肉类联合加工厂担任车间支部书记，成为一名国有企业的干部，用刘龙自己的话来说，是彻底翻身得解放了。

儿子的成长，母亲依然蒙在鼓里。因为，刘龙 8 岁那年见面以后，母子再也未相见。陈淑娥不知道儿子在何处。那次见面，刘龙面黄肌瘦，衣着破烂的样子，长期留在她的心里。她想儿子几乎想发了疯，几次逃走未成，寻死又死不了。日久天长，心神疲惫，容颜憔悴。

1949 年 5 月 26 日，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一举攻克兰州，全歼守敌马步芳部 6 个军近 10 万人。然后直捣“西北王”马步芳的老巢西宁。马步芳仓皇出逃，死在异域他乡。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定要报。”马步芳曾为打败红西路军，并以“斩尽杀绝”的残忍手段对待红军俘虏而得意洋洋，想不到 12 年后他彻底完蛋了。这就是报应。树倒猢狲散。西宁大大小小的反动派一个个法网难逃。被他们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群众从此获得翻身解放。陈淑娥趁此机会回到了阔别 16 年的四川老家，与哥哥一家团聚。人民政府给她分了土地和房屋。她不仅获得人身自由，还过着从未有过与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日子。但她的心里还是想着儿子。1952 年夏天，她告别哥哥一家，只身一人北上寻子。先在青海贵德县打听到她的儿子刘龙已经参加志愿军，在朝鲜前线作战。她为儿子在没有人告诉他的身世，也没有人指引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继承父志，参军杀敌感到由衷的高兴。

经过民政部门和刘龙战友的帮助，她与儿子有了书信联系。压在陈淑娥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她立即离开曾使她屈辱、伤心的贵德、西宁，只身一人来到兰州，以帮人干杂活为生，等待刘龙从朝鲜归来。1956 年刘龙转业没去青海，要求到兰州工作，以便赡养母亲。从此，母子在兰州注籍，相依为命。并把养母（养父早已去世）接去住了两年，以报养育之恩。后来，刘龙娶妻生子，爱人是一位小学教师，养有一子二女。全家 6 口人，日子过得和和美美。陈淑娥被安排在街道缝纫合作社工作，再也不去干杂活了。就母

子而言，事情至此已有可喜的结局。

陈淑娥和刘龙，事实上是孙玉清烈士的遗属，但要得到政府承认，又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1958年，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元帅视察甘肃、青海时，非常关心红西路军死难烈士及其流落人员的情况，曾问及孙玉清烈士有无家属。事后，甘肃省军区副政委许昌对此事进行过调查，认为刘龙是红西路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的遗孤。将要作进一步调查核实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事便不了了之。

“文化大革命”中，陈淑娥被街道当作审查对象。后经查证核实，她在被俘后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这个结论使她放下了历史包袱，但从此母子俩不愿再提往事。陈淑娥说：“今后只想过安静的日子，靠自己劳动收入为生，过去的事情再也不想提了。”刘龙则显得更加沉闷与无奈。他说：“解放前不敢说自己是谁的儿子，因为说了就会死。解放后不好说自己是谁的儿子，因为说了没有用。几十年就这样过来了，也习惯了，没有任何奢望，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母子俩的这种心情和态度可以理解。

历史问题迟早会弄清楚。1982年后，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甘肃、青海等省对于红西路军的流落人员进行了全面调查并落实政策，对于红西路军的死难烈士以建纪念馆、纪念碑等形式进行褒扬。这些活动开展以后，为收集孙玉清烈士的资料，弄清孙玉清与陈淑娥、刘龙的关系，先后有不少人去登门访问，打破了母子俩心中的平静。开始，陈淑娥闭口不谈。后经当年的红军战友李桂芝、王定国等做工作才讲话。特别是全国政协委员、谢觉哉夫人王定国，1983年专程从北京到甘肃、青海等地调查研究，帮助各地贯彻落实中央政策，做好对“红流”人员的照顾和对烈士的褒扬。她在调查时，听说陈淑娥住在兰州，亲自到她家里与之促膝长谈，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王定国说：“当时知道你陈淑娥与孙玉清军长关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好多人。我劝你承认这种关系，让刘龙有个归属。”王定国称得上是陈淑娥的直接领导之一，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关心陈淑娥，使她很受感动。王定国讲的话对陈淑娥触动很大，当即表示愿意接受访问，承认并公开她与孙玉清烈士的关系，同时让刘龙积极配合青海省西宁市孙玉清烈士纪念碑筹备小组，为孙玉清烈士塑像当好模特服好务。这件事传开后，甘肃省省长陈光毅带领民政部门负责人前去看望，并送500元慰问金。原红九军司令部作战参谋、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绕道兰州，

专门去看望了陈淑娥和刘龙，送去孙军长当年的一个老部下最真挚的安慰与祝福。所有这些，使陈淑娥和刘龙母子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慰藉与开心。

但是，领导的关心，不等于陈淑娥、刘龙母子与孙玉清烈士的关系就得到了承认。他们要成为烈士家属，还要按规定走完一定程序。不知什么原因，时间过去三四年了，问题还未解决。

1987 年是红西路军广大将士遇难 50 周年。青海省决定在西宁市建立红西路军纪念馆，在孙玉清军长就义处建立纪念碑。这一年，红安县委党史办收到青海省党史委寄来的一封信和两张照片。信中要求，将照片转交原红西路军第九军供给部粮秣科科长董贤应辨识，看塑像照片像不像孙玉清烈士。笔者马上带着信件和照片去拜访董贤应。董贤应原是城关镇政府秘书，已离休。年近七旬，身体不好，刚从医院出来，躺在床上休息。听说青海来信请他辨识孙玉清的塑像照，非常高兴，马上起床，在昏暗的屋子里边看信边看塑像照，看完后，他说像。就是不知道这是根据谁的样子塑成的。这时，笔者告诉他，是根据这个人——随即递上刘龙的照片——塑成的，你看他像不像孙玉清？董贤应看完照片说，像，非常像孙玉清。然后，再告诉他，这个人叫刘龙，是孙玉清的遗腹子。董贤应听了高兴地说，太好了！为革命血战到底的孙军长有后人了，真叫人高兴！孙军长在九泉之下一定更高兴！董贤应又说，请你代劳把我的辨认意见作为复信告诉青海党史委，最后再加一句，青海省委、省政府为红西路军死难烈士做了一件大好事，作为红九军的一名老战士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祝红西路军纪念馆、孙玉清烈士纪念碑早日落成！董贤应对孙玉清烈士塑像照片和刘龙照片的认定，也是对孙玉清与陈淑娥和刘龙母子的关系一种肯定与支持。

1988 年 8 月初，青海省委、省政府邀请红安县委、县政府领导及孙玉清烈士亲属各一名代表参加红西路军纪念馆和孙玉清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红安县委研究决定，孙玉清的亲房叔伯没有人就不去了，由党史办和文物局负责人前去参加典礼活动，代表县委、县政府向纪念馆和烈士纪念碑献花篮和花圈。笔者等到了西宁，大会筹备处告诉我们：陈淑娥和刘龙一家都邀请来了，由于还未领到烈士家属证书，不便以家属身份露面。所以孙玉清烈士纪念碑揭幕式他们不参加，过后再安排去祭拜，请孙玉清烈士家乡的代表予以理解和支持。若陈淑娥找我们谈及此事，还望帮他们做说服工作。这时，笔者才知道讲过多年的陈淑娥、刘龙与孙玉清的关系问题尚未解决，而且到了这样一种令人尴尬的地步。应邀参加纪念活动的原西路军的老红军首长也

觉得问题解决太慢。但是，解决问题要靠甘肃而不是青海。因为陈淑娥和刘龙都住在甘肃省兰州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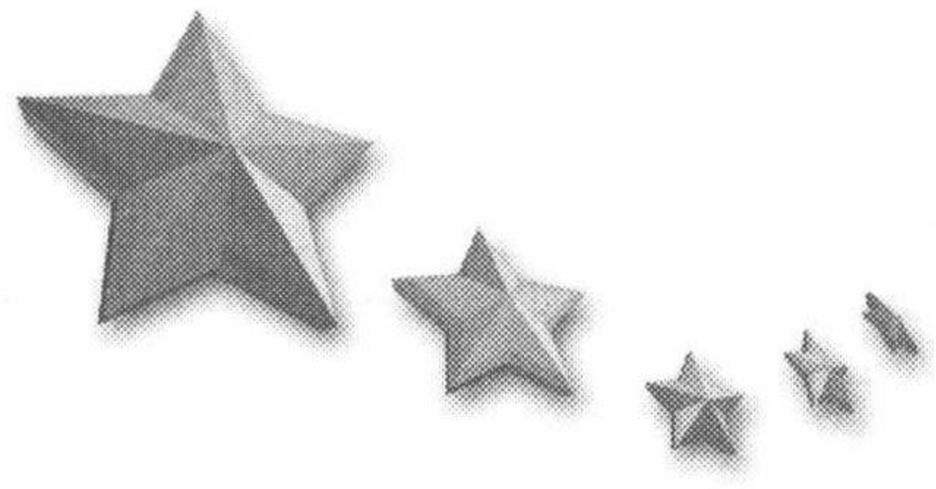
纪念活动结束后，以王定国、王政柱等8位红西路军的老红军首长怀着深厚的感情，专门坐下来商量怎样促使问题尽快解决，并通知我们列席参加。商量的一致意见是：他们联名致信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市委、市政府，证明陈淑娥与孙玉清烈士是事实夫妻，刘龙是烈士的遗子，请按有关规定，及早明文确认陈淑娥及其子孙是孙玉清烈士的遗属，补办各项正式手续，以示党和政府对烈士的尊敬和对其遗属的关怀。

老红军首长的联名信很快起了作用。两个月后，1988年10月20日，甘肃省委、省政府作出批示，由省民政部门为孙玉清烈士补办烈士证明书，以此作根据承认陈淑娥及其子孙为烈士家属。至此，经历三十多年的追认，陈淑娥和刘龙烈属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这个姗姗来迟的消息，安慰并抚平了孙玉清烈士遗属之心！也让在高原古城西宁驻留了五十余年的孙玉清烈士的英魂得到了告慰和安息！



孙玉清烈士遗属。前排：陈淑娥与两个孙女，后排左起：陈淑娥的孙子、儿媳、儿子，客人、作者、阙裕民。



第五章　驰骋华北　敌胆颤

战争跟着政治走，将士跟着战争走。这一走，我军从内战走向了抗战，纷纷奔赴前线英勇杀敌。张仁初冲锋陷阵大战平型关。陈锡联见机而做突袭阳明堡。郭天民向毛泽东请战出征获得“双准”。王近山三天打两仗，仗仗都赢。王建安三讨伪军吴化文。王吉文智擒二匪伪。长城内外，平原山地，都留下了红安籍将士的抗战足迹。

平型大捷　阳明毁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驻屯军一部，以演习为名，借口一名士兵失踪，突然进攻驻守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的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影响下，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国难当头。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发表宣言，通电请缨，愿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这一正确主张，得到全国人民和各爱国阶层的支持。蒋介石不得不表示赞同。国共两党握手言和，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内战烟消云散，抗日烽火勃起。

根据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0日，中央军委将陕甘宁地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三个师，全军兵力共42000人。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115师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二十五、二十六军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下辖343旅、344旅、独立团和数个直属营，全师兵力15000人。120师由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二十七、二十八军等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下辖358旅、359旅、教导团及数个直属营，全师兵力14000人。129师由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一军和陕北红二十九、三十军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下辖385旅、386旅、教导团及数个直属营，全师兵力12300多人。

10月2日，又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现胜利街332—352号）正式成立，全军编为4个支队：闽浙粤湘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1、第2、第3支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各地便衣队、游击队

改编为第 4 支队，全军兵力共 10300 人。其中第 1 支队约 2300 人，第 2 支队约 1800 人，第 3 支队约 2100 人，第 4 支队约 3100 人，军直属队约 980 人。唯 4 支队人数最多，说明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得较好。

全国各地的红军在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由于番号、建制和兵员数额有限，原来 10 多个军的军、师、团级干部一般都降级使用，并且要不了那么多人。编余干部去抗大或党校学习。这是党中央为积蓄骨干，以待后用的一项决策。最初调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各师任职的红安籍干部有：郭天民任军委总参一局局长；张竭诚任 115 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吴大明任 115 师卫生部政委、韩先楚任 115 师 343 旅 688 团副团长；张仁初先任 343 旅 686 团 3 营营长后任副团长、张天云先任 115 师 344 旅 687 团营长后任副团长；陈锡联任 129 师 385 旅 769 团团长、胡奇才任 770 团副团长、徐深吉任 129 师 386 旅 771 团团长、徐绍华任 771 团副团长、王近山任 129 师 386 旅 772 团副团长、谢富治任 772 团政训处主任，况玉纯后任 129 师骑兵团团长。

到新四军任职的有：刘松清任新四军 1 支队 6 团政训处主任，叶道志任 2 支队 4 团副团长，戴季英任 4 支队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徐海珊任 4 支队 7 团政训处主任、郑重任 9 团政训处主任、程启文任 4 支队东北抗日挺进团政委、郑行福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李先念任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杨子明任支队挺进团政委、汪进先任抗日游击第 5 大队副大队长、罗厚福任抗日游击第 6 大队大队长。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以后，各部举行了誓师大会，并立即开赴前线杀敌。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八路军在华北抗战。

1937 年 8 月下旬，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为首的八路军总部，率领各师由驻地分别出发，主力经韩城、一部分经潼关东渡黄河，向华北前线开进。部队渡过黄河以后，乘火车北上参战。沿途所经城镇、车站和村庄，广大群众夹道欢呼。与此同时，三五成群一批接一批的国民党溃兵向南逃跑。

当八路军向晋北开进时，日军丧心病狂地沿平绥路南下山西，以主力坂垣第 5 师团由天镇、广灵一线向平型关进攻，并以关东军第 2、第 15 独立混成旅团由大同南下，配合主力作战；另以关东军第 1 独立混成旅团占领左

云、右玉地区，保障南下作战部队侧后安全。9 月 20 日前后，日军已攻进涞源、灵丘、浑源、怀仁、左云一线。

这个时候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确保晋北要地，将平绥路沿线后撤的晋绥军和中央军一部，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一线沿内长城布防，阻敌前进，并企图在繁峙城东至沙河间地区与日军决战。阎锡山在这里部署了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所辖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十五、第十七、第十九 6 个军和新编第一、第二预备军，参加对敌作战。9 月 19 日，我 115 师进至平型关东南的上寨、下关地区。国民党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负责指挥平型关方面作战）要求 115 师增援灵丘正面作战。可是在灵丘正面担任防御作战任务的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第 73 师，于 9 月 21 日不待敌至即撤退到平型关外的马跑泉、关沟、小西沟一线。敌人很快占领灵丘。在这种情况下，115 师决定利用平型关附近有利地形，采取侧面伏击的战术，给进攻之敌以歼灭性打击。24 日上午，我军以营为单位进行战斗动员，下午进至冉庄地区隐蔽集结。这时，敌坂垣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的先头部队已占领平型关以北的东跑池、团池口、鹞子涧等地，与内长城线上的国民党守军的战斗已经展开。

24 日夜，一场大雨不期而至，同时刮起大风。深秋的塞外，风吹雨急，雨助风寒。行进在崎岖山路中的八路军指战员，既无防雨工具，又无御寒衣服，显得更为寒冷。但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他们顶风冒雨，秘密快行，于 25 日拂晓前按时到达了位于平型关东北方向的预定伏击地区。具体部署是：343 旅 685 团占领老爷庙至关沟以北高地，686 团占领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担任主要攻击任务，歼灭进至伏击区日军；344 旅 687 团占领西沟至蔡家峪以南一线高地，切断进入伏击区日军的退路，并阻击敌援兵；688 团作师预备队。

拂晓，雨住风停，天气转晴。由灵丘西犯的日军坂垣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进入 115 师设伏区。由于秋雨刚过，道路泥泞，敌人的汽车、马车拥挤在老爷庙东北的山谷里，艰难地向平型关前进。

25 日晨，师长林彪一声令下，担任主攻的 685、686 团，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在一阵猛烈打击之后，686 团 3 营营长张仁初带领全营，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入敌人辎重部队中，与兄弟部队一起，将敌分割包围，展开白刃格斗，杀得日军人仰马翻，尸横遍地，其先头部队被打得晕头转向，束手待毙。与此同时，687 团 1 营 1 连指导员周世忠与连长带领全连，同兄弟部队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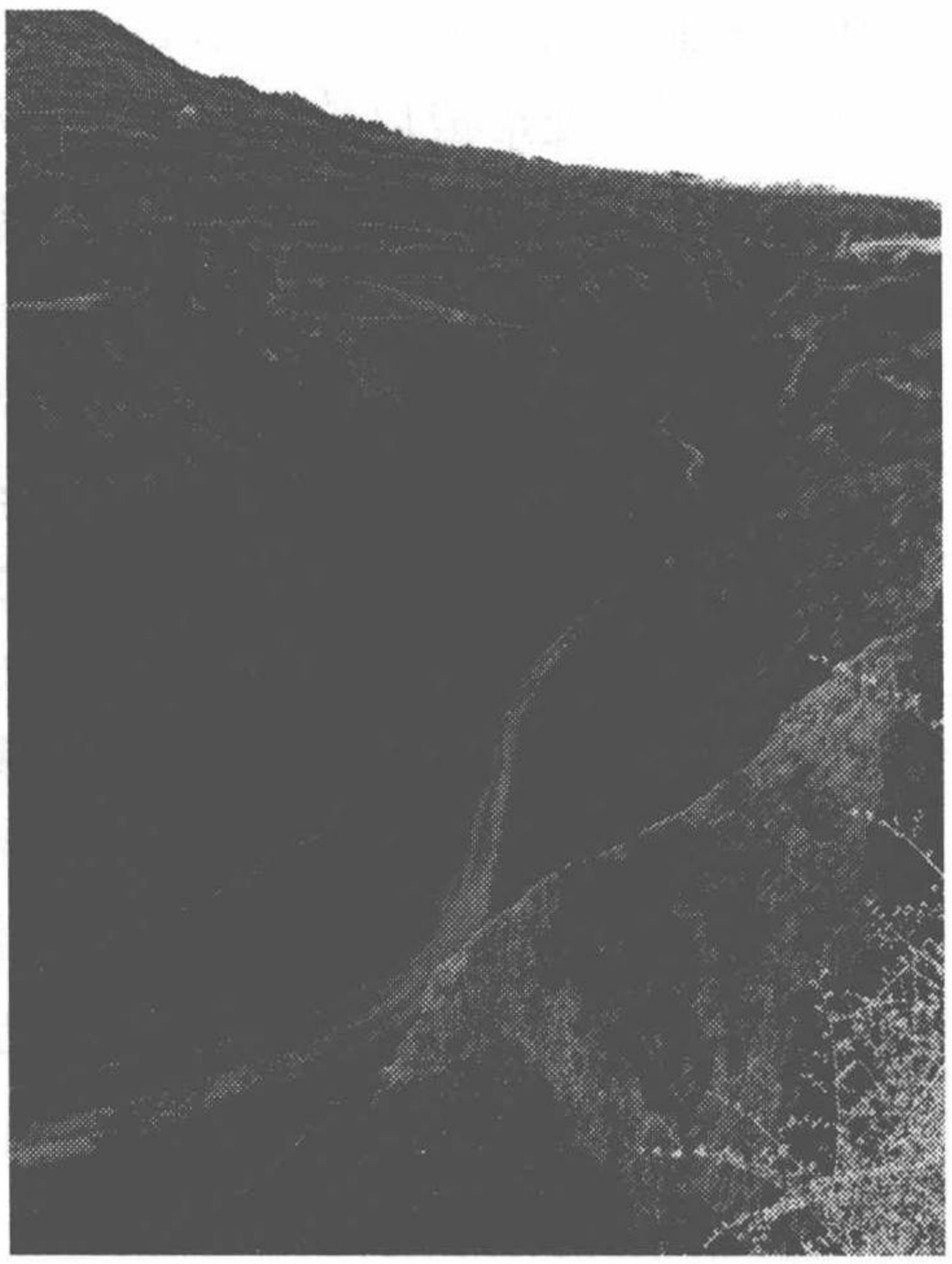
切断了敌人的后路，在敌人尾部猛追猛打。日军首尾不能相顾，阵脚大乱，纷纷求援。先已占领东泡池的敌军欲就近援救，被我打援部队阻击不能前进。驻涞源之敌奉命西进，也遭到师部独立团的坚决阻击。被困的敌军待援无望，疯狂组织反扑，企图突围，均被击退。激战至下午 1 时许，战斗胜利结束。随后，685、686 团不顾战斗疲劳，又去支援友军歼灭东泡池的敌人。待我军赶到时，友军并未向敌人出击，致使东泡池的敌人乘隙逃走。国民党军队如此怠战，影响了战果的扩大。

平型关战役，共歼日军王牌师团 1000 余人，缴获轻重机枪 20 余挺，火炮 1 门，步枪 1000 余支，击毁汽车 79 辆，马车 200 余辆，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国民党政府称："此为华军在平绥线之空前胜利。"它有力打击了敌人不可一世的疯狂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和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参加平型关战斗的红安籍指战员，除担任主攻任务的张仁初和周世忠外，还有 115 师卫生部政委吴大明，344 旅司令部作战参谋张竭诚，该旅 688 团副团长韩先楚、该团青年干事张绍基、卫生队看护长李其华、2 营教导员张天云等，他们带领部队或阻敌援兵，或追歼逃敌，或抢救伤员，都为夺取平型关战斗胜利做出了贡献。

接着传来的好消息是阳明堡炸毁日军 24 架飞机。这次战斗是 129 师 385 旅 769 团打的。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29 师直属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和辎重营，以及 385 旅直属机关和下辖 770 团均留守陕北，列入了八路军留守处建制。129 师其余部队于 1937 年 9 月 30 日出发，渡过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是最后一批渡河部队。在此之前，师长刘伯承因要去太原与阎锡山会谈 129 师给养和参



平型关战斗最激烈的地点——老爷庙附近的峡谷沟道

战问题，就带领769团先行一步。

769团是由原红四方面军四军10师改编的。随着部队缩编，师长陈锡联改任团长。这位22岁的团长，却有8年军龄，7年党龄。那时我军建军才10周年，他算得上军人中的“老资格”。陈锡联带兵打仗，有勇有谋，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钢炮”。刘伯承同四方面军一起长征时，就知道这位“小钢炮”，但没有机会单独交谈。没想到这次出征，师长和团长要相处一段时间了。刘师长想利用这次机会帮助提高一下这位年轻的指挥员；陈锡联高兴之余，觉得机会难得，决心向师长好好学习，细心聆听他的教导，提高自己摆阵布兵打仗的本领，特别是面对新的敌人——像野兽一般疯狂的日本侵略军，更要提高指挥作战的水平。

一路10多天，只要有时间，刘师长就与陈锡联交谈。话题是从阎锡山忻口防御战的布防开始的。刘师长引导陈锡联一步步明确我军的战略战术。他对陈锡联说：“别看阎锡山保卫太原的口号喊得很响，但他自己根本没有信心。从忻口的防御就可以看出来。你不是也在场听了阎长官的介绍吗？他在忻口的布防，俗称“三珠串线”的野战防御阵势。以2个军和5个师组成所谓中央兵团，防守忻口山岭；以1个军1个师和1个独立旅组成所谓左翼兵团，控制云中山；以1个军2个师组成所谓右翼兵团，部署在滹沱河左岸一线。这样，便形成以忻口为轴心，左右连接云中山、五台山的横向防御阵势。这么一个机械的阵势，进失据，退失险，斜不能出击。地利的优势发挥不到一半……”说着说着，刘师长陷入忧虑之中。

过了一会，陈锡联问道：“师长，依你看怎样部署兵力才算妥当呢？”

刘师长说：“首先，改变防御体系。将单纯的横向防御，改为横、纵、斜向紧密结合的网状防御。忻口的地势是三峡两口，正适合网状防御。若这样，进入防御系统的日军无法避免横、纵、斜三个方面的攻击，必然三面挨打。其次，改变兵力结构，置少量精兵于正面，顶住日军的冲击。将主要兵力放在隐蔽和机动位置，形成突击之势。第三，在云中山和五台山准备几支战役预备队，袭敌侧后，使其首尾难顾。”

陈锡联听了师长的部署后，感到它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很有魄力和魅力，心中充满对师长的敬佩之情。不禁脱口而出：“可惜呀……”马上又戛然而止。刘师长看出了陈锡联的心思，笑着说：“你也不必唉声叹气嘛。虽然忻口防御计划有种种弊端，但国民党军队还在坚持执行，在防御兵力上占有优势，卫立煌和黄绍竑两位前线总指挥不算弱。忻口这一仗的结局暂不管

它，我们的责任就是打好配合。”

接着，刘伯承师长向陈锡联交代了作战任务。他说，129 师任务是要赶到原平县方向投入使用，打击日军后背。你们团的任务是在原平县东北侧击雁门关向忻口进攻的敌人。

10 月 15 日，刘伯承带领 769 团来到东冶。因要去八路军总部开会，他握住陈锡联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就在此地分手了，部队就归你指挥，责任可不轻啊，这是我们师出师后第一仗，胜负成败都对全师的士气影响很大，所以既要大胆，又要慎重，千万不要鲁莽行事，宁可仗打小一点，但要打好打响。”

说完，师长松开手，准备挥手告别。陈锡联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赶紧又请教一个问题。他说：“师长，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出击最为合适？”

刘师长笑了笑说：“锡联呀，兵无常形，不能一言概之。但你要记住最基本的一点，你们是单独行动，一定要有独立自主的意识。也就是说，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根据敌情我情、地形地貌等条件，抓住战机，果断行事，主动歼敌。”说完，师长最后又强调了一句：“与日军作战，关键的还是要有信心。”

陈锡联望着师长逐渐远去的背影，大声地说：“师长，你所讲的，我都记住了，请你放心吧！”

10 月 16 日，陈锡联带领 769 团深入敌后 100 余里，来到代县以南滹沱河南岸的苏龙口、刘家庄一带。从这里可以看到，日军的飞机不断地从滹沱河北岸起飞，对忻口、太原的国民党军队实施轮番轰炸。望着涂有太阳膏药旗的敌机低飞而过，一批又一批来来往往，陈锡联的心里一动：附近是不是有敌人的飞机场？他抓紧时间进行调查了解。开始，他找到一位从机场逃出的老乡，接着又找了几个溃逃的国民党士兵。他们告诉陈锡联：敌人的飞机场位于阳明堡镇南侧，共有飞机 24 架，分成 3 排，每排 8 架。白天起飞去轰炸忻口、太原，晚上全部停在机场上。守卫这个飞机场的是日军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大部分住在镇上，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约 200 人，住在机场的北面，飞机集中停放在机场的东南面。日军进攻到此，未受到过有力的抵抗，狂妄得很，因而警戒不那么严密，只有一些简单的防御工事。

敌情基本弄清楚了。陈锡联和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利、政训处主任丁先国一起研究，决定隐蔽进入机场，出其不意，突然袭击，摧毁敌人的

飞机场。这时，各营纷纷前来请战，要求团部下命令，干掉鬼子的飞机！好汉心思一般同。大家都想过一把打鬼子的瘾。陈锡联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想到师长临别时的叮嘱，不能打无把握之仗，便沉静下来了。他觉得突袭敌人机场要做到万无一失，还必须把战斗的每一步、每个细节搞稳妥，才有足够的把握取胜。于是，他亲自带着人去阳明堡镇侦察，亲自选择过河的渡口和进攻路线。侦察完后，再次召开团营干部会议，讨论和确定进攻方案和炸机方法。其具体部署是：3 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摧毁敌机；1 营阻击可能增援之敌；2 营作预备队。炸机方法，大家提出了很多，有的说火烧，有的说用机枪扫射，有的说用铁锤、锄头砸，有的说用手榴弹炸。经过比较，最后决定用手榴弹炸。不是单个投掷，而是将几枚手榴弹捆在一起，塞进飞机驾驶舱里进行爆炸。

10 月 19 日夜，在陈锡联的指挥下，各营按部署进入指定位置。红安籍参战的指挥员有：1 营副营长郑国仲与营长一起带领全营进入阻击阵地；2 营教导员李定灼与营长一起带领全营紧随团长行动，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3 营 10 连连长马忠全在营长赵崇德率领下，隐蔽摸进机场，并迅速做好战斗准备，掩护 11 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人警卫部队压制在掩蔽体内。然后 10 连全部扑向敌人飞机，将准备好的捆绑手榴弹一捆一捆地塞进敌机的机舱里。顿时一架架飞机爆炸起火，一团团火光腾空而起，映红了半边天。敌人的警卫部队疯狂进行反扑。我 3 营指战员与敌人展开肉搏。手握大刀的八路军勇士，怒火在胸中燃烧，刀柄上的红飘带在空中飞舞，与手持东洋刀的鬼子对劈对杀，几个回合，就叫小鬼子见阎王爷去了。激战中，营长赵崇德为掩护战友光荣牺牲。10 连连长马忠全主动起来指挥大家继续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反扑。驻扎阳明堡的敌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闻讯，出动快速部队增援。郑国仲、李定灼所在的 1、2 营，根据团长的命令稍作阻击后主动撤出战斗。当敌援兵赶到机场时，所看到的是一堆堆余火，横七竖八的死尸和满地皆是的飞机残骸，整个飞机场一片狼藉。日军联队长叽里呱啦问死里逃生的士兵，是什么人来袭击的，一问三不知，谁也不知道。机毁人亡，联队长只有带着问号回去报丧。

突袭阳明堡机场，从进入到结束战斗，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干净利落地将 24 架敌机全部击毁，并毙伤敌警卫部队及地勤人员 100 多人，创造了一个光辉战例。

阳明堡敌人飞机场被炸毁后，忻口、太原上空没有日军飞机轰炸。国民

党的下层士兵心里明白，一定是八路军炸掉了敌人的飞机，只有他们敢摸老虎的屁股。但国民党的上层不相信，要等调查证实以后再表态。事隔一天多，御用喉舌《中央日报》才在报纸的一角发了一则简讯："我军在晋北突袭阳明堡并炸毁敌机 24 架之消息，此间关系方面亦接到消息，业经证实云。"八路军以步兵用落后的武器击毁日军 24 架飞机，不但创造了中国军队抗日以来神话般的奇迹，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少见的。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让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兴高采烈，也令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表态，通令嘉奖八路军，并给 769 团发奖金。

我八路军总部、129 师师部当然是第一时间接到陈锡联的报告的。朱德总司令看了陈锡联的电报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 769 团打得漂亮。刘伯承师长看完电报后说，这个"小钢炮"真是说到做到，不放空炮。真的很快就为我 129 师打响了出征第一炮！然后，总部电令嘉奖了 769 团。师部对这次参加战斗的有功人员予以提升和重用。马忠全由连长提升为 3 营副营长，郑国仲由 1 营副营长调升为 3 营营长。

阳明堡战斗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五台山和太行山地区。当地老百姓





陈锡联和《新中华报》关于阳明堡大捷的报道

专门编了一首歌谣来传唱这一胜利。

万里长城万里长，
雁门关下古战场。
阳明堡里一把火，
鬼子飞机一扫光。

独立作战，出师大捷。陈锡联没有辜负刘伯承师长的厚望。从此，放牛娃出身的陈锡联在刘伯承麾下茁壮成长为一员重要将领。随着战斗的增多，陈锡联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半年后，129 师鉴于 385 旅旅部留在延安，决定组建新旅部，陈锡联任旅长。后来成立太行军分区，他任分区司令员。再后来成立太行军区，他任军区司令员。

八路军 115 师大战平型关和 129 师 769 团炸毁阳明堡日军飞机，取得首战日寇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扭转了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被动局面，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驰骋塞外　浴血太行

八路军在抗击日寇进攻的同时，遵照党中央“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不断向华北、华中敌后深入。形势的发展，需要大批干部。留在延安工作或学习的红安籍干部，纷纷奔赴前线。他们在打击敌人、开辟根据地的斗争中，尽展其才，很快成为统率一方的抗日军政领导人。

地处长城内外的晋察冀根据地，是八路军 115 师副师长（后称政委）聂荣臻率独立团、骑兵营等部队于 1937 年 10 月开辟的，辖有北岳、冀中、平北、平西、冀东 5 个区，先后成立了 13 个军分区。战斗在这里的红安籍干部有郭天民、詹才芳、李天焕、刘诚光、陈炎清、谢正荣、詹道奎、韩志凤、朱静轩等。

郭天民本在延安军委工作。但军人的本能驱使他坚决要求上前线，几次请战都未批准。最后他把请战书送到毛泽东手里才如愿以偿。离开延安时，毛泽东问郭天民：“不是找到对象了吗，怎么还不结婚？”郭天民回答说：“她还没有入党，组织上……”毛泽东说：“真把有些同志没办法！她不是个



作者(左二)1985年访问郭天民夫人窦克和女儿郭丽卿

东北流亡学生吗？跑几千里地来革命，还要人家入了党才准结婚？！你去跟政治部讲，就说我同意你们结婚。”说完，毛泽东诙谐地说：“结了婚把老婆带走。不要放在延安让我给你照顾呀。”就这样，此次请战出征，郭天民获得了双准。1938年8月，郭天民带着新婚妻子窦克到了晋察冀。开始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他觉得还是未到前线，又向聂荣臻司令请求到第一线。聂司令开玩笑说：“常言道不到黄河不死心，你这个人过了黄河还不死心，那就去支队当司令，再可以了吧？！”郭天民高兴地到晋察冀军区所属第2支队任支队长。后来随着根据地的扩大，第2支队兼第2军分区，他又兼任第2军分区司令员。2分区是晋察冀边区的西大门。五台山、娘子关、平型关等古来军事要地都在其境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时，总是反复扫荡2分区，妄图夺取这个咽喉地带。仅1940年，日伪军向2分区进攻达185次，平均每两天打一仗。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多么不容易！郭天民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广大指战员的奋勇，精心运筹，巧妙指挥，在这里坚持领导了6年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没有丢失一寸土地，还扩大了根据地，地方武装力量由2个连发展到8个团，各级党组织和政权都得到了发展，2分区成了模范根据地。百团大

战中，他在军区司令聂荣臻的指挥下，担任右路纵队指挥，一举攻下正太铁路的咽喉——娘子关，取得了百团大战的首战胜利。后来他任晋察军区司令员。

说到攻下娘子关，不能不讲谢正荣。12 岁就当红色游击队队员的谢正荣，1937 年 8 月红军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五台县游击支队任支队长兼政委，即率部到五台石佛寺与日军作战。1938 年 3 月，五台县游击支队编入晋察冀 2 分区 6 大队，谢正荣任该大队 1 营营长。1940 年 8 月，参加百团大战。6 大队与兄弟部队一起，在击破正太路后向阳泉以东的日军据点发起进攻，经 3 小时激战，攻下了这些据点。然后在分区司令郭天民指挥下，一举突破敌人把守的险要隘口——娘子关，歼灭了大部分守敌。战后，谢正荣的 1 营被评为模范营，他被提升为分区 4 团副团长。

陈炎清是红二十五军培养出来的模范连指导员、营教导员。1939 年春奉命调到晋察冀 2 分区 34 团任团长。从此改做军事工作。此时，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大举“扫荡”，敌人先是集中兵力“扫荡”4 分区。为了配合全区的反“扫荡”斗争，陈炎清率 34 团袭击敌军据点，将敌人梅花形据点内的中心据点拔掉了，引起敌人改变进攻部署，掉过头来集中兵力“扫荡”2 分区，并寻求与我主力决战。分区司令郭天民决定让陈炎清率 34 团进入阵地，做出决战的态势。到了夜晚，陈炎清指挥大部分兵力转移，留下小股部队引诱敌人。第二天拂晓，敌军发起进攻。我小股部队用重型武器还击，更造成敌人错觉，以为是我主力突围，于是数路敌军一齐猛攻。待战斗进入白热化时，陈炎清将部队全部撤出，让四面合围之敌火并。敌人自食苦果，其“扫荡”计划便不了了之。陈炎清第一次指挥一个团的部队与强大的日军作战，表现出的不光是勇猛还有谋略，受到了分区领导的表扬。

像陈炎清这样军政兼备的干部还有詹道奎。他是 1938 年从延安到晋察冀军区所属的机动部队——第 5 支队 26 团的，时而任团政委，时而任团长，时而军政一肩担，可说是位全才。可惜在 1941 年 12 月反“扫荡”作战中不幸牺牲。他将一腔热血洒在了塞外的抗日战场上。

红军时期任过军政委的詹才芳和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天焕，经过抗大学习后，詹才芳调任晋察冀军区 3 分区副司令，李天焕任 5 分区政委。他们杀敌不减当年勇。詹才芳与军分区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部队与敌人进行大小 600 多次战斗，共歼敌 9000 多人，后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他是第一个出

关，在东北土地上与鬼子浴血奋战的红安籍将领。与他同时踏上黑土地的还有刘诚光。1938 年刘诚光从延安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开始任冀热辽挺进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后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 12 团政委，在他的领导下，12 团由几百人迅速发展到 2000 人，成为很有战斗力的主力团。冀东军分区像一把刀子插进了北京、唐山、承德至锦州等日军重要据点中间。敌人对该分区频繁进行“扫荡”。刘诚光率 12 团与兄弟部队一起，粉碎了敌人多次“扫荡”，共歼敌数千人。1942 年 4 月，刘诚光率部在河北与辽宁交界地区进行反“扫荡”作战，遭优势敌人包围。为保存有生力量，他带领少数人掩护大多数人突围，直战斗到弹尽粮绝，死也不当俘虏，带头跳崖，壮烈牺牲。

115 师大战平型关之后，沿长城边逐渐向南发展。师部奉上级命令，以 344 旅为主组成的八路军第 2 纵队，南下开辟冀鲁豫边区。这时的韩先楚是 344 旅副旅长、代旅长，在开辟冀鲁豫边时，他率部征战，一举攻克威县县城，歼灭伪军 1 个军部和 1 个师，重创敌伪，很快打开了局面。冀鲁豫边是八路军南下山东和华中的桥头堡，中央决定成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韩先楚在创建这块新的根据地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冀鲁豫划归晋冀鲁豫军区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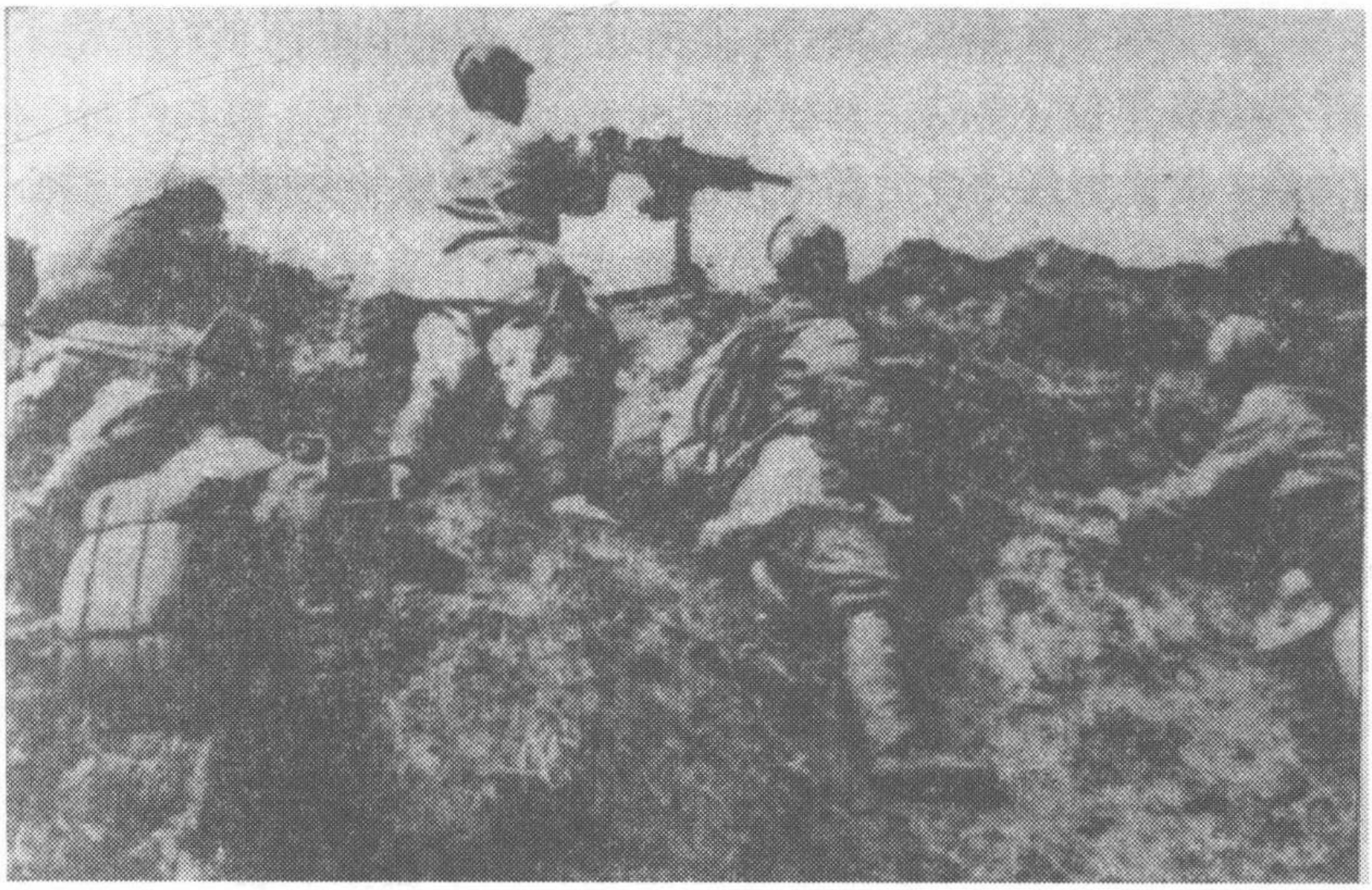
129 师创建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后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从 1938 年到 1940 年上半年，主力部队发展到 9 个旅，先后成立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 4 个军区，辖 16 个军分区。战斗在这里的红安籍干部最多，几乎遍及各单位。

在师直：周光坦任师政治部生产部长，况玉纯任骑兵团政委，熊心乐任特务团参谋长。

在各旅：韩先楚任新 3 旅旅长，张旭任 8 团团长；徐深吉任新 4 旅旅长，徐绍华任 771 团团长，夏祖盛任 2 团政委，王成忠任政治处主任，刘福胜任 3 团政委；陈锡联任 385 旅旅长，谢富治任政委，郑国仲任 769 团团长，马忠全任该团营长，韩卫民任 14 团参谋长；金世柏任 386 旅武装动员科长，程悦长任 772 团政委，阙子清任副团长，胡裕文任政治处主任，闵学胜任 18 团团长；邹国厚任新 7 旅副旅长，李定灼任 19 团团长，徐绍恩任 20 团团长，王进前任 21 团政委；王近山任新 8 旅副旅长，周光策任参谋长，蒋洪钧任 24 团政委；杨宏明任新 9 旅副旅长，赵鹤亭任 26 团团长；秦基伟任新 11 旅副旅长。这些旅团干部在红军时期练就一身硬

本事——拼，打起鬼子来个个都是拼命三郎。看看他们在百团大战中争夺制高点的那股子拼劲，就能窥见一斑。

1940 年 8 月 20 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 129 师、120 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发动了以袭击正太铁路（从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因参战部队达 105 个团，故称之为百团大战。在这个规格大、持续时间长（5 个多月）的战役中，129 师承担的任务是战役重点——破坏正太路。师长刘伯承给 385 旅旅长陈锡联下达命令，要他夺取并控制战役制高点阳泉狮垴山，以保证我师对正太路进行彻底击破。陈锡联接到命令后召开团长会议，下达作战任务。769 团团长郑国仲要求将任务交给他们团。8 月 20 日晚，战役全面打响。郑国仲令 3 营夺取阳泉车站。3 营长马忠全指挥一连进攻，2 连配合，3 连侧击。敌人凭碉堡和建筑物顽强抵抗，我军几次强攻未能得手。在战斗的关键时刻，马忠全有个标志性动作，挽起袖子举起手枪，在空中画个圆圈，表示他要带头冲锋了。全营指战员一看，营长的眼睛都红了，带着 3 连冲在前面，副营长、教导员带 1、2 连从两侧，一齐猛攻。敌人的碉堡垮了，建筑物也挡不住了，不到半小时，阳泉车站就拿下了。郑国仲借势发力，令 3 营坚守车站，1、2 营夺取制高点狮垴山。失去阳泉车站和其他据点后，狮垴山的敌人孤立了。当郑国仲指挥 1、2 营再次发起攻击时，狮垴山的敌人开始溃逃。769 团的指战员穷追猛打，歼敌大部。郑国



坚守狮垴山的勇士们

仲率 769 团主力控制狮垴山后立即修复工事，准备反击敌人进攻。从 21 日起，敌人每天出动数百上千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对狮垴山猛烈反攻。郑国仲以正面阻击、侧面出击等灵活战术，先后打退了敌人 20 多次进攻，毙伤敌数百人。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坚守了 7 天 7 夜，保证兄弟部队完成了破路任务。战后，八路军总部和 129 师师部分别通电嘉奖。彭副总司令称赞说："守卫狮垴山的部队英勇顽强，打出我军的威风，为夺取战斗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8 年下半年，在各地活动的我军开始建军区和军分区。一批红安籍干部既是战场上的指挥员，又是各根据地行政区的军政首长。他们是：

在太行军区：秦基伟任 1 分区司令员兼地委书记，秦忠任供给处政委，梅宏德任卫生处政委；刘昌毅任 3 分区参谋长；熊心乐任 5 分区参谋长，潘阳泰任卫生处长，王诚汉任分区 1 团团长；李少清任华北义勇军参谋长；韩卫民任 6 分区参谋长，胡裕文任政治部主任。

参加过黄麻起义，任过红军师长的秦基伟，抗战爆发后，奉命到山西太谷县，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军事教官的公开身份举办抗日游击训练班，组建抗日游击队。不到一个月发展了 300 多人，两个月后又发展到 600 多人。太原失陷后，129 师副师长徐向前赶到太谷，将几支游击队合编为独立抗日游击支队，秦基伟任司令，赖际发任政委，对外称秦赖支队。秦基伟在时隔一年以后与老首长徐向前重逢该有多少话要讲。时局危急，只能谈战事。徐向前对秦基伟说，你们的游击支队是太行山组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一定要把队伍带好，站住脚跟，打出威风来。秦基伟表示坚决做到。一年后这支队伍像滚雪球似的发展到 5000 多人。他们神出鬼没，不断袭击敌人的据点，炸碉堡，毁铁路，伏击"扫荡"日军，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还配合 129 师主力粉碎了 3000 多日军分 9 路对晋东南的大规模"围剿"，取得了很大胜利。

一分区地处正太、平汉两铁路的要冲地带。日军在此遍设据点，频繁"扫荡"，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和"囚笼政策"。在这块根据地里坚持斗争实在不容易。秦基伟根据上级指示，以过人的胆识，领导军民积极开展三大斗争（反"扫荡"、反"封锁"和袭击敌据点破坏交通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仅 1942 年，开展三大斗争所进行大小战斗达 1200 多次，毙伤俘日伪军 1700 多人，使根据地和游击区不断扩大。

在太岳军区：谢富治任军区副司令员，后因司令员陈赓去延安学习，任

代理司令员。谢富治过去一直搞政工，称得上是做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抗战把他推上了军事指挥员的岗位。在太岳军区工作的还有：王近山任2分区司令员，徐绍恩任该分区20团团长；黎锡福任3分区57团团长；金世柏任4分区豫北义勇军政委，闵学胜任豫北义勇军副司令员。

王近山是由8旅副旅长升任386旅旅长兼2军分区司令员的。他善捉战机，战则必胜，有三天打两仗，两次全胜的传奇。

那是1937年下半年，时任386旅772团副团长的王近山，从旅长陈赓那里接受战斗任务，在山西平定县七亘村设伏，以400战士消灭300日军，缴获300多匹骡马驮运的军用物资。这次战斗成为八路军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兵家说“胜战不复”。王近山一反常规，第三天在同一地点附近继续伏击，再歼敌100多人和数十匹骡马驮运的物资。刘伯承师长接到报告后高兴不已，称赞说：“这个王近山敢于打破常规打胜仗，是好样的！”更令人赞叹的是，1943年10月，臭名昭著的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太岳军区实行“铁磙式扫荡”。王近山带一个团护送一批干部去延安学习。途经韩略村时，见地势险要，好打伏击战。他认为能消灭敌人就是命令。就主动在韩略村附近设伏，歼敌“战地观战团”军官100多人，其中有少将旅团长1名，大佐联队长6名，打乱了敌人“铁磙式扫荡”计划。到达延安后，毛主席接见他们时，赞扬王近山勇敢、果断、有胆略，能抓住战机打漂亮仗。

在冀南军区：徐深吉任青年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率部与敌人作战百余次，歼敌3000多人。青纵后来改编为新编第4旅，他任旅长兼3军分区司令员，李定灼任副政委。徐深吉虽行伍出身，但一副书生模样，部队这所大学造就他能文能武，被调到抗大6分校任校长，为根据地培养输送了一批军政干部。他离开后，由周光策继任3军分区司令员，甘思和任滏西支队政委。

杨宏明先任新编第9旅副旅长，后兼任4军分区司令员。王进前任分区11团政委。1942年4月，4分区机关所在地突遭敌人“铁壁合围”。杨宏明趴在屋檐上一面指挥部队作战，一面架起机关枪猛扫敌人。经过血拼血战，杀出一条血路。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分三路冲出了合围。当他带一部分部队到达布寨时，又被数倍于己之敌包围。再次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2岁。

赵义京任5军分区司令员，涂锡道任政委，刘福胜任副政委，吴大明任

分区 19 团团长。赵义京是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由师通讯队队长升至军分区司令。他所在 5 分区斗争复杂，日军猖獗，杂牌武装假借抗日名义横行乡里。他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将大部分杂牌军争取改造过来了，对少数与人民为敌的则予以打击，巩固和发展了 5 分区地盘。1943 年 8 月，5 分区在枣强县小白庄召开全区大队长以上干部会，遭到日伪军 2000 多人的包围袭击。赵义京指挥部队连续 3 次突围。第一次突围歼伪军一个中队。第二次突围击溃了一部分敌人。第三次突围后，他听说村里还有少数干部未出来，毅然带上警卫员、通讯员等 6 人冲进村去，被敌人团团包围。赵义京带 6 名战士与敌人肉搏。他夺过敌人的战刀一连砍倒六七个鬼子，自己也身负重伤。警卫员要背他走，他说："不要管我。我掩护你把文件带走。"警卫员走后，他在与敌人厮杀中壮烈牺牲，年仅 31 岁。英雄热血洒冀南，人民永远记得他们。现在邯郸烈士陵园展出了杨宏明、赵义京的英雄事迹。

邹国厚先任新 4 旅副旅长，后调任 6 军分区司令员。在抗战极其困难的岁月里，他根据上级指示，组织敌后武工队、小分队，开展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不断打击敌人，坚持和保卫了 6 军分区根据地。

在冀鲁豫军区：李天德任 2 分区基干团副团长，程绍祥任 4 分区新 4 路副司令员。

1944 年 5 月，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组成新的冀鲁豫军区，下辖 12 个军分区。到新军区任职的红安籍干部有：刘福胜任 5 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赵鹤亭任 7 分区 22 团团长，况玉纯任 9 分区骑兵团团长兼政委，吴大明任 10 分区司令员。

同年 10 月，在延安成立了河南人民抗日军，挺进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又调了一批红安籍干部到该军工作。其中团以上干部有：戴季英任军政委，叶再元任供给部长，熊心乐任 1 支队参谋长，王诚汉任 1 支队 35 团团长，闵学胜任 2 支队副支队长兼 18 团团长。

挺进山东　力挽狂澜

1937 年 7 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后，日本侵略军沿津浦路南下，进犯山东，国民党军队不战自退，日寇长驱直入，齐鲁大地沦入敌手。危难中，山东的爱国军民在共产党各级地方组织的推动下，纷纷揭竿而起抗

击侵略军。为支援山东人民抗战，1938 年 4 月，八路军总部命令 115 师、129 师各一部向山东挺进，与山东人民一起挽狂澜于既倒。八路军各个部队深入农村开辟山东敌后战场，先后创建了鲁中、鲁南、清河、滨海、冀鲁边、胶东等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山东分局和两支主力部队——115 师和山东纵队。

115 师由师长林彪（未到职由 343 旅旅长陈光代理）、政委罗荣桓领导。下辖东进抗日挺进纵队、344 旅、独立支队和直属团、支队各 1 个。在 115 师各部任职的红安籍干部有：周纯全任抗大一分校校长，张天云任 344 旅 687 团团长，韩先楚任 689 团团长，周世忠始任该团营长后任副团长，张竭诚任团参谋长，张仁初始任直属 686 团副团长，后任教导 2 旅副旅长。

山东纵队是由八路军第 1 纵队与山东纵队组成的（主要部队来自 129 师），开始由徐向前任纵队司令员。后由张经武任纵队指挥。下辖 6 个支队、1 个军区和直属特务团。红安籍干部王建安任副总指挥，徐斌洲任 2 支队政治部主任，胡奇才任 4 支队政委，卢燕秋任 5 旅 13 团副团长、代团长，王吉文任直属特务 3 团团长。在八年抗战中，他们转战齐鲁大地，为创建和保卫山东各个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鲁中、鲁南、鲁北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 年春，王建安抗大毕业去山东，任津浦支队指挥。这位红军时期的军政委，面对气焰嚣张的日寇，巧打妙击，在山东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与兄弟部队一起很快打开了鲁中的抗战局面。不久，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山东纵队，他任纵队副指挥兼一旅旅长，一年后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2 年 10 月，日伪军对山东根据地由频繁的“扫荡”发展到“拉网合围”，企图摧垮我山东抗日领导机关。11 月初，王建安率军区机关转移时，敌人从四面八方扑来。军区机关只有一个特务营掩护。王建安当机立断，命令特务营长率部抢占对崮山，居高临下，打击敌人。王建安亲登山顶指挥阻击。经过一天激战，特务营打退了敌人 8 次冲锋，坚持到天黑，使军区机关得以安全转移。1943 年 3 月，王建安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鲁中军区司令员。伪军吴化文部屡犯鲁中区。不灭掉此敌，鲁中难以巩固。他指挥鲁中军区部队发起三次讨吴战役，将吴部 1 万余人基本消灭。消息传到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鲁中讨吴战役胜利》的社论，指出“这次伟大的胜利，不但对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很重要，而且是敌后战场上

我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行动的一部分。”

说到鲁中区，在早期的开辟工作中还有一位红安籍干部功不可没。他就是胡奇才。1937 年 12 月，胡奇才作为 129 师 385 旅 770 团副团长，奉调去延安抗大学习。1938 年 11 月毕业后，奉命与同乡战友徐斌洲从延安带领干部大队 160 多人到山东战场，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 4 支队政委。在纵队领导下，4 支队与 1、2 支队一起，在山东中部的泰山、沂蒙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直接威胁济南及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线，引起日寇恐慌。1939 年 6 月，敌人调集 2 个半师团共 20000 余人进行大规模“扫荡”。在 1 个多月的反“扫荡”作战中，胡奇才率 4 支队与敌人作战 20 多次，同兄弟部队一起共毙伤敌 1000 多人。到 7 月中旬，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战后，1、2 支队进入淄河流域，将根据地向东扩展。4 支队留泰山地区坚持斗争。8 月间，胡奇才率部向津浦路泰安至大汶口段出击，一度中断了敌人的交通。日寇集结 2000 多人对泰山区进行“扫荡”，胡奇才凭借山区优势，又给敌人以重创。1940 年 5 月，为配合鲁南反“扫荡”，胡奇才带 4 支队频频向博



1945 年 6 月，胡奇才率鲁中军区部队在山东临朐冶原一举歼灭日军一个小队。这是当时胡奇才亲自拍摄的被歼灭日军现场照片。

山、莱芜、新泰等敌人据点出击，先后歼敌 300 多人。这些战斗，不仅支援了鲁南，保卫了鲁中，还打通了南与鲁南、北与清河区的联系。胡奇才为开辟鲁中区做出了贡献，1941 年升任山东纵队第 1 旅副旅长。胡奇才在山东抗日留下很多佳话，其中有一首歌谣专门唱他打鬼子。1987 年 10 月 12 日，时任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在山东视察时，临朐县一位七旬老汉跟他唱了这首歌谣：

胡奇才，真勇敢，
指挥八路攻冶原。
打死鬼子三十三，
活捉一个翻译官。

抗战胜利已经几十年了，人民群众始终不忘抗日有功的人民子弟兵。迟浩田不仅记下了这首歌谣，还把它写成条幅赠给胡奇才将军作纪念。

张仁初是 115 师直属 686 团团长。挺进山东后，在开辟鲁南根据地时，敢打敢拼，不断取得战绩。1940 年 2 月，他率部与师特务团、苏鲁豫支队一起，一举攻克鲁南山区的交通要冲、日寇的重要据点——费县西部的白彦镇。敌人为夺回白彦发动了 3 次大规模进攻，均被我军打退，并解放了费西地区。战后，张仁初任鲁南支队队长兼 686 团团长。四五月间，又粉碎了日寇 8000 人的大“扫荡”，开辟了费北山区。8 月，115 师兵分两路：一部向西开辟了邹县、藤县、曲阜、泗水地区；一部向东，由张仁初带领的 686 团开辟了临沂、郯城、赣榆地区，打通了鲁南向滨海的通路。至此，鲁南区已初具规模。

在开辟和巩固鲁南根据地的战斗中，还应提到王吉文。1939 年他任山东纵队特务 3 团团长，挺进山东滨海地区与日军作战。1941 年他的部队编入 115 师教导 1 旅，任该旅 3 团团长，来到鲁南战场，成为这个地区的骨干武装力量。1943 年，3 团隶属鲁南军区。他在军区的领导下，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鲁南有两股惯匪，抗战前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抗战后他们投靠日寇，更是气焰嚣张。鲁南军区决定消灭这两股“惯匪+伪军”的双料敌人。这项作战任务军区命令 3 团去完成。王吉文根据两股匪伪的不同情况，采取逐个消灭的战法。首先出击盘踞在泗水县的张显荣。此人狡诈，不易得手。王吉文就用智擒。他用欲攻故走的战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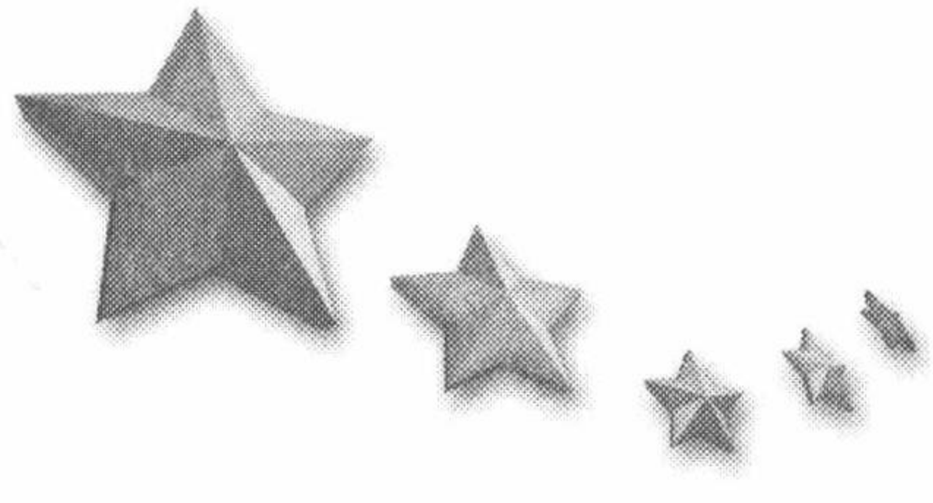
放下张匪所在的据点不打，而去 80 里外攻打他的另一个小据点。白天，他将全部人马拉上去，佯攻一天，夜晚则将大部人马撤到指定地点待命。让小据点的匪徒去向张显荣报告求援。张信以为真，放松了警戒。就在张匪进入梦乡时，王吉文率部远程奔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张显荣的围砦炸开，碉楼炸塌，部队猛冲进去活捉了张显荣，并将附近的大小据点一起端掉，共歼匪伪 1300 多人，开辟了邹（县）泗（水）根据地。对盘踞在费县西南的另一名惯匪、伪第十军第 3 师师长刘黑七所部，王吉文则采取强攻消灭之。他派人反复侦察，摸清地形兵力布置，然后组织强大火力猛攻，还挑出百多名精兵强将组成“尖刀队”，直插敌人心脏。刘黑七见大势已去，落荒而逃，被追击部队击毙。这次战斗，共歼敌 1000 多人。战后山东军区通令嘉奖。这两股匪伪军被彻底消灭后，鲁南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徐斌洲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纵队 2 支队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任 3 支队政委。他与支队司令杨国夫为开辟山东北部的清河地区费了一番周折。1939 年 3 月，3 支队在粉碎日伪军对小清河南部地区的春季大“扫荡”后，6 月间突遭敌人合围袭击。3 支队与敌激战，分散突出重围，转至胶济路以南的山区打游击。年底，3 支队重返清河区。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再到清河，徐斌洲与支队司令以百倍的警惕和仇恨打击日伪军。1940 年上半年，3 支队在粉碎敌人 3 个月的“扫荡”之后，打开了小清河北面的局面。然后多次设伏歼击日伪军，其中由徐斌洲指挥的魏家铺歼灭战，毙伤敌伪 400 多人。日伪军不断遭到打击，只好撤掉高苑镇境内的所有据点。7 月，3 支队又粉碎了敌人对博兴、广饶、临淄地区的大“扫荡”，同时打退了鲁北国民党顽军的多次进攻，从而巩固了清河根据地，并向东部沿海垦区发展。1941 年徐斌洲调任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粉碎敌人万人“拉网合围”大“扫荡”战斗。战后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成立渤海军区，他任渤海军区第 4 分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纯全，在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时，认真检查了自己所受的影响，主动请求免去总政副主任职务到抗大学习。毕业后改做干部教育工作，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抗大一分校有过两次大迁移，周纯全都参与领导其事。第一次大迁移，他和校长何长工带 3000 多名教工学员，从陕西延长县迁到太行山，行程 2000 余里。不到一个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迁移。朱总司令点将，要周纯全再带 3000 多名教工学

员，由太行山迁至山东沂蒙山，行程又是2000多里。两次迁校沿途通过敌人无数道封锁线，打了大小几十次仗，无一伤亡，均胜利到达目的地。抗大一分校的两次大迁移，被誉为两次小长征，周纯全抓住这两次机会锻炼和提高了教工学员的军政素质。抗大一分校迁到山东后，周纯全任校长，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政干部。直到抗战后期周纯全才被调出抗大转做地方政府工作，任渤海地区行署主任。

八路军各部队与山东人民一起，经过几年苦战，先后开辟了鲁中、鲁南、清河、胶东、滨海5个地区，成立了4个军区和滨海独立军分区，形成了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继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之后，八路军开辟的又一重要抗日根据地，也是八路军东进南下华中抗战的重要前沿阵地。在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红安籍将领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第六章　叱咤华中寇心惊

“皖南事变”惊中外，重铸七剑耀华中。徐绪奎血染黄桥。熊应堂杀出重围。刘飞芦荡播火种传奇沙家浜。张天云率“钢铁团”砸遍敌据点。戴季英智击桂顽。郑位三主政淮南。罗应怀血战朱家岗手折脚断。罗厚福宁死不离大别山。李先念单骑走豫鄂，抗日大旗一展五万兵。

东进抗日　顽造奇冤

再说新四军在华中抗战。

新四军是由福建、浙江、广东、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等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未改编之前，他们分散活动于这 8 个省的广大地区，多半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将这些分散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改编，并非易事。而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便衣队的集中改编就更为奇巧。

事情得从内战后期说起。1936 年秋季，“清剿”鄂豫皖共产党和红军的国民党第 11 路军某团有个叫姜术堂的少尉排长，携枪械到皖西潜山县万山游击队，要求参加红军。当时斗争环境十分恶劣，接纳他不合适。因此，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规劝他回北方老家。行前何耀榜对姜术堂说，如果你想为革命做点事情，就帮我们给红二十五军带封信。姜术堂没有找到红二十五军，却找到了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后改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了鄂豫皖红二十八军的情况。从此，红二十八军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专门接见了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毛泽东说：“请你们 4 位同志来，就是派你们到鄂豫皖去找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同志。郑位三、萧望东同志为党中央的代表，由你们前往向红二十八军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指示。张体学和程启文同志负责联络工作。你们两位必须先行一步，待找到高敬亭同志联系好后，再安排位三和望东同志与高敬亭同志会面。”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关心红二十八军，是因为这支红军三年来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极其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保存下来了。他觉得非常了不起。所以当他知道红二十八军的情况后，就立即派代表前去联系。接见完后郑位三等开始起程。他们是延

安较早派到全国各地去的抗日干部队伍之一，郑位三是红军长征后第一个回故乡的红安籍高级将领。

从陕北到鄂豫皖，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们长途跋涉两月有余才到达。就在这两个多月中，鄂豫皖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那个姜术堂走后将近一年，1937 年 6 月底，他奇迹般地出现在岳西县大岗岭。那天下雨，山林雾气蒙蒙。夏克放哨，看见一个人在树林里走来走去，觉得可疑，经盘问，他是来送信的，要见何耀榜。夏克一检查都是油印的信件，觉得重要，就带他去见何耀榜。何耀榜一看是姜术堂回来了，非常高兴。何耀榜再看信件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何耀榜将这些文件给了当时鄂豫皖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高敬亭。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三年之久的高敬亭，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这些文件，认识到与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重要。他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作出决定：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卫立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判倡议，很快得到对方的响应。7 月 15 日，高敬亭派何耀榜作代表，卫立煌派刘纲夫作代表，双方开始接触，22 日正式谈判，27 日达成协议。在谈判过程中，高敬亭高度警惕，提出以七里坪为红军和便衣队的集结中心，国民党军队必须撤到离七里坪 50 里以外的地方去。可以看出，高敬亭时刻提防着国民党做出不利于红二十八军的事情来。

谈判是在皖鄂边界的岳西县青天畈汪氏祠堂进行的，并达成协议。8 月上旬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分赴鄂东北，始到天台山，然后向七里坪集结。高敬亭与军部驻福德乡蔡家塝祠堂。当郑位三等于 9 月上旬辗转来到七里坪时，红二十八军已基本集结完毕，便衣队尚未集拢。国共谈判代表就一些未尽事宜在七里坪继续谈判。

红二十八军和便衣队集结完后，郑位三和高敬亭商量，在七里坪西的秦氏祠堂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轮训红军和便衣队的各级干部，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其目的是做好广大干部工作，真正从思想上由内战转变到抗战方面来，然后通过他们去做好广大战士的工作。这个思想上的急转弯转得好与不好，事关部队今后的行动。所以，郑位三倾其全力去做。在此前后，中央又派来聂鹤亭、余立金等一批军政干部，协助郑位三办好干训班。在集训干部的同时，红军和便衣队还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练兵运动。根据地群众掀起了拥军参军热潮。红安有不



1985年4月，作者在合肥访问原4支队老干部与他们合影。右起：叶厚弟、刘本华、杨辉明、县领导耿协楠、作者、肖仁。

少年轻人报名参军。

红二十八军干训班尚未结束，湖北省委也选择秦氏祠附近的横塝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省委派方毅前来与郑位三一起领导办班。青训班的任务是为全面开展抗战培养青年干部，共办两期，先后有400多名知识青年到七里坪学习。青训班于1938年的3月结束。郑位三又不顾国民党的反对，举办了党训班。为在4支队改编东进以后，恢复与发展地方党组织，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积蓄基层骨干力量。

这时的七里坪，抗日志士纷至沓来，抗日热潮汹涌澎湃，跟10年前黄麻暴动时的情形一样。当年无数的革命者从这里出发，推动了鄂豫皖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现在无数的革命者又从这里出发，去推动鄂豫皖抗日民族战争的发展。七里坪不仅是鄂豫皖红军的摇篮，还是新四军的发源地之一。

1938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长江局派参谋长叶剑英专程到七里坪督导红二十八军整训改编和东进抗日的准备工作。2月中旬，由红二十八军和各地便衣队改编的新四军第4支队在七里坪成立，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

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因病未到职，由戴季英接任）、供给部主任吴先元，下辖7、8、9团和手枪团，共3100多人。红安籍营以上干部有：新四军第4支队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政治部组织科长戴克明，政治部统战科长方忠立，供给部医务室主任戴醒群（女），7团2营副营长徐海珊，9团政治处主任郑重、9团供给处主任吴大胜、9团2营副营长吴大奎，手枪团3分队队长李世焱，4支队七里坪留守处军需主任郑植惠，4支队8团竹沟留守处教导队政委刘友海等。4支队成立后就积极准备开赴皖西抗日前线。

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沿津浦铁路分别从济南和南京出发，南北对进，进攻徐州。当南线之敌进至台儿庄时，遭到国民党5战区李宗仁部的顽强抵抗，使日军损失2万余人。台儿庄大战，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打得较为出色的一仗。虽取得很大胜利，但未能阻止敌人进攻。到5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不得不放弃徐州，大步后撤。于是江苏、安徽、河南大片土地陷入敌手。

在徐州准备会战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指示新四军领导人要抓紧时间，向敌人后方挺进，在长江以南的江苏苏州、镇江、南京和安徽芜湖、广德之间的广大地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然后，再分兵渡江，进入苏北和皖北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5月19日，徐州失守后，中央又要求新四军在鄂豫皖三省积极深入敌后，在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的创建抗日根据地。

根据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命令第1、2支队向苏南和皖南挺进，第3支队与军部留在皖南，但有一部分向繁昌、铜陵挺进，第4支队向皖中挺进。

1938年3月8日，新四军第4支队在七里坪召开誓师大会，东进皖西抗日。同郑位三一起从延安来的干部，只有程启文随军东进，因他被任命为由东北军流亡官兵近百人组成的抗日挺进团副团长。其他人暂留地方工作。郑位三调任鄂东特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先后组建了抗日游击第5、第6大队，汪进先任5大队副大队长，罗厚福任6大队大队长。这两个游击大队，是武汉沦陷后在鄂豫边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力量——新四军第5师的最初来源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

继4支队之后，七里坪在抗战初期，接连走出几支有影响的抗日部队，称得上是鄂豫皖地区新四军抗日的出发点和支撑点。像七里坪这样在中国革

命重要历史时期做出重要贡献的小镇全国不多。借地利之便，红安又有很多人从这里走向各个抗日战场。这批新生力量，像当年的红军一样迅速成长。

4 月，日军集中 10 万余兵力，企图先侵入皖中、皖西，然后掩护其主力西侵武汉。5 月中旬，日军先遣部队占领合肥继续西进。国民党第 5 战区廖磊部和杨森部，闻风丧胆，纷纷后撤，地方政权垮台，百姓四处逃难，江北的战局处于危急之中。

当此危难之际，张国焘利用清明节祭黄帝陵之名从延安出逃，叛党投蒋。党中央一再挽救无效后决定开除他的党籍。这个决定传达到 4 支队，高敬亭思想认识不清，行动上与军部不尽一致，排斥延安派去的干部，情况使人担忧。党中央和长江局决定派董必武到 4 支队做高敬亭的工作。从武汉到高敬亭的驻地安徽舒城县东蒋家冲，路程较远，且多山路，时局混乱，匪盗横行，一路难走。年过半百的董必武不顾个人安危，在 3 名工作人员陪同下，跋山涉水来到东蒋家冲，向高敬亭和 4 支队连以上干部传达中央决定，讲明事实真相，用七天七夜时间做高敬亭和有关干部的工作，终使高敬亭思想转变，表示一定听从军部指挥，搞好干部团结。董必武这才放心离去。返汉途中又翻山越岭到红安，听取郑位三等党的负责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汇报，指示要抓紧做好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准备工作。董必武舒城之行表明，在历史转折关头，他对大别山地区党和军队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抗日斗争是极其关心的。

为了抗击日寇，第 4 支队从安徽舒城继续向皖中地区开进。这时高敬亭身体有病留后方休养，由副司令戴季英和参谋长林维先带领部队东进。5 月上旬，4 支队所属 7、8、9 团和东北抗日挺进团在庐江、无为、巢县展开，其中东北抗日挺进团渡过巢湖，进至皖东的全椒、含山、合肥一线。至此，4 支队全部深入了敌后。

以巢湖为中心的皖中地区，河道纵横，芦苇丛生，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戴季英和林维先决定在此打响东进抗日第一枪。5 月 15 日，我侦察队获得情报，日军巢县守备队第二天将出发“扫荡”。戴季英、林维先令 9 团在敌人必经之地蒋家河口伏击敌人。16 日上午，日军巢县守备队 70 多人乘坐两艘汽艇向蒋家河口驶来，靠岸后敌人纷纷上岸。隐蔽在两岸河堤后面的我 9 团 2 营和团侦察队一齐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乱作一团，有的倒毙，有的落水，战斗只 20 分钟就胜利结束，共毙敌 40 多人，伤敌 10 多人，缴获长短枪 30 多支，我军无一伤亡。待敌增援部队赶来，我伏击部队已安全撤

离。这次战斗，是4支队开赴敌后打击日寇的第一仗，拉开了新四军抗战的序幕，戳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皖中军民的抗日斗志，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紧接着，程启文与团长一起率领东北抗日挺进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夜袭全椒县城，迫使日军从该城撤逃。4支队在皖中抗日打出了威风，也站稳了脚跟。

再说新四军另外三个支队。6月，陈毅率领第1支队在茅山以北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展开斗争。7月，张鼎丞率领第2支队在茅山以西的江宁、溧水、高淳和安徽当涂地区展开斗争。两个支队互相配合，一方面对宁沪、宁芜铁路和各公路沿线薄弱之敌展开袭击和破击作战；一方面发动群众建立带有政权性质的抗日自卫委员会和地方游击武装。经三个多月战斗，粉碎敌人20多次“扫荡”以后，到12月底，初步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第3支队一部也在繁昌、铜陵一带打开了局面。至此，新四军四个支队在大江南北敌后抗战已全面展开。

1939年春，为贯彻党中央向北、向东发展的方针，第1、2支队各抽出一部组成挺进队渡江北上。第1支队的第6团稍后又奉命向东部的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挺进，与当地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组成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简称江抗），下辖1、2、3路军。其中第3路军是上海地下党员梅光迪、刘史明等领导的游击队，不善于作战。他们要求派一位军政兼备的干部去加强领导。第1支队司令陈毅选中了徐绪奎，派他去江抗第3路军任参谋长。徐绪奎去后，从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觉悟、政策水平和军事素养入手，让部队逐步走上了正轨。同时，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干部、战士。每次作战，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通过言传身教，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他的带领下，不到一年，江抗3路军由百余人的游击队发展成一个正规团，在江苏武进一带抗击日寇，威震敌胆。有一次，武进南部数千日军进行大“扫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徐绪奎从容不迫，以多变的战术与敌人转战数天，打死打伤日军200多人。这是江抗3路军打的第一个胜仗，不仅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还增强了老百姓的抗战信心。1940年春，江抗3路军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2团，徐绪奎任团长、梅光迪任政委、刘史明任参谋长。梅、刘这两位地下党领导人，在徐绪奎的帮助下，迅速成长为能打仗的指挥员。

1940年6月，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推动下，江苏顽军向挺进扬州、泰州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四军江北挺进纵队发起进

攻。徐绪奎奉命率江抗 2 团北上增援，从此编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 2 纵队，改为第 9 团，徐绪奎仍任团长。7 月 29 日，陈毅、粟裕指挥 2 纵东进抗日，直指泰兴重镇黄桥。遭到江苏顽军保安第 4 旅阻挠。徐绪奎率 9 团与兄弟部队一起，一举歼灭了保 4 旅，排除了干扰。2 纵很快开辟了以黄桥为中心的大片抗日根据地。9 月 6 日，专搞摩擦不抗日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纠集重兵进攻黄桥。其急先锋保 1 旅向黄桥东北的营溪发起攻击。9 团奉命反击。徐绪奎率部与顽军展开激战。他冒着密集的炮火，带领部队直捣顽军指挥所。就在快要取得胜利时，一颗子弹夺去了他年仅 23 岁的生命。团长的牺牲，更激起全团指战员的仇恨，在“为徐团长报仇”的口号声中，一鼓作气歼灭了保 1 旅两个团，共 1500 多人。战斗结束后，2 纵司令员王必成将徐绪奎的一条军毯收藏起来作纪念。每当人们提到徐绪奎时，他总是泪水满眶地说：“他是个好同志，好党员，好团长，能打仗。是新四军东进时，我们 2 纵最得力的团长之一。”

与徐绪奎壮烈牺牲相比，叶道志之死发人深省。他在红四方面军当过 4 年师长兼政委，算是个军政全才。1938 年初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第 2 支队第 4 团任副团长。他认为安排不合理，虽然工作照样做，仗照样打，但思想不通，想离开新四军回到八路军中去工作。7 月 31 日，他以侦察地形为名离队出走，抓回去以后被军法处以叛变罪处决了。后来查明，叶道志问题的性质是违反纪律，不是叛变投敌。事过 45 年后的 1983 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一位早已露出头角的将领就这样消失了。军队是所大学校，人才辈出。但培养和造就一位团师级干部并不容易。培养出来了的人，随时有可能战死沙场，或作无谓的牺牲。在战争岁月里，红安籍师团级干部中，这两种结局的人都有，叶道志又是一例。

新四军在大江南北英勇杀敌，深受人民群众拥护，但国民党顽固派容它不下，诬蔑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战”，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舆论，并于 1940 年 10 月以参谋总长何应钦的名义发出命令，限新四军在 1 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党中央一面用新四军坚持抗战收复失地的事实，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诬蔑；一面为顾全大局，同意新四军撤出皖南，移师江北。但叶挺、项英对形势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行动迟缓，到 1941 年 1 月 4 日才率部从安徽泾县云岭出动北移。又遇连日大雨，行军受阻。6 日即遭到顽固派的重兵围攻。造成新四军军部及其新编 3 个支队共 9000 余

人除 2000 多人突围外，其余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和流散。军长叶挺被顽军扣押，副军长项英等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在“皖南事变”中，红安籍干部有牺牲者，也有幸存者，在幸存者中熊应堂、张志勇等都有感人的事迹。

熊应堂是延安派到新四军的首批干部。他先在军部教导队任教官，后调到 1 支队 1 团 1 营当营长。在创建苏南敌后根据地的斗争中，参加了小丹阳、溧阳、句容、朱门镇和破坏宁芜铁路等战斗，表现突出，升任 1 团副团长。1940 年秋，留在皖南的新四军进行整编，熊应堂任新编 1 支队老 1 团团长。老 1 团是军部的主力团。皖南事变中，部队在突出顽军包围时，老 1 团奉命在前面开路，熊应堂身先士卒带领全团杀出一条血路，但后续部队未能跟上，孤军落入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以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指挥部队与顽军血战几昼夜，全团人只剩下不足百人，仍冲出了包围，并掩护支队司令傅秋涛等安全转移到苏南。不久，他们又渡江北进，在安徽巢县、无为地区创建了皖中根据地。

张志勇是军部军法处派驻团部的特派员。“皖南事变”中奉命收集失散人员。他以惊人的胆略，两次出入顽军的大包围圈中，收集了大批失散人员，使那些无法归队的干部战士回到了部队。国民党特务化装成我军失散人员，混进收容队，妄图进行破坏。张志勇有意让他带路。特务邀功心切，往顽军方向走。未走多远，就被监视他的战士处决了。张志勇对做收容工作有一种特殊感情。这种特殊感情是由他的特殊经历产生的。他原是红西路军第九军 25 师的作战科长。1937 年春，西路军失败后被敌人俘去，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当兵的。国民党军队无法查对，但也不放他，留下继续当兵。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年后，1938 年 8 月，他随国民党军队由西北来到皖南后，乘其不备逃出虎口，回到了新四军中。有过失散的痛苦经历，所以他将收容工作做得那么成功。张志勇回到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后，被分配到第 3 师领导下的盐阜军分区盐东总队任总队长。在维护地方治安、巩固根据地方面颇有成绩。

重铸七剑　三剑在苏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为了坚持抗战和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

高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1941 年 1 月 20 日，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 月 28 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将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继续在大江南北抗击日寇。这七个师犹如七把利剑，插进苏、浙、皖、豫、鄂、湘、赣敌后，并创建了苏南、苏中、淮南、淮北、苏北、皖中和豫鄂七块抗日根据地。这七个师是：

第 1 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活动在江苏中部，开辟了苏中根据地。它的前身是原新四军 1、2 支队各一部组成的挺进江北的 1、2 纵队。红安干部徐绪奎生前就是 2 纵 9 团团长。此外还有郑重，他原是 4 支队 7 团政治处主任，后任淮南行署东南货物管理局长，有丰富的物管经验，被调到 1 师任供给部副部长，为 1 师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出了很大努力。

与 1 师密切相关、地域相连的是 6 师。

第 6 师由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和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成，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下辖 16 旅，另有在江南的 1 师 18 旅归 6 师指挥。6 师活动在江苏南面的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虞（山）锡（无锡）及茅山地区。这些地区临近上海和南京，敌我顽三方争夺十分激烈。为开辟苏南特别是苏常太和澄虞锡地区，我军几进几出。在艰苦曲折的斗争中，红安籍干部刘飞、戴克林等英勇顽强，足智多谋，留下了为人传颂的战斗事迹。京剧《沙家浜》脍炙人口，就是根据刘飞等人的事迹创作的。



1941 年，戴克林（左）与刘飞在“江抗”1 支队时合影。

抗战开始，刘飞调任新四军江南抗日救国军（简称江抗）政治部主任。离开延安前，毛主席接见了他们那批南下干部，叮嘱大家要“努力开创抗战新局面”。他牢记此言，率部在苏常太地区抗击日寇，参加夜袭上海虹桥机场，毁敌机数架。后升任“江抗”东路指挥部下辖第 5 支队司令员。在顾山战斗中身负重伤，被送

进阳澄湖后方医院疗伤。不久，“江抗”东路指挥部奉命率部西进。敌人趁此机会水陆并进，反复“扫荡”阳澄湖，妄图消灭新四军的伤病员。刘飞身卧渔舟，组织 36 个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在芦苇荡中与敌人战斗，并派人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以轻伤员为骨干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不仅保护了伤病员，还守卫了根据地。“江抗”东返后，指挥部领导通过地下党将刘飞送至上海就医，伤愈后出任 18 旅政治部主任，后任旅长兼苏中军区第 1 分区司令员。刘飞和伤病员们在芦苇荡中的传奇故事编成京剧后，使沙家浜闻名遐迩，成为人们争相观光的旅游热点。

刘飞赴上海就医后，戴克林任“江抗”东路指挥部第 1 支队队长，他率部来到澄虞锡地区，开展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他在红军时期，不论是正规军还是地方武装都干过，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指挥“江抗”1 支队打击日伪军，搞得有声有色，很受师长谭震林赏识。他的部队常随师部一起行动。6 师在苏南的活动，使南京、上海的敌人坐卧不安。1941 年下半年，大汉奸、卖国头子汪精卫乞求日军主子调兵 2 万人，对苏常太、澄虞锡地区进行梳篦式的“清剿”。6 师寡不敌众，除留下一部分武装坚持斗争外，主力撤至江北与 1 师合并，6 师番号从此不存在。戴克林先后调任苏中军区 1 分区江都独立团团长、1 旅 2 团团长，率部在苏中、苏南参加反“扫荡”、反“清乡”战斗，直到抗战胜利。

第 3 师活动在江苏北部，它是由八路军改编的。1938 年 2 月，115 师 344 旅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由正太路北进至晋东南。随军南下的红安籍干部有：韩先楚、张天云、张竭诚、梁业坤、戴修福、汪呈等。1940 年 5 月，344 旅分开行动：旅长杨得志与由 689 团团长升任副旅长的韩先楚奉命率 688、689 团开辟冀南根据地；政委黄克诚率 687 团继续东进豫鲁苏。1940 年 8 月，以 687 团为基础成立八路军第 5 纵队，黄克诚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领导开辟以盐城和阜宁为中心的苏北根据地。张天云原是 687 团参谋长、副团长。皖南事变后，第 5 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 3 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下辖 7、8、9 三个旅。张天云是 8 旅 22 团团长。在开辟和保卫苏北根据地的战斗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1 年 9 月，日伪军在郑潭口设据点，像钉子一样楔进了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拔掉这颗钉子的任务落到了 22 团身上。张天云率部担任主攻。战斗异常激烈。他亲临前线指挥。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攻克了郑潭口，全歼守敌 800 多人。战后，22 团被师部誉为“钢铁团”。此后，凡有硬仗恶仗

都少不了22团，少不了张天云。1943年2月至4月，敌人为夺取以盐阜为中心的苏北根据地，纠集2万多兵力进行“大扫荡”。当时，新四军军部驻盐城。3师的任务不仅要保卫根据地，还要保卫军部。形势十分严峻。军师两级领导研究决定用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战法粉碎敌人的“大扫荡”。内线作战不仅艰巨而且危险，哪个部队担当此任为好？师领导反复斟酌，决定由22团所在的8旅担此重任。此时，张天云已升任副旅长，他和旅长采取“牵牛转圈”的战术，拖着“扫荡”的日伪军在根据地游来游去，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然后实行反击作战。在外线部队的有力配合下，将2万敌人“大扫荡”粉碎了。这次战役历时2个多月，大小战斗达600多次，毙伤日伪军1800多人，攻克据点30多处，缴获各种枪500多支，子弹1万多发，挫败了敌人消灭新四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并控制苏北的企图，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战后，各军分区、地方武装进一步发展。当年随八路军来苏北的红安籍干部，被分配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他们是：张志勇调任3师直属政治处主任，张天云任8旅旅长兼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梁业坤任该分区下辖涟东总队总队长，汪呈任总队政委，戴修福任盐东总队副总队长，张竭诚任淮海军区第3支队司令员。一次，敌人以重兵“扫荡”淮海分区，正在党校学习的张竭诚，奉命回部队指挥反“扫荡”战斗。他曾在团部和旅部当过8年参谋，懂得以计制敌。在持续20多天反“扫荡”战斗中，他带领部队避实击虚，让敌人在新占领的地区修炮楼，安据点。待敌人疲劳松懈时，猛杀回马枪，将敌人所设据点一一拔掉，共歼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两个大队，取得了反“扫荡”战斗的重大胜利。

第1、6、3师全体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是开创了苏中、苏南和苏北三块根据地，像三把利剑插进了江苏敌后。从此，江苏的抗战局面朝着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敌人的方向发展。

三剑在皖　敌忾同仇

第2、4、7师这三把利剑指向安徽和皖苏边，开辟了淮南、淮北、苏皖边和皖中根据地。他们在江淮大地上活跃如龙，勇猛似虎，为了民族和国家，杀敌反顽，一往无前。

第2师由江北指挥部所属第4、5支队编成，有着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

1938 年 3 月，第 4 支队从七里坪出发，由皖西到皖中，边打边进。在高敬亭、戴季英指挥下，先后进行了蒋家河口伏击战、安（庆）合（肥）、六（安）合（肥）公路出击战和攻克无为、庐江等大小战斗 90 多次，共毙伤日军 1700 多人，歼伪军、土匪武装 3700 多人，缴枪 1400 多支，轻机枪 17 挺，击毁汽车 156 辆，取得了很大战绩，迅速打开了皖中敌后抗战局面。就在第 4 支队准备创建以舒城、庐江为中心的皖中根据地时，国民党令其撤出皖中开赴津浦路东。新四军领导人受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错误主张的影响，也令第 4 支队东进。高敬亭不愿退出自己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皖中，迟迟不肯出动。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就向第 5 战区诬告第 4 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第 5 战区转报蒋介石。蒋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廖磊将这一电令交新四军军部处理。新四军的领导人也认为高敬亭“不服从上级命令”，在未经请示我党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于 6 月 24 日在合肥县青龙厂将高敬亭枪毙了。这样急急忙忙处理高敬亭当然是错误的。4 年后的 1943 年，毛泽东跟到延安党校学习的原 4 支队 8 团团长周骏鸣讲：“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不好吗？”36 年后的 1975 年 12 月 14 日，毛泽东又在重新审查高敬亭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在毛泽东生前过问下，1977 年 4 月 27 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蒙冤 38 年的高敬亭终得昭雪。

在处理高敬亭问题前后，新四军军部决定成立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长，徐海东任副指挥长。将 4 支队编成两个支队，即 4 支队和 5 支队，与江北游击纵队一起，开赴津浦路两侧，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4 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下辖 7、9、14 团和特务营，在津浦路西展开。5 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下辖 8、10、15 团，在津浦路东展开。4 支队本来红安籍干部较多，扩编后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也多。他们中有：戴克明任 4 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徐海珊任 4 支队 7 团政委，李世焱任 4 支队 14 团政委，程启文任 5 支队 10 团副团长，江腾蛟任 5 支队 15 团营教导员，郑行福任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况业学任纵队第 2 团副团长。在两个多月时间里，4 支队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5 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12 月下旬，日伪军分别从南京、蚌埠、巢县等地集中 3000 余人，分数路对路西根据地进行“扫荡”。徐海东、戴季英率 7、9 团进行反

击，与来势凶猛之敌激战 3 日，粉碎了日寇首次大“扫荡”。这次战斗共毙伤敌近 200 人（内有 1 名日军中队长），缴获大量弹药及军用物资。4 支队英勇抗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根据地随之扩大，部队也由 4000 人发展到 6000 多人。

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让新四军 4、5 支队扩大抗日根据地。他们宁可让大片河山沦入敌手，也不愿有寸土属于新四军。在蒋介石密令之下，1940 年 3 月，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第 21 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和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联合用兵向新四军第 4、5 支队发起进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领导，一面与顽军进行交涉，一面集中第 4、5 支队主力反击最疯狂的李品仙部。中原局领导认为，李顽是广西军，属桂系，很有战斗力。如将桂顽击溃，则韩顽会不战而退。正在这时，骁勇善战的主将徐海东肺病复发，卧床不起。电告中央，毛泽东回复 8 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指挥重担落在戴季英肩上。他与副司令员林维先、参谋长谭希林反复研究作战方案，最后决定避实击虚，奇袭顽军后方定远城，调动顽军回援，打乱其部署，然后各个击溃。戴季英挑兵选将，选中了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善于化装奇袭的李世焱。由他率 14 团奇袭定远城。李世焱不负众望，将守城的县保安大队全部歼灭。然后南下迎击回头增援的顽军第 12 游击纵队，在 9 团配合下，又歼其大部。北线顽军的进攻于是被粉碎。南线进攻的是顽军第 10 游击纵队。由徐海珊率 7 团奋勇迎战，一举歼顽 700 多人，将顽军击退。东线由第 5 支队主力迎战，将滁县保安团近千人全部歼灭。最后，戴季英指挥第 4 支队主力与李顽 138 师一部在八斗岭激战两昼夜，将顽军全部打退。这次路西反顽战斗，共毙伤顽军 2500 多人，俘顽支队副司令以下官兵 1000 多人，缴轻重机枪 30 多挺，长短枪近千支，子弹 19 万余发。顽军受此打击，被迫坐下来与我军和谈，达成以淮南路为界，彼不向东，我不向西，分区抗日的协议。俗话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李顽砸了脚，韩顽便将脚缩回去了。这次反顽战斗，打退了国民党在皖东掀起的反共高潮。

1940 年夏，戴季英去延安学习，接替他的是郑位三。郑位三原是鄂豫皖区党委书记，1939 年秋奉命率区党委机关从皖西来到津浦路西。1941 年 1 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委改为皖东军政委员会，郑位三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夏，兼任第 4 支队政委。郑位三在工作中，既抓军队又抓地方。他有创建根据地的经验。1935 年郑位三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长征到陕南途中，被留在鄂豫陕边坚持领导游击战争。在与上级失去联系，斗争环

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他领导创建了鄂豫陕边根据地和红 74 师。现在他运用过去的经验，在华中局书记刘少奇领导下，与皖东军政委员会和 4、5 支队干部一起，积极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他从各单位抽调数百名干部，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肃匪除奸，自下而上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到 1940 年 10 月，先后在路西和路东建立了两个过渡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机构——联防办事处和定远、凤阳、全椒、来安、天长、盱眙、嘉山、六合、仪征、高邮、宝应等 14 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至此，西达淮南路、东到运河高邮湖，南濒长江，北临淮河，南北长 400 多里，东西宽 500 余里的淮南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当时在皖东军政委员会领导下的路西区党委书记张劲夫回忆说："位三同志在创建淮南根据地的工作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皖南事变后，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 2 师，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委。下辖 3 个旅：4 支队改编为 4 旅，辖 10、11、12 团；5 支队改编为 5 旅，辖 13、14、15 团；江北游击纵队改编为 6 旅，辖 16、17、18 团，另辖津浦路东和路西两个联防司令部。这时红安籍团以上干部除郑位三外，还有：罗应清任师部通讯科长，方中立任师供给部政委，杜耀清任师特务团副团长，刘保华任 4 旅供给部部长，李世焱任 4 旅政治部主任，程启文任 4 旅 10 团副团长，徐海珊任 4 旅 12 团政委，李正清任 5 旅 13 团政委，江腾蛟任 5 旅 13 团政治处主任，吴怀才任 5 旅 14 团副团长，郑行福任 6 旅政治部主任，吴大胜任 6 旅供给部部长，况业学任 6 旅 17 团团长，夏克任淮南军区甘泉支队政治部主任，徐显德任路西联防司令部独立 2 团团长，郑行郯任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团政委，郑维发任路东军区六合总队副总队长。郑维发是 1936 年入伍的，属后起之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伤亡在所难免。郑维发、郑行郯、郑行福、徐显德、况业学等团以上干部都牺牲在皖中、皖东、淮南抗日战场上。

第 4 师由八路军第 4 纵队编成，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下辖 10（1941 年 9 月，4 师 10 旅与 3 师 9 旅对调）、11、12 旅，活动在淮北地区，地跨皖苏边界。红安的罗应怀任 9 旅 26 团团长，周世忠任 11 旅参谋长，张永远任 12 旅 32 团团长。后来 12 旅旅部撤销，张永远任师直属 34 团团长。1942 年 11 月，淮北根据地周围据点之敌出动近万人，在飞机、汽艇的配合下，从 5 路分进合击第 4 师主力。守备在此的是 9 旅 26 团。在团长罗应怀的指挥下，与敌人血战 18 个小时，反复冲锋 8 次，白刃格斗，血流成河。敌人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却而去。战后打扫战场，敌人抛下 300 多具尸体，我军牺牲 73



血战朱家岗英雄26团排以上干部合影

人。团长罗应怀手折脚断，血渍满身。他记不清砍杀了多少敌人，只见大刀卷刃。这次战斗，是4师反“扫荡”以来最壮烈的一次。泗阳县人民为了纪念这次战斗胜利和殉国烈士，1943年10月兴建了纪念朱家岗殉国烈士碑。师长彭雪枫为纪念碑撰写了碑文。他在文中写道：“敌寇挟其优势兵力火力，抱定以石击卵之野心，妄图一逞。统观敌我态势，大为悬殊。我军既属劣势，且亦处于被动地位。以数量论，则以少御众；以武器论，则以弱敌强；是战败之局，似乎预定。但我26团指战员赤胆忠心，英烈奋勇，抱定与阵地共存亡之铁石意志，以歼灭顽寇。自晨至夜，激战达18小时，反复肉搏，十进十出。中华男儿，革命斗士之英勇气概表露无遗。终使敌寇胆寒，丑类气馁，弃械遗尸，而仓皇逃矣……”战后，罗应怀成了甲等残废军人，但他一直未下战场，是有名的“瘸子将领”。

第4师在取得朱家岗大捷之后，1943年在军部领导下，与各兄弟师一起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1944年7月，师长彭雪枫率主力5个团，在八路军冀鲁豫武装和2师的策应下，收复被顽固派占领的根据地和拔除日伪据点。周世忠、张永远率部随师长出征。从8月15日开始至10月下旬结束，连续作战两个多月，共歼日、伪、顽军13000多人，拔除

据点 36 处，淮北苏皖边根据地基本上得到了恢复。这一系列战斗，师长彭雪枫亲临前线指挥，后在八里庄战斗中不幸牺牲。张永远也永远长眠在淮北土地上了。

第 7 师由无为游击队和皖南突围部队编成，张鼎丞任师长，曾希圣任政委，下辖 19 旅，活动于皖中和皖南地区。这里早在 1939 年就被第 4 支队辟为抗日游击根据地，红安籍团政治处主任王少香将鲜血洒在这里。第 4 支队奉命开进皖东后，这里重陷敌顽之手。皖南事变的突围部队渡江后集结在此，与当地抗日武装一起重辟皖中（后改称皖江）根据地。红安熊应堂一直承担着在此坚持武装斗争的重任。他任过独立团团长、沿江支队参谋长、7 师 19 旅参谋长、副旅长，在坚持皖南和开辟皖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此外，还有一位战斗在救死扶伤战线上的汪浩，他是三年游击战争中由红二十八军培养出来的红色医官，是从 2 师调来的，任 19 旅卫生部长。在医药匮乏、伤员增多的情况下，他总是想方设法抢救伤病员，让他们早日康复重返前线。

第 2、4、7 师开辟的淮南、淮北、苏皖边和皖江根据地，与苏北、苏中、苏南根据地紧紧相连，形成了新四军华中抗日中心，有着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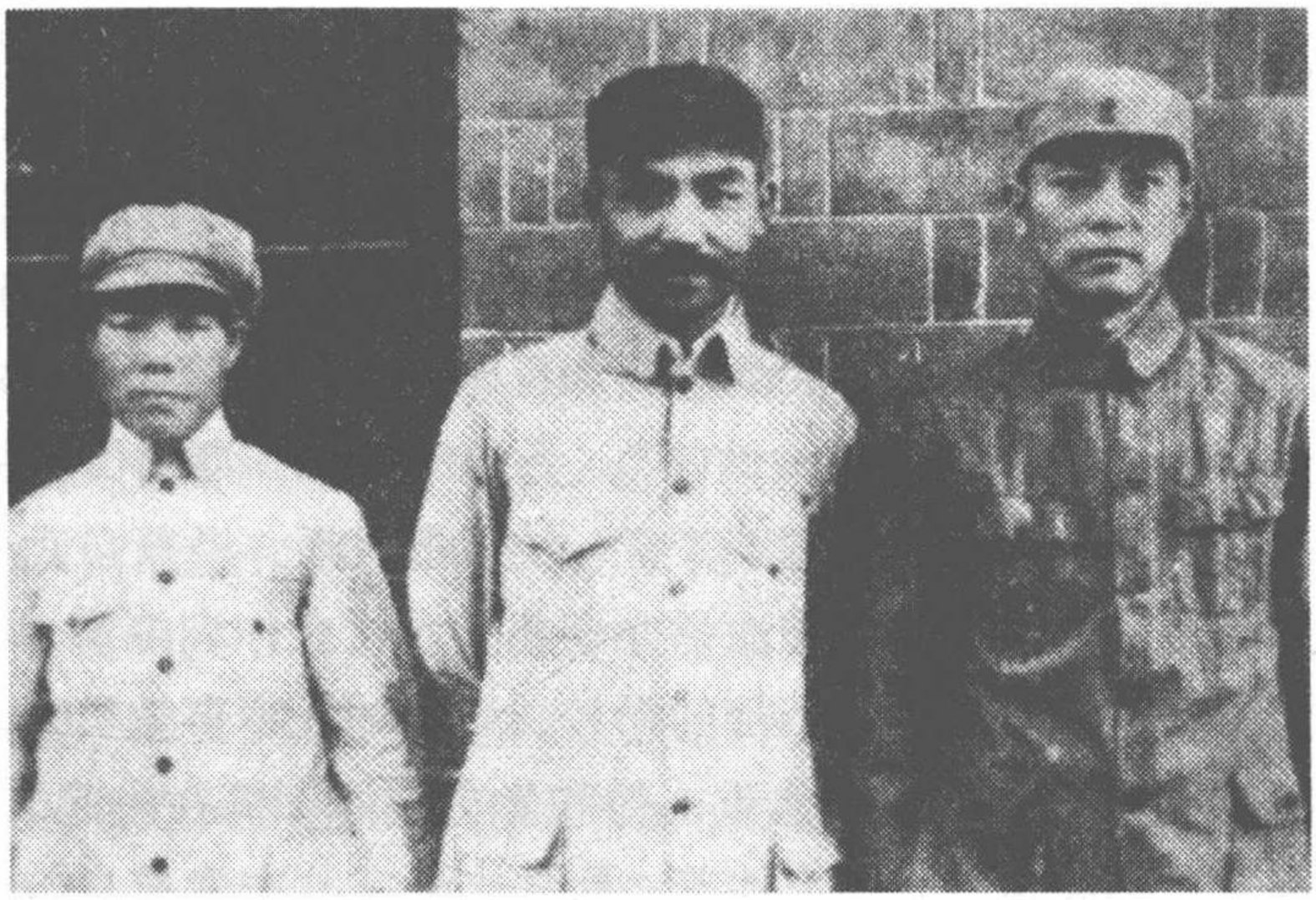
独辟鄂豫　孤悬抗敌

武汉沦陷前，群众的抗战热情极高，正好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但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主要负责人王明未按中央的方针办事，错过了大好时机，致使我党领导下的中原敌后抗战局面未能很好打开。

武汉沦陷后，1938 年 11 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根据中原地区的政治形势，中央决定撤销湖北、河南省委，成立鄂豫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等区党委。其任务是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2 月，中央派原红西路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重返中原，任豫鄂边区党委军事委员，负责组建敌后抗战主力部队，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是他离开鄂豫皖七年后第一次回来。与七年前相比，迥然不同：1932 年他率一个师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出鄂豫皖苏区，是兵多将广；这次回来，他只带了几十名干部，是有将无兵。有人笑他是“光杆司令”。

既是将才，自有雄兵。1939 年 1 月，李先念根据区党委的决定，将竹沟 4 支队 8 团留守处两个中队编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共 100 多人，司令李威。李威是李先念的化名，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他未用真名。随即率部南下豫南和鄂中，一路高举抗日大旗，一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边打击日伪军，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6 月，与活动在鄂东、鄂中分别由罗厚福领导的新四军游击第 6 大队、张体学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 21 集团军独立游击第 5 大队、许金彪领导的湖北抗日游击大队，以及应城、京山、汉川、应山等地的抗日游击武装会合，统一编成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约 3000 人，李先念任支队司令。群众一听说李先念回来领导打日本鬼子，奔走相告，热烈欢迎。日伪军见李先念回来了，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常向独立游击支队发起进攻。李先念运筹帷幄，屡败敌军，分化伪军，促使一些伪军先后反正。11 月，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下辖 6 个团队、3 个总队和 1 个独立团，共有兵力近万人，李先念任纵队司令。至此，完全改变了我党在中原地区无抗日主力的状况。党中央闻讯评价说：鄂豫挺进纵队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李先念率部英勇杀敌，收复失地，队伍增加了，活动地盘也扩大了。国民党顽固派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地制造事端，挑起摩擦。尤其是在三次反共高潮中，顽固派竟勾结日伪军夹击鄂豫挺进纵队。在众多国民党顽固派摩擦专家中，有两位与李先念是同乡。他们当时都担任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专员兼游击司令。一位叫石毓灵，在鄂中；一位叫程汝怀，在鄂东。他们经常令部下向鄂豫纵队及其抗日根据地进攻。李先念本着既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亲访石毓灵，致函程汝怀，要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共同对敌。他们不听，一意孤行。尤其是程汝怀让部下屡犯鄂豫边区。李先念不得不先礼后兵，予以沉重还击。后来谈到这段历史时，李先念说：石毓灵、程汝怀是两个老顽固，不如应城郭仁泰通情达理。郭仁泰带伪军打我们。我们对他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该共同打鬼子。他听进去了，带 1000 多伪军反正参加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群众要清算斗争他，他求助于我。我叫他到省里来。他还是很担心，怕被揪回去了。我对他说，再不放心就住到我家里。你应该相信，共产党不会忘记在困难时帮助过我们的朋友的。程汝怀、石毓灵一顽到底，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谅解啊。作为赫赫有名的抗日将领，李先念既讲原则又讲情义。所以在孤悬敌后的 8 年抗战中，他得到了广大群众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拥护和支持。



新四军5师三位领导人：左起陈少敏、郑位三、李先念。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将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下辖第13、14、15旅、特务旅，第1、2、3纵队，边区党委警卫团等，全师15300多人，另有地方武装7000多人。5师的骨干除一部分来自延安外，绝大部分来自七里坪、汤池和竹沟三个抗日支点。因此，红安在5师的干部较多。随着部队的不断扩大，许多人走上了团以上领导岗位。除李先念外，郑位三于1943年底作为华中局的党代表来5师工作，后任5师政委，江子明任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罗厚福任14旅旅长、后任特务旅旅长，周光策任13旅参谋长，郑植惠任13旅供给部长；秦振任13旅38团政委，黄世德任13旅39团团长，刘友海任39团政委；黄宏伸任14旅40团团长，姚泽洪任40团参谋长，聂庆泰任14旅42团政委，张海彪任42团副团长；李福太任15旅45团政委，杨洪先任特务旅3团政委；汪进先任边区党委警卫团团长，李明任警卫团政委，魏正兴任特务团政委，易元鳌任鄂东独立团团长，韩志龙任第3游击纵队2团政治部主任。在此之前，还有刘金德、徐国盛、吴应龙、袁世起、程敬太、杨庭芝、谢家荣、袁克其、王辉杰、袁克福、戴醒群（女）等在独立游击支队和挺进纵队中任营团级干部，他们在1941年前就已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据《七七月刊》1942年第6期发表陈少敏《艰苦奋斗的三年》一文中讲："在三年（指1939至1941年）坚持抗战中，我们牺牲了连级以上干部110余人，内有团长、政委8人。"在牺牲的110多人中，有红安籍营以上干部13人，

内有团长、政委2人，占牺牲总数的10%。鄂豫边抗战初期，红安人付出的代价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还有辛亥革命老将潘怡如，战斗在抗战烽烟后方的战场上。

潘怡如青年时放弃科举，投笔从戎，在军中秘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后去日本学军事。回国后参加过武昌起义和反对北洋军阀等诸多战役，战绩显著。他追随孙中山，坚持“三大政策”，受排斥打击，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经董必武与湖北省政府上层沟通，国共合作在应城汤池举办湖北省农村合作训练班，名义上是省建设厅主管，实际是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潘怡如任军事教员。在训练课程中，游击战和野外训练占很大比重，他和学员学习训练在一起，十分劳累，导致旧病复发，不能执教，回家休养。他从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回家后以爱国人士面貌出现，带病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乡村抗战教育工作，深受民众欢迎，被推举为鄂豫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和陂安南县中学（又称怡如中学）校长。他还利用过去在军政界的关系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规劝国民党军中的顽固派不要挑起国共摩擦，告诫一些伪军头目要站到中国人一边，不要助纣为虐，为此做了许多工作。

1942年，日伪军加紧对鄂豫边区进行“清乡”“扫荡”，顽军不断制造摩擦，根据地的形势持续紧张动荡。边区党委和5师在领导军民反击日伪顽的作战中获悉：顽固派鄂东保安司令部第1旅旅长李九皋等多次到陂安南县吴家大垮吴蘅圃家活动。吴原是国军团长，因战败赋闲在家。过去很少有军界要人前来，现在频频拜访，是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情报送到5师师部，领导认为有查清的必要，但要注意方法，因为吴住在根据地，是统战对象，不能简单从事，要做好工作，搞清事实，以绝后患。经研究决定请潘怡如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为慎重起见，师部派联络部长带着信函到陂安南县桐柏集庙嘴村去面请，潘怡如看完师长的信后表示一定不辱使命，完成任务。联络部长问需要什么，他说什么也不要，只要一个人，最好请派陂安南县教育科长陈贤璋一同前往。

农历端午节那天，潘怡如和陈贤璋以检查学校工作的名义去吴家大垮。路上潘怡如告诉陈贤璋，要见机行事，排除干扰，还要提高警惕，以防不测。陈贤璋说既然如此，何不将吴请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谈。潘怡如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样做可能把事情办坏。

潘怡如和吴蘅圃两家相距20来里，早已相识，都是当地头面人物，而

潘的资历更老，名望更高。当潘怡如和陈贤璋来到吴家时，吴蘅圃高兴地说："怡老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快请上座。"没寒暄几句，又进来三个人。出乎意料的来客使吴语无伦次，忘了介绍前客，反介绍起后客，说他们三位是来玩的客人。潘怡如趁机表明来意，我们是了解乡村教育情况，动员学生上学读书路过这里，今天是端午节，顺便看望一下吴团长这位老朋友，送个节日祝福。吴蘅圃连说不敢当，恳留大家共度节日。饭后吴蘅圃拿出麻将摆在桌上，请潘陈和那三位打牌。潘怡如说："我和你好久未见，先让他们四位打吧，我俩换个地方叙叙旧。陈贤璋主动请那三位上了牌桌，吴蘅圃也领潘怡如到了后面的小客室。两人都是行伍出身，三句话不离本行，谈的是战事和边区形势。潘怡如见缝插针地问吴蘅圃：听说李九皋旅长到贵府来过，有何贵干？吴蘅圃这才明白潘怡如是有备而来，想瞒是瞒不过去的，只好大致以答。

吴说自皖南事变以来，5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 21 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令鄂东保安司令程汝怀进占鄂东。程汝怀调李九皋的保 1 旅和蒋少瑗的保 4 旅分别从东面和北面两个方向进攻陂安南，结果都失败了。李品仙对程汝怀大为不满，再次令他夺占鄂东，并派自己的亲信 21 集团军所辖 48 军副军长程树芬任鄂东保安副司令，名曰加强领导，实则监督，如任务完成便罢，不能完成就取而代之，吃掉程部。在此情况下，程汝怀先派李九皋，后又派保 3 旅旅长王啸风到家中请我帮忙，要我充当程汝怀的密使去武汉与伪湖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何佩瑢联络，通过何再与驻汉日军联络，商谈共同进攻陂安南的问题。他们要我尽早去汉，不能迟于大端午节。情况就是这样。

潘怡如问："你赋闲在家，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吴蘅圃说"我和程汝怀、李九皋、何佩瑢等都是保定军校四期同学。"潘怡如一听便知是程汝怀利用同学关系打坏主意，说："人家都说程汝怀算个人物，我看他连狗屁都不如，蘅圃老弟呀你说是不是这个理？你好好想一想，这个密使当不当得？要知道我们住在抗日根据地内，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对我们很尊重，有大事还请我们去商量，生命财产有保障，我们要知道珍惜和自重，不能做亲痛仇快的事。"潘怡如语重心长的一番话，深深触动吴蘅圃，讲了心里话："我也在犹豫，所以没有马上动身去汉，怡老的话深刻中肯，令人信服，我向你表示不去武汉当密使。为感谢你为我消灾送福，今天不要走了，晚上还要好好谈谈。"

在晚上的交谈中，吴蘅圃将程汝怀伙同日伪军进攻陂安南的方案告诉了

潘怡如。其方案是：由日伪军进攻占领黄陂东北的王家河、老鹳庙、长堰、应家凉亭、柿子树店、塔耳岗等地，修筑碉堡，建立维持会，强化其统治；由鄂东保安司令部所属各旅进攻占领黄安的江家店、詹店、桥店、桐柏集、杜家凉亭、觅儿寺、八里湾等地。双方得手以后，将陂安南抗日根据地分成东西两半，西半边由日伪军控制，东半边由鄂东保安司令部所属部队控制，铲除抗日民主政府及其武装，为进攻大悟山做桥头堡。这个方案如果对方接受了，双方再另定作战时间和实施方案。最后吴蘅圃告诉潘怡如，上午那三个人是李九皋派来催他去汉的，已被他打发走。潘怡如问他不去汉打算怎样对付？吴蘅圃说他采取一拖二挨。潘怡如说只要吴坚决不去，他想办法帮忙摆脱他们。

潘怡如和陈贤璋从吴家大垮返回边区向师领导汇报后，师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便对顽固派的阴谋大加揭露，使之胎死腹中。程汝怀迅即被程树芬取代，鄂东保安司令部所辖4个旅全部被李品仙吞并。顽固派去忙于整编这支地方军，日伪军得不到顽军策应也暂不妄动。这样一来，陂安南抗日根据地面临日伪顽会同进攻的严峻形势有了好转。人们都说这与潘怡如做了细致的工作有关。

5师的成立，标志着鄂豫边区人民抗日武装已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新四军指向中原敌后的一把利剑。这把利剑是在敌伪顽的夹缝中磨砺出来的。当徐州、武汉失守后，近40万国民党军队退守山中，将湖北周边的大别山、桐柏山、幕阜山和境内的大洪山、大荆山等山地占据；江河、铁路、公路沿线的大小城镇，被15万日军和8万伪军占领。5师在他们的中间地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既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又遭到日伪军的封锁，长期与兄弟部队相隔绝，孤悬敌后，孤军作战。在财力、物力上更得不到外援，一切都靠自力更生。其艰难险阻不言而喻。俗话说："百炼成钢"。在这样恶劣环境中拼杀出来的5师，自然能征善战。所辖各旅互相配合，各自展开。

14旅在鄂东地区活动，并向北发展到河南罗山、光山、新县，向南发展到鄂城、武昌、黄石、咸宁，向东发展到蕲春、广济、英山、黄梅和安徽宿松、江西九江。开辟这块抗日游击根据地，颇不容易，既要杀敌，又要反顽，几次进出，才站稳脚跟。红安籍的罗厚福、聂庆泰、易元鳌、黄宏伸等在此大显身手。这几位都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游击高手，罗厚福更富传奇色彩。1935年，他在鄂东北任3路游击司令时，不仅敌人斗他不过，就连内部"肃反"也能闯过鬼门关，凭的就是会打仗。是年秋季，正当敌人用重

金悬赏捉拿他时，有人说他是“改组派”，随即遭到保卫部门的关押和审讯。一天，敌人打来了。保卫人员将罗厚福五花大绑带上。眼看敌人快攻上来了。他急得跳起来喊：“快放开我，给我枪，等把敌人打败了，你们再审再杀我也不迟！”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游击英雄，有他参加战斗胜多败少，便给他松绑，让他指挥战斗。他用灵活多变的打法很快将敌人打退。战后他让别人再绑上带回去。此事报告到上级，将他释放了，仍让他当游击司令。从那以后，他立下誓言：血可流，头可断，死也不离大别山！他要把重新捡回来的这条命献给大别山人民的解放事业。1938 年春，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 4 支队时，他被任命为营长。他要求留下当 4 支队留守处的警卫排长，为的是坚守大别山。警卫排后来发展成为第 6 游击大队，他任大队长。1939 年他率部在红安、黄陂、孝感一带抗击日伪军，三战三捷：4 月，在余家河首战日寇，歼敌一个小队；5 月，在李新塝打击伪第八军，俘伪旅长以下官兵 300 余人，缴迫击炮 3 门，轻重机枪 9 挺，长短枪 500 多支，极大地加强了大队的武器装备；7 月，在东洋岗歼伪第 25 师大部。此后，6 大队与其他部队一起编入第 14 旅，成为 5 师的主力部队之一。罗厚福由大队长擢升为旅长。

罗厚福能知人善任。土地革命时期他任区委书记时，聂庆泰任区苏维埃主席，黄宏伸任区游击队长；他任游击司令时，易元鳌任游击大队长。他知道他们每个人的脾气和特点。在向东发展时，他派黄宏伸率 40 团、聂庆泰率 42 团向鄂皖边挺进，一直打到安徽宿松、太湖边与 7 师挺进团会合，使 5 师与军部的联络沟通了一个时期。在向鄂南发展时，他让易元鳌率鄂东独立团配合 41 团和黄冈县的武装渡过长江挺进鄂城梁子湖区，然后向黄石、咸宁、武昌发展，直打到武汉郊外。他依靠这些能应付一切复杂局面的游击干将，打开了这些复杂地区的局面，并成为抗日游击根据地。可惜的是聂庆泰、易元鳌先后在战斗中牺牲了。罗厚福叹息地说：“我们失去了两个打仗的行家。”

13 旅在鄂中活动。其中的红安籍干部有参谋长周光策，供给部长郑植惠，37 团副教务长邹顺华，38 团政委秦振、副团长魏正兴，39 团团长黄世德、政委刘友海等。他们在旅首长的领导下，南征北战，收复失地，将根据地向北发展到了河南信阳、确山，向南发展到了沔阳、汉川。

15 旅在汉水以西活动。该旅红安籍干部虽少，但 43 团政委李福太、团政治部主任韩志龙，还有团级干部杨德香等，也是久经锻炼的军政干部。

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2 月，以 15 旅 43、44 团为主，13 旅 37、38 团配合，发起了侏儒山战役。李福太、韩志龙、杨德香、秦振、魏正兴等率部参加了战斗。秦振的 38 团突入敌阵，与敌人白刃格斗，杀得敌人片甲不留。杨德香不幸牺牲。这次战役历时近 2 月，共进行大小战斗 10 多次，毙伤日军 200 多人，伪军 5000 多人，其中生俘伪军 950 多人，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大片地区并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从此，5 师部队可以北控汉水，南扼长江，东逼武汉，西迫荆（州）沙（市），为向鄂湘边发展创造了一个前进阵地。

5 师主力部队不断地东进、北上、南征，使部队本身和抗日游击根据地都得到很大发展。到 1942 年底，鄂豫边区已扩大到北至河南确山、南抵湖南华容、东到江西彭泽、西迄湖北当阳，成为鄂豫皖湘赣边区。为了巩固根据地，全边区成立 5 个军分区。除保留 13 旅外，其他各旅的番号撤销，所辖各团分配到各军分区作武装骨干力量。这时红安又有一批干部分赴各军分区工作。他们是：罗厚福任 1 军分区司令员，曾广泰任自卫 3 团团长，董绍明任自卫 7 团团长。军分区下面成立总队，各县成立军事指挥部。黄宏儒任 1 分区罗礼经光中心县军事指挥部政委，郑维孝、郑维忠兄弟分别任安麻总队总队长和总队政委，吴明忠任安麻县军事指挥长，杨子明任礼南总队政委，钱运华任礼南总队副总队长，汪立波任陂安南县军事指挥长。吴昌炽任 2 军分区参谋长，杨洪先任 2 分区独立第 5 团团长，黄光炳任副团长。张海彪任四军分区挺进 18 团团长，汪进先任 4 分区冈浠罗麻中心县军事指挥部政委，潘继义任冈浠总队总队长。随着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后又成立了第 6、鄂皖、鄂南、豫中等军分区。刘友海任 6 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世德任鄂皖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康宏山任分区参谋长，刘敏任分区政治部主任，吴振挺任豫中军分区舞叶支队支队长、舞（阳）叶（县）泌（阳）方（城）中心县军事总指挥。这位曾任过红二十五军 74 师手枪团政委的支队长，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可说是文武兼备。他把当年在鄂豫陕打游击的经验运用到新开辟的游击区，打日军、除汉奸，搞得有声有色。

新四军第 5 师是诞生、战斗在家门口的子弟兵。红安人民拥爱有加，积极参军参战。抗战期间，全县参加部队和地方工作的人数以千计，仅团以上干部就有 52 名，占全师团以上干部 744 名（见《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的 7%，旅以上干部 8 名，占全师旅以上干部的 10%还多。一个师有这么多红安籍团以上干部，是八路军、新四军其他师所没有的。

第 5 师的快速发展和对武汉形成的战略包围，吸引了敌人更多兵力，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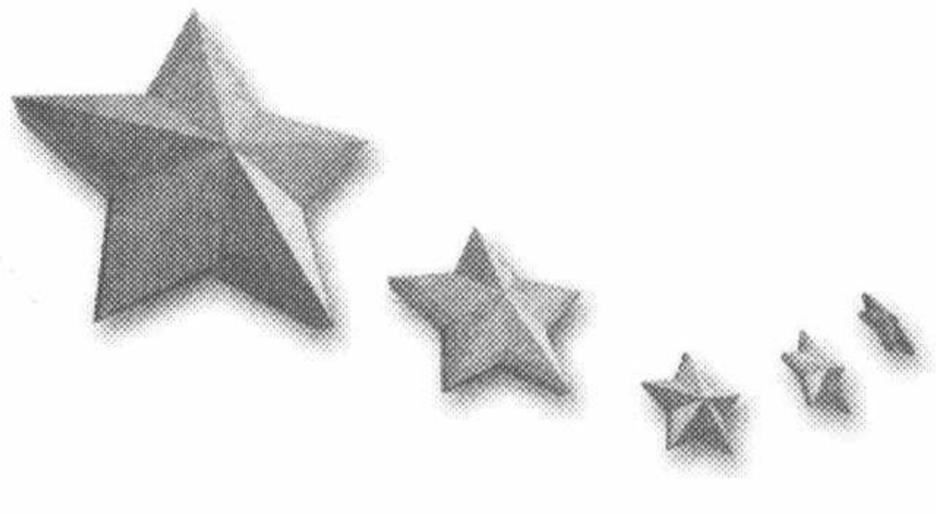


1983年4月，原新四军第5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顾循重访他当年战斗过的七里坪、大悟山、宣化店。作者一路陪同，听他讲5师的成长历程和中原突围。图为参观董老旧居合影，左起：作者、顾循、邓秘书。

以数千或数万人，分成几路对鄂豫边根据地进行“扫荡”、“合围”、“清乡”。国民党顽固派在三次反共高潮中，不断地挑起摩擦，有时甚至与敌伪配合起来进攻根据地。5师为了抗战，常常背顽面敌以杀敌，或背敌面顽以反顽。5师肩挑双担抗战，使本来就孤悬敌后的处境更加困难，以至无法与其军部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经党中央同意，从1942年秋季起，5师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在建制上仍属新四军。为此，刘少奇派郑位三作为华中局的党代表到5师工作。1943年底，郑位三由淮南2师来到大悟山5师师部所在地，与李先念相会。战友在阔别10年之后又战斗在一起。从此，中原敌后抗战又多了一位主要领导人，5师又添了一员主将。

郑位三的到来，使5师领导集体增添了智慧和活力，提高了边区军民克服困难、夺取胜利的信心。师领导从组织群众大多数、加强政权建设，提高

部队战斗力和大力发展生产等方面去努力，使边区反敌伪“扫荡”、“蚕食”的战斗不断取得胜利，根据地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到1945年初，5师在中原开辟的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已扩展到鄂豫皖湘赣5省边界地区，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下辖9个军分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50000多人，根据地人口达1500多万，成为华中新四军最大的抗日根据地之一，也是最具战略地位的根据地之一。自5师组建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与敌伪军作战达1400多次，毙伤俘敌伪军43000多人，缴获各种武器数万件。这些辉煌的战绩是边区军民浴血奋战共同取得的，与李先念的正确领导和指挥分不开。回想李先念回中原之初被人戏称“光杆司令”，短短六七年时间就拥有5万大军，他的理政治军才能实在令人佩服。1945年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委员。与此同时，郑位三也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全党对李先念、郑位三的信任与肯定。至此，继董必武之后，红安在抗战期间便有3位中央委员了。



第七章　硝烟未尽战云起

最后一战郭天民率部夺取伪蒙疆首府张家口。詹才芳收复热河后出关攻占赤峰朝阳。秦基伟出太行横扫平汉路五百里连克六座城。陈美藻攻占临沂使之成为山东解放区首府。邹国厚从北国战到江南一扫陂孝敌伪。杨子明配合军分区拔除红安境内敌伪最大据点。围城打援红安众将领挥戈夺取上党战役胜利。促敌起义陈锡联、郑国仲奉命在前线具体施行。

最后一战　夺取胜利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此前，意大利法西斯已于1943年9月投降。法西斯阵营三轴心国有两个投降了，剩下日本也就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8月6日，美国用原子弹打击日本本土。8月8日，苏联出兵聚歼日本关东军。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立即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从8月9日开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进攻。晋察冀军区部队进逼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城镇，山东军区部队进攻徐州、济南、青岛等城镇，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攻邯郸、新乡、开封、晋城等城镇，晋绥军区部队逼近太原、归绥，新四军各部队向江苏、浙江、安徽地区敌占城镇进攻，新四军第5师向湖北、河南之敌进攻，华南各抗日游击队攻歼盘踞在本地区之敌。到8月下旬止，各解放区的人民抗日武装，收复县以上城市80余座，歼灭了大量日伪军，解放了大片国土。在80余座城市中最大的是张家口。它是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的部队收复的。

张家口是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首府，是日军在抗战期间的后方基地，修有20余里长的“皇军仓库”，储有大量战备物资。蒋介石想把它抢到手里，命令远在千里之外的傅作义部抢占张家口。我党中央命令冀察军区一定要夺取张家口。军区司令员郭天民为了保证完成任务，来个双保险：一是派参谋长易耀彩率冀察北线部队围攻张家口，二是亲率南线部队阻击傅作义部，然后与北线部队一举解放张家口。这是当时我军收复的第一座大城市，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中国抗日武装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大本营随后下令从 8 月 25 日零时起，停止一切军事行动。9 月 2 日，在停靠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正式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至此，历时 6 年之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日本投降，有人说是因为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丢了两颗原子弹，也有人说是因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消灭了关东军。这些说法都不全面，应该说导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美英等西方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对日军的打击；美国用原子弹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苏联出兵消灭其关东军等。但是大量的事实表明，在诸因素中，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对于导致日本的投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长期大量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人民战争，抗击包围 69%的侵华日军和 95%的伪军，使分布在中国境内铁路沿线及其附近较大据点的敌军 22 个师不能集中，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日军的力量。而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和苏联出兵消灭关东军，对日本的投降则是起了重要的加速作用。对于这一点，日本历史学家伊豆公夫，在他所著《日本小史》一书中就曾公正地指出过。他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 14 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伊豆说“绵延 14 年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是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算起的。我们常说 8 年抗战，实际上不止 8 年，而是 14 年。

就在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的时候，有两个人出来搅局：一个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他知道在中国抗战期间，蒋介石一直偏安于西南一隅。日本投降后，中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大片土地就会落入共产党之手。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为了帮助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他让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指令日军只能向蒋军投降；另一个是蒋介石。他对杜鲁门虽感激不尽，但要把自己的军队迅速派往各地，特别是华北、东北，谈何容易。他便使出两手：一面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和谈”，以拖延时间；一面调兵遣将向解放区大举进兵，并委任头号战犯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指使他协同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于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大好局面就被这两个人搅乱了。

为了粉碎美、蒋、日、伪合流进犯解放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党中央决定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面做好由毛泽东率代表团赴重庆谈判的准备工作，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一面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各军区“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不好向大城市及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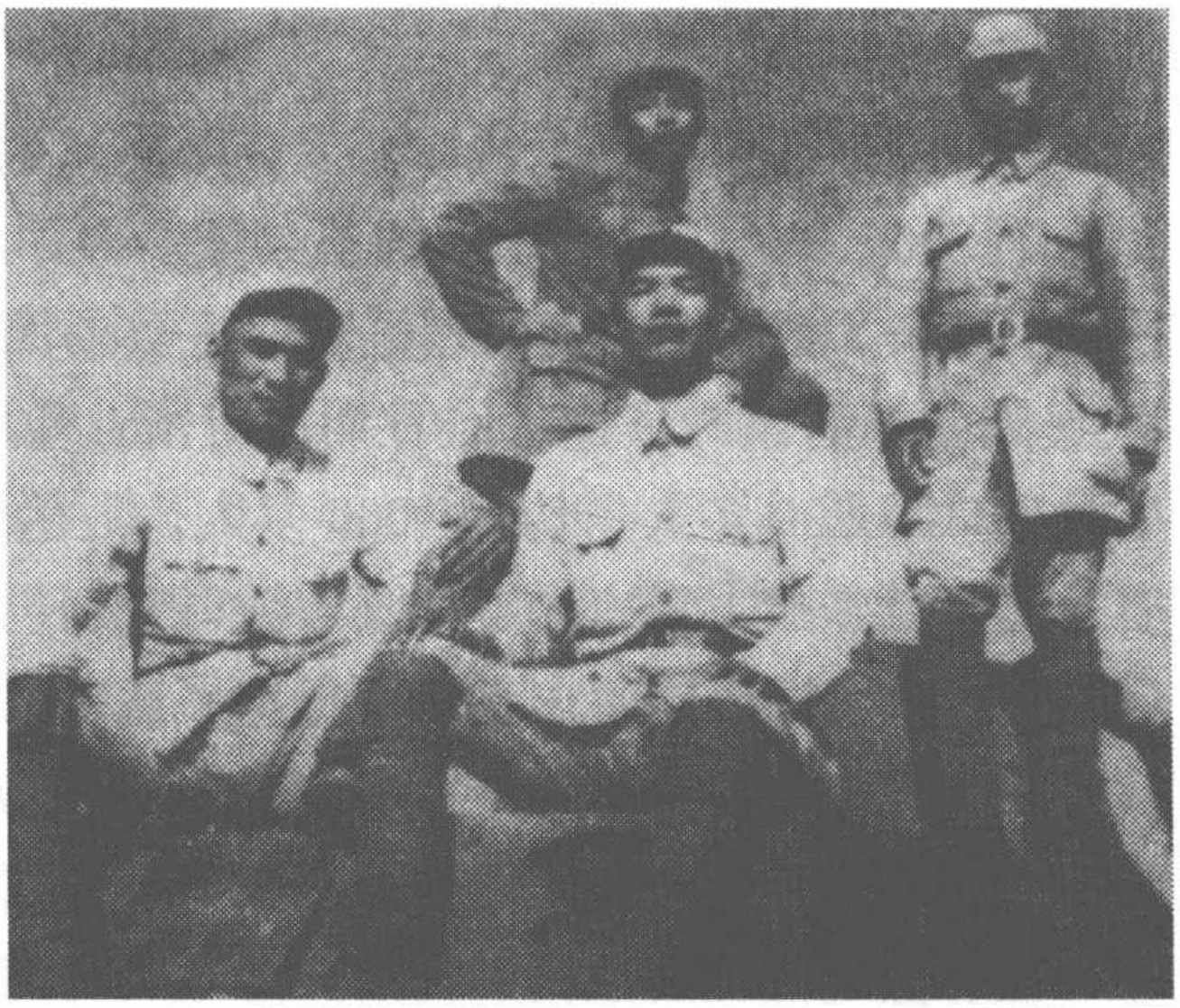
根据新的作战方针，各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立即调整作战部署，主力迅速转向夺取小城镇和广大乡村。

在晋察冀解放区，所属冀晋、冀察、冀热辽军区的部队，在聂荣臻的指挥下，于8月24日分南、西、北三个方向，向敌伪军发起进攻。红安籍将领在新一轮的反攻作战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战绩。冀晋军区第五军分区副政委赵国威，与分区领导一起率部队参加了南线作战，同各兄弟部队一起奋战一个多月，扫除了察哈尔南部的敌人，共歼日伪军3000多人，收复了察南。冀察军司令员兼冀察纵队司令员郭天民，与纵队政委李天焕，率部在西线作战，主要任务是夺取平绥铁路东段。两位老乡配合极好。9月19日，一举攻下宣化，随后又拿下重镇新保安，歼灭日伪军数百人。然后一鼓作气向东追歼逃敌，连克怀来、延庆、永宁等城镇，直打到北平近郊，肃清了平绥路东段及其附近地区的日伪军，收复了察中，继又挥师北上收复了察北。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兼冀东纵队司令员詹才芳，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收复热河的作战。他们首战兴隆，迫使伪满军3800多人缴械投降，接着出关作战，先后占领了凌源、赤峰、朝阳地区，彻底肃清了热河境内的日伪军。察哈尔、热河两省的收复，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为八路军进军东北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所属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都向辖区内各据点的敌人展开进攻。8月20日，刚刚接任太行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亲率15个团的兵力杀下太行山，横扫平汉路500余里，同兄弟部队一起连克6城，歼敌1万多人。在攻打临城的战斗中，守敌垂死挣扎，屡攻不下。秦基伟亲临火线，一面指挥，一面操起机枪，发挥他神枪手的本领压制敌人火力，掩护突击队炸掉碉堡，夺取了战斗胜利。这次随他一起反攻作战的红安籍干部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光坦，卫生部政委胡裕文，13军分区警备团政委万文献，14军分区司令员韩卫民等。他们都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做出了贡献。另三个军区——太岳、冀南、冀鲁豫也有大批红安籍将领参加各路反攻作战。他们是：太岳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他率军区主力拔除境内敌伪据点后，向西面出击，直取平遥、介休县

城，逼近太原。冀南军区军政处长张天伟、7军分区卫生处长黄华、8军分区司令员李定灼、9军分区政委甘思和、11军分区司令员刘福胜等，他们在军区统一部署下向东面进击，收复了广平、长清、高唐、南宫等10余座县城，一直打到济南近郊。冀鲁豫军区后勤处长武世洪、3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胡正平、6军分区后勤处长李天忠、7军分区22团团长赵鹤亭、10军分区司令员吴大明等，他们在军区首长指挥下向南面出击，连克修武、济源、博爱、新乡等10余座城镇。经一个来月的连续反攻，到9月下旬，晋冀鲁豫解放区所属4个军区已完成“夺取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威胁大城市及要道”的作战任务。

在山东解放区，所属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军区的部队，在罗荣桓指挥下，分别向胶济路、津浦路、陇海路沿线之敌出击，8月25日解放烟台，并先后收复即墨、海阳、寿光、临淄、章丘、莱芜、临沂等30多座县城。红安籍参战的干部有：山东军区特务团团长陈美藻，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参谋长胡奇才；鲁南军区1军分区司令员王吉文；滨海军区参谋长张仁初，2军分区副司令员贺健，2分区6团副团长祝顺鹏；胶东军区特务团副团长钟光国，胶东军区主力团13团团长卢燕秋；渤海军区四军分区政委徐斌洲等。他们在反攻作战中，各自率部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其中陈美藻率特务团在临沂攻坚战中打得尤为出色。8月底，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亲自指挥5个主力团和3个独立团及县区武装，共25000多人夺取鲁东南的日军重要据点临沂。敌人凭坚据守，屡攻不下。罗荣桓只好使出杀手锏——山东军区特务团担任主攻。这支部队军政素质好，装备也好，颇有战斗力，其任务是负责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到万不得已不投入战斗。这次为了拿下临沂，



1945年9月，解放山东临沂后，陈美藻（中坐者）与战友在缴获的敌方坦克上留影。

彻底消灭负隅顽抗的日本鬼子，罗荣桓让特务团上，自然是陈美藻和全团指战员最高兴的事。陈美藻选择城东作为突破口，亲自到前沿观察，然后总结了前段攻城的经验教训，认为是爆破杀伤力不猛。在缺乏大口径火炮支援的情况下，他改用手榴弹进攻。在他的指挥下，敢死队奋不顾身攀梯而上，用集束手榴弹轮番进攻，终于打开了缺口，让后续部队攻入城内，全歼日伪军守敌1000多人。特务团随即进驻城内，肃清日伪残余势力，稳定社会秩序。不久，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领导机关迁入临沂，后来新四军部也北迁临沂。从此临沂成了华东解放区的首府。陈美藻为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华中解放区，在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指挥下，所属苏浙军区部队向溧阳、金坛、溧水、句容、郎溪、长兴等地进攻；苏中军区部队向高邮、宝应、东台、盐城等地进攻；苏北军区部队向沭阳、涟水、海洲等地进攻；淮南军区部队向定远、蚌埠、滁县、六合等地和津浦路进攻；淮北军区部队向永城、宿迁、淮阴、淮安等地进攻。不到一个月先后共收复30多座城镇。参加上述各军区反攻作战的红安籍干部有：苏中军区教导1旅旅长刘飞，苏浙军区“民抗”参谋长戴克林，淮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徐海珊、第5旅13团团长李正清、14团团长吴怀才、路东军分区政委李世焱、来安支队司令员程启文；苏北军区第8旅旅长兼盐阜军分区司令员张天云，淮北军区特务团团长罗应怀，第3军分区参谋长周世忠；皖江军区第19旅副旅长熊应堂等。他们在各自的作战区内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拿刘飞来说，他率苏中军区教导1旅北战南征，8月底先攻下兴化，歼伪军5000多人，生俘伪22师师长刘湘图，一举解放苏中重镇兴化城。接着南下，于9月初进攻海安和如皋，又歼敌伪军2000多人，解放了这两座县城。再如吴怀才，他是淮南军区第5旅14团团长。5旅奉命收复淮南路北段之重要城市蚌埠。当部队进至该市南面20里处的刘府镇时，遭据点日伪军阻击。他向旅部请战拿下这个据点。这里驻有日军200多人，伪军1000多人。敌伪凭坚固工事顽抗。吴怀才与政委一起研究作战方案，决定将日、伪军分别包围，先打伪军后打日军。战斗从深夜打响，拂晓前便攻下伪军据点。日军孤立无援，仓皇出逃。吴怀才率14团穷追猛打，除少数日军逃往蚌埠外，多数被歼。这次战斗共歼日军100多人，伪军700多人，生俘日军20多人，缴获步炮、机枪、弹药颇多。

在鄂豫皖湘赣解放区，长期孤悬敌后的第5师，在李先念的指挥下，主力部队和各军分区从8月中旬开始，向盘踞在中小城镇和交通要道的敌伪军展开反攻。师长麾下的指战员有一大批红安同乡，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打

得异常勇猛。13 旅副旅长邹国厚和所属 37 团政委曾广泰、38 团副团长刘金黄、39 团政委刘友海、特务团团长杨洪先等一同作战还是首次。因为邹国厚在 1944 年前战斗在华北。这位农民出身的将领参加过黄麻暴动，红军时期从班长当到团长。抗战开始后，先在 129 师 385 旅任团长，后任新编第 7 旅副旅长，从 1943 年起任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参加过“百团大战”、反“扫荡”、“清乡”等战斗。1944 年 10 月去延安党校学习，时值鄂豫边区需要干部，被调回家乡参加抗日战争。这次他和这么多同乡老战友一同参加反攻作战，非常高兴。他们根据师部的命令，沿平汉路东侧向南攻击敌伪据点，连克孝感魏店、花园、肖港、三汊和黄陂祁家塝等沿线重镇，歼伪军第 12 师大部，俘日军 20 多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与此同时，戴政率陂安南县大队配合第 1 军分区 42 团夺取了黄陂甘棠铺、六指店日伪据点。安麻县大队在吴明忠率领下先后夺取了麻城歧亭、红安门前塝、桃花、下店等据点，共毙伤日伪军近百人，缴枪 80 余支和一批军用物资，并将据点碉堡、鹿砦全部摧毁。下旬，戴政又率陂安南县大队，杨子明、钱运华率安礼县大队，配合 1 分区 42 团、教导团进攻敌人较大据点——日伪黄安县政府所在地河口镇。敌人顽抗不肯投降。我军以优势兵力一举将据点攻下，俘伪县长韩子钊、伪县大队长涂子敬以下官兵近 400 人，缴获长短枪 200 多支，轻机枪 9 挺，重机枪 3 挺，迫击炮 8 门和一大批军用物资。至此，陂安南、安麻、安礼三县境内的敌伪据点全部扫除。在这次战斗中，奉调来 1 军分区教导团工作不久的原 2 军分区独立第 5 团副团长黄光炳，在指挥攻打河口敌伪碉堡时不幸牺牲。他用自己的鲜血为家乡的抗战画上了句号。

战斗在鄂豫皖湘赣军区所属其他军分区的红安籍指挥员，也是战绩颇丰。2 军分区参谋长吴昌炽出谋划策夺取了应山境内的敌伪据点；5 分区副司令员罗厚福率 44 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天门县吴家新场歼灭拒降日军 1 个中队及伪军 2 个大队，计毙俘日军 55 人、伪军 300 多人，缴获平射炮 1 门，重机枪 1 挺，长短枪 270 多支；鄂皖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黄世德，在国民党军队干扰日伪军向我军投降的情况下，毫不退让，指挥所部拿下一些据点；豫中军分区的舞叶泌方中心县军事总指挥吴振挺，率 4 县地方武装，配合分区挺进团在舞阳公路上截击日军辎重，俘敌 7 人，缴获胶轮大车运载的 50 多辆军用物资，接着攻下叶县常庄据点，俘伪军 300 多人。

据不完全统计，鄂豫皖湘赣军区从 8 月中旬到 9 月上旬的大反攻中，红安籍将领积极参加反攻受降作战，拔除了 40 多处敌伪据点，其中城镇 10 多

处，让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从敌人的铁蹄下获得了解放。

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在10天之内，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面商国事。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参加谈判。8月28日，重庆派出专机迎接。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团，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接陪下飞抵重庆。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领导人很快坐到一起共商和平新中国成立大计，一时成为盛事。山城重庆沉浸在一片欢腾喜悦之中。

就在重庆谈判开始后的第二天，即8月29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剿匪手本》。这是蒋介石1933年为“围剿”各根据地红军而编写的，其目的是在军内进行反共、内战动员。在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密电，称谈判是为了拖延时间，转移国际视线，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完成受降以后，如共党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显然，蒋介石是在和平谈判的掩护下，加紧备战，妄图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对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的图谋，党中央和毛泽东早有预料和对策，其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为了配合重庆谈判，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我军各大战略军区的部队都做好了自卫反击的准备。

1945年8月16日，“山西王”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命令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4个师和1个纵队，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长治地区（古时称上党郡），企图夺取晋东南。为保卫根据地，中央军委决心对阎锡山予以迎头痛击。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阎部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刘、邓根据军委的指示，决定集中太行、太岳、冀南军区的三个纵队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共31000多人，发起上党战役。这是抗战胜利后，我军由分散游击战向集中运动战转变所进行的第一次战役。部队要适应这个转变，并战胜装备精良的敌人，必须在战术上有良策。为此，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征得中央军委同意后，将这一战役分两步进行，即先夺取长治外围各县城，然后再攻占长治。此役，有11位红安籍团以上指挥员参加，并在战场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是太行纵队司令员陈锡联，8旅旅长马忠全，9旅旅

长郑国仲，7 旅 20 团政委杨辉明；太岳纵队政委谢富治，11 旅副旅长黎锡福；冀南纵队保卫部长殷国洪，卫生部长梅宏德，4 旅副旅长赵鹤亭，5 旅 13 团团长徐青山，6 旅独立团团长张绍基等。

9 月 10 日，战役正式打响。凌晨 2 时，陈锡联指挥太行纵队向屯留县城的敌人发起攻击，太岳、冀南纵队隐蔽在长治到屯留的公路两侧打援。攻击发起后，长治敌军出动 6000 多人向屯留增援，与我打援部队稍一接触，害怕被歼便缩回长治。陈锡联抓住战机加紧攻城。这位在抗战初期，曾率一个营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毁敌机 24 架的英雄指挥员，经过 8 年抗战锻炼，使他更加有勇有谋，成为真正能征善战的“钢炮将军”。他知道这次参战是首战的首战，打好这一仗不仅关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全党全国和党的领袖在重庆谈判这个大局。在他的精心指挥下，马忠全、郑国仲、杨辉明等旅、团长都亲临前线与战士们一起战斗。经过一天一夜激战，12 日便拿下了屯留城，全歼守敌 2000 多人，打响了上党战役第一炮。然后各路纵队轮番向敌人进攻。13 日夜，谢富治与司令员陈赓指挥太岳纵队进攻长子县城，太行、冀南纵队打援。长治敌人不敢增援。于是，陈锡联率太行纵队进攻壶关县城；赵鹤亭、殷国洪、梅宏德、徐青山、张绍基这些旅、团干部所在的冀南纵队，在陈再道的指挥下进攻潞城县城。17、18、19 三天，三个纵队便夺取了长子、壶关、潞城三城，共歼敌 5000 多人。至此，长治外围五城市——屯留、长子、壶关、潞城、襄垣（此役之前已夺取）全部攻克，共歼敌 7000 多人，胜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

9 月 20 日，我军开始合围长治。长治为上党地区首府，是过去日军设防的重点，城高壕深，工事坚固，敌有万人据守。加之天雨路滑，扒城不便。因此，攻长治比夺五城要困难得多。刘、邓决定采取先夺关后攻城的战法，从东、南、西三面进攻，北面留缺口诱敌外逃，然后歼于野战之中。到 24 日，我军已攻占城关多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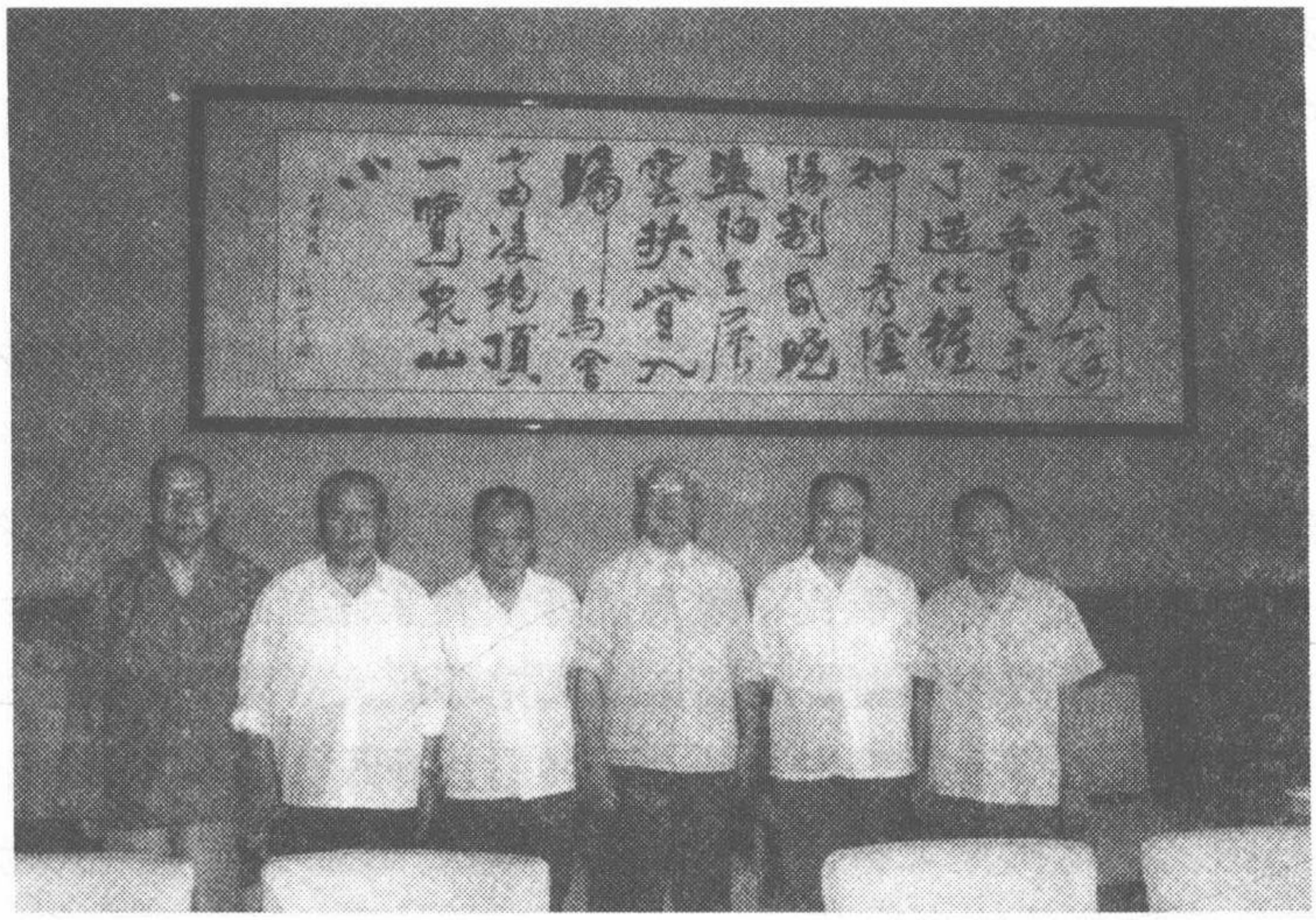
28 日，我情报人员从敌人内部获悉，阎锡山派出三个师 7000 多人增援，两支先头部队各 1000 多人，已从北面和西面进至离刚夺取的襄垣和屯留不远。战场多变。刘、邓马上改攻城为打援，重点放在打援上面。急调陈锡联的太行纵队和陈赓、谢富治的太岳纵队兼程北上打敌援军。留陈再道的冀南纵队攻城，但只佯攻，以吸引敌人援兵南下，同时准备歼灭出城接应之敌。30 日，敌援军沿虒亭、屯留大道前进。我打援主力向虒屯大道两侧运动，并增派晋冀鲁豫军区直属 17 师尾随敌后前进。10 月 2 日，我主力部队与敌人

在屯留西北遭遇，各部队随即向敌人展开攻击，将其合围起来。敌人发现被围后，利用山地构筑工事，恃其机枪多、炮兵强进行顽抗。为避开敌人火力优势，我军发挥打夜战的长处，凭手榴弹、刺刀向敌人的薄弱处进行突袭。这些传统战术用上后很奏效。太行纵队 8 旅长马忠全、9 旅长郑国仲凭借这种打法，指挥部队不断突破敌人的防守线并向纵深推进。太岳纵队 11 旅副旅长黎锡福，抗战开始后就带部队在这一带打游击，对地理民情非常熟悉。他指挥部队进攻，也是连连得手。经过昼夜不停的激战，我军各部队已歼灭一部分敌人。敌被迫步步收缩到磨盘垴和老爷岭地区，缺水缺粮，饥疲不堪，仍作困兽之斗。

为避免“啃硬核桃”，刘、邓又施一计。调冀南纵队大部分投入打援。指示他们白天开进，故意让敌人看见，增强威慑力，以便动摇敌人的军心。然后在北面布下阵来，留一缺口诱敌向北突围。10 月 5 日夜，被困之敌果然向北突围。这时早已等候在此并占住制高点的冀南纵队 4 旅副旅长赵鹤亭同旅长一起率部队猛烈出击，截断敌人的退路。其他兄弟部队迅速将敌拦腰切断，猛烈穿插，使敌人溃不成军。战至 6 日，除 2000 余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这时才知敌人援军不止 3 个师 7000 多人，而是由第 7 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 8 个师 2 个炮团，共 20000 多人，彭毓斌被击毙，数十名高级军官被擒。敌援军被歼后，长治城内的敌人于 10 月 8 日向西南突围，其主力在 12 日被歼灭，史泽波被擒。

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历时 22 天，共歼敌 13 个师计 35000 多人，缴山炮 24 门，轻重机枪 2000 余挺，长短枪 16000 多支。这次胜利，显示了解放区军民的坚强力量，对重庆谈判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给予了高度赞扬。他风趣地说：“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地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被消灭了三万五，逃掉二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还要拼命来争。”

事实与毛泽东预料的完全一样。蒋介石为了“控制华北，抢占东北”，在 10 月 10 日签订《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之后，墨迹未干，就于 13 日发出进攻解放区的“酉元密令”，要求国民党各战区将领



1987 年，原第 3 纵队部分首长重聚一起。左二起：郑国仲、马忠全、陈锡联、李德生等。

“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并先后动用百万军队和 50 多万伪军，向冀、晋、鲁、豫、绥、察、苏、浙、皖、鄂、粤 11 省的解放区进攻。其中规模最大的有孙连仲部 5 个军沿平汉路北犯安阳、邯郸，傅作义部 3 个军、胡宗南部 3 个军向平绥路和正太、同蒲路进攻，李品仙部 4 个军向津浦路徐济段进攻。为保卫解放区，阻止国民党军进犯，我晋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山东军区和华中新四军主力部队及各地民兵，遵照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纷纷投入自卫反击作战，先后发起了邯郸战役（又称平汉路战役）、察绥战役（又称平绥路战役）、津浦路徐济段战役。

10 月中旬，刚刚打完上党战役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6 万人和 10 万民兵，在刘、邓指挥下，马不停蹄，兵不解甲，于 10 月 23 日发起邯郸战役，11 月 2 日胜利结束。这次战役使国民党第 11 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领的 45000 多人产生两个结局：一是新编第八军军长高树勋在我们的争取下，率全军 1 万多人起义；二是负隅顽抗的马法五和他属下的 5 个师长及广大官兵 2 万多人被俘，另有 3000 多人被击毙。此外，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美式反坦克炮、火箭筒等，给敌人又一次沉重打击，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很大震动。在这次战役中，陈锡联所率第 3 纵队，在作战中表现出来的机动灵活，战则必胜的战斗风格，很受刘、邓首长的青睐。它说明我军从游击战转向运动战已经成熟，因而战斗力也猛增。

在邯郸战役发起前五天，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统一指挥两区主力部队53000人，于10月18日对进攻热河、察哈尔解放区的傅作义部5万人发起了察绥战役。郭天民、詹才芳、李天焕、陈炎清、谢正荣、韩志凤、朱静轩、郑维家等红安籍团以上干部率部参加了战斗。首战在卓资山地区进行，我军未能抓住分割围歼有利时机，敌人逃到归绥、包头城内死守。我军乃攻归绥未克，继攻包头也未奏效，11月14日撤出战斗。这次战役共歼敌12000人，收复绥东广大地区，减轻了敌人对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的威胁，有利于我军政人员继续向东北挺进。

津浦路徐济段战役，主要是阻止国民党军队大举北犯。这次战役，是在原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率主力开赴东北后，新四军军长陈毅刚抵山东，来不及统一两个军区部队之际进行的。陈毅只好组建临时指挥部统一作战部署，命鲁中军区部队攻歼泰安、兖州守敌，山东军区第8师和鲁南军区部队攻歼邹县、临城间的守敌，新四军北调山东的第2师、4师迎击徐州北进之敌。10月19日战役打响，鲁南军区1军分区司令员贺健与兄弟部队一起，在军区首长指挥下，一举攻克邹县、大汶口，歼灭了听命于国民党的日伪军。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率主力歼灭了泰安、兖州间的守敌。李世焱、程启文、吴怀才等所在的新四军第2师和周世忠、罗应怀所在的第4师，除阻击徐州北进之敌外，还在界河以北设伏歼灭了伪军吴化文部4000多人。随后我军继续扩大攻势，到12月中旬，又先后攻克了藤县和临城，控制了徐州至济南间铁路200多里。这次战役共歼敌非正规军（包括日伪军）共8800多人。粉碎了蒋介石打通津浦路向北进军的企图，推迟了国民党军进占华北、东北的计划，也为我军做好战争准备争取了时间。

军政兼施　促敌起义

回头再说说在邯郸战役中发生的那件令国民党朝野震惊的事，就是高树勋在内战前线举行战场起义。这事是陈锡联、郑国仲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用军政兼施的办法促使高树勋走向光明的。据当事人之一、原海军副司令员郑国仲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5年10月14日，也就是《双十协定》签订后第四天，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第四十军军长）、高树勋（兼新编第八军军长）率三十军（军长鲁崇义）、四十军、新八军约45000人从新乡出发，沿平汉

路北犯，计划用 10 天时间打通平汉路，进抵石家庄。然后控制这条铁路，运兵抢占东北。为了自卫，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必须歼灭沿平汉路北犯之敌。强调这次战役的胜败，关系到争取实现和平这个大局，必须打好，要力争全胜。否则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刘、邓接到军委指示后，带着上党战役的硝烟，从山西赶赴河北。一路上边走边召开纵队领导人会议，讨论作战计划。刘伯承司令员在分析敌情时说："这次进犯之敌中，有嫡系和非嫡系之分。马法五的四十军和鲁崇义的三十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高树勋的新编第八军是非嫡系部队。我们要针对敌人营垒中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嫡系部队要打得狠，打得勇猛顽强；对非嫡系部队要采取灵活的打法。具体点说，对高树勋的新八军则应：一要把他包围住，打消其内部一部分人的幻想，使其发生变化；二要打好政治仗，掩护我们派人去与高树勋谈判；三要准备可靠的同志送信联络；四要在打的时候掌握好分寸，既要真打给高树勋施加军事压力，又要有间歇给他们以希望。总之，我们要做到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交叉进行，争取高树勋起义。这样我们就能获得这个战役的全胜。"

邯郸战役作战计划经军委批准后，接下来是调兵遣将。刘伯承和邓小平反复考虑：派谁去打高树勋为好。两人最后确定，由陈锡联纵队完成这个任务。

10 月 24 日，刘、邓率第 1、2、3 纵队到达预定战场，1、2 纵队分别包围敌四十军和三十军，3 纵包围新八军。战前陈锡联向所属 7 旅旅长赵兰田、8 旅旅长马忠全、9 旅旅长郑国仲交代任务时说："7 旅在左翼，8 旅在右翼，9 旅既要打好军事仗，又要打好政治仗。"究竟如何打好政治仗，他没多讲。

入夜，战斗打响。各部队向敌人发起攻击。从左翼进攻的 7 旅，猛攻敌新八军与四十军的结合部，然后向新八军的外围阵地进攻。从右翼进攻的 8 旅，在马忠全的指挥下，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经一天战斗，将新八军与三十军的联系切断，占领了他们之间的重要据点中马头。从正面进攻的 9 旅，正在向新八军军部驻地马头镇攻击时，突然叫暂停。指战员都不理解。战士问班长，班长问排长，排长问连长，一级一级的往上问，这是为什么？最后问到旅长。幸好旅长郑国仲在接到上级命令时，了解了上级的意图，便把暂停的意思按自己的理解作了一番解释，然后往下传达。他说："我旅作战要紧密围绕军区首长和纵队首长的意图行事。采取的办法是，围而不打，打而不猛，有进有退，打打停停。"广大指战员才知道，这是一次特殊的作战任

务，大家的战斗情绪依旧饱满如初。

25日凌晨，9旅从接近马头镇的阵地上撤回驻地。休整了一天后，26日凌晨以两个团的兵力再向马头镇进攻，在突破敌人多处防御前沿的情况下，又主动撤回原地。这样反复进攻过多次，目的是向新八军显示我军的战斗力，给他们造成一种军事压力；同时又表明我军对新八军和其他两个军是有区别的，促使高树勋尽快做出抉择。

高树勋原是冯玉祥的部属。抗战期间在山东积极抗日，与共产党、八路军有过联系。他率领的新八军，与蒋介石的嫡系素有矛盾，在国民党军中受排挤。高树勋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通过8年抗战，使他看清了只有依靠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他们才能生存下去。于是在1945年8月初，给彭德怀副总司令写了一封信，希望与我军友好相处。9月下旬，又派与他有深厚交情的幕僚王定南（系中共地下党员），到山西黎城与我军联系。当时上党战役打得正激烈。在炮火喧天的前线指挥部，刘、邓首长热情地接待了王定南。邓小平说："你来得正好，我们也准备做这项工作。为了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其在政治上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和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军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在这项工作上做出成绩。所以你要赶快回去，做好高树勋的工作。"刘伯承随即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王定南，表示欢迎高树勋将军派人联系，希望他不断进步，为革命、为人民做出贡献。

刘定南走后，刘、邓又派人去将他追了回来。邓小平告诉刘定南："这几天情况变化很快。高树勋的新八军已经离开新乡，到达了磁县马头镇。你应直去马头镇。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拦这一路的国民党军北进。这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刘伯承也补充说："蒋介石的意图，是要11战区的三个军进到北平，使北平的国民党军进占我东北解放区。因此，我们必须守住南大门，掩护我们的东北根据地。"接着邓小平更明确地说："现在你回去就对高树勋将军讲，根据形势的需要，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的战略任务。"刘伯承最后强调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要他当机立断！"说完，邓小平就今后的联络事宜，向王定南作了交代。

上党战役结束后，晋冀鲁豫野战军迅速开赴磁县。王定南再次来见刘、邓，报告高部情况。刘、邓要他抓紧时间做高树勋的工作。鉴于战斗很快就

要打响，双方商定在前线建立联系。谈完后，刘、邓用车将王定南送到3纵指挥部。陈锡联热情地接待了他。两人又商定了火线送信的办法和步骤。为了王定南的安全起见，陈锡联让他暂住下来，等双方沟通以后再回马头镇。

敌我前线建立联系不是一般任务。陈锡联将这一重任交给了9旅。郑国仲根据上级意图，挑选精明强干的秦国仲，化装前往敌营送信。郑国仲嘱咐小秦说："这里有两封信：一封是王定南特使写给对方田树喜团长的，须交本人；另外一封，是刘、邓首长写给高树勋将军的，请田团长一定要转交到，万万不可失密。"小秦充满信心的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时近黄昏，暮气和硝烟开始笼罩大地。机智、勇敢的侦察员小秦化装成商人，向敌人的阵地走去。郑国仲指挥用炮火掩护。快到敌人阵地前，小秦边走边喊："请你们不要打枪，我是给你们的田团长送信的！"天黑以后，对方派一士兵陪同小秦穿过敌军的前沿阵地回来了。郑国仲赶紧问情况如何？小秦说很顺利。他从马头镇西南角一进去，就有人把他接走，见到田团长后又派人把他安全地送回来。双方算是沟通了。接着，郑国仲把王定南和军区敌工部参谋辛志良又送过去。临走时，郑国仲根据陈锡联的指示告诉他们：今夜零点我军攻击马头镇，希望在攻击之前能得到高将军的回信。但高树勋没有作答。9旅攻击一阵，又奉命退回原地。

鉴于高树勋犹豫不决的态度，刘、邓又指示陈锡联再派得力干部去送信。陈锡联到郑国仲的指挥所研究，决定派9旅侦察股长罗永年，带着刘、邓的亲笔信，二进马头镇，进一步表明我军的态度。罗永年带着几名侦察员，乘黑夜赶往马头镇。在敌人前沿阵地不远处，按事先约定的联络信号，燃起一把火，前沿敌兵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罗回答："我们是来见田团长的。"敌兵又问："你们来了几个人？"罗答："五个人。"敌兵说："只准你们进来三个人。"罗永年带着两名侦察员走过去，被带进镇里一间房子里休息。过了一会，一名军官以友好的态度将一封信交给罗永年，然后派人将他们从原路送回。

如此人来信往，看来不能很快解决问题。刘、邓决定在政治争取的同时，给高树勋再施加一定的军事压力，命令陈锡联对马头镇实行有选择的攻击。陈锡联接到命令后，亲自到9旅摆兵布阵。他与郑国仲等一起研究决定，除留一个团继续监视马头镇外，旅主力转到马头镇的西北面，对据守路庄的新八军发起猛攻。与此同时，7旅从花官营由北向南攻，8旅从中马头由南向北攻，直逼马头镇。战斗从天黑打响，战至拂晓，眼看9旅就要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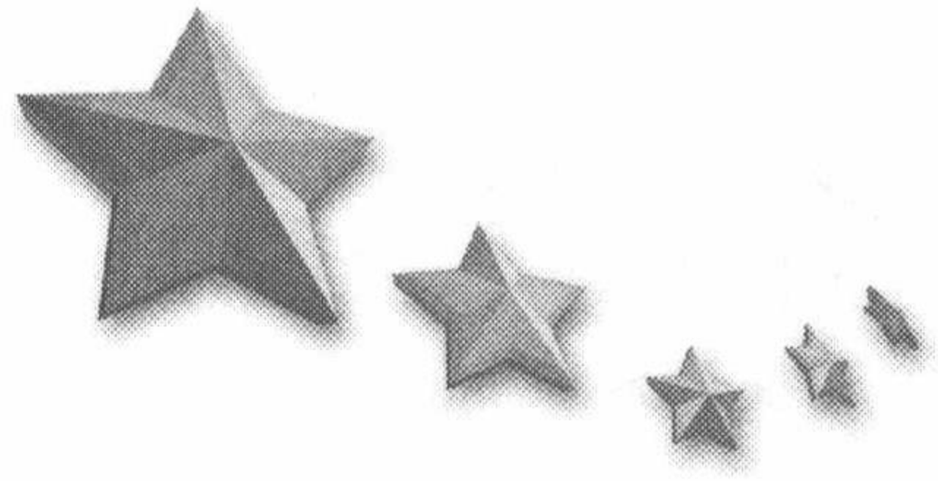
马头镇外围的重要据点路庄，又奉命撤出战斗。早就想打个痛快的广大指战员，都不解地嘟叨："这是打的什么仗？！"郑国仲和政委秦传厚跟大家解释说："这是刘司令员的军政兼施战术，既打军事仗，又打政治仗。"指战员们向来佩服刘司令员用兵如神，再也不说什么了。

经过我军连日来的打击和争取，高树勋终于打消顾虑，下定决心，同意谈判。刘、邓决定派野战军参谋长李达作代表前往马头镇。护送李参谋长的任务又交给了9旅。郑国仲知道事关重大，不能有半点闪失。他把罗永年、秦国仲等去过马头镇联络的侦察员招来，详细研究了保卫措施。29日晚，李达参谋长一行在夜幕的掩护下，前往马头镇去与高树勋谈判。由于我方态度真诚，出席的代表规格很高，高树勋很受感动，与李达彻夜长谈后，决定率部起义。10月30日下午，高树勋在内战前线率新八军10000余人在马头镇起义。

敌人兵力骤减，全部动摇，四十军和三十军开始收缩，准备逃跑。刘、邓早已布置好围歼阵势，兵分几路向敌人出击。郑国仲的9旅完成任务后，又迅速投入到围歼战斗中去。11月2日战斗结束，不到两天时间，共毙伤敌3000余人，俘敌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四十军的师长司马恺、李振青，三十军师长王震、李学正等高级将领以下近2万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其中有美式反坦克炮、火箭筒等，为我军从山地转入平原作战，提供了新的武器。

高树勋率部起义，使我军迅速夺取了邯郸战役的胜利。这是继上党战役之后，给国民党军又一次沉重打击，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很大震动，对阻止敌人沿平汉路北进起了重大作用。

郑国仲跟笔者讲完事情的经过后，颇有感慨地说："指挥打仗，不那么简单。有时军事仗要按政治仗来打，有时政治仗要按军事仗来打。领会贯彻好上级的作战意图，把握好战斗火候，全靠指挥员的判断能力！"他的这番话包含着深厚的军政修养，体现了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是科班胜似科班出身。所以，他们能够打败那些黄埔、保定等名牌军校出身的国民党将领。



第八章　巧布迷阵突重围

李先念舌战郭忏质问谁在破坏停战协定。雪中送炭董必武到宣化店慰问。周恩来促美蒋代表到宣化店调停借机传达中央指示。李先念、郑位三巧摆迷魂阵然后金蝉脱壳。夏世厚杀出血路让李郑率部脱险。闵学胜历险不惊带余部胜利归队。刘昌毅杀回马枪重返大别山东山再起。何德庆为革命两次忍痛寄儿。

自力更生　坚守中原

抗战期间，蒋介石躲进峨眉山，他的部队也大多退避西南和西北。抗战胜利后，他要出山回南京，进军华东，控制华北，抢占东北，新四军第5师所在的中原地区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必先尽快清除。因此，从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起，蒋介石就从第一、五、六、九、十这五个战区调集20多个师和9个游击纵队，从四面八方向中原解放区扑来，先后侵占了我鄂中、襄西、襄南、鄂东、鄂南、豫中、豫西等广大地区。

我党中央深知中原地区所处的战略地位重要，也在同一天电告第5师："你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将到来的内战局面，才不至临时张皇受挫折。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上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的内战危险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第5师立即投入到对付内战的斗争中去。9月间，师部将三个主力旅组成野战纵队，把守着中原大门。10月间，党中央为加强中原地区的斗争，以便牵制更多的国民党军，决定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自广东北返，命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南下。月底，三大主力部队在鄂豫交界的桐柏地区会师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并组建中原军区，下辖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郑位三任中原局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李先念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戴季英任副政委，王首道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后将三支主力部队整编为两个纵队和三个独立旅。河南军区部队编为第1纵队，下辖第1、2、3旅；南下支队恢复359旅番号，与5师野战纵队合编为第2纵队，下辖第13、15旅及359旅。三个独立旅分别属于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从此，中原地区的人民武装统一起来了，共有兵力6万余人。

中原军区的建立，形成了一只"铁拳"，既守卫中原解放区的大门，又

牵制国民党军队对华北、华东解放区的进攻。在这只“铁拳”中，有一大批红安籍干部。他们中除李、郑两位主将外，还有副旅长以上干部16名。他们是：中原军区副政委兼第1纵队政委戴季英、1纵副司令员刘昌毅、后勤部长叶再元、3旅旅长闵学胜，第2纵队14旅副旅长邹国厚、参谋长周光策、政治部主任刘友海，江汉军区副司令员罗厚福，鄂中军分区参谋长吴昌炽，河南军区副政委曾传六，鄂东军区独立第2旅供给部长马友才，河南军区独立第3旅政治部主任曾焜，豫鄂陕军区野战纵队第1支队长曾广泰、政委秦振、第6支队长邹顺华、第8支队政委戴克明等。至于团级干部更多，计有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政委秦忠（教导团后撤销，改任3旅9团副政委）、1纵1旅1团团长王诚汉、2团政委吴振挺、3团政委陈行庚、3旅7团团长阙子清、政委何德庆、2纵13旅团长杨洪先，独立第2旅4团团长张海彪、5团政委汪进先、6团政委黄世德、干部大队大队长黄宏伸，还有郑维忠、郑维孝、徐锡煌、黄宏儒、潘继义、冯益民、康洪山、杨德香、周泽厚、戴福山、胡承尧、吴光禄、许生玉等20多人。此外，不属部队编制，但参与领导了中原地区斗争的还有董必武、李金德等。如此众多的红安籍中高级干部同广大军民一起，为争取中原地区和平、制止内战发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中原军区部队组建完毕，1946年1月，由桐柏山向大别山进发，下属三个军区的部队亦在各自所在地区展开。1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经过谈判达成停战协定。中原解放军即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近200里的地方停驻待命。

宣化店隶属湖北礼山（今大悟）县，地处大别山西端，位于罗（山）礼（礼山，今大悟）黄（黄安，今红安）经（经扶，今新县）4县交界地区。西靠平汉铁路，东有淮南铁路，南面长江，北临淮河。虽是一个山区小镇，但具有战略地位。中原解放军集结在此，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军队出鄂北上和东进。“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视其为心腹大患，欲尽快除之。他先后调集30万大军，修筑6000余座碉堡，将我中原部队包围，实行军事蚕食和经济封锁并举的战术，妄图制造新的“皖南事变”。

为了粉碎蒋介石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恶毒阴谋，中原军民在党中央领导和关怀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关键时刻，李先念、董必武冒着危险，同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过多次谈判和斗争，想争取和平解决问题，但都未能如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

2月初，为了表示我军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诚意，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将（和谈期间，为了工作需要，中央军委曾给我方参加谈判的重要代表授过将级、校级军衔）赴汉，与国民党武汉行辕副主任郭忏中将，就中原地区破坏停战协定等问题进行对等谈判。谈判会上有中外记者参加。郭忏信口雌黄，造谣惑众，胡说中原共军破坏停战协定，抢占了黄陂塔耳岗、礼山河口、安陆赵家棚等他们的阵地。待郭忏讲完后，李先念慢慢站起来发言。他说，我有个问题要请教郭将军——然后用问话的语气说道：有道是水有头，山有主。抗战8年，你们的部队一直待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同日本鬼子打过仗？塔耳岗、河口、赵家棚是我们浴血奋战从敌人手中收复的。你们是什么时间开进上述地方的？明明是你们抢占我们的地方，怎能说是我们抢占了你们的阵地呢？请郭将军回答。郭忏面有难色，回答不出，只是连连说：这个嘛，这个……李先念理直气壮的发言，使反动派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尽管郭忏理屈词穷，仍无遵守停战协定以保中原和平的诚意。这次谈判虽收效不大，但揭穿了国民党的谎言，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

中原危急，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方局副书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我党驻重庆谈判代表董必武揪心。他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和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就中原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过多次交涉，反复斗争。董必武参加完政协会议后，即与周恩来商量去宣化店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问题。行前，董必武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特地邀请了正在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的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主任郑绍文，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中原形势，揭露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战协定，封锁经济，使边区军民陷入困境的种种事实，引起舆论界的强烈反响。经过新闻媒体传播，原来只听到一面之词的国内公众，对中原地区的形势才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他们对被困军民深表同情，有不少民主人士和学生走上街头，反对蒋介石在中原发动内战。

3 月 24 日，董必武偕郑绍文由重庆飞抵武汉。他不顾疲劳，竟日奔走于联合国救济署驻汉办事机构和有关团体之间，为中原解放区筹粮。30 日，董必武在我党驻武汉代表吴德峰等人的陪同下，乘车到达宣化店，代表党中央和解放区人民慰问军民，并带去华北解放区人民捐赠的 3 亿元法币和重庆办事处同志们捐献的医药用品，以供军民急用。正在忍饥挨饿中进行艰苦斗争的中原军民，见董必武来慰问他们，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军民们欢迎董老的激动心情，当时在宣化店出版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报《七七日报》发表别具一格的社论中，表达得非常充分。

欢迎你，董老！
犹如一阵温暖的春风拂去了我们的愁容，
又好比冬天的太阳使我们忘却了寒冬。
是你啊，董老！
是你带来了亲切的慰问，带来了革命的热爱，
使我们又有兴致热情地歌唱起来，
使我们的愁眉变成了笑容，
是你的来临使我们欢笑在危难中，
……
我们欢迎而又感谢，
感谢你不辞劳苦来解救我们的苦痛，
感谢你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我们，
关怀着我们这一群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原解放区的广大群众。
是你的老当益壮的革命精神感动着我们，
使我们在敌后斗争了八年，使我们敢于冲破内战的重围，
使我们在这弹尽粮绝的时刻，还能够苦熬坚持，屹然不动！
我们又亲眼看到你那和善的面容，
听见你的声音，那永远向前的诲人不倦的醒钟。
你还是那样健康，那样焕发，丝毫看不出老态龙钟。
祝福你，董老！
愿你永远健康！愿你幸福！愿你的革命事业不断地成功！
我们将永远追随着你，学着你的榜样。
我们要为中国彻底民主而斗争。

我们也要更努力地苦熬坚持，
为了我们的生存，为了拯救我们自己于危难之中。

从这些热情似火的诗句中，我们看到了广大军民对董老的欢迎与感激之情。

这篇社论是《七七日报》社长夏农苔写的。据说，平时他写社论来得很快。这篇社论，按常规写法，他写了一个晚上，排字工人催过几次，却不能脱稿，总觉得未能表达中原军民的心声。忽然他想到自己和广大军民对董老来宣化店慰问的高兴劲头，于是茅塞顿开，文思泉涌，洋洋洒洒，一挥而就。

这篇社论出台的故事，说明最感动人的东西，是危难之中的革命真情！这种真情是鼓舞人的一种力量。董老的革命精神、革命人格，从来都是非常感动人和鼓舞人的。不论他走到哪里，人民喜欢，敌人畏惧。别看他的名字叫“必武”“用威”，可是他从未担过任何军职。因此，有人赞扬说董老不拿枪胜过十万兵。

董必武在宣化店逗留了十天，看望了机关、团体、部队的干部战士，学校师生和民主人士，走访了农村群众，给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怀，鼓励广大军民“加强团结，战胜困难，能苦必胜”。在此期间，还多次与郑位三、李先念等中原军区领导人一同研究与反动派作斗争的策略。董必武宣化店之行，给广大军民战胜国民党军增添了巨大力量。

4月18日，董必武回到重庆，用自己亲眼所见向各界揭露：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的封锁和进攻，造成军民极大困难。无论军民，每天都只能吃一餐稀饭。宣化店有整个一条街没有一家有门窗。中原军区司令部也一样，从大门进到里面，没有一扇门窗。饥饿、凄凉和内战充满宣化店，这就是高喊和平的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董必武对反动派的有力揭露，使中原解放区军民的正义事业，得到了重庆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继董必武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驻南京（此时中共代表团已从重庆迁到南京）代表团团长、停战小组和军事调停部代表周恩来，就国民党军队进一步破坏停战协定，加紧封锁蚕食中原解放区的问题，奉中央之命又作宣化店之行。

5月6日，在军调部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的一再敦促下，美方代表白鲁德、蒋方代表王天鸣不得不同他一起，从武汉出发，赴宣化店进行军事调停。当军车行至黄陂十棵松时，因山洪暴发遇阻，美蒋代表想回汉口，周恩

来不同意。他让曾在黄陂任过县委书记的任仕舜去动员群众，将一辆辆车子抬过河去，并将美蒋代表也抬过河去，自己则涉过腰深的河水到对岸。在场的群众热烈鼓掌欢迎，美蒋代表的脸上显得很不自在。山路难行，走走停停，7日上午才到宣化店。下午军调小组代表与中原军区负责人见面座谈。晚上，中原军区举行了欢迎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谈到当前形势时，结合宣化店地区不断发生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战协定的事实，说："事实已经证明不论文的武的，小打大打，国民党方面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消灭共产党的武装。"

会后，周恩来在中原军区司令部作战室听取了李先念、郑位三的汇报。李先念指着墙上的地图说："南面是长江天险，西面是桐柏山区，这两处是国民党的后方，只有北面和东面是我华北、华东解放区。从突围得失上看，我们向北和向东突围有利，可以进入华北、华东解放区。但是，敌人是不会让我们去的。他们已经在这两个方向布置了重兵。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们只有向南和向西了。但是，向南有长江天险，即便是过了江也是进入敌人的腹地。所以，目前只有向西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关于向西突围的具体方案我们已经报送中央，并经军委研究批准了。"

周恩来听罢点点头，说："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只是你们一定要把主力向西突围的困难考虑充分，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李先念回答说："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战胜。"

然后，周恩来对突围具体方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商定。

8日上午，周恩来与美蒋代表一行实地察看了一些地方，随即回到汉口进行谈判，并达成了《汉口协议》。这个协议同意中原军区转移800余名伤病员去华北解放区，复员近万名老弱病残干部战士。周恩来通过谈判斗争取得的这一成果，虽使中原解放区的困难稍有缓解，但形势依然严峻。

周恩来此次与美蒋代表一起到宣化店调停，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深入实地调查了解，用铁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方面发动内战的阴谋；二是深入实地与中原军区进一步商定了突围方案。两个方面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里还应该说一下，在周副主席的随行人员中，还有跟随多年的机要秘书李金德，时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秘书处副处长。李金德是郑位三的老部下。1935年郑位三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时，他是机要通讯员，人很精明。周副主席这次带他到宣化店，一来让他与久违的老领导、老战友见见面，二来好了解中原地区更多的情况，以便与美蒋代表谈判。李金德是在这

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为中原突围做出了一份贡献。

周恩来一行离开宣化店之后，郑位三负责很快完成了转移和复员干部、战士的工作，他借用这次合法机会，用化装的办法，多转移了非老弱病残干部 1000 多人，为日后重返中原保存了大批骨干。李先念则负责做好了突围的一切准备。

巧布迷阵　突出重围

经过近半年的围困，蒋介石认为消灭中原共军的时机已经成熟，委任郑州行营主任刘峙为“围剿”总指挥。密令他指挥 30 万大军，于 1946 年 7 月 1 日发起总攻，在 48 小时内将共军消灭。但是，在“围歼”的战略上，蒋介石和刘峙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们以为中原共军不会向西和向南突围。因为西面近有平汉铁路，远有武当山脉，插翅也难飞过去；南面是波涛滚滚的长江天险，横渡很困难。只有北面和东面可去。北面有晋冀鲁豫解放区，是八路军主力所在地；东面有苏皖解放区，是新四军主力所在地。因此，他们认定中原共军必定向北和向东突围。于是，在宣化店的北边和东边特别加强兵力，还故意在我 1、2 纵队驻地的东北方向——潢川县西南一带留下一个缺口，布下一个“口袋”妄图引诱我军钻进他们的“口袋”里。



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

战场本来就是斗智斗勇。根据党中央批准的突围计划和“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集思广益，对敌人来个“将计就计”。在我军突围前三天，李先念令 1 纵 1 旅旅长皮定均，率部向敌人布置的“口袋”靠拢，但不进入“口袋”，只在袋旁徘徊，构筑工事。入夜将兵力悄悄西移，天明后又大摇大摆地向东开进。故意虚张声势，给敌人造成我军将大举东进的错觉。再令张体学率鄂东军区独 2 旅在红安活动，配合 1 旅制造东进假象。敌人得到这些情报后，进一步断定我军要

向东、向北突围，于是在北线和东线继续增兵。将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东线和北线之后，李先念再摆出迷魂阵，来个金蝉脱壳。

6 月 26 日傍晚，以野外演习为名，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在李先念、郑位三的率领下开始离开宣化店，留下王震、王首道迷惑敌人。与此同时，2 纵 13 旅、15 旅 45 团亦奉命从罗山定远店驻地出动跟进。27 日，两王率 359 旅和干部旅又离开，再让张体学率独立旅进驻宣化店，继续迷惑敌人。但我军“出出进进”的活动，引起了军调部驻宣化店第 32 执行小组蒋方代表李柱流的注意。他为了探听我军的动静，突然向我方代表任仕舜提出备忘录，称：“据了解，共军集结，准备突围。”为了防止泄露军事机密，任仕舜退还备忘录并严厉驳斥他说：“纯属造谣。”李柱流见捞不到什么，就让美方代表白罗素出面，提出要见李先念将军。他们认为如李司令在宣化店，说明我军未采取突围行动；若是不在就说明已经准备突围了。任仕舜向中原军区司令部（实际上是张体学独 2 旅的旅部）打过电话后，回答白罗素说：“李将军身体欠佳，改日再行会见。”其实，这时李先念已率部进至平汉铁路附近了。他接到张体学的报告后，为了进一步稳住敌人，立即迅速赶回宣化店。29 日上午，白罗素以向李将军送药表示慰问的名义，在任仕舜的陪同下，拜见李先念。他们来到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时，这里一切正常：操场上有人操练，司令部的人员正在进行学习。白罗素进入住房，李先念从床上坐起来表示欢迎。白罗素用西方人惯用的礼节施过礼后说：“李将军，听说贵体欠佳，我们深为挂念。这是美国最新药品，愿将军早日恢复健康。”李先念对美方代表的“友好关怀”表示了谢意。待白罗素走后，李先念立即跃马扬鞭，追赶部队去了。

白罗素回到住地宣化店河西会馆，通报了他会见了李司令。美蒋代表和工作人员一个个喜形于色，认为他们将在 48 小时内全歼中原共军的美梦就要实现。殊不知，就在 29 日这天我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分几路开始突围了。

首先是皮定均率 1 旅 3 个团从敌人“口袋”旁边杀出，越过潢（川）麻（城）公路封锁线后迅疾南驰，然后折向东去。一路上遭到敌人重兵追堵。在松子关、小界岭等地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时任 1 团团长王诚汉、政委陈行庚和 3 团政委吴振挺，各自带领所在团，时作前锋，时当后卫，时向敌人发起主攻，时断后阻击敌人，打得十分出色。7 月 20 日，1 旅在苏皖解放区淮南支队的接应下，胜利越过津浦铁路与新四军主力会师。

其次是 29 日晚，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首道先后率部抵达信阳柳

林车站附近，一举越过平汉铁路向西北前进。路上，李先念又兵分两支，一支由他亲率 2 纵 13 旅和 15 旅 45 团向陕南之宁陕方向前进；一支由王震率 359 旅（此时干部旅已取消）向陕南之柞水前进。河南军区所属独 3 旅为这两支突围部队打掩护。

第三是王树声、戴季英率 1 纵 2、3 旅和 2 纵 15 旅 43、44 团离开光山泼皮河驻地后，南行两百余里，29 日进至孝感花园附近遭敌阻击。30 日发起强攻越过了平汉铁路封锁线，在江汉军区独 1 旅的掩护下，向鄂西北方向前进。

我军主力相继离开驻地后，张体学也要率部队离开宣化店了。29 日晚，他去 3 人小组驻地河西会馆“辞行”。只见美蒋代表及其工作人员，正在我方代表任仕舜安排的宴会中喝酒起舞。张体学先与任仕舜打招呼，然后由任陪同会见美蒋代表，郑重地通知他们：“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撕毁《停战协定》，向我们进攻，我们突围了。”美蒋代表听后气急败坏，但又无可奈何。宴席也不欢而散。张体学告辞出来，迅速率独 2 旅离开宣化店，撤至红安天台山，然后向麻城、罗田方向前进。

李先念的金蝉脱壳计，使敌人竟未察觉被困之军已经突围。当我军强行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枪炮声划破夜空时，敌人才如梦方醒。刘峙得意洋洋准备向蒋介石报功，但送到他手上的情报却是：“共军主力西去，我中李先念声东击西之计。”刘峙立即蔫得像泄了气的皮球。经蒋介石一顿痛斥之后。他按上谕，连忙下令围追堵截向西突围的我军，又是派汽车运兵，又是派飞机轰炸，不停地叫嚷重新组织“围歼”。限令追堵部队于 7 月 20 日前，在紫荆关、南化塘等地消灭我北路突围部队，在汉水之滨消灭我南路突围部队。但我军神速前进，奋勇拼杀，使敌人的堵截围歼计划未能得逞。

7 月中旬，北路突围部队一举渡过丹江，进入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王震率 359 旅先行杀出紫荆关进入陕南，然后直奔陕北，胜利回到了延安。待李先念率部进入紫荆关西的南化塘时，敌人已增兵围堵：前面是胡宗南的部队占据有利地势，拦住去路，后面是刘峙的追兵。情况万分紧急。李先念、郑位三等到实地观察后，认为只有从正面突破才能脱险，决定让 13 旅 37 团担任主攻，38 团从右翼出击，39 团在左翼攻击，45 团断后。部署完毕，李先念叫来 37 团团长夏世厚，对他说：“夏世厚同志，你们要迅速拿下玉皇顶敌人的主要阵地，杀出一条血路，全军才能脱险。否则，后果不可想象。”夏世厚二话没说，向老师长敬了个军礼，表态说：“坚决完成

任务！”37 团是 5 师组建以来的主力团，善打硬仗恶仗。夏世厚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老团长。他是商城人。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时，身负重伤，留在红安两道桥养伤。敌人血洗苏区时，两道桥的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他，将伤治好送他归队。常言说得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救命之恩。从此以后，夏世厚把红安两道桥当家乡看待。全国胜利后，他任湖北省副省长时，对遭受敌人严重破坏的两道桥苏区给予了很多关照。他生前嘱咐，死后将骨灰葬在红安烈士陵园，其墓面向商城。由此可见，他对红安有多么深厚的革命感情。这位猛将不负重望，动员全团的勇士们，以气吞河岳之势，爬上悬崖陡壁，接连发起七次冲锋。最后，他亲率由党团员组成的敢死队，攻破由胡宗南“天下第一军”把守的玉皇顶主阵地，杀出一条血路，让李、郑首长和全军转危为安，进入陕南。正当部队继续前进时，党中央来电指示他们留在陕南，牵制敌人，配合全国各战场作战。8 月初，北路突围部队先后与陕南红色游击队、河南军区独 1 旅会合，奉中央军委命令，正式成立了豫鄂陕区党委和豫鄂陕军区，下辖四个军分区。红安的一批旅级干部派去担任分区领导职务。如曾广泰任 1 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邹顺华任 2 分区参谋长，周光策任 3 分区司令员。

7 月 7 日，南路突围部队在敌人的追击下，进到汉水之滨的宜城县流水沟。好不容易才找到 6 条小木船，每次只能渡一个多连。在背后有敌人追击，空中有敌机轰炸的情况下，经过两天两夜的战斗，一纵主力部队才渡过汉水，到达西岸。但留在后面担任阻击敌人的 3 旅 8 团和 2 旅 6 团 1 个营及部分后勤人员共 3400 多人被阻于东岸。这时如不及时夺路而去，就有被歼的危险。负责断后阻击敌人的 3 旅旅长闵学胜当机立断，迅速撤回强攻抢渡部队，然后提高嗓门作了个简短的动员。他说：“大家要冷静，坚定。现在不能渡河了，只有另外杀出一条路来去与主力部队会合。”说完将后勤人员编入战斗序列，决定在汉水以东寻找敌人的空隙，能渡则渡河西去，不能渡就迂回北进。部署完毕，他带领部队避实击虚，冲破敌人的层层包围，辗转千里，进入曾经战斗过的河南伏牛山区，再向西进入陕南，与李先念率领的北路突围部队会合了。这时才知道，他所在的 1 纵主力奉命留在鄂西北。他带领的这支部队就编入了豫鄂陕军区，闵学胜调任第四军分区政委，不久又调任军区参谋长。在与主力失去联系之后，闵学胜独自为战，带领一支孤军奋战于强敌张开的“围歼大网”之中，历经险阻，胜利回归。在突围这场大战中，演奏了一支神奇的小插曲，为悲壮的中原突围增添了几分色彩。

然而，还有比闵学胜更传奇的人物，那就是他的上司 1 纵副司令员刘昌毅。

突围前，刘昌毅在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战协定向我进攻的战斗中，右腮中弹。当时他任 1 纵 3 旅旅长。纵队司令员王树声要送他去华北解放区治疗。他不同意，并指着自己受伤的脸部说："蒋介石把老子的嘴巴打歪了，不能便宜了他，我要跟他算账。"王树声怎么做工作，他就是不肯离开部队。他是一员猛将，素有"活张飞"之称。只要有仗打就行。他知道一场大仗即将到来，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所以不管司令员怎么劝他都不动。再说，大战在即，王树声也少不了这样的战将。就这样，刘昌毅带着伤参加突围战斗。一路之上，险恶之战不断，这位新上任的纵队副司令员都要求参加指挥，别的领导为了照顾他不让去，他不干。他认为枪声就是命令，指挥员就要迅速站到指挥位置上指挥战斗，才算尽到自己的革命职责。

南路突围部队遭敌分割后，主力只剩下 7000 多人。这时与敌作战更要谨慎，用刘昌毅的话说，不能再做赔本的买卖。因此，一路上他就琢磨着如何做赚钱的生意。7 月 21 日，部队进至谷城县石花镇苍峪沟，遭敌阻拦，后面追剿之敌也快赶到。他派人侦察得知，阻敌可打。他亲自指挥 3 旅 7 团、2 旅 4 团向敌人发起猛攻，敌人支持不住开始动摇。他号召全体指战员更猛地攻击，一举将正面敌人击退，共歼敌人 500 多人。这是自突围以来打的第一个胜仗，给全军以极大的鼓舞。8 月上旬，部队进至房县西南馆木河地区，敌人一个整编旅（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军队将军改为整编师，将师改为整编旅）尾随其后，不断向我军发起追击，部队行动受制。刘昌毅想打掉他，但兵力不够。13 日，我军进入山谷。敌人仍尾追不放。刘昌毅见地势于我有利，便将 7 团两个营埋伏于险要山道两侧，然后诱敌深入。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我军轻重火器齐发，打得敌人仓皇失措，前进不能，后退无路，成了瓮中之鳖。这一仗，全歼敌先头部队一个加营共 800 多人，缴获迫击炮 4 门，重机枪 4 挺，我军仅伤 1 人。这两次战斗，对于我军打开鄂西北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引起了敌人的震惊。敌武汉行营迅速调集大批部队到鄂西北"清剿"，使我军面临更大的困难。

8 月底，党中央决定南路突围部队留在该地，继续牵制敌人有生力量，配合各主要战场的斗争，并指示将原属 1 纵、2 纵和江汉军区的部队统一起来，成立鄂西北军区，由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刘昌毅、罗厚福任副司令员，下辖野战旅和 4 个军分区。部队统一后，分散到以武当

山为中心的周围 10 余县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辟根据地。9 月中旬，刘昌毅率野战旅 7 团扫除地方反动武装，先后在均县草店和县城南关，消灭敌均县保安团，缴获一批弹药和部队过冬急需物资。特别使刘昌毅高兴的是，在缴获品中发现了一张比例为 20 万分之一的鄂西北地图，解决了过去作战不便指挥的困难。有了作战地图，刘昌毅如虎添翼。他指挥部队在老河口至白河的公路以北、汉水以南地区机动作战，掩护各县、区开展地方工作。10 月，刘昌毅指挥 7 团远程奔袭，在汉水之滨一举消灭郧县保安团 1000 多人，打开了郧县局面，然后回师与“清剿”的敌正规军激战于郧县茅坪和均县娘娘山。在茅坪战斗中，敌两个旅将我 7 团和襄河大队包围在山上。刘昌毅大胆采用敌进我进战术，于天黑云沉敌我难辨时，从敌人防范最严的地段实施突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回到武当山区。

蒋介石曾妄图在 48 小时内消灭中原我军，结果未成。后又下令在 7 月 20 日前“剿灭”我军，也未成。两次计划失败，使他恼羞成怒，在不断斥责武汉、郑州行营之后，电令他们增加兵力，加紧“清剿”。敌人以数十倍于我军的兵力，采取分割“进剿”的办法，切断我军各个游击区的联系，逐步将我军从各地挤压出来。秋去冬临。鄂西北是高寒山区，地瘠人稀，群众生活困难，许多地方不仅缺粮食，而且饮水也成问题。部队连续作战，弹药极缺，粮食服装等给养也得不到补充。曾被迫几度进入神农架原始森林，在荒山野岭、天寒地冻中辗转，不时还要与尾追的敌人作战。战斗和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部队面临严重困难，军区领导人不得不思考和研究怎样去求得生存和发展。

重返大别　东山再起

1947 年春节前后，分散活动的鄂西北军区领导人逐步会合到一起。2 月初，在远安县老鹳窝召开军区党委常委紧急会议，根据目前形势和党中央关于既要坚持对敌斗争，又要保存实力的指示，决定精简军区机关，将年轻力壮的充实到部队，年老体弱的包括主要领导人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等，报请中央同意后转移到华北解放区。会议进行到第二天，传来消息说，7 团等遭到敌人突然袭击被冲散了，这是刘昌毅带领的一支部队。会议立即研究派人去收拢，刘昌毅主动请缨。常委们认为在情况未弄清之前，主要领导人不宜贸然前去。经刘昌毅再三要求，最后同意他带两个连、一

个侦察队和一部分机关干部前往。

人民军队是有凝聚力的。战斗过后，7 团政委何德庆已收拢了一部分人。刘昌毅去后，在何德庆的协助下，收集工作进展很快。没过几天，7 团的几个连队和其他建制的部队已基本收拢了。经查点，连以上干部基本都在，唯独不见 7 团团长阙子清。阙子清是有名的猛将，很会打仗，没想到在这次敌人突然袭击战斗中，被敌人俘去了（后在转押途中逃脱）。失去了一员干将，刘昌毅心中很是难受。他压住怒火，等待时机再找敌人算账。收拢的部队和从军区带去的部队加到一起，共有 1000 多人，在当时主力分散活动的情况下，算是一支大部队了，因此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2 月 8 日，部队游击到保康，在康家山遭到敌人包围。我侦察队和一个营从山沟冲出去抢占制高点时，被敌人拦腰切断。敌人狂叫："这一回你们再也跑不了！就算你们能打，长有飞毛腿，也跑不出这方圆 60 多里的包围圈！"在这生死存亡时刻，刘昌毅一面指挥部分兵力在正面迷惑敌人，一面命令最能打硬仗的 7 团的一个连，从侧面迂回攻占制高点。这个连在晨雾的掩护下，迅速攀上悬崖峭壁，如天兵出现在敌人面前。用仅有的 5 枚手榴弹和只有少量子弹的 5 挺轻机枪，歼灭了山顶上敌人一个加强连，缴获了敌人的一部分武器弹药和通讯联络信号。我军抢占制高点后，利用敌人的信号，以假乱真，边打边走，黄昏时分别从韩山垭和千家林突出重围。这次战斗历时 3 天 3 夜，虽然胜利突围了，但部队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打坏了，从此与上级和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

2 月下旬，刘昌毅率部南下荆（门）当（阳）远（安）地区。一天联络员送来一封信，拆开一看，是王树声写给他的。信中说："经中央批准我等即日化装去华北。张才千已率 4 团过长江去与四军分区的李人林部会合。罗厚福率原江汉军区一部留在当地打游击，今后你同党中央直接联系。现在敌人集中全力对付你，日后如何行动由你自定，望保重。"刘昌毅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大家一致认为，大别山是我党坚持武装斗争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都好。中原突围后，敌人集中兵力"追剿"我们，目前那里的兵力较为薄弱，有利我军开展游击战争。会议决定，重返大别山。为便于指挥，刘昌毅将部队统一编成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连，全军共计 1000 人。

重返大别山，要东渡汉江。沿江两岸有敌兵防守，船只都被封锁，部队过江不容易。刘昌毅亲自带领部队到靠近汉江的荆门、钟祥一带摸敌情，选

择渡江地点。就在这时，1大队政委何德庆的爱人阎玉珍快要分娩了。女人生孩子需要个落脚地。部队转战不定，停不下来，何德庆有点着急，担心爱人不能顺利生儿子。刘昌毅一向关心爱护干部战士。他对何德庆说："女人生儿是鬼门关前走一趟。伙计，你可不能大意，要照顾好。小阎临产前你们找个安全一点的地方住下来，让她把孩子生下来。"有了刘司令的关照，何德庆很快为爱人分娩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一天，刘昌毅听说阎玉珍生了孩子，便找来何德庆，关心地问道："小阎的身体好吗？孩子怎么样？"何德庆回答说："谢谢刘副司令关心，他们母子平安，孩子已经安置好了。"刘昌毅吃惊地说："这么快就安置好了！"何德庆说："现在情况这么紧张，不快不行。在孩子未出生前，我和小阎就请地方党组织帮助物色好了收养对象。当孩子生下第三天，我们就托人把孩子送去了。不然的话，急忙急脚去找谁养孩子？"刘昌毅听了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好呀，我也放心了。这是你们第二次寄养孩子吧？"何德庆说："是"。刘昌毅说："你转告小阎，叫她安心休养，天塌下来不用管，有我们这些男人撑着。还要安慰她，不要难过，等胜利了再去把孩子接回来就是了。"这番话何德庆听了十分感激，但也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

那是1944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已经过去，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在各个根据地开始向日伪军据点展开袭击；敌人由主动变为被动，将大规模"扫荡"改为突击进攻。地处前线的太行军区3分区，不断地遭到敌人的突袭，频繁的战斗，使3分区军政人员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当时何德庆任30团政委。该团是分区的主力之一，动不动就上战场。他和小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名叫晋中，才8个月大，不能带在身边，让保姆领着他回到榆社县老家去隐蔽。临行前，何德庆对保姆说："希望你养好孩子，等胜利了再去接他，我们会感谢你的。"就这样，保姆带着何德庆夫妇的重托，回到了榆社农村。

战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抗战胜利后，他们正准备去接回孩子，谁知和平像昙花一现，马上就消失了。蒋介石指使"山西王"阎锡山，大肆抢夺胜利果实和地盘。战斗又在太行根据地的上党地区首先打响。何德庆要带领部队参战。从此以后战斗不断，接孩子的事变得遥遥无期。每当想起这事，他们的心里就难以平静。现在，又不得不把叫华中的第二个孩子寄托别人收养了。俗话说，儿是娘的心头肉。两次骨肉分离，怎不叫为娘的难过？阎玉珍想孩子，有时想得暗暗落泪。何德庆只好安慰她说："别难过，等全国胜利了，我们马上去把孩子们一个一个地接回来。"其实他也想孩子，只

不过压在心头不说。这种精神上的付出与战场上的负伤一样，都是为革命做出贡献。全国解放后，何德庆和阎玉珍开始寻找两个孩子。小儿子华中，在湖北郧阳地区领导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但大儿子晋中却颇费周折，直到1984年才找到。何德庆和阎玉珍对孩子的养父母说："孩子是我们生的，但是你们教养成人的，就让他跟着你们养老尽孝吧！"为了让下一代受到更好的教养，在征得晋中一家人的同意后，将两个孙儿女接到北京读书。用两位老革命的话说："作为父母我们欠儿子很多，就在孙子头上补偿一下吧！"

4月初，刘昌毅带领部队，乘黑夜迅速进到钟祥县石牌镇以南的汉江西岸。侦察连找来了一位老渔民。刘昌毅亲自同他谈话，请他帮助渡江。当老渔民知道他们也是八路军的部队时，说出了不久前，他的独生儿子帮2旅5团渡江，不幸遭敌人杀害，要求为他的儿子报仇。刘昌毅安慰说："老人家，你放心，我们会收拾他们的。"老渔民立即将隐藏的一只小木划子拉出来，载上几名水性好有经验的战士，在夜幕笼罩下划向对岸，巧妙地把敌人拴在岸边的一条船弄来了。然后在敌人疏于防守的地方迅速渡过去一个连，将守在东岸的一个保安队很快消灭了，并又夺来6条船。有7条船来回摆渡，部队就抢在敌人追兵到来之前安全地渡过了汉江。分别时，刘昌毅拉着老渔民的手，送他30块银圆，并说："你儿子为革命牺牲了，这是我们给你的抚恤费，请收下。十分感谢你们父子为我军渡江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望你保重。你要迅速离开这里去隐蔽起来，以免再遭敌人的毒手。"老渔民泪流满面地说："感谢八路军消灭了保安队，为我儿子报了仇！希望你们早点打回来。"

东渡汉江成功，部队士气大增，一路奋勇击溃堵截之敌，经京山、安陆、应山、礼山，4月中旬进入黄安七里坪北，遇到原2旅5团的失散人员。他们是在渡过汉江进入大别山后，在经扶陡山河遭敌人袭击打散的。这些失散人员要求加入部队，刘昌毅同意了。部队本想在这里停留几天，将失散人员再收一收，但敌湖北省保安团尾追而来，只好放弃收容工作，走麻城，到商城，进入立煌（今金寨）。这三县位于鄂豫皖三省边界上，地处大别山中间地段。到达这里，刘昌毅便实现了重返大别山的目的。现在他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打一些漂亮仗让部队壮大起来。因此，在向金寨县南开进途中，一路上他在寻找战场，捕捉战机。

一天清早，部队行至一个叫吊桥崖的地方。只见两面山高林密，中间一条溪水缓缓流过。河床全是石块。水中的石块长满了青苔，很滑很滑。人走到上面，一不小心就摔倒了。善于指挥打仗的人有军事天赋，刘昌毅马

上受到启发。他想：我们的战士会摔倒，敌人也会摔倒。我们摔倒了可以爬起来，我要叫敌人摔倒在这里爬不起来。他决定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打个伏击战。具体部署是：以弹药较多的两个警卫连为火力队，1 大队为突击队，2 大队在山上准备檑木滚石，侦察队封锁该地并诱敌深入。刘昌毅还作了战前动员，讲明打好这一仗的意义，鼓励全体指战员夺取全胜。部队布下“口袋阵”后，下午两点多钟，尾追之敌露头了，约有 800 人走进了山谷，在蹚过溪水时就有不少人摔倒。刘昌毅待敌人钻进了“口袋”，一声令下，猛烈的枪弹、手榴弹声一齐响起，山上的檑木滚石纷纷落下，打得敌人进退不能，乱作一团，摔倒在溪流中就更多。这时何德庆与大队长一起指挥 1 大队冲过去，将敌人分割开来，逐一消灭。整个战斗，仅用个把钟头，歼敌两个营和团部的一部分，缴获迫击炮 2 门，重机枪 3 挺，各种枪械 250 支，子弹数万发和大批军用物资，特别是缴获了美式电台一部，为部队与上级恢复联系提供了条件。几天后，刘昌毅率部又在霍山漫水河、岳西大冈岭等地，击溃了尾随之敌湖北省保安团，消灭了英山县自卫中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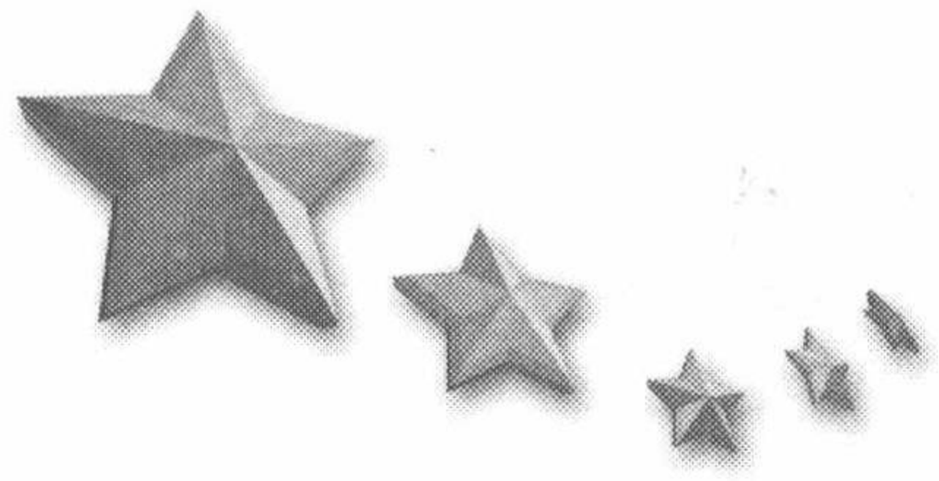
刘昌毅率部到皖西，连战皆捷，消息不胫而走。老百姓互相传说：“当



1947 年 10 月 31 日，太湖县城解放后皖西人民军领导合影。前排左三为刘昌毅、右一为何德庆。

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消息传到地方党组织那里，他们立即派人联系。4月27日皖西工委书记桂林栖，带领游击队前来迎接刘昌毅的部队。两支队伍在潜山县的后冲会合了，双方互相介绍了情况。刘昌毅才知道，中原突围后，张体学的独2旅也奉党中央之命，留在大别山坚持。大别山与鄂西北的情况差不多，都与党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失去了联系。现在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组织领导机构，以便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和扩大游击根据地。桂林栖请刘昌毅主持召开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刘昌毅提议统一武装和党的组织，成立了皖西人民自卫军和自卫军临时党委会，由刘昌毅任司令员，负责全面工作；桂林栖任政委，兼管地方工作。会后，为尽快取得与上级联系，特派两名营级干部将密码送到华北去，但未沟通。直到9月份，与刘邓大军第三纵队陈锡联部在皖西会师，才算恢复联系。7个多月来，刘昌毅带领一支被打散的部队，独立作战，转战千里，重返大别山，最后在皖西的六安、霍山、潜山、舒城、桐城、宿松等县边界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部队由原来2个大队、3个直属连和1个干部队总共1000人，发展到3个支队共4000多人，成为当时大别山中唯一主力，不仅牵制了敌人大批兵力，还威胁了敌人的心脏地区南京、武汉，为配合我军在华北、西北、华东作战作出了有力的支援。

事情有成功也有失败。中原突围后，进入豫鄂陕地区的部队，在反敌“清剿”斗争中，也有重返大别山的，但因武装力量太小，或斗争策略不当，多半失败了。如周光策，带部分人员辗转来到大别山，由于力量小不足以与敌人周旋，转入隐蔽斗争，后暴露被俘，光荣牺牲在故乡红安县城。他曾任过红四军11师31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任过冀南第2军分区司令员、新8旅参谋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14旅参谋长，参加了中原突围，后任豫鄂陕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是一位沙场老将。他的牺牲，家乡人民至今尤为痛惜。从中原突围起到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止，在鄂西北和豫鄂陕地区牺牲的，还有军分区参谋长邹顺华、团长戴福山、胡承尧、吴光禄、许生玉、杨德香、周泽厚，团政委黄世德等。但是，也有为了保护老百姓，不得不挺身而出的。还有少数败类，投敌叛变，成为可耻的叛徒。中原突围如大江东去，难免会泥沙俱下。



第九章　鏖兵西北拼智勇

转战陕北，程悦长有幸聆听毛泽东面授机宜。江波打仗做后勤善于随机应变。彭德怀横刀跃马打败十倍于己之敌，扭转西北战局。徐向前宝刀不老，用6万人歼敌10万活捉同窗赵承绶。耿锡祥未进学堂门与无线电结缘。胡正平率部上前线被叫回去练兵磨成利剑。王诚汉要炮弹挨批后智取敌要塞。谢正荣歼马家军直下银川。吴先恩眷恋出生籍贯始终认祖红安。程悦长献身大西北屯垦戍边。

三战三捷　扭转乾坤

1946年6月，蒋介石从进攻中原开始，全面发动了内战。

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命令，“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经8个月战斗，共歼敌65个旅计71万人。平均每月歼敌正规军8个旅。打得蒋介石手忙脚乱，不得不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他的如意算盘是：将共党中央逐出陕北，使其在全国战场上失去统一指挥，然后各个击破；夺取山东，以解除对南京的威胁。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军23万进攻陕北。当时，在陕北的解放军正规部队不过25000人。敌我兵力对比是十比一。陕北形势严重。

毛泽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岂惧胡马23万人马？他运筹于窑洞之中，辗转在羊肠小道之上，指挥西北野战军一步步置强敌于死地。

在鏖兵西北中，有很多红安籍干部参战，其中旅以上干部有程悦长、江波、耿锡祥、谢正荣等，还有女医官戴觉敏。他们在各个战役中，在各自的领导岗位上指挥部队打了许多漂亮仗。他们的战斗足迹遍布西北高原。

程悦长开始任西北野战军新编第4旅副旅长，后任旅长。他很幸运，不仅参加了保卫延安的战斗，还有幸受到毛泽东接见。鏖战前夕，毛泽东接见了他们旅的团以上干部，亲口教导他们应如何去战胜强大的敌人。从毛泽东同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中，我们就会知道陕北战场以至全国战场，解放军为什么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1947年3月中旬初，胡宗南下令进攻陕北。程悦长奉命率部参加延安保卫战，在延安以南地区抗击敌人。连日来，敌人每天出动数十架飞机轰炸延安，目标集中在毛泽东的住地王家坪。炸弹把窑洞前面老槐树的枝丫打断了，将树身刮去了一大块皮。老槐树依然屹立不动。毛泽东就住在老槐树后面的窑洞里，任凭敌机狂轰滥炸，主席仍处变不惊，不愿离开。正在前线指挥战

斗的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得知后，立即派程悦长率新4旅赶去延安加强保卫，以防敌人在轰炸之后空降伞兵偷袭。行前，彭总嘱咐说：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责任重大，可不能有半点闪失！程悦长牢记彭总的话，带领部队连夜赶回延安，在从延安到王家坪的周围山上布下警戒。程悦长将部队部署完毕回到指挥所，接到电话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新四旅团以上干部，时间是天黑后到达毛主席的住处。

程悦长他们等候在接待室。毛主席从内面一间窑洞里走出来，神采焕发，同大家一一握手，说话还是那样风趣幽默。好像白天没有发生过敌机狂轰滥炸一样。

主席询问了部队情况后，谈话便开始了。谈到防止敌人空投伞兵时，他风趣地说："我看胡宗南未必敢派伞兵来。不管他来不来，我们还是做好准备，主动撤出延安，让他进来。"大家听了一怔，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错了。主席知道大家的心思。不等别人开口，主席说："作战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看，暂时放弃延安，无损于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主席精辟的分析，解开了大家心里的疙瘩，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主席接着讲："敌人有23万，我们才两万多。两万多人要消灭23万人是有困难的。这就要靠正确的作战方针。现在就靠我们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让敌人围着我们团团转。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陕北山高路隘，我们牵上敌人去爬山越岭吧。等他们爬够了，疲劳了，饿了，就寻机会歼灭他。我们一定要拖住敌人，让他们陷在陕北拔不起脚。我和大家一起留在陕北。"大家一听有些担心。主席笑了笑说："你们不必担心我的安全，陕北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有保障。"

接着主席又讲，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占劣势，要消灭强大敌人就要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好比三个人，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打倒，剩下一个失去照应，强手也变成弱手了，一打就倒。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大家高兴地回答说："是。"

最后，主席扳着指头跟大家算了一笔账：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兵力共218个旅。过去8个月平均每月被歼8个旅，如果以后几个月还保持这个平均数，等到歼敌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然发生重大变化。主席问，一个月歼敌8个旅，你们看有把握吗？大家说有。主席说，照这样打下去，一年，

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到延安。黄陂籍团长袁学凯说，只是一枪不放把延安让给敌人，有些不甘心。主席笑着说，你们完全可以放几枪，欢迎“运输大队长”来嘛！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接见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毛泽东那浅近明白而又丰富深刻的谈话，使程悦长的脑子像滤过一样清醒。回到部队，他和政委忙作动员，把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告诉每一个干部战士。全旅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决心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誓作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光荣的警卫军，彻底消灭敌人。

3 月 18 日，敌人推进到延安城郊的三十里铺，即将兵临城下。毛泽东还不愿走。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一再催促。主席才不慌不忙地走出办公室，风趣地说，慌什么，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为保主席安全撤离，程悦长一直留在清凉山指挥所。19 日上午 10 时敌人进城，下午 3 点他才撤退。遵照毛泽东的作战方针，他率部同兄弟部队一起去牵敌人，磨敌人。仅在撤离延安后的 40 多天内，就磨了敌人 3 次。

第一次在青化砭。彭德怀指挥新 4 旅、358 旅、359 旅、教导旅，于 3 月 25 日在青化砭伏击敌人，激战一个多小时，歼敌 31 旅近 3000 人，敌旅长李纪云被俘了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第二次在羊马河。敌人分兵被歼后，用 9 个旅组成方阵前进。彭总令程悦长的新 4 旅装成主力，牵住敌人转圈。敌人被转得粮尽人疲时，撇下 135 旅守瓦窑堡，大部队则南下去补充给养。135 旅害怕被歼，稍后也往南开拔。4 月 14 日，彭总抓住战机，令新 4 旅杀回马枪，2 纵和教导旅则猛力截击。经 7 小时激战，全歼 135 旅 4700 多人，活捉了代旅长麦宗禹及其团长数名。

第三次在蟠龙。彭总巧妙将敌人的大部队调开。5 月 4 日，以 1 纵 3 个旅、2 纵两个旅和新 4 旅共 6 个旅的优势兵力围攻蟠龙。蟠龙是敌人在陕北的战略补给站，囤有大批军需物资，防守坚固。彭总令程悦长率新 4 旅担任主攻，其他部队助攻和打援。新 4 旅广大指战员奋勇冲杀，突破了敌人设防要点 5 号阵地，使敌全线动摇，其他兄弟部队一齐猛攻，将守卫蟠龙的精锐部队 167 旅全部歼灭，共毙俘敌 6700 多人，缴获山炮 6 门，军衣 4 万多套，面粉 12000 多袋，骡马 1000 余匹。此战是陕北战场缴获最多的一次，给我军以很大补充。战士们乐呵呵地说，胡宗南这个“运输队长”当得不赖！

在进攻敌人 5 号阵地时，新 4 旅用来攻坚和掩护进攻的炮弹打完了。程悦长急得直搓手。这时旅供给部政委江波，组织人运来了从 2 纵阵地上找来的几发炮弹。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就是这几发炮弹帮新 4 旅啃下了敌 5 号阵



程悦长的新4旅与兄弟部队一起向蟠龙疾进

地这块硬骨头，为部队攻入城内打开了通道。这位由团长升作供给部政委的江波，老脾气一点未改，一打仗就上前线，做后勤也是这样。他说不到前线去就不知道部队最缺什么，怎么能做好供给工作。他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使笔者想起了1988年9月初，在西安访问江波夫人贺东平时，她跟笔者讲了一个故事，对江波善于见机行事的作风，说得十分生动具体。

那是1939年，江波所在部队385旅，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保卫部队，驻防甘肃宁县。那时虽是国共合作时期，但顽固派不断挑起事端。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宁县土顽纠集地方势力，企图将我军逐出县境。开始他们利用一批无赖，天黑后不停地向我驻军营房扔砖头石块，每天都有战士被砸伤。时任营教导员的江波去与国民党宁县县长刘某交涉，请求出面制止。土顽县长以民众自发所为，与政府无关，不予理睬。江波说，好哇，那就看看到底是谁所为吧？他与营长商量，派一些战士化装成老百姓在驻地外围监视。天黑后，那些无赖又来扔石头。我们的战士也参与进去。无赖们好奇地问："你们是谁派来的？"我们的战士反问道"你们是谁派来的？"无赖们理直气壮地回答："县政府"。战士们也挺干脆回应："保安队"。无赖们听了很高兴，说："反正是一起的，赶快扔吧，扔完了好去领赏"。战士们说："我们的赏金可不低咧，你们怎么样？要不扔完了，你们跟我们一起去领赏？"无赖们高兴极了，心想这回该发财了，先去保安队，再去县政府，可得两份。扔完后，无赖们就跟战士们去"保安队"，谁知走进去一看，是八路军的营房。他们呆住了。江波出来跟他们谈话，指出他们受人指使破

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不对。并说只要他们承认是谁叫干的，就不追究他们的责任。无赖们深受感动，说出他们是受县政府民政科指使的，每人每晚扔一趟石块可得一个银板。江波说："我不相信，堂堂的县政府民政科会叫你们去干这种事。"无赖们说："你不信可以去问呀！"江波说："我去问谁呀？要不这样吧，你们说的若是真话，就签名画押怎么样？"大家说可以。第二天，江波和营长约见宁县县长。在人证物证面前，土顽县长一句诡辩之词也吐不出来。他默认了这个卑鄙而又肮脏的勾当是他指使干的。从此，扔石头之事平息了。土顽县长却是火烧乌龟肚内疼，疼得不自在便请调走了。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斗的胜利，被称之为"三战三捷"，开始扭转陕北战局。这时，毛泽东随部队转战陕北有两个多月了，住在安塞县的王家湾。他根据全国的形势，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著名的评论，题目是《蒋介石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7月到现在共计11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队来说，即已被歼灭约90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干城市就是失败，妄想在3个月或6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10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评论着重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号召人民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这篇评论透露出一个伟大的预言："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对全国军民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但是在陕北转战途中将这么重要的文章，及时传播出去，谈何容易？当时担负播发任务的是新华社电讯部，负责电讯传送业务的是耿锡祥。他在设备简陋，故障频发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很快将文稿播发出去了，受到了中央首长的表扬。

耿锡祥原名耿协祥，锡与协有点谐音。参加红军时报名，登记人员写成耿锡祥。锡是金属。没想到名字一改，这位从未进过学堂门的放牛娃，竟然与满身是贵重金属的无线电发报机打起交道来了。他原是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电话兵，后搞无线电。曾多年跟随总指挥徐向前上前线，负责战地通讯。徐总指挥到哪里，他的电话就架到哪里，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千百次火线

通讯实践，使他成为电讯高手。抗战以来，他一直在军委作电讯工作。为了保证战时新华社的无线电广播畅通无阻，军委忍痛割爱，将他调到新华社电务处任处长。耿锡祥到任后，带领电务处同志克服一切困难，及时准确地将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传播到全国各个解放区，有的传播到国外。那些重要电讯播出后，如风雷震九垓，霞光照万里，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不亚于万炮齐发的重炮弹。无线电波在空中的斗争，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耿锡祥是一位在空中电波大战中，与敌人作斗争的指挥员。

“三战三捷”后，敌人害怕被歼，抱成一团。西北野战军见不能在运动中歼胡，就转向打马。5 月下旬，彭德怀挥师西出，打击进占陇东、三边解放区的马步芳、马鸿逵。经一个半月战斗，先后共歼敌近 5000 人。战斗中，程悦长的新四旅活捉了宁夏王马鸿逵的女婿、上校团长马奠邦。马步芳、马鸿逵受此打击，退回老巢，陇东、三边得以收复。

当我军西出打马时，胡宗南策兵西援。歼胡的机会又来了，彭德怀又挥师秘密东返。从 8 月中旬到 10 月中旬，两个月中先后发起了沙家店、延（长）清（涧）、黄龙等战役，共歼敌胡宗南部 25000 多人。这几次战斗的胜利，使西北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我军由原来的 6 个旅 25000 人，增加到 5 个纵队 75000 人，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并与晋西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掌握了主动权；敌人则损兵折将 6 万多人，战斗力大大削弱，处于收缩防御之中。毛泽东及时指示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1948 年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瓦（子街）战役，一次歼敌 5 个旅近 3 万人。毙敌第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及中、少将师旅长 4 名，俘敌少将军、师参谋长、副师、旅长 6 名。其中二十九军少将参谋长刘振世被新 4 旅捉住。程悦长听说他是黄埔一期学生，在国民党将领中较为出色，不是死硬派，就礼送他到纵队司令部。纵队又送他到解放军总部。通过学习，特别是周恩来以师生之谊对他进行教育后，表示要悔过自新，站到人民一边。刘振世后在解放新疆时做出了贡献。

1947 年 3 月 19 日，在我军撤出延安一周年之际，西北野战军总部发表战报，指出一年来共歼国民党军近 10 万人，生俘 63000 人，毙 36000 人，收复与解放城镇 22 座。我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后，胡宗南不得不率部南下去保他的老巢西安。

4 月 21 日，我军光复延安。党中央致电热烈祝贺，延安万余军民开大会庆祝胜利。至此，革命圣地延安，被胡宗南占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后，又

重回人民手中。毛泽东在撤离延安前说：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是要回到延安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是多么的英明正确。

宝刀不老　无坚不摧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华北和山东战场上，我们经常见到能征善战的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的身影，但后来看不到了。对这位与红安有亲缘关系的老将，我们不能不关注。

原来，到抗战后期他病倒了，而且病的时间很长。在延安医院里，他终日与病床为伴，心里焦急不安。毛泽东去看望时，安慰他说："安心养病，天塌莫管。等病好了，蒋介石不会让你闲着的。"徐向前是在医院里与群众一起欢庆抗战胜利的。不久又传来内战的枪炮声。他再也躺不住了，一再要求上前线，党中央只好同意他的请求。1946年11月，他带病奔赴山西。1947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再次与刘伯承、邓小平合作共事。不过这时的刘、邓已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了，正向大别山挺进。徐向前与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和地方党政军领导一起，一面指挥内线作战，一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战争进行到第二年，局面发生了变化：敌军由进攻转为防御；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首先是我三路大军转向外线作战。这三路大军是：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晋冀鲁豫另一支主力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三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构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机动歼敌，打得有声有色。为配合三路大军外线作战，处在各根据地内的我军，也纷纷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1947年8月下旬至10月底，先后取得了沙家店、延清、黄龙等战役的胜利，共歼敌18000余人，收复了延长等5座县城，打破了胡宗南"一战结束陕北问题"的美梦，扭转了西北战场，结束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晋察冀野战军在聂荣臻指挥下，于10、11两月先后取得了清风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共歼敌3万余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我军后方更加巩固，华北局面为之一新。东北我军在林彪、罗荣桓的指挥下，继夏季攻势取得胜利之后，于9月中旬又发动了秋季攻势，到11月上旬结束，历时50天，共歼敌近7万人，收复城市15座，使东北敌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我军内外线

配合作战，构成了全国规模的攻势，迫使敌人不得不分区防御，提出所谓“坚守东北，力争华北，保住西北，进剿中原，经营华南”的战略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华北之敌集中兵力防守战略要点，确保（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以便与东北和华中保持联系。西北之敌则企图保住以西安为中心的陕南和西部地区。山西之敌则死守晋南和晋中，充当华中与西北的策应桥梁。敌人要保住的地方，正是我军在内线作战的矛头所向。

为更好地部署和指挥山西战场作战，徐向前决定从军区司政机关抽出干部，组成精干的前线指挥所。这时他的身体仍然不好，常抱病带领指挥所上前线。他是山西人，常为自己不能尽快将老百姓从老同乡、老对手阎锡山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感不安。因此，他日夜运筹，出谋划策以加快解放山西的进程。他根据敌人沿同蒲铁路的太原、介休、临汾、运城等地的据守情况，认为解放山西之战，应先南后北，逐一解决。于是他提出先攻运城。在与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委薄一波等商量这一计划时，他说：“我们打下运城，既可巩固晋南，又可支援中原和西北战场，还可解决财政困难，可说是一举三得。”滕、薄等即表同意，并报中央军委，很快获得了批准。

运城位于山西南部，向来是军事战略要地。敌人在这里囤积了大量军需物资，用来策应西北和中原战场。城里驻有敌正规军 1 万多人，土杂武装数千人，还有阎锡山的 3 个专署、16 个县的官员。敌人的工事是由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相结合、明碉与暗堡相结合的方法构成的，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易守难攻。我军曾攻打过两次而未克。第一次是 5 月间，陈赓、谢富治奉命率 3 个旅及部分地方武装围攻运城，正在扫除外围敌人据点时，中央军委命令陈、谢率部南渡黄河，策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他们即撤出战斗，运城之敌暂免被歼。第二次是 10 月间，王新亭率 3 个旅和部分地方武装围攻运城，战至关键时刻，胡宗南从陕西抽调 4 个旅赶来增援，我军阻挡不住，撤出战斗，只在外围歼敌 1300 多人。两次攻运城未克，在徐向前的心中留下太多遗憾。他万没想到，出山后放的第一炮竟是个哑炮。所以第三次攻运城，从一开头他就对部队提出了严格要求，凡是第二次攻运城打得不力的部队一律不准上，留在后方好好训练。这样兵力就不够用，他就借兵，请路过晋冀鲁豫的王震部帮助。王震说：“徐总，我好说话，还得毛主席、彭老总点头啊！”徐向前说：“你同意就好，上面的话我去说。”就这样，他让不同军区的两支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王新亭率第 8 纵队和西北野战军的王震率第 2 纵队，共同组成攻运城部队，并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王新亭任前线

司令，王震任政委。12 月 16 日晚，开始围攻运城。当 8 纵的 23、24 旅开赴战场时，22 旅留下待命。该旅广大指挥员强烈要求上前线，旅长胡正平去请示纵队司令王新亭。王说是徐副司令交代的。胡正平硬着头皮去请示徐副司令。徐向前说："正平呀，你是我的老兵、老部下，从黄安打到鄂豫皖，然后入川、长征、抗日，我们都在一起战斗，难道我不信任你吗？不为别的，你那个部队刚从地方升为野战军，缺乏正规训练。他们只会打游击，不会打阵地战、攻坚战，拉上去不但不顶用，反而会作无谓的牺牲。我看你带他们去好好地训练一个月，练习攻坚战中的土木作业、爆破、打明碉暗堡等，尽快提高指战员们的战术技术水平。你看怎么样？"山西的冬季特别冷，徐副司令的一席话温暖如春。胡正平恭恭敬敬地敬了个军礼赶回部队。他把徐副司令的话原原本本、原汁原汤地倒给全旅的指战员，会场上立即响起了："感谢徐副司令的关怀！""我们一定好好训练！""练好本领，奋勇杀敌！"的口号声。胡正平的 22 旅虽未参加三打运城，但全旅指战员带着与攻运城一样的勇气和毅力，苦练了一个月的攻坚作业，为以后的攻坚战奠定了基础。我们从这里看到了军事家徐向前"用中有爱"的用兵之道。难怪他在山西战场上，能够不断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攻运城之战，进至 23 日已扫清了外围敌人。原定 25 日攻城。忽然接到情报说，胡宗南派出 4 个旅增援，正准备渡黄河。徐向前立即指示两王提前攻城。24 日，王新亭率部从城北分 3 路进攻，王震率部从城西南分两路进攻。由于城里火力猛，我军两次进攻失利。正当士气有所波动时，徐向前及时提出"坚持最后五分钟"的鼓舞性口号，号召广大指战员咬紧牙关，继续再战。攻城部队改用坑道作业的方法，爆破城墙和暗堡，终于撕开了口子，27 日一举拿下了运城。此时胡宗南的增援部队尚在渡河，只好望河兴叹。运城之战，历时 12 天，共歼敌人 13000 多人，将反动官员一网打尽，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拔除了晋南敌人的据点，切断了胡、阎互援的后路。使临汾、晋中之敌更加孤立。

啃下了第一个"硬核桃"，徐向前便着手准备啃又大又硬的第二个核桃了。他让部队稍事休整后，于 1948 年 3 月 7 日下令发起临汾战役。

临汾是晋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期以来，阎锡山苦心经营，派重兵把守，修建了大量坚固工事。还设置了多层外壕、铁丝网、鹿砦等副防设施，在不少地方挖有暗道，组成明暗交错的火力防护网。临汾城内高外低，城墙高大、宽厚、坚固，护城河又宽又深，是

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城市。为了加强临汾的防务，阎锡山将守军增至一个整编军。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也给守军打气，鼓励他们保住临汾，将有重赏。

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只有少量炮兵，没有攻城的重型装备，虽在运城攻坚战中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对攻打临汾这样坚固设防的城市还是经验不足。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徐向前亲临前线，观察地形，了解敌情，制订作战方案，召开作战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后才定下作战计划，然后布置兵力。这次参加战斗的都是晋冀鲁豫的部队，其部署是：第 13 纵队（辖 37、38、39 旅）从城东关、第 8 纵队（辖 22、23、24 旅）从城南面、太岳军区部队从城北面向临汾城敌人发动合围进攻，吕梁军区部队打敌援兵。我军发起进攻后，可说是寸步难攻。但不管怎样困难，广大指战员都抱着必胜的信心，将战斗推向前进。这回胡正平的 22 旅表现出色。他们与 23 旅一起，在 8 日这天，一鼓作气打下了张吴、尧庙宫、乔家庄等外围据点，并打垮敌人的多次反扑，巩固了阵地，然后步步向前推进。11 日推进到距临汾城墙只有 300 多米的地方。13 纵 37 旅旅长是王诚汉，他们的部队攻打东关，这也是难啃的骨头。东关是临汾的生命关，决定临汾的存亡。敌人为了守住东关，将妨碍视线和火力的民房全部拆除，以防我军利用。这就更增加了进攻的难度。但作为曾是中原突围东进虎将皮定均的得力干将王诚汉，经过东征西战更为成熟，皮定均升迁后现在他成为该旅的主官，指挥战斗就更为老练了。他和 38、39 旅等兄弟部队并肩作战，虽然费了些时日，但还是一口一口地将东关啃下来了。

兵临城下，下一步就是攻城，但在临汾要说且慢。因为小口径火炮打到城墙上爆破力小，轰不动，等于白打。进攻得另想办法。这时徐向前及时召开团以上干部会，一面号召动员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一面调整作战部署，将攻城的 8 纵和 13 纵主力改为坑道作业，从地下向临汾城发起进攻。敌人也不是白痴。他们似乎料到我军要来这一手。当我军从城外向内挖坑道时，他们就从墙城脚下由内向外挖，进行坑道对坑道的反击战。另外驱使市民和学生日夜上城作挡箭牌，阻止我军攻城。敌人这两手也是够毒狠的。但再狡猾的狐狸怎能斗过老猎手？在这场反坑道作业战中，徐向前技高一筹。他指示四面开花作业，使敌人不知我们到底要从哪里突破。然后加快两条主坑道的作业进度，与敌人在地下赛跑，抢在他们前面挖到城墙脚下。果然敌人破来破去，对两条主坑道竟未发觉。眼看有被敌发现的危险，徐向前果断地下令，将原定 5 月 18 日总攻提前到 17 日下午。随着两条主坑道的巨大爆炸声

响，坚固的临汾城被炸开了两个各 30 多米宽的大缺口，我军的敢死队一拥而上，后续部队如潮涌进，经 5 个小时的激战，彻底消灭了城内的敌人。这次战斗从 3 月 7 日到 5 月 17 日，历时 27 天，共歼敌 25000 多人，活捉了守敌总指挥梁培璜，使晋南完全获得了解放。临汾攻坚战，创造了我军大规模坑道作业、爆破攻坚的典型战例。战后，党中央给徐向前等人和全体指战员专门发来贺电：庆祝你们解放临汾的伟大胜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消灭山西全部敌军，解放全华北而奋斗！我军打了大胜仗，一般都是中央军委致贺电。这次是党中央致电祝贺，过去少有，可见解放临汾意义之重大。



徐向前运用坑道作业，将坚不可摧的临汾城炸开大缺口，我军迅速夺取了该城。

临汾大捷，也为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东迁西柏坡，献上了一份厚礼。

说起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东迁，起源于去年即 1947 年 12 月。当时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即是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一个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它对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如作战方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经济政策、统一战线等都作了深刻的论述。特别是报告总结了我军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成为我军打败蒋介石军队的主要法宝。这次会后，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开始迁移，1948 年 3 月 23 日东渡黄河，5 月上旬到达河北

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临汾大捷，正好是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来不久。从此，党中央和领袖毛泽东结束了在陕北的转战生活。在那乌云压顶的一年多时间里，党的领袖，临危不惧，将党的中枢等留在陕北，与军民一起艰苦转战，巧制强敌。这种大智大勇，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给全党和全体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驻西柏坡后，为更好推动革命战争向南发展，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准备成立华北区人民政府。刘少奇兼任华北局书记，董必武负责组建华北区政府。此前董必武是党中央驻南京代表。1947 年 2 月 28 日，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撕掉和谈假面具，强迫中共代表五天之内撤离南京。3 月 7 日，董必武率代表处全体工作人员离宁。临上飞机时，他向送别的各界人士意味深长地说："再见之期，当在不远。"历史的发展，如董必武所料，两年零一个半月之后，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就在我驻南京代表撤离时，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同时决定中央机构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赴华北解放区。这样既能应付各种危急局面，又能分工合作领导和指挥各解放区的战争和工作。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央工委常委。他刚从蒋管区风尘仆仆归来，又马不停蹄地奔赴西柏坡，立即投入到刚统一的华北解放区的繁忙政务之中，同时积极准备筹建华北区人民政府。这一段他着重抓财政经济工作，在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组织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和建立各级政权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成立的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任副司令员。原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的部队统一编为华北野战军第 1、第 2 兵团，后又成立第 3 兵团。徐向前兼第 1 兵团司令员和政委。一大批原在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区工作的红安籍党政军干部，又走上了新的岗位。他们是：华北区党委常委、华北区政府筹备处负责人董必武，华北绥蒙区党委秘书长李质；华北军区后勤司令部参谋长吴先恩，华北军区直属第 14 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思和，华北军区补训兵团第 7 旅副旅长王长清；华北冀鲁豫军区独立第 1 旅旅长况玉纯，独立第 3 旅旅长闵学胜（中原突围后 1947 年秋由鄂豫陕进入冀鲁豫），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处长何子成；华北太行军区政治部主任周光坦，太行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旅长韩卫民；华北冀南军区司令员徐深

吉，冀南军区政治部保卫处长殷国洪，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邹国厚；华北军区野战军第 1 兵团（后为 18 兵团）第 8 纵队 22 旅旅长胡正平，第 1 兵团第 13 纵队 37 旅旅长王诚汉；第 2 兵团（后为 19 兵团）第 4 纵队 11 旅旅长谢正荣；第 2 兵团第 6 纵队 17 旅政治部主任赵国威；第 3 兵团（后为 20 兵团）政委李天焕。他们从红军时代起就是徐向前麾下的师团营级干部。现在又在他的指挥下，为巩固和扩大华北解放区，支援中原和西北野战军作战而英勇奋战。

华北军区成立后，人马多了，地盘大了，战争也多了。但徐向前的目光还是盯在山西。他不彻底打败阎老西不罢手。他领导的第 1 兵团所属第 8、第 13、第 15 纵队（由太岳军区部队组成）都是原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用起来得心应手。本来打下临汾后，部队应该休整，以利再战，但形势的变化不由人。

临汾战罢，麦收季节到来。晋中平原麦浪滚滚，一片金黄，广大农民开始收割，敌人即出动抢粮。保卫群众麦收，人民军队责无旁贷。徐向前想趁此机会做一篇大文章，即将盘踞晋中的阎锡山的主力调动起来，在运动战中加以歼灭。他的这一谋略得到兵团其他领导的赞成，经军委批准，决定发起晋中战役。在进行战前动员时，他反复强调这次战役的意义和目的：一是保护晋中群众麦收，严防阎锡山抢劫群众麦子囤积太原；二是防止晋中敌人逃回太原集中，大量消灭阎锡山的有生力量，为攻取太原创造条件。针对天气炎热，部队疲劳等实际情况，他指出：我们作战有困难，敌人同样有困难，而且比我们更大。因为整个形势对我们有利，对他们不利。因此，我们应该乘胜前进，不应坐失战机。广大指战员听了徐司令员的战斗动员，受到了鼓舞，都以高昂的战斗姿态投入战斗。

6 月 19 日，徐向前下令发起晋中战役。参战部队除第 1 兵团第 8、第 13、第 15 纵队外，还有华北军区第 1 炮兵旅，太岳军区彭绍辉纵队，绥德军分区张达志旅和部分地方独立团，共 6 万余人。敌军方面是山西野战军总司令兼山西保安副司令赵承绶统领的 5 个军 13 个师及民卫军约 13 万人，分别驻守在榆次至灵石铁路段及太原至孝义公路段沿线的城镇要点上。为阻止我军北上，赵承绶还以其中的 13 个步兵团和炮兵团组成精锐的“闪击兵团”，机动应对。敌我兵力对比，我军不及敌军一半。这种以小击大的仗怎么打？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徐向前自有他的妙招。

兵不厌诈。徐向前在临汾战役结束后，有意扩大我军主力将南下和东进

的宣传，给敌人造成错觉。然后指挥我军快速而又隐蔽地分东、西、中三路向晋中前进。东路是主力，部队有 8 纵、13 纵和兵团机关，分别从晋南的洪洞、安泽出发，向祁县、太谷进发，登占东山高地，居高临下，拦腰侧击敌军；西路是钳制敌人的彭绍辉纵队和张达志旅，他们从更南的临汾出发，向汾阳前进；中路是 15 纵队，从洪洞出发，沿同蒲线向灵石、介休前进，造成主力假象，迷惑敌人。此外，派出地方独立团，深入晋中敌驻点附近，打击外出抢粮的敌人。

我军出其不意地北进，狡猾的阎老西始未料到，继则认为自己兵力强大，共军疲师远征不堪一击。令赵承绶带着“闪击兵团”从汾阳、孝义、平遥、介休出动，合击彭绍辉的两个旅，大有一举围歼之势。这时徐向前认为鱼儿上钩了，急令 8 纵、13 纵向平遥、介休出击，调动“闪击兵团”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发觉上当，忙调头回撤，被我军压至汾河东岸分割包围，经 3 小时激战，将敌大部歼灭。赵承绶见“闪击兵团”被歼，乃将主力集中在榆次以南、太谷以西地区，妄图凭借坚固工事进行顽抗。徐向前令 15 纵阻敌，8 纵、13 纵迅速将敌人包围在南庄和小常庄。7 月 10 日，我军发起总攻，敌人顽强抵抗，屡攻不下，在南庄火线上的胡正平急得跳脚。平时从不开口叫骂的他，这时狠狠地骂道：“那些乌龟王八蛋，我就不信敲不掉！”恰好前沿阵地抓了一个俘虏，经审问得知，南庄守敌中有日军一个总队。万没想到，关键时刻打出日本鬼子来了。他迅速向总指挥部报告。徐向前令炮旅上去。我军的山炮、野炮一齐指向敌军阵地，实行逐点轮番轰击，掩护部队冲锋。在硝烟弥漫、弹片横飞中，我军反复出击。经过几天几夜激战，终于消灭了南庄负隅顽抗的敌人。

就在 8 纵打扫战场时，又接到徐向前的命令：太谷城内敌第 9 总队 2000 多人弃城向太原逃跑，应速追歼之。部队尚未集中，也未吃饭，军情急如火，连集合整队出发的时间都没有。纵队首长无法让谁先谁后，只有命令旅团长领头，集合一班走一班，集合一排走一排，边走边集中。胡正平把手臂一挥说，旅部参谋留下督促，集合好了的班、排、连跟他走。他和战士们一样忍受着饥饿和疲劳，快速行军，追赶敌人。结果是，他们旅和兄弟部队一起，将惊弓之鸟似的逃敌包围起来，一网打尽。

战后得知，阎锡山在日军投降时，将日军战俘收编为第 10 总队，由日本军官原泉福任总队长，同时委任他为野战军副总司令。这次晋中战役就是赵承绶和原泉福指挥的。阎老西特别倚仗原泉福，希望他得胜回营，没想到

原泉福被我军的炮火炸得血肉横飞，无须用地来埋葬。这是对一再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刽子手最好的惩罚。

7月20日，王诚汉的37旅与38、39旅一起，攻进了小常庄敌野战军指挥部，活捉了赵承绶。赵是阎锡山的一员老将，山西五台人，阎老西的同乡。国民党的军政界拉帮结派成风，阎锡山有过之无不及，特别重用老乡。所以把指挥晋中作战的兵权交给赵承绶。但历史岂按个人意愿发展？阎老西重用同乡也不能挽救败局。更为有趣的是，赵承绶跟徐向前不仅同乡而且是中学时代的同学。于是，敌我两方的阎锡山、赵承绶、徐向前，构成不对等的同乡斗争，结果阎赵两人斗不过徐向前一人。当我军战士押着赵承绶来见徐向前时，他低着头，眼皮也不敢抬一下。徐向前请他坐下，问道："还认识我吗？"赵点点头，低声回答："认识。"徐向前又问道："这次交战，你看我的战略战术、兵力布置，有什么缺陷？"赵承绶刚吃完苦果，口里还含着苦味，脸上带着苦笑说："战败之人，能看出什么缺陷来。如能看出来，还能落到这一步。"谈了一会，徐向前吩咐部属："你们去找找赵承绶的老婆，让他们团圆。"赵承绶完全没想到这位老同学交战中无情，战罢却有情。

晋中战役，从6月19日发起到7月20日结束，历时1个月，共歼敌主力10万人，毙伤俘敌高级将领28人，解放了除太原以外的晋中14座县城，给阎老西以决定性打击，使太原完全陷于孤立。这次战役的特点，是我军兵力少，作战时间短，战果大，伤亡小，是以少胜多、极其漂亮的运动歼灭战，充分显示了徐向前高超的指挥艺术。当战斗捷报传到西柏坡时，毛泽东亲自起草，以党中央名义致电祝贺，赞扬说："在向前同志直接指挥下，仅仅一个月，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整个战局帮助极大。"后来徐向前到西柏坡出席中央会议，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向前，你来告诉大家，你的6万人是怎么消灭阎老西10万人的！"晋中之战，徐向前宝刀不老，而他的那个同乡阎锡山成了秋后蚂蚱，太原城也岌岌可危。

晋中战役结束后，鉴于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补充解放过来的大量战士需要整训，徐向前决定一边休整，一边做好围攻太原的准备。这时的阎老西作困兽斗。他纠集7个师的兵力，于10月2日，由北向南对我军发起进攻。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抓夫抢粮，妄图长期坚守；二重新控制机场（晋中战役后我军趁势控制了太原城南的飞机场），以便继续空运增援部队和物资；三将我军赶至榆次以南，缓解太原的威胁。徐向前来个将计就计，抓住敌军脱离坚固工事的有利机会，立即改变原定在10月18日发起太原战役的计

划，提前于5日发动了扫清太原外围的战斗，太原战役从此开始了。他指挥部队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发动连续进攻，一直打到太原的南大门，活捉了敌南线司令、师长等多人，歼敌1万余人，很快结束了太原外围的初期战斗。

接下来，徐向前命令部队进行太原外围“要塞”争夺战。太原是阎锡山的老巢。从清末就任太原总督起，阎锡山一直苦心经营了38年。在城南、城北建有飞机场，城周边筑有永久性工事，号称“固若金汤，坚不可摧”。我军攻打临汾、晋中时，阎锡山又抓丁驱兵，又在太原城的东山险要高地上建起了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大“要塞”核心阵地。四大“要塞”碉堡如林，壕沟暗道四通八达，构成所谓“百里火海防线”。阎老西称作是不可逾越的“雷池”。进行“要塞”争夺战，就是要拿下东山，使太原失去屏障，处于我军火力的攻击之下，为攻城创造条件。徐向前决定集中主力猛攻“要塞”，其部署是：7纵打牛驼寨，8纵攻小窑头，15纵取淖马，13纵拿山头。同时令张志达旅攻击西山敌阵，牵制敌人。

东山是阎锡山的生命山。山中高地上的各“要塞”不但有重兵凭坚固守，还有飞机在空中掩护。我军用一个纵队攻一个“要塞”，应该说兵力充足，但攻打起来异常艰难。大部分阵地都要反复争夺才能占领。13纵队负责攻山头，王诚汉的37旅担任主攻。他组织富有爆破攻坚经验的营、连于10月30日向敌人的1、2、3号阵地发起攻击，连续4次都失利。到组织第5次攻击时，掩护进攻的炮弹打完了。去纵队领取时被拒绝了不说，还挨了纵队首长一顿批。说他们只晓得要炮弹，不知道想办法。王诚汉听了深感惊奇，但仔细一想，觉得首长批评得对，确实是只顾拼火力，没有动脑子。他召开战地诸葛亮会，让指战员们出谋献策。大家提出要加强侦察，摸准敌情，再组织进攻。这一招果然有效。有两个侦察战士，无意在杂草丛中发现了敌人的暗道洞口，并机智的抓了两个“活舌头”。经审问，弄清了1、2、3号阵地的兵力部署和相连的暗道情况。11月17日，王诚汉组织突击队巧取了1、2号阵地，让3号阵地孤立起来，12日，37旅在39旅配合下发起猛攻，不仅夺取了3号阵地，还攻占了山头以西的野战阵地。至此，敌我反复争夺5次、费时半个月的东山头“要塞”，被我军智取，共消灭了有8个师的番号约7个团的敌军。战后王诚汉旅得到了纵队首长和徐向前的表彰。

经半个多月苦战，到11月18日敌人在东山的四大“要塞”，全部被我军攻占，共歼敌50000多人。为了有利于攻城，徐向前决定将阵地再向前推

进到东山脚下以西离城不远的地方。在这个地段内仍有敌人依地形构筑的坚固工事。攻打这个地段，兵团首长仍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分到各纵队，限期完成。

胡正平的 22 旅，被 8 纵首长指定拿下一个叫松树坡的敌军阵地。这个阵地内有一个团的兵力防守，后面有大量的兵力增援。24 日，设在东山一个小煤窑内的旅部作战室，胡正平主持召开了全旅团级干部会议，传达纵队关于攻占松树坡的命令，研究作战方案。胡正平简短总结了太原战役开战以来 48 天所取得的战绩。他说，在攻占小窑头的战斗中，我们旅共歼敌 4000 多人，抓了 2000 多俘虏，战绩不错，但作战缺点也不少。特别是上级一再指出的缺点——作战方法老一套，在我们旅尤为突出。这次务必改正，打出新战法，取得新战绩。希望大家认真总结经验，研究出新的战术。有位团长在会上发言，讲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东山作战老是三部曲：下午开始炮击，1 小时后炮火延伸，接着步兵冲锋。这个三部曲阎军都掌握了。你打炮他躲进坑里，炮火停息他钻出坑道，你冲锋他组织反冲锋，所以出现反复争夺。这次我们要来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进攻，打它个措手不及。究竟怎样出其不意，应发扬战地民主，让战士出主意，一定会有高招。就让我们来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保证完成任务！"一席话，赢得了大家的赞同。胡



1988 年 8 月，作者与胡正平和胡夫人张玉英合影。

正平归纳会议意见，与旅部其他领导研究后，宣布作战要求："明晚（25 日）9 时开始进攻，65 团插入松树坡腹地，攻占其西北侧的 5 号阵地，切断敌人与仓库区'要塞'的联系，堵溃打援；64 团在 65 团打响战斗后，开始正面进攻，夺取敌人的主阵地；66 团作预备队，听候调遣。各团任务明确后，务必按这次会议要求，动脑筋，出新招，再打一个漂亮的攻坚战。"会议结束后，各团又召开战地"神仙会"，研究出自己的作战方案。群众智慧无穷。65 团组织突击队，采取隐蔽插入，用"虎腹掏心"法夺取了松树坡 5 号阵地；64 团用步炮协同，连轰带攻，快速攻下了主阵地。快到什么程度？主阵地攻下时，敌人还有个连来不及钻出避弹坑就当了俘虏。敌连长说："上头总是说拂晓 4 至 6 点钟不打炮，不会有什么大事。没想到你们在这个时辰悄悄地打上来了。"

枪声未息，胡正平就赶到前沿阵地，督促 64、65 团赶快抢修防御工事，做好敌人反扑的准备，并将 66 团和炮兵调到指定位置待命。天渐亮，敌人以三倍于我们的兵力开始反扑。其主力是从仓库区"要塞"里抽出的、号称"精锐旅"的第 83 旅。在两个少将正、副旅长的驱使下，敌军蜂拥而上，向松树坡猛力反扑。主阵地曾两次易手。正当两军进行第三轮争夺时，我兄弟部队 24 旅、44 旅赶到，一齐将敌人击溃。敌逃回仓库区"要塞"。这场攻防战，其激烈程度是进攻东山以来所没有的。战斗白热化时，硝烟弥漫，枪炮声震耳欲聋。松树坡上的五棵大松树被弹片削得只剩下光光的树干，炮弹炸起的浮土有 1 尺多深，随便在地上一抓就是一把弹片（壳）。打扫战场时统计，共歼敌 3000 多人，我军伤亡 1000 多人。松树坡战斗情况上报到纵队和兵团，徐向前司令员和周士第副司员令称赞说："攻占松树坡是使用新的作战方法取得成功，守住松树坡是反击有力的结果。松树坡攻防战是太原外围作战中的一个范例。"

松树坡战斗的胜利，不仅使我军巩固了东山阵地，还使太原城及其外围仅有的仓库区、黑土港、大东关、英国坟等"要塞"，完全暴露在我军的脚下。至此，太原外围作战计划已完成。它标志着太原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12 月 5 日，中央军委指示太原前线我军进入围城休整。

攻克太原　长驱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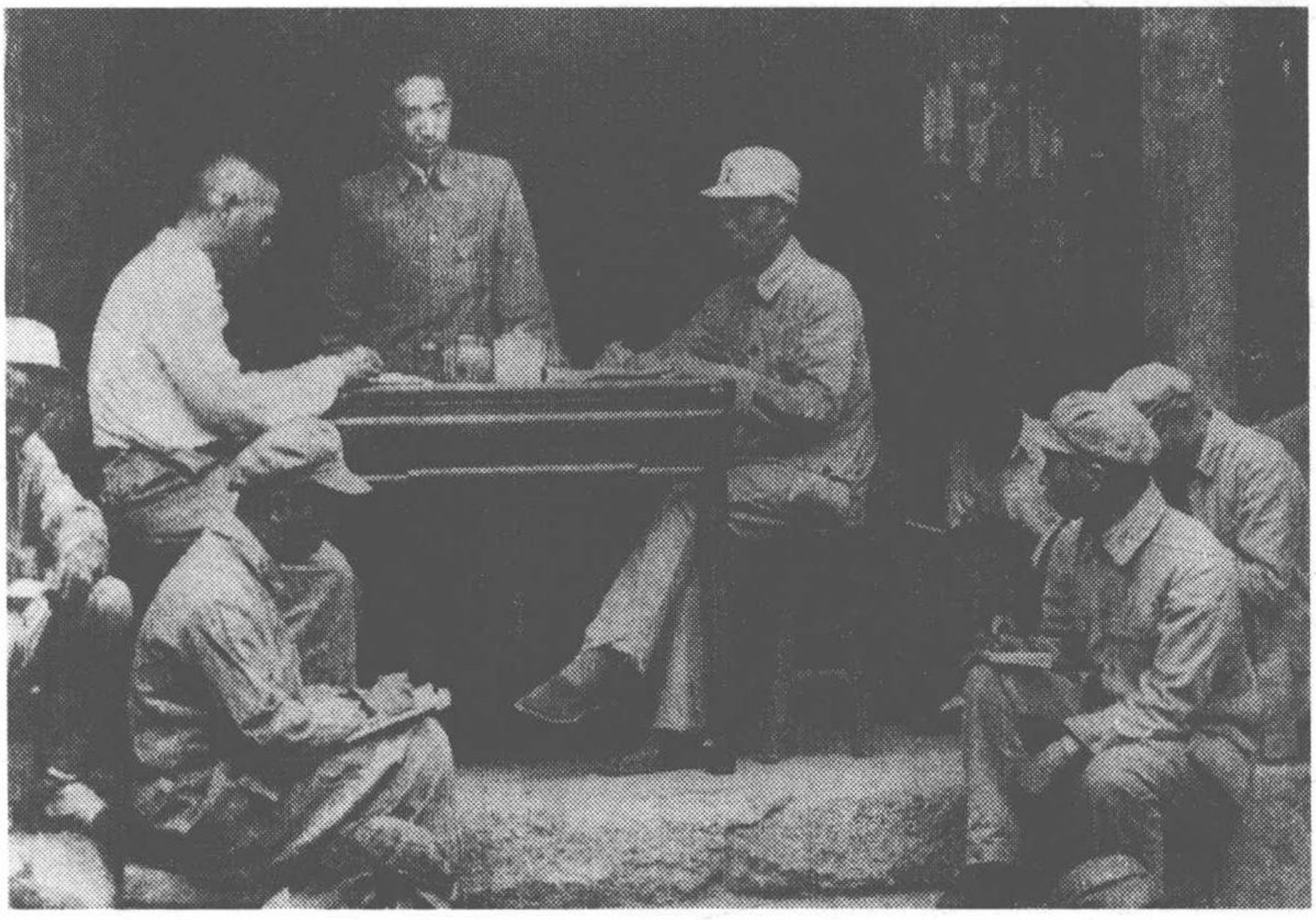
连续紧张激烈的战斗，使带病指挥作战的徐向前病情加重。大家劝他休

息都被拒绝了。打下太原外围后，由于过度疲劳，他的肋膜炎病严重复发，以至睡在床上爬不起来，却还在考虑打太原，并找同志们来商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军委关于围城整训的指示下达后，他才同意离开前线去榆次峪壁村兵团医院治疗。就是治病期间，他仍在考虑下一步打太原应如何改进战术、技术等问题。医护人员劝他多休息，少想事。他说："太原打的个半拉子怎能不想？只有太原解放了我才不会想哩。"他在医院里，还经常与在前线的副司令员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等前委常委保持联系，了解部队的整训情况。他一再强调，一定要把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劳动人民造成的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抓紧抓好，同时要把以改进战术、提高军事素质为内容的训练抓落实，为最后夺取太原做好一切准备。

1949 年 3 月，为适应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实行统一序列，部队名称除野战军、兵团不变外，纵队改称军，旅改称师，按野战军—兵团—军—师建制编成，以数为序，规范统一。原西北野战军编为第一野战军，辖第 1、第 2 兵团，共 7 个军 15 个师；中原野战军（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编为第二野战军，辖第 3、第 4、第 5 兵团，共 9 个军 28 个师；华东野战军编为第三野战军，辖第 7、第 8、第 9、第 10 兵团，共 15 个军加直属 1 个军合计 16 个军 47 个师；东北野战军编为第四野战军，辖第 12、第 13、第 14、第 15 兵团，共 12 个军加直属 2 个军合计 14 个军 50 个师；华北野战军改为军委直属，辖第 18、第 19、第 20 兵团，共 9 个军加华北军区直属 2 个军共 11 个军 34 个师。全国的解放军分为四支野战军和一支军委直属部队，共有 16 个兵团 57 个军 174 个师。这是自抗战以来人民军队第一次实行统一序列。它表明在激烈的解放战争中，我军不忘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

徐向前领导的华北野战军第 1 兵团改称第 18 兵团，由他继续任司令员兼政委，所属 8 纵改为第六十军，13 纵改为第六十一军，15 纵改为第六十二军，共有 9 个师，仍在太原前线进行围城整训。

太原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我胜利之师兵临城下，为什么围而不打？其原因是当时正在进行平津战役。全国战争是一盘棋。我方执棋高手是毛泽东。他的战略眼光远大，总是看几步才走一步。他让徐向前围住太原的阎锡山，不急于拿掉他，以便稳住北京的傅作义，使他不至于逃跑。现在天津已经解放了，傅作义在我党多方敦促下举行起义，北京也宣告和平解放。平津地区无战事，又轮到下太原这盘棋了。



1949 年 3 月 27 日徐向前在太原前线总前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时间已到 4 月，北方天气转暖，冰化雪融，花红柳绿，春天似乎比往年显得更美丽。解放战争的形势也如春天一样喜人。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150 万蒋军被歼灭，国民党的统治已处于总崩溃状态，南京在风雨飘摇之中。但在西北战场上，战争的形势不如中原和华东那么明朗，国民党在西北残存的势力还不算小。主要是西安的胡宗南有 18 万人，西北的张治中有 17 万人，太原的阎锡山虽然被围困但还有 12 万多人。如何改变西北战局，首先要解决太原问题。拿下太原不仅使华北完全解放了，而且还开通了向西北大进军的道路。因此，军委决定调第 19、第 20 兵团和 4 野一个炮兵师参加太原战役，成立太原前线司令部，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和党的总前委书记。各兵团的主要领导人为总前委委员，第 20 兵团政委李天焕是其中之一。各路人马陆续开到后，太原总前委 4 月 5 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对太原发起总攻。此时，徐向前重病未缓不能出席，由彭德怀出席并主持会议。这是中央根据徐向前的病情做出的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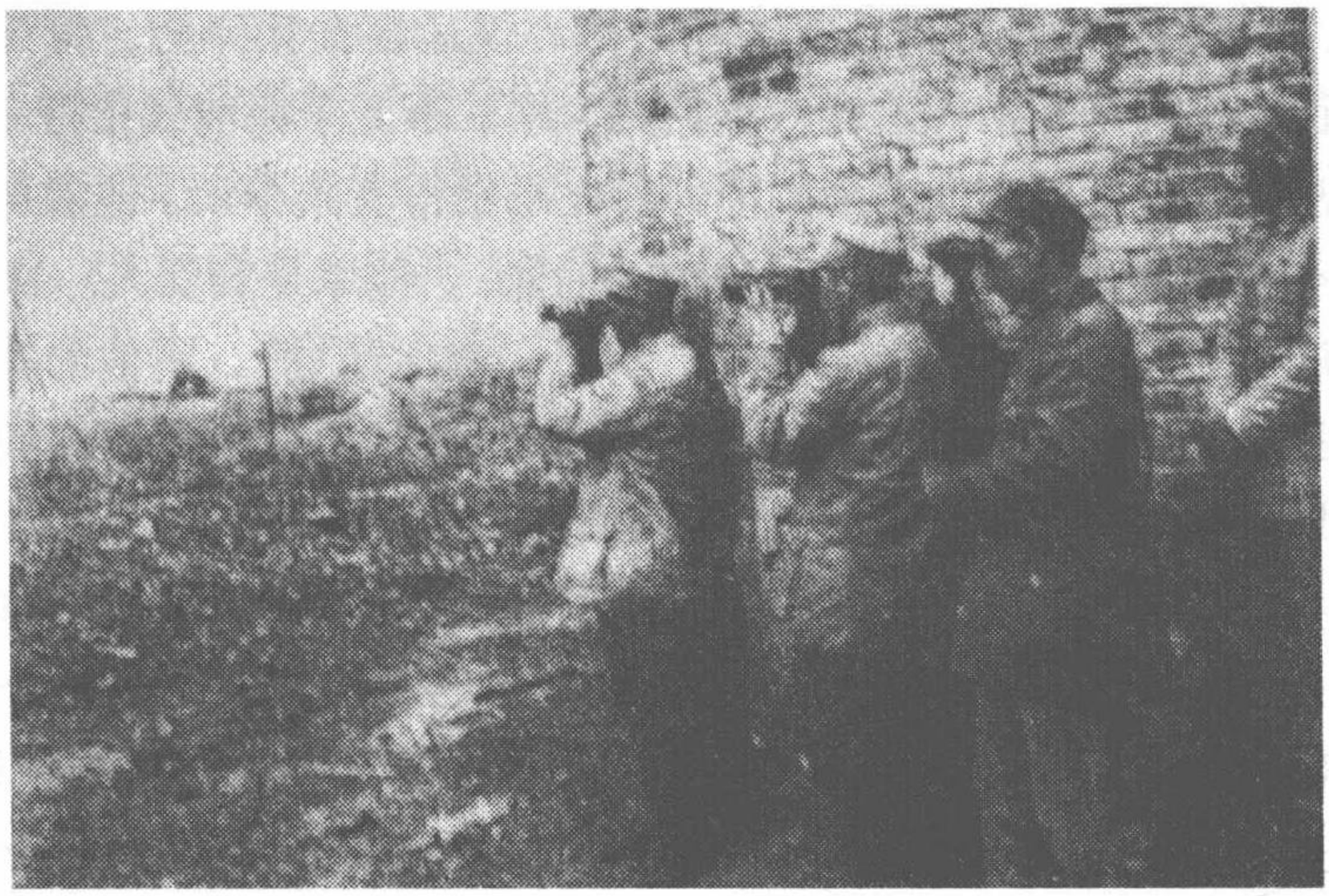
早在 3 月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就太原问题议过，认为太原前线徐向前病重不能指挥，应派人前去代理，谁去未作最后决定。这天晚饭后，毛、朱、周在西柏坡村口散步，彭德怀走过去告诉他们明天将起程回西北。周恩来不意脱口而出："太原战役进入最后阶段，胜利在望，向前同志却病倒了，他的身体确实糟糕，彭老总你……"后面的

话还未说完，毛泽东、朱德一齐说："对了，就彭老总去！"然后毛泽东继续说："德怀同志，中央想让你先去太原，接替向前同志实施后期作战指挥！"彭德怀开头一愣，觉得这事来得太突然。过了一会他还是点头答应了，只是提了一个条件："向前同志还是前线总指挥，我去是协助。"毛泽东笑了起来说："德怀同志不争功，向前同志不居功。我看这条件可以答应，不过战争瞬息万变，还要你当机立断。"稍停，毛泽东又说："太原战役结束后，18、19 兵团就归你指挥，带他们到西北去作战。"彭德怀也高兴，虽然临时受命思想没有准备，但一下子增加了两个兵团的兵力，西北战场的戏就好唱多了。

4 月初，彭德怀带着王震赶赴太原前线。他先去看望了病中的徐向前，两位老战友久未见面，此次相见，格外高兴。彭德怀告诉徐向前："中央已同意打完太原战役后，把 18、19 兵团调给一野，参加解放大西北。希望你也去西北参加领导和指挥作战。"徐向前说："我早就想在彭总领导下一同工作，可我这不争气的身体怕是去不成了。"尽管徐向前现在病又缠身，不能继续驰骋疆场。但在复出的一年中，他在山西战场上叱咤风云，四战四捷，其胜利纪录高出过去战争年代任何一年。

探视完后，彭总回到指挥部就带上有关人员到前线视察。他仔细察看了太原外围我军阵地和敌人尚存的一些"要塞"，认真听取了指战员们关于攻城的意见。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彭总向来不打无把握的仗，打则必胜。像打太原这样的阵地攻坚战，他在西北战场上还未遇到过，所以在决断上更慎重。他与前委们反复研究后才决定从三个方向，即 18 兵团和西北野战军第七军两个师，分成两个集团从东面进攻，19 兵团和晋中军区部队分两个集团从西南进攻，20 兵团和西北野战军第七军一个师从北面进攻。4 月 20 日，彭总一声令下，我 20 万大军形成的 3 把铁锤，一齐砸向敌人在城外的所有"要塞"。经 4 天连续激战，全部扫除了城周一切据点，共歼敌 12 个师。

在此次战斗中，20 兵团扫除城北卧虎山"要塞"时，遇到敌人顽强抵抗，屡攻不下。总前委委员、兵团政委李天焕赶到前沿阵地，与担任主攻的六十七军 119 师指挥员一起研究改进战术。李天焕提出用坑道与强攻相结合的办法拿下卧虎山。119 师指战员一边战斗，一边不分昼夜地实行土工作业，很快掘成多条坑道。只听一声巨响，敌人由明碉暗堡组成的防线，被炸开多个缺口。我军一拥而进，拿下了卧虎山。阎老西曾吹嘘说："卧虎山坚不可



李天焕(前一)在太原前线

摧，共军三个军一个月也难攻下。”结果是我一个师不到两天就打下来了，活捉了在此督战的敌十九军军长曹国忠。

当太原城外所有“要塞”、据点被打下以后，曾经大肆叫嚷“与太原共存亡”的阎锡山，见势不妙，借口去见蒋介石，坐上飞机逃往南京了。困守城内的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5兵团司令孙楚、太原守备司令兼第10兵团司令王靖国等不识时务，仍企图顽抗。我方多次提出和平解决太原问题，均遭他们拒绝。文的不行就来武的。4月25日5时30分，彭总下令发起总攻，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接着1300门大炮发出怒吼，千万条火龙从四面八方飞向城垣，一下子炸开了多个缺口。在一片军号声和喊杀声中，我军势如猛虎从缺口冲进城内，直捣敌人老巢——绥靖公署和日军顾问司令部，活捉了孙楚、王靖国、日军顾问岩田等，共歼敌124000人，缴获的弹药、物资堆积如山。像太原这样在蒋、阎军重兵把守之下有名的坚固城市被我军攻下后，对国民党军震动很大，大同、新乡之敌纷纷向我军投降。太原的解放，从此结束了蒋介石、阎锡山在山西的反动统治，使华北成为更加巩固的后方，而且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太原战役，还有在此之前的运城、临汾、晋中战役的胜利，是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也是各级后勤保障部门和广大群众大力支援的结果。有位“老后勤”不能不提到。他叫吴先恩，是华北军区后勤司令部参谋长。在太原战役的最后阶段，由两支野战军3个多兵团组织的联合攻城部队，共有

20万人，其后勤给养是多么复杂和繁忙。仅运粮食和弹药，每天就得成千上万的民工。调动和指挥这样一支后勤大军，不亚于在前线指挥一个军、一个师作战。负责指挥调度后勤大军的吴先恩做得有条不紊。他参加红军以来一直战斗在后勤战线，人们都称他“老后勤”。他原是黄安人。1932年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鄂豫皖苏区时，为了“划区清剿”，将他的家乡划到新建立的经扶县（今新县）。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黄安人。他说：“我的家乡四角槽门划到新县去了。区划变了，但我的籍贯不变，所有履历表我都是填的黄安（今红安）。前不久解放军出版社要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将有关条目送我作最后的审定，我还是将自己定为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我对儿女们说：‘我的籍贯是红安，你们的籍贯是红安还是新县我不管，由你们自己决定。’”老将军的一席话，道出了他对出生地是多么的情深意笃！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1988年8月中旬，去青海西宁参加红西路军纪念馆和孙玉清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时，一同参加庆典的原沈阳军区空军顾问吕黎平将军问道：“你们红安县第一次授衔时到底有几多将军？”笔者回答：“61位。”他纠正说：“不对，应是62位。”笔者反问他：“你怎么知道？”他回答：“我是按《将帅名录》中的将军籍贯一个一个数的。”笔者说：“你说的也对。不过其中有位叫吴先恩的中将，原籍是红安，后来划到河南新县去了。我未算在内。”他说：“吴先恩我认识，他一直说他是红安人，他的籍贯现在写的还是红安，你不计算在内就不对嘛！这里面有个感情问题，你们应该尊重人家的感情！”吕黎平将军的话有道理。我们不仅要尊重历史，还要尊重人的感情。对曾经出生在黄安，并在黄安这块土地上参加革命，后来成为开国将军的人，不管他的家乡现属何省何县管辖，本人纪念出生地而不愿改变籍贯，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意愿和选择。

华北战场的大幕刚落下，西北战场的大幕又拉开。经过休整后的第18、第19兵团，带着在河北、山西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迈上向西北进军的征途。两个兵团相继由晋入陕，投入彭德怀的麾下，列入西北野战军建制，使一野的兵力增至42万。而此时盘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兵力仍有41万。两相比较，我军只占相对优势，不能分兵对敌，便采取“牵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

6月10日，一野发起扶（风）眉（县）战役。彭总令19兵团牵制二马（马步芳、马鸿逵），18兵团和1、2兵团打胡（胡宗南）。11日，我军以3

个兵团 7 个军，将胡宗南部 4 个军 9 个师约 4 万人，合围在扶眉地区。12 日发起总攻，经 5 小时激战将其全歼。这次战役除胡正平（此时已升任六十一军参谋长）、王诚汉外，又有新的红安籍将领参加。他们是：六十二军后勤部长金世柏，19 兵团六十四军 191 师师长谢正荣，第 8 野战医院政委杜青平等。他们在战斗中，有的参与策划，有的在前线指挥，有的做后勤保障，为夺取战役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宗南在扶眉战役中遭到重创后，退据汉中，对我军消灭马步芳、马鸿逵集团，解放甘肃、青海、宁夏极为有利。7 月下旬，彭总令 18 兵团留守西安、宝鸡一线牵胡，准备入川协同第二野战军作战，亲率主力 3 个兵团，乘胜西进，追歼二马，沿途粉碎了二马的联系。为了首先消灭马步芳，夺取兰州，扫清解放新疆的道路，彭总决定除留 1 个军牵制马鸿逵外，以 1 兵团 2 个军从甘肃南部迂回取青海西宁，截断马步芳的后路，以 19 兵团向兰州城东进攻，2 兵团向兰州城南进攻。20 日两路进攻部队抵达兰州城郊。

兰州城三面环山，北依黄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马步芳是青海、甘肃的土皇帝。为保西宁老巢，必须巩固兰州。故在兰州苦心经营了多年的防御工事。城外的环山地带，尤其是全城的天然屏障——南山，修筑了很多永久性工事，堡垒密布，壕沟贯通，是兰州城的防御核心。马步芳拥兵 10 万，以 8 万精锐之师据守兰州及其周围地区，另有蒋系两个军守在黄河北岸。俗话说：“上阵全靠父子兵。”马步芳就是这么做的。他派儿子马继援任兰州守军总指挥，妄图凭借兰州的险要地势，负隅顽抗，以保住西北这最后的反革命基地，幻想取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然后卷土重来。然而历史的发展，与反动派的愿望恰恰相反。

21 日拂晓，彭总下令向南山的马架山、营盘岭、狗娃山等阵地的敌人发起攻击。敌人凭坚顽抗。我进攻部队有轻敌思想，战斗准备不周，以致激战两天，未能克一阵地。彭总下令停止攻击，认真总结受挫教训，进行再准备，并重新明确任务，调整攻击部署。

25 日，彭总下令再次向敌人发起进攻。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步兵奋勇冲向敌人阵地。经过激烈搏斗，2 兵团四军首先攻占了狗娃山，接着 19 兵团六十五军攻占了马架山，最后 1 兵团六军攻克了南山最高峰营盘岭主阵地。

夺取营盘岭最为艰难。用战士的话说，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在这场攻坚战中有程悦长。他是 1 兵团六军 17 师师长兼政委。他的任务是与兄弟部队一起拿下营盘岭。敌人居高临下，火力交叉扫射，无处不到。程悦长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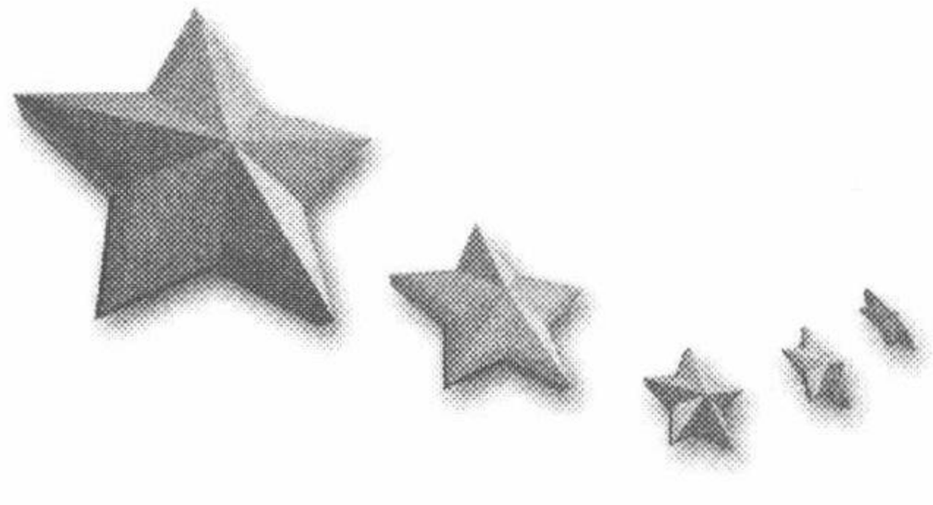
织突击队连续进攻，几次冲锋无一生还。最后在炮兵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由党团员组成的敢死队冲上了营盘岭，夺取了这个主阵地。

我军拿下了营盘岭、马架山、狗娃山等城郊阵地后，兰州城已不保。马继援挽救不了败局，决定撤出兰州。25 日晚，敌人秘密撤逃，很快被我军发现。乘敌人混乱之际，2 兵团三军夺取了黄河铁桥，使敌不能过桥北逃。其他各军勇猛突入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至 26 日中午，全部肃清了城内之敌。随即我军跨过铁桥，占领了白塔山，黄河北岸之敌不战而退，兰州遂告解放。

在围攻兰州的同时，迂回穿插到青海的 1 兵团一、二军，于 9 月 5 日解放了西宁。

兰州解放后，担负牵制宁马的 19 兵团奉命进军宁夏。马鸿逵见势不妙，逃之夭夭，所属 7 万部队军心动摇。但敌人不见棺材不落泪，仍想顽抗。9 月 13 日，19 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令 191 师作先遣队。师长谢正荣率部快速穿过荒无人烟的沙漠，进至银川南面，切断银川通往金积的公路。然后以突袭手段，占领了瞰制金（积）灵（武）平原的牛首山制高点，为兵团发起金灵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19 日，金灵战役总攻开始，经一天激战，20 日马鸿逵的王牌军一二八军被全歼。其他马军不战自栗，有的求和，有的通电起义。23 日达成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协议。同日，谢正荣率 191 师首先进入银川城内。从此，宁夏人民获得了解放。

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省会相继解放后，彭德怀率一野大军沿河西走廊，乘胜向西挺进。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在我军的胜利影响和我党的政策感召下，于 9 月 25、26 日先后发出起义通电，接受我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彭总令王震率第 1 兵团，于 10 月 20 日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遂告和平解放。随后，王震按中央军委和野战军司令部的部署，将所属 3 个军 9 个师在全新疆展开，剿匪安民，戍边卫国。程悦长有勇有谋，从保卫延安以来，一路征战，打了许多硬仗，深得彭德怀和王震的赏识。入疆后，17 师留迪化作卫戍部队，程悦长兼任迪化军分区司令员、迪化市警备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程悦长任新疆军区参谋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他与兵团领导成员一起，带领广大指战员，修水利，垦荒原，在茫茫戈壁滩上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绿洲，为今日繁荣的新型城市——石河子奠定了基础。他是最早戍边的红安籍将军。他对西北是情难舍义难分，从抗战以来将自己大半生的精力献给了大西北！



第十章　大战华东扫千军

宿北战役刘飞、徐海珊、熊应堂率部吃掉敌3个半旅。鲁南追歼敌第一快速纵队王吉文两腿赛过四轮。周世忠率部讨伐叛军远程袭擒郝鹏举。王建安、张仁初、刘飞、陈美藻4将领捞住莱芜之战中的3条“大鱼”。热战中走冷门李世焱深入敌后恢复根据地。5个纵队啃“硬核桃”：张灵甫由“王牌”变成亡牌。举杯释前嫌许世友请王建安具体指挥攻济。王吉文、徐海珊二勇将血染泉城。

初战苏北　激战鲁南

华东解放区包括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和山东全省。它南抵宁沪，北接平津，津浦、陇海路纵横贯穿其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华东解放区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最近，而且威胁最大。蒋介石一直把它视为心腹大患。内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这里。

1946 年春，蒋介石在以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同时，集中近百万兵力包围华东解放区。他的如意算盘是：先由南向北推进，将我军压缩到陇海路以北，然后由北向南进攻，实行南北夹击。6 月下旬，中原我军胜利突围后，蒋介石于 7 月 15 日下令进攻华东解放区，叫嚷在“三个月内消灭华东共军”。

遵照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军委关于迅速组建野战军以抗击敌人进攻的指示，华东地区的新四军、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一分为二：一是由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新四军第 3 师师长黄克诚分别率领 12 万多人，于 1945 年 10 月挺进东北；二是留下来的部队于 1946 年 1 月分别组成了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和山东野战军（陈毅兼司令员），两支野战军共 11 万人，另有各军区所辖地方武装 26 万余人。以上部队统归以陈毅为司令员的山东军区指挥。

鉴于敌人对华东解放区的进攻气势汹汹，中央军委指示华中野战军北上与山东野战军会合，共同挫败敌人南北夹击的图谋。粟裕认为华中野战军暂留原地，利用地利人和条件作战比北上作战更有利于消灭敌人。中央军委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华东解放区在 1946 年抵御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时，分为华中和山东两个战场作战，并都取得了可喜的战绩。

首先是粟裕先机制敌。在华中战场上，敌人用 15 个旅计 12 万人，准备向苏中解放区进攻。我华中野战军主力才 4 万多人，敌我力量对比是 3 比 1。

面对强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抢在敌人动手之前，于 7 月 13 日指挥部队在泰兴、如皋、海安地区发起苏中战役。他以打歼灭战为主，灵活用兵，连续反复作战 45 天，至 8 月 27 日主动撤出战斗，取得了“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共歼敌 6 个旅 5 万余人。其中华野第 10 纵队 30 旅政委李世焱与旅长罗占云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在西线天长、盱眙地区迎战由六合、滁县出动的敌新 5 个军 3 个旅，经 10 余天战斗，30 旅共歼敌 4 个营 3 个连计 1500 余人，并从敌人手中缴获大批美式武器。

接着是陈毅“暗度陈仓”。7 月 25 日，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以隐蔽方式进入淮北，出击进攻淮北和苏北之敌。27 日凌晨 2 时，陈毅令第 2 纵队、第 7、第 8 师，向进占宿县以北朝阳集的敌整编 69 师之第 92、60 旅发起突如其来的进攻。第 2 纵队 4 旅副政委徐海珊与旅长一起，率部一举攻取了朝阳集外围阵地，迫使敌人龟缩朝阳集待援。28 日，敌多路援军被我军击退。朝阳集之敌见待援无望，向西北方向分头窜逃。我围攻部队即行出击。29 日下午将窜逃之敌第 92 旅全部歼灭，第 60 旅歼其一部，共 5000 余人。

苏中、朝阳集战役后，盘踞在海州的敌第 9 绥靖区李延年集团，乘我山东野战军主力在苏北沭阳，华中野战军在苏中海安之际，令所辖两个整编师和 1 个军（整编师与未整编军相同），于 9 月 10 日进攻淮阴，并以一部北上佯攻沭阳，牵制我山野主力，使其不能迅即南下。

淮阴此时是华东解放区首府。敌人早就想拿下，曾多次进攻均未得逞。这次敌人乘我兵力空虚，突然袭击，形势十分紧急。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急调华中野战军救援。粟裕昼夜挥师北上。海安距淮阴 400 多里，快速行军也需两天。待华野赶到，敌人已于 12 日攻占了淮阴，接着又占领了淮安。当华野在涟水与山野会合时，粟裕仍习惯地称陈毅为军长，歉疚地说：“军长，我来迟了！”陈毅紧紧握住粟裕的手说：“你来了就好，下一仗，一定能旗开得胜！”话中含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意。对于两淮突然失守，两位将军都很在意。但作为军事家，他们知道当前的战争对于我军来说，是不能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因此，在两淮失守后，陈毅于马背吟下这样的诗句：“诱敌何防让两淮，蒋军到此好堆埋。运河不是鸿沟界，会见狂潮卷地来。”

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两位主帅这次会合后再未分开。从此，一个善于总揽全局、出谋划策，一个善于指挥打仗，两位愈战愈勇的老战友、老搭

档，配合更加默契。10 月至 11 月间，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先后发起了平渡、安丘战役和盐城保卫战，共歼敌 21000 多人。这时的敌军，仗着人多势众，尽管付出了 10 万多人的伤亡代价，仍是“一鼓作气”进攻，先后占领了我华东解放区的淮南、淮北地区和苏中、苏北大部分地区，并向鲁南推进。

11 月 15 日，蒋介石导演的“伪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开锣。他要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结束苏北战事”，以配合伪国大的召开。薛岳指挥 25 个半旅，分北、西、南三路向苏北进攻。

根据敌人多路进攻，间隙大、应援不便的特点，陈毅和粟裕决定先歼宿迁以北一路孤立突出之敌，并将这一计划报请中央军委批准。12 月 15 日宿北战役打响了。

真是冤家路窄。宿北一路之敌，乃是在朝阳集战役中被歼过的敌整编 69 师。它在朝阳集战役中损失第 92 旅之后，只剩第 60 旅一部分。不过由它指挥的还有整编第 57 师的两个旅和整编第 26 师第 41 旅，共 3 个半旅，正向宿迁以北的新安镇进犯。陈、粟决定以华中野战军一部阻敌援兵，山东野战军第 1、第 2 纵队和第 7 师担任主攻。为了全歼敌整编 69 师指挥的 3 个半旅，不使其漏网，采取了分割包围然后歼灭的战法，并将这一些任务分别下达到担任主攻的 3 个部队。事也凑巧，红安籍参战的 1 纵 2 旅旅长刘飞、2 纵 4 旅副政委徐海珊、7 师 19 旅旅长熊应堂，分别参加了围歼敌 3 个半旅的战斗。他们在各自纵队（师）首长的指挥下，与兄弟部队一起，打得异常勇猛顽强。刘飞率部负责进攻敌 41 旅。敌凭借村庄死守。2 旅攻了一天一夜未克。刘飞亲到前沿阵地，挽起袖口，挥动手枪对指战员们说：“他姓刘（指敌旅长），我也姓刘，到底谁硬，今天就比试比试，我们一定要把它攻下来。”说完，指挥部队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发起猛攻。敌人最终全部被歼灭。徐海珊、熊应堂率部进攻敌 57 师的两个旅，战斗也打得十分猛烈。在我军 3 个纵队（师）的重拳打击之下，敌人全部溃败。整个战役到 19 日全部结束，敌整编 69 师指挥的 3 个半旅共 21000 多人悉数被歼。俗话说得好：“逃过了初一，逃不过十五。”敌 69 师终究难逃覆灭的命运。宿北战役，是山东、华中野战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初步取得了大兵团作战经验，对我军今后作战有重大意义。战后中央军委致电祝贺，并号召华东全军力争多打大歼灭战。

宿北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应集中主力消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台、枣、峄，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并

指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收复，必须集中兵力，以先打整编第 26 师为宜。陈、粟即根据军委指示进行部署：留 24 个团在沭阳东西地区，阻止盐城、涟水敌人北犯，保证鲁南我军作战；率 29 个团于 12 月 27 日自沭阳隐蔽北上，然后以第 8、第 9、第 10 师等部队共 12 个团组成左纵队，以第 1 纵队及第 1 师共 15 个团组成右纵队，对敌人实行分进合击。

敌整编第 26 师（2 个旅）和由它指挥的第 1 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 51、第 53 师（各一个旅），分驻于鲁南的台儿庄、峄县和枣庄地区，较为孤立。1947 年 1 月 2 日，我军如从天降，突然向敌人发起进攻，左右两路纵队似一把利剪，从台儿庄向枣庄一路剪去，势不可挡。4 日，在台儿庄北之兰陵歼敌整编 26 师 2 个旅和第一快速纵队，共 3 万余人。

第一快速纵队为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机械化部队，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苦心经营多年的“国军精华”，也是蒋介石经常炫耀的两张王牌之一。这一张放在鲁南，另一张放在东北。蒋氏父子万没想到，放在鲁南的这张王牌，连“昙花一现”的威力都未发挥就完蛋了。一些被俘的坦克兵、装甲车兵说：“我们在印缅战场上与日军作战，一直冲锋在前，势不可挡，想不到今天败得这样惨！”他们哪里知道，使他们惨败的是当年在鲁南开辟抗日根据地、令日本鬼子胆寒的八路军战将王吉文。他现在是山东野战军第 3 纵队第 8 师师长。这次他率 8 师与各兄弟部队一起，乘敌不备先攻下了敌整编第 26 师师部，接着用两条腿与四轮赛跑包围了正在逃跑而陷在泥泞道上乱作一团的快速纵队，除 7 辆坦克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9 日晚，王吉文又奉命与各兄弟部队一起进攻峄县城，经三天激战，11 日全歼城内敌整编 26 师后方机关和整编 53 师 1 个旅，共 7000 余人。19 日至 20 日，我军各参战部队巷战枣庄，歼敌整编 51 师师部及所属 2 个团，共 8000 余人。鲁南战役历时 19 天，共歼敌整编师 2 个师部、4 个旅和 1 个快速纵队，共 53000 余人，缴获美制坦克 24 辆，榴弹炮、野炮、山炮



王吉文

89门，汽车474辆，首创华东战场一次歼敌两个整编师纪录，并取得了对敌机械化部队作战的经验。

宿北、鲁南两场战役的胜利，使山野和华野得到很大发展。部队人数骤增，仗也越打越大，两支野战军急需统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1月间，撤销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建制，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委，下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北、苏中6个军区，共有武装36万多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兼司令员和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下辖第1、2、3、4、6、7、8、9、10、11、12、13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全军共30万人。红安籍师以上干部有：刘飞任1纵2师师长，徐海珊任2纵政治部主任，周世忠任2纵5师政委，贺健任3纵7师师长，王吉文任3纵8师师长，熊应堂任7纵19师师长，王建安任8纵司令员，张仁初任8纵参谋长，陈美藻任8纵24师政委，李世焱任12纵36旅政委，罗应怀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汪运祖任后勤部军需部部长，陈行庚任后勤部卫生部政治部主任。

整编完毕，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开往临沂休整两周。但我休敌未休。1月30日，敌人又发动新的进攻。原来，宿北、鲁南两仗，打痛了蒋介石。他认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不力，加派身边的参谋总长陈诚前往督战。陈诚飞到徐州后，为了邀功，煞费苦心，很快制订了一个“南北两大兵团对进夹击临沂，歼灭陈毅主力于沂蒙山区”的作战方案，并严令各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还总结了前段失败教训，提出这次作战的16字方针：“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要各部严格遵守。

陈毅和粟裕部署，用50个团的兵力粉碎敌人进攻。但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不好下手。还是陈毅高瞻远瞩。他提出弃南打北。粟裕认为这个思路好，非常赞成。在强敌压境面前，主力如何北移又成问题。粟裕点子多。他很快想出了一些迷惑敌人的办法：让留守临沂的部队四处征用木料、门板、麻袋等，用来加固工事，以示将固守临沂；再派出一支部队去运河边搭浮桥，去黄河边筹集船只，扬言主力要西去与刘、邓大军会合；然后派一个纵队突击南下讨伐叛军郝鹏举部。我军的这些举动，使敌人觉察不到我主力将北移的意图。

2月3日晚，2纵司令员韦国清奉命率所辖4、5、6师前去讨逆。从临

沂到叛军驻地白塔埠，有 200 多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他们夜晚行军，白天隐蔽，5 日晚到达目的地。参加这次战斗的有纵队政治部主任徐海珊，一路上他让宣传队做好宣传工作：揭露郝鹏举的罪行，讲明这次讨逆战斗的意义，鼓励指战员打好这一仗。

郝鹏举是个什么人？他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此人反复无常，见风使舵。曾任日伪淮海省（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豫皖边区）省长。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委任为第 6 路军总指挥。他不是蒋的嫡系，未受重用，又心存二意。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了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新四军军部派联络部长朱克靖到郝部做统战工作。朱克靖与郝鹏举 1924 年曾在苏联是同学。朱劝郝倒戈，退出内战。在我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1946 年 1 月 6 日郝鹏举在台儿庄率部起义，受到山东军民的宽待：他的部队只改番号不改编，名为华中民主联军，他为民主联军司令员，单独驻防，军饷从优。朱克靖以联络员的身份，留在民主联军做政治工作。

时隔一年，1947 年 1 月 27 日，当陈诚将要大举进攻临沂之际，郝鹏举又投靠蒋介石，被改编为第 42 集团军，任集团军兼鲁南绥署司令长官，参与进攻临沂，在南线担任侧翼掩护。郝鹏举叛变后，为了表示忠于蒋介石，将部队拉到重兵驻守的海州城附近的白塔埠驻扎；同时将他的同学、我军联络员朱克靖交到南京秘密杀害。陈毅闻讯，十分愤怒。他严令韦国清，此去一定要擒到郝鹏举这个逆贼。

2 月 6 日，2 纵开始包围郝部，夜 12 时发起进攻，战至 7 日下午，叛军大部被歼。一部分在郝鹏举驱使下亡命突围。2 纵 5 师奉命追击。师政委周世忠和师长一起，指挥部队穷追猛打，将其全部歼灭，郝鹏举亦被生擒。当我军围攻郝部时，部署进攻临沂的敌人主力一部，曾回头增援，妄图救郝鹏举，均被我军击退。这次战役不仅全歼叛贼郝鹏举所部两个师，还诱敌主力回援，打乱了他们进攻临沂的部署。

2 纵胜利归来后，郝鹏举被关押在临沂附近一个村子里。他厚颜无耻地提出要见军长。在一般人看来没有必要理会他。具有大将风度的陈毅不这么看，他要让所有的人包括敌人都知道，我军对郝鹏举做到了仁至义尽。他同意见郝，并与他进行了交谈。陈毅对郝鹏举说：“我又派人，又写信，又发电报，屡次劝告你不要丧失人格，背叛人民，你就是不听。我知道已无希望，仍申言只要你不公开投蒋，我们绝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意你最后自寻死路，公开背叛人民，公开投降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于解放区无甚损失，故

我们并不重视你投蒋的事。即使到这个时候，我仍在最后一分钟下了一道警告给你，要你们部队迅速远离内战战场，不要向解放区进攻，但你们硬不听话，敢于在2月初即参加前线进攻。这时我才派部队进行迎击，一昼夜即捉你过来。我在这里明白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是料定了的；我可又告诉你，你们拖走部队时，竟捕杀我派去的联络人员，则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不料人之无良知竟到了这种地步！”陈毅最后说：“目前你既然到了此地，一切应由人民处理。你做的事太坏，太对不起人民，太违反人情。再次背叛国家民族，罪恶实在太大，要看人民是否宽恕你。我立刻送你到后方去，听候发落好了。”说到这里，集军人和诗人气质于一身的陈毅，他那大义凛然之气凝成了诗句，随即口占一首《示郝鹏举》：“叫尔做人不做人，叫尔不苟竟狗苟。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叫尔分人狗。”后来郝鹏举被处决。他是解放战争中唯一被枪毙的国民党军被俘将领。

让一座城　歼敌六万

讨伐叛军的白塔埠之战，只是大战前的一段小曲，真正的大戏还在后头。这时的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成为焦点：我军将在这里让这场大戏开锣；国民党军想在这里让这场戏收尾。两军已是剑拔弩张，都在积极行动。

2月10日，陈毅、粟裕按既定作战计划，率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第7纵队自临沂隐蔽北上，同时令北线的第8、第9、第10纵队从胶东、渤海南下，秘密向指定地域集结，留下第2、第3纵队守在临沂。开场锣鼓就由2、3纵队敲响。

11日，南线敌军由欧震指挥20个旅进犯临沂。2、3纵打出我军各个部队的番号，在临沂外围进行顽强抵抗，做出与敌决战的模样。陈诚以为我军要固守临沂，除叫欧震加强南线攻势外，令北线李仙洲指挥的3个军9个师从胶济路南下，先占领莱芜、新泰，再南下合围临沂。就在敌人做着“在临沂将山东共军一举歼灭”的美梦时，我2、3纵队经过5天抗击，于15日突然撤出临沂，留下一座空城等待敌人到来。敌人虽未歼灭我军，但占领了多年就想占领的山东“共军老巢”，自是兴高采烈。陈诚向外大肆鼓吹“胜利”，宣称：“在临沂外围歼灭共军16个旅”“共军伤亡惨重，不堪再战”“陈毅开始总退却，企图西渡黄河，与中原刘邓会合”。蒋介石闻讯，更是得意洋洋地说：“在关内的五部共军中，以陈毅一部最为顽强，训练最精，诡计最多，

肃清最为困难。现在陈毅已失其老巢，难以发挥作用了。”敌人哪里知道在欢庆“胜利”时，一场灾难正悄悄地降临到他们头上。

当北线之敌李仙洲集团占领莱芜后，其势较弱且又突出。这正是我军所寻求的战机。陈毅、粟裕于 20 日令王建安所率第 8 纵队、许世友所率第 9 纵队迅速进入莱芜东北设伏，21 日全歼了敌后续部队第七十三军 77 师，切断敌人后路。回过头来，第 8、9 纵与第 1、第 6、第 10 纵队对莱芜城发起全面进攻，以绝对优势将李仙洲总部及所率两个军包围在城内。顿时敌人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李仙洲本来就怕被歼，他在进占莱芜之前，一路上迟迟挨挨，并不积极。他的上司王耀武也不主张李仙洲进占莱芜，认为这样冒进会有危险，并在第一次进占莱芜后令他撤出。但陈诚斥责王耀武，命令他即调李仙洲重占莱芜，以便实现“堵住共军退路，消灭于沂蒙山区”的计划。李仙洲不得不遵命重返。事情果如他们所料，整个集团的军队，还来不及在莱芜集结，就有一部被歼，全部被围。李仙洲立即向王耀武求救。王耀武知道我军打援的厉害，不敢贸然派兵增援，左思右想，觉得只有突围。他一面命令李仙洲经吐丝口镇向北集体突围，另派飞机掩护；一面越过陈诚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莱芜的险情，以免今后遭责难。李仙洲根据王耀武的命令，23 日早晨将部队分成三股：左边是 77 军，右边是 46 军，自己率总部及辎重在中间，在飞机的掩护下，并列向北突围。

其实，敌人突围已在陈、粟的预料之中。在发起莱芜战役时，就有两手准备：敌不突围如何进攻，敌如突围如何在运动中歼灭，已有方案在胸。现在敌人突围了，第二手就用上了。当敌人突围动向暴露时，王建安便接到陈、粟的命令，去吐丝口镇布口袋阵。第 8 纵队的任务是做袋底，要求一定要抢在敌前赶到吐丝口，一定要兜住。王建安知道这两个“一定”的分量，便派 24 师急速轻装前进。所谓急速，实际上是跑步。莱芜城距吐丝口 30 里。师政委陈美藻与师长周长胜带领部队，只用一个多小时就赶到。随后，8 纵队司令员王建安和参谋长张仁初率 21、22 师也到达。王建安将部队布成一个牢牢的袋底，用他的话说“即使是洪水猛兽冲来也冲不破”。

陈毅让粟裕指挥这场运动歼灭战。根据敌人呈方阵形的突围队形，粟裕将 1、6、9、10 纵队分成左右两路在两侧进行攻击，边放边打边围，待敌人出了莱芜城，即派兵堵住退路。这样一来，李仙洲带领突围的两个军，被压进一个宽不过三四里、长不过七八里的狭长地带，完全钻进了粟裕预

先设置的“大口袋”。这时，敌人争先恐后，队形混乱，已经失控。李仙洲见势不好，急向率领几十架飞机在空中掩护的国民党空军副司令、他的黄埔同学王叔铭求救，要求炸开一条血路让他冲出去。王叔铭回答李仙洲：“共军越来越多，突围是难以成功的，不如退回莱芜城固守待援，我保证空运粮弹提供补给。”王叔铭哪里知道，装进“口袋”里的李仙洲想退回去是不可能的。

下午 1 时，我军采取多路猛插，分割围歼的战法，对被围敌军发起总攻。1 纵 2 师师长刘飞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分割包围敌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在陈毅事前派去做统战工作人员的说服下，愿意归顺，趁战斗正在进行之际，随我方人员转移出去了。群龙无首。四十六军被我军一攻即溃，迅即被歼。敌七十三军被围后，军长韩浚见势不妙，率千余精兵猛打猛冲，突出包围向吐丝口逃去。他想做漏网之鱼，谁知又钻进了设在吐丝口的袋底，被张仁初指挥的拦截部队擒住。这时被围在中间的李仙洲，还不肯投降，仍在指挥他的随行敌军作垂死挣扎。枪弹有眼，当他正在下令冲锋时，一颗飞弹将他打中了。待他醒来已成了俘虏。战斗到 5 时全部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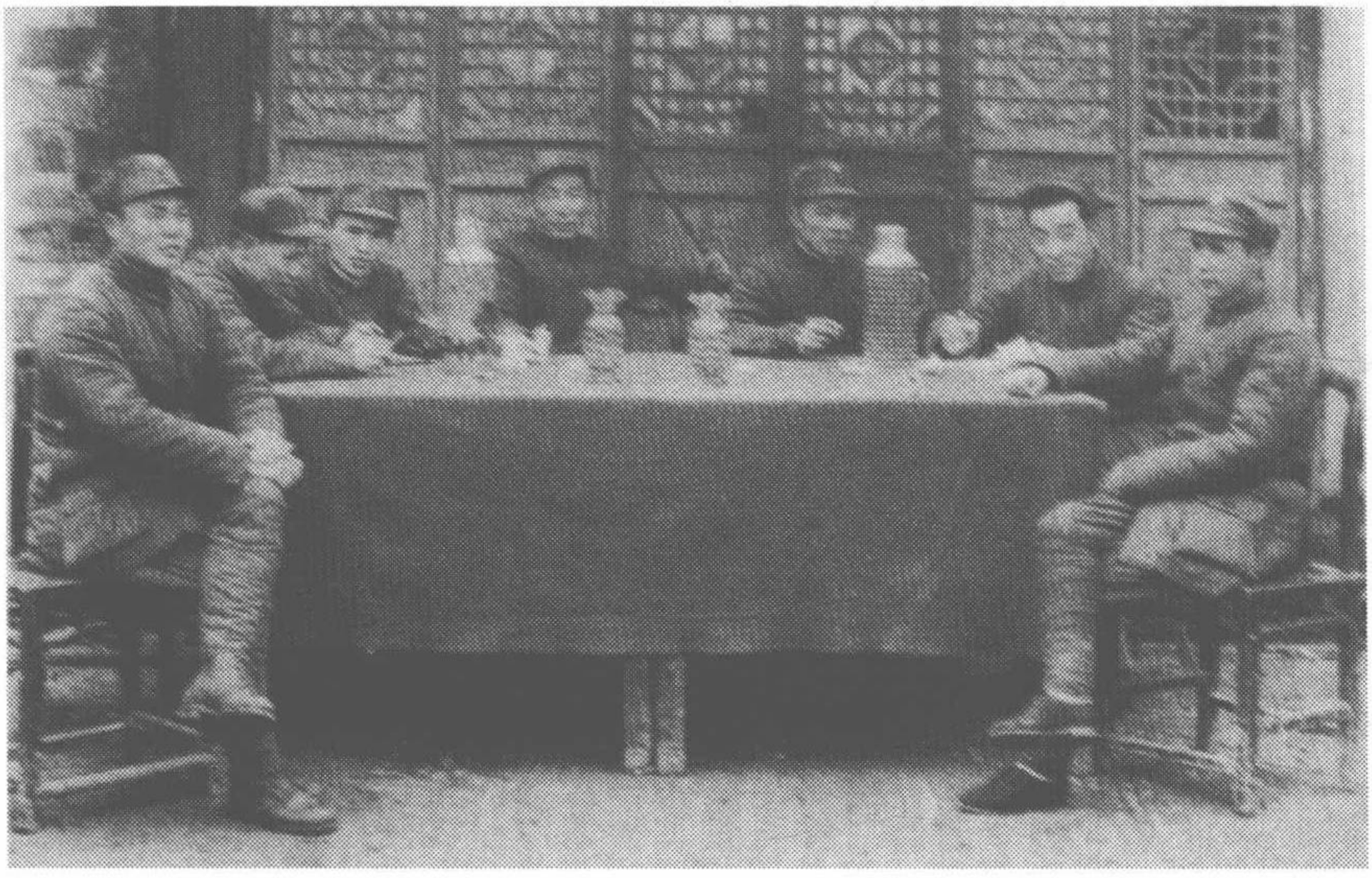
这次战役，共歼敌 2 个军 7 个师共 6 万多人。这就是被群众广为传颂的“让出一座城，歼敌六万人”的莱芜之战。李仙洲集团被歼后，蒋介石急忙飞到济南，斥责王耀武、李仙洲无能，要王耀武守好济南，不能再有闪失。王耀武遂令胶济路西段各部撤回济南。我胶东军区主力部队新编第 5 师参谋长钟光国与师长、政委率部同各军分区武装一起，乘胜横扫地方反动武装，解放了胶济路西段及其两侧城镇 10 余座，控制铁路 400 多里，使山东解放区的胶东、渤海、鲁中三区连成了一片。

进攻华东之敌遭此惨败后，3 月份未敢出战。陈毅、粟裕抓紧时间休整部队，厉兵秣马，迎接新的战斗。

回过头来，再看看敌占地区的情况，那里的战斗虽不如前线热烈，但十分艰苦。随着敌人的大举进攻，主要战场由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转移到鲁南、鲁中，敌人的大部队也随之跟进，留在两苏、两淮的兵力较为薄弱。陈毅、粟裕令华东野战军第 11、第 12 纵队深入敌后开辟战场，收复失地，建立政权。11 纵从苏北进到苏中的海安、如皋，仅 4 月份即歼敌数千人，打通了苏中与苏北地区的联系。12 纵也在两淮地区寻机歼敌 1 万多人。纵队领导还从各旅抽出一部分武装，由既会打游击、又有地方工作经验的旅首长率领，到敌人占领地区去打游击，开辟地方工作。李世焱是被

抽调的领队之一。他当时是12纵队34旅政委，奉命带1个团到淮南去，恢复津浦路以东的老根据地，以配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的斗争。出发前纵队司令员陈庆先对李世焱说："你的任务很艰巨，有什么困难没有？"李世焱说："回到老根据地去开展斗争，有群众支持，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陈庆先说："好！世焱同志，我祝你成功。"就这样，他带领34旅第100团离开纵队，离开旅部。

李世焱孤军南下第一站是淮宝，与当地坚持斗争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取得联系后，随即按上级指示成立了前委，统一思想和行动，为下一步开展斗争提供组织保证。接着，根据敌人在宝应、高邮、盱眙、天长等县的驻守情况，决定先打银集，然后拿下金沟，以打开局面。银集驻有敌正规军一个加强连和一些地方武装，筑有坚固工事。我地方武装多次攻打未克。李世焱指挥部队围攻，仅一天时间将其全歼。金沟驻敌闻讯，连夜逃走。这一地区便被我军控制，实现了南下的第一个战斗目标。这时，在盱眙西坚持斗争的一支地方武装前来会合。李世焱召开前委会议，将淮宝、盱眙两地武装（约两个营）统一起来，组成淮南支队，配合100团的军事行动。于是接连攻下了马坝、黎城等敌人据点，然后直下天长，围攻敌人重要据点铜城镇。这一行



1947年李世焱率100团南下津浦路东恢复根据地。图为李世焱(左四)与军队和地方负责人在研究工作。

动，惊动了淮南地区的敌人，忙从南面的扬州、六合调1个旅，从北面的光明、盱眙调1个师，南北对进，实行夹击。李世焱率部撤出战斗，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外，转到天长以南、六合以北，敌人兵力空虚的地方打土顽武装。不久敌合围部队撤走，李世焱率部乘机进入天长县张公铺，在那里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民主政权，并为继续打铜城镇做准备。1948年2月底，陈庆先电令李世焱和淮南支队围攻铜城，随后他亲率34旅的另两个团南下打击敌人援兵。3月1日，李世焱指挥100团和淮南支队对铜城发起总攻，在旅炮兵的配合下，很快拿下了铜城，消灭敌天长县保安大队所属6个中队和高邮、宝应等县的土顽武装共800多人，缴获武器物资颇多。我军攻铜城时，敌交警总队从六合、天长驰援，进入34旅另两个团设下的伏击圈被歼300多人，余敌仓皇逃去不敢再犯。从此天长以北地区大部收复。战后，李世焱率部归队，与旅长廖成美一起继续在这一地区活动。他们率34旅又打下了盱眙的古镇，歼敌青年军400多人，敌人龟缩于盱眙城内据守。从此天长大部，盱眙以东，宝应南部，运河以西这块老根据地得以恢复，并建立了4个县政权，基本完成了南下的作战任务，李世焱获得纵队表彰，第100团受到了嘉奖。

猛虎掏心　斩精截锐

莱芜战役，国民党军遭到惨败，一个月不敢出战。

蒋介石为实施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又走马换将，撤回陈诚，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成立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汤恩伯、王敬久、欧震的第1、第2、第3三个机动兵团，共计24个整编师60个旅45万人，分三路向我华东野战军进攻。国民党军有“五大主力”，其中有三大主力用于山东战场，即整编第74师，整编第11师和第五军。三个机动兵团分别以这三大主力为骨干组成。敌人的进攻计划是：第1、第2兵团向北推进，第3兵团向东压迫，实行“东压北进”的战术，首先占领鲁南，然后进占鲁中，迫使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或压迫我军北渡黄河，实现占领全山东之目的。敌人为避免在进攻中被我军分割歼灭，吸取以往的教训，采取了“加强纵深，紧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

敌变我亦变。陈毅、粟裕采取“敌进我退”的办法，有意让出鲁南老根据地，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但一开始，敌人很谨慎，用“集团滚动”方式

进攻，很难捕捉战机。我军又由沂蒙山中心地带向北转到徂徕山，用两条腿跟敌人的四个轮子周旋。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陈、粟决定围城打援，以打破这种局面。其具体部署是：以 1、3、10 纵队为西兵团，围攻驻守泰安的敌第 2 兵团整编 72 师；以 2、4、6、7、8、9 纵队为东兵团，布置在临沂至蒙阴的公路东侧，待机歼灭北援之敌。

4 月 22 日，西兵团的 1、10 纵队攻占了泰安外围，邻近的大汶口驻敌不敢出援。为尽快拿下泰安歼灭驻敌，24 日粟裕又加派 3 纵的第 8、第 9 两个师参加攻城。8 师师长贺健，9 师师长王吉文，两位红安老乡，早想打仗等了一个月。他们高兴地接受任务后，连夜从蒙阴以北赶赴泰安，与围城部队一起对泰安城守敌发起猛攻。26 日攻入城内，全歼敌整编 72 师师部和 2 个旅，俘敌师长杨文泉以下官兵 15000 人。战后，8、9 两师归队。1 纵西进克宁阳，3 纵逼兖州，10 纵向肥城扩大战果。

东线兵团在新泰、蒙阴百里长的阻击线上，积极阻击由东向西进攻的敌第 3 兵团的 10 万兵力，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放弃新蒙两地，转向临沂东北地区待机。5 月 3 日，粟裕又以 4 个纵队，包围驻新泰地区的敌“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 11 师，敌第 2 兵团主力迅速向新泰地区靠拢，我军兵力不足，有被反包围的危险，4 日主动撤围。这次战役未达目的，引起远在陕北转战中的毛泽东的关注。

当敌人开始重点进攻山东时，毛泽东曾向陈毅、粟裕发出指示：“我军作战应依旧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但鉴于敌军兵力过分密集，准备充分，行动谨慎，估计有利战机比过去少得多，应采取慎重待机的方针，即以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疲惫、迷惑敌人，审慎地观察战场形势细微的变化，分析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能动地创造和捕捉有利的战机，条件具备了就坚决歼灭之，条件不具备，就改变和放弃原计划，绝不能急躁作战。”这次我军对敌整编 11 师围而又撤后，毛泽东又及时电告：“不要轻敌，不要分散兵力，对于密集之敌要有极大的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过早惊动敌人后方，让敌人大胆前进，总有歼敌机会。当然，希望华野再打两三个战役后转入外线。”毛泽东虽不在山东，但对山东战场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的指示来得真是及时。曾任华野 4 纵 11 师特务团团长杜耀清，回忆这段战斗日子时说：“莱芜战役后，敌人重点进攻山东，兵多武器好，气势汹汹，我们想打不好打，只好憋一肚子气东奔西转。不是大踏步前进，就是大踏步后退，每天都是百多里，刮大风下大雨都是如此。

日子长了战士们讲怪话，说是‘放着咸鱼吃淡饭’，意思是放着敌人不打绕开走。后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条件不具备绝不能急躁作战，条件具备了就坚决消灭之。经过学习，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弄明白了，怪话就没有了，情绪很高，结果在孟良崮打了个大胜仗。”

孟良崮之战是怎样一回事呢?

5 月上旬，敌军 3 个兵团中担任右翼进攻任务的第 1 兵团司令汤恩伯，想抢头功。他不等第 2、第 3 兵团统一行动，就以整编 74 师为骨干，在整编 25、83 师的配合下，自沂蒙誓师北进。他在誓师会上口出狂言：“要打掉陈毅的主力，把陈毅这个山大王捉拿归案。”汤恩伯狂过以后，他麾下的 74 师师长张灵甫想抢头功的头功，也疯狂起来。他向恩伯提出“我 74 师愿从中出击，直捣陈毅的指挥部”，汤恩伯同意了。5 月 11 日，汤恩伯令各部，向华野指挥部所在地蒙阴坦埠前进。张灵甫率 74 师一马当先，跑得更快，与主力前后相距有 20 多里。粟裕得到这一情报，马上向陈毅报告，并提出自己的作战意见。他说：“敌 74 师已形成孤军深入之势，我想用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阵中央楔入，切断 74 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将其干净、全部消灭掉！”陈毅听了十分高兴地说：“好！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两人经过一番研究就把作战方案定下来了：以 5 个纵队围歼整编 74 师，以 4 个纵队阻敌打援。具体布置是：陶勇 4 纵和许世友 9 纵从正面出击；叶飞 1 纵和王建安 8 纵分别从 74 师的左右两翼迂回穿插；王必成 6 纵断敌后路；宋时轮 10 纵阻击莱芜南援之敌；何以祥 3 纵阻击新泰南援之敌；成钧 7 纵阻击河阳北援之敌；韦国清 2 纵配合 7、8 纵作战。这个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后，毛泽东看了对周恩来、朱德说：“我们不是刚电告他们，拣好打的消灭敌人一两个军。现在他们的报告正合我们的意图，我看可以同意他们执行吧！”统帅部复电同意，一场恶战就此开始了。

5 月 13 日晚，华东野战军的 5 个纵队似 5 支利箭一齐射出，向敌“精锐之精锐”“王牌之王牌”整编 74 师进行分割包围。战至 14 日晚，将进攻坦埠的敌 74 师围困于天马山。被围敌军发生动荡，张灵甫反而得意地告诫部下：“不要大惊小怪，把共军吸引到我们周围，正好有利于我军四面夹击，实现全歼共军主力的‘宏伟蓝图’。”蒋介石听到他的第一张王牌军被围，坐卧不安，急飞徐州，要顾祝同调重兵，不仅解 74 师之围，还要趁此机会消灭山东主要共军。顾祝同立即调动 10 个整编师对我军进行反包围。战场的形势一下子变得十分严峻。我军如不迅速结束战斗，5 个纵队有可能覆没。

陈毅在指挥所不同寻常地给叶飞打电话，说："蒋介石要和我们决一死战，敌人已经派重兵把我们反包围了，情况十分严重。现在由你指挥1、4、6纵队，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孟良崮。哪怕1、4、6纵队打光了，只要把敌人消灭了，也在所不惜。我给你们补充，恢复你们的番号。"陈毅还分别跟许世友、王建安打了同样的电话。主帅把话说到这分上就是死命令。叶飞即令他的两员战将2师师长刘飞、独立师师长方升普：你们两个师留1个团在山脚阻击敌人援兵，其他5个团与兄弟部队一起全力攻击。2师是山东军区的老部队，独立师却是从中原突围来的原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改编而成的，以善战著称。现在这两个师成了叶飞的"杀手锏"，锏一打出，势不可挡。张灵甫带着部队向后退去。这时需要更多的兵力向敌人压去。但后续部队一时又上不来。叶飞只好将预备队1师和3师拉上去，一边巩固阵地，一边进攻。张灵甫稍事调整后猛烈反扑，重又夺去阵地，我军复又夺回来。战斗从白天到晚上，一直处于白热化之中。张灵甫虽然剽悍，但还是悍不过我方的勇将猛士。15日拂晓，刘飞的第6团，方升普的第1团和第3团分别抢占了两个有利高地，1团团长王诚汉、政委陈行庚，3团政委吴振挺和团长都身先士卒，带领所部节节挺进，与8纵、9纵兄弟部队各一部一起不断攻占敌人的扼守要点。张灵甫只得由天马山退守草木稀疏、乱石丛生的孟良崮山中，所有装甲车、坦克车等重型美式装备全部扔下，我军未等战斗结束就缴获了大量武器。

孟良崮的恶战，牵动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心，一个接一个的电示传到陈、粟手中，意思都是一个：要速战速决，不能贪多，否则将产生不利后果。陈、粟看着这些电示，心情十分沉重。粟裕提出从阻击部队中再抽出一部分兵力，增加进攻力量。这是一着险棋。因为阻击部队正抗击着外围几十万敌人的进攻，应该加强兵力反而要减。陈毅权衡一下轻重缓急，觉得只有如此。抽调的部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后，粟裕要通了叶飞的电话，说："现在我授权由你统一指挥1、4、6、8、9纵队总攻孟良崮，16日拂晓前一定要拿下来，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拼掉两个纵队，也要完成任务！"叶飞立即将总攻的时间、信号和任务下达各纵。各纵队首长亲临前线，师团干部都到了前沿。

在浴血奋战中，红安籍参战的将领王建安、张仁初、陈美藻、刘飞、戴克林、徐海珊、周世忠、贺健、王吉文、熊应堂、杜耀清等，都是一马当先。2师参谋长戴克林已是两天两夜未合眼，这时他让参谋留在指挥室守电

话，自己到担任攻坚任务的第 6 团。他原是这个团的团长。在他的带领下，6 团从苏中打到鲁中，经历大小战斗无数，部队在顺利和困难中有扩大也有缩小。扩大时 6 团达到 1800 多人，困难时减到 700 多人。不管扩大与缩小，6 团一直以敢打敢拼而闻名。这次 6 团在攻占孟良崮有利高地时有一定伤亡，现在仍要继续攻坚。他怕这把利剑变钝了，所以不顾师长、政委叫他待在指挥室的劝告，径自赶到了 6 团。已进入战斗状况的指战员们，见老团长回来了很高兴，都说完成作战任务更有把握。戴克林说："有没有把握靠大家，大家打好了，任务就胜利完成了。要打好，我还是那句老话'敢打敢拼'。今天是去掏张灵甫这只猛虎的心，不敢打不敢拼不行。待会总攻命令下达后，你们一个个要变成比张灵甫凶猛十倍的铁老虎、钢老虎去掏他的心！"戴克林的战地动员是火上加油，后来第 6 团打得非常出色。

16 日凌晨 1 时，总攻开始。我军无数门山炮、野炮、迫击炮，从四面八方飞向孟良崮山头，打得敌人尸横遍地。张灵甫这才知道大事不好，忙向蒋介石、顾祝同、汤恩伯求救。蒋介石命令顾祝同速援 74 师，不得有误。顾令距孟良崮较近的 6 个整编师拼死相救，多遭到我 3 纵、5 纵、10 纵和鲁南军区部队坚决阻击，不能前进，只有敌整编 83 师逼近我包围圈。敌我已构成交叉火力。这时如不能将敌人打退，就有可能解围。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我 8 纵和 2 纵一部在王建安的指挥下，边攻孟良崮边打援，歼敌 83 师 1 个团并将其击退。张灵甫求援无望作困兽斗，以贴身警卫部队为骨干，组成千人敢死队向外突围，又被我军猛烈的火力压了回去。随即我各个纵队组织的突击队攻上了山顶，张灵甫躲入一个山洞中，拒俘自毙。不可一世的张灵甫倒下了。树倒猢狲散，孟良崮之战，于下午 5 时结束。这次战役历时 4 天，歼敌整编 74 师 3 个旅和整编 83 师 1 个团共 32000 多人。5 月 22 日，新华社发表述评，代表党中央高度评价孟良崮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述评说："华东人民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区人民，在全国人民的爱国自卫战争中，担负的任务最严重，得到的成就也最荣耀。"

整编 74 师的覆灭，令国民党政府朝野震惊，蒋介石潸然泪下。这是他请美国军事顾问训练、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御林军（在进攻山东解放区之前，74 师是首都南京的警卫部队），是他手中 5 张王牌的第一张。他花费多年心血培养起来的一支劲旅，就这样被人吃掉了，能不伤心落泪吗？敌整编第 74 师被歼后，其进攻山东的计划受到重挫，不得不暂停进攻。但蒋介石整饬内部没有停。他在一阵抱怨之后，将不得力的将领进行处罚，罢官一

个，处分一个，法办一个：第 1 兵团司令汤恩伯被撤职，整编 25 师师长黄百韬受处分，整编 83 师师长李天霞送军事法庭审判。“杀鸡给猴看”，蒋介石用这一手告诉顾祝同：整顿好部队再进攻。

6 月下旬至 7 月底，顾祝同调集 9 个整编师 25 个旅，用“重叠交互前进”的战法，以三个师一重叠，互相交替前进，向我山东解放区的腹地——沂蒙山区发起全线进攻。陈、粟采取“避开正面，出击侧后”的战法，将主力分成南路、北路兵团，专打敌人的侧后方，一下子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至此，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以折将损兵 5 万余人而告终。

血取泉城　全盘皆赢

1947 年 6 月 30 日，刘邓大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挺进中原，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为配合刘邓大军实行战略反攻，8 月 1 日陈毅、粟裕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率华东野战军第 1、3、4、6、8、10 纵队和特种兵纵队进入鲁西南，组成外线兵团，牵制敌人，掩护刘邓大军南下。留在山东境内的第 2、7、9、13 纵队组成内线兵团，配合外线作战，逐步收复失地。

外线兵团在陈、粟亲率下，南下豫皖苏，西出陇海路和平汉路，纵横千里，辗转奋战，在将近一年时间内，先后发起了沙土集战役、进军豫皖苏战役、陇海路破击战、平汉线战役、洛阳战役、豫东战役等，共歼敌 19 万人，开辟了豫皖苏新解放区，建立了 24 县民主政权，取得了始料未及的重大战绩。外线兵团这一战略行动，不仅有效地拖住了敌人进攻山东的主力，减轻了山东解放区军民的压力；还有力地掩护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实行战略展开。

随外线兵团转战的红安籍将领在上述各战役中率部打得非常出色。3 纵 7 师师长贺健，在沙土集战役中，为歼灭敌整编 57 师，两度率先攻打。9 月 7 日，敌 57 师首先犯我，贺健奉命率部先给敌人当头一棒，迫使敌人龟缩沙土集。我军即将其包围。9 日，我军发起总攻。贺健率部又先攻入敌人营中。经过激战，与兄弟部队一起将 57 师师部 2 个旅共 1 万余人全部歼灭。在进军豫皖苏战役中，善做政治工作的 8 纵 24 师政委陈美藻，率领部队一面行军打仗，消灭国民党地方武装；一面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民主政权。繁忙的军政工作，使他日夜无暇休息。由于他忘我的工作，使 24 师在开辟新解放

区的工作中搞得有声有色，受到上级表扬。至于陇海路破击战、平汉线战役、洛阳战役的战况战绩就不一一细说，重点说说豫东战役。

豫东战役是粟裕巧妙用兵，取得辉煌战果的一场大战。这个战役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的。

第一个阶段打开封。1948 年 5 月底，粟裕让 3、8 纵队从许昌北上，去吸引敌“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然后亲率 1、4、6 纵和两广纵队渡过黄河去分割围歼。敌人发觉我军意图，连忙靠拢。这时我 3、8 纵已接近开封，城内驻敌没有严防。粟裕觉得捞不到大鱼，捞条小点的鱼也可以，便来个“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令 3、8 纵进攻开封。

开封是河南省省会，地处平原，城墙坚固，易守难攻。6 月 17 日，8 纵在司令员王建安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仁初的指挥下，与王吉文、贺健所在的 3 纵一起发起进攻。8 纵主攻南门和东门，3 纵主攻北门和西门。南门有敌人的地堡、暗碉，较为难攻，张仁初站在前沿指挥，广大指战员以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英雄气概，一步一个血印地向前攻去。蒋介石怕失开封，亲临空中督战，调快速部队增援，都无济于事。18 日，8 纵突破南门。19 日，3 纵突破北门。20 日在市区进行巷战。21 日攻占开封，全歼守敌 1 个整编师 2 个保安旅，共 38000 多人。我军打下开封，不论政治上还是心理上对蒋介石都是很大的威慑。

第二个阶段是睢（县）杞（县）围攻战。我军攻克开封后，蒋介石怕引起多米诺效应，责令黄百韬、区寿年兵团去迅速夺回。黄百韬想立功，行军快速；区寿年则很迟疑。两军相距 80 余里。善捕战机的粟裕决定歼其一路。6 月 27 日，他集中主力向区寿年兵团发起猛攻，29 日将敌人分割包围起来。与此同时，我 3、8 纵队从开封撤出后，便投入打援战斗。经过 6 天激战，到 7 月 2 日结束，除一部分突围外，区兵团大部被歼，计 5 万多人，区寿年被活捉。

这场大战是在开封、睢县、杞县进行的，地处河南东部，被称之为豫东战役。整个战役前后 11 天，歼敌 1 个兵团部、2 个师部、4 个正规旅、2 个保安旅近 9 万人，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王建安、张仁初、贺健、王吉文、刘飞等，在豫东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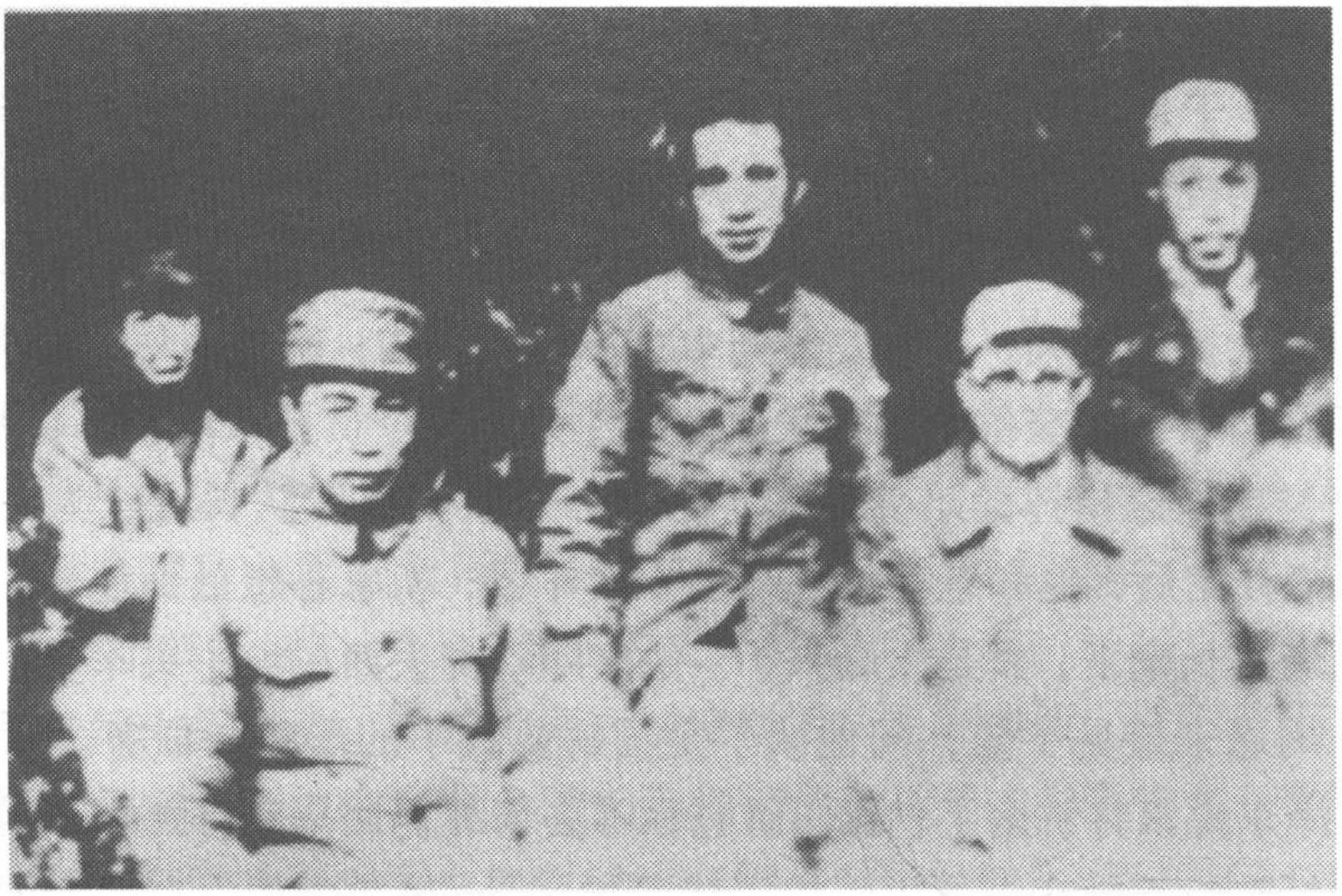
内战线兵团在许世友的指挥下，将近一年先后打了南麻临朐战役、胶东战役、周张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等，共歼敌近 20 万人，收复了大部分失地。至此，山东境内国民党军手中的城市只剩下济南和青岛了。

豫东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内外线兵团适时会师，具有攻打大城市的作战能力。于是，蒋介石赖以支撑华东与华北的战略要点济南和太原，进入了毛泽东的视线。他在考虑攻打这两个城市的时间，还考虑作战部队的干部配备。

豫东大捷后不久，王建安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调他到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任副司令员，准备参加打太原。第1兵团司令员是徐向前。红军时期，王建安是在徐总指挥的培养带领下，从一个农民自卫队长成长为红四军政委。抗战开始后，他和老首长分开已十多年了，朝思暮想见到他。现在通知他重返老首长麾下，真是太高兴了。他立即动身去西柏坡中央军委报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他，同他谈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与任务。讲到山东时，毛泽东说该打济南了，我们研究你不去华北仍回华东，到山东兵团当副司令员好吧？毛泽东之所以征求王建安的意见，是考虑到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跟他是同级干部。王建安领会了毛泽东的意思，马上回答说："请主席放心，我和许司令是老搭档，会合作得很好的。"毛泽东讲完后，周恩来说，济南战役作战方针拟好了，打算给华东发电报，就由你回去传达吧。

王建安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重托回到山东后，向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等传达了中央指示。大家当即进行了研究，决定由山东兵团主攻济南，成立前线指挥所。会后，王建安去兵团部报到，许世友破例摆酒接风。这是因为红军时期，这一对情同手足的搭档，后在延安"抗大出走事件"中有过不愉快的经历。现在老搭档来当副司令，尽管是军委安排，许世友觉得王建安到职是一种高姿态。所以他也满腔热情地欢迎。许世友是有名的酒将军，把酒接风是他的最高礼遇。他和王建安一人一瓶酒。许世友举瓶对王建安说："我们从延安分手后，这是第一次在一起喝酒。酒到意到，过去的都过去了，为了今后共事愉快，我先干了！"说完一饮而尽。王建安被他的豪爽和真诚所感动，也把酒喝完了。这事传开后，人们借古谈今，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许世友瓶酒释前嫌。"从此两人和好如初。在攻济问题上许世友对王建安多有倚重。他对王建安说："你亲自听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关于攻打济南的指示，领会精神比我早、比我深。近来我的身体不算好，前线指挥所的工作以你为主抓起来，由你统筹攻济之事，你看怎样？"王建安觉得许世友讲的是实情，不好推辞，就答应下来。

山东省会济南，北靠黄河，南倚泰山，城内遍布泉眼，人云"家家泉



王建安与华东野战军领导人在一起。左起：谭震林、陈士架、粟裕、王建安、谢有法。

水，户户垂杨”，故称“泉城”。济南地形险要，城墙高大，守城容易攻城难。国民党军以济南内城为核心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以外围县镇及制高点构成外围阵地，各阵地构筑有很多永久性工事，形成能独立作战的支撑点。守城的是敌第 2 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总兵力有 9 个正规旅、5 个保安旅以及特种兵部队，共 11 万多人。王耀武吹嘘说：“济南城固若金汤，光外围第一道防线够共军啃 3 个月。”这虽是痴人说梦，但攻打起来，确很困难。同时敌在徐州集结有 3 个兵团 23 个旅的重兵，随时可北援济南。

粟裕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围城打援分工协作”的作战方针，决定集中兵力，组成攻城、打援两大兵团攻克济南。攻城兵团由山东兵团首长指挥，下辖 6 个半纵队，并配属特种兵纵队大部和地方武装，共约 14 万人。打援兵团 8 个半纵队，共约 18 万人，由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攻城兵团又分成东西两个集团和总预备队。9 月 15 日夜，攻城兵团迫近城郊。16 日晚，两个集团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以勇猛的动作，突然向济南外围防线发起攻击并一举突破。接着西集团乘胜直指敌整编 96 军军部。在我军猛烈进攻下，抗战时就是王建安的手下败将、敌 96 军军长吴化文率 2 万余人起义，使我军一举夺取了济西飞机场，切断了王耀武与外面的联系。东集团我军亦

占领了济南东面的制高点。王耀武向内收缩作困兽斗。战斗遂转入攻坚阶段。尤其是城西进攻阻力大，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广大指战员依然前仆后继向前攻。9 月 21 日，3 纵 8 师师长王吉文，率部攻入城西商埠区，接到报告说 21 团的突击队在纬八路，被敌人的地堡群阻住了。他之前三天三夜未合眼，不顾疲劳也不听政委的劝阻，亲自到火线上去指挥排堡。当他与团、营干部一起指挥打掉地堡群，使部队通过封锁线时，敌人一颗炮弹飞来，在他的身边爆炸了。王吉文不幸牺牲。全师悲痛万分，以锐不可当之势向敌人纵深插去，直扑城下。

王吉文 1930 年参加红军，由战士当到营长、团长，参加长征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任营长，与兄弟部队一起突破天险腊子口，使一方面军顺利走出草地，进入甘南，得到毛泽东的表扬。抗战开始，随八路军第 1 纵队挺进山东，先任特务团长，后任鲁南军区 2 军分区司令员，为开辟鲁南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是一位深受广大指战员喜爱的将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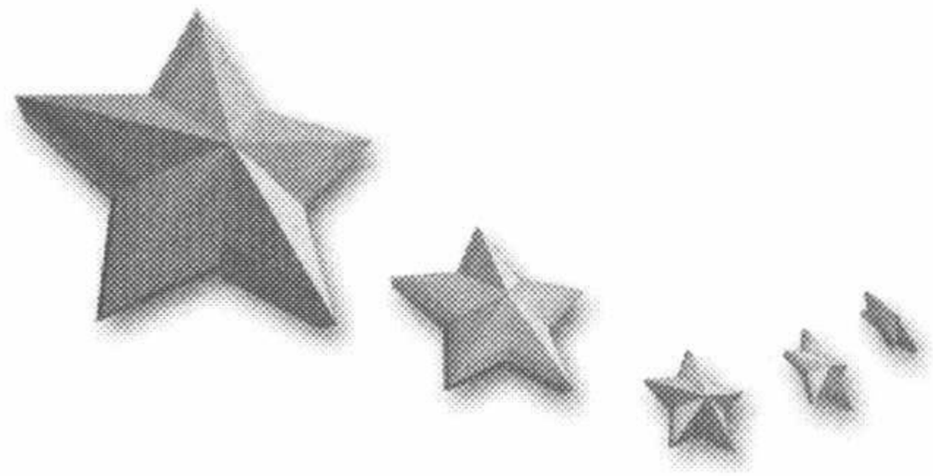
由于城墙坚固，敌人的火力猛，我攻城部队屡屡受挫。一直待在前线指挥所的王建安，将总预备队 13 纵投入攻城战斗。他对纵队司令员周志坚说："你一定要把济南城打个洞钻进去！"周志坚把这一任务交给 37 师。师长高锐和政委徐海珊选择坤顺门作为突破口，由 109 团担任爆破。23 日夜，109 团在坤顺门下炸了个洞，冲进两个营，又被敌人赶出来，并卡去了两个连。徐海珊急了，立即召开战地会重新部署。在 109 团一再请求下，他们第 2 次冲进去并站住了脚跟。接着东门亦被东集团我军突破。东西两线的攻击部队会合后直捣王耀武的司令部。就在即将取得全胜的时刻，蒋介石为挽救垂死挣扎的王耀武，派飞机轰炸我军突破口附近的阵地。一颗大炸弹落在 37 师指挥所附近，指挥所的楼房被炸倒，师政委徐海珊和几位参谋、警卫员不幸牺牲。

在清理师政委的遗物时，他的挎包里只有两份文稿：一是 1945 年 3 月在华中党校学习时写的自传，二是济南战役开始前写给爱人张杰的一封短信。信上说："张杰同志，这次任务艰巨，我是准备牺牲的，没有什么留给你，只有这份自传，作永久的纪念。"这位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组建第一支便衣队的创始人，英勇地实践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立下的誓言，在解放济南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24 日黄昏，我军全歼城内守敌，计 1 个绥靖区司令部、2 个整编军部、10 个旅零 1 个团，一个整编军部起义，3 个旅以及非正规军 4 个师零 4 个团，

共104000人。活捉王耀武以下高级将领23名。

济南战役结束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给华野发来贺电，电文说："庆祝你们解放济南，歼敌10万的伟大胜利。你们这一勇敢、果敢、敏捷的行动，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来革命战争给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是华野的最大光荣。在分享这份荣誉的同时，那些在不同地点、不同岗位上参加这次战役的红安籍将领，如一直站在前线指挥所担任攻城实际指挥的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在东西两个集团参加攻城战斗的3纵9师师长贺健、9纵27师参谋长罗映臣，在津浦路兖州、邹县段两侧打援的8纵司令员张仁初、22师政委陈美藻，1纵2师师长刘飞、副师长戴克林、2纵4师副师长周世忠、7纵19师师长熊应堂、副师长吴怀才、21师副政委李正清等，也得到了极大锻炼和提高，在以后的战斗中他们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十一章　经略中原勇逐鹿

战略反攻刘邓剑指鲁西南，往返五渡黄河均获胜。惜损一员好将，吴大明血洒章缝集。挺进大别山郑国仲情急中指挥取得第一个胜仗。解放军同样有亲情孝道，陈锡联在转战中悄见老母。吴昌炽组织土游击队诱敌深入，夺取高山铺战斗胜利。谢富治伏牛山“牵牛”，黎锡福勇打头阵。王近山一反兵家常规夺取襄阳城。詹少联妙手回春消除部队隔阂。郭天民言人之不愿言敢于纠偏。

五渡黄河　运动歼敌

中原自古是群雄逐鹿之地，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在中原大打出手。因我军胜利突围，使他的图谋未能得逞，转而向陕北、华北和华东全面进攻。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全国内战形势的变化，指示晋冀鲁豫军区由防御自卫转向机动歼敌。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全军区的军事力量重新作出部署：第2、第3、第6、第7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由他们亲自指挥，向豫东机动作战；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由陈赓、谢富治率领，向晋南机动作战；滕代远、薄一波率其余武装留守后方。这一部署拉开了中原逐鹿的序幕。

1946年8月初，在西面围追堵截我中原突围部队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被牵制到豫西、陕西地区。在东面进攻苏中、皖北的敌军继续北进。这样一来，陇海路开封至徐州间，以及鲁西南、豫东广大地区，敌人只有两个正规师及地方保安团守备，形成两面强中间弱的局面，为我军机动作战提供了机会。刘、邓抓住机会即率野战军4个纵队，一渡黄河南下，乘虚而入，于8月10日发起陇海路战役，在西起开封东至徐州数百里陇海线上进行破袭，并向路南出击。

我军分为左右两路：左路由杨勇指挥7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进攻商丘至徐州间路段，右路由陈锡联指挥3、6纵队进攻商丘至开封间路段。11日，左右两路同克沿线各车站，歼敌5000余人，控制与破坏铁路300余里。这次战斗使敌人大为震惊，纷纷从豫陕和华东调兵回援开封和徐州。13日，刘、邓决定以陈锡联指挥的3、6纵队，围歼回援孤立突出之敌整编55师的181旅，其他部队越过铁路南进，打击地方反动武装。21日，敌181旅进至陇海路边的马牧集附近，便遭到3纵的阻击。随即3纵的7、8、9三个旅，

将敌人的3个团分割包围起来。敌旅长米文和通过无线电命令被围的3个团长顶住，给他们打气说："我们手中是美国武器，比八路的土枪土炮强得多，只要坚持住，一定能够打败八路军。"他的话说完不久，困在乔庄和杨楼的两个团，就被郑国仲指挥的9旅和7旅1个团歼灭。稍后，困在吕庄的旅部和另一个团也被马忠全指挥的8旅全歼，米文和侥幸逃脱。另一路敌援军第29旅，大部也被王近山指挥的6纵歼灭。与此同时，进入路南的其他部队攻克了5座县城，歼灭了一些保安团。到22日止，整个战役结束，共歼敌正规军2个旅和保安团16000人。

刘、邓乘虚而入，引敌回援，也引来大火烧身。8月底，蒋介石令国防部长白崇禧坐镇开封，从郑州和徐州两个绥署调集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合围刘、邓野战军。位于中路的郑州绥署刘峙最积极，所属整编第3、47、55、68师和保安第4纵队，组成钳形，向曹县、定陶进攻。

我军刚打完陇海路战役，急需休整，敌人又气势汹汹地赶来。毛泽东及时给刘伯承、邓小平发出指示："集中全力歼其一部，尔后伺机再歼一部。"刘、邓便将4个纵队集中起来，先打向定陶进攻的敌整3师和47师。采取"猫捉老鼠，玩软了再吃"的战法，用运动阻击战，消耗和迟滞敌人进攻，为我军争取3至4天休整时间，做好战斗准备。

这次阻击战是战役的关键。刘、邓把任务交给3纵。纵队司令员陈锡联领受后交给9旅。陈锡联对旅长郑国仲说："这次阻击任务很重，侧重点有所不同。对进攻定陶之敌整3师，要阻中有节。先猛阻，消耗它，后放它进来。对整47师，要又阻又切，切断它与整3师的联系，使其不能支援。这就是刘司令员常说的，把老鼠玩软了再吃。对进攻曹县之敌整55、68师，就要坚决阻于曹县以南，使其不能进县城，保证主力吃掉敌整3师、47师。刘、邓首长决定从冀鲁豫军区调2个团交你指挥。用5个团去对付敌人4个师，担子不轻啊，你得挑好。"郑国仲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8月30日，郑国仲率部队向指定地点开进。连日多雨，道路泥泞，行走困难。但指战员们情绪饱满，仍按时到达考城至仲堤圈一线展开。9月2日，在猛烈炮火支援下，敌整3师、47师在西，整55、68师在东，向我阵地发起进攻。郑国仲在前线指挥所，几天几夜未能合眼。后来他谈到这次战斗时说："这是9旅组建以来，头次执行这么大规模的阻击任务。稍有不慎，就会出大问题。我满脑子想的是，哪里打得怎么样，还应该怎么打……实在

操心！在西面，我用‘节节抗退’，诱敌整 3 师深入，堵住整 47 师前进。在东面，我用‘交替阻击，纵深防御’，阻击敌整 55、68 师。敌人用飞机、大炮配合地面部队向我主阵地进攻，一度展开白刃战，终使敌人未能进至曹县，完成了阻击任务。”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指挥员在火线上，有如孟子所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有时还要“饿其体肤”。

被放进来的敌整 3 师，到达我预设的战场——定陶西面的大杨湖、大黄集地区后，刘、邓指挥主力，于 9 月 4 日予以分割包围，6 日将其全歼，生俘中将师长赵锡田。7 日至 8 日，又歼整 47 师大部。余敌仓皇逃遁。我军又追歼了敌整 55、68 师各一部，共歼敌 17000 多人。定陶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白崇禧在豫鲁边钳击我刘、邓野战军的企图。9 月 12 日，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这一胜利，连同中原突围的胜利和苏中七战七捷，“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时局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刘、邓在豫东出奇制胜，陈赓、谢富治在晋南亦捷报频传。7 月上旬，敌胡宗南部 6 个旅与阎锡山部共 7 万人进攻晋南，企图打通同蒲路南段。7 月 13 日至 9 月 24 日，陈、谢遵照军委指示，率第 4 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先后发起闻（喜）夏（县）战役、同蒲路战役和临（汾）浮（山）战役，共歼敌 25000 人。在临浮战役中，一举全歼号称“满天飞”的国民党军“天下第一旅”，活捉了中将旅长黄正诚、少将副旅长兼参谋长戴涛和少将团长刘玉树等，缴获了全部美式装备和物资。一战擒三将，一时传为佳话。陈、谢在同蒲路南段发动的三次战役，都是在国民党军控制的铁路沿线新区内进行的。为使我军在群众中留下好影响，第 4 纵队政委谢富治，特别注意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采取层层检查，总结评比的办法，鞭策和提高各部执行纪律的自觉性。因此我军在战前战后，受到了新区人民的欢迎和拥护，赞誉我军是“仁义之师，秋毫无犯”。第 4 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独当一面，三战三捷，《解放日报》特此发表《向太岳纵队致敬》的社论。

再说定陶战役结束后，刘、邓即时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议，总结作战经验，强调要防止和克服因胜利而滋生的骄傲情绪及违纪现象，以保持部队旺盛的战斗力。打算让部队边总结边休整。

但是，敌人不让你这么做。他们仗着优势兵力和装备，继续向我军进逼。蒋介石手中的五大主力在山东战场投放了三支。其中整编 74 师在孟良

崮被我军消灭后，另两支——第五军和整编 11 师，调到鲁西南，与刘、邓野战军作战。这时第五军和整 11 师向定陶前进，整 88 师向金乡前进。刚被我军创伤过的整 55、68 师残部，纠集一起进攻东明。敌人的企图是，先夺取菏泽，将刘、邓主力围逼到微山湖以西，迫使我军背水决战，然后夺取整个鲁西南。

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争取时间休整部队，以利再战。刘、邓决定放弃菏泽，让敌人分兵守备，然后率主力转至巨野休整。敌占菏泽后，于 9 月 28 日，以第五军和整 11 师由定陶、菏泽分路并进，占领巨野的龙固集和章缝集。刘、邓决定以 2 纵阻击敌五军，集中 3、6、7 纵歼敌整 11 师。10 月 3 日夜，巨野战役总攻开始。敌整 11 师曾在新泰地区被我军包围过，幸免被歼。此后变得狡猾起来，不断变换宿营据守位置，难以摸清虚实。我军从当晚战至 4 日黄昏，都扑了空。5 日夜，刘、邓重新部署，以 3、6 纵攻击东西蒋庄敌师部，因大雨未成功；7 纵攻击章缝集敌 11 旅。战斗十分激烈。我 19 旅 1 个团突入敌人阵地，被敌包围，后续部队不能前进。19 旅旅长吴大明，亲临火线指挥部队拼命救援。刘、邓命令 3 纵全力支援。8 旅旅长马忠全，9 旅旅长郑国仲率部从两侧猛攻敌 11 旅。在激烈战斗中，19 旅旅长吴大明不幸身负重伤后牺牲。这是内战爆发以来，刘、邓麾下失去的第一个高级别将领。参加这次战斗的 7 纵 21 旅旅长况玉纯、副旅长程绍祥，以及 3 纵司令陈锡联和马忠全、郑国仲等，闻讯后无不痛惜。他们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早期，从故乡红安一同战斗过来的战友。大家多么希望一起走向胜利，迎接新中国诞生。然而战争是无情的，想不到从抗战以来到解放战争开始，一直战斗在冀鲁豫根据地的吴大明，却长眠在这里。1952 年人民政府专为吴大明烈士修陵墓建纪念亭。将烈士遗骸迁葬于单县湖西革命烈士陵园。刘伯承司令员亲笔题字：人民解放军阵亡旅长吴大明烈士墓。纪念亭两边刻有一副挽联：过草地走雪山披肝沥胆救祖国；战章缝挫强敌碧血丹心为人民。

吴大明有兄弟四个。黄麻起义后，在父母的带动下，都先后参加了革命。他排行老二，同哥哥吴大谋一起在地方工作。老三吴大胜、老四吴大奎参加了红军。吴大明任赤卫队队长。1931 年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吴大明的赤卫队编进了红军。他先在师政治部任宣传干部，后下部队任过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抗战时期，任八路军 115 师冀鲁豫支队第 4 大队大队长、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副司令员，第五军分区 19 团团长。解放战争开始后，先任鲁西南军分区司令员，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7 纵队 19 旅旅

长。当他转战在豫鲁边时，他的两个弟弟大胜和大奎，转战在鲁南。地域相邻，因战争阻隔，三兄弟一直互无音信。全国胜利后，吴大明的战友将他牺牲的消息告诉大胜、大奎。他们才知道哥哥牺牲在巨野，与自己曾经的作战地近在咫尺。大胜和大奎把这个消息一直瞒着，没有告诉家里。20 世纪 50 年代，两兄弟回家探亲。老母亲只见他俩，不见大明，就知道他不在人世了。她老人家不等别人开口就主动地讲："我还以为都回不来哩，能回两个就不错了！革命哪有不死人的。我们这天台山该埋了多少革命战士，他们都是各个地方父母的儿女。"老母亲的开明和革命胸怀，使在场的区乡干部感动得几乎流泪。在红安，像吴老母一样送子参加红军的人家比比皆是，两兄弟、三兄弟、四兄弟齐上战场拼杀的各乡都有。正是广大群众那么踊跃地参军参战，红安才有"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歌谣流传。

吴大明牺牲后，19 旅的广大指战员发誓要为旅长报仇，请求向敌人继续进攻。但狡猾的整 11 师已与整五军靠拢，不易分割歼灭。加之天降大雨，积水成潭，不利战斗，我军便停止了围攻。巨野战役历时 5 天，仅歼敌整 11 师 1 个团，阻击整五军消灭 1 个团两个营，共 5300 多人。我军折一员战将，可谓损失不小。

巨野之战打得不理想，刘、邓决心改变战法：声东击西，避强击弱。为寻战机，刘、邓率野战军二渡黄河北返打圈圈。10 月 27 日，发现被我军创伤过的敌刘汝明部整 68 师 119 旅和整 55 师 29 旅 1 个团，以及附属 1 个炮兵营向鄄城南部地区冒进。机会来了。刘、邓当机立断，挥师三渡黄河南下，发起鄄城战役。29 日晚，陈锡联指挥 3 纵，王近山指挥 6 纵，向鄄南之敌发起突然进攻。敌人驻在多个村庄，我军分头攻击。3 纵的 7、8、9 旅负责攻打石庄和刘家庄。石庄有敌 1 个多团，刘家庄有敌旅部和 1 个多团。9 旅攻石庄，8 旅打刘家庄，7 旅作预备队。8 旅旅长马忠全指挥部队，首先夺取村南有利地形，然后猛烈向村内压去。敌人支持不住，在飞机的掩护下向东南方向逃窜。7 旅将敌人兜住。8 旅赶到将其全歼，活捉了 119 旅旅长刘广信。这时 9 旅也拿下了石庄。6 纵也将 29 旅 1 个团和炮兵营全部歼灭。这次战斗，共歼敌 9100 多人，缴获榴弹炮 8 门，山炮 7 门。敌 119 旅的覆灭，正好应了那句俗话："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鄄城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控制鲁西南的企图。战后，野战军主力四渡黄河北上，在濮阳以东地区休整。

11 月上旬，蒋介石令孙震、刘汝明、王敬久 3 个集团，由鲁西南向冀

鲁豫解放区腹地进犯，企图与邢台之敌会合夺取邯郸，打通平汉路中段，以配合伪国大召开。毛泽东电示刘、邓：用各个击破方法，将孙、刘两集团大部歼灭，使王集团孤立，以转变战局。刘、邓接此指示后，认为刘汝明屡遭我打击，成了惊弓之鸟，且与王敬久靠得很近，不好歼击。只有孙震较为孤立，其战斗力强，有恃无恐，布署分散，便于围歼。决定先打孙集团，消灭其一两个旅，然后视情况再扩大战果。采取的战法是：远程奔袭，出其不意，猛虎掏心。刘、邓将消灭敌人两个旅的任务，下达给 3、6 纵队。3 纵消灭孙部整 47 师 125 旅，6 纵消灭整 41 师 104 旅。

领受任务后，3 纵司令陈锡联和 6 纵司令王近山，边走边商量具体打法。两位同乡加老战友，都是多谋善断的战将，各种战术都很精通，便道出自己的高见。

陈锡联说：“这次战役的关键在于秘密行动，隐蔽接敌，突然打响。我们的驻地距敌人约 200 里，接敌前还有 80 余里敌人纵深地区，只有穿过敌人的结合部，才能到达敌人主阵地前。这就要求部队做到三不——不惊动敌人，不被敌发现，不与小敌纠缠。”说至此，王近山马上接过话：“你的‘三不’提得非常好，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密’字。还要加一个‘突’字，来它个三突然——突然打响，突然进攻，突然掏心。我看就这么办。回去后发动群众，发扬军事民主，可能还会有更好的办法完成任务。让我们在欢呼胜利声中再见！”有人说，战役的指导思想是统帅们作出的，战役的实施是战将们完成的。这话说得对。没有战将们临场发挥，指挥有方，再好的作战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从陈、王的商讨对话中看得出来，大别山里走出来的放牛娃，经过千百次战争的磨炼，已成为我军屈指可数的骁勇善战之将了。

11 月 18 日，在敌人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我军发起滑县战役，经 5 天战斗，到 22 日将驻在滑县以南的孙震集团第 104 旅、保安 12 纵队全部和第 125 旅大部歼灭，共 12000 人。其中敌 125 旅 374 团等 2200 多人突围逃窜，又被打阻击的 2 纵 4 旅副旅长赵鹤亭率部歼灭于黄庄地区。

滑县战役结束后，豫北敌人相对集中，稳步推进，无战机可寻。毛泽东洞悉战机，指示刘、邓：“如果你们面前之敌不好打，似以南下歼敌较为有利。”据此，刘、邓率 4 个纵队五渡黄河南下，大踏步向敌后徐州西北地区前进，威胁徐州与陇海路，调动王敬久集团回援，打破其合攻邯郸的北进计划。我野战军从 12 月 22 日开始，到 1947 年 1 月 16 日结束，发起了巨（野）金（乡）鱼（台）战役，连克聊城、巨野、嘉祥 3 县，歼敌一部，进而围金

乡，出鱼台，歼敌16000多人。打得敌人首尾不能相顾，不得不从豫北抽兵回援，实现了我军打乱敌战略部署之目的。同时有力策应了华东我军作战，保卫了冀鲁豫解放区，又一次粉碎了敌人打通平汉路的美梦。

挺进大别　站稳脚跟

人们常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来形容蠢人做蠢事。蒋介石聪明透顶，却做蠢事。他搬起石头发动内战，本想砸共产党，结果砸到了自己。到1947年2月，内战已进行8个月，蒋军被歼65个旅共71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的。蒋介石捉襟见肘，不得不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

这时的晋冀鲁豫战场该怎么打？毛泽东指出：主动进攻，大量歼敌，收复一切可能收复的失地，以更大的打击回击敌人的重点进攻。同时要积极准备反攻，转入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蒋管区。

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一闪现，刘、邓心领神会，决定野战军主力在东线发起豫北攻势，陈赓、谢富治率领的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西线发起晋南攻势，以配合山东和陕北我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同时为转入外线作战做好准备。

1947年3月22日到5月25日，刘、邓指挥第1、2、3、6、7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共10万人发起豫北战役。经2个多月战斗，共歼敌45000多人，解放了豫北、冀南广大地区，控制平汉路300余里。在这次战役中被称之为啃“硬核桃”的汤阴攻坚战，较为难打。但在6纵司令员王近山的指挥下，将炮兵与坑道兵巧妙结合起来攻坚，同时得到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仅用两天时间，就将敌人认为坚不可摧的汤阴城攻克了，全歼守敌暂编第3纵队15000多人，活捉著名伪军头子、纵队司令孙殿英。豫北之战有力配合了山东我军作战。

4月4日至5月12日，陈、谢指挥第4纵队、太岳军区部队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共8万人。向临汾以南的晋南三角地带发起晋南战役，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的口号下，士气高涨，所向披靡，不到一个半月时间，就收复20座县城，歼敌28000多人，在胡宗南的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策应了陕北我军作战。至此，刘、邓在晋冀鲁豫战场争取了主动，可以向外线出击了。

硝烟伴着岁月逝去，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二年。党中央、毛泽东科学分析

了敌我形势，作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并制订了“两翼钳制、中央突破、三军配合”的战略计划。所谓三军就是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兵团。刘邓大军担任中央突破，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蒋管区；陈、粟和陈、谢大军担任两翼钳制。三军摆成“品”字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经略中原。

为了加强对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域的领导，5月15日，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局，由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等组成，邓小平任书记，郑位三、李先念任副书记，统管中原地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6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3、6纵队组成南征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李先念任副司令员，李达任参谋长，郭天民任副参谋长，执行挺进中原，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南征野战军组成以后，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晋冀鲁豫军区又将下属各军区的部队，统一整编为4个纵队，即太岳军区部队编为第8纵队，太行军区部队编为第9纵队，冀南军区部队编为第10纵队，冀鲁豫军区部队编为第11纵队。另外，将中原突围部队编为第12纵队。既加强区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座谈会结束后部分与会者合影。出席首长：刘敏、胡先祥、郑国仲、吴先恩、吴恒发、贺导海（前排右起一至六）、白水田（后排左二）。文柏山（县委领导），其余为县领导，后排右一作者。

内机动作战能力，又可作南征野战军的后备军。

挺进大别山，打回鄂豫皖。不论军队和地方，当然是熟悉那里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的干部越多越好。因此，中央军委和中原局决定，抽调一些当年从鄂豫皖地区战斗出来的干部参加南征，以便进入大别山后部队展开重建根据地时，充实到军队和地方的各级领导部门。被抽调的干部，党政军各方面都有，其中还有一些高级干部，如郭天民就是。他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初期，一直工作和战斗在晋察冀根据地，是冀察军区司令员兼冀察纵队司令员，担负守卫根据地东南大门的重任。这次因革命需要，同时考虑到他从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以来，一直转战南北，从未回过家乡，便调他担任南征野战军副参谋长。同时将中原突围到华东、华北的原新四军第5师属下的军队和地方干部，也都集中起来，随野战军南下。于是，便有一大批红安籍干部重返鄂豫皖。据不完全统计，县团以上干部达100余人。其中旅以上干部除李先念、郑位三、戴季英、郭天民外，还有1纵新兵第1支队副司令员李天德，2纵卫生部政委梅宏德、4旅副旅长赵鹤亭，3纵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郑国仲、供给部副部长刘必正、卫生部部长兼政委潘阳泰、8旅旅长马忠全，6纵司令员王近山、卫生部长詹少联、18旅政治部副主任李少清，10纵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殷国洪、29旅旅长李定灼、30旅旅长刘福胜、11纵32旅副旅长程绍祥，12纵35旅旅长闵学胜、中原独立旅参谋长吴昌炽等。他们在刘、邓指挥下，分期分批，先后进入大别山或中原地区。

6月30日晚，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预定计划，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又称刘邓大军）第1、2、3、6四个纵队，共13个旅124000人，在鲁西南张秋镇至临濮集300里长的地段上，以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敌人自诩可顶“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我军这一壮举，震惊中外。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也在他撰写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对我军突破黄河防线，感叹不已。他说：“我阅历过多次战争，但都从未见过共产党这次和以后抢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说它高明出色，倒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尽管没有行动一切都是空的，而是在于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美国人惊呼也好，感叹也罢，都是因为事情太出人意料。它从另一方面说明，这次南征主帅刘伯承不但熟悉现代战术，而且深谙中国古代兵法。他把2500年前《孙子兵法》中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计谋，可说是继承和应用

到了极致。

国民党军南京统帅部一阵震惊之后，慌忙就近从河南、安徽、江苏调集3个整编师和1个旅，分两路北上鲁西南堵击我军。敌人分路前进，有利于我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于是刘、邓趁势发起了鲁西南战役。从7月7日起，各纵队分别在郓城、定陶、六营集、羊山集等地，分割围歼敌军。郓城、定陶、六营集很快攻克。唯有羊山集之敌凭高据守，屡攻未克。毛泽东非常关心鲁西南战役和下一步的战略计划，电示刘、邓："羊山之敌如有把握则歼之，否则立即撤出，直出大别山。"刘、邓向羊山集前线指挥陈锡联传达毛主席指示时，问他怎么办？陈锡联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坚决拿下羊山集，保证不误大事。"他与副司令员郑国仲、曾绍山等到各旅再动员，研究战术，调整兵力，决定第7旅和6纵16旅由炮兵团配合，主攻制高点"羊身"，第8旅主攻"羊头"，第9旅主攻"羊尾"和村镇。8旅旅长马忠全，见部队前段未打好，心里发闷，生怕就此撤军"放羊"。现要再打了，他的劲儿上来了，指挥部队勇猛进攻，就把"羊头"啃下来了。接着"羊身"和"羊尾"也都拿下。再攻羊山集的战斗，从27日开始到28日中午结束，全歼守敌整编66师2个旅11000多人，活捉师长宋瑞珂。至此，鲁西南战役历时28天宣告结束，共歼敌4个师部、9个半旅共6万多人。迫使敌人先后从西北、山东、中原等地调动9个整编师22个半旅向鲁西南驰援，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为我军跃进大别山开辟了道路。

鲁西南大捷后，刘、邓想扩大战果，再多歼一些敌人。但据情报得知，蒋介石将借黄河涨水时决堤，使用恶毒的"水淹七军"之计。为鲁西南数百万人民着想，刘、邓不再恋战，经一番周密部署，作出向北佯动的态势，忽于8月7日率南征野战军1、2、3、6纵队，兵分三路南下：一纵在西，直趋豫南；三纵在东，直奔皖西；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率2、6纵居中，直插鄂东。第一批南下的1300多名地方干部随各纵前行。至此，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壮举开始了。

我军多路出动，敌人弄不清真实意图，在判断上接连出现错误：开始认为我军要北渡黄河，结果合围扑空；继又认为是"北渡不成而南窜"，忙又调兵追堵。趁敌人折腾之际，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跨陇海路，越黄泛区，突过沙河，急速南驰。这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知道我军并非"南窜"，而是要进入大别山。急令汇集在鲁西南的23个旅，分为两个梯队，向南尾追，同时派飞机无间日地轰炸。妄图借助汝河、淮河这两道天然屏障，

将我军堵住。

我南征野战军在刘、邓指挥下，以锐不可当之势，开血路，夺要津，于8月24日强渡汝河，27日抢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地区。至此，经过21天的连续急行军，战胜了敌人的多次追堵，克服了一个个自然障碍，终于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任务。

刘、邓率大军从中央突破后，毛泽东令两翼大军出动：8月10日，陈、粟率华东野战军6个纵队10万余人，组成外线兵团，转向鲁西南作战，并向豫皖苏挺进，在东线牵制敌人；8月23日，由第4纵队和组建不久的9纵及三十八军共8万余人组成的陈赓、谢富治兵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在西线牵制敌人。于是，我三路大军经略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开始形成。

我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跃进大别山，到敌人深远后方去作战，其前途如何？毛泽东在南征前曾作了三个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刘、邓向部属传达贯彻毛泽东这个谈话精神时，要求广大指战员，一定要努力争取实现第三种估计站稳脚跟。

大军刚一进入大别山，中原局和野战军总部立即作出决定：趁敌人主力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迅速实施战略展开。要求全体人员，“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注意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一切可能占领的城镇，争取打些小胜仗，肃清土顽，安置后方，为大量歼敌和重建根据地创造条件。

8月底，各纵队按照中原局和总部的部署，向预定地区开进。

9月初，1纵4个旅和6纵16旅进驻罗山以南、光山、经扶（新县）以西地区；与此同时，完成西线牵制任务的中原独立旅，进至武胜关和宣化店之间；2纵3个旅继占领潢川之后，又向南推进到固始、商城一线。上述9个旅部署在大别山北麓，一面阻击和牵制尾追之敌，一面就地铺开摊子，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

3纵经固始直出皖西。8月31日攻克豫皖边重镇叶集。9月初，又连克立煌（金寨）、六安、舒城等县城。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率主力在六安附近作短暂逗留，一边向合肥以西扩展，一边帮群众秋收，借以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副司令员郑国仲与8旅旅长马忠全，率8旅继续乘胜南进，先后又克霍山、岳西、桐城、潜山等县城。9月4日，皖西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刘昌毅和所属第1支队政委何德庆带第1支队，自卫军政委桂林栖带第2支队，

先后来到霍山县城，与3纵8旅会合。郑国仲、马忠全、刘昌毅、何德庆原是战友，又是同乡。他们参加红军后，都编在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一同战斗到长征北上。抗战开始后，又都编入129师，奔赴山西前线。但后来就被派往各个抗日战场了。解放战争开始后，刘、何走到了一起，郑、马也一同战斗。但他们分属两个不同军区，刘、何属中原军区部队，在南；郑、马属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北。一南一北，相隔甚远，已有近10年未见面了。现在，忽然在大别山当年六霍起义之地相见，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刘昌毅的张飞性格一点没变。他上前去拉起郑国仲的手猛握，使郑打了个趔趄，并说："伙计，记得不？在川陕苏区，你当营长，我当营长，红四军练兵比武，我们两个打'抱腰钩'，互相想赢，结果打了个平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这笑声包含了多少友情、乡情和会合后的喜悦之情。一阵寒暄过后，郑国仲和刘昌毅互相介绍了情况，交换了工作意见和今后作战方案。第二天，在霍山城内召开了军民大会。郑国仲代表6纵在会上讲话，热情赞扬了皖西人民自卫军在艰苦困难条件下，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英勇精神。刘昌毅代表皖西军民，热烈欢迎刘邓大军到来，表示一定做好支援和配合工作。会后，8旅在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下，进一步在皖西地区展开。

6纵司令员王近山，因伤留在华北治疗。纵队政委杜义德率17、18旅，于8月底自光山、经扶（新县），兵分两路出鄂东。9月1日，18旅克麻城。



1947年9月4日6纵17旅解放黄安县城

2日，17旅旅长李德生率部进入七里坪，与中原突围后在天台山坚持斗争的徐锡煌、马友才领导的游击队会合。4日，17旅解放黄安城，歼敌黄安县保安团一部。5日，17旅南下黄冈。敌湖北省保安总队一部和黄安县保安团乘机回窜，占领了县城、八里湾等地，但广大农村均已解放。10月3日，完成了战略掩护任务的中原独立旅自经扶南下，在旅长兼政委张才千、参谋长吴昌炽率领下，二克黄安县城，歼守敌保安团600余人，为恢复黄安解放区扫除了障碍。

在中原独立旅进入黄安县境的同时，3日下午，刘、邓率野战军总部自经扶董店南行，傍晚进入黄安大斛山杨李家村。在该村住了一夜，无人知晓。4日下午，经紫云区长冲南行，傍晚时进驻两道桥的李家塝。刘、邓在这里住了一天两夜，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了进入大别山的情况和今后的行动计划。同时作出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设立各级党、政、军机构的决定。6日下午，刘、邓从李家塝出发，经叶枫河南行出境，进入麻城地界。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派放映队到农村放电影。在故事片前面加映新闻短片。有一部新闻纪录片是刘伯承元帅等观看解放军军事表演。李家塝的李老汉，在放映场上喜得跳起来，说："他就是刘伯承呀，1947年在我家住过咧！那时看不出他是大首长，只觉得他对人特别客气。"从此以后，李家塝的人都以刘、邓住过而感到荣幸，总爱津津有味地谈起来。刘、邓率总部住李家塝的情形，在《刘邓大军南征记》一书中还有这样的记叙："这一带是老苏区，群众看到解放军非常亲切。有的老太太知道我军有些领导干部又回到老家的时候，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一面笑容满面，一面却以责备的口吻说：'这多年来，我们受苦受够了，还以为这些孩子把老家的人都忘了呢？'我们大家对这些老人一再表示，这次回来再也不会走了。"

是的，老苏区几乎家家都有人当红军。老人想念在外当红军的儿子，儿子也想念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但在战争年代，这种想念难以实现。即使是现在随大军回来的干部想探亲，也不得不慎重而又秘密地进行。因为环境不允许，局势还不稳定。一旦国民党军反攻过来，家属是要遭打击报复的。所以只有极少数干部与家属见过面，且举两个事例。

3纵司令员陈锡联，在杜义德的帮助下与老母亲见了面。当时6纵政委杜义德率部进驻黄安高桥、桃花一带，得知陈锡联的老母亲还健在。杜义德就与在麻城机动的3纵联系，要他们转告陈锡联司令员，然后就安排他们母子见面。出于安全考虑，杜义德派人去高桥陡山彭家，以走亲戚的名义，将

陈老母接到桃花杨二张家塝侄女婿家中等候。三天后，3 纵指挥部由麻城移驻黄安桃花。杜义德安排陈锡联与纵队副司令员郑国仲、副政委阎红彦一起来到 6 纵司令部驻地碾子塝。再用独轮车将陈母从张家塝接到该塝。四位纵队首长在门前列队迎接。大家有意不让陈锡联上前去，要陈母辨认谁是她的儿子。陈老母来到他们面前，一眼就认出陈锡联。大家高兴得热烈鼓掌，陈锡联的眼眶里还涌出了喜悦的泪花。晚上，陈锡联坐在母亲的床前，听她谈 17 年来经受的苦难与折磨。第二天，送走陈老母时，几位纵队首长都要将自己的津贴送给老人家，陈锡联婉言谢绝，将自己的津贴送给了母亲。然后嘱咐弟弟陈锡礼要照顾好母亲，依然回到亲戚家里再回家去，不要透露母子见面的消息。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这次陈锡联母子见面平平安安，被传为佳话。

野战军副参谋长郭天民想回家却没有回成。郭天民是 1926 年离家投身革命，已有 20 余年未回家，非常渴望见到家里的父母兄弟和父老乡亲。这次他随刘、邓首长来到了两道桥，离家不过 20 多里路，但不能回家，也没派人去家里探望。因为家住黄安城郊，反动派随时会反扑过来。为了家乡和家里亲人的安宁，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过家门而不入。后来，郭天民留在鄂豫军区工作，他的弟弟知道后，以肩挑贩运猪娃为名，到黄安与光山交界的泼皮河去打探，希望能见到哥哥。在泼皮河，他从鄂豫军区的布告上，看到了哥哥郭天民的名字。但他人在哪里，一时无法找到。他怕惹出麻烦，只好见到名字如见面，径自回家了。类似这种情况的还有很多。可以说随大军回来十多位级别较高的红安籍将领，他们都因同一原因而没回家看看。大禹治水三过其门不入，公而忘私，传为佳话。红安籍将领，为了革命离乡别境十几二十几年，过其县乡境内而不回家，也成美谈。

根据中原局和野战军总部的决定，11 月中旬，大别山解放区率先成立了鄂豫区党委、行署和军区，下设 5 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中原局和野战军总部向新设各级机构下派的干部中，有郭天民任鄂豫军区副司令员，张绍基任 1 分区金东县军事指挥长，戴克明任 2 分区副司令员，罗厚福任 3 分区司令员，曾广泰任副司令员，熊心乐任参谋长，汪进先任 4 地委组织部长兼冈麻县委书记，邹国厚任 4 分区司令员，赵鹤亭任副司令员，刘敏任罗田县委书记，黄宏伸任 5 分区副司令员。老人新岗位，他们的职务不但未升，反而有降，有的则由正职变为副职，但他们都乐意服从组织分配。事实证明，在党的培养教育和革命战争锻炼下，红安干部已养成能上能下，能屈能伸，

一心一意干革命的好品德好作风，继续保持和发扬当年闹革命的好传统。

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一直跟在后面追击的敌 20 多个旅也赶来了，从南、北、东三面进行围攻，企图将我军逐出大别山。在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刘、邓采取避实就虚，寻机歼敌的战法。在兵力部署上，以纵队为单位，攻城夺地，肃清土顽，巩固地方，同时互相策应，辗转寻机。10 月初，敌整编 88 师师部率 62 旅，入侵桐城后，侵占舒城，继又孤军西进霍山。这路敌军，在巨金鱼战役中，与我军较量时被 3 纵歼灭了一个多团，因向徐州逃得快，才免覆灭。经过补充和整训，又卷土重来。正好遇上当时的对手，真是冤家路窄。郑国仲和马忠全弄清敌情后，即向总部和纵队部报告，并提出消灭这股敌人的作战计划，请总部和纵队部指示。总部批示同意。但纵队司令员和政委率 7、9 旅转至了商城。陈锡联一面电告郑国仲要他率 8 旅咬住该敌，勿让逃掉；一面冒着大雨连夜回师六、霍。敌 88 师得知是共军 3 纵在此，心有余悸。忙由霍山北上，妄图靠近六安之敌以免被歼。郑国仲和马忠全率 8 旅拼命尾追，刘昌毅也奉命率自卫军进行侧击。但敌人还是进到了距六安 50 多里的张家店。这时如不将敌拦住，就有逃掉的可能。但纵队主要领导尚未赶到。是等，还是当机立断下令围攻？郑国仲与马忠全研究，觉得军情紧急，时不我待。两人商定后，由郑国仲担起指挥责任，同时向纵队司令员和政委报告。



张家店战斗我军阵地一角

10 月 8 日，郑国仲令 8 旅和自卫军向敌两侧形成包围，先行赶到的 9 旅在张家店以北将敌堵住。接着 7 旅的先头部队也到达张家店，抢占了几处制高点，切断敌人北逃和南援的通路。9 日，天刚亮，敌见被围，便以整连整营乃至整团的兵力开始向北突围。我军在来不及构筑掩体工事的情况下，顽强抗击，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凶猛的冲锋，将一头发了疯的野兽关进了笼子。眼看天快黑了，正好发挥我军夜战特长，一举将敌人歼灭。但陈锡联仍未赶到。郑国仲再次与马忠全和已经赶到的 7 旅、8 旅旅长等商量，决定天黑后

发起总攻。郑国仲令各旅的山炮、迫击炮，向敌驻地连续猛轰，迅速摧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和火力配备。接着迫击炮发挥威力，将敌指挥所击中，引起熊熊大火，引起敌营一片混乱。而后，各旅按部署发起猛攻。战斗正在进行时，司令员陈锡联和政委彭涛赶到了指挥所。郑国仲高兴地说："你们来得正好，现在请陈司令指挥。"陈锡联向郑轻轻地挥挥手，说："你指挥打得不错嘛，接着干完。"彭政委也说："老郑呀，不要谦让了。就让我和陈司令来分享一下即将到来的胜利吧！"激战通宵，10 日天明结束战斗。全歼敌 88 师师部和 62 旅，计毙伤敌 900 余人，除敌副师长提前化装逃跑外，俘敌少将副旅长唐家楫以下官兵 4700 多人，缴获山炮 3 门，枪数千支。刘伯承接到战报后评价说："此役是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取得的第一次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消息传来，大振军心民心，对我进一步展开，十分有利。"10 月 12 日，党中央电贺张家店大捷，号召全军指战员，在刘、邓正确领导下，继续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伟大战略任务。

3 纵在皖西奏捷的同时，6 纵在鄂东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连克团风、浠水、广济、英山等城镇，控制长江北岸达 300 余里。跑到庐山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惶恐不安，生怕刘、邓挥师渡江南进，急令江南第 203 师和新 17 旅在军舰配合下，由九江北进黄梅、广济堵截，同时令尾追的第 40 师和第 52 师 82 旅，共 5 个步兵团从黄安、麻城加速追击，妄图将我军压缩到长江北岸的湖沼地带进行围歼。

刘伯承对敌情了如指掌。特别是对从黄、麻一路追来的敌人更了解。因为在平汉线上交过手，敌 40 师受过我军歼灭性打击。这次他们孤军来追，正是求之不得。他形象地说："这可是送上门的一块肥肉啊！我们吃定了。"时值秋末，天气渐冷。广大指战员仍身着夏装。本来，刘、邓率部来到江北，想在这物资较为丰富之地补给冬衣。现战机出现了，刘伯承下定决心，吃掉敌人再穿棉衣。10 月 20 日，刘、邓率总部来到蕲春县北。刘伯承不顾年纪大身体弱，拄着竹棍，翻山越岭观察地形，选择战场。他还饶有兴趣地登上浠、蕲边上海拔千余米的三角山顶，放眼向东南眺望，只见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连连称赞这是能攻易守的好地形。下山后，他又作了更加仔细的察看。最后选择了地形险要、敌人必经的高山铺，作为设伏歼敌的战场。25 日，尾追之敌从浠水出动，进到蕲春漕河，周围之敌无大变化。刘、邓命令分遣在江北的各纵队迅速作向心集结：6 纵从黄冈尾敌前进，堵敌退路；1 纵自广济

回师，在高山铺的北、东、南三面设伏；2纵集结黄梅作预备队；3纵以4个团在蕲北张家榜地区待命，准备参战；中原独立旅诱敌深入。部署完毕，刘、邓移驻高山铺北面的胡凉亭亲自指挥。

独立旅旅长兼政委张才千接受任务回来，参谋长吴昌炽问："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张才千没有回答，反问道："老吴，你小时放牛是牵着放，还是散着放？"吴昌炽说："你问这干什么？"张才千说："你回答我就是了。"吴昌炽说："我们那里田地多，草场少，放牛得牵着，不然就损害庄稼。"张才千又问："牛绳断了怎么办？"吴昌炽说："那就弄把青草去撩它，把它撩拢来抓住牛鼻绳就牵上了。"张才千说："我小时也是这样放牛的。刘、邓首长选我们去'牵牛'算选对了。我们就用撩的办法去将牛牵进来。"说完张才千将诱敌深入的任务对参谋长讲了。接着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进行部署。会后，张才千又与吴昌炽研究，组织侦察队去"牵牛"。吴昌炽负责具体落实，从当地游击队中找来一些"汉阳造""老套筒"等破旧枪支，让侦察队员穿上各色便衣，扛着这些破旧枪，于26日早上在交通要道两旁"恭候"敌人。

敌40师的先头部队于早饭后开过来了。侦察队乱打一阵，掉头就跑。一会换个地方，再打再跑，有意地撩他。敌人以为是游击队，不放在眼里，继续保持几路纵队前进。到中午时分，敌人被撩进了高山铺、清水河一带，钻进了我军马蹄形的包围圈。刘、邓命令1纵开始阻击，6纵从后面攻击，对敌人形成包围。下午又令2纵投入战斗。27日上午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将敌40师和52师82旅切成两段，予以全歼。共毙俘敌12600多人，缴各种火炮70门，长短枪4800多支，击落敌机一架。这次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军民信心，沉重打击了敌人破坏我军立足生根的所谓追歼计划，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后，野战军主力在蕲广地区边休整，边筹集棉花、布料做棉衣。刘、邓带头自制，全军上下自己动手，很快将棉衣问题解决了。

11月初，刘、邓率总部离开蕲北，翻山越岭来到皖西太湖县刘家畈。这里是3纵司令部驻地。陈锡联和皖西人民自卫军刘昌毅等，热烈迎接刘、邓首长。邓小平说，我和伯承同志前来，一是看望在皖西坚持斗争的同志们，二是商量建立皖西区的问题。随后，刘、邓亲切接见了刘昌毅、桂林栖、何德庆等同志。刘伯承赞扬说："刘昌毅同志，你们从鄂西北一路打到皖西，与在这里的桂林栖同志一起，在大别山坚持下来，远离解放区独立作战，是很艰苦很了不起的。我们知道后，在向大别山进军时，将你们战胜困难的事

迹，向部队进行了宣传，号召大家向你们学习。”刘伯承的话，不但对刘昌毅，而且对自卫军是很大的肯定和鼓舞。会见后，召开了3纵党委和皖西工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皖西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刘、邓决定调刘昌毅到3纵与陈锡联搭档，任副司令员，何德庆到3纵7旅任副旅长，皖西人民自卫军番号撤销，编入皖西军区。刘昌毅、何德庆离开正规军一年之后，重又归队了。由于斗争的需要，马忠全被派到皖西的前沿地区——第2军分区任司令员。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战友合而又分了。

鄂豫、皖西两区各级党政军机构的建立，标志着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已站稳了脚跟。

三军际会　逐鹿中原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似一把尖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蒋介石坐卧不安，忙召开“华中六省联防清剿会议”，叫嚷要“集中兵力消灭华中共匪”。1947年11月中旬，从豫皖苏和山东前线调回5个师10个旅，连同原有的9个师23个旅，共14个师33个旅的兵力，与我争夺大别山。蒋令国防部长白崇禧坐镇汉口指挥。11月27日，敌人向大别山展开全面“围剿”。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暂留后方领导整编中原突围部队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李先念，奉命率第10、12（中原突围部队改编）纵队和一批物资、银圆南下增援，12月初到达黄安。这时绕大别山一周的刘、邓也到了黄安。三位领导人率部队进驻华家河地区。他们在西汪家村作出了粉碎敌人“围剿”的重大决策即内外线分兵配合作战，决定成立前、后方指挥所。以刘伯承、张际春为首组成后方指挥所，率1、10、12纵队到外线作战，以邓小平、李先念为首组成前方指挥所，率2、3、6纵队留在大别山，在内线作战。

12月初，1纵在光山一带活动，10纵由礼山（大悟）挺进桐柏山区。12月6日，12纵和中原独立旅集结在华家河一带，在刘、邓、李首长驻地西汪家村的山林里，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将两支部队合并组成江汉军区。刘、邓、李等出席了会议并讲话。这时，数架敌人飞机轮番在上空盘旋。警卫员纷纷请首长们去隐蔽。李副司令员的房东汪遵清也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捏了一把冷汗。刘伯承却风趣地说：“它天天来关照也不怕讨嫌，管它做啥子嘛！”首长们这种不畏艰险的精神，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鼓舞。散

会后天已黄昏，由12000多人组成的江汉军区部队，浩浩荡荡向西开去。刘、邓、李首长频频挥手送行。李先念望着这支由当年新四军第5师为主组成的江汉军区部队，心中依依不舍，伫立好久。入夜，刘、邓、李也动身起程，他们一同行至华河北面握手告别。刘、张率后指北去与1纵会合，邓、李率前指东移。

刘、邓在西汪家村的决策，使大别山以至中原地区的斗争发生重大转折。月余后，刘、张率1纵北出淮西，歼敌5000余人，解放10余座县城，建立了淮西解放区。10纵进入桐柏地区，歼敌13000余人，解放20余座县城，建立了桐柏解放区。江汉军区部队（12纵）进入江汉地区，解放15座县城，歼敌3000余人，建立了江汉解放区。在外线作战的红安籍将领有：10纵29旅旅长李定灼，30旅旅长刘福胜，12纵35旅旅长兼政委闵学胜等，此外还有刘友海、秦振、林恺成、卢焱山等旅团级干部。他们为开辟淮西、桐柏、江汉解放区做出了贡献。有外线作战配合，邓、李在内线反“围剿”斗争中也取得重大胜利，先后收复县城10余座，歼敌11000余人。至此，敌人对大别山的“围剿”遂告失败。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另一支大军——陈、谢兵团。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陈赓、谢富治也是下决心不要后方，8月22日乘风雨大作之夜，率兵团一举渡过黄河，到陇海路南去开辟平汉路与伏牛山之间的广阔根据地。

中原形胜，辐射四方。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现在的中原形势取决于两山一边。两山是大别山和伏牛山，一边是豫皖苏。大别山刘、邓已进去站住了脚。伏牛山陈、谢率部进去将怎样做文章？

陈赓，黄埔军校高才生，文韬武略，军旅生涯富于传奇。谢富治，木匠出身，经长期革命战争锻炼，也是军政兼备。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工农干部，搭档领军，配合默契。他们这个兵团由4纵、9纵和三十八军等部组成，共8万余人。越过陇海路后，陈、谢让9纵司令员秦基伟率部留下牵制敌人，主力旋即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地区展开攻击。经半个多月作战，解放了陕县、灵宝、洛宁、宜阳、卢氏等8座县城，直逼潼关，威胁西安。此时，敌人集中15个旅，从东西两面向伏牛山对进，妄图合击我军。陈、谢采取“牵牛”战术，派出两个旅去“牵牛”。其中有以陈康为旅长、黎锡福为副旅长的13旅，是4纵的主力军，陈康和黎锡福是陈赓的爱将，由他们指挥一个旅，伪装成我军主力部队，向伏牛山西峡口挺进。敌以为我军要去南阳，即以整编第3师放胆西追，落入陈、谢设下的圈套，结果该敌被拖



陈赓、谢富治兵团向伏牛山区挺进

垮。当敌人被牵西去时，陈、谢率主力在伏牛山东麓，放手歼灭地方反动武装，大力开展地方工作。到 11 月底，陈、谢兵团共歼敌 5 万多人，建立了 39 个县的民主政权，开辟了豫陕鄂根据地，成立了豫陕鄂军区，下辖 8 个军分区，完成了战略展开。从陈、谢兵团挺进豫西的战斗过程中可以看出，谢富治配合陈赓指挥大军，一路奏捷；秦基伟率部牵制敌人，独当一面；黎锡福参与指挥“牵牛”进伏牛山，将敌人这头肥牛拖瘦拖垮，这三位红安籍将领是各显其能了。

大别山和伏牛山掌控在我军手中之后，再看豫皖苏边。华东野战军在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将全军分成内线和外线两个集团，内线兵团（又称东兵团）留山东境内作战，外线兵团（又称西兵团）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配合刘邓大军。9 月 9 日，陈毅、粟裕率华野 1、3、4、6、8、10 纵队，在菏泽沙土集歼敌整编 57 师近万人，吸引敌人从山东和大别山区抽调 4 个整编师来援，减轻了大别山及山东战场我军的压力。陈、粟在战后不与敌人纠缠，率西兵团分 5 路越过陇海路，南下豫皖苏地区，以纵队为单位展开。到 10 月下旬，攻克县城 24 座，歼敌 1 万多人。11 月又发起陇海路破击战，破坏铁路 400 余里，歼敌 11000 多人，迫使敌人调 15 个旅救援，其中包括准备用于大别山的 8 个旅。至此，经过两个

多月的作战，陈、粟大军解放了豫皖苏广大地区，建立了各级政权，完成了战略展开。豫皖苏边也控制在我军手中。

征战两山一边，形成了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壮举。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周恩来，在陕北小河村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讲话时，用形象而又风趣的语言赞扬说："刘邓大军直插大别山，朝蒋介石的胸膛扎上一刀！陈赓、谢富治大军，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再扎他一刀！陈毅、粟裕大军，挺进豫东，再扎他一刀！这三路大军，在战略上就布成了'品'字阵势，互为犄角，协力配合，在南起长江，北至黄河，西从汉水，东到黄海的中原大地上，向敌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周恩来的精辟概括，就是我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形势。我三路大军，在江海河汉之间，纵横驰骋，苦战半年，取得了很大战绩：共歼敌近 28 万人，解放了拥有 2500 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使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及江汉、桐柏地区连成一片，形成了新的中原解放区。

形势大好，仍不容乐观。敌人在中原的兵力还有 34 个整编师 54 万人，占国民党军作战部队的三分之一，主要集结在津浦、陇海、平汉铁路沿线，灵活机动，妄图将我三路大军包围在中原逐个消灭。对中原敌军新的战略攻势，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主力调出，与陈、粟大军和陈、谢大军一起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948 年 2 月 24 日，邓小平、李先念率前指和 2 纵出大别山，北上安徽临泉县，与刘伯承、张际春率领的后指和 1 纵会合，接着又与陈、粟大军会合。为掩护大别山第 3、6 纵队继续调出，刘伯承提出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法，挥师西进，攻打洛阳，以调动敌人。3 月 9 日，由陈、粟率领的 3、8 纵和陈、谢率领的 4、9 纵共同发起洛阳战役，14 日攻克，歼守敌青年军第 206 师近 2 万人。当我军围攻洛阳时，敌人纷纷出动增援。待敌援兵赶到洛阳，我军撤出，而大别山的 3、6 纵则趁势出淮北转至豫西与陈、谢大军会合。至此，我中原三路大军实现了大会师。4 月初，敌援洛部队相继调走，洛阳城内兵力空虚。陈、谢即指挥 4、9 纵队二次攻洛。以秦基伟为司令员的第 9 纵队担任主攻。不及一日，就将守敌整编 47 师一部近 5000 人全歼。此后洛阳一直被我军控制。

4 月中旬，刘邓大军进入豫西叶县休整补充部队，准备打大仗。这时，党中央为加强中原战场的领导，决定重建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为政

委、邓子恢、张际春为副政委，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7个军区，南征的刘邓大军、陈、谢大军统一改称中原野战军，下辖第1、2、3、4、6、9、11纵队和三十八军；同时，中央决定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第1、3、4、6、8、两广、特种兵7个纵队，加入中原战场。中原军区的重建和华东野战军主力参战，标志着中原逐鹿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解放战争中最为壮观的一幕。

且说刘伯承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法，挥师发起洛阳战役，果使中原敌军调动频繁，处处被动，其战略部署全被打乱。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及时指示刘、邓：下一步作战行动是在豫西南歼灭分散之敌。刘、邓乃于1948年5月初至6月初先后发起了宛西、宛东战役。南阳古名宛城。宛西、宛东皆南阳地区。参加这两次战役的，有中原野战军第1、2、3、4、6、9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3、8、10纵队以及陕南、桐柏军区部队，统由刘、邓指挥。

宛西战役是5月2日至12日进行的。刘、邓将参战部队组成两个集团；以中野3、6、9纵和华野3、8纵为一个集团，负责牵敌和打援；以中野2、4纵和华野10纵及桐柏、陕南军区部队为一个集团，由陈赓、谢富治指挥担任主攻，采取“突然奔袭，出敌不意，严密下网，防其逃脱”的方法，横扫宛西之敌，连克南阳地区的邓县、镇平、内乡、淅川、西峡和鄂西北之光化、老河口等10座县城，歼敌正规军和保安团21700余人，彻底摧毁了敌人在豫西南的统治，使豫鄂陕解放区得到了巩固。此后，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以此为后方。

半月后，刘、邓用围点打援战术，于5月25日至6月3日又进行了宛东战役。由陈锡联指挥1、3、6纵为东集团，佯攻平汉线上的确山，吸引南阳驻敌张轸兵团来援。以陈、谢指挥2、4纵和华野10纵及桐柏军区部队切断援敌后路。然后我东西集团对进，合歼张轸兵团。战斗打响后，张轸见势不妙，拼命逃窜，只歼其一部共12200余人。

两次战役，都是中原和华东野战军联合作战，使在这两支野战军中的红安籍将领，如华野的王建安、张仁初、陈美藻、贺健和中野的陈锡联、郑国仲、刘昌毅、何德庆、王近山、谢富治、秦基伟、黎锡福、刘福胜、李定灼等得以相会在豫西南战场。他们中有的自抗战以来从未晤面。如果不是中原逐鹿，是不会走到一个战场上来的。

中原逐鹿，毛泽东尤为关注。他原打算把战争再向蒋管区域延伸，派粟

裕率部渡江南下作战。经粟裕面呈利弊后，毛泽东觉得粟裕的意见是对的，决定不去江南了，仍留在中原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于是，华东野战军在粟裕指挥下，于6月中旬发起豫东战役，斩获颇丰，有关战役经过前面已叙。这里要讲的是在这次战役中间发生的颇为有趣的襄樊战役。豫东战役开始后中原野战军除将参加豫西南作战的第3、8、10纵队归还华野外，又将自己的第9、11纵队交华野指挥。另以第1、2、3、4、7、8纵队投入打击敌胡琏等4个兵团的援军。唯独让第6纵队留在驻地不动。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怎么也坐不住，又是书面报告，又是电话请示，要求参加战斗。刘伯承老是回复四个字：好好休息。无令不能行，王近山只有待着。

当豫东战役第一阶段攻打开封胜利结束后，我军迅速移兵向东，在睢（县）杞（县）地区包围了敌区寿年兵团。敌华中“剿总”白崇禧急调驻南阳整编20师东进增援。于是，老河口、谷城、樊城、襄阳一线之敌处于孤立态势。多谋善断的刘伯承，早料到了这一着棋。机不可失。他令6纵和桐柏、陕南军区部队，以日行150里的速度前进，突然包围上述地区的敌人，发起襄樊战役。

襄樊地区守敌，是国民党第15绥靖区的部队。特务头子康泽任绥靖区司令长官，辖有3个旅共2万余人。战斗从7月2日打响，第一阶段扫除老河口、谷城、樊城之敌一个旅，较为顺利。7日转入攻襄阳城。襄阳依山傍水，地形险要。欲夺襄阳，必先夺取城南的羊祜山、虎头山、十字架山。这些制高点，敌人筑有大量坚固工事。开始，我军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指挥进攻，屡屡受挫，伤亡较大。他向刘伯承建议撤兵。刘伯承当机立断，改派王近山指挥继续进攻。王近山深知首长的信任和肩上的重任非同一般，在冷静分析战场形势之后，断然改变主攻方向，将攻山改为攻关，选择兵家认为不能选择的西关作为突破口（因为西关是在敌人制高点火力掩护下不好进攻）。然后集中优势兵力，用猛虎掏心战术，一举破城而入，全歼守敌2个旅，活捉了康泽。刘司令员高兴地夸奖道：“这个王近山，真是好样的！”这次战役共歼敌21000人。朱总司令闻讯，称赞襄樊战役为“小的模范战役”。

在攻破襄阳城时，各参战部队都想抓到特务头子康泽。为此，发生了不该发生的冲突。6纵将陕南军区12旅一位指导员击成重伤，奄奄一息。6纵卫生部部长詹少联，凭着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医术，紧急抢救5个多小时，将这位肠壁断裂多处的重伤员，从死亡线上救活了，康复后又礼送到12旅，

让他归队。詹少联用爱心和巧手消除了 6 纵与 12 旅之间的隔阂和怨恨，维系了两支部队的友谊，在军中传为佳话。

中原逐鹿急，大别又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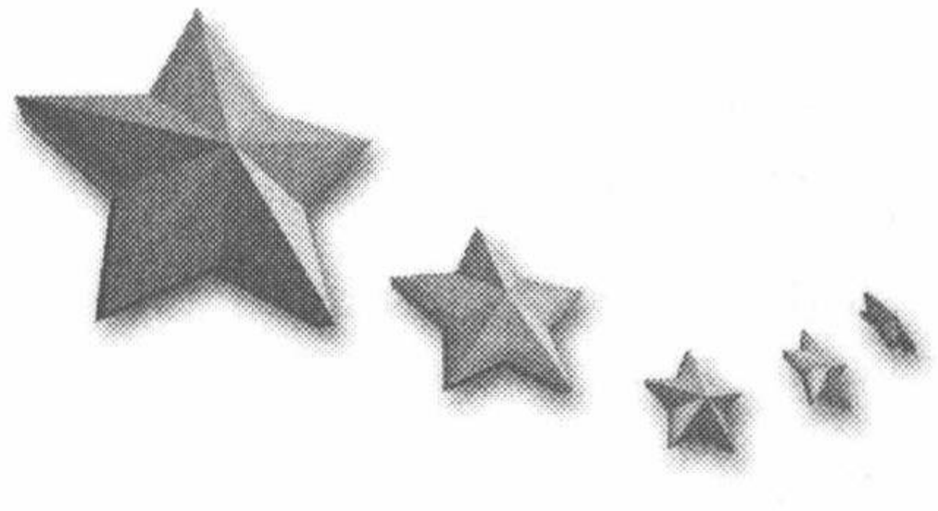
自 1948 年 3 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敌华中“剿总”白崇禧，组织 20 多个旅进行残酷的“清剿”，妄图一举占领大别山。留在大别山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鄂豫和皖西军区，各自只有教导旅（独立旅）和所属各分区基干团及县区游击队，总兵力不过 10 多个团。敌我力量悬殊，局势对我军非常不利。但解放区广大军民，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他们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与敌人周旋，坚持斗争。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红安籍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

鄂豫军区副司令员郭天民，看到有些县、区武装在“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口号下，被敌人逐个消灭，很是难过。在未征得区党委和军区同意改变这个口号之前，他一面让一些县、区武装，随他率领的军区教导旅一起行动，以减少损失；一面向区党委和军区提出集中县、区武装，在县际间打游击的建议。这样不但不被敌人消灭，而且可以消灭敌人。他的意见被采纳后，斗争便由被动变为主动。4 月 11 日，4 军分区司令员邹国厚率分区基干团和联县武装突袭敌人据点，歼敌黄冈保安团一个大队 400 余人。5 月初，5 军分区副司令员黄宏伸，率分区基干团一部和联县武装插入敌后，扫除敌乡保武装，恢复了蕲春北面的地方工作。3 军分区司令员罗厚福、副司令员曾广泰，率分区基干团和黄安、礼山（大悟）联县武装，于 10 月初在禹王城歼敌正规军一个机炮营大部和礼山县大队共 900 余人，缴获各种炮 11 门，轻重机枪 32 挺，步枪 700 余支，子弹 4 万余发。经过这次战斗，敌人再不敢贸然窜犯黄（安）礼（山）经（扶）边地区，使鄂豫区党政军机关有了一个稳固的后方。与此同时，皖西军区亦广泛发起小型战斗，寻歼小股弱敌。积小胜为大胜。到 10 月底止，鄂豫、皖西两军区部队，在各自所在地区配合中原逐鹿，共歼敌 7000 余人。在艰苦环境中取得如此战绩是很不容易的。

在地方工作中，红安籍干部敢于抵制和纠正一些错误倾向。在刘邓大军实施战略展开时，为了发动群众而进行的土地改革，外来干部不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盲目搬用华北经验，搞“急性土改”“搬石头”，不按政策划阶级成分和滥杀人，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脱离群众。黄安七里区杨山乡老党员、贫农团团长杨先文，利用到晏家河开会的机会，向军区副司令员郭

天民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郭天民便在3分区召开的军队和地方干部会上，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说："我们这里是老苏区，过去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人太多了。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又擅开杀戒，杀了不该杀的人。这怎么行呢？从今以后，你们谁再滥用权力杀人，我就杀谁的头！"但是，郭天民的告诫并未完全制止错误行为。12月，中原军区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部回来了，住在大斛山北麓的秦家塝。他的老部下黄安县民主政府县长徐锡煌、军事部长马友才前去看望。在汇报工作时，他们向李副司令员汇报了乱打滥杀问题。李先念在详细了解情况后，答应向刘、邓反映并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很快纠正了这一错误倾向，并向受害者的家属进行了抚恤。纠正地方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对巩固大别山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再看中原战场。我三路大军主力及时从两山一边抽出，会合一起，驰骋中原，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尤其是7月至9月西破襄樊，东克济南的重大胜利，使蒋介石惊恐不已，急令驻郑州的孙元良兵团东进，加强徐州、蚌埠地区的兵力，以保南京。毛泽东即电刘、邓、陈：立即攻郑州，拖住孙元良，勿使东进。于是，中原野战军于10月21日至24日发起郑州战役。1、3、4、9纵攻城，其余部队打援。9纵司令秦基伟根据敌情和地形等方面条件分析，如果守敌不支而逃，很可能把出路选在位于郑州西北的黄河铁桥方向，这正好是9纵的战区。他当机立断，做好两手准备：攻城和"张网捕鱼"。果不出所料，10月21日夜总攻开始，敌如惊弓之鸟不敢固守，于22日晨仓皇夺路向西北方向逃窜，正好钻进9纵埋伏圈。经10小时激战，将敌四十、九十九军各1个师共11000多人全歼，郑州遂告解放。开封守敌闻讯弃城东逃。24日我军解放开封。至此，中原野战军主力已能机动用于东线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随时可从山东南下。早已谋略在胸的毛泽东，他要中原、华东野战军结束中原逐鹿，做好打大战的准备。这场大战将是淮海战役。



第十二章　夺取东北奋争先

抢占先机，红安有30多位将领从各地奔赴东北，程儒珍第一个进去。天寒地冻，周纯全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为部队解决棉衣。胡奇才首歼敌一整编师，一着棋带活全盘，东北我军由冰点升到热点。韩先楚力排异议飞兵威远堡猛虎掏敌心获“旋风将军”美称。敌“王牌军”军长用士兵尸体当掩体作困兽斗。“擒贼先擒王”韩先楚抓住这个丧尽天良的陈林达。第四次打四平“一石二鸟”脸不带笑色的林彪露出了笑容。

抢占先机　立马关外

东北，莫看地处边陲，在形势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首先占领东北。苏联对日宣战出兵，第一脚踏进东北。战后，国共两党一直盯着东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抢占东北，是想消灭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产党要控制东北，是想利用周边有利的国际环境及幅员广阔、物资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又与华北解放区相连的有利条件，以图更大的发展。

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预想在打败日本侵略军之后，将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东北去，建立巩固的基础，为国共继续合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谈话中，又多次提到：今后的问题，要想得到有利条件，就得准备20~30个旅，15万~20万人脱离军区，开到东北去。6月10日，代表大会举行选举之前，毛泽东作简短讲话，再次提出东北问题。他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审时度势，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将战后争取东北的战略构想，提到全党的议事日程上来，无疑是富有远见和及时的。为日本投降后，我军抢占先机，进入东北，做好了思想准备。

到了8月，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

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9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召号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

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发出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迅速向日伪军开展全面大反攻，接受日军投降。并命令冀热辽边区的八路军，迅速深入东北，配合苏军作战。

8月11日，蒋介石下达三道命令：一是要八路军、新四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八路军、新四军受降。

8月12日，美国的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在中国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

8月13日，朱德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错误命令。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同日，蒋介石致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之后，又于20、23日一再电邀。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10天中发生这么多重大事情，都直接影响到东北的地位，使东北的形势变得云谲波诡，而且有些不可思议。比如说，当配合过苏军作战的我军，佩戴着八路军臂章出现在沈阳时，苏军加以干涉，不许他们上街。理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在苏联向中国政府移交东北之前，不允许其他部队出现。但允许原东北地方抗日武装存在。就是说，苏军解放东北后，我军要进去是有一定限制的。

再说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和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是为了限制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东北。能不能限制住，他自己也打了问号。所以，就来个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玩弄和平阴谋，拖延时间，以便从大西南调兵，向华北、东北进军。如果说写在纸上的命令和条约是虚的，那么面对面的谈判就是实的了。蒋介石虚实并举，妄图捆住毛泽东的手脚。他还估计，毛泽东不会、甚至不敢来重庆谈判。如果是那样，他还可以把破坏国内和平的罪责推到共产党的身上。

但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毛泽东说服全党，以惊人的胆略和气魄同周恩来等人一起飞抵重庆，同蒋介石进行了43天的谈判，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于10月10日签订了

《双十协定》。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对党政军工作都作了周到的安排。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对军队的部署，他向朱德作了交代。临行前，毛泽东还对朱德说："总司令啊，东北万万不能落在蒋介石的手中！"朱德握着毛泽东的手说："主席，你就放心吧！"

刘少奇不负重托。他根据迅速发展的全国形势，及时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使毛泽东的东北战略思想更加明确具体。

根据这一方针，抢占先机，进军东北，已成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在毛泽东未去重庆前，部队已有小动，现在是大动了。尽管东北形势变化多端，我军扬其有利一面，避开不利一面，多途并进，抢时间、争速度，向东北挺进。于是，出现了我党建军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首先是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晋绥等军区的部队和延安的干部，陆续调进东北；其次是华中的新四军调进山东；第三是长江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调到长江以北。

在这次大调动中，范围最广、数量最多是到东北去的部队。涉及的地区除延安外，还有五个大军区。

最早动身进入东北的，是晋察冀军区所属冀热辽军区的部队。随后中央军委通知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

冀热辽军区地处河北、热河（当时是热河省）、辽宁3省边界地区，与东北最贴近，所辖热河、辽宁部分地方原属东北。李运昌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詹才芳任副司令员。8月12日，他们接到上级命令后，在河北丰润县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以李、詹为首的"东北工作委员会"。接着，在该委员会领导下，先后有8个团、2个支队，共13000多人和2000名地方干部，准备分西、中、东3路悄悄开进东北。其中东路部队由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带领，他们参加了配合苏军解放山海关等地的战斗。时任军分区供给部长的程儒珍，为部队出关北上，一路忙得不可开交。他是红安籍将领进入东北最早的一位。曾克林率部继续向沈阳、本溪前进。经过一番周折，才与苏军司令部接上头。按照苏军的要求，部队改称东北地方武装，这才落下脚来。这支部队进去后，了解了许多情况。曾克林还陪苏军代表飞抵延安，会晤了中共领导人，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依据。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就在这时成立。由4名政治局委员、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率领的大批干部到东北也从这时开始。

曾克林率部进入东北之后，中央军委鉴于冀热辽地区是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以仍属晋察冀军区领导为好，故于11月底又将其调归。因此冀热辽军区的西、中两路人马就未出动。1947年4月，军委再次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在这里工作的红安籍干部除詹才芳、程儒珍外，还有热西军分区参谋长张天恕、二十一军分区副司令员陈炎清，团级干部郑维家、郑炳礼、郑强等，便投入了东北的战斗。

紧接着是山东军区的部队。也是8月中旬，山东军区先派出一支小部队，从海上进入大连等地了解情况后，接着由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率先遣部队，于9月初渡海到沈阳，做好接待大部队的准备工作。9月下旬，山东军区机关及所属第1、2、3、5、6、7师，共5万人，在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率领下，以师为单位，分别渡海北上，只有第3师走陆路，先后于10月底和11月初到达辽东。山东军区部队中红安籍干部有：渤海区行署主任周纯全、第3师副师长胡奇才、第7师政治部主任徐斌洲、第5师供给部长涂其友、鲁南军区3分区副司令员石世良，团级干部毛普安、钟光国、张鸣夫、祝顺鹏等。

9月25日，华中军区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接到上级调动命令后立即部署：主力部队先行，师直属机关单位作后梯队跟进。3师所属部队有第7、8、10、独立等4个旅和特务第1、2、3团，共35000人。这些部队分别驻在苏北的淮安、阜宁等地。其中独立旅完成南下皖江支援7师的任



新四军第3师第8旅在旅长张天云率领下奋勇向东北进军。

务后，刚返回泗阳县里红集，顾不得休整就要出发。黄克诚要求各部立即做好准备，于28日出动北上。他们从苏北进入鲁南。这时，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从延安回到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陈毅接见了3师连以上干部，并作了形势报告。在讲东北问题时，陈毅风趣地说："同志们晓得不？东北可是个好地方哟！有啥子呢？有重工业，有兵工厂，有丰富的矿藏，还有大豆、高粱、玉米三件宝哩！之所以嘛，蒋介石就要抢喽！抢，是不行的，人民不答应，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不答应。最近党中央提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要争取东北，抢进东北。这就叫针锋相对！同志们，抗日战争是胜利了，天下是不是就太平了呢？不是的。蒋介石表面上在和谈，骨子里是要打内战，使中国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你们要打破和平幻想，立足于打。打，也是为了和平嘛！日前形势紧迫，蒋介石正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调兵遣将，阴谋夺占东北。你们3师肩负着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责任重大，不得有误。希望你们轻装兼程，立马关外，在东北一展我们新四军的军威！"

军长的报告传达以后，广大指战员极受鼓舞。程启文回忆说："由于时间紧，部队出发前来不及进行深入动员，大家的思想认识没有统一，情绪不高，有点烟不出，火不冒的味道。主要是和平思想作怪，认为抗战胜利了，该好好歇歇。军长的报告打破了大家的和平幻想，拨通了思想，烟出了，火冒了，情绪也高涨起来了。后来连续行军几千里，长达一个多月，就很顺利。"

10月16日，3师告别军部，从临沂挥师北进，出山东进河北，走霸县到丰润，原计划从山海关进入辽宁。11月6日，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用军舰抢运第十三军和52军，先后在秦皇岛登陆。15日，在蒋介石刚任命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下，进攻山海关。我冀热辽军区部队坚决抗击。因敌众我寡，16日撤出山海关。国民党军便控制了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3师便改变行军路线，从迁安到建昌营，于11月15日从冷口出关进入辽宁建昌，与沿北宁线向北进攻的国民党军不断发生战斗，然后进入阜新以西。

至此，3师主力历时近50天，行程3000里，终于踏进了东北大地。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最远的一次调动。后来毛泽东谈到此事时，称之为"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参加这次长征的红安籍干部有：3师直属政治处主任张志勇、8旅旅长张天云、独立旅3团团长张竭诚、来（安）

六（合）支司令员程启文、旅供给部部长汪浩、3 师卫生队长李其华、团政治处主任江腾蛟等。

3 师主力部队出发后，后梯队于 10 月初从师部驻地阜宁开拔。后梯队由师直的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及医院等单位工作人员和家属，从地方抽调的县以上干部，还有物资运输队一起组成，由阜宁独立团护卫，共 2500 多人。师部指定由师直政治处主任张志勇、供给部副部长翁绪文等三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指挥行动。行前，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向张志勇、翁绪文等转达黄克诚师长的意见：后梯队很重要，沿途行军要小心，要保证安全到达目的地。张、翁明白责任重大，一路上起早摸黑，督促检查，让后梯队平稳地走过每一天。进入河北后，得知山海关失守。为了后梯队安全出关，张志勇去冀鲁豫军区请求帮助，第 1 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同意派部队护送。后梯队绕道热河，于 11 月底进入辽西，与主力部队会合。后梯队实际上是师部的搬家队，尽管经过轻装减从，但必要的东西不能不带，还是繁重复杂。在局势多变的情况下，张志勇等人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师首长的表扬。

自 9 月 18 日党中央派彭真、陈云等到东北后，紧接着又从中直机关和八路军总部，抽调 2 万名干部分批赶赴东北。同时将抗日军政大学总部和延安炮兵学校等迁往东北。在这一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红安籍的有中央组织部直属处处长袁克服、中央党校学员卢燕秋、抗日军政大学直属政治处主任徐洪才、第 1 大队大队长韩先楚、第 3 大队大队长徐绍华、第 3 大队政治部主任涂锡道、第 4 大队大队长吴恒富、八路军总政治部交际处处长吴基荣及其妻子朱映明、总后勤部兵站部处长程启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熊友刚、政治部总务处生产主任聂洪国、385 旅卫生部长秦光运等。

吴基荣原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团长。他作战英勇，长征途中身负重伤，被送进医院。他的妻子朱映明是这个医院洗衣班班长。经过医生治疗和妻子的照料，吴基荣到达陕北后伤渐好了，但足部落下了残疾。组织上先让他上抗大，后又进中央党校。通过学习，他的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有很大提高。毕业后，总政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分配他到八路军总部招待所当管理科长。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不少国内外友人到延安参观访问。总部招待所改为交际处，吴基荣任交际处处长。他把交际处管理得有条有理，多次受到周恩来的表扬。但是，在沙场厮杀惯了的人，心里一直向往战场。他多次向领导提

出要上前线，均未获准。这次抽调大批干部去东北，吴基荣觉得机会来了。开始动员他就报了名，可是迟迟不见通知。他去问分管的负责人。负责人回答说，我不能当家，你去问胡部长。他去问胡部长。胡耀邦说："交际处是周副主席亲自过问的单位，我不能随便放你走。"没办法，吴基荣硬着头皮去向周副主席当面报告。他说："抗战八年我未上战场，这回该轮到我了，请周副主席批准我去吧，不然我会憋死的。"说得可怜巴巴的。周恩来说："好个吴基荣，你怎么也学会了软磨硬泡，好吧，我跟你的领导打个招呼，让你去东北。"吴基荣恭恭敬敬地向周恩来敬了个军礼，说："谢谢周副主席！"就这样，在彭真等人去后不久，吴基荣他们那一批就赶赴东北了。吴基荣到达后，李富春把他留下做后勤，虽不在一线，但属战斗部队。他实现了愿望很高兴，马上给妻子写信，要她也来东北。这时朱映明在中央党校做财会工作。她是长征结束后住党校时留下来的。朱映明向领导申请获得批准，便随大批干部一起踏进了黑土地。从此，与丈夫一起从北国战斗到江南。

在上述大批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的同时，还有晋冀鲁豫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和八路军南下第 2 支队。中央军委先是通知晋冀鲁豫军区派 1 个纵队到东北去。军区马上组成了以谢富治为司令员的第 4 纵队，整装待发。这时，国民党军队不但抢占东北，还在美国帮助下，用飞机运部队抢占华北。有鉴于此，中央军委只调了冀鲁豫军区 1 个多团，于 10 月下旬进入沈阳以西地区。八路军南下第 2 支队，于 1945 年 5 月从陕甘宁出发南下，拟去江南。行军途中，抗战胜利了，便停止前进。后奉命挺进东北，于 10 月底到达本溪、抚顺地区。这两支部队共约 5000 人。

此外，地处长江北岸的中原军区，虽未调部队，但有一批干部相继进入东北。其中红安籍的有：中原野战军第 2 纵队 13 旅 38 团政委魏正兴、河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曾传六、河南军区保卫科科长江汉东等。他们于 1946 年春到达辽东。

以上各大军区调到东北的部队，共有 11 万多人。为了统一指挥，11 月 4 日，以东北地方军的名义，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所属部队，暂时保留原来的建制，只有少部分改编或扩编。如八路军南下第 2 支队仍编为 359 旅，冀鲁豫军区 1 个多团扩编为第 25 旅。另外增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周保中部，共 23 个保安团。新设置 12 个军区，以便实行战略展开。

血染雪红　艰苦抗争

我军进入东北后，国民党军也在抢进。

11 月 16 日，国民党第 13、第 52 军攻占山海关，接着沿北宁路向北猛进，先后又占我绥中、兴城、锦西等地。26 日我军撤出锦州。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准备将中国长春铁路（中长路）沿线大城市，交中国军队接管。要不要去争取接管？出于我军刚到东北，主力尚未集中，即使接管了也难控制住大城市的原因考虑，决定暂时不去接管。因此，党中央于 11 月下旬指示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要我军从大城市及主要铁路沿线退出，去占领中长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当时有人思想不通，认为不该让出大城市。毛泽东怕误大事，12 月 28 日亲自起草，给东北局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强调把东北的工作重心，一定要放到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及广大乡村方面，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以便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在这个正确方针指引下，东北的局面就一步步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

根据上述指示，东北局将军队和地方工作重新部署，强调进驻东满、北满、西满和边远地区。当时这些地方是“七无”区，即无党的组织、无政权机构、无群众组织、无后方、无粮食、无医药、无衣服鞋帽，有的部队还缺少枪支弹药，不论是军队和地方干部到这些地方去都是困难重重。如新四军第 3 师黄克诚部 3 万多人，出发前上级要求他们轻装，甚至说不好的枪也不要带，到东北去有的是。结果来了以后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呢？看看伍修权的回忆就知道。他说:

“1945 年 9 月中旬，我随彭真、陈云等同志到了东北，是延安去得最早的一批干部。彭真同志作为东北局书记，与苏军驻沈阳的城防司令谈判，我做翻译，最后达成了协议。沈阳有一个武器仓库，存有十万多支枪，苏军同意交给我们装备部队。到 11 月底，各根据地调到东北的部队已达 11 万多人。加上我们收编一些地方武装，部队迅速扩大，装备成为一个大问题。新扩编的部队，从受降和剿匪所得到的武器中解决了。而从各根据地调来的部队，不仅武器装备差，有些部队干脆是徒手来的。像黄克诚同志的新四军第三师，就是这样。当黄克诚同志向东北局致电要武器装备时，

我们按照协议去苏军那里接收，他们变卦不给了，使我军陷于缺乏武器装备的状况。苏联人开国际玩笑，能把他们怎么样？只有算了。至于给养问题，部队进入宽阔无边、人烟稀少的东北农村和小城镇，更成了问题。还是拿三师来说，自进入东北后，这样的电报向东北局，直至向中央军委不知发过多少次，最终还是靠各部队自己解决。”

在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时，红安籍干部做了大量工作。担任辽南行署主任的周纯全，主动肩负起后勤工作的繁重任务。北国的冬天来得早，部队急需棉衣。经费困难怎么办？周纯全毫不含糊地表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解决。他将行署机关可以变卖的东西，拿到苏联军队控制的大连市卖掉，从大连搞到冬装送到部队。根据地缩小后，粮食供应和兵源补充都发生困难，他千方百计筹集粮草，动员群众参军，有力地支援前线作战，还妥善安置大批伤员和部队家属。调到 2 纵后勤部任政委的张志勇，饿得两眼昏花，将山上采集到的榆树叶子掺点玉米面，熬成大锅粥让给战士吃。3 师第 8 旅旅长张天云为建立根据地，到各地发动群众，消灭匪患，组织地方武装；同时关注军事斗争形势，捕捉有利时机，就狠狠给敌人一个打击，发展一下自己。这都说明我军初进东北时的艰辛。

1946 年 1 月中旬，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下辖 5 个纵队又 3 个师。根据新的形势，在已有的 12 个军区的基础上，成立了吉黑（北满）、热辽（西满）、辽东（南满）和吉辽（东满）4 个带战略性军区，加强对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的领导，以便协同作战。各地调去的部队也有所调整，干部大都分到军队和地方任职。胡奇才、韩先楚任南满军区第 4 纵队副司令员、祝顺鹏任南满军区安东第 2 分区司令员、魏正兴任安东第 4 分区副司令员，徐绍华任东满军区警备 1 旅副旅长、袁克服任警备 2 旅政委、吴恒富任警备 2 旅副旅长兼参谋长、程启文任东满军区松江第 2 分区副司令员、程启光任合江第 4 分区副司令员，石世良任西满军区辽西第 2 分区参谋长、江腾蛟任 2 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志勇任北满军区嫩江第 4 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云任第 3 师 8 旅旅长、徐斌洲任第 7 师副政委、周纯全任辽南省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涂锡道任民主联军驻沈阳办事处政委。

1 月 10 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13 日停战令生效。蒋介石却违约，以“接收主权”为名，利用停战机会，大举向东北增兵，先后又调进新编第 1、第六军，沿铁路线进占我新民和沈阳附近地区。为了打击国民党军的疯狂气焰，民主联军集中两个主力师的 6 个团，在秀水河将全副美械武装的国

民党军 4 个营歼灭了，计 1600 多人，缴获各种炮 30 多门，轻重机枪 100 多挺，步枪 800 多支，汽车 200 辆和其他军用物资。

这次战斗，显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战斗力在不断增强。蒋介石在山海关得手后，原以为我军进入东北不久，装备差，地形不熟，不堪一击。现一交手，他丢了 4 个美械营，便开始集结重兵进攻。

3 月 12 日，苏军开始从沈阳沿中长铁路北撤回国。蒋介石置停战协定于不顾，任命郑洞国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集中 5 个军的兵力，以沈阳为基地向东、向北扩张，抢占本溪、鞍山、四平，进而抢占长春、哈尔滨，达到占领全东北之目的。我党中央指示东北局，必须控制北满地区和长春、哈尔滨两市，要不惜任何牺牲，坚决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心集中兵力在本溪和四平以南进行防御，由此上演了本溪和四平两个保卫战。

4 月 1 日至 7 日，国民党军以 5 个师中的 3 个师向本溪发动两次进攻。南满军区指挥第 3、4 纵队和保安第 3 旅进行防御作战，给敌人以坚决的打击。结果敌两次进攻以损失 2300 多人而告失败。这时，四平告急。民主联军总部令 3 纵和保 3 旅前去参加四平保卫战。国民党军乘我军部分撤走之机，集中 5 个师 8 万多人，于 4 月 28 日兵分 3 路，第 3 次向本溪进攻。我 4 纵司令员胡奇才、副司令员韩先楚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以近 3 万人抗击敌 5 万多人。

这两位司令员是同乡。他们参加红军后，因不是同一个部队，内战和抗战不在一起。想不到解放战争开始后奉命来到东北，他们不但走到了一起，还共同领导第 4 纵队并肩战斗了。真是山不转路转，河不弯水弯。高兴劲都挂在脸上。现在面临强敌，互相商量怎样对付敌人进攻。胡奇才从军后很少歇战，红军时期就是师政委。他打仗稳中有狠。韩先楚也是红军师长，打仗奇猛。抗战后期去延安抗大学习，后又留校任大队长。经过长期军政学习训练，总结提高后，他打仗猛中有谋。两人发挥自己的作战特长，在本溪保卫战中顽强抗击，坚持了 6 天，歼敌人 17000 多人，5 月 3 日奉命撤出战斗。本溪保卫战，牵制了国民党近 2 个军的兵力，有效地配合了我军主力保卫四平的作战行动。

再说四平之战。蒋介石急不可待地要夺取四平，毛泽东要坚决保卫四平。于是四平就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4 月初，林彪来到四平北面梨树县的一个山村坐镇指挥。这是自 1937

年9月他指挥八路军115师取得轰动中外的平型关大战以来，首次出现在战场上。他惯于在沉思中想办法，作决定。鉴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兵力尚不充足，来犯四平的不到两个军。他决定让西满军区黄克诚部的4个旅又3个团保卫四平。

4月8日，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和第七军共5个师，从开原、法库出动向四平进攻。林彪盯住敌人的行动，一俟战机出现就先发制人。8日晚，敌新一军38师进到柳条沟、兴隆岭一带。林彪认为有机可乘，要黄克诚发挥我军夜战的长处，乘敌立足未稳进行打击。黄克诚令8旅旅长张天云与7旅一起向敌军进攻，一举歼灭38师4个整连，给新一军当头一个重棒。接着，黄克诚又指挥独立旅阻击敌第七十一军87师的进攻。独立旅旅长以1、2团作预备队，派3团团长张竭诚率本团和配属的13团及1个大队，赶到四平南面的金家屯阻击87师。张竭诚采取节节抗退的战法，引敌深入。敌87师得意地向前推进到大洼时，预设在这里的我军主力将其包围。后面跟进的敌91师见此情况，不敢前进。独立旅第1、2团将其拦住。张竭诚率3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将首先进入大洼集市的敌87师的骑兵队歼灭。这时黄克诚赶到大洼亲自指挥主力部队，将87师压到大洼金山堡一带村庄里予以分割，将其大部分歼灭。计毙伤敌2300多人，俘敌2000多人，缴获汽车30多辆及大批军用物资，敌91师也被击退。大洼战斗，重创了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领略了林彪的厉害，不敢随便进攻。首次四平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林彪令东满军区夺取长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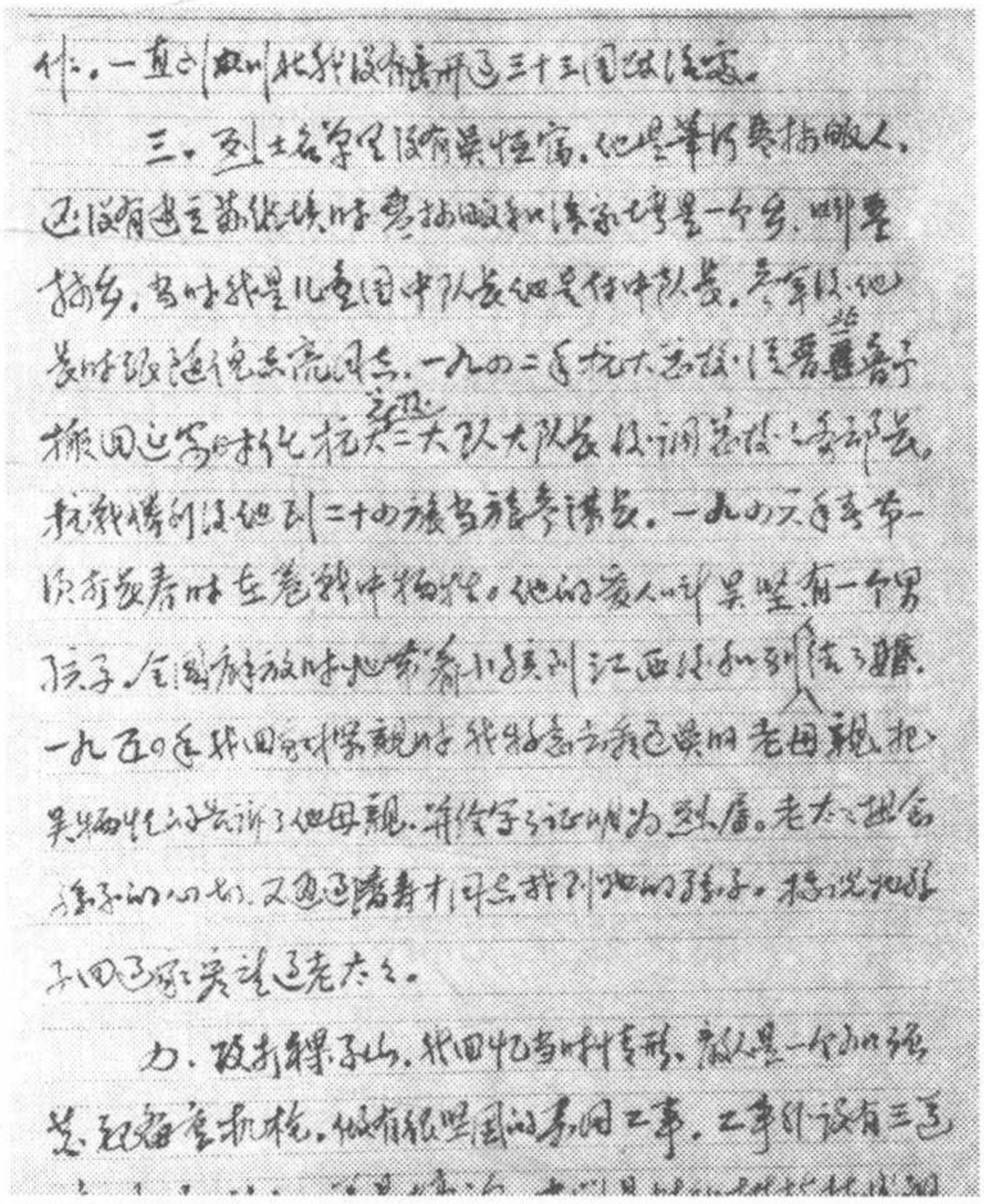
长春是伪满洲国的京都。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抢占长春，将吉林省伪军政大员全部收编，并委以代理省主席、市长、卫戍司令、警察局局长等要职。这些人的手中有原日本关东军铁心少将组建的“铁石军”1个师和保安部队共2万人。4月14日上午苏军撤出长春，这伙汉奸、土匪就粉墨登场。他们哪里知道上台之日即是毁灭之时。当晚，东满军区将早就组织好的3个临时纵队，即由杨国夫、徐斌洲率领7师为西南纵队，由吉东军区警1旅副旅长徐绍华率部参加的东北纵队，由贺庆积、袁克服、吴恒富率领的东南纵队，从四面八方向长春发起进攻。经过4天3夜的激烈战斗，18日晚全歼守敌，夺取了在东北具有战略地位的长春。

在这次战役中，有两处硬骨头难啃。

一处是攻打伪市府大楼。在屡攻不下时，负责指挥战斗的东南纵队副司

令员、警 2 旅副旅长吴恒富赶到前沿阵地，在炮火掩护下，命令本旅的主力——由朝鲜族组成的“朝鲜团”，一定要拿下市府大楼。就在这时，一颗飞弹将他打中，不幸牺牲，时年 32 岁。同他一起指挥战斗的纵队副政委、警 2 旅政委袁克服闻讯，悲愤不已。他号召指战员们为吴副司令员报仇。大家化悲痛为力量，一鼓作气攻占了市府大楼。战后，部队追悼吴恒富时，袁克服介绍了他的生平。袁克服说：“吴恒富同志湖北黄安熊家河村人，1930 年参加红军。我和他是同乡。我们一起从鄂豫皖战斗到川陕。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去华北参加抗日，是一位出色的团长。抗战后期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任第 4 大队大队长。负责训练学员，工作颇有成绩。这次我们又一起来到东北，他的抱负和才能还未发挥出来就牺牲了，实在令人痛惜。……”袁克服的介绍，更加激起指战员们对吴恒富的怀念，他是红安籍将领在东北战场牺牲的第一人。

另一处是攻打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此处由两个纵队从东北和西南两个方向联合进攻。西南纵队先夺取长春机场，然后向市区推进。东北纵队先攻总车站。战斗非常激烈。徐绍华率警 1 旅打得很猛也很艰苦，但还是按时攻下来了，扫除了前进路上的障碍。最后两个纵队合围关东军司令部。在这里驻守的是“铁石军”1 个师。他们是日本关东军训练出来的，被武士道精神奴化，拼死顽抗。但是它敌不过曾在山东抗日战场上锻炼出来的“铁锤”第 7 师的打击。在纵队司令员、7 师师长杨国夫和纵队政委、7 师政委徐斌洲的指挥下，采取“以强压强，步步推进”的战法，在东北纵队的协同配合下，17 日终于攻占了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不可一世的“铁石军”1 个师和一部分保安队 1 万多人，除死伤外全部投降。18 日凌晨整个战役结束，俘伪省长、卫戍司令以下官兵 2 万多人，长春回到人民的怀抱。



涂锡道回忆吴恒富烈士

长春解放后，北满军区部队奉命于4月25日夺取了齐齐哈尔，28日攻下了哈尔滨。但南面的四平又告急。

民主联军少了后顾之忧，主力部队纷纷南下，奔赴四平。国民党军继续增兵开向四平。双方的兵力正从四面八方聚来，小小四平城骤然成为东北的焦点所在。

四平保卫战从4月18日开始，历时31天，于5月18日结束。民主联军抗击由美械装备起来的白崇禧、杜聿明的10个师，以损失80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是一个谈不上胜利，只能说是推迟了国民党军北进时间的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所有参战部队打得非常努力。红安籍参战的将领更是如此。7师政委徐斌洲与师长一起指挥7师官兵守卫在阵地上，日夜与进犯阵地的敌军厮杀。战斗间隙，他不断向广大指战员打气，号召全师将士与阵地共存亡。部队防守三道林子时，阵地上平均每两分钟落炮弹400余发，工事掩体被炸毁后又修复。徐斌洲总是靠前沉着指挥，死守阵地，连续打退敌军新38师的多次进攻，并在晚上向外出击，使敌无法突破我军阵地。创造了日守夜攻，守攻结合的防御战法。

四平保卫战的战前、战中，毛泽东多次电示，要林彪守住四平，并要林彪变四平为马德里。林彪也想保住四平，但确实无力顶住。最后见势不对，悄然撤出参战的10万多人的部队，并安全地渡过了松花江。林彪撤军，不仅敌人不知道，跟毛泽东也不打报告。这就是林彪。他在东北坐镇指挥的二次四平保卫战虽然走了麦城，但还是很高明。

四平失守，国民党军继续向北进攻，5月25日占长春，28日占吉林，妄图一举消灭撤至北满的我军主力。为了打乱敌人部署，民主联军总部决定趁南满敌人兵力薄弱之机，令南满军区主动出击。第4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奉命挂帅，指挥3个师发起了鞍山海城战役。韩先楚率4纵主力乘夜间大雨中悄悄行动，于24日拂晓突然出现在敌阵地前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击。并采取穿插迂回战术，迅速占领国民党鞍山市公署大楼，消灭了敌人的指挥所，全歼鞍山守敌。然后转兵南下进逼海城，28日发起攻打海城的战斗。经一天一夜激战，拿下玉皇山，突入海城东门。海城守敌184师师部及552团2700余人孤立无援，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宣布起义。韩先楚边打边走，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6月3日，乘胜一举攻克大石桥。全歼守敌后率部撤出，转至草河口、通远堡一带休整。这次战役首创东北战场用

军政结合的方法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打破了敌人向北满的进攻计划，对6月6日达成东北休战协议和稳定东北战局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发电报表扬鞍海战役打得好。自此，从延安抗大出道不久的韩先楚，引起各方关注。

6月下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其方针是“先关内，后关外。”一时之间，中原大地狼烟四起，烽火连天。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国民党军战线延长，兵力分散，暂难继续大举进攻的时机，进一步集中兵力清剿残余伪军和土匪，到农村去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同时，加紧部队的整训和建设，先后又组建了第1、2、6三个纵队和南满3个独立师。至此，东北民主联军共有5个纵队、1个直属旅、3个独立师，主力部队达12万人。分别成立了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医科大学等各种专业学校。涂锡道是从抗大来的，有办学经验，调任东北军政大学东满分校校长。各学校有计划地训练各种人才，以供部队发展和作战需要。

蒋介石妄想在3个月或6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所以在6月6日达成东北停战15天的协议后，一连停了4个月。这4个月中他见关内问题没法解决，又在东北动手，定下一个“北守南攻，先南后北”的方针，集中兵力消灭或逼走南满我军，再进攻北满。

10月19日，杜聿明调集9个师计10万之众，以铁路为依托，由西至东，向安东、通化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南满我军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于转战中寻机歼敌。10月下旬，民主联军第4纵队兵分两路，副司令员韩先楚带领10师活动在新宾，司令员胡奇才则带领12师向11师活动地区赛马集一带撤去。胡奇才在集结中发现了战机，用两天两夜时间，把分散在100平方公里以内11、12两个师集合到一起。暂缓执行辽东军区赶到草河口结集的命令，于24日指挥部队打掉敌25师守卫赛马集的两个营，使25师孤军突出，逼他就范，然后趁敌在行动中歼灭它。号称“千里驹”的敌25师师长李正谊，果然率部出动。胡奇才一边电告韩先楚火速赶到，一边预设伏击战场。29日黄昏，胡奇才亲自引诱李正谊的25师进入东西走向的狭窄山谷地带——新开岭。31日凌晨，韩先楚带领10师三个团冒着初冬的雨雪，忍饥挨饿，爬山越岭，连日疾行，到达指定地点。上午，胡奇才、韩先楚指挥4纵3个师向敌25师发起攻击。战至次日，将其压缩到老爷岭，敌固守待援。由于山高坡陡，加上雨雪连绵，路滑难行，4纵的攻坚部队运动非常困难。虽经两天一夜前仆后继地顽强冲击，老爷岭依然未能攻下。正

在激战之时，外线国民党军的3个师，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合围过来，形势非常危急。胡奇才冷静以对，亲去10师前沿阵地，会同韩先楚仔细观察敌军部署和火力配备，现场协调战斗安排。11月2日凌晨7时整，强攻老爷岭的战斗打响，全纵所有火炮支援担任突击队的10师。强大的突击队一个冲锋就冲上山顶，攻克了老爷岭，毙俘敌正、副师长以下官兵8000余人，开创了东北战场我军一次作战歼敌一个整师的先例。

新开岭战役，是东北我军在政治和军事都处于冰点时期的一个还手，一个回马枪，一剂强心针，一个转折点。展现了红安籍将领敏锐的军事目光和出色的指挥才能。这一着棋带活全盘。从此，我军在东北战场由冰点升至热点。此战非智勇兼备的将领不敢为，两位红安籍将领联手取得的新开岭战役胜利被传为佳话。

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地区时，南满各军区、军分区除配合主力作战外，还在本地坚持斗争。安东军区2分区司令员祝顺鹏率部不断打击地方反动武装。4分区副司令员魏正兴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战后为他开追悼会，宽甸地委、专署、军分区送了一副挽联："自幼出身贫雇，备受饥寒，一片忠心报祖国；童龄参加革命，转战万里，壮烈捐躯为人民。"他是牺牲在白山黑水间第二个红安籍将领，也是最后一个。

1946年12月中旬到1947年4月，杜聿明高嚷要把南满的共军"赶到长白山上啃树皮，挤到鸭绿江里喝凉水"，集中近20万人的兵力，四次向临江进攻。我军第3、4纵队的3万将士被压缩在长白、抚松、临江一带，处境极为不利。当时气温下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战士们吃的是冻得硬邦邦的窝窝头，喝的是雪水。有时一连十来天爬冰卧雪，部队冻伤减员很多。由于奇寒，有的枪打不响，有的连枪栓都拉不开。就是在这样险恶的情势下，为保卫南满根据地，东北民主联军在北满、西满、东满和南满的部队，互相密切配合，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法，从12月17日至1947年4月3日，进行了"三



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我军一口窝窝头一把雪在零下4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艰苦作战。

下江南四保临江”的艰苦作战。

临江是我长白山根据地的一个县，位于吉、辽两省边界，南满党政军机关驻在这里。12 月 17 日，敌人用 6 个师全面进攻临江。民主联军以 3 纵在正面抗击，胡奇才率 4 纵在外线寻机歼敌，北满军区主力部队跨过松花江一次江南支援。在我军三方面打击下，敌人害怕被歼，开始回撤。我军乘势反击，歼敌两个团大部和两个保安团，取得了一保临江的胜利。

1947 年 1 月 30 日，敌人又以 4 个师分三路再次进攻临江。我 3 纵和 4 纵 1 个师迅速出击。胡奇才率 4 纵另两个师插入敌人后方，向宽甸、辑安一线出击，并且袭入桓仁县城，敌人大为恐慌，纷纷撤退，取得了二保临江的胜利。趁此机会，胡奇才率部在本溪以东开辟了一片纵横 70 多公里的山区根据地，使我军作战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2 月 13 日，敌人集中 5 个师分三路向临江发动第三次进攻。我军仍以 3 纵和 4 纵 1 个师在运动中进行反击，北满军区令 12 师跨过江去二下江南支援，一举将中路敌人击溃。胡奇才仍率 4 纵另两个师插入敌后攻城夺镇，配合 3 纵收复了 5 城 2 镇，取得了三保临江的胜利。

3 月 7 日，北满军区主力部队乘胜出击，跨过松花江，三下江南，在通化、新宾地区对敌人发动进攻，解放了大片地区。这时，东满、西满等军区的部队纷纷配合作战。西满军区 2 纵 6 师师长张天云，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避实就虚，灵活机动地打歼灭战。该师团长张竭诚，在战斗中战绩突出被任命为 6 师副师长。北满军区的哈北军分区副司令员程启文、合江四军分区副司令员程启光、辽吉 2 分区政治部主任江腾蛟、嫩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志勇等，也在各自地区投入了歼灭地方反动武装的战斗。

接下来再说四保临江。4 纵副司令员韩先楚和 3 纵副司令员曾克林被任命为四保临江的前线指挥，由他们指挥 4 纵 10 师与 3 纵 7、8、9 师抗击敌人 20 个团对临江的第四次进攻。韩先楚处置果断，先敌展开，先敌占领阵地，先敌进攻，争取了战场主动权。一俟战机出现，即飞兵抵达红石砬子，使出拖刀计，且战且走，诱敌于山间谷地。然后以 7、8、9、10 共 4 个师的优势兵力，围歼敌主力 89 师，俘敌 7000 余人。这一仗，打得主动、坚决，部队伤亡很少，以最小代价赢得了胜利。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听闻此信，惊呆半晌，不敢再战，随即下令各路人马全部撤退。至此，四保临江战役以民主联军的胜利而告终。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是一次事关东北全局的战役。林彪指挥还是有方的，

南满的3、4纵队打得勇猛，东满、西满、北满部队相互配合有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绩，共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彻底粉碎了杜聿明的“北守南攻”战略，使他的机动力量遭到严重削弱，逐渐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从此以后国民党军不得不转攻为守。而民主联军则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基本扭转了东北局势。

三季攻罢　胜算在握

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国民党军遭到民主联军的严重打击后，被迫转入防御。但仍在继续分割我东、西、南、北满和冀察热辽各区，等待关内增援后再发起进攻。

这时东北战场形势是：敌占地方大，兵力分散，正规军多以团或营为单位防守据点，机动兵力不足。长春至沈阳铁路两侧，守备兵力更为薄弱。我占地方虽小一些，但建立了较巩固的后方，军队已发展到46万多人，大部分可用于机动作战。将防御战变为进攻战的条件已经具备。从全国各个战场来看，有的解放区已经这样做了。如晋冀鲁豫野战军，1947年3月上旬就在豫北和晋西南展开战略性反攻。晋察冀野战军也在4月初至5月初，发起了正太、保北战役，打通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的联系。东北局和民主联军决定抓住有利时机，打通南、北满的联系，结束东北解放区被分割的局面，从根本上扭转东北的战争形势。这个方案报到中央，正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看了，甚为高兴。毛泽东说：“我料到林彪会想到这一点，果然不等我们开口，他就把方案提出来了。恩来你看怎样？”周恩来按统帅的意见批准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计划。于是，在林彪指挥下，1947年5月中旬，发起了夏季攻势作战。其部署是：北满的1、2纵及独立1、2师，从吉（林）、黑（龙江）边的扶余等地出发，突然向长春至铁岭的铁路两侧地区展开远距离奔袭；南满的3、4纵，从通化北奔袭沈阳至吉林的铁路中段之敌。两大主力同时行动，以四平为中心，南北对打。东满我军在吉林东，西满我军在双辽地区，也向敌人展开积极进攻，以配合主攻方向作战。

5月13日，我2纵包围长春与四平之间的怀德，1纵打敌援军。16日，6师师长张天云率部协同4师攻城。经过一昼夜激战，17日占领怀德，全歼敌新一军1个团及1个保安团共5000余人。这时由四平出援的敌七十一军

88、91 师见势不妙，企图回撤。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传达林彪的命令：1、2 纵队要截住敌人消灭它！我 1、2 纵在大黑林子地区与敌激战 12 小时，将敌 88 师全部和 91 师大部歼灭。战罢，兵分两路，乘胜扩大战果：1 纵向北，夺取公主岭、陶家屯等地；2 纵向南，奔袭昌图。张天云、张竭诚率 6 师打头阵。部队日夜兼程，很快到达昌图外围。当完成合围任务后，张天云命令 18 团迅速肃清外围据点南岭之敌，扫清攻城障碍。18 团一鼓作气拿下了南岭敌人据点。张天云深入南岭前沿，亲自选择攻城突击方向。敌人发现我军攻城意图，马上用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支援下向南岭方向反攻。张天云迅速组织兵力和火炮打击敌人。经过激烈交战，出城之敌一部分被歼，其余全部躲到城内。在这次反击战中，张天云的左肺被敌人机枪打伤，伤势较重。他忍着痛留在师指挥所指挥作战。副师长张竭诚不论怎样劝说，他也不离开火线。没办法只好看着师长忍痛和他一起研究攻城方案。最后算是说服师长不离开指挥所，由自己代他去前沿看地形，选择攻城突破口。6 月 1 日晚，纵队部发出攻城命令，6 师与 5 师奋力攻击，翌晨结束战斗，全歼守敌 2 个团，计 4200 余人，解放了昌图。至此，北满民主联军控制了长春至沈阳间大部分铁路和两侧广大地区，并在四平南北对中长路展开破袭，完全孤立了四平。

在北满我军进攻的同时，南满我军 3、4 纵队于 14 日攻克了吉（林）辽（宁）边上的山城、草市等重镇，歼敌 60 军 184 师一个团和暂编 20 师一部，切断了沈阳至吉林的铁路线。本已染病在身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蒋介石点将不得不抱病出征。但杜聿明对其黄埔学弟林彪的南北对攻，调不出更多的兵来对付，只抽出 6 个团在南满我军侧后反击。林彪令 3、4 纵反手一击，于 16 日至 17 日在南山城子地区一举将其击溃，并歼新编 22 师一部。杜聿明吃了败仗，病情加重。部属劝他去治病。他怕丢掉四平不愿离开。

将对将。林彪初胜杜聿明，稍解四平之恨，但还是耿耿于怀。林彪抓住战机，令 3、4 纵夺取战略要地梅河口。22 日，4 纵 10 师和 3 纵 2 个团包围了梅河口守敌。指挥这次战斗的重任落到 4 纵副司令员韩先楚的肩上。他亲自带着师团干部到前沿阵地去观察和布置。

战斗打响后，原定的主攻地点，由于受地形限制，我军屡攻不下，伤亡较大。当夜，韩先楚重新研究了作战方案，改变主攻方向，决定先拿下火车站。他让 10 师派出一个连，潜入靠近敌人两个大碉堡的一排民房内，打通

一道道墙壁，直到靠近碉堡，经连续三次爆破，炸掉了碉堡，打下火车站，将核心阵地的敌军牢牢困在一块狭小区域里。28 日下午，总攻开始，韩先楚指挥部队一举歼灭敌 60 军 184 师，俘师长以下 6000 多人。战后韩先楚升任第 3 纵队司令员。

韩先楚攻下梅河口，各个纵队分别向北向南进攻。3 纵克东丰、辽源，歼敌青年军第 2 师大部。6 纵在东满军区配合下，首克天岗、江密峰，歼敌保安第 7 团；继克老爷岭、小丰满，歼敌 38 师一个团。29 日，驻守海龙的敌 60 军暂编 21 师害怕被歼，弃城北逃。林彪令 6 纵和东满军区部队截住，将其全歼。至此，我军肃清了永吉、长春以南，四平以东广大地区的敌军，控制了沈阳至吉林铁路中段、梅河口至四平铁路东段和长春、沈阳间广大地区。与此同时，由 4 纵司令员胡奇才率领的 11、12 师，在南满军区配合下，向辽东、辽南敌军防守据点发起进攻，由北向南先后收复了通化、新宾、宽甸、庄河、复县、盖平、大石桥等城镇，使辽南、辽东解放区连成一片。6 月 3 日，由北满南下的 1、2 纵与由南满、东满北上和西进的 3、4、6 纵，胜利会师于四平以南，使南、北满连接起来了。驻守沈阳、四平、长春、吉林等铁路线上的国民党军已成孤立之敌。为进攻四平创造了条件。

一年前，为保卫四平，我军牺牲 8000 将士，尚未保住。那尸横遍地，惨不忍睹的情景大家都记忆犹新。广大指战员，包括林彪在内都想一雪此恨。现在听说又要打四平，我军群情激愤，请战书雪片似的飞进联军总部。林彪作出部署，集中 24 个师，以 7 个师主攻，3 个师作预备队，14 个师在四平南北打援。

四平守敌是陈明仁的七十一军，共 3 个师，刚被歼一个，剩下两个师也受过伤。另外是杜聿明调来的 54 师，也受过我军打击。虽说仍有 3 个师，但实际战斗人员不足 2 万人，另有临时武装的文职人员近万人。7 对 3，我军占绝对优势。6 月 14 日，林彪下令发起总攻，我军从西南、西北两个方向一举突入城内。20 日，6 纵政治部主任兼 17 师政委徐斌洲，率部攻打核心守备区。陈明仁破釜沉舟，凭借弹药充足，用日式守法，在占据地拼死顽抗，同时向杜聿明求援。战斗渐呈胶着状态。我军不惜牺牲猛攻，难以将其摧垮。

四平告急。杜聿明已卧床不起。他向蒋介石求援。蒋飞沈阳督战。从长春、沈阳和关内急调 10 个师，分成 3 路，沿中长铁路的两侧，向四平攻击前进。

敌情有变。林彪改变打法，只留部分兵力佯攻，集中 9 个师追击从沈阳出动的新 6 军。本想吃掉这路敌人，结果只歼一个团。另外两路敌人援军也逼迫四平。我军继续围攻不利。7 月 1 日，林彪不无遗憾地下令撤出战斗。四平这只快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

夏季攻势，是东北民主联军首次发起的战略性反攻，历时 50 天，虽未打下四平，但歼灭了国民党军 82000 多人，收复和攻克的城镇有 42 座，扭转了东北的战局，从此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夏季攻势战役结束后，民主联军主力集结在沈吉路和中长路两侧休整，并增编了第 7、8、9、10 纵队。这时野战军发展到 9 个纵队共 27 个师，加上 10 个独立师，约 29 万人，地方武装有 23 万人，总兵力达 52 万人。在林彪麾下担任各级领导的红安籍干部有：总部兵工部政治部副主任江汉东、总部管理科科长吴基荣、1 纵 2 师参谋长沈先夫、2 纵司令部科长毛普安、2 纵后勤部政委张志勇、2 纵 6 师师长张竭诚、3 纵司令员韩先楚、4 纵副司令员胡奇才、6 纵政治部主任兼 17 师政委徐斌洲、6 纵 18 师政委袁克服、7 纵通讯科长刘坤、7 纵 21 师 62 团团长程启光、7 纵 19 师师长徐绍华、9 纵司令员詹才芳、9 纵后勤部长程儒珍、9 纵卫生部长秦光远、联军总医院院长李其华、副院长张克斌、独立 7 师副师长程启文、独立 8 师副师长陈炎清、独立 10 师副政委江腾蛟、联军东线战勤司令部司令员周纯全、军工部驻辽东办事处政委涂锡道、东北财经委员会物资处处长曾传六、辽吉军区 2 分区参谋长石世良、热西军分区参谋长张天恕等。

在这次扩编中，有些人的职务提升了，自然高兴；有些人的职务未升甚至有降，心里不悦。红安籍干部却能正确对待。有两个事例说来生动感人。参加黄麻起义的程启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红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军分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到东北，任合江军区 4 分区副司令员。这次他们分区的部队编入 7 纵，组织上安排他到 21 师 62 团当团长。他乐意地服从分配。有人觉得这不公平，有人说他傻。当这些话传进他的耳里，他一笑了之说：“干革命就要当傻子，不能太怪物（工于心计）了。”石世良抗战期间任过鲁南军区 4 分区副司令员，到东北后任辽吉军区 2 分区参谋长。部队扩编时，本来安排他到开鲁通辽联合司令部任副司令员，他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低，主动让给别人去担任这一职务。分区司令部一位参谋跟他当秘书，劝他不要这样做。他对那位参谋说：“参加革命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革命需要干什么都行。再说，让能力强的同志去做那份



作者(左)访问吴先恩,谈东北野战军的后勤供给等问题。

工作，肯定会比我做得好，对革命更有利，又有什么不好？”像程启光、石世良这样不计职务高低的红军老干部还不只他二人。

这次任命的9纵司令员詹才芳，也是一位能上能下，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将领。1927年他与李先念等一起领导高桥区农民参加黄麻起义。后任黄陂县游击大队长，再后任红四方面军九军政委。抗战时期到晋察冀军区3分区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抗战胜利后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与李运昌率部较早进入东北。由于他在冀热辽地区工作战斗多年，情况熟悉，又被派回去担任冀东军区司令员。每次调动，他都认真实践自己的诺言：“党叫到哪就到哪，党叫干啥就干啥。”在冀东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大力发展地方武装。这次扩编，他们军区的部队编了3个编制师和1个独立师，共4个师，为壮大东北野战军做出了贡献。

东北根据地建立不久，物资匮乏不说，补给线常遭敌机轰炸破坏。需要一批干部去做这方面的工作。红安到东北去的共有30多名团以上干部，搞后勤的约占三分之一。他们中有的是老后勤，但多数是因革命需要而改行。周纯全本是一位资格较老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参加黄麻起义后任过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红军师政委、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抗大山东分校校长、辽南行署主任等职。这次派他担任民主联军后勤部东线战勤司令员，算是改行了。他是工人出身，有一股工人阶级“迎难而进”的气概。东线战事频繁，仗越打越大，前方后方工作矛盾越来越突出。周纯全这时就任东线战勤司令员，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保障供给。他从调查中发现，过去的作战物资多是集中存放，丢失严重。1947年初，民

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在大连治病期间，通过商谈，从驻大连苏军那里得到一批物资，运到安东后存放一处，被敌机全炸毁了。这事给联军领导人和从事后勤工作的同志敲响警钟。周纯全根据联军后勤部的意见和自己调研的结果，提出“统一领导，分散管理”的方针，在我军控制的交通线上，建立隐蔽小型的物资站。凡由后方基地运来的弹药物资，一律分存到各个小站，疏散隐藏，随要随装。并在四平至梅河口、梅河口至辑安、吉林至梅河口、吉林至长春、吉林至延吉等线路上，建立兵站指挥所和转运站，形成了一个指挥灵活、转运快捷的交通运输网，有效地保障了供给。他在解决了物资储运问题之后，接着又征得联军后勤部同意，充实和完善了野战军各级后勤保障机构，加强了后勤工作的机动性，改进了供应办法，将原来各部队后勤各自为政的分散供应状态，逐步变为统一领导、集中供应、确保战勤的供给体系，同时把作战中的缴获及时补充给部队，使部队的物资供应和战勤保障有了明显好转，推动了东北解放战争物资保障体系的健全和民主联军后勤建设的发展。像周纯全一样改行的还有涂锡道。他从延安到东北，始作学校工作。这次调他担任民主联军驻辽东办事处政委，实际上是专管军械，即武器弹药。沈阳解放后，又派他担任沈阳兵工总厂厂长。从此他与军械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是在军内改行的。还有从军队转到地方去工作的，曾传六就是。他是1925年参加革命，到1947年已有22年工龄，21年党龄，20年军龄，曾任过红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党组书记、八路军总部军法处长等职。他的履历告诉我们，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队政工干部。这次挺进东北后，没想到领导派他去担任东北财委会物资处处长。当东北局副书记兼财委主任、民主联军副政委陈云找他谈话时，他说：“陈副政委，是不是召错人了？”陈云说：“没有呀，你不就是曾传六吗？”陈云看出了他的心思，接着说：“在延安我当组织部长时，就知道你的情况。现在革命形势发展了，各方面需要的干部多了。我们不能老待在军队里，应该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今天抽调你，明天可以抽调他。军队干部将会一批又一批转到地方去工作。不然的话，各个地方各个部队需要干部到哪里去找？”曾传六听到这里，等陈云的话说完，就表态说：“陈副政委，今天我就向你报到，明天就去工作。”陈云高兴地说：“好，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事事处处就是应该带好头。”曾传六打这时起，离开了他热爱和熟悉的军队工作，有点依依不舍。使他感到欣慰的是物资工作基本上是为部

队服务。他不断加强管理，改进运输，保障供给，为东北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他是红安较早转业的将领。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有一批红安干部转业，其中一些高级将领如李先念、戴季英等，纷纷抖落征尘，脱下军装，转换岗位，到中央或地方去做行政工作。

战时对干部的调整，是为了打好仗，打胜仗。那么，东北的战争形势怎样呢？他们在战场上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敌军遭到我军夏季攻势严重打击后，蒋介石为挽救东北危局，派他的亲信、参谋总长陈诚接替杜聿明任东北最高军事指挥官。陈诚到任后，扬言在6个月内收复东北一切失地。他从指责前任腐败无能入手，开始整编部队，撤销绥靖区，组建兵团司令部，将保安部队改编为师，连同关内调去的人马，一共组成4个兵团10个军40个师，14个保安支队，共50多万人。实行“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方针。企图“确保北宁路，打通锦承路，维护中长路”，待关内更多的援军到达后转入反攻，以打破我军新的攻势。

9月中旬，敌人为打通锦（州）承（德）路，用3个师进犯我热东解放区。为了挫败敌人的企图，林彪决定提前于9月14日发动秋季攻势。战斗在锦西地区首先打响。民主联军副总司令黄克诚指挥黄永胜的8纵和詹才芳的9纵，主动寻找战机，坚决打击来犯之敌。两个纵队翻山越岭前去迎敌。9月21日13时，詹才芳率部打响杨家仗子战斗，几番冲锋后，敌丢弃阵地逃入附近村子内，倚仗强大火力继续顽抗，一面死拼一面求救。陈诚忙调兵紧急增援，8纵和9纵的打援部队又将这批增援敌军牢牢阻挡在虹螺岘、连山、五岭山一线，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当时天降大雨，民主联军没有任何雨具，他们冒着大雨先后向杨家仗子进行了三次总冲锋，直到22日黄昏，敌人分散突围。8、9纵乘胜追击，歼敌3个师大部，计15000多人，粉碎了敌人打通锦承路的计划。接着詹才芳和黄永胜率部对北宁线展开破袭战，攻克据点10多个，破坏铁路数百里，切断了敌人与关内的陆上联系。

北宁路沿线告急，陈诚从铁岭调兵增援。林彪趁四平、沈阳间敌守备兵力减弱，命7纵向中长路长春以南两侧奔袭。7纵19师师长徐绍华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收复了西丰、梨树、公主岭等地，直接威逼四平，迫使敌人从长春南援四平。徐绍华他们奉命不打四平，改为破坏中长路，又粉碎了敌人维护中长路的计划。

林彪在锦西地区和中长路以南两侧使用“南打北拉”的战法，有效打击了敌人，使东北的敌军更加被动。不但陈诚上任伊始那股嚣张气焰没有了，而且连在南京的蒋介石也坐卧不安。10 月初，蒋介石急飞沈阳，商讨对策，又从华北调 4 个师进入锦州，以解除我军对北宁路走廊的压力，恢复关内外陆路上的联系。趁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北宁路和沈阳地区的时候，林彪又来个“北打南拉”，以 1、2、3、4、6、10 纵队在北面打，出击敌人防守较为薄弱的林吉、长春地区，分别围攻永吉、开原，诱歼援军。以 7、8、9 纵队从南面拉，在北宁路阻击和钳制华北的援军，策应北线主力作战。南面这 3 个纵队活如龙，猛如虎，不断创造战斗佳绩。9 日，徐绍华、程启光所在的 7 纵在新立屯歼守敌 57 师大部。10 日，8、9 纵乘胜扫除了锦州至兴城间除锦西以外的各个据点，歼敌 1500 多人。随后 8 纵转兵包围义县。17 日，7 纵攻克阜新，歼敌 51 师师部及 1 个团。7、8、9 纵的迅猛行动，迫使华北来援的敌军无法进至沈阳以北地区，只是占领了被我军刚攻下的新立屯、阜新、彰武一线。

为了诱敌西进。黄克诚根据总部意图，独点詹才芳 9 纵飞兵朝阳。21 日，詹才芳指挥部队攻打朝阳，经大半天激战，于 22 日晚破城而入，歼敌 50 师 1 个团和骑兵第三军一部共 2000 余人。与此同时，义县守敌保安 4 支队在突围逃跑中被 8 纵全歼。7、8、9 纵在南面拉，有力地打击了敌增援部队，使其不能北顾。

位于北面的几个纵队，按照林彪的部署，以 1、2、6、10 纵进到四平南北和吉林以东地区，钳制敌新一军、第七十一、六十军。3、4 纵出击威远堡和西丰地区。这一仗该怎么打？纵队领导的意见不一。多数人主张先打西丰。韩先楚主张远程奔袭威远堡。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上报总部，批准了韩先楚的方案。10 月 1 日，韩先楚率领 3 纵和 4 纵一个师共 4 个师，远程突袭威远堡。他指挥部队神速前进，如旋风一般骤至，用“猛虎掏心”战术，经 19 小时激战，将敌五十三军 116 师全歼。由此获得“旋风将军”的美称。与此同时，胡奇才率领 4 纵 10 师和卢燕秋的 12 师，出击西丰东南的八棵树、貂皮屯，歼敌五十三军 130 师一个团。韩、胡出击连连取胜，使北打凯歌奏得更响亮。此后，敌人开始向吉林、长春收缩。我 6 个纵队乘此机会在短短几天内，先后占领了九台、农安、德惠、乌拉街、桦皮厂等地，又歼敌近 4 个团。这时长春和吉林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林彪本打算攻吉林。因陈诚紧急向该城空运增兵。我军见失去围城打援条件，于

11 月 5 日结束秋季攻势。

秋季攻势历时也是 50 天，共歼敌 69000 多人，收复城市 15 座，破坏了锦州至山海关间、农安至铁岭间的铁路，不仅孤立了吉林、长春、四平之敌，还将敌人压缩到沈阳、营口、锦州等狭小地区，使陈诚的机动防御方针完全破产，敌军更加被动。

在民主联军秋季攻势的沉重打击下，说杜聿明无能的陈诚，也变成了缩头乌龟。不过他手中还有 45 个师，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为 58 万人。为了挽回败局，陈诚将主要兵力集中在沈阳外围和北宁路沈阳至锦州段的两侧，企图一面保持东北和关内的联系，维护“辽西走廊”与沈阳的安全；一面打通沈阳至长春、吉林的铁路交通，以便驰援这些孤立的据点。

民主联军在取得秋季攻势胜利之后，又发展壮大了，总兵力达到 73 万人，第一次超过了敌人。为了不给陈诚以喘息的机会，林彪决定继续向敌人展开进攻。战略部署是：首先攻击北宁路沈阳至锦州段，迫使沈阳、锦州敌人增援，争取歼灭沈锦段上所有城镇的守敌和援军，而后转兵沈阳以南，歼灭辽阳、鞍山、营口等地的敌人，把沈阳孤立起来。这个计划报到中央军委，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说实话，毛泽东这时最关注的是将战争引向了蒋管区的中原战场。相比之下，东北在其次。因此，毛泽东对东北的电示，不像中原战场那样频仍。他对林彪很信任，放手让他去打。统帅部给了林彪这样一个宽松的指挥环境，林彪就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其指挥艺术和才能得到了最佳发挥，捷报也就不断地传出。

进入冬季，东北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天气对作战来讲，有时是朋友，有时是敌人。前面讲过，1946 年冬季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斗，就是在天气奇冷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军在零下 40 摄氏度抗击强敌进攻，冻得拉不开枪栓，有许多战士冻伤直至冻死，这时天气就是敌人。时过一年，冬天又来到东北大地，天气故伎重演，气温降至零下 30 摄氏度。天寒地冻，对孤立的敌人不利，而对我军则有利，天气就成了朋友。

林彪、罗荣桓和总部其他领导人研究决定，12 月 15 日发起冬季攻势。林彪像往日一样言语简洁，只说了一句话：“统统拉出去。”从他的这句话中可看出，我军已无后顾之忧。参谋长刘亚楼立即向各纵队下达命令：2 纵和 10 纵一个师突击包围法库，1、3、6、7 纵队分别插入法库、新民、铁岭、沈阳间，10 纵两个师进抵昌图、开原地区，4 纵直逼沈阳，8、9 纵向北票、黑

山、台安进攻。

我军出动后，在沈阳外围地区形成了北、西、南三面进攻之势。陈诚急忙从长春、四平、锦州等地抽调6个师，到沈阳、铁岭、新民抗击。我军采取的战法是围点打援，重点放在打援上，于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种打法对我军所有将领来讲可说是滚瓜烂熟。尤其是红安人，16年前他们在徐向前指挥的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中，就学会了围城打援。这是我军的经典战法，常用常新。因此红安籍将领在这场冬季攻势中表现突出。

12月18日，参加包围法库的2纵6师副师长张竭诚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扫除法库外围敌军，一下子吃掉两个团。然后奉命将围攻法库的任务交给其他部队，转兵西进，直取彰武。22日，2、7纵完成对彰武的合围。张竭诚带领3个团在南门外投入战斗。他和指战员们一起边清除外围据点边打援。几天几夜未很好休息。在张竭诚精心指挥下，所属18团1营在7个小时内，连续打退了10倍于己的敌人9次冲锋，始终守住了阵地，使敌人不能前进。28日凌晨总攻开始，2、7纵在炮兵的支援下，对彰武发起总攻。两个纵队分别从东南和西北角突击。66门大炮将城东南打开了一个缺口。张竭诚指挥17团迅速冲了进去，直扑敌军指挥所。这时各部的突击队也攻入城内。经3个多小时激战，胜利结束战斗，全歼敌79师等近万人，开创了东北我军步炮协同，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范例。为冬季攻势开了一个好头。战后张竭诚擢升师长。此前，因师长张天云负伤，他是副师长代行师长职务。战争年代，正职如有伤亡，由副职代理。代多久，很难说。张竭诚只代了几个月就转正了，说明他代理不错，有能力挑起这个担子。这是他到东北后第二次提职，由正团升为正师了。他的晋升很有代表性。大多数红安籍干部同他一样，也是在解放战争中快速成长起来的。

彰武战斗正在进行时，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我军在战斗间只休息补充而不进行大休整，尽可能利用冰期大量歼敌，将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山海关等几大据点间的中小城市及农村收归我手。办到这一点，尔后就只剩下打大据点的问题了。与此同时，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复电林彪、罗荣桓，同意他们的建议，从1948年1月1日起，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将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

林、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彰武战斗结束后，令东野2、7纵就地休

息，1、8、9纵向黑山、打虎山前进，歼灭中小城市之敌，4纵在辽阳、沈阳间破坏交通，诱敌出援，予以歼灭。

陈诚见我野战军主力分散，转忧为喜，忙调5个军，分成左、中、右三路，向在新民、法库、沈阳三角地区的我3、6、10纵进行合击，并想解法库之围。他调来这5个军的军长各怀鬼胎，多数人害怕被歼，畏葸不前，唯有号称王牌军的新五军军长陈林达，邀功心切。他原是师长，陈诚来东北后将他一下子提拔为军长。为报陈诚知遇之恩，他率左路军积极推进。

林彪见陈诚这只缩头乌龟伸出头来，高兴得手拍桌子说："我们要抓住他，不要让他缩回去了。"他令6纵节节抗击，将敌诱到公主屯地区，2、3、7纵断敌后路，1、4、10纵将新五军与其他4个军分隔开来并打敌援军。1月5日，林彪令2、3、6、7纵对新五军展开进攻，激战至7日，全歼新五军军部及两个师共2万多人。生俘中将军长陈林达和两个少将师长，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这次战斗大获全胜，韩先楚起了很大作用。按分配的作战任务，他率3纵是在闻家台以南警戒沈阳的敌人，协同兄弟部队歼灭新五军。战斗打响后，他见我军在公主屯南和东南方向攻击力量不强，敌人很有可能从这里逃向新民或沈阳。为了全局的胜利，他一面向林彪、罗荣桓报告情况，请求增加任务；一面将所部由警戒变为攻击侧后，断敌后路。敌人想退退不了，守又守不住，便由公主屯窜到闻家台死守待援。陈林达竟丧尽天良，拿他的士兵尸体做掩体，作困兽之斗。攻守双方打得十分激烈。一贯亲临前线指挥的韩先楚，凭经验断定陈林达就在闻家台。他又向林、罗回报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加强进攻火力，尽快抓住陈林达，消灭新五军，以动摇其他两路敌军，夺取胜利。林、罗采纳了韩先楚的建议，令东野4个炮团，配合各纵队于7日早晨对闻家台发起总攻。经5个多小时激战，就将敌人全部歼灭了。战后，韩先楚得到上级好评，说他是一个胸怀全局，善抓战机的战将。

俗话说："偷鸡不成蚀把米。"陈诚到沈阳就任东北行辕主任之初，叫嚷"在六个月内收复一切失地"。现在6个月过去了，不仅失地未收，反而丢了辽西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近又失去战略要点彰武、公主屯、新立屯，损失了王牌新五军。他原想把丧军失地的责任推给部属。结果众将不服，他们当着急飞沈阳挽救败局的蒋介石的面，驳得陈诚哑口无言，陈诚只好自己承担罪责，请蒋处置，然后来个"跛子拜年——就势一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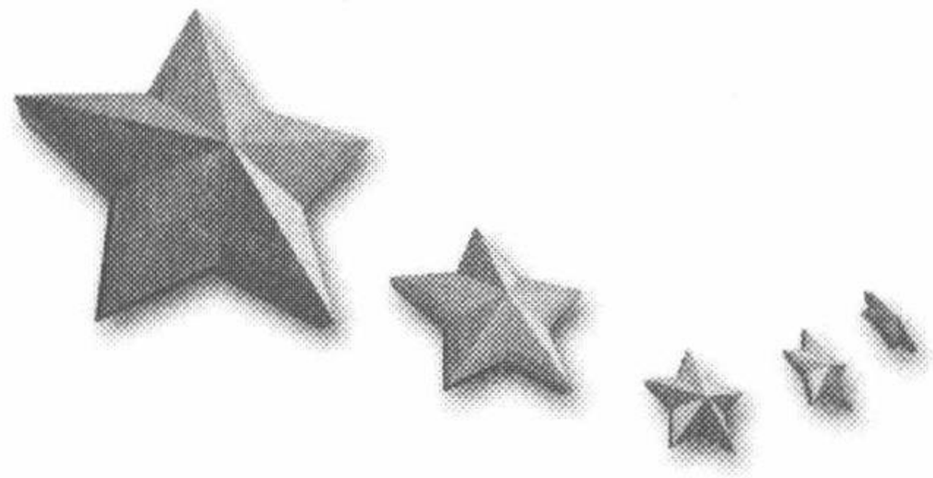
以胃病复发为由请求去职。蒋介石给他一顿训斥之后，同意他去养病。调卫立煌到东北任“剿匪”总司令。2 月 1 日卫立煌上任。这个人老谋深算，使出两手：一面叫嚷要死守东北，一面将高级军官的家属撤至关内。可以看出，他对挽救东北危局是缺乏信心的。林彪抓住卫立煌调整兵力部署的机会，1 月底令 4、6 纵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辽南出击。4 纵副司令员胡奇才、6 纵政治部主任徐斌洲与本纵的主官一起，率领部队于 2 月 6 日一举拿下辽南重镇辽阳，歼敌 1 万多人。卫立煌怕蹈陈诚的覆辙，不敢出援。17 日又克鞍山。26 日包围营口，守敌 58 师副师长王家善率部起义。在短短的 20 天内，4、6 纵三战三捷，一举荡平辽南之敌，切断了敌人的海上通道，为进一步歼灭吉林、长春、四平等孤立据点的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卫立煌连失三城，惊恐之余进一步收缩部队保卫沈阳大本营，使沈北的吉林、长春、四平更加孤立。林彪欲雪四平之恨的机会终于来了。3 月 2 日，他令 1、3、7 纵和炮兵主力四打四平，其余部队打援。我围攻部队有的曾经打过四平，尤其是被任命为前线指挥的 1 纵司令员李天佑，为打四平吃过亏，至今耿耿于怀。这一次他发誓要拿下四平。韩先楚当时在辽东作战，虽未吃过四平的苦头，但共同的敌人也使他感同身受。他号召 3 纵指战员，要像在辽东作战一样打好四平这一仗。7 纵 19 师师长徐绍华和 21 师 62 团老团长程启光所在的部队，也是群情激愤，摩拳擦掌，请战书、决心书，像飘落的雪花飞向各自的领导机关……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待一声令下。3 月 12 日清晨，东北大地雪住天晴，林彪下令向四平发起总攻，200 多门大炮发出的轰鸣声，震得天摇地动。我 3 个纵队从 3 个方向向四平实施向心攻击。破城以后，各路人马对敌人进行猛烈分割围歼，仅用 23 个小时，于 13 日凌晨全歼了国民党守军 19000 多人。卫立煌坐看四平失守不敢出援，吉林守敌害怕被歼，弃城逃到长春。于是我军又兵不血刃，解放了吉林。这次四平之战，一石二鸟。林彪从不带笑色的脸上似乎露出了微笑。

从 1946 年 3 月 18 日我军第一次攻克四平起，两年中共打四平四次，第一次我胜，第二次、第三次我负，第四次我胜，两胜两负，打成平手。有人因此说林彪打仗不过如此。我们不能以胜败论英雄。要知道东北战场，林彪始终是主角。我军由开始的被动变为后来的主动，由劣势变为优势，根据地由不巩固到巩固到不断扩大，都与林彪分不开。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林彪，才不失偏颇。至于他后来出了问题那是另一回事。

随着四平的解放，冬季攻势于1948年3月15日结束了。这次战役历时3个月，歼灭国民党军8个师，争取1个师起义，共计156000多人。收复城市17座，切断了中长路的北端，将东北的敌军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3个孤立地区，为以后全歼敌人奠定了基础。

冬季攻势后，为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东北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整编，有计划地加强了以炮兵为重点的特种兵建设，加强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各部队投入了空前规模的军事训练。在罗荣桓领导和组织下，东北解放军首开“诉苦教育”先河。七纵政治部主任徐斌洲在“诉苦教育”中创造了一些好经验，经毛泽东指示在全军推广。一时，我军指战员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士气旺盛，斗志昂扬，在黑土地上已经敢于称“无敌”了。至8月，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已拥有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14个独立师和3个骑兵师共约7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力已发展到103万人。东北解放区的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解放区人口占东北的86%。为了就地全歼东北之敌，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关门打敌”。8月29日，林彪向各纵队下达战斗动员令。9月10日，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从各处火车站秘密登车南下北宁线，9天之内，十万大军安全、迅速、秘密地运到辽西。辽沈大决战的序幕已悄然拉开。



第十三章　三大战役显身手

林彪突然变更3、4纵作战任务，葫芦里卖什么药？塔山无塔又无山胡奇才坐镇成铁塔山。战场物资供应及时，程儒珍被称为“及时雨”。战地施救得力秦光远被誉为“保护神”。詹才芳飞兵堵截东北敌军唯一海上逃路营口。刘飞一个纵队歼敌一个军又传佳话。王近山巧妙策应起义对敌军立体突围釜底抽薪。陈锡联、陈赓、谢富治、王近山组成铁三角围歼黄维兵团活捉“天马”。李天焕善从教训中吸取经验获张家口大捷。张竭诚造两条地上长龙巧破天津堡垒。徐斌洲率“攻坚老虎师”攻下民权门陈长捷完蛋。周纯全积两大战役之经验创造分部供应法，后勤保障有条不紊。

决战辽沈　关门打敌

1948 年秋，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前两年的战况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敌军连连失败，我军节节获胜。我们可从两大方面来看。

一是经过两年作战，到 1948 年 6 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 264 万人。敌军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 430 万人，减少到 365 万人。其中正规军 198 万人，能用于第一线的只有 174 万人，而且被我军分割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剩下 24 万人用于后方守备，很难机动。敌人在各个战场上连遭失败，将无信心，兵无斗志，军心动摇，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与此相反，我军由战争开始时的 61 万人，增加到 149 万人，大部分可用于机动作战，机动兵力已经优于敌人。随着战争的发展，还组建了炮兵、工兵、装甲兵等兵种，部队装备有很大改善。通过新式整军，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军心振奋，士气高涨，军政素质有很大提高，战斗力比以往更强，不但能打运动战，还能打阵地战、攻坚战。

二是解放区不断扩大，到 1948 年 6 月止，华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东北占 98%的地区获得了解放，西北和华东解放区的失地基本恢复，中原新解放区也日渐巩固。各个解放区的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所有解放区内，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支前，支援战争的人力物力比以前更雄厚。与此相反，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 75%的地区，近 65%的人口，但由于各级官僚极端腐败，又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财政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生产下降，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各地民众不断掀起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社会动荡不安，矛盾重重，反动统治岌岌可危。

总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表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于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会议提出在今后三年内建设500万解放军，每年歼敌100个旅，从1946年7月算起，用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会议决定第三年解放军仍全部在长江以北和西北、华东、东北地区作战。

中央军委根据党中央9月会议提出的总任务，指示各个战场发起秋季攻势，要求我军必须攻取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必须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必须集中兵力分期分批就地歼灭敌人的战略集团。军委提出这“四个必须”，实际就是进行大决战的动员令。正处在胜利之中的我军广大指战员，早就盼望打大仗。华东野战军一马当先，于9月16日发起济南战役，仅用9天时间，攻克了敌人谓之固若金汤的济南城，歼敌11万人，拉开了大决战的序幕。随后，各野战军先后组织了规模更大的、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大决战。

辽沈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头一个，是在东北地区进行的。为什么选在东北？这是因为东北解放军经过冬季攻势后将国民党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的14个军55万多人，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靠空运补给。当时国统区的报纸形容这三个城市是：“饥饿的沈阳，挣扎的锦州，垂死的长春”。而我东北野战军主力达到70多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共103万人，控制了95%的铁路运输线，解放区连成了一片，有强大的后方基地支援前线作战。不论从东北还是从全国战场形势来看，把东北战场作为战略大决战的开端，条件最具备，时机也最成熟。

辽沈战役应该怎么打？作为我军统帅部的主要决策人毛泽东，是思考已久，胸有成竹。

早在东北我军进行冬季攻势时，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就有算谋。他在1948年2月7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就提出要“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实现这个计划，我军必须离开北满，南下北宁线作战，尽快控制锦州、锦西、兴城、义县等地区，将东北的大门关起来，形成“关门打敌”。毛泽东希望林、罗、刘在冬季攻势结束后，部队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即率部南下北宁线作战。

但是，林彪对南下顾虑重重。他以我军远道作战补给困难，一旦打锦州久攻不下，遭到东北和华北敌军的夹击，部队将损失惨重为由，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就近打长春的作战方案。毛泽东的算谋本是统观全局的

英明之举，遭到林彪拒绝后，心中很是不悦。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往今来就有。因此他没有勉强林彪南下，同意他打长春。1948 年 5 月，林彪下令攻打长春，因准备不足，伤亡较大，一时无法攻下，就改为长围久困。参战部队除留一部分围困长春外，大部分转入以“诉苦三查”及“五整一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提高战斗力。直到 7 月，林彪才定下南下北宁线作战的决心。

为了大决战的头一战能顺利进行，毛泽东除了亲自制订《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外，还作出了“东北打，华北牵”的精心部署。中央军委根据作战方针和部署，命令华北野战军的杨成武、李天焕率第 3 兵团进绥远，将位于北平、天津一带的傅作义集团的主力吸引到西线，牵制蒋介石从华北抽兵增援东北，为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创造了条件。这样，林彪的重重顾虑也就消除了。于是，林彪根据毛泽东拟定的作战方针，开始部署兵力：以 6 个纵队另 4 个师对付锦州之敌，以 3 个纵队（欠一个师）位于沈阳以西地区，以 2 纵队位于沈阳以北地区，对付沈阳之敌，并阻止长春之敌突围，以 1 个纵队及 6 个独立师包围长春之敌。为确保南下作战取得胜利，东北野战军总部于 9 月 7 日颁布政治动员令，对南下作战的意义、战斗作风、党的政策、思想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动员，广大指战员学习讨论以后，思想更明确，情绪更高涨。

9 月 12 日，东北野战军按预定部署，在北宁路中段向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辽沈战役正式开始。

北宁路是联结东北与华北的大动脉，是国民党军在关内关外唯一的陆上通道。依靠这条铁路，东北与华北的兵员、物资可互相支援。北宁路的南侧，有葫芦岛和秦皇岛两个海运港口。为确保关内外的陆上联系，敌人在锦州、锦西、义县实行重点防御。其兵力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领的 4 个军 14 个师 15 万人。其中 6 个师守锦州，1 个师守义县，1 个师守高桥，3 个师分守锦西、葫芦岛和兴城，3 个师分守绥中、山海关、秦皇岛一线。敌人如此部署重兵，其目的是两个：一是保持关内外互相呼应，二是一旦失利好向关内撤退。

打蛇打七寸。林彪令程子华率 3 个独立师 2 个独立团和 1 个炮兵旅，首先切断锦州与唐山间的联系，阻断华北敌人增援东北的陆上交通。接着由吴克华、胡奇才率 4 纵（欠 11 师）和詹才芳的 9 纵，于 9 月 16 日渡过大凌河，切断锦州与义县的联系，4 纵包围了义县。

正当4纵做进攻的准备时，林彪忽令韩先楚率3纵和2纵5师及炮纵一部，前去接替4纵包围义县，令4纵南进切断锦西与兴城的联系，包围兴城。其他兄弟部队也切断与包围了绥中、高桥、锦西等城镇。这时4纵的指战员才知道，林司令调动他们是去撒更大的网捕鱼。但林彪让3、4纵调换作战任务的真正用意，暂时还未看出来，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韩先楚接到命令，他的部队尚在吉林的辽源地区。他即率部乘火车赶到阜新，然后徒步奔义县。接过围城任务后，他一面了解敌情、地形等情况，一面思考这一仗该怎么打。

义县是锦州北面的门户，城墙完整，工事坚固，城北有大凌河作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守敌是93军20师，加上地方武装共12000多人，装备良好，颇有战斗力。

我围攻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韩先楚按老习惯要全面检查、观察一遍。他从师看到团，从团看到营，从营看到连，从连看到排，直到一些重点班、组，逐个询问情况，观察敌我双方地形，做到心中有数。然后，与各师领导，特别是与暂属他指挥的2纵5师师长、炮纵司令员商讨进攻之策。他反复强调，攻打义县是辽沈战役第一仗，初战必须打胜，再战方才有利。野战军首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韩先楚经过现场观察调查和集思广益之后，也就有了决心和方法：在兵力使用上，两个师从城西南方向并肩突击，1个师从北面和东面突击；在战术上先逐点夺取、扫清外围，后坑道推进、接近城墙，再炮火开口、步兵突破、实施总攻。这个作战方案得到了总部的赞同。但韩先楚仍不满足。他觉得这个方案的难点是突破坚城厚墙。为了万无一失，他又去与2纵5师师长商量，请他介绍交通壕接近城墙的经验，再与炮纵司令商量，如何使炮弹穿城又快又好，又便于步兵越过。一切准备就绪后，韩先楚请示林彪同意，9月29日开始进攻义县，两天即扫清了外围，并将交通壕挖到了城墙脚下。10月1日发起总攻，从突破到巷战，只用了5个多小时就将守敌全歼，俘敌师长以下官兵万余人。一位被俘团长说："你们的坑道四通八达，我们的地堡变成无用的东西。这一手对我们是致命的一击。"攻克义县，首战告捷，林彪听了点点头，仍旧瞅着地图去想他的问题。

在3纵攻克义县的同时，热河3个独立师攻占了绥中，4纵攻克了兴城，并钳制了锦西、葫芦岛的敌五十四军。这时，卫立煌才明确我军的企图是要打锦州，关闭东北大门。于是采取紧急措施，一面命范汉杰坚守，一面从沈

阳空运增兵锦州。我 9 纵和炮纵一部，在詹才芳的指挥下，奉命袭击锦州机场，用远射程炮火击毁敌机 5 架，控制了机场，打破了卫立煌的空运计划。

到这时，辽西走廊除锦州、锦西两个孤立据点外，其余城乡均被我军占领。锦州之敌完全陷入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林、罗、刘根据战场形势，向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先打锦州后打锦西的作战报告，得到批准。林彪便下达攻锦战斗动员令，要求全军以最大决心拿下锦州。随后我军各个纵队按部署向锦州逼近。

当我军向锦州合围时，范汉杰求援的电报不停地飞向南京。蒋介石感到局势严重，急将卫立煌召去，要他从沈阳出兵援锦。卫立煌力陈出援会被共军消灭，不同意出兵。蒋不顾卫立煌的反对，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随卫立煌飞回沈阳督战。顾祝同一再召开东北高级将领会议，逼卫出兵解围。卫立煌被逼得要与顾祝同打赌，说："出兵援锦，一定会全军覆没，你若不信，我与你一同立字画押为证。"这样争吵过多次，顾祝同没法使卫立煌出兵，只好怏怏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蒋一听大怒，马上飞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从华北抽调 7 个师加上锦西、葫芦岛原有 4 个师共 11 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 17 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增援锦州。接着，蒋介石又飞抵沈阳，将该处兵力编为防守和攻击兵团，任命第 8 兵团司令官周福成为防守兵团司令，第 9 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为攻击兵团（也称西进兵团）司令，指挥 5 个军 2 个美械师 3 个骑兵旅，解锦州之围。蒋介石亲定的作战方针是：以廖耀湘、侯镜如两兵团东西对进，解锦州之围后，相机在辽西与我军决战，阻止共军入关。他在离开沈阳前，专门召见师以上军官进行训勉，开口就说："我是来救你们的，来救锦州的！你们过去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目前共军主力都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我相信你们会同关内国军协同一致行动，一定能够成功！……"说着说着，话到末尾，还是掩盖不住自己的悲观情绪："万一这次你们打不出去，就只有来生再见了！"

林彪获悉敌人增兵锦西的消息，攻锦决心发生动摇。10 月 2 日深夜，在未征得罗荣桓、刘亚楼同意的情况下，却以林、罗、刘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发电报，提出放弃攻锦州，回师打长春的想法。罗、刘得知后，3 日清晨即向林彪阐明不同意放弃原定作战计划，劝他收回电报申明作废。林彪感到自己的做法不妥，便请罗荣桓起草收回前电，再增兵力继续攻锦州的报告。当这份电报刚一发出，收到了毛泽东对前电的回复。他在批评林彪的同时并指出："5 月间长春之敌好打，你们不敢打。现在攻锦州部署业已完毕，敌人

变化并不大，又不敢打，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不妥的。只要你们10天内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

经过毛泽东批评以后，林彪坚定了攻取锦州的决心，并在兵力使用上作了进一步调整。以2、3、7、8、9纵和6纵17师、炮纵主力攻打锦州，以4、11纵和2个独立师在塔山、高桥一线阻击敌东进兵团，以1纵作总预备队，以5、10、12、6纵（欠17师）阻击由沈阳出动援锦的敌西进兵团，以9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新的攻锦部署，又以三人的名义上报军委。毛泽东看后很高兴，立即复电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在战锦问题上，林彪摇摆不定，使毛泽东很长时间放心不下。在解决这个问题当中，有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凸显出来。这个人就是为人处世都能从大局出发的罗荣桓。因此，当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毛泽东在悼诗中无限悲伤地吟道：“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10月4日，林彪将野战军指挥所由阜新移到锦州前线，指挥25万主力军攻打锦州。林彪战前点将：令韩先楚指挥2、3纵和6纵17师并炮兵纵队3个团及坦克车1个连，由北向南担任主要攻击；令邓华指挥7、9纵和炮纵一部，由南向北攻击；令张天云所在的8纵及1纵的炮兵团，由东向西攻击；令1纵为总预备队。同时，令程子华率领4纵、11纵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在塔山、高桥一线阻击敌东进兵团，不让他越过塔山阵地一步，确保攻锦作战的胜利。林彪这时变得谨慎起来，事事请示汇报。9日，他将这一部署再报军委。10日，毛泽东复电说：“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攻克锦州。”“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辽西走廊的战略要地。从日伪时期起，利用环城多山丘且又临河的地势特点，构筑了大量坚固工事。范汉杰率10多万人据守以后，又进行加固和新修，形成以配水池、大小紫荆山、城南诸山及女儿河等外围据点为主的点面结合的全纵深防御体系。

10月9日，我军开始向锦州城外的敌人据点发起进攻。当天，詹才芳的9纵和19师师长徐绍华所在的7纵攻占了城南诸山，将女儿河南岸之敌肃清。10日，8纵副司令员张天云与司令员黄永胜一同指挥所部攻占了大小紫荆山，一直打到城东关。与此同时，韩先楚指挥2、3纵和6纵17师，在

扫除北郊敌人分散的工事后，进到离城最近的配水池和大疙瘩。这两处据点，工事坚固，火力交叉，易守难攻。范汉杰称它是“第二个凡尔登”。我军先攻配水池，一开始就受挫。韩先楚不顾危险，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发现两个据点之间有一间隙地可利用。他马上下令投入力量，对两据点进行分割包围，在猛烈炮火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配水池。随即他登上配水池高地，指挥部队打下这场硬仗，进到锦州城下。这时，从南、北、东三个方向攻到锦州城外的我军，立即转入挖地道、修工事、备器材，积极准备攻城。

10 月 14 日 10 时，林彪下令总攻。炮纵的炮兵配合各路进攻部队，用 1000 多门火炮猛轰，从地道里运到城下的炸药包一齐爆炸。顿时城墙坍塌，碉石飞扬，烟雾弥漫。我军各个突击集团从突破口冲入市区。北面的突破口因要让坦克、大炮先通过，6 纵 17 师被排在后面。师长龙书金急得直搓手，说：“韩司令员要我们这只攻坚老虎先冲进去，直插敌人心脏。这一等不就耽误了时间！怎么办？”政委徐斌洲说：“老龙，别急，我们另找洞口钻进去！”话音刚落，有人前来报告：“49 团从小北门冲进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 49 团团长赵浩然见此情况，带领部队掉头就走，另找入口。17 师的团营连干部在紧急关头都会抓住战机，出手迅猛，破坚而入。因此，在四战四平的攻坚战中，受到野战军总部表彰，被誉为“攻坚老虎”。龙书金、徐斌洲闻讯大喜，即率 50、51 团绕到小北门向内冲，转入攻占敌人赖以顽抗的坚强核心。其他所有攻入城内的部队，与敌人逐街逐巷展开激战，15 日 18 时胜利结束，共歼敌 13 万多人，俘范汉杰以下将官 36 名。锦州战斗正好一星期，在毛泽东设想的时间内如期完成。

速克锦州，得益于东西两线的阻击，尤其是西线的塔山阻击战，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塔山位于锦州和锦西之间，铁路、公路在这里平行穿过，是通往锦州的交通要道。名叫塔山，其实是锦西山地向渤海边上延伸的一片坡地，有个百多户的村子叫塔山堡。10 月 4 日，4 纵接到命令，到塔山阻击敌“东进兵团”。野战军首长明确指示他们：两锦的敌人相距不到 40 里，故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御方法，必须构筑工事作英勇顽强的阵地防御。准备在此死守不退，准备抵抗数十次猛烈进攻。要争取 7 天时间，保证主力夺取锦州。

无险可守也要守。4 纵广大指战员日夜奋战，在东起海边西至虹螺山 20 多里长的防线上，以塔山堡为中心，筑起 2600 多个掩体，开挖 9500 米交通

沟和 6500 米防坦克壕。然后以 12 师作正面防守，10、11 师作后续梯队。10 月 10 日拂晓，敌人出动 3 个师，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发动试探性全面进攻。战至下午，占领了最东端的打鱼山岛，直接威胁我军左翼防线。纵队指挥所令 10 师 29 团在潮退时拼命夺了回来。敌人这次进攻虽被打退，并毙俘 1200 人，但初战丢失阵地，引起了野战军总部的注意。林彪亲自点将，要胡奇才到塔山前线 12 师坐镇指挥，规定他每天要报告 4 次战情。胡奇才有股子狠劲。抗战时他在山东打鬼子就狠出了名。当年同他一起战斗过的人都说，谁要是叫胡奇才狠上了，不死也得扒一层皮。

胡奇才接到命令，立即赶到 12 师指挥所。他去不多时，野司作战处长也去 12 师协助指挥。可见野战军总部对防守塔山该是多么重视。

胡奇才去后，首先和 12 师师长江燮元、政委潘寿才、副师长卢燕秋、参谋长李宏茂及野司作战处长一起，逐个检查工事，该加固的加固，该抢修的抢修，特别将师指挥所和炮兵指挥所的掩体筑得更牢。其次向纵队建议缩短 12 师的防线，将左翼阵地交 10 师防守，由 12 师统一指挥。12 师集中力量守中间和右翼阵地。第三加强团级指挥力量，提议派副师长卢燕秋到右翼白台山阵地帮助 36 团指挥，参谋长李宏茂到炮团阵地帮助指挥。检查部署完毕，各就各位。胡奇才握着既是同乡又是战友的手说："燕秋同志，白台山阵地就拜托给你了！"卢燕秋握着胡奇才的手用力抖了两下，说："副司令员请放心，人在阵地在！"送走副师长和参谋长，胡奇才和江师长、潘政委等一起走进了 12 师指挥所。

在师指挥所里，胡奇才拿着望远镜，整天盯着敌人，看他们怎样进攻就怎样对付；也盯着自己的指战员，看打得怎样还应怎么打。参加塔山阻击战的老战士回忆说："胡奇才往那儿一坐，就像钉子钉住了一样，不用吭声，威势就来



1983 年 2 月作者就塔山阻击战访问胡奇才后陪同参观红安烈士陵园。左起：文柏山、胡奇才、作者。

了，许进不许退，只有把敌人往死里打，守住阵地。”塔山阻击战打了6天6夜，胡奇才在一线坐镇指挥了5天5夜。这5天5夜几乎都是恶战。

11日，敌人用4个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整营整团向塔山堡发起集团冲锋，企图从中间突破。胡奇才采取挡前击后的战法，利用阵地将敌人挡住，让炮兵打敌人纵深，破坏其后梯队，使之不能持续进攻。这一天激战了10多小时，有3处阵地一度被敌人攻入，但最后将敌人全部击退。

12日，以为敌人会更大规模进攻，因为锦州的外围据点快被我军扫除。奇怪的是规模不比昨天大，但很激烈。当兵的人都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之前的平静。原来是蒋介石撤换了前线指挥官，让东进兵团司令侯镜如亲自指挥。侯镜如带上独立95师（所谓“没丢过一挺机枪”的“赵子龙师”）连以上当官的到前线观察地形，为次日大进攻做准备。胡奇才和12师师长、政委商议，趁势出击，并将工事筑到前面去，以攻为守，防敌偷袭。

13日，侯镜如以“赵子龙师”为主，用4个师分两路夹击塔山堡。这个“赵子龙师”确非一般。它用每人50万金元券的高价，收买“宁死不退”的人做“敢死队”，另外在团、营、连设督战员，凡怯阵者杀无赦。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由亡命之徒组成的“敢死队”，第一队冲上来，端的是冲锋枪；第二队冲上来，拿的是机关枪，都是自动武器，火力猛，杀伤面大。后面跟着整营整团的敌人像潮水一般地涌来，气势汹汹，锐不可当。就是打过很多恶仗的胡奇才，对如此凶猛的进攻也遇见不多。每一次冲锋，敌我双方都是成排的人倒下。我军阵地不时传来有敌人攻入的消息。守卫左翼铁路桥头堡的10师28团5连，与敌人反复肉搏10多次，杀得敌人尸横遍地，自己也伤亡110多人。守卫右翼白台山7号阵地的12师36团5连，浴血奋战仅剩连长一人。

在这千钧之际，野战军总部把注意力移向了塔山。林彪亲自给12师指挥所打电话，说：“我给中央军委立下了军令状，攻不下锦州提我的脑袋去见！你们守不住塔山也要提脑袋来见！”4纵司令员吴克华和政委莫文骅，与前沿阵地联系几乎手不离电话机。他们关切地问胡奇才：“老胡呀，你很疲倦吧？要不把你换下来？”胡奇才回答：“没事，我受得了！”吴司令员又说：“那好，你可要顶住！我们会及时补充所需兵力。”这一天，敌我双方激战到夜晚。我军左翼阻击部队轮换了三次。先是10师28团上去，不到半天，因伤亡过大换上30团。战到下午，30团又因伤亡过大交给29团。右翼阵地是12师的部队，也轮换了两次。战斗正激烈时，传来好消息，锦州外

围之敌已被扫除。苦战中的我军指战员备受鼓舞，大家一鼓作气将敌人全部击退。

当天晚上，野战军总部发出指示：攻锦准备已全部完成，明天就要发起总攻。敌人决不会甘心失败，塔山阻击战可能更为激烈和残酷，各部队要做好准备，坚持到底！担负整个阻击任务的第 2 兵团（由前方第 2 指挥所改称）司令员程子华，立即调整兵力：令守备高桥的 11 纵将任务交给两个独立师，前去接替 4 纵 11 师的阵地，11 师作预备队，随时换下 10、12 师一些伤亡过大的团，令后勤系统补充好弹药和食物。

锦州危在旦夕，蒋介石坐卧不安，限令东进兵团 14 日拂晓攻下塔山，12 时进占高桥，黄昏到达锦州。在蒋介石的严令逼迫下，侯镜如不等天亮，指挥 4 个师在飞机、军舰、大炮支援下，沿着我军 16 里长的防线，实施全面猛烈的冲击。胡奇才等指挥前沿部队，以短促火力结合阵前反击的战法，从正面阻击，兄弟部队 11 纵和独立师从侧面迂回出击。打得最激烈的仍是铁路桥头堡、塔山堡和白台山 7 号阵地。铁路桥头堡遭“赵子龙师”反复冲击 8 次，阵地几次失而复得。就在战斗最为艰苦的时候，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代表林彪给胡、江、潘和 10 师发来电报，表扬他们打得坚决，守得顽强，夺得了时间，保证了主力突破敌人的城防，希望再接再厉，夺取最后胜利！这个好消息使广大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大家奋力抗击，终使敌人未能越雷池一步。蒋介石火速救锦计划又成泡影。

15 日拂晓前，我各路部队已先后攻进锦州城内。蒋介石作最后挣扎，再令东进兵团倾全力攻下塔山，企图夺回锦州。侯镜如知道硬冲不行，改用偷袭。也是在拂晓前，“赵子龙师”偷袭队利用我军极度疲劳之机，摸进了塔山堡我 12 师 34 团 1 连阵地的第一道战壕。当敌人向第二道战壕爬进时，被我哨兵发现。他一声大喊，唤醒了抱枪打盹的指战员。大家一跃而起，将摸进来的敌人全部消灭。敌人偷袭不成，用 5 个师分 3 路向我铁路桥头堡、塔山堡、白台山阵地发起集团冲击。其中重点攻击塔山堡。胡奇才等指挥 12 师 34 团与敌人抗击 3 个多小时，将“赵子龙师”打得溃不成军。同样，白台山、铁路桥头堡阵地，也像钉子钉住一样，使敌人寸步难进。侯镜如知道救锦无望，战到下午 1 时停止了进攻。6 时许，我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至此，塔山阻击战告一段落，共俘敌 8000 多人，毙敌团长以下 7000 多人，伤敌不计其数。其中“赵子龙师”伤亡惨重，每个团各剩约 1 个营。兵败之后，蒋介石还不知道塔山是什么样子。10 月 16 日，他乘飞机在塔山上空盘

旋了一阵，见此地无险可守，哀叹地说："没有料到，3 个军在海空军配合下，就是打不过塔山。"其实蒋介石没有料到的何止塔山，辽沈战役后期发生的事他更没有料到。

林彪在战前就充分估计到了攻锦打援的艰巨性，故令 3、4 纵交换作战任务，让猛勇之将韩先楚打义县积累经验再打锦州，让狠稳之将胡奇才夺取兴城后去塔山打阻击。发挥他们一个能攻，一个善守的长处，果然大获全胜。原来林彪葫芦里卖的是知将善用之药。

塔山阻击战结束后，上级通令嘉奖参战有功的单位和个人，12 师 34 团获"塔山英雄团"、36 团获"白台山英雄团"、10 师 28 团获"守备英雄团"、炮兵团获"威震敌胆团"光荣称号。与这些英雄一起奋战的胡奇才、卢燕秋等红安籍将领也受到表扬。

攻克锦州的胜利，使东北战局急剧变化。被我军围困 5 个月的长春守敌，不攻自溃。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鉴于突围无望，守必被歼，在我强大政治攻势下，10 月 17 日，毅然率所属 3 个师 26000 人起义。19 日新 7 军军长率部投诚。吉林省主席兼第 1 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成了光杆司令，欲战不能，也于 21 日放下武器投诚。兵不血刃，长春和平解放。但在此前长期的围城过程中，战斗也是不断。程启文、江腾蛟等在各自的部队积极参与指挥了这些战斗。程启文时任独立第七师副师长，担负围城任务。自进入指定位置后，构筑工事，勘察地形，制定反突围方案，灵活机动打击敌人。5 个多月进行过大小战斗数十次，歼敌逾千人。

长春解放，辽沈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中央军委指示：就地消灭卫立煌集团。

这时东北"剿总"卫立煌手中还有两个兵团 8 个军 24 个师 30 万人。开始，这些人马作为中枢集团都驻沈阳。我军围攻锦州后，其中廖耀湘的第 9 兵团 10 万多人，奉蒋介石之命组成西进兵团，从沈阳出动驰援锦州，被我阻于彰武、新民、新立屯之间。锦州攻克后，有迹象表明，沈阳、彰武等地之敌，可能经锦州或营口实行总退却。为此，林彪、罗荣桓根据军委"消灭卫立煌集团"的指示，决定先不打锦西、葫芦岛，率主力北上，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的战法，先消灭廖耀湘兵团。这个计划报到军委，毛泽东看了很是赞赏，马上批示同意。

十月的辽西，战事一个接一个。锦州硝烟未尽，黑山枪声再起。

10 月 21 日，廖耀湘指挥部队由彰武、新立屯南下。23 日，猛攻黑山、

大虎山，企图打开南下营口的通道，遭我 1、10 纵的坚决阻击。这时我野战军主力已回师到达黑山附近。廖耀湘见南逃无望，改向沈阳突围，又被我 8 纵挫败。南奔东突不成，军乱旗靡，陷入混乱状态。我军下手的时候到了。26 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对廖耀湘兵团展开大规模围歼战。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在黑山以东，大虎山、魏家窝棚以北，饶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纵横约 120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展开向心攻击。我 1、2、3、10 纵、6 纵 17 师和炮纵主力从正面由西向东攻击，7、8、9 纵自南向北攻击，5、6 纵（缺 17 师）由东向西攻击。我军发挥高度的机动作战精神和战斗积极性，不怕疲劳，不怕伤亡，大胆插入廖兵团各部分之间。韩先楚在这次“拦住先头”的战斗中，指挥部队开合得当，有声有色。他率 3 纵和 6 纵 17 师从锦州赶回黑山后，先在该县城北打垮了敌七十一军，接着与兄弟部队一起，向黑山以东及东北地区的敌人展开进攻。当时，敌我双方都处于运动之中。为不失时机地歼灭敌人，他要求各师发现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向哪里集中，剥夺敌收缩整顿的机会，并注意和兄弟部队联系。他说，战斗的目标是消灭廖耀湘，前进的大方向是沈阳。这一措施，充分发挥各师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很快歼灭了敌兵团部和新六军军部。乘敌人群龙无首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他指挥部队继续向敌纵深攻击，在三家子、茶棚奄地区歼敌新一军军部及 50 师一部。在胡家窝棚，3 纵的勇士们冲入敌营，炸掉了敌兵团前线指挥所（廖耀湘此时在村外幸免于死），随后协同兄弟部队再歼敌 105 师一部。

“拖住后尾”的是 5、6 纵队。6 纵 18 师政委袁克服与师长率部队两天一夜强行军 250 里，在厉家窝棚和姚家窝棚跟敌部队遭遇。面临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敌军，他和师长指挥所部从白天打到黑夜，又从黑夜打到天明。许多连队打得只剩下几个人，活着的人仍在死人堆里顽强战斗。当兄弟部队赶到的时候，战士们已经站不起来了。

前线的将士血拼血战，后勤的指战员也不轻松。

敌西进兵团离开彰武时，廖耀湘下令炸断彰武铁路大桥，妄图切断我军主要补给线。担任我东北野战军后勤部长不久的周纯全，面对这个重大困难要求各个纵队的后勤部门，另辟新路，肩挑背扛，畜驮车拉，用各种办法，将弹药物资按时送到前线去。在他的督促下，9 纵后勤部长程儒珍带领后勤指战员，组织和发动当地群众抢修了汽车路、马车路和骆驼路。这三条路修通后，不仅便利了 9 纵的物资运输，还为兄弟部队提供了方便。激烈的战斗

使弹药的消耗量极大，大后方运来的远远不够。程儒珍在冀热辽地区工作多年，与各个地方部队很熟。他一个“借”字出口，各地就将弹药送来解燃眉之急。程儒珍被前线指战员誉为“及时雨”。他日夜操劳，积劳成疾，咯血不止，仍坚持工作，直到辽沈战役结束。还有9纵卫生部政委秦光远，为加强战场救护工作，争取宝贵的救护时间，一方面组织卫生人员冒着枪林弹雨到火线上去抢救伤员，另一方面将医院的容量扩大三分之一，让所有的伤员得到较好的医治。他的这些举措，受到伤病员的称赞，说他是战场上的“保护神”。

前方后方齐努力，辽西围歼创佳绩。我军经过四天四夜的包围分割，至10月28日拂晓，廖耀湘兵团10万余人全部被歼。廖也在黑山西南的中安堡被俘。他仰天长叹道：“10万精兵啦！老天呀！就这么完了！”在北平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得知西进兵团被我军歼灭的消息后，悲伤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蒋介石的内心独白表明，他现在是火烧乌龟肚内疼，比廖耀湘更为难受。

辽西大捷，党中央特致电祝贺。贺电说：“东北我军在两星期内，连获锦州、长春、辽西三次大捷，使敌损失26个整师共约30万人，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望全军再接再厉，为全歼东北匪军，解放沈阳而战！”

为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于辽西围歼战接近尾声时，即10月27日就发出命令，除留一部分兵力继续歼灭敌西进兵团残部外，主力转向鞍山、海城、营口、沈阳，特别是要抢占营口，以防敌人从海上逃跑，然后予以全歼。这意味着辽沈战役进入最后阶段。

在这场大结局的战斗中，跃马上阵的红安籍将领有：

首先是9纵司令员詹才芳。他奉命指挥7、8、9三个纵队，于10月29日自辽西挥师东进。在这路大军里有7纵19师师长徐绍华，8纵副司令员张天云等。他们不顾疲劳，连越绕阳河、辽河、浑河、太子河，行程三四百里，用不到两天时间便拿下辽阳、鞍山、海城。詹才芳亲率9纵队直逼营口，让7、8纵肃清残敌后再南下。30日晚，9纵便对营口形成半圆形包围。

其次是隶属一纵的原独立10师政治部主任江腾蛟、2纵6师师长张竭诚、原独立师副师长程启文、12纵后勤部长毛普安、卫生部副部长李其华、东北野战军军械部长涂其友、从长春南下的东北军工局驻辽东办事处政委涂锡道等，他们参加了围攻沈阳的战斗。

第三是原独立 8 师后隶属 11 纵的副师长陈炎清，还有郑维家、郑炳礼、郑强等，在纵队首长指挥下，在锦州以南阻击可能从山海关内出援之敌。

11 月 1 日，东野 1、2、12 纵兵分 3 路，向沈阳城内之敌发起总攻。此前，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见势不妙，将指挥权交给第 8 兵团司令官周福成，自己悄悄乘飞机逃走。他到北平后，蒋介石见他临阵脱逃，就将他关押起来。卫立煌与蒋介石早已有隙。这一关押使两人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后来蒋介石逃台，卫立煌没有跟去。新中国成立后，他从香港回到了内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同建设新的国家。沈阳城内，主帅逃逸，人心惶惶，周福成难以控局。当我军发起猛攻后，敌人支持不住，一道道防线迅被突破。2 日，我军便占领了全城。2 纵 6 师师长张竭诚指挥该师 16 团直捣敌兵团部，将周福成活捉。树倒猢狲散，13 万多敌军全部被歼，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从此回到人民的怀抱。

沈阳鏖战急，营口敌惊慌。驻营口守敌五十二军乘我 9 纵立足未稳，于 11 月 1 日发起 7 次反击，妄图打破我军包围予以逃走。20 多年前詹才芳在鄂豫皖苏区就是几战成名。他什么样的仗都打过，追歼敌人时如果咬上了你就跑不掉，包抄敌人时如果围住了你就突不出。所以林彪派他飞兵营口。敌人从陆地上反击不成后，改从海上开溜。我军没有舰艇，怎么办？詹才芳当机立断，一面将赶来助战的独立 2 师投入战斗，与 9 纵 3 个师一起对营口守敌发起快速进攻，尽快剥夺敌人的上船登舰时间，一面令炮兵对泊在海岸边上的敌人船舰猛轰，尽量将它摧毁。战至 2 日上午 10 时，营口市区之敌被我军消灭。停在海边的敌运输舰一艘、军用商船 22 只被炸毁。营口守敌除五十二军 1 个军部、1 个师部、3 个团得以乘船逃走外，该军第 2 师、25 师 1 个团、军部直辖运输团等 15000 多人被我军歼灭。营口再次获得解放。

沈阳和营口解放，宣告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在这次历时 52 天的大决战中，东北野战军共消灭国民党军 47 万余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党政府之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东北的失败是“国民党最后一连串军事失利的开始”。

东北大地终于硝烟散尽。东北野战军在黑土地上与国民党军队较量三年，相继歼灭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三员名将麾下 108 万兵力，使东北全境获得了解放。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这对于尔后顺利进行平津战役和加速全国的解放都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毛泽东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兴奋不已，信心十足地说：“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

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决战淮海　分割围歼

1948 年 9 月 24 日，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震慑了南京。第二天，蒋介石紧急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济南失守后的对策，决定“固淮守江，屏障南京”。

同一天，毛泽东在西柏坡收到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的电报，“建议部队不休整，乘胜举行淮海战役，攻歼两淮、海州等地之敌，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研究后，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当即复电：“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于是，淮海大战就在西柏坡和南京的对决中展开了。

这时，敌人在中原有刘峙、白崇禧两个集团，分踞徐州和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刘峙集团辖有 4 个兵团和 3 个绥靖区的部队。白崇禧集团辖有 3 个兵团和 3 个绥靖区的部队。蒋要“固淮守江，屏障南京”，重点在徐州，武汉是其次。刘峙集团共有 34 个军，82 个师，约 70 万人。其具体部署是：黄百韬第 7 兵团在新安镇地区；李弥第 13 兵团在徐州以东地区；邱清泉第 2 兵团在徐州西的黄口、砀山地区；孙元良第 16 兵团在蒙城待机；李延年第 9 绥靖区在海州；冯治安第 3 绥靖区在韩庄；刘汝明第 4 绥靖区在商丘。10 月下旬和 11 月初，敌人判断我军可能发动攻击，两次收缩兵力，形成一点（徐州）两线（徐州至海州的陇海段和徐州至蚌埠的津浦段）的部署。白崇禧集团的任务是：一、防御平汉路南段及长江中游地区，拱卫南京；二、用追击的办法，牵制中原野战军，使其不能与华野联合作战；三、必要时支援刘峙集团。

我军在中原也有两支野战大军：一是华东野战军，有 15 个纵队和 1 个特种兵纵队，约 38 万人；二是中原野战军（1948 年 5 月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此名），有 7 个纵队，约 13 万人；华东、中原军区所辖各级地方武装有 21 万人，总兵力约 72 万人。与敌刘峙集团的兵力相比虽不占优势，但我军士气旺盛，华北、华东、中原解放区已相连接，机动兵团作战能力大大加强，具备了更大规模联合作战的条件。因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实施淮海战役。

10 月 11 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亲自起草《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提出此次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

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阶段攻歼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在淮阴、淮安地区作战。三个阶段大概共需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后来根据全国战局和中原、华东战场的敌情变化，扩大了淮海战役的规模，要求歼敌刘峙集团于淮海或长江以北。

为隐蔽作战意图，迷惑敌人。淮海战役前夕，毛泽东让华野在鲁南佯装休整，中野兵分两路驰骋中原：一路由陈毅、邓小平率 4 个纵队出击陇海路上的郑州等地，吸引邱清泉兵团和刘汝明 4 绥靖区部队西顾；一路由刘伯承、李先念、邓子恢率两个纵队和豫西、桐柏、江汉军区的 3 个独立旅，将白崇禧集团的黄维、张淦兵团牵制在平汉路西，使其不能东援。

11 月 6 日，敌又收缩。黄百韬兵团自新安镇开始西撤。华东野战军乘机出击，在粟裕指挥下，以 6 个纵队（内有中野一个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以两个纵队隔断该兵团与李弥兵团的联系，以 4 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旅南北对进，隔断李弥兵团、第 3 绥靖区与徐州的联系；与此同时，陈毅、邓小平指挥中野 4 个纵队迅速东进，阻击邱清泉兵团、4 绥靖区部队和孙元良兵团向徐州靠拢。这样一来，刘峙想抱团未果反被分割成几块。接着，以华野为主，中野配合，实施本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作战。参战各部队中的红安籍将领有华野 1 纵副司令员刘飞、1 纵 2 师参谋长戴克林，2 纵 4 师副师长周世忠、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7 纵 19 师师长熊应堂、副师长吴怀才、副政委李正清，8 纵司令员张仁初，9 纵 27 师参谋长罗映臣，10 纵政治部主任陈美藻、胶东军区 5 师参谋长钟光国等；中野 2 纵 4 旅旅长赵鹤亭，3 纵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郑国仲、刘昌毅、7 旅副旅长何德庆，4 纵政委谢富治、13 旅旅长黎锡福，6 纵司令员王近山，9 纵司令员秦基伟，10 纵 29 旅旅长李定灼、30 旅旅长刘福胜，11 纵 32 旅副旅长程绍祥，12 纵中原独立旅参谋长吴昌炽、35 旅旅长闵学胜等。他们按照统一部署，各显其能，指挥各自的部队英勇奋战，不断传出捷报。

11 月 7 日，中野 1、3 纵与向徐州收缩的敌第 4 绥靖区刘汝明部赛跑，在张公店追歼该部一个师，然后与 4、9 纵和华野 3 纵、两广纵队继续逼近徐州，去完成阻隔敌人的任务。华野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同兵团其他首长一起，指挥 7、10、13 纵分三路飞驰南下，直插徐州与台儿庄之间，将敌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包围。7 纵 19 旅的熊应堂、吴怀才、李正清各带一个团从韩庄迅速渡过运河，直取贾汪，堵住冯治安部南逃要路。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地下共产党员、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



1987 年 6 月，作者（中）访问周世忠将军（左）后请他题词。

根据党的指示，积极策动和组织战场起义。这时，熊应堂部接到上级新的命令：现在的任务是变堵截为掩护，迅速做好准备，掩护敌第三绥靖区的部队起义。作战任务一下子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熊应堂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他和吴、李等商议，决定做好两手准备：既防徐州和李弥兵团出击，又防起义有诈。他说掩护比堵截任务不是轻松而是更重，要求全旅指战员出色完成这次特殊战斗任务。8 日，在我方组织安排下，何基沣、张克侠率敌五十九、七十七军（每军辖两师）三个半师起义成功，在刘峙集团的防御外围开了一个口子。徐州的东北屏障既除，王建安即率山东兵团迅速投入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他令部队抢渡不老河，占领曹八集，截击黄百韬先头部队。

黄百韬兵团有 5 个军，除二十五军辖 3 个师外，其余每军辖 2 个师，共 11 个师。向西撤时，尽管他令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并进，但这是退却不是进攻，士气低沉，秩序混乱，步调不能一致。当他的先遣队 100 军所辖 44 师进到徐州东北的大许家、曹八集时，王建安指挥部队将其全歼，并在徐州东部大庙一带占领阵地，准备歼敌打援。

这时，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华野其他各纵队，正在扫除敌在运河东岸的掩护部队。其中一纵负责扫除左翼之敌六十三军。该敌已靠近运河边的窑湾镇。我军如攻击不当，敌人有可能渡河逃走。纵队司令员叶飞因病未随军前

往，由副司令员刘飞代理指挥作战。他迅速召开会议，在听取师以上干部的意见后，决定将所属三个师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对敌进行围攻。另从2师抽调一个营，由该师参谋长戴克林带领渡过运河在对岸设堵，以防敌人渡河西逃。11日黄昏，刘飞一声令下，一纵指战员向六十三军奋勇进攻，敌人支持不住，打算渡河西逃，有的已跳下河去。戴克林在对岸指挥部队猛烈阻击，将敌压住。经过8小时激烈战斗，翌日晨结束，全歼敌人一个整编军（辖两个师），共13000多人。敌军长陈章在战斗中被击毙，其余军、师、团长被俘。刘飞以一个纵队歼敌一个军，开创解放战争以来的先例，在全军中引起轰动。战后，各报记者纷纷采访。刘飞开始不愿意谈，但不讲记者们不走。没有办法他才说："现在是大兵团作战，局部看来是一个打一个，但整体看来都在起作用。窑湾战斗不是我刘飞一人的杰作，上有前委和野司指挥，下有师、团、营、连、排、班干部和广大战士奋战，上下一齐努力，浴血苦战，才获得了窑湾战斗的胜利。"这番谈话可以看出刘飞不但谦虚谨慎而且军政素养很高。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是一位扛码头出身的战将。这位"码头"将军打败了军官学校毕业、外号"左笔将军"的陈章。

华野各纵队渡过运河后，猛打猛追，将敌黄百韬兵团合围在碾庄及其周围狭小地区内。

处于中间位置的黄百韬兵团被包围了，蒋介石惊讶不安，连下四道命令：一令黄百韬坚守待援；二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解围；三令从东北撤回来的部队组成第6兵团（由李延年任司令）和将4绥靖区部队改为第8兵团（由刘汝明任司令），从蚌埠沿津浦路北援；四令黄维兵团从阜阳向蒙城攻击前进。蒋介石将这么多的兵力投向徐州，是想来个一石二鸟——既解黄百韬之围，又抓住共军决战。这是自重点进攻山东以来他梦寐以求的。为了加强徐州会战的领导，他还将在辽沈战役中因病脱身的杜聿明调到徐州任"剿总"副总司令。蒋介石下这么大的赌注，当然是想扭亏为"赢"。

运筹于西柏坡的毛泽东是不会让蒋某人的图谋得逞的。他没有调兵遣将（实际也无兵将可调），只是根据战场新的变化形势作出新的决策，然后向中野、华野发出三个电示：

一、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前，中野须攻占宿县，切断敌补给线，同时，可阻止南敌北援；华野在围困黄兵团的同时，要做好打援准备，既要防徐州之敌南逃，又要坚决阻住李弥、孙元良兵团增援。

二、李先念、邓子恢所率中野2、6纵队迅速从平汉路西赶到路东，抢

在黄维兵团前面，从正面阻止该敌的由蒙城前进。

三、由中野、华野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讨论重要问题，刘、陈、邓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就这样，南京和西柏坡的对决，在战役打响后再一次展开。

11 月 10 日，刘、陈、邓令中野 3 纵和 9 纵一部攻占宿县。3 纵司令员陈锡联和 9 纵司令员秦基伟接受任务后，秦基伟对陈锡联说，我把 27 旅交给你指挥，我率主力南下固镇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援，祝你马到成功！陈锡联握住秦基伟的手说："彼此一样！"这是出太行山以来，两位红安战将第一次在淮海合攻一役。

接受任务后，3 纵连夜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陈锡联传达了刘、陈、邓首长的指示和野司的部署，讨论了作战方案，最后确定的部署是：8 旅从东北面包围宿县，夺取东关、北关和宿县火车站，扫除外围据点，并破坏符离集至宿县间铁路，然后作纵队预备队；9 旅从西面包围宿县，切断宿县至固镇间铁路，从西门攻城，9 纵 27 旅作为攻西城的预备队；7 旅在东门担任主攻。任务明确以后，陈锡联强调说，我纵从大别山出来后，没有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广大指战员求战心切，士气很高，这是好的一面。但也要看到缺员多，物资不足，装备较差等不好的一面。大家要做好政治工作和战斗准备，扬长避短，保证夺取这次战斗的胜利。

宿县位于徐州与蚌埠之间，有"南徐州"之称。秦末陈胜、吴广在此起义。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是敌人的后方补给基地，存有大量武器、弹药、衣被、装备等军需物资。驻有黄百韬兵团二十五军 148 师，交警 16 总队、装甲第 7 营等，共计 12900 多人。城墙高大厚实，护城河又宽又深，工事密布坚固，易守难攻。打宿县是一场攻坚战。3 纵过去也曾攻城破寨，但遇到这样坚固的城池不多。因此，纵队领导对于攻城特别关注。

战斗于 12 日开始，9 旅一举夺取西关，直插城南，到第二天拂晓完成了对西、南面的包围。8 旅也在同一时间内完成了对东、北面的包围。在战斗中，两个旅共歼敌近 300 人，毁装甲车一辆，除东关因街道太长未全部占领以外，其余三关都已控制。敌人在撤进城内时，将南门、西门、北门外的护城河桥毁掉了，给我军进攻带来很大困难。

14 日下午，陈锡联与纵队其他领导和各旅负责人深入现场察看地形，进一步研究攻城的具体打法。经过大家研究以后，决定部署不变，攻城重点放在东西两面。至于具体打法，陈锡联说，东城以 7 旅为主攻 8 旅配合，西城

以9旅为主攻，27旅配合。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在16日拿下宿县。为了迷惑敌人，总攻开始时，先实行南北佯攻，给敌人造成错觉，制造混乱。然后从东西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猛攻。炮步要配合好，步工要结合好，力争一鼓作气破城而入。当然也要想到出现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一仗事关全局，刘、陈、邓首长和野司十分关心，我们要用宿县战斗的胜利去迎接淮海大战的更大胜利。会议将要结束时，野司来电通知：将1纵和9纵的炮兵营配给3纵攻城。大家听了高兴不已，更增加了必胜的信心。

当时，7旅决定拿下东关，以扫除攻城障碍。东关西接县城，东连车站，有近三里长的街道。8旅只夺取了中间一段，与县城和车站相接的两头尚未攻下。现在，7旅在8旅的配合下，向盘踞在两地的敌人进行猛攻。敌人支持不住，竟放燃烧弹烧毁商店和民房，阻止我军进攻。为了抢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我军边战边救火。敌人趁机从城内出动大批步兵，用装甲车开路进行疯狂反扑。我军进攻受阻。消息传到纵队指挥所，副司令员刘昌毅听到后骂了起来："他娘的，我倒要去看看那些龟孙子厉害到什么程度！"他对陈锡联说："陈司令，我下去看看吧。"司令员尚未回答，他就带上警卫员和参谋走了。陈锡联只好摇摇头说了一句："刘昌毅，还是那个火爆性子。"刘昌毅去了东关前线，让8旅组织人救火，自己和7旅副旅长何德庆指挥19团打退敌人反扑，缴获装甲车一部。他坐上装甲车继续指挥部队夺取东关，然后又夺取了火车站，彻底扫除了障碍。郑国仲也提出到西关去。他说："西关是两个兄弟旅联合作战，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协调，就让我去吧！"陈锡联说："我打算总攻之前，纵队领导再分头下去，现在你们两位副司令主动提前到一线去，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希望及时交换情况，共同把这次战斗指挥好。"

陈锡联、郑国仲、刘昌毅虽同乡但住地不同。陈锡联家住高桥区，郑国仲家住紫云区，刘昌毅家住七里区。三家的住址正好是个三角形。物理学上说三角形的稳定性好，三位将领的稳定性也好。每次战斗，总是稳稳地夺取胜利。

15日下午5时，总攻开始。3个炮兵营的几十门大炮一齐开火，一条条火龙飞向目标，打得地动城摇。敌军阵地上尘烟四起，一片火海。趁着浓烟滚滚，火势熊熊，英勇的工兵们在火力掩护下，对东城门进行连续爆破，最后炸开一丈多宽的缺口。突击队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后，东门突破取得成功。城西先要架桥过河才能攻城。敌人凭借明碉暗

堡封锁护城河，使我军无法接近。8旅旅长找战士们献计。一位四川籍战士建议用滑竿（竹竿）搭桥，上面铺木板。他去找来一捆滑竿和几块木板演试给大家看，都说可以。然后，在炮轰10分钟后，集中火箭筒摧毁敌人的暗堡，工兵们很快完成了滑竿铺板架桥任务。工兵实行连续爆炸，将城墙爆开一个缺口，突击队就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接着一个连、一个营冲了进去。夜11时，7、8、9、27旅在城中心十字街口胜利会师。这时，敌人大部分被歼，只剩敌护路司令张绩伟带着司令部300余人逃进城西南一角的福音堂内顽抗。当我军劝降无效后，7旅21团5连攻入堂内，班长李振堂打开刚缴获的一箱箱手榴弹，让战士们一齐投向敌人，敌人鬼哭狼嚎，乖乖举手投降。清点俘虏时不见张绩伟，便一个个盘查。当查到一个满脸抹了锅底灰的人，诡称自己是兵营管理所的中尉书记，名叫方晓号。21团团长突然吼了一声，说："不对！你叫张绩伟！"对方马上低下头，连连说："是，是，敝人张绩伟。"就这样，敌津浦路护路中将司令张绩伟以下12964人无一漏掉。战斗结束正好是16日凌晨2时。

在中野3纵进攻宿县的同一天，华野1、4、6、8、9纵向被围于碾庄的黄百韬7兵团也发动了进攻。各纵队发挥我军夜战近战的特长，以近迫作业接近敌人，插入各村敌人之间，逐点逐村夺取，逐个予以歼灭。到16日，我军已歼敌7兵团之四十四、一百军和二十五、六十四军各一部，连同前歼的六十三军和二十五军148师，黄百韬兵团只剩一个多军。

19日晚，总攻开始。华野5个纵队向碾庄发起猛攻。黄百韬作困兽斗。战至22日，碾庄被攻破。黄百韬赖以保驾的六十四军159师发生了动摇，师长率部投降。一直盼救兵未盼到的黄百韬陷入了绝望中，在其总部被攻破的那一刻开枪自杀了。他的遗书只写了八个字："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斗到此胜利结束。这个阶段华野和中野共歼灭刘峙集团18个整师（包括起义三个半师），切断了徐蚌线，孤立了徐州之敌，分割了刘峙集团各兵团的联系。为尔后各个歼灭敌人打下了基础。

对第二个阶段作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也有电示，要求华野和中野各歼敌一两个兵团。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刘、陈、邓向中央建议华野只监视徐州之敌，以一部兵力支持中野着重歼灭黄维兵团。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建议，决定第二阶段作战以歼灭黄维兵团为主。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部队，辖十、十四、十八、八十五军和第4快速纵队，共约12万人。其中十八军是陈诚一手扶植起来的，全系美

械装备，各级军官清一色的军校毕业生，受法西斯教育很深，属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该军仗着装备好，机械化程度高，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我军攻占宿县切断徐蚌线和全歼黄百韬兵团，连点了蒋介石的两次痛穴。他痛定思痛，决定令南线的黄维、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和徐州的孙元良、邱清泉兵团南北对攻，打通徐蚌线，挽救败局。这 5 个兵团除黄维外，都被我重兵迟滞，前进很难。只有黄维未受其制，兵分左、中、右三路，从蒙城以东浩浩荡荡向宿县涌来。他哪里知道我军正张网以待。

11 月 24 日，黄维兵团的中路军进至宿县西南的南坪集，中野 4 纵一部与其激战一天，然后佯装败退。敌人迅速占领该镇，并有一部分渡过浍河。黄维自觉不妙令其撤回。25 日，由 4、9、11 纵队和独立旅等组成的东集团，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从东北方向围攻而来；由 1、3 纵队组成的西集团，在陈锡联指挥下，从西面围攻而来；黄维见势不对，掉头南进，去与李延年兵团靠拢，又被由 2、6 纵队、陕南 12 旅等组成的南集团，在王近山指挥下，堵住了南逃之路。就这样，中野 7 个纵队在华野 3、7、13 纵的协同下，将黄维的 12 万人马，围困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东西宽不过 20 里、南北长不过 15 里的范围内。

本是增援，反而被围。自视是天马行空、不可一世的黄维，现在也慌了手脚。他一面令部队拼命突围，一面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得知后只好放弃打通徐蚌线计划，令李延年兵团前去解围，却遭到我华野 3、7、13 纵的坚决阻击，进展缓慢。黄维害怕被歼，决定组织更大规模的突围。这个情报，被八十五军 110 师我党地下工作者杨振海送到了 6 纵指挥部。

6 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接见了杨振海。他向两位首长报告说：“蒋介石昨日电令 12 兵团向蚌埠方向突围，限明日（27）与李延年兵团会师。今天上午黄维召开军、师长会议，决定明晨 6 点向东南突围，抽 4 个师作第一梯队，由飞机掩护，坦克、大炮开路，齐头并进，冲破包围。”说着他拿出一张地图摊在桌上，只见地图上用蓝色铅笔画了 4 条很粗的箭头指向我军阵地。“这 4 个师中有十八军 11、118 师，十军 181 师和八十五军 110 师。”他指着地图说，“我师位置在右翼，即靠西边这个箭头。廖运周师长想乘明日突围之机，举行战场起义。为避免误会，特派我前来联络。请首长给 110 师指定起义路线。”

前些时 6 纵在豫西牵制黄维兵团时，杨振海曾为 110 师起义事前来联系过。所以这次谈话双方都直截了当。

杜义德问："110 师起义是否有诚意？还有什么要求？"

杨振海答："有诚意。廖师长担心起义后，他在武汉的家属会被害。"

王近山听完，请杨振海暂去休息，待研究好了再请你来。

纵队首长齐集指挥部。大家讨论时不约而同把焦点集中到 110 师是真起义还是假起义的问题上。真起义好办，假起义怎么办？兵不厌诈，真真假假，必须作出正确的判断。王近山边听大家发言边分析思考。讨论了一会，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等着他拿意见。会场沉寂了一会，王近山站起来讲：

"110 师起义看来有诚意，其根据是原已来联系过。但我们要有对付假起义的准备。真起义更好，假起义也不怕，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我不想让起义部队经过我纵深内的村庄，以免造成麻烦。另划一条通道让他们经过。在通道两旁，各部署一个团的兵力，构筑临时工事，如有意外，两边同时开火，将哗变之敌消灭在开阔地带。如无意外，则作为伏兵掩护 110 师顺利通过后，负责歼灭跟在 110 师后面突围之敌。另以 5 个半团的兵力顶住敌人 4 个师（作起义不成打算）的攻击，要准备与阵地共存亡，决不准放跑敌人。除此以外，将其余 4 个团作纵队总预备队，保持这个拳头，哪里吃紧，我就用这个拳头打到哪里去，不搞分兵把口。你们看这样部署还有什么问题。"

王近山提出的办法，确切地说是他的果断和决心，获得大家一致赞成。杜义德说："好得很！先报告野司，同意后立即调整防务。"王近山亲自向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作电话汇报，得到了首肯。然后请出杨振海，请他向廖师长转达三点要求：

第一，起义时间明早 6 时，联络信号是三发枪榴弹升空。

第二，起义部队必须按我们规定的路线走，我们派兵掩护。如果离开这条路线，我们就开火。说完，他让杨振海在地图上标出路线来。

第三，起义部队过来以后，到我指定地方集结，不能随便驻防。为了保证起义部队不走错路线，到时我们派人前去领路并负责双方联系。

杨振海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连夜赶回去复命。

11 月 27 日，黄维用廖运周 110 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跟进，向东南方突围。这天早晨，雾气弥漫，能见度低，天助事成。110 师成 4 路纵队通过我军阵地。刚一走完，所开的口子马上封住。跟在 110 师后面的敌人突然遭到猛烈炮火打击，伤亡惨重，被迫退了回去。这时引起了黄维的注意。他让兵团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同廖运周联络。廖运周说我师冲过来了，

但又陷进了新的包围圈，已是动弹不得。廖运周用这番话打发了他的上司，信不信由他。这时，我军派去领路的联络员促廖运周通电起义。廖说要等两天再说。联络员不好再催，请他迅速与我 6 纵联系。廖同意了。几小时后，王司令亲自打电话告诉廖运周：你的家属已安抵河南，请你放心。廖运周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抱住电话筒，一个劲地说感谢感谢……王近山说："廖师长，不要客气了！要感谢的话，请你赶快将炮兵营借我一用怎么样？"廖运周说我马上照办。没过多久，双堆集南面 6 纵阵地上多了一个炮营，正在使劲地用黄维的炮弹打黄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黄维兵团毕竟是敌军中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它的突围计划被我军粉碎后，很快调整部署，稳住了阵脚，进一步加强工事，准备死守待援。

12 月 6 日下午 4 时半，我军东、南、西三个集团，同时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敌人依赖大量的地堡群、坚固工事和各种兵器组成严密的火力网，阻挡我军前进，并不断在坦克、火炮的支援下反扑，但挡不住我军的猛烈进攻。敌人的阵地一块接一块的被瓦解，控制的地盘一天比一天缩小。一周后，刘伯承、陈毅发出《促黄维立刻投降书》。黄维拒绝投降。

12 月 15 日下午 5 时，我三个集团发起最后攻击。王近山指挥南集团迅速突破双堆集的核心工事。陈赓、谢富治指挥东集团、陈锡联指挥西集团也突破敌人重重防线去与南集团会合。三只铁拳一齐砸向敌人的指挥中心，顷刻土崩瓦解，无数敌军纷纷缴械投降。混乱之际，黄维、吴绍周企图逃跑，被西集团 3 纵 7 旅警卫营活捉。敌兵团副司令胡琏只身逃脱。至此，蒋介石的主力兵团之一的黄维兵团 12 万人全部被歼。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逃到淮河以南。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又胜利结束。

在黄维兵团被围后的第三天，即 11 月 28 日，蒋介石决定将徐州兵力撤出。早想撤退的"剿总"司令刘峙和副司令杜聿明，决定将总部迁往蚌埠。随后刘峙乘飞机去了蚌埠，杜聿明留下指挥。30 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由徐州经肖县向永城逃去。出肖县不远接到蒋介石电令，要他取捷径去救黄维。他立即叫来各兵团司令开会。会上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去救，有的不主张救，争来议去七八个小时无法统一，将逃跑的宝贵时间白白浪费掉了。这时，华野 11 个纵队追击而至。杜聿明命令部队且战且逃。但再想逃掉已不可能。最后被我军合围在肖县西南的陈官庄、青龙集一个狭小地区。杜聿明采取三面掩护，一面突击，逐次前进的战法，继续挣扎着想突破包围圈。然而我军铁桶似的包围圈越围越紧。各兵团司令似乎有点泄

气，要求副司令官拿出解救的高招。杜聿明左思右想，决定分散兵力，多路突围。令邱清泉兵团向南猛攻，李弥兵团向西突击，孙元良兵团向西北冲杀……，任凭敌人怎样猛攻猛打，我军的包围圈不但未被打破，反而越收越小。俗话说："水不急，鱼不闹。网不收，鱼不跳。"孙元良第一个跳起来了，不等杜聿明下令，指挥他的16兵团单独突围。我军有意放他出来歼灭。华野8、9、10纵将其堵住。8纵司令员张仁初指挥他的部队给孙元良一顿痛击，打得孙元良招架不住。狡猾的孙元良事先就换了装，悄悄地从吉普车内滚下来，从人缝中只身逃掉了。16兵团全部被歼。杜聿明迅速调整好防守兵力，与黄维一样，死守待援。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歼，剩下杜聿明集团成了淮海战场一个孤岛上的孤军。

华野代司令员粟裕下令从东、西、北三面加强攻击，重点放在邱、李两兵团的结合部。我军连续猛烈进攻，占领了敌人大部分的外围据点。杜聿明的阵地越来越小，加上天寒地冻，缺乏粮弹，度日如年。他再三向蒋介石呼救，回复老是一句话："无兵增援，应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杜聿明只好对天长叹："末日到了。"

粟裕再次令各纵队发起全线攻击，要求尽快拿下敌人控制的中心地点陈官庄。正在这个关键时候，西柏坡来电，毛泽东电示暂停进攻，部队原地休整。广大指战员开始不理解，又是议论，又是猜测。他们说，准是毛主席又要导演一场新戏，开锣之前落一落幕，然后再上演。

的确是这样。这出新戏是平津战役。当时我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已经盯上了北平、天津的敌人，先头部队已抵城郊，对敌尚未形成包围。如果迅速歼灭杜聿明集团，恐吓跑平津之敌。为了稳住敌人阵脚，故毛泽东命令我军在淮海战场暂停进攻。兵书上叫"欲擒故纵"。

两周后，东北、华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平津之敌的包围，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战斗继续进行。在向敌人发起攻击之前，我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希望杜聿明等认清形势，放下武器，弃暗投明，但遭到拒绝。而下级官兵比他识时务，整排、整连、整营陆续不断地向我军投诚。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1949年1月6日，总前委命令各参战部队发起总攻。李弥抵挡不住，逃进邱清泉防区。我军乘胜将敌人防御体系打破。9日，我军攻进敌中心阵地。杜聿明指挥部队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企图逃跑。我追击和堵截部队打得敌人寸步难行，纷纷瓦解。敌第7兵团司令邱清泉，冥顽不化，自毙身亡。第13兵团司令李弥只身逃走。徐州"剿总"

副总司令杜聿明逃到永城被华野4纵俘虏。战斗至10日，第三阶段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自薛城，南抵淮河的广大区域内进行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歼灭战。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5天，歼敌一个“剿总”司令部、5个兵团部和一个绥靖区的部队，共22个军、56个师（内有4个半师起义），总计555000人。至此，国民党在华东和中原战场上的精锐师团已丧失殆尽，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皆被解放，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处于我军直接威胁之下。兵败蒋倒。大战结束仅11天，蒋介石宣布“引退”，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遂陷入土崩瓦解之中。

淮海战役时间长，战场广。除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鏖战在主战场外，还有各军区、军分区的部队参加战斗。这些地方部队中红安籍将领率部参战的也有很多。

在战役第一阶段，原中野4纵13旅副旅长后任豫西军区6分区司令员的黎锡福，带领部队配合中野2、3纵，在商丘东歼敌181师，取得首战胜利。战役第二阶段，江淮军区34旅政委李世焱与旅长一起，同华野13纵在宿县东南的灵璧，全歼增援黄维的敌十二军238师。第三阶段，冀鲁豫军区独立1旅旅长况玉纯、独立3旅旅长闵学胜追击邱清泉兵团，共毙俘敌5000多人，缴枪4000多支、炮20多门、汽车20多辆，使向永城以西逃窜之敌无一漏网。

位于平汉路西的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为牵制敌“华中剿总”白崇禧的兵力，频频出击，遍地开花。参与指挥战斗的有桐柏军区1分区政委刘福胜、副司令员殷国洪、3分区司令员李定灼、参谋长李一等，他们率部配合军区部队于1948年12月23日攻克樊城，歼敌十五军一部共4000多人。迫使驻襄阳东津湾守敌暂编第2师一部1000多人向我军投诚。江汉军区独立旅参谋长吴昌炽、独立2旅参谋长秦振、2分区政委刘友海等所在部队，在军区首长指挥下，发起荆门战役，歼敌七十九军298师、60师和保安大队近9000人，俘其军长方靖。他们用自己的战斗成果来欢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地处战略要地大别山的鄂豫、皖西军区，在淮海战役期间，加倍地受到敌人进攻。白崇禧企图将我地方武装消灭或逐出境外，以便将大别山作为他固守长江的屏障，但是他的算盘打错了。鄂豫军区副司令员郭天民与司令员王树声一起，率领教导1、3旅和各分区的部队，用游击运动战粉碎敌人进

攻。其中参与领导作战的有教导 1 旅副旅长赵鹤亭，2 分区司令员戴克明，3 分区司令员罗厚福、副司令员曾广泰、参谋长熊心乐，4 分区司令员邹国厚，5 分区副司令员黄宏伸，以及刘敏、汪进先、徐锡煌、马友才、张绍基等，共歼敌 9000 多人，先后收复了黄安、礼山、经扶、光山、麻城、商城、固始、金寨等县城，并打通了与江淮解放区的联系。皖西军区独立旅在旅长马忠全率领下，1948 年 12 月 21 日在庐江县西，全歼南逃的河南省保安旅，俘敌 2000 多人，缴轻重机枪 30 多挺，火炮 17 门，汽车 7 辆。在此前后，独立旅在各分区部队配合下，还沉重打击了六安、霍山、宿松、太湖等县的保安团，基本肃清了这几个县的反动武装。鄂豫、皖西两军区所取得的军事胜利，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淮海战役，巩固了大别山根据地，还为以后我大军渡江作战建立了可靠的前进阵地。

抢救伤员，保障供给，是淮海战役期间后勤部门两大主要工作。在这两条战线上，同样出现了红安籍将领忙碌的身影。俗话说，“伤人一万，自损三千”。淮海战役共歼敌 55 万多人，我军伤亡亦有 10 多万。中野 3 纵副司令员郑国仲回忆围歼黄维兵团时说：“敌 12 兵团副司令胡琏（兼十八军军长）亲自指挥十八军 4 个团，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向我 3 纵 9 旅 26 团杨大庄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我 26 团在纵队炮兵支援下，采取连续抗击、反冲攻击、白刃格斗等战法，从上午 9 时打到下午 5 时，杀得敌人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纷纷后退。后得到 8 旅支援将敌人全部打了回去。这次战斗 8 个小时，毙敌 1500 多人，炸毁坦克两辆，26 团伤亡 500 多人，取得了我一个团抗击敌 4 个团攻击的胜利。”这个战例证实那句俗话说的损人与自损的比例不错。一个大战役，天天有战斗，且不止一处，而是几处、十几处，伤亡人数以千计。这样多的伤员必须很快得到救治。在各医疗站、院参加指挥抢救的仅红安人就有中野 2 纵卫生部政委梅宏德、3 纵卫生部长潘阳泰、6 纵卫生部长兼政委詹少联、9 纵卫生部副部长熊志生、冀南军区卫生部政委徐青山、冀鲁豫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何子成、华东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陈行庚、华东军区卫生部野战第四医院副院长王汉臣、华东军区后方第一医院院长金仕华等。他们在“伤员命在旦夕”的时刻，不仅做好后勤服务，有的还亲自动手抢救。如詹少联就曾千百次抢救伤员，成了军中有名的战伤外科专家，许多危重伤员在他的抢救下重新回到了战斗岗位。

至于后勤保障，更是一项浩繁的工作。物资多不说，光是支前民工，据统计达 560 万。民工与参战部队的比例大概是七比一，就是说前方一个战士



1985 年 4 月，作者访问何子成，听他讲淮海战役中的后勤工作。

作战，后方七个民工送粮送弹。曾任山东军区兵站主任、支前储运处处长的何仁堂回忆说：

“当时，我在山东搞支前，向前方运送粮食不是几万斤、几十万斤，而是几百万斤、几千万斤，另外还有弹药。仅沂蒙地区就动员了上百万民工送粮送弹，真是浩浩荡荡，车轮滚滚。他们自带的口粮吃完了，绝不动一粒军粮。担架队冒着生命危险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在刺骨的风雪中脱下自己的棉衣盖在伤员身上，遇到敌机扫射，他们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解放区的群众，日夜不停地为前线战士碾米、磨面、缝军衣、做军鞋。他们真正做到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可以说没有人民的支援，整个淮海大战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

淮海大战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正如陈毅司令员在《记淮海前线见闻》一诗中所赞颂的那样：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健行问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如果说前方打仗是流血的战斗，那么后方支前就是流汗的战斗。我们不能忘记那几百万民工英雄和后勤战线广大的组织领导者。其中红安人有：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罗应怀、后勤部军需部长汪运祖，后勤部物资处长郑重、后勤部直属工作部副部长夏克、后勤部后备团供给部副部长王佑林、华野 12 纵供给部长吴大胜、中野 3 纵供给部处长刘必正等。是他们与广大民工同心协力，密切配合前线作战，才确保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决战平津　以打促和

1948 年 11 月，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多事之月：辽沈会战失败，淮海会战开始不久几十万大军被分割包围，太原被困……国军在战场上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为了挽回败局，他想将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 60 万部队南撤，固守长江，保卫南京，稳住阵脚。

傅作义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对蒋早有戒心，现在更是同床异梦。傅作义不是不撤，而是想西撤，回绥远老巢去，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但他心里所想嘴里不说。当蒋提出南撤，傅作义用托词说，东北共军大战后急需休整，不会急于南下，现在谈撤退为时过早，主张坚守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地，以稳定全国的军心。美国为了在华利益，支持傅作义守平津，并愿提供直接援助。于是，平津是撤是守，经过蒋、傅、美三方惟妙捏合，暂时统一为守了。蒋介石授傅作义以“华北军政全权”，要求将其主力集中于北平、天津、唐山三角地带，控制海口，以部分兵力维持平绥交通，并准备视机南撤。但傅作义没按蒋介石的要求办。他将本系军队置于平绥线保障西撤的通道，将蒋系军队置于北宁线保障从海上南撤的通道和抗击东北共军的攻势。这样，傅作义的 60 万部队便以北平为中心，东起北宁线的唐山，西至平绥线的张家口，在长约 1200 里的交通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然后将平、津、唐划分为三个防区。

善于审时度势掌控战局的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场的新变化和傅作义的新

部署，与朱德、周恩来等研究，决定集中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和地方部队100万人，分割包围平津之敌，就地各个歼灭之。毛泽东还亲自制定《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并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电令，部署如下：

一、令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夜行晓宿，隐蔽入关，首先隔断平、津和津、唐之间国民党军的联系，将其分割包围，然后各个歼灭；二、令徐向前、周士第率领的华北第一兵团停攻太原，杨成武、李天焕率领的华北第三兵团撤围归绥，以免攻克诸城后，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而下决心撤逃；三、令华北第三兵团首先在平绥路中段发起攻击，包围柴沟堡、万全、张家口地区的守军，吸引傅作义部西援。然后杨得志、罗瑞卿率华北第二兵团，程子华、黄志勇率东北先遣兵团（由4纵和11纵组成，于10月底从辽西悄悄进抵河北遵化、蓟县地区）出击平张线，以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潜出平、津、唐之间打开主要地区的战局争取时间；四、通过跟傅作义谈判，将他稳住。

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合战平津，需要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林为书记，统管平津等地一切事宜。两军作战则由林彪、罗荣桓统一指挥。

根据军委的部署，平津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分割包围，断敌退路。

兵不厌诈。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前，毛泽东电授机宜，要他们大肆宣传、大造各部队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等地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声势，用以迷惑敌人；然后于11月23日将主力分为三路，从锦州、营口、沈阳向北平、天津、塘沽、唐山等地隐蔽前进，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1月25日，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撤围归绥后，由集宁东进，在杨成武、李天焕指挥下，根据毛泽东“迅速包围张家口之敌，吸引北平敌人来援”的电示，于29日向张家口外围敌人发起攻击，打响了平津战役的第一枪。30日，攻克怀安、柴沟堡、万全、孔家庄等地，随后又占领了黄土梁、赵家窑、南天门等张家口外围据点，转而向张家口、宣化间猛插，并占领了沙岭子，完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

傅作义见势不妙，急派嫡系精锐部队第三十五军（两个师）并配属第一〇四军一个师，乘美制大卡车连夜驰援张家口，又令驻怀来一个师增援宣化，驻昌平一个师进至怀来，以加强平绥线东段的防御。12月2日，傅作义飞临张家口坐镇，指挥他的“王牌”军三十五军等4个师向沙岭子疯狂反

扑，妄图打通宣化与张家口的联系。

战事纷繁，统帅难眠。毛泽东挥笔通宵达旦，亲自起草一封又一封电报，从西柏坡发向华北、东北各部队：

一是给华北第3兵团杨成武、李天焕的，严令他们一定要顶住敌人4个师的进攻，务必继续切断张家口、宣化间敌人的联系，将他们围住，在阵前消耗敌人。

二是给华北第2兵团杨得志、罗瑞卿的，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从数百里外赶到平绥线，以最快的手段攻占下花园一线，隔断敌一〇四军与宣化敌人的联系。

三是给东北先遣兵团程子华、黄志勇的，要他们的部队向怀来、南口一线急进，歼灭驻该线的敌十六军。

令指旌旗奋。我三支英雄部队，将傅作义布置在平绥线上的链条阵：怀来、南口的十六军—宣化以东的一〇四军—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张家口的11兵团部及所属一〇五军，一下截成数段。

傅作义得知他的阵容已破，大吃一惊。最出乎他意料的是东北共军已经入关，出现在延庆一带，觉得大事不好，决定“丢卒保车”。忙令他的“王牌”三十五军放弃支援张家口，速回北平。并令驻怀来、南口的十六军西去接应。同时令天津、塘沽地区的九十二、九十四军和六十二军共8个师立即开赴北平，十三军放弃顺义、怀柔集中于通县附近，一〇一军放弃涿县、良乡，集中于宛平、丰台、门头沟一线，以加强北平的防御。

傅作义用兵，不论是增援还是撤援，“一个接一个”，可说是部署周全，老谋深算。但是，孙悟空的筋斗十万八千里也翻不过如来佛的巴掌心，他的“接接法”被毛泽东一一破除了。

先说傅作义的“王牌”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自12月初奉命出援，自恃其装备精良，气势汹汹地向张家口扑去。却被杨成武、李天焕张开的口袋阵将他兜住，然后牵着这只貌似强大的老虎转悠。郭景云原想“指日下张家口”，现在转了六七天还是不能与张家口的第11兵团部所属一〇五军会合，援张目的不能达到。正在一筹莫展时，突接傅作义撤援返回的命令，郭景云喜出望外。他带领这支机械化部队往回走，同样遇到不断的阻击。但是，由于坚守沙岭子的我3兵团1纵某团阻击不力，竟让郭景云突破该地向新保安逃去。幸亏杨、罗、耿率华北第2兵团赶来将其截住，并包围于新保安。

傅作义得知三十五军被围，茶饭不思，坐卧不安，巴不得立马营救。于

是连下三道命令：一令郭景云全力突围，二令在宣化的一〇四军回援，三令在怀来的十六军速去接应。傅作义如此慌神，说明我军已打到了他的痛处。

当敌三十五军这只老虎被包围起来可以打时，毛泽东指示杨、罗、耿“围而不打”，看看傅作义对谈判的态度再作定夺。如果三十五军突围逃跑，则坚决歼灭。对于援救三十五军的其他敌军则坚决歼灭。

12 月 9 日，东北先遣兵团所属第 4、11 纵队将救援三十五军的十六军包围于康庄。第二天拂晓，十六军向八达岭突围，被我军全歼。敌一〇四军见十六军被歼，便拼命向新保安攻击前进，企图去与三十五军靠拢，当即遭到杨、罗、耿兵团第 3 纵队顽强阻击，正想后退，又被东北 4 纵切断了退路。这个纵队在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中是出了名的。该纵所属 3 个师有 4 个团荣获“英雄团”称号。现在，4 纵像张开的一把铁钳将敌一〇四军死死钳住。10 日下午，一〇四军开始向南突围。升任 4 纵 123 师师长卢燕秋率部追歼。卢师长使出他的双刃剑——“塔山英雄团”和“白台山英雄团”乘胜勇猛追击，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追至横岭城、镇边城地区将敌一举全歼。至此，华北、东北我军在平绥线东段共歼敌两个军部 5 个师部 22000 多人。敌人的援军被歼后，傅系“王牌”三十五军被钉在新保安一动也不能动，而第 11 兵团部及一〇五军所属 7 个师（旅）被包围在张家口，处于求援不到西撤不能的绝境。

我军在平绥线东段作战，将傅作义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 12 月 14 日起，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开始隔断北平、天津、塘沽等地敌人之间联系，作战略包围。15 日，东北第 11 纵队从北面，第 5 纵队从西南面，第 3、6 纵队从东北面，华北第 4 纵队从东南面，一起包围北平。3 纵司令员韩先楚率部急行军 20 多天，从冷口越过长城，于 12 月中旬到达北平附近的香河地区。13 日歼通县之敌，并于当夜包围马驹桥。14 日乘胜歼灭青云店附近之敌，部队迅速逼近北平近郊，立即指挥攻占南苑机场，全歼守军，截断并控制敌空中通道。又以一部兵力在北平东南设置了两道阻击线，随时准备阻击自北平突围之敌。傅作义为夺回南苑机场，派出一个师的兵力，在 16 辆坦克、10 余门山炮的支援下，向我机场守卫部队疯狂进攻。韩先楚指挥本部及兄弟部队一起打退了敌人进攻。参加这次战斗的 6 纵 18 师政委袁克服，开展战场政治宣传工作，鼓舞士气，激励斗志，配合韩先楚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南苑机场战斗结束后，我军完成了对北平敌人的包围。

与此同时，东北第 10 纵队占领了青云店、廊坊等地，151 师政治部主任江腾蛟所在的第 1 纵队进至宝坻以南地区，与同时进至马头镇、漷县镇一带的 6 纵一起，完成了隔断北平、天津两地敌人的任务。

此外，由詹才芳率领的第 9 纵队，内有后勤部长程儒珍、卫生部政委秦光远带领本部门一同行动，自凌南隐蔽进入迁安后，迅速南下，相继占领了唐山、芦台和张贵庄机场等地；由副司令员张天云与司令员、政委一起率领第 8 纵队相继占领了宜兴埠、杨柳青等地，130 师师长徐绍华所在的第 7 纵队进至塘沽以西新河地区，纵队后勤部政委张志勇、117 师师长张竭诚、152 师副师长程启文所在的第 2 纵队进至北塘地区，纵队后勤部长毛普安所在的第 12 纵队进至天津和塘沽之间，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隔断了津、塘两地敌人的联系。至此，傅作义的 60 万人马被我军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新保安和张家口 5 个孤立据点，其向西、向南的退路均被切断。

包围是为了歼灭。傅作义是沙场老将，深明此理。当我军在实施战略包围和战役隔断的过程中，他就作出判断说，共军进攻必先打北平。

毛泽东来个将计就计，从迎合傅作义的判断入手，拉开下一阶段的战斗序幕。

第二阶段，佯攻北平，先打两头。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意图，令东北 11 纵向南口、怀柔之敌进行佯攻，从北面威胁北平；令韩先楚 3 纵等部在通县及其以南的平津路进行佯攻，从东面威胁北平；令华北第 7 纵队从房山、良乡进行佯攻，从西南面威胁北平。北平吃紧，印证了傅作义的判断。但他哪里知道毛泽东的策略与其相反，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即先打张家口和天津，最后夺取北平。

就在我军对敌人实行包围的过程中，仍不放弃和平努力，曾几次派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谈判。傅作义却利用谈判作掩护，不断地扩军和加强防御，令所属部队进行顽抗。更有甚者，还暗中策划偷袭西柏坡。看来不给傅作义一点颜色看看，他是不会丢掉幻想真心诚意坐下来谈判的。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统帅部，决定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立即以强攻的手段首先夺取新保安和张家口，坚决打击傅系主力，制敌死命。为保证做到速战速决，中央军委令东北先遣兵团第 4 纵队由南口赶往张家口，暂属华北第 3 兵团指挥，增强进攻张家口的兵力。然后，将这次作战分为两步走，先拿下新保安，后夺取张家口。

12 月 21 日下午，华北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天焕下令各部扫清外围，打通前进道路。早就想干掉郭景云所部的指战员，一鼓作气将敌人设在新保安城外的铁丝网、地堡统统捣毁。午夜，各突击队进入攻击出发点。

清晨 7 时，杨得志通过电话向各纵队下达了总攻命令。三颗信号弹拖着长长的尾巴划破新保安城的上空，弧光消失，炮声四起。在持续一个小时的炮击中，有一支特殊炮队打得忒猛。它是 4 纵司令员曾思玉别出心裁组建的。战前，曾思玉见新保安城墙高大坚固，自己无重炮摧坚，便将全纵的迫击炮集中到他负责主攻的东门外的阵地上。战斗打响后，他令各迫击炮手齐向城墙、城楼、城门猛击。炮击过后由 11 旅副旅长谢正荣率部担任主攻。别看一门迫击炮的威力不怎么样，但几十上百门迫击炮连连发射起来，那是咆哮如雷，弹飞如雨，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是什么新式武器，纷纷躲在工事里乱叫起来。一阵狂轰猛击，东城门被炸开了。趁着浓烟滚滚，谢正荣指挥 33 团攻入城内，歼敌三十五军 267 师的一个团，拔得攻破新保安城的头筹。接着，由郑维山率领的 3 纵从南面，由邱蔚率领的 8 纵从西北面，也先后攻入城内。经 11 个小时激战，到下午 5 时，4、3、8 纵各进攻部队胜利会合，新保安战斗结束。傅系“王牌”三十五军所属两个师共 19000 余人全部被歼。军长郭景云效法他的前任军长鲁英麟战败自杀。我军缴获 400 辆美式卡车，20 多辆美日产的吉普、卧车，武器弹药不计其数，取得了新保安大捷。战后，华北第 2 兵团开赴平津待命。

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用来护身壮胆的，用他的话说，“三十五军是我 30 年储积起来的精英，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凝有我的心血”。从这番话看，三十五军也是他傅作义的心肝宝贝。当傅作义得知三十五军全军覆没，据说落泪了，而且是老泪纵横。

我军全歼敌三十五军后，本可乘胜将张家口之敌一鼓荡平。但毛泽东电示杨成武、李天焕继续围而不打。这是为什么？是给傅作义留点时间考虑何去何从。但傅痛定思痛，不是真心诚意坐下来谈判，而是继续抱着保存实力的幻想不放，命令张家口的守军突围。张家口守将孙兰峰对其上司的想法早已心领神会，当新保安的三十五军被歼后，他觉得自己更加孤立，再获救援已不可能，就开始突围。他突围也是煞费苦心，使出“先北后西”之计，即先冲向张北，然后转而向西，逃回绥远。

包围张家口已达半月之久的我华北第 3 兵团，在杨成武、李天焕指挥下，已经做好各种准备，不会让孙兰峰再从他们手中跑掉。因为张家口有

“前车之鉴”，就是前面提到的拦截郭景云的三十五军没拦住。当时毛泽东在西柏坡得知敌三十五军有可能跑掉，深为焦虑，在屋里坐不住走到外面的雪地里站着。天寒地冻，警卫员怎么请他也请不回去。是周恩来前去报告说，敌三十五军已被紧急赶去的杨、罗、耿兵团拦住了，并包围在新保安，他听了才如释重负回到了屋里。但为了吸取教训，打好后面的仗，他挥笔疾书起草了给杨成武、李天焕的电报。电文说：杨、李过去违背军委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三十五军东逃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杨、李任务是包围张家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南、东或绕道跑掉，如果逃跑，则全歼之。杨、李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

这份电报分量重，压力大。作为政工老手的李天焕善于将压力变动力。他和司令员杨成武一起承担全部责任，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很快使全体指战员的情绪高涨起来，积极投入了围攻张家口的战斗中去。

李天焕从红军时期锻炼成长为指挥员以来，履历表上的职务几乎清一色，不是团、师、军、军分区、军区政治部主任就是政治委员，是我军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但他做政工不忘学军事，加上身经百战，见多识广，在军事上有他独到之处。特别是当战斗遇到麻烦时，他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并提出与别人不同的解决办法。12 月 23 日，敌人采取“声北击西”突围。李天焕在兵团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将计就计，趋势分割围歼，得到了司令员杨成武的首肯。当敌人约有三分之一的兵力冲向张北时，杨成武率 1、6 两个纵队追歼逃敌，李天焕率 2 纵和东北 4 纵攻入城中，将敌拦腰切断，然后分割围歼。这次战斗从 24 日凌晨开始至下午 3 时结束，歼敌第 11 兵团 5 个师 3 个骑兵旅共 54000 人，解放了张家口。

12 月 24 日深夜，一份电报载着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贺词传到了华北第 3 兵团，贺词说：“华北 3 兵团：庆祝你们在几天内歼灭张家口敌人，并收复张家口的伟大胜利！”李天焕看着贺词，心里激动不已。他从主席赏罚分明中悟到了更深层次的治军要领。于是，他的政委一职成了“长青藤”，从新中国成立前当到新中国成立后，后来还成为我军最现代化、科技含量更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政治委员。

解放张家口，打掉了傅作义防线上的西头堡，彻底斩断了他西逃之路，但他还有东头堡天津、塘沽作为退路。因此，防傅作义集团逃跑仍是当务之急。为此，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一面要严防平津等地敌人突围，一

面要加紧做傅作义的争取工作，并要准备攻取塘沽。经过实地侦察，林、罗认为塘沽背靠渤海，当面河流较多，加上盐田密布，不便我军运动作战。其守敌第 17 兵团部及所属第八十七军计 5 个师已如惊兔，早将指挥部搬上了兵舰，随时准备逃跑。经上报军委同意，放弃攻塘沽。至于争取工作，傅作义尚缺诚意，妄图以固守天津、塘沽牵制我军，作为谈判筹码，讨价还价。傅作义认为天津不同于张家口，共军想攻占堡垒化的大天津没有三两月是办不到的。

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研究平津下一步作战部署时，朱老总说，我们还得给傅宜生（傅作义字宜生）一点颜色看看，不然他是不会服气的。于是，中央军委根据统帅部的意见，电令林彪、罗荣桓用强攻手段夺取天津，以打破傅作义的幻想，并提出将攻津转告傅的谈判代表周北峰。

当我方代表转告对方代表时，周北峰代表问我方代表，贵军打天津要多长时间？我方代表反问，你认为要多长时间？周代表用转述作答：傅总司令和邓宝珊副总司令说不要三两月起码也要 30 天。我方代表也用转述作答：林彪司令员讲 3 天（其实是中央军委提出三天打下天津）。一方讲起码要三十天，一方讲三天，相差之大，正好反映谈判的差距。双方代表只好一笑结束交谈，静候战斗揭晓。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林彪点将，让参谋长刘亚楼挂帅出征，攻打天津。

天津市区狭长，海河从西北流贯东南，将全市分为东西两半，四周有护城河，整个市区地形开阔，城垣坚固。经过敌人长期设防，城市周围遍布碉堡和多层鹿寨，并利用市内坚固建筑组成多个核心阵地，与城周围的碉堡群相通，易守难攻。除此以外，在我军包围天津前夕，敌人将城周围 5 里以内的村庄烧拆一空，难以隐蔽接近城垣。如此苦心经营的是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他仗着手中有两个军 10 多个师共 13 万人坚守固若堡垒的天津，企图顽抗，并夸下海口说："天津的城防不比长春差，起码能守半年"。故而两次谈判，他都拒不接受我方条件。和谈大门被陈长捷关上了，只有用战斗解决问题。

我平津前线总前委决定调华北第 2、第 3 兵团及地方武装配合东北野战军一部分兵力包围北平。新投入围城战斗的红安籍将领有太行军区政治部主任周光坦、第 4 分区司令员韩卫民等。总前委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第 1、2、7、8、9 纵队和 6 纵 17 师、12 纵 34 师计 22 个步兵师及炮兵纵队等共 34 万人攻打天津。受命挂帅的刘亚楼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指挥部，设在离城只有 8 公

里的杨柳青，就近指挥各部队迅速扫清敌人外围据点，进入战斗位置。

布置就绪，刘亚楼赶回总前委向林、罗、聂回报。罗荣桓说，三天拿下天津是军委要求，你能不能再将时间缩短些？刘亚楼说，请三位首长定夺。林彪说 48 个小时，怎么样？刘亚楼伸出三个指头。聂荣臻说还是三天。刘亚楼说不是，是 30 个小时。聂荣臻说军中无戏言，你可要想好哟。刘亚楼说我已搞到了天津城防图，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有把握在 30 个小时内拿下来。三位首长满意地点头笑了。

刘亚楼带着总前委制定并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作战方案返回杨柳青，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总前委的决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割后围，各个歼敌的战法，于 1 月 14 日上午 10 时发起总攻。根据这个作战方案和时间规定，刘亚楼又进行了一番具体部署：

以第 1、第 2 纵队为西集团，从和平门两侧由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在这个集团里，有 1 纵独 10 师政治部主任江腾蛟，2 纵后勤部政委张志勇、6 师师长张竭诚、独 7 师副师长程启文等率部参加战斗。久做参谋历练老到的张竭诚，养成了战前战后亲自督促检查的习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在作战会上接受担任和平门方向的主攻任务回来后，同政委、副师长、参谋长等一起，利用晚上带领各团团长进至 3 公里外的敌前沿阵地进行勘察。津西地势平坦，河流纵横，不利于运动兵力。为创造接近敌人、发起冲击的条件，他和大家一起研究挖掘交通壕。全师用一个晚上挖了两条长 3 公里、宽 1.5 米、深 1.8 米的壕沟。这两条壕沟像两条巨龙伸向敌人的外围工事，距护城河仅 100 米左右。全师部队均转入地下。2 纵首长看了交通壕后，称赞他们干得好。1 月 12 日，张竭诚指挥 18 团从交通壕内向敌人发起攻击，一举攻下和平门外百米处的敌人重要据点三元村，为攻入城内扫除了拦路虎。

以第 7、第 8 纵队和 6 纵 18 师为东集团，从民权门两侧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在这一集团中，有 7 纵 19 师师长徐绍华、6 纵 17 师政委徐斌洲，8 纵副司令员张天云率部参加战斗。

以 9 纵和 12 纵 34 师为南集团，由南向北实施助攻。这个集团由 9 纵司令员詹才芳指挥，后勤部长程儒珍、卫生部政委秦光远等参加战斗。

总攻前，刘亚楼来个“调虎离山”，将数十门重炮调到天津北面，对敌人的城北防御工事进行破坏性打击。陈长捷以为共军主攻方向在城北，忙将手中“王牌”六十二军 151 师从重点防区城西调往城北。陈长捷战前易兵，对我军顺利攻下他的重点防区有利。

14 日上午 10 时，总攻开始。千余门火炮同时开火，炮声震天，硝烟四起，与尚未散去的冬雾弥漫在一起，笼罩了整个天津，就像传说中的“阔天罩”，将陈长捷的 13 万人马一下子罩了起来，只等手到擒来。

炮击一个小时过后，东北野战军 5 个纵队、22 个师，从西、东、南三个方向，在 40 多辆坦克领头冲锋下，奋勇攻城，很快打开了 10 个突破口。

西集团 8 个师由西向东攻击。1 纵在辽沈战役中是预备队，未过足战斗瘾，早想大打。这次他们争得了突击任务，指战员们个个奋不顾身往前冲，大显威风。2 纵 6 师挖了战壕，攻城更近更方便，在师长张竭诚的带领下，快速越过了护城河，打开了前进通道，使后续部队顺利进攻。这两个纵队互相配合，互相竞赛，很快攻入和平门，插进市区。1 纵捷足先登占领了金汤桥夺取了天津的中心区。

东集团 9 个师由东向西攻击，担任突击的是 7 纵 19 师、6 纵 17 师和 8 纵 22 师。19 师师长徐绍华准备了爆破队、梯子队，攻城时遇到大炮打开的洞口不大就来个二次爆破，城墙高了就架梯子上，加快了进攻速度。17 师是野战军总部表彰命名的“攻坚老虎师”。这次独点该师配属东集团作战，是总前委充分发挥该师的长处和威力。这只“攻坚老虎”是政委徐斌洲和师长龙书金认真培训出来的。徐斌洲原是 6 纵政治部主任，突然调到 17 师当政委，有人认为降职使用是他犯了错误，徐斌洲没放心上。“党叫干啥就干啥”，照样努力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协助师长抓好军事训练，苦练过硬本领，终于带出一支能打攻坚战的部队。这次 17 师同 22 师一起攻打被守敌称为“永久性工事”的民权门，在 8 纵副司令员张天云指挥下，攻坚老虎咆哮起来，22 师如蛟龙出水，虎跃龙腾，不到一个小时就破门而入了。

南集团由 9 纵司令员詹才芳指挥本纵 25、26、27、独 7 师和 12 纵 34 师共 5 个师以及配属的特种兵部队的炮队、装甲车队，由南向北攻击。身经百战的詹才芳仍像十八年前第二次夺取黄安县城一样，指挥这支 5 万多人的大军勇猛扑向天津城。在跨越护城河时，敌机炸断了我军临时架起的浮桥，詹才芳落入深水中，被战士们迅速救起，全身衣服透湿。天寒地冻，警卫员要他换换衣服，他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打完仗再换！”湿透的外衣在严寒中很快结冰，他穿着铠甲似的冰衣指挥部队一举突破城垣，攻入市区。

15 日凌晨 2 时，即发起总攻 14 小时后，我东西对进和南向北攻的三支部队，在金汤桥胜利会合，号称“大天津堡垒化”的守敌被分割包围。又经 10 多个小时巷战，下午 3 时战斗结束。西集团活捉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



我军奋勇攻入天津敌警备司令部

陈长捷、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等，东集团抓住了国民党第 86 军军长刘云翰，南集团俘虏了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三个集团都有斩获，皆大欢喜。

攻津之战，历时 29 小时，歼敌 13 万，俘陈长捷以下高级将官 26 名。整个战斗比刘亚楼预计的 30 小时只少不多。

东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天津，震慑了塘沽敌人。守敌是谁？我军手下败将第 17 兵团司令侯镜如及所属 87 军等 5 个师共 5 万余人。侯镜如在辽沈战役中为援锦州被我军打得头破血流，丧魂落魄。逃到塘沽后仍惊魂未定，将兵团部和指挥部都设在兵舰上。天津城破后，连忙带上他的人马从海上开溜。但是，留在岸上掩护的 3000 多部队，想溜溜不掉，被我 12 纵队将其全部歼灭。

解放了天津和塘沽，傅作义的东头堡也被荡平了。失去张家口和天津的拱卫，北平现在成了孤城一座。

刘亚楼向总前委报告战斗胜利结束。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闻讯高兴至极，马上向西柏坡报捷。毛泽东收到他们的捷报后，对天津战斗给予很高评价，将此战称之为创造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一种斗争方式——“天津方式”。

果敢、快速、干净地歼灭敌人解放天津，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直接而又关键的作用。

接下来，平津战役便转入第三阶段，重兵压城，和平解放北平。

平津战役开始后，傅作义虽几次派代表与我军谈判，但他玩弄两面手法，企图保全其军队。针对傅作义的图谋，我军采取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方针，一方面晓以大义，说明利害，揭穿其企图；一方面以积极的作战行动，给予连续性的打击，促其转变。

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和塘沽解放后，东北、华北两野战军近百万大军汇集一起，对北平进行严密包围。傅作义部已完全陷入欲战不能和欲逃无路的绝境。但他还是不肯彻底丢掉幻想，不愿接受我方条件，打算继续拖延时间。

毛泽东洞察一切，以中央军委名义向平津前线总前委发出关于“积极准备攻城”和“加强和平谈判”的指示。我北平地下党组织根据这一指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从多方面进行有力的配合。

毛泽东还出了一个好主意：让总前委在攻克天津当日，立即将这个消息通报对方代表，并让陈长捷与傅作义通电话。陈长捷心有余悸地说：“傅总司令，不要守了，天津的味道不好受啊！”陈长捷现身说法，再次触痛傅作义的心。

1 月 16 日，我方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严正指出他执行蒋介石的“剿匪戡乱”令是有罪的，并提出两项办法任其选择：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文化古迹、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我军则保证其生命财产之安全；二是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我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最后强调指出，如以文化古城和 200 万人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顽抗到底，我军将用精确的战术实行攻城。破城之日，必将严惩，决不宽恕。

1 月 21 日，傅作义终于痛下决心，接受我方提出的一切条件，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愿意接受第二种办法，并令其所属部队从 1 月 22 日起开到我军指定的孙何镇、庞各庄、黄村、良乡等地，听候改编。

1 月 26 日，我军宣布整编命令。31 日，驻守北平的傅作义 20 万人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同日，东北野战军第 4 纵队在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的率领下，作为解放军卫戍部队进入北平，接管了全城的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这座千年文化古城，终于避免战争破坏，回到人民手中。不久，绥远傅作义余部也接受我党提出的解决方式：即军队和政府暂时维持现状，待一个时期后按我党我军制度整编和处理。绥远也宣告和平解放。这样一来，平津战役便有了三种解决敌军的办法。毛泽东把这三种办法称之为“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并将这三种方式作为我军解决国民党残军的基本方针，对加快全国解放起了重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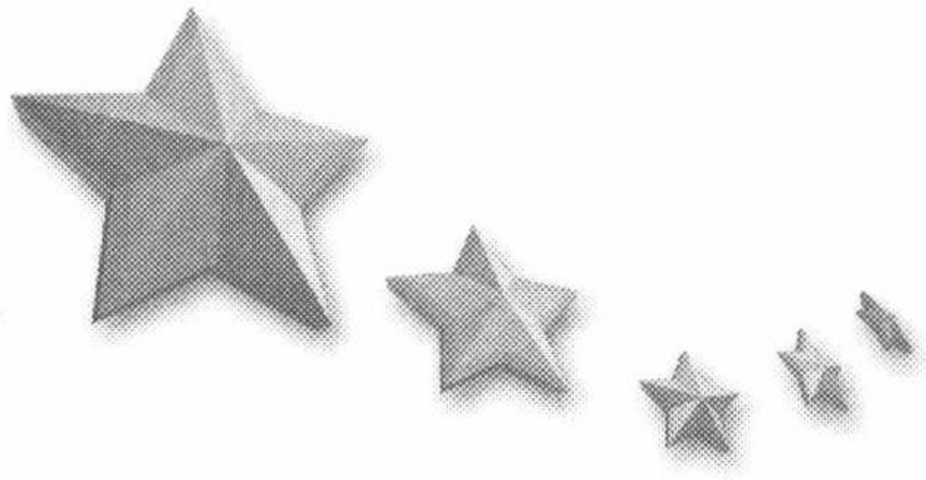
平津战役获胜，离不开广大民兵的配合和民工的支援。战役开始阶段，东北野战军主力尚未到达平津地区时，华北的广大民兵除在西线担任破路和

炸桥，切断敌人交通线，以及直接配合部队阻击敌第三十五军西援东返外，还在东线各军分区的领导下，组成一至三道防线，形成由千百万人民群众铸成的铜墙铁壁，对围歼傅作义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战役期间，华北和东北两区有 30 多万民工担任战时勤务。华北还组织了 150 万民工，修路 6800 多公里，修桥 370 多座，动员 10 万辆胶轮大车运输粮食支援前线。

人民群众的支援离不开后勤部门的精心组织。担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长的周纯全，日夜运筹，领导后勤战线的广大指战员和民工，组织物资供应，保障了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并在战争中完善了后勤组织机构，组建了跟随野战部队进行作战行动的 3 个后勤分部、33 个医院、3 个汽车团（1200 余辆汽车），共 7 万余人参加了后勤保障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平津战役 10 个纵队所需物资的供应任务，其中仅供应弹药就达 4000 余吨，其他物资 3500 万斤，救治伤员 17000 多人。所有这些对保障大兵团作战获胜发挥了重要作用。

平津战役百万大军参战，后勤保障非常具体复杂。周纯全创造性地组建后勤分部，解决了大兵团作战形势下野战后勤保障难题，不能不说是个创举。在后勤保障中，2 纵后勤部政委张志勇、5 纵后勤部政委聂洪国、9 纵后勤部长程儒珍、卫生部政委秦光远、12 纵后勤部长毛普安等都默默地做出了贡献。

平津战役历时 64 天，共计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 52 万多人（内改编 25 万人）。平津战役的胜利，连同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关于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实践，使国民党军丧失了三大战略集团，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为解放战争在全国赢得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第十四章　猛追穷寇下南疆

王建安率部首批渡江扬起解放东南的征帆。韩先楚挥师先遣入汉开启解放中南的大门。陈锡联谢富治统兵迂回重庆，拉开解放西南的序幕。陈赓郭天民为兜住穷寇率部从赣南沿南国边境一直迂回到滇川。郭天民打一场漂亮的高速运动歼灭战，向黄埔军校交一份特别答卷。解放海南岛韩先楚用木船打军舰史无前例。黎锡福建议设边防区从此西南边疆从无防到有防。

雄师渡江　解放东南

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歼灭，残余的兵力虽有 220 万人，但正规军只剩 146 万人，分布在东南、中南和西南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已不可能组织有效的战略防御。而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 400 万人以上，其中野战军 210 万人，解放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以北近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区，使各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形势的发展，预示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行将结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即将来临。

但是，蒋介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一方面收集残部，利用长江天堑布置长江防线；另一方面伪装和平，企图在和平烟幕的掩护下，首先利用长江防线拒我军于长江以北，以争取时间扩编军队，然后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当 1949 年到来时，国共两党都从时局出发，选在元旦发表声明或献词。1 月 1 日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21 日又伪装下野，退居幕后指挥，由代总统李宗仁出面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

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新年献词，向全国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提出了人民解放军继续向长江以南进军，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1 月 14 日，针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彻底揭露了他的和平骗局，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并指示人民解放军“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各野战军要做好向全国进军的准备，首先在长江中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南，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对国民党残存的作战部队，可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但主要靠战斗解决。

为了适应向全国进军的需要，全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部队组织和番

号的指示，先后进行了统一整编。原来的旅改编为师，纵队改编为军，军以上设兵团，兵团上面为野战军，统一按数字顺序编成。

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辖第 1、2 兵团 6 个军 18 个师。

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辖第 3、4、5 兵团 10 个军 30 个师。

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辖第 7、8、9、10 兵团 16 个军 47 个师。

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辖第 12、13、14、15 兵团 14 个军 50 个师。

华北野战军番号撤销，部队直属中央军委，辖第 18、19、20 兵团 11 个军 34 个师。

全军共计 16 个兵团 57 个军 179 个师。整编以后，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做好向全国进军的准备。

国民党军在和谈烟幕的掩护下，积极构筑长江防线，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东面是“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集团，有 25 个军 45 万人，担任湖口至上海的沿江防御。其中以 18 个军担任江防和守备京沪，以 7 个军配置在浙赣路及浙东等纵深地区。西面是华中“剿总”白崇禧集团，有 15 个军约 25 万人，其中以 13 个军担任宜昌至湖口的江防和守备武汉，以 2 个军配置在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敌海军第 2 舰队和江防舰队以及空军主力，分别配置给汤、白两个集团，其总兵力达 40 个军约 70 万人，舰艇 133 艘，飞机 300 余架，在长江中下游两岸构成所谓陆海空立体防御，并以京沪杭地区为重点，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方针，以待国际事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由于战线漫长，兵力不足，长江防线东重西轻，后方空虚，缺乏机动作战兵力。

为了消灭敌人的残存势力，解放全中国，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发起渡江战役，仍由淮海战役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书记邓小平）组织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 24 个军约 100 万人的兵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也暂归其指挥。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将敌人主力歼灭在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然后向浙闽赣广大地区推进，同时做好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

总前委根据中央决定和毛泽东指示，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二野 3 个兵团组成西集团，以三野 4 个兵团分别组成中集团和东集团，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战线上，实施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突破敌人

的长江防线。另外，以四野先遣兵团位于武汉地区牵制敌白崇禧集团，以策应二、三野战军作战。鉴于镇江至江阴段敌防守兵力较强，决定东集团比中集团晚一天发起战斗，以减轻敌人对东集团的压力。

总前委还对三个集团的具体作战方案，作了明确规定：

西集团，由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和参谋长李达指挥，第 3、4、5 兵团组成，约 35 万人，在湖口至枞阳间实行渡江作战。得手后快速向浙赣铁路挺进，切断敌人退路。

中集团，由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 7、9 兵团及榴弹炮兵第 2、4 团、第 1 团一个营和骑兵团组成，约 30 万人，在裕溪口至枞阳间实行渡江作战。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配合西集团消灭当面之敌，主力则迅速东进截断宁杭公路，会同东集团完成对敌主力的包围。

东集团，由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和参谋长张震指挥，第 8、10 兵团及榴弹炮第 5、6 团，苏北军区 3 个警备旅，海防纵队，坦克团，炮兵预备队等组成，约 35 万人，渡江地段为张黄港至三江营之间。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歼灭沿江之敌，力求站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和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大战果；主力则对敌人做有后方的迅速推进，截断沪宁铁路，会同中集团合围芜湖、南京、镇江等地撤逃之敌。

为了保证西集团渡江右翼的安全，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约 20 万人，一部进占浠水、蕲春、黄梅等地，钳制白崇禧集团防守九江的敌军，一部进占武汉外围孝感、黄陂等地，造成进攻和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至九江段渡江南进。

部署已定，总前委五成员有三个上了前线，留下陈毅、邓小平组成轻便指挥部，移至合肥东南面一个叫瑶岗的小村，负责上下联络，指挥协调。

3 月上旬，我第二、第三野战军 7 个兵团 24 个军共百万大军，分途向长江北岸指定地方开进。在一支支大军中，当年在大江南北战斗过的老红军、老新四军又回来了，面对曾经风里来浪里去的长江，他们心中有无限的感慨，但更多的是把目光和注意力放在渡江作战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他们的最高使命。

三野第 7 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来到庐江后，也不休息就去察看江边的地形。他用望远镜扫视南岸，在茫茫大江之外，只能看个“大概”，脑中马上闪出参军打仗以来最熟悉的一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想，挟三大战役胜利雄风南征的我军，容易产生轻敌思想，便向上建议要广泛收集情报，

互通有无。总前委采纳了他的意见，指示各兵团、军、师、团运用各种办法进行侦察，摸清敌人情况。王建安亲自到农民、渔民中去调查访问，多次听取各级侦察情报汇报，加以归纳后通报给各级指挥员，让大家心中有数，明明白白地去指挥战斗。

在东集团，第二十军本属第9兵团，因军长刘飞熟悉苏南，暂配属第8兵团，其作战地段由南京以西的中集团调到南京以东的东集团。刘飞率部到达指定位置后，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根据部队特长，令他收集情报。刘飞组织全军的侦察员，发扬机智勇敢和不畏艰险的精神，潜入江南侦察，查明了敌兵重要火力位置、敌舰巡逻活动规律，还抓了几个“活舌头”带回来，为部队渡江作战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在西集团，刘伯承令第4兵团作先遣部队。兵团司令员陈赓知道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长征时组织过红军抢渡北盘江，便让他率第十五军先行。郭天民与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虽是同乡，却未一同工作和战斗，渡江战役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两人很快成了要好的战友。他们率部挺进皖西，一举攻占了望江华阳镇至宿松老洲头一线的长江北岸，为兵团所辖第十三、十四军进入前线铺平了道路。陈赓率主力随后到达，将渡江作战的准备和训练工作又交给郭天民负责。郭天民带领三位军长——十三军军长周希汉、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到江边察看地形，边看边议渡江作战事宜。郭天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们四个人是黄麻老乡，老家与这里相距不远，渡



1949年4月，渡工战役前，秦基伟（右一）在安徽望江县华阳镇的长江边观察敌情。

江战役可以说是在家门口打。打不好上面打我的屁股，我就打你们的屁股啊。要打好这一仗就要做充分的准备，研究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各师成立三个专门委员会做好渡江作战准备。这三个委员会是：由侦察、保卫、敌工部门组成情报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查明敌军火力配置、活动规律、警戒程度等情况；由作战、训练、通信部门组成战术研究委员会，研究渡江战术、作战方案、水上训练和演习；由政治、后勤、民运部门组成后勤委员会，做好思想宣传发动、粮草军需供应、筹集船只器材、组织船工、救治伤员。各师首长分工负责领导，部门首长参与其中。这些组织措施非常得力，大大加快了渡江准备工作的进程。头 8 天时间，第十五军就筹到大小船只 443 只，到渡江时共筹到 784 只，一次可渡上万人。渡江侦察得到了江南人民的支持，老百姓将敌人的江防工事绘成图，冒着生命危险，泅渡过江送到我军手中，广大指战员知道后极受感动和鼓舞。

第 3 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副司令员王近山、杜义德等率所辖第十、十一、十二军，抵达江北枞阳县境。这里据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较近，沿江一带有敌军据守。枞阳镇地形特别，长江到此分为内外二江，江心有铁板、铜板、玉板三个沙洲，以铁板洲最大。洲上有一营敌军据守。兵团领导研究认为，夺取铁板洲对渡江作战有利，当即决定由副司令员兼军长杜义德率十军包围安庆，围而不打，待渡江战役打响后再攻克；由副司令员兼军长王近山指挥十二军拿下铁板洲，并扫除沿江敌人据点。兵团主力很快进入阵地。陈锡联和谢富治边抓筹集船只边搞水上练兵。从兵团、军、师到团、营、连层层抽调干部下到农村去，发动农民、渔民支援船只。第十一军副军长郑国仲带领该军 31 师抽调的 30 多名干部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处调查访问，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经过深入动员，群众纷纷把沉船捞起来，把破船修好送到部队，另外还推荐一批会驾船、水性好的船工。仅一周时间，就征集到大小船只 300 多只，船工 200 多名，组成一个运送大军渡江的船队。管理船队的干部与船工平等相处，关心他们的生活，除给每个船工发一份大米作劳动报酬外，还给家属发补助粮。军队与船工亲如一家人，与国民党军队抓夫、抢船、烧船、残害百姓的种种暴行形成鲜明的对照，激发了群众的热情，纷纷向部队提供船只。有些渔民全家从百里之外赶来参战支前。船工们的觉悟提高了，表示要争当渡江第一船，为解放全国立功。就是这样，三个集团百万大军渡江作战所需数以千计的船只，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在较短时间便解决了。

为防备敌机轰炸，征集来的船只先是隐蔽在港汊湖泊中。训练可以，但按实战要求不行。所有船只必须泊在港江相通、能出能进的地方，而且还能隐蔽。像这样的天然港口不多，也不够用。各部队要按要求自造港口。第3兵团第十一军经过13个昼夜奋战，开挖了一条长50公尺、深8公尺、上宽14公尺下宽4公尺的引河，使训练基地石塘湖与长江相通，不论大小船只都能从这条引河通过。第4兵团第十三军借鉴第十一军的经验加以发展，在龙感湖与长江之间挖了一条长600多公尺，宽8公尺，深4公尺的引河，先不开通，渡江时再挖通，几百只船都能顺利出航。

开挖了船只入江通道，各部队的水上练兵更是热火朝天。当年智过北盘江的郭天民，勇战太行山的陈锡联，猛克济南城的王建安等兵团领导人都出现在水上练兵的训练场上。广大指战员，经半个多月的勤学苦练，普遍习惯了水上生活，学会了摇橹、划桨、判定方位、通信联络和水上射击等技能。北方战士都学会了游泳，摘掉了“旱鸭”帽子。根据水上作战特点，打破了班排建制，以船为单位编成新的战斗组织，每船十七八人，分成火力组、突击组，附带轻机枪、冲锋枪、炸药包及足够的手榴弹，由连排干部分工掌握，进行独立战斗。为便于指挥和协同作战，突击部队编成几个战斗梯队。每个梯队又编有突击船、火力船、指挥船、救护船等，达到散得开、集得拢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各师又按预定作战方案，昼夜进行轮番演习。经一个多月努力，所有参战部队，解决了渡江作战的战术、技术和极为复杂的战斗组织、水上指挥等问题，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大多数船只装上了木制推进机，提高了航行速度。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等一声令下，飞渡天堑。

4月1日至15日，以周恩来为首的我党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双方共同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为给国民党政府以足够的时间签字，我军原定4月15日渡江向后推迟了一周。但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下，于20日拒绝签字。当晚，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发起了渡江战役。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指挥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进军令下，雄师奋发，万炮齐鸣，千船竞渡！

中集团首先渡江。集团主力第 7 和第 9 兵团的两位司令员——王建安和宋时轮，带领广大指挥员早已做好出征的准备。当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消息传出后，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来到渡江作战指挥部，他问王建安："突击渡江有没有成功的把握？"王建安回答说："敌情明，决心大，准备充分，有成功的把握。"谭震林告诉王建安："我们中集团肩负的责任重大，能否从中间突破敌人的江防，事关整个战役成败，不仅总前委关心，党中央也很关心，周副主席在亲自过问。"这时，电话铃响了，要王建安讲话。他接过话筒一听，是周恩来的声音："王建安同志，你和宋时轮同志的两个兵团先渡江，一定要渡过去，在南岸站住脚跟。毛主席今晚不睡觉了，我们都不睡觉了，等候你们渡江成功的好消息！"党中央的关心和鼓励，使王建安备受鼓舞，更有信心去夺取胜利。

现在，王建安最担心的是风。木船行驶借助风力才会快起来。有了速度就能保证胜利。从早上起，江面风平浪静，没想到黄昏时起风了。王建安想起家乡一句农谚：早上起风天黑息，天黑起风三日息。不由得一拍大腿高兴地说："好啊，天助我们！"叫参谋人员立即通知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派专人掌帆，借好风力，提高船速。

4 月 20 日下午 5 时，总前委下达进攻命令，渡江战役打响了。炮兵先向对岸发起攻击。密集的炮弹拖着簇簇火光，越过茫茫大江，飞向南岸，在敌人的滩头阵地、明碉暗堡、江防要塞上爆炸，火光闪闪，浓烟滚滚。敌人反制的炮火也随之飞过江面，落入江中，江水像烧开的锅一样沸腾。在我强大炮火掩护下，由第 7 兵团二十一、二十五军和第 9 兵团二十七、三十三军组成的渡江第一梯队的战船，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力向对岸驶去。在他们当中，有第二十一军 62 师政委周世忠带领的两个突击营，第二十五军参谋长熊应堂随船队指挥的三个突击团。他们与友邻部队一起，在 100 多里宽的江面上，冲破敌人舰艇和江防炮火的重重封锁和拦截，21 日拂晓，在鲁港至铜陵间攻占了敌人的滩头阵地，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后巩固了这些阵地。这时，王建安指挥第 2 梯队的大批人马赶来，一同杀上岸去，将敌人的长江防线拦腰斩断。23 日，攻占了贵池、铜陵。与此同时，第 9 兵团也连克繁昌、南陵。

西集团在湖口至枞阳段实施渡江。4 月 21 日上午，各突击部队举行了简短的出征欢送仪式，兵团、军、师首长给突击队授旗、戴花、发突击队员证，鼓励指战员和船工们奋勇渡江，争当英雄模范。出征勇士们备受鼓舞，

夺取胜利的信心更足。

下午 3 时，炮兵开始射击。几百门大炮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声，炮弹飞过大江，击中目标后立刻形成一片火海，升起一堆浓烟。第 3 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来到炮兵阵地上，连连称赞打得好！打得好！他鼓励炮兵指战员说："总前委要求渡江突击队每门炮至少要把 100 发炮弹打到敌人阵地上。你们现在要狠狠地打，一定要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我们有的是炮弹，你们就放手打吧！"敌人开炮还击，根据弹速和方向，我炮兵很快判断出它的位置，计算出距离远近，然后集中火力加以打击，将它压了下去。

下午 5 时，刘伯承下令渡江作战开始。一支支突击队的勇士们佩戴红花，扛着红旗，雄赳赳地登上船。大大小小的船只，分为战斗火力船和救护船，编排有序，开出引河，进入长江，在江面上一字排开。每只船上红旗招展，桅杆林立，风鼓帆张，桨声哗哗，一齐穿过蒙蒙细雨，向大江南岸飞速划去。

船到江心，敌人阵地上接连飞起照明弹，照得江面通明，发现了我军突击船队，接着是猛烈的火力拦截。游弋在南岸的敌舰和炮艇，也向我军开火。在我军强大炮火压制下，敌舰艇见势不妙开溜了，但江滩地堡、岸边暗碉火力仍强。我突击队的船有的被破坏仍拼命前进。第十五军突击队在抢占滩头阵地时受阻，军长秦基伟透过照明弹，发现对岸那座山临江一面石崖陡峭，敌凭险据守火力不强，马上令突击队改在石崖登陆。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突击队员们攀崖而上，迂回到敌后夺取了香山、黄山等滩头阵地，打开了登陆通道。22 日，第十五军占领东流、至德等地。第十四军随后跟进。第十三军 39 师师长黎锡福与兄弟部队一起，不惜一切攻下了马垱要塞和小姑山，全军过江后迅即攻占了彭泽、官港等地。

第 3 兵团第十一、十二军利用铁板洲有利地形，组成多层次船队渡江。这是十二军军长王近山提出来的。王近山指挥所部攻占铁板洲时，从俘虏嘴里得知，对岸陈家坟至乌沙闸一段是敌第五十五和第九十六军的结合部，共约一个团防守，兵力较弱。王近山向兵团建议，将船队分批出发改为多层组合，以压倒敌人的气势一次性渡过去，即使遭敌火力拦截也不怕。陈锡联、谢富治等反复研究认为可行，并提出第十一军及第十军一个师也统一行动。21 日下午 5 时半，在炮火掩护下，第 3 兵团两个军加一个师的突击部队共 5 个团，乘坐大小 700 多只船从铁板洲进入长江，在数十里长的江面上展开：前面以排、连为单位摆成前三角形，中间以营为单位摆成梯次形，后面以团

为单位摆成后三角形，火炮、机枪组成的火力船位于两翼，救护船跟在后面。船与船、队与队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相互照应，既能发挥火力又便于统一指挥，而且能保持强大持续的突击力量，避免因船队密集增大伤亡。船到江中，遭敌猛烈火力阻击。但在我船上火力和岸上 200 多门大炮共同压制下，敌人阻止不了我船队前进。敌人见我军来势凶猛，锐不可当，狼狈逃窜。不到一个小时，突击部队 5 个团全部登陆并控制了南岸数公里纵深。我军渡江后，安庆守敌第九十六军 141 师和皖西总队吓得弃城逃走。陈锡联令第十军 28 师进驻安庆。22 日，第 3 兵团所辖第十一、十二军和第十军 29 师全部过江，攻占了贵池、青阳、殷家汇等地。到 22 日晚，西集团第 3、4、5 兵团主力部队已大部渡完。

东集团在张黄港至镇江东实施渡江。这是敌江防核心地段，除有重兵把守外，还有江阴要塞的炮群和第 2 舰队的兵舰、炮艇，共同组成立体交叉流动火力网。汤恩伯自吹是“固若金汤，不可逾越”。我军选在这里渡江，是要突破敌人防御核心段直捣核心区京沪杭。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况再坚实的脊背下面也有软肋。在这里指挥渡江的是粟裕。“皖南事变”以来，他曾三次率部渡江作战，就是选准敌人软肋打过去的。这是他第四次渡江作战，更是信心十足，并有三着高棋：

第一着高棋，选熟悉苏南的勇将打头阵，轻车熟路，增加取胜把握。在三野内部挑选了第 9 兵团第二十军军长刘飞、第 7 兵团第二十三军军长陶勇等，将他们从中集团调来东集团。粟裕给刘飞的任务是做东集团先遣军，突击渡江，切断沪宁铁路，策应其他兄弟部队过江。

第二着高棋，猛攻三处，先发制敌。令第三十五军攻打“三浦”（浦镇、江浦、镇浦），钳制南京。令第三十四军攻占瓜洲，威慑镇江。令第二十九军攻占八圩港，扫除江阴北岸敌人据点。

第三着高棋，运用隐蔽在敌营中的地下党组织适时发动战场起义，配合大军渡江。

这三着高棋，相互发挥作用，保证了渡江作战的胜利。

刘飞接受任务感到既光荣又艰巨。为了渡江战役全局的胜利，第二十军这个局部将要付出代价。广大指战员听到消息后既高兴又担心。知兵善用的刘飞理解大家的心情，在动员大会上说：“同志们，大家想一想，有哪个兄弟部队比我们更了解长江，更熟悉苏南呢？”一句饱含深情的话勾起了大家的回忆。当年在常州、无锡、常熟一带抗日的“老江抗”不由得唱起那时的

战歌："长江是我们的，我们千百次自由来往……"无须多讲，广大指战员一致表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定完成作战任务。

暮春时节，晴阴雨雾，变化无常。4 月 21 日，太阳刚露一会脸就躲进阴云中去了。灰蒙蒙的大江之滨，指战员们正忙碌着进一步做好渡江战斗的准备。刘飞挨队挨船查看有没有准备不周的地方。这时传来好消息：昨晚中集团突击渡江作战成功，胜利登陆。这一喜讯，大振军心，刘飞非常高兴。他想起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时，第 7 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当时任红四军政委，自己当团政委，后来当师政治部主任，曾得到王政委不少帮助和支持，至今难忘。现在，老上级加老同乡取得首渡胜利，很想送上一句祝贺话。但同在一条江上却相去几百里远，哪能搭上话？刘飞便把祝贺话变为激励本军的号角，说："同志们，7、9 兵团的老大哥已经胜利渡过江去了，我们也要勇敢快速地渡过去，大家有信心和决心没有？""有！"成千上万人的回答声和着江涛声，久久在江面上回荡。

下午 8 时，东集团总指挥粟裕下达渡江开始的命令。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刘飞指挥二十军分成两个地点渡江。这时，天下雨了，风越刮越大。由三江营起渡的 58 个师遇上逆风，船出不了港。由永安洲起渡的 59 师又因顺风，风速过大，两个先遣营所乘船只在非预定地点登陆，遭敌猛烈攻击。刘飞令长期跟他一起征战的 59 师副师长戴克林带一个团紧急渡江支援。他查看了一下地图，觉得过去的兵力仍不够，又果断将预备队 60 师调来永安洲渡江，要求全师天亮之前全部上岸。然后，他一跃上了指挥船，随 59 师另一个团出发了，将 58 师渡江任务交给军政委去指挥，亲自率主力去增援先期登陆的部队抢占登陆场，巩固滩头阵地。22 日凌晨，二十军突破敌人江防线后攻占了扬中，然后迅速渡过夹江，攻占丹阳、吕城，首先切断沪宁铁路，断绝了南京与上海的交通联系。

就在刘飞率二十军渡江时，他所在的第 8 兵团第二十六军张仁初部在扬州的邗江县驷马、王圩等地渡江，第三十四军和第三十五军继续钳制镇江和南京。第 10 兵团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在张黄港至靖江段渡江。靖江的对岸便是长江下游最大的江阴要塞。要塞内有 100 多门各种类型的火炮和一个流动炮团，其火力网组成扇形，可控 50 公里的江面。我军炮兵无法将它压制。因此，在渡江战役发起前便加强了策反工作。通过隐蔽在敌营中的地下党组织，做好了江阴要塞战场起义的准备。21 日晚，第 10 兵团各军渡江时，敌江阴要塞奉上司命令开炮，但炮弹漫无目的地飞向

夜空。当我军快登陆时，江阴要塞守军在炮台总台长唐秉霖率领下，7000 多官兵宣布战场起义，使第 10 兵团 4 个军顺利过江。

江阴要塞成无塞，蒋介石用来挡住我军进攻的一张王牌没有了。他气急败坏地骂道："戴戎光这个混蛋，一炮不打，让共军轻易地过江了。"戴戎光是江阴要塞司令。是他真的不打吗？不是的。他奉汤恩伯的命令，一再下令向江面开炮。但炮弹打出去不知所向，你叫他怎么办？兵心所向，都不愿替蒋介石卖命，而愿迎接解放。蒋介石骂人又有何用？

第 10 兵团 4 个军过江后，第二十九军切断沪宁路，阻敌向上海撤逃。第二十八军在政委陈美藻、军长朱绍清率领下，切断沪宁路后向太湖以西推进。第二十三、第三十一军攻占溧阳、武进后，向郎溪、广德地区挺进。

第 8 兵团先遣渡江的第二十军在刘飞率领下，沿金坛、溧阳向广德追歼逃敌。第二十六军在张仁初率领下，在天王寺、上沛埠地区堵截、围歼从南京撤逃的敌四十五军 312 师，然后阻敌东逃。

在渡江作战中，我军虽无坚船利炮，同样敢打敌人的舰艇，共击毁舰艇 18 艘。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向我军开火也被击伤，搁浅在镇江附近的江面上（后逃脱）。经过争取，敌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于 4 月 23 日率 25 艘舰艇（军舰 9 艘、炮艇 16 艘）在南京燕子矶江面上起义，迫使敌海军江防舰队 23 艘舰艇向我军投降，加快了渡江战役的进程。

4 月 23 日，我三十五军解放了国民党 22 年来的统治中心——南京，解放军战士登上总统府的楼台，扯下挂在楼台上的青天白日旗，升起鲜艳的八一军旗。这一降一升，宣告了蒋家王朝的灭亡和南京城的新生。

我百万大军全线渡江后，敌军一触即溃，汤恩伯害怕江防部队被分割围歼，根据蒋介石早已定好的撤退方案，4 月 22 日下午 4 时下令总退却。芜湖以西部队向浙赣线撤退，芜湖以东部队分别向上海、杭州撤退，妄图控制皖、浙、赣山区，构成新防线继续顽抗。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总前委及时调整部署，令东、中集团兼程前进，合围南逃之敌，并决定两个集团由粟裕统一指挥。粟裕随军进驻常州，不断向东、中集团发出电令。令东集团迅速向太湖以西前进，并以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军为先遣部队进占宜兴、长兴，第二十八军还应进至长兴西南的梅溪地区；令中集团迅速从南陵、宣城渡过青弋江向广德疾进，中途不要为小敌所纠缠。此路较远，粟裕要熟悉皖南的第二十五军参谋长熊应堂带领该军，选捷径直奔梅溪与第二十八军会合，将逃敌兜住。4 月 27 日，

我东集团和中集团在吴兴（湖州）会师，然后，东集团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军一部从东面展开，中集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二十四、第三十三军从西面展开，将南逃之敌包围在郎溪、广德地区，经过两天激战，29 日将敌第四、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五十一、第六十六军 5 个多军全部歼灭，计 8 万多人。在这次战斗中，熊应堂协助军长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所辖第 73 师副师长吴怀才、第 75 师副政委李正清带领所部指战员奋勇拼杀，将敌一个整编军全部歼灭。陈美藻的第二十八军歼敌 11000 多人。

郎广围歼战结束后，东、中集团撤销，各军归建。王建安根据总前委命令率兵团主力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军向浙江挺进。冒着风雨穿过层林叠嶂的天目山，然后以第二十二军从北面，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军从西面和南面合围杭州，一举全歼守敌，5 月 3 日解放杭州。

这时，二野第 3 兵团第十一军已进到浙江西南地区，第十二军进到浙江中东部地区。5 月 16 日，王建安指挥第二十一、二十二军进军浙东。第二十二军出萧山东进解放了余姚、宁波，第二十一军出绍兴于 5 月 25 日解放奉化，离蒋介石从他的老家溪口逃走只有一星期。据说蒋介石逃走前，在他母亲坟前长跪不起，老泪纵横。是思亲落泪，还是为自己的惨败落泪，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他知道这一走再也回不来了，便抓了一把土带走。王建安事先就接到上级指示，解放奉化溪口时要特别注意纪律。他令第二十一军第 61 师到了溪口要保护那里一草一木，绝不能有任何损坏。正义之师秋毫无犯，得到了奉化人民的拥护。

西集团突破长江防线后，刘伯承根据敌人溃逃的混乱趋势，向总前委建议二野第 4 兵团可不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浙赣铁路进贤至义乌一线，割断汤恩伯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围歼汤敌，使白敌不能东顾。总前委复电同意。于是，刘伯承令第 3 兵团向金华、第 4 兵团向上饶、第 5 兵团向衢县追击前进。

第 3 兵团在陈锡联、谢富治指挥下，第十一军在右，第十二军在左，并行追击。第十一军副军长郑国仲率部追歼敌第九十六军 212 师。该敌狡诈，又善山地作战，且战且退，虚虚实实，我军咬上它后 5 天打了 6 仗未能歼灭。郑国仲想起家乡“坐径”打野猪的办法，令 31 师绕道前进在敌必经之地拦截，其他两师猛烈追赶，在江南游击队配合下一举将其全歼。然后经祁门、屯溪进入浙江。5 月 10 日解放了衢县、遂昌、云和、龙泉。王近山率

第十二军经石台、太平，4 月 28 日奔袭皖南重镇歙县，围歼敌第一〇六军 282 师，出敌不意攻进城内，歼敌大部，残部在逃跑途中亦被歼灭。5 月 5 日，将敌第一〇六军 192 师追至桐庐，迫使其全部投降。7 日解放金华，歼敌李延年第 6 兵团残部，又追至义乌迫敌第 110 师投降。9 日，第 35 师东出，解放了诸暨、嵊县、新昌。同日，第 34 师南进，解放永康、缙云，共歼敌 35000 多人。第十一军、第十二军共同解放了皖南、浙西 20 多座县城。

第 4 兵团在陈赓、郭天民指挥下，以第十五军为左纵队，向上饶进击，第十三军为右纵队，向弋阳进击，第十四军作后卫。4 月 29 日，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率部攻占乐平，继续南追，在漆工镇追上敌第八十军 143 师。秦基伟留小部分部队截留该敌，令第 43、第 45 师迂回从两侧将敌包围，先喊话劝降，敌人欲战不能，欲逃无路，大部分放下武器，但师长阎尚元等企图顽抗，被我第 43 师 127 团一阵猛烈攻击，将其全歼。接着日行 140 里奔袭铅山，歼敌交警两个总队近 2000 人。然后攻占了横峰、上饶、广丰，切断了浙赣铁路。5 月 3 日，第十三军解放贵溪后，军部令第 38、第 39 师追歼敌第八十军军部及 81 师。敌向弋阳逃窜。第 39 师师长黎锡福先抵弋阳城南，将敌包围起来。敌八十军副军长王振声见窜逃无路，率部投降。经过教育争取，王振声协助我军乘坐汽车追歼已渡河逃窜的敌 81 师，迫敌投降。此役未费一枪一弹，就使敌八十军军部和 81 师 5000 多官兵放下武器。黎锡福接着向南挺进武夷山区，其先锋 115 团进入福建云际关地区，歼敌 1000 多人。第十四军作后卫，在十三军的右侧向鹰潭方向疾进。5 月 5 日解放鹰潭和东乡。继又穷追猛进，两夜三天跃进 320 里，解放了金溪和南城，打破敌第 12 兵团司令兼十八军军长胡琏构筑的金（溪）南（城）临（川）防线。胡琏在淮海战役中是我军手下败将，曾只身逃脱。他听说我军进了金溪，胆战心惊，拼命逃跑。我军坐上汽车追 3 个小时也未能追上，只歼其一部。

第 5 兵团在杨勇、苏振华指挥下，第十六、十七军在第 3、第 4 兵团之间出击浙赣线，第十八军作后卫跟进。5 月初，第十六军攻占了浙江开化、常山、衢县、江山和福建浦城、松溪、屏南等城镇。第十七军第 49 师政委况玉纯、第 51 师师长闵学胜率部与第 50 师一起向南追击，沿玉山、广丰一线进入福建，先后解放崇安、建阳、建瓯、南平、古田、尤溪、三明等城镇，歼敌刘汝明残部近万人。第十六、第十七两军共同解放了闽北。第十八军攻占了婺源及鄱阳湖周边各县，组建了鄱阳军分区。

到 5 月上旬，二野部队完全控制了浙赣铁路进贤至义乌一线，解放了浙

江大部、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地区，彻底粉碎了汤恩伯在此组建新防线的图谋。

5 月 14 日，四野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三军组成的先遣兵团，在鄂豫和江汉军区部队配合下，由刚升任第 12 兵团副司令员的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具体指挥，在武穴至团风之间渡江，一举突破敌白崇禧集团的长江防线。南岸守军慑于我军威力，当即有 5 个营起义，其余不战逃去。第四十三军副政委袁克服同军长、政委一起率部解放了阳新、通山。第四十军第 120 师参谋长祝顺鹏与师长一起率领该师跟友邻部队一同解放了大冶、鄂城，逼近武昌。江汉军区独立第 2 旅在参谋长秦振和旅长带领下直指汉阳，第四十军第 153 师从黄陂逼近汉口。15 日，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第 19 兵团司令兼第一二八军军长张轸，率该军两个师共 25000 人在贺胜桥、金口起义，打乱了白崇禧的部署。16 日，白崇禧下令全线撤退，仓皇南逃。兵败如山倒。汉口至九江段构筑的长江防线，不等我军进攻便自破了。当日我第四十军 118、153 师和第四十三军一部分别进入汉口、武昌，江汉军区独立旅进入汉阳，武汉三镇全部解放。

在这次渡江作战中，鄂豫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罗厚福、副司令员曾广泰、参谋长熊心乐、后勤处长徐锡煌，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黄宏伸带领本分区部队给予了大力配合和支援。曾广泰回忆说：“渡江之前，我们被韩司令员召集去开军队与地方的联席会议，大家听说要打武汉，个个摩拳擦掌。我们 3 分区罗司令员发言说，只要你韩司令员发话，要什么有什么，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罗司令员简简单单两句话，说出了当时大家的心情。是啊，武汉不是现在要打，十八年前红军就提出过‘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尽管是犯了‘左’倾幼稚病，但也是人心所向。革命人民，尤其离武汉较近的红安老区人民，遭受以武汉为中心的反动势力的迫害最深，都希望能早一天解放它。听说打武汉，不仅是地方武装同志受鼓舞，广大群众也极受鼓舞，大家纷纷送粮食、柴草支援前线。”

武汉解放后，二野第 4 兵团陈赓、郭天民指挥第十四军攻占了南昌。第 5 兵团第十八军攻占了九江、庐山。两军一同解放了江西北部。至此，从南通到武昌沿江两岸广大地区均被解放。

长江防线全面崩溃，敌营中“划江而治”的美梦也随之破灭，代总统李宗仁与所谓的国民政府逃去广州。李宗仁由台前渐退幕后，蒋介石由幕后走到台前。他从老家奉化溪口跑到上海指挥汤恩伯守住上海，企图凭借上海至

台湾沿海一线和中南、西南地区与我军周旋，以求东山再起。

在二野和三野一部向南追歼逃敌的同时，三野第 9、第 10 兵团向上海周边地区开进，准备发起上海战役。

这时，上海守敌有 8 个军 25 个师共 20 万人，其中以 6 个军约 20 个师守浦西，以两个军 5 个师守浦东，另有驻上海的海军和空军部队，在汤恩伯的指挥下，形成陆海空立体防御。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国际上亦有名。为求完整接收，避免战火破坏，陈毅、粟裕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和要求，决定由第 9、第 10 兵团共 8 个军攻占上海。具体部署是：由第 10 兵团司令员叶飞指挥第二十六、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三军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先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阻截敌人水上退路；由第 9 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指挥第二十、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一军及特种兵一部，先攻占浦东地区，协同第 10 兵团封锁吴淞口，切断敌人向东、向南的退路，而后由东、南、西三面协同第 10 兵团围攻上海。部队进入市区作战，力争不使用重武器射击，以最大限度降低居民损失。

5 月 12 日，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头 10 天是在外围作战，歼敌 2 万多人，占领了敌人外围的警戒阵地，并突入一部分主阵地，为攻占市区创造了有利条件。然后，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攻击步骤先解放上海，后解放吴淞的指示，和总前委关于攻占市区应同时由南向北多路攻击的要求，各部队积极做好了总攻的准备。陈毅、粟裕为加强攻城力量，又增调第 7 兵团第二十三军和第 8 兵团第二十五军及特纵全部炮兵参战。

5 月 23 日夜，三野参战部队向上海市区发起总攻。当晚，从西北方向进攻的第二十九军攻占了月浦，陈美藻和朱绍清率第二十八军迫近吴淞。24 日早晨，刘飞第二十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全部浦东市区，第 81 师师长罗映臣所在的第二十七军攻占了虹桥、徐家汇车站。这时，早已待在军舰上准备逃跑的汤恩伯，见大势已去，一面调集力量加强吴淞阵地以保退路，一面指挥退却，自带蒋系 5 万人马从海上逃走，让副司令杂牌军刘昌义坚守上海。粟裕即令各军楔入市区，分割截歼逃窜之敌。24 日夜，第二十七、第二十、第二十三军先后攻进市内，采取多路跃进、快速穿插和迂回包围的战术，全部控制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25 日，第 10 兵团主力直扑吴淞，第 9 兵团主力强渡苏州河，会歼敌军主力。当晚，军政治部副主任陶励所在的第三十军和第三十一军攻克高桥，控制了黄浦江入海口东面的要地。26

日，张仁初第二十六军攻占大场、江湾；陈美藻第二十八军和第三十三军一起攻占杨行、庙行；刚升任副军长的熊应堂率第二十五军与第二十九军一起进攻吴淞。新官上任三把火，熊应堂将三把烈火烧进吴淞。号称长江第一要塞吴淞的守敌怎么也抵挡不住，不到半天就被英勇无敌的解放军战士攻克了。我军占领吴淞和高桥后，等于封住了瓮口，上海守敌成了瓮中之鳖。与此同时，第二十七、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军一部渡过苏州河，迅速占领了该河以北市区，守敌纷纷被歼，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向我军投诚。27 日，上海全部解放。6 月 1 日，熊应堂率部乘胜渡江，进军崇明岛，歼守敌暂 1 军近 4000 人，解放了全岛。

上海的解放比原来估计的时间要短一些，只花了 22 天，歼敌 15 万人，缴获了大批装备物资。这对继续解放沿海地区和全国其他地方都有帮助；同时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它告诉帝国主义者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不要妄加干涉。如若不信，英舰“紫石英号”就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从 4 月 20 日晚渡江作战到 6 月 2 日解放崇明岛，通称渡江战役，历时 42 天，共歼敌 43 万人。这次战役，我军用木船作兵舰打过长江去，直捣蒋介石的老巢京沪杭，一举推翻他 22 年的反动统治，大快全国人心。毛泽东得知这个特大喜讯后，将无限感慨与激情吟成一首气撼山岳的诗，将祝捷与继续进军艺术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凯旋诗中不同凡响的绝唱。诗云：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打铁要趁热。陈毅、粟裕不因接管大上海繁忙而耽误了“追穷寇”，即令刚从硝烟中走出来的第 10 兵团司令员叶飞率部向福建进军，扫除境内残敌。叶飞指挥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从 8 月 11 日至 20 日，先后解放了福州、舟山群岛，次年 9、10 月间又解放了泉州、漳州、厦门。从此，位于祖国东南部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台湾和江西等省，除台湾省及金门、马祖等岛屿外都得到了解放。

三路进击　解放中南

百万雄师过大江，华东南解放了。而在中南的敌军尚有两个集团。一是白崇禧集团辖有 5 个兵团 11 个军 29 个师，退守湖南、广西。二是余汉谋集团辖有 3 个兵团 10 个军 31 个师，另有 4 个保安师和 4 个暂编纵队，据守广东。他们企图利用崇山峻岭和湖泊河流等有利地形，阻止我军南进。

以毛泽东为首的统帅部分析中南敌情后，认为白崇禧狡诈，余汉谋圆滑，尽管他们一狡一滑，其共同点是能挡则挡，不能挡则逃。为了彻底歼灭中南敌军，中央军委根据统帅部的意见作出了精心部署：先以二野第 4 兵团和四野第 15 兵团，由江西出广东，占领广州，歼灭余汉谋集团，然后第 4 兵团由广东进入广西南部，迂回白崇禧集团的右侧背，四野主力则进至柳州、桂林地区，形成对白崇禧的大包围，将其全歼。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林彪率四野主力于 4 月中旬从平津地区南下，行程 2400 余里，到达湖北的襄阳、随县、安陆、孝感、黄陂、浠水一线。5 月 12 日，党中央决定在原中原局的基础上成立中南局，原中原军区与四野指挥机构合并改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林彪任中原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二书记兼政委，邓子恢任第三书记兼第二政委，统一领导中南地区的全面工作。

5 月 14 日，武汉解放。5 月 20 日，湖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在孝感花园宣布成立。李先念任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撤销鄂豫、江汉区党政军机关及其下辖地级机构。所属各独立旅改编为湖北军区独立第 1、2、3 师（后又成立独立第 4 师）。全省设黄冈、孝感、荆州、沔阳、大冶、襄阳、宜昌、恩施 8 个地区和军分区。6 月上旬，湖北省党政军机关迁入武汉。全省除鄂西外都已解放，地方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一大批军政干部跟随李先念一起到各级党政军机关工作。

对干部来说，军队和地方互相调动是常事。李先念从 1926 年参加革命以来互动过三次。1929 年，他从红 31 师第 5 大队下到高桥区任区委书记是第一次。1931 年他在陂安南任县委书记又带领全县青年参加红四军是第二次。现在他由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到湖北担任党政军领导是第三次。三次互动都是革命需要。

这次跟李先念一起到各级党政军机关工作的有一大批干部，其中属红安



1987 年作者访问汪进先，请他审阅访谈记录。

籍团以上干部就有 20 多人。如原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工商部副部长曾传六任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民政部副部长周光坦任中南检察署副检察长，二野后勤部供给处长、接管部部长郑维孝任中南监察厅副厅长，原鄂豫区党委组织部长程坦任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不久任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前中原军区晋城留守处政委杨子明负责组建湖北省合作局任局长。曾任旅后勤部政委邹德负责组建湖北气象局任局长。有意思的是，四野政治部命令秦忠去广州担任公安纵队副政委兼师政委被李先念留下来了。秦忠说："司令员，你知道我是当兵打仗的，到地方去能干什么？"李先念说："秦忠，革命胜利了，留下来一起建设我们的家乡湖北省多好哇！我们都是打仗出身的，不会就学嘛！在湖北人熟地熟，你跛着个腿到人生地不熟的广州去搞么事。"就这样，秦忠的师政委没当成被派到沙市去担任纱厂、油厂、电厂三厂总经理，恢复和发展地方工业生产。原鄂豫 4 地委组织部长汪进先任大冶工矿特区党委第一副书记，抓恢复矿区生产。前中原军区驻华北留守处处长汪立波任省农林局处长兼金水场场长，抓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三野城市接管部部长董绍明任省工商管理处处长，抓恢复工商贸易。红安县委副书记汪群任武汉市江汉区区长，抓城市工作。原鄂豫 5 分区党委组织部长刘敏任罗田县委书记，抓农村工作。中原突围后在山东临沂任县委副书记的黄宏儒回到家乡红安任县委书记，在天台山地坚持游击战争的黄安工委副书记马友才任县长，领导老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这时调到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公安部队和各军分区工作的则有：四野第 46 军后勤部长程儒珍任省军区后勤部长，同时还有原鄂豫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罗厚福任省军区副参谋长，原江汉军区独立旅参谋长吴昌炽任省军区独立第 1 师副师长，前中原军区第 1 纵队卫生部长赵基魁任中南公安部队卫生处长，原鄂豫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曾广泰任孝感军分区司令员，原 3 军分区

参谋长熊心乐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原红安县县长徐锡煌任孝感军分区后勤处长，红安县大队大队长张绍基任军分区独立团团长，县大队政委李一（张天华）任孝感航空站政委，原鄂豫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黄宏伸任黄冈军分区副司令员，原鄂西北军区房（县）保（康）谷（城）联合军事指挥长林恺成任黄冈军分区副政委，原江汉军区独 2 旅参谋长秦振任荆州军分区副政委。

干部有回来也有调出。原鄂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邹国厚调任河北公安总队总队长，副司令员赵鹤亭任四野第五十军 148 师副师长。在随（县）、枣（阳）一带活动的原桐柏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李定灼任四野第五十八军 173 师师长。

过去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各级党政军机构，是因地制宜，往往跨省跨县建立。现在所有地方解放了，则按历史区划建立，象征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成千上万的人为之奋斗与牺牲换来的，实在不易！所以，不管是回来还是走出去的革命幸存者，他们都满怀豪情壮志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将新生的国家建设好！

各级党政军机构成立后面貌一新，但面临的却是战争留下的百孔千疮，百业待兴的混乱局面，工作任务千头万绪，十分艰巨。作为湖北省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李先念，从湖北实际出发，以农村为重点，同时兼顾城市，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打击资本家投机倒把，狠刹涨价风，打击匪、霸、特造谣惑众，安定社会秩序，很快调动了广大农民、工人和城市居民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大家都以实际行动恢复工农业生产和商贸工作，踊跃支援大军南下作战。

省委、省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指示各地继续全力做好支前工作。指出“我省支前任务极大，除保证百万大军过境供给及常驻武汉党政军食用外，必须支援在湖南作战的部队。各级同志应愉快接受此光荣战略任务，深入群众做支前动员，完成此一任务，以保证大军南进所需要的粮秣供应。”遵照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指示，红安成立了以县长马友才为指挥长、县委书记黄宏儒为政委的支前司令部，下辖五个区成立支前指挥部，根据“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合理负担，不搞平均摊派”的政策，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全县掀起了支前高潮。根据 4 月至 7 月不完全统计，全县筹集粮食 300 多万斤，柴禾马草 1000 万斤，修复红安至七里坪、红安至宋埠、红安至河口三条公路共 200 多里，大小桥梁五处，沿公路线建临时粮草仓库 18 个，为四野过境大军南下做出了贡献。

7月初，在全省广大军民支援下，四野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率第三十八、第四十七、第四十九军在湖北独立第1、第2师配合下，发起宜（昌）沙（市）战役。从7月4日开始，向盘踞在远安、当阳、宜昌、沙市等地敌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部发动进攻。稍事接触，敌即向江边撤退，利用晚上暗渡，逃往江南。我军乘胜追击。第151师政治部主任江腾蛟所在的第三十八军与第四十七军解放了当阳、兴山，16日解放宜昌，然后第四十七军渡江进入湖南境内。另一路第四十九军政委徐斌洲与军长钟伟率所部，在湖北独1师配合下，15日解放了沙市、潜江、监利。接着成立沙市、宜昌两个警备司令部，原江汉第2军分区政委刘友海任沙市警备司令员，调黄宏伸任宜昌警备司令员。

在沙市，徐斌洲、吴昌炽、刘友海三位老战友难得地见了面。当年徐斌洲任红四军12师34团政治处主任，吴昌炽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刘友海任12师司令部参谋。在红四方面军向西转战途中，在长征路上，他们经常见面，抗战以后就各奔东西。徐斌洲去了山东，吴昌炽、刘友海回到鄂豫皖，一别就是12年。这12年从何谈起？三人不约而同地把话题放到眼前怎么过江追击敌人上面。吴昌炽、刘友海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开始后，基本上在江汉地区坚持斗争，情况熟，办法多。他们说，我们早已备好船只、船工，只等一声通知，马上可以集中起来渡大军过江。徐斌洲听了高兴地说："你们的支前工作做得这样好，我们前进的困难就少多了。"

17日，程子华指挥所辖3个军及两个湖北独立师追歼逃敌，仅歼其尾计15000多人。18日宜沙战役结束。湖北独立第1、第2师和各军分区武装留在境内。四野司令部将第三十九军配属13兵团。程子华统领4个军向湘北进军，一举解放了常德、岳阳。与此同时，四野第12兵团所辖第四十、四十五、四十六军解放湘赣边广大地区。然后第12、第13兵团一起向南挺进，突破白崇禧依托九岭山脉、洞庭湖和汨罗江组成的防线，逼近长沙。

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白崇禧的背后起火，想占住湘中与我军顽抗的图谋破灭，连忙撤至以衡阳、宝庆（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依托湘江、资水，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的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的芷江与湘鄂边的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半弧形的湘粤联合防线，企图继续阻我前进。

根据白崇禧的作战特点和部署，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电示四野：白崇

禧的本钱越来越小了，也就越来越机灵，非到万不得已不会和我作战。因此，对白作战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以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会白崇禧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使他最后不得不跟我作战。为此，四野和二野第 4 兵团及第 5 兵团十八军要远距离奔袭广东、广西，争取在 11、12 月解放两广，消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主力。

遵照上述指示，四野决定兵分三路：以第 13 兵团率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为西路军，取道沅陵、芷江直插百色、南宁，实行断敌西退黔、滇的战略迂回任务；以第 15 兵团、二野第 4 兵团和两广纵队为东路军，夺取广州，尔后第 4 兵团继续西进，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更大的钳形包围；以第 12 兵团率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九军为中路军，首先在湖南衡阳、宝庆地区展开攻击，牵制敌人，尔后尾追敌人进入广西，协同第 4、第 13 兵团歼灭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第四十七军位于湘西北的永顺、大庸以南，监视敌宋希濂集团，保障湘桂前线侧翼安全，并掩护二野主力入川前的集结。二野第 5 兵团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在湘南投入战斗。

9 月 13 日，我西路军由桃源、常德一线出发，向沅陵、溆浦、芷江地区挺进。部队在远距离、长时间的歼敌夺城战斗中十分疲惫。第三十八军 151 师政治部主任江腾蛟，第三十九军 117 师师长张竭诚，第 152 师副师长程启文身先士卒，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励指战员们发扬勇敢顽强、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去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战斗胜利。到 10 月 5 日，他们所在部队与兄弟部队一起连克沅陵、泸溪、辰溪、溆浦、怀化、芷江、安江、洪江等 10 余座城镇，控制了湘黔公路，切断了白、宋两敌的联系，堵住了白崇禧主力西窜贵州的道路。

中路军从 9 月 30 日开始奔袭衡阳、宝庆外围地区，到 10 月 3 日先后突破了敌人第一线阵地。白崇禧发觉我军进攻衡、宝地区，即调动兵力应对。先以 6 个师分成一、二梯队北上，打击我由永丰（双峰）南下的第四十一军。当敌人数次攻击被我军击败后，他又将主力东调，企图打击从金田向渣江地区前进的第 12 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所率部队。白崇禧想给韩先楚这位“旋风将军”一个当头棒，一来挫我锐气，二来为他争取局部主动。于是以两个师在渣江南面阻击，以 5 个师在第 11 兵团司令鲁道源指挥下，向我四十军展开攻击。与此同时，白崇禧又抽调两个师西去武冈、绥宁，阻我西路军东进。

这一新情况给我军在湘南地区寻歼白崇禧集团主力创造了有利战机。林

彪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衡阳、宝庆地区与白崇禧主力展开决战。但为避免第一线部队因分散和过于突出而遭敌袭击，以及准备诱敌北进予以歼灭，于10月5日上午下令正面挺进部队暂停前进，集中兵力，调整部署；同时令西路军由会同、黔阳东进宝庆、祁阳地区参战。二野第5兵团第十八军向常宁、祁阳挺进，阻止敌人渡过湘江。第四十六军向耒阳逼近，从右侧钳制敌人。二野第5兵团第十六、第十七军向渣江地区前进，准备参战。

但是，我第四十五军先头部队135师在副军长张天云指挥下，前进途中未能接到10月5日停止前进的命令，于当日夜晚在金兰寺、水东江之间，乘敌空隙越过衡宝公路插入敌后，进至沙坪、灵官殿地区。部队停下以后，张天云和135师师长丁盛接到军部命令停止前进。他们抓住这一有利情况，占据有利地形，控制要点，构筑环形防御工事，做好两手准备：敌人进攻时顶住，敌人退却时堵击，争取时间，配合正面各部队的进攻。敌人发现我135师对其整个部署构成了严重威胁，于6日集中第七、第四十八军4个多师的兵力连续猛攻，张天云和丁盛沉着指挥将他们击退。这时，我西路军已进至芷江、黔阳、洪江，截断了敌西窜贵州的道路，东路军也多路攻入粤北，敌人的“湘粤联合防线”被我军从左右两翼突破。白崇禧见此情况，感到在衡宝线与我军作战对自己不利，便于7日零时下令全线撤退。“小诸葛”使出大诸葛《阴符经》中的计策，要求所部悄悄地撤，快快地跑，真有点“神出鬼没”。

我军发觉敌人撤逃较迟，时间已到7日凌晨5时。第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与两位副司令员陈伯钧、韩先楚等立即分头组织指挥正面5个军13个师实施全线追歼，同时向位于南、西、东三面的各部队发出命令：

令第135师在敌人退逃路上占领要点堵击、侧击，迟滞南逃之敌；

令西路军迅速东进，占领武冈、黄金桥一线，截住西窜之敌；

令第四十六军向衡阳、耒阳疾进，堵击向东南逃窜之敌。

令第十八军向常宁、祁阳方向兼程前进，截击南逃之敌。

其实张天云和丁盛早已指挥135师顽强抗击敌4个多师轮番进攻，迟滞敌人达一天之久，使尾追和平追的我军各部于8日拂晓前在牛头江、石桥铺、灵官殿一线追上了退却的敌人。9日拂晓，张天云指挥135师反击，与追击前来的友邻部队取得联系，堵住了敌人南窜的道路。

这时，在正面担任左右两翼迂回的我第四十、四十一军，分别插到了敌人西侧，与北面的第四十五、四十九军一起，完成了对敌人第七、四十八军

4个多师的包围。10日，肖劲光集中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九军共13个师的兵力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从北、东、西三面展开向心攻击，并集中3个师由北向南进行主攻，一举突破敌人的防御，乘胜向敌纵深穿插分割，各个围歼。经两昼夜激战，到11日下午，将被围在祁阳以北五峰山地区的白崇禧主力第七军军部及171、172师和第四十八军之138、176师等部共2万余人全部歼灭。参加这次战斗的有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第四十一军154师师长卢燕秋，第四十九军政委徐斌洲和后勤部长毛普安，第四十五军副军长张天云等。战后，韩先楚感慨地说："可惜呀，鲁道源没逮住。这位鲁司令当初显得好'鲁'，要同我决一高下。想不到他是个色厉内荏的家伙，表面凶，骨子里怕得很。他两次跃跃欲试，想跟我干一仗，但想想怕了，最后不听白崇禧的命令自己先溜了。"

西路军接到命令后，将进占武冈、黄金桥一线的任务交给第三十九军117、152师。117师师长张竭诚和152师师长罗华生、副师长程启文率所部分别从黔阳、洪江出发，日夜兼程前进，8日上午抵达武冈县城郊。两师会合后，按照军部命令，117师350团协同152师主力抗击并钳住武冈附近的敌第一二六军305师，117师主力与152师455团攻打武冈县城。张竭诚和程启文带领参战各团团长勘察了地形，认真研究了攻城部署。这是两人相隔15年后并肩作战。15年前，两人都在红二十五军部工作。张竭诚任军部交通队排长，程启文任军政治部巡视员。在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两人经常战斗在一起。抗战开始后两人分开了，平津战役又走到了一起，但未并肩作战。现在，他俩在湘南共同作战，高兴中带几分谦虚，张竭诚要程启文负责指挥，程启文决意不可，最后是两人共同指挥。俗话说得好，"一人不及两人智"，两位师长用心制订了攻城方案，在全体指战员奋力攻击下，仅用一个半小时就打下了武冈城，全歼守敌3700多人。9日解放了武冈。

宝庆守敌第十四军62师见武冈失守，即率所部4个团于当日弃城西逃。10日，被正在东进的西路军在石下江地区截住。这时我各路追击部队也相继赶到，将敌包围全歼，并迫使敌新编第八军独立1师在石下江以西地区投降。敌人的其余部队迅速向广西境内逃去。

第四十六军接到命令后，在军长詹才芳率领下于8日攻占了衡阳、耒阳，歼敌3000多人。并以一部继续西进，攻占了衡阳至祁阳间湘桂路两侧地区，完成了堵截敌人向东南逃窜的任务。

第十八军接到命令后，先后解放了郴县、桂阳、常宁等城镇，完成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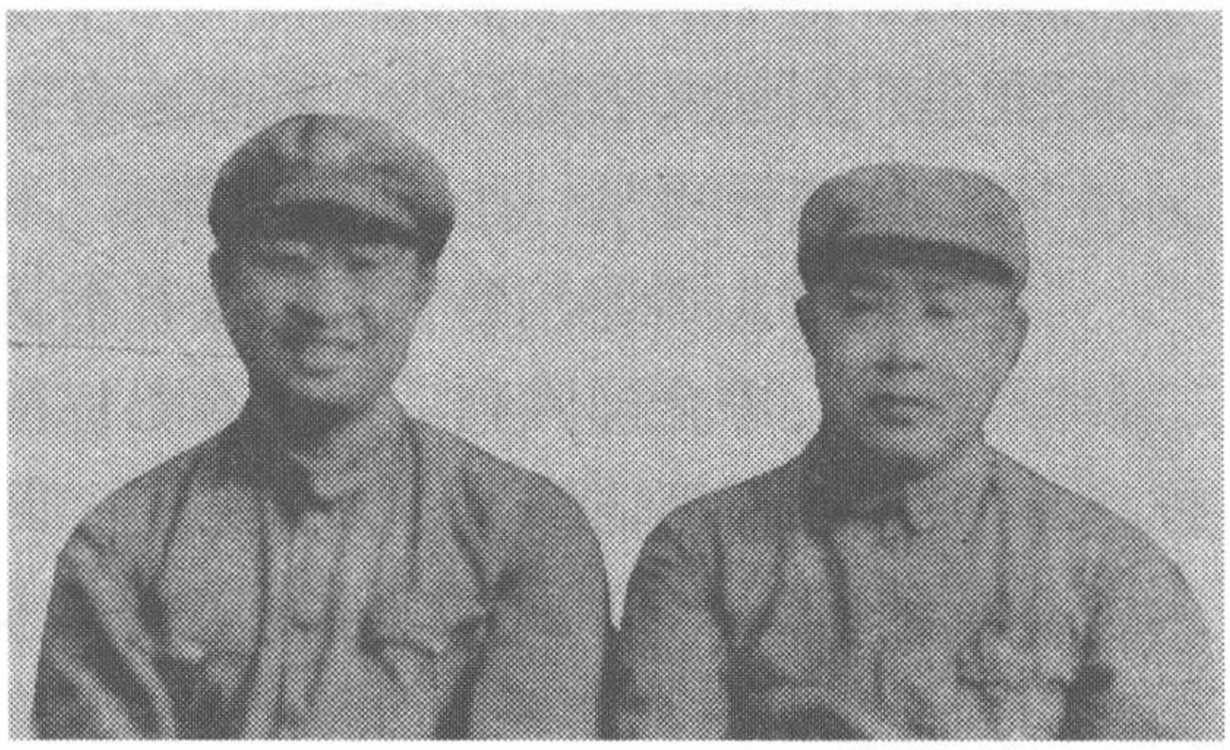
后与正在开进中的二野第 5 兵团会合归建，准备参加湘鄂西和入川解放西南的作战。

自宜沙战役结束后一直坚守鄂湘交界处的第四十七军，在打退敌宋希濂第一二二军东犯以后，乘胜解放了长阳、鹤峰、桑植、大庸等地，歼敌共 9000 余人，保障了衡宝战役中我军侧翼安全，同时掩护了二野向湘西开进和集结。

白崇禧逃进广西，战场情况有所变化，我军原定部署须作调整。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电示林彪：为了不使敌人逃掉，保障战略迂回，西路军和东路军应适时前出于敌后，截断敌人西窜南逃的退路，中路则应在衡宝以南地区暂停前进。

那么东路军现在何处呢？

为了解放中南，中央军委于 5 月间电令二野第 4 兵团暂属四野指挥，与四野第 15 兵团和两广纵队组成东路军，共 22 万人，由第 4 兵团司令员陈赓统一指挥。8 月初，在江西吉安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陈赓和第 15 兵团司令员邓华主持会议并作形势报告，郭天民作军事报告，对进军两广和解放云南的战略意图、战役目的、军事部署和后勤保障，作了详细阐述，然后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为新组成的东路军打好了思想基础。会后，第 15 兵团第四十八军先行去解放赣南，为大军南下打通道路。9 月初，叶剑英又赶赴赣州传达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对进军两广，接管广州，进行了具体部署。东路军如此受中央重视，是因为他不仅要歼灭白崇禧集团，还要歼灭余汉谋集团。两敌都处在边境地区，弄不好有可能逃掉，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



陈赓（左）与郭天民

9 月底，集结在湘赣粤边地区的东路军，在湘赣粤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和粤中纵队共 4 万人的配合下，也分三路向广东进军。广东守敌余汉谋的 12 万人马，在蒋介石“巩固粤北，确保广州”的指令下，将主要兵力部署在韶关、梅县、汕头和韶关至广州铁路沿线，企图阻止我军入粤。10 月 2 日，

我军从赣南向粤北发起进攻。7 日，右路陈赓、郭天民指挥第 4 兵团首先攻占了韶关。接着，中路邓华指挥第 15 兵团进占翁源。左路是 1946 年从东江地区突围北上山东的两广纵队。他们日盼夜盼打回老家，现在时候到了，在粤赣湘边纵队配合下，凭着熟悉的地理民情，连克和平、龙川、河源等县，直插博罗，逼近广州。在我三路大军的强大攻势下，敌军一触即溃，纷纷向广州撤逃。我各路大军乘胜急追，长驱直入。这时，从南京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又仓皇逃往重庆，余汉谋集团主力向粤西溃退。14 日夜，邓华率第四十三、四十四军进占广州。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进至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此同时，陈赓、郭天民率第 4 兵团指挥机关也到达广州。为了追歼逃敌，部队没有进城，在城外露宿。陈赓、郭天民两位黄埔校友，自然而然地聊起黄埔军校来。陈赓问郭天民：

“你离开黄埔多少年了？”

“我是广州起义后离开的，算起来有 22 年了。”郭天民回答。

“我比你离开更早一些，”陈赓说，“不知黄埔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黄埔离这儿不远，坐个车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不行啊，等全国胜利后再去看吧！不谈了，休息吧，明天拂晓又要开拔。”陈赓说搁就把话搁下，去睡觉了。但话匣子打开了，黄埔军校往日的人和事浮现在郭天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其中有两个人使他无法平静下来。

一个是军校教官李亚芬，他是个正直的国民党人，也是郭天民的同乡。当郭天民与军校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时，事后李亚芬总是提醒他要注意策略，不能锋芒太露。“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爪牙准备对郭天民下手，李亚芬总是在校方领导人中为郭天民打圆场，使郭天民免遭清洗和迫害。因此，他一直很感激这位保护过他的李亚芬教官。

另一位是堂兄弟郭基磐，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读书，一起来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十多年来，两人互相为伴，互相促进，实现了投笔从戎的愿望。想不到进军校后，受各种社会思潮和革命左、右派别斗争的影响，两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郭天民信仰共产主义，在军校加入了共产党。郭基磐保持中立，实际上保持不住。郭天民很想拉这位堂兄弟一把但没拉动。三十多年后，郭天民对郭基磐的儿子说：“你父亲太不听人劝了。我那样劝他跟我一起离开广州，他不听，结果被别人拉走了。”说到这里，郭天民再也不往下讲了。人各有志，堂兄弟也不能互相勉强。作为一同走出山乡，一同投笔从戎，一同想为国家效力的兄弟，唯愿都有好结果。但那位堂兄弟路没走

对，令人遗憾。

这两个人的事情怎能不引起郭天民的回忆？好在他过完“电影”就入睡了。

早在第 4 兵团攻下韶关时，陈赓、郭天民就研究决定了下一步行动：第十四军沿北江南下，第十五军沿铁路前进。第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将部队分成两路，一路乘船，一路步行，日夜兼程，于 15 日拂晓抢占了三水，歼敌第三十九军一部，然后继续向高要、高明方向追击，迫使敌第三十九军第 91、103 师等部向我军投降。同一天，秦基伟指挥第十五军攻占了佛山，歼敌一部。这时查明余汉谋已于 13 日逃往雷州半岛的湛江，所属部队除第六十三、一〇九军等向西流窜粤桂边境外，主力第 21 兵团所辖第三十二、五十军和第三十九军残部向阳江方向撤逃，第 13 兵团残部向阳春方向撤逃。面对敌人这一态势，第 4 兵团如按军委命令在广州解放后立即入桂围歼白崇禧部，余汉谋部就逃掉了；如去追歼余汉谋部就耽误了入桂作战的时间。军情紧急，刻不容缓，必须马上作出决策。陈赓、郭天民从有利于歼灭敌人、解放广东的大局出发，决定先歼敌后入桂。他们边向野司报告边行动。

这时，西逃的敌人与我军相距有 200 多里。敌人有汽车，我军靠两腿，你快他更快。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要赶上去歼灭他，指战员没有勇气、决心和毅力是做不到的。作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郭天民，身先士卒，亲自带领部队追击，靠前指挥，解决部队在追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按事先研究的部署，将追击部队分为三路：右路是李成芳第十四军，不但要追上敌人，还要抢在敌人前面控制阳江至电白的公路，断敌向西的逃路；中路是周希汉第十三军，要抢占新兴，断敌向南的逃路；左路是秦基伟第十五军，向阳江方向攻击前进。在“解放军是英雄汉，两腿赛过四轮转”的口号鼓舞下，各路大军不顾疲劳，不畏艰险，日行 120 里追击前进。21 日，左、中路追上了逃敌第三十九、五十军各一部。右路受到鼓舞，以日行 150 里的速度于 23 日抢占了阳白公路，截断敌人西逃雷州半岛的通道。24 日，郭天民指挥三路部队将由广州西逃之敌第 13、第 21 兵团部及所属第二十三、第三十九、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七十、第一〇九军和保安师等残部，全部合围在阳江和阳春地区。经过两天激烈战斗，全歼该敌 4 万余人。解放了三水、四会至阳春、阳江一带 13 座县城。此战为两阳战役，是在高速运动中打的一个漂亮歼灭战，也是郭天民出黄埔军校以来所进行的千百次战斗中的得意之作。战役结束后，陈赓说：“天民呀，这一仗打得好啊，拿什么犒劳你和三军呢？”郭

天民说："得到师兄夸奖就满足了。这一仗打得好还不是你的盘子掌握得好！"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战斗结束后，第十三军 39 师师长黎锡福率部继续西进，解放了罗定、信宜、廉江等粤桂边各县，切断了白崇禧向海南岛撤逃的退路。

与此同时，第 15 兵团横扫粤东。余汉谋部署在这里据守的是胡琏第 12 兵团。胡琏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只身逃脱，现在听说共军占了广州，闻风而逃，从汕头乘舰艇逃往金门、台湾。至此，除海南岛外广东已全部解放。

广东解放后，第 15 兵团大部和两广纵队等留下执行接管城市和剿匪任务，由第 4 兵团（另配属 15 兵团第四十三军）继续执行东路军的任务，去广西包围歼灭白崇禧集团。

再说白崇禧遭我军两次打击后，从湘南逃进广西，仍保持原来 5 个兵团 12 个军建制，但兵力减少到 15 万人。他还在做美梦，企图在逃至粤桂边余汉谋残部 4 万人的策应下，以桂林为中心，沿全州至郴州铁路两侧组织防御，阻止我军入桂。

广西是桂系派的老巢，桂系的头头脑脑苦心经营了 20 多年，老百姓深受蒙蔽，唯桂系军阀是听，连蒋介石的账都不买。只要桂系军阀一声唤，地方爪牙立即响应。要人有人，要枪有枪，送来的人拉出去就能作战。现在，白崇禧回到了他的老巢，如虎归山，不可小视。因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几次电示林彪：贯彻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不能打折扣，一定要歼灭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林彪不敢怠慢，亲自在前线指挥所指挥追击，将 9 个军 40 万大军分成北、西、南三路，向广西突进。

11 月 6 日，西路程子华第 13 兵团第三十八、三十九军从会同、武冈出发，10 日分别攻占靖县、通道，敌第 17 兵团仓皇西逃，我军乘胜追击，15 日经黔南插入广西，向河池、白色疾进，一下切断敌西逃贵州、云南之路。

南路陈赓第 4 兵团第十三、十四、十五、四十三军，从廉江、茂名、信宜出发，向粤桂边境进击，切断敌人逃向海上的通路。

北路肖劲光第 12 兵团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军进至湘桂边境，其先头部队袭占全州城，突破了白崇禧北面的防线。

在我三路大军的进逼下，白崇禧西逃无望，处境孤立，急调第 3、第 11 兵团共 5 个军由荔浦、恭城南下玉林、岑溪地区，企图在余汉谋残部配合下，发动"南线攻势"，打通南逃海南岛的通路，并令第 1、第 13 兵团也从桂北地区南撤。

狡兔三窟。白崇禧这只狡猾兔子又想开跑，他能逃掉吗？

林彪决心趁机歼敌于运动之中，先吃掉第 3、第 11 兵团。他令南路陈赓以一部兵力在粤桂边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主力隐蔽待机；令西、北两路部队迅速南进，策应南路作战。24 日，敌第 3、第 11 兵团向南路我军阵地实施猛烈攻击，连攻两天，未能前进一步。这时，陈赓、郭天民指挥主力部队突然出击，敌人见势不对掉头就跑，我第十三、十四、十五军乘胜追击，连占容县、玉林、陆川三城，歼敌第 11 兵团大部。副政委袁克服和军长洪学智指挥的第四十三军追得最猛，一举突入博白城，歼敌第 3 兵团部，俘敌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 3 兵团司令张淦。眼看该敌各部有可能逃掉，郭天民率第 4 兵团主力迅速赶到，将敌第 3 兵团所辖 3 个军围歼在博白、陆川地区。与此同时，我西路和北路军迅速南下，在桂滇黔边纵队配合下，先后攻占了桂林、河池、柳州、梧州等重要城镇，接着进至东兰、宾阳、贵县一线，解放了大半个广西，将敌压到西南一角。白崇禧发动的“南线攻势”惨败后，仓皇撤逃。他令第 1、第 10 兵团分别撤到南宁、钦州地区，第 11 兵团残部退到钦州，企图从海上逃跑。

为了全歼白崇禧残部，12 月 2 日林彪令各路部队长途奔袭，大胆渗透，继续猛追。我军先后又占领百色、南宁、灵山、合浦等地，将敌逼到西南一角。4 日，我军解放南宁。7 日，攻占钦州，封闭了敌人南逃的海口。然后，我三路大军将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第 1、第 10 兵团及其他残部包围在钦州北面的小董圩地区，经一天战斗，除约 2 万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被歼，共计 173000 人。白崇禧乘飞机逃往台湾。郭天民后来回忆说：“我们追到南宁机场，缴获了白崇禧的小汽车，车头还是热乎乎的，说明他坐飞机逃走没有多久。这位小诸葛专门算计别人，自己输成一个光棍就没算到。我们的毛主席早帮他算到了，并通过国民党的谈判代表转告他和李宗仁，叫他们不要去参加蒋介石在杭州召开破坏和谈的紧急会议，白崇禧不听去了。毛主席说你们出席了，就决定你桂系与蒋家王朝同归于尽。果真如此。”

14 日，我军先后占领镇南关（今友谊关）和爱店。至此，广西全境解放。

河里打鱼总有漏网的。在湖南、广东、广西战役中漏网的部分残敌逃往了海南岛，加上岛上原有陈济棠的部队，拼凑编成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三十二、第四军五个军 19 个师，另有海军第 3 舰队（舰艇 50 艘），空军 4 个大队（飞机 35 架），包括地方武装，总兵力约 10 万人，由从广州逃去的广东省主席薛岳任琼崖保安司令兼防卫总司令，统一指挥。薛岳仰仗

宽阔的海峡和海陆空军，在全岛组成三道防线，自称为“伯陵防线”（薛岳字伯陵），认为它如“铜墙铁壁”，坚不可摧。企图长期固守，作为日后反攻大陆的跳板。

在广西战役结束时，袁克服所在的第四十三军接到命令归建，与韩先楚第四十军一同开赴雷州半岛，做解放海南岛的战斗准备。四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由第 15 兵团司令员邓华负责指挥解放海南岛，第 12 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为前线指挥之一。

解放海南岛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渡海作战。敌人在岛上部署了陆海空立体防御，可我军没有海、空军，没有现代的渡海运具，更没有渡海作战经验。于是产生一些畏难情绪。第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提出到港、澳买登陆艇和机器船，待艇和船运来后再渡海作战。韩先楚反对这种意见。他说：“我看这个办法行不通。帝国主义怎么会卖登陆艇和机器船给我们去打蒋介石呢？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我们可以用木船去解放海南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正关注解放海岛，听到韩先楚这么有骨气有信心的意见十分高兴。毛泽东告诉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海南岛一有冯白驹在里面配合，二是敌人战斗力不强，只要我们运载足够的兵力和粮食，有军级干部随船指挥登陆，建立立足点是完全可以取得胜利的。你们研究制订好作战方针后，可以提早解放海南岛。叶剑英于 1950 年 2 月初召开了第 15 兵团、第四十三军、第四十军和琼崖纵队首长参加的解放海南岛会议。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强行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即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的力量，而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的策应下强行登陆。

3 月 5 日和 10 日，第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各派一个加强营，向海南岛进行首批偷渡，均获成功，与琼纵胜利会合。

4 月底，第四十军一个加强团 2937 名勇士，四十三军一个加强团 3733 名勇士，分别乘坐 169 只木船偷渡成功。

两军先后已渡过去 9 个加强营，加岛上琼纵有一个师，接应的兵力大大加强。兵团决定于 4 月中旬集中两军主力，举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

4 月 16 日 19 时 30 分，第四十军 6 个团在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韩先楚率领下，第四十三军两个团在副军长龙书金的率领下，分乘 500 多艘木船和少量机帆船，从雷州半岛向海南岛驶去。出发前夕，各军都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四十三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袁克服来到渡海部队中间，与所有政工



解放海南岛胜利登陆后，我四十军和四十三军与琼崖纵队领导合影。前排右二起：韩先楚、邓华、冯白驹。

干部一起，为每位渡海勇士戴花，祝福这些勇士们说："这些红花你们带到海南岛去，会像岛上盛开的木棉花一样，红红火火地庆祝你们的胜利！"随后他坐上指挥船参与指挥渡海作战。

深夜 23 时许，我四十军的船队前面发现了敌人的舰艇。韩先楚命令先头部队沉着应战，等靠近了再打。150 米、100 米、50 米……韩先楚一声令下："打！给我狠狠地打！"我军用装有 57 战防炮和山炮的船，战士们叫它"土炮艇"，齐向敌舰开火，有的船避开敌舰火力靠近它扔手榴弹，打得敌舰晕头转向，有的冒烟起火逃走，有的被打翻。在与敌旗舰"太平号"作战时，将敌海军第 3 舰队中将司令王恩华当场击毙。与此同时，四十三军在另外一条航道上也进行了激烈的木船打军舰的海上之战。不等这场史无前例的海战结束，韩先楚指挥主力船队抢滩登陆了。战斗进行到 17 日凌晨 3 时，我渡海大军突破了薛岳的立体防线，在海南岛正面的临高角、博铺港、雷公岛、玉抱港、才芳岭一线强行登陆成功。

17 日晚，薛岳将机动部队 5 个半师调来，企图趁我军立足未稳赶下海去。先是进攻我四十三军，广大指战员与凶猛扑来的敌军作殊死战斗。有一个连连续打退敌人 5 个营轮番发起的 13 次冲锋后，最后剩下 13 个人依然坚守阵地。21 日，韩先楚率四十军冲破敌人层层包围，赶来与四十三军会合，并迅速对敌人形成反包围。这时，第四十三军后续 5 个团顺利登陆赶到，一起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支持不住纷纷撤逃。我四十、四十三军乘胜追击。薛岳害怕全军覆没，忙于 22 日下达总撤退的命令。他本人当天乘飞机逃向

台湾。26 日，蒋介石从台湾派出军舰到榆林港运走部分逃敌。我军经过一周的追击，4 月 30 日解放了全岛，计歼敌 5 个师、9 个团共 33000 人，击毁敌机两架，击伤敌舰 5 艘，击沉 1 艘。这次战役首开我军海上作战胜利之先例，创造了木船战胜兵舰的奇迹。红安将军韩先楚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迂回包围　解放西南

我军解放广州前夕，蒋介石打着挽救党国的旗号，不请自出，带上即将倒台的国民政府官员逃往重庆，李宗仁只好出局。蒋介石为了苟延残喘，将撤退广西的白崇禧集团、湘鄂川黔边的宋希濂集团和川陕边的胡宗南集团组成西南防线，其防守重点是四川。他的部署是：以胡宗南集团（约 20 万人）位于川陕交界地区，依托秦岭，构成北面的主要防线，防我军由陕入川；以宋希濂集团位于鄂湘川黔边界地区、孙元良第 16 兵团位于巫山、奉节地区，防我军从东入川；以罗文广第 15 兵团位于达县、南充、大竹地区，准备向川北和川东机动。另以一部分兵力配置在黔东，控制湘黔公路及沿线各要点。蒋介石的美梦是，像抗战初期那样退守西南，以重庆为陪都，偏安一隅，以图东山再起。殊不知，那个时候有全国人民和人民的军队挡着日本鬼子，他蒋某人才能在山城待下去。现在是全国人民和人民的军队要打倒他，不论他逃到哪个地方都是难以待下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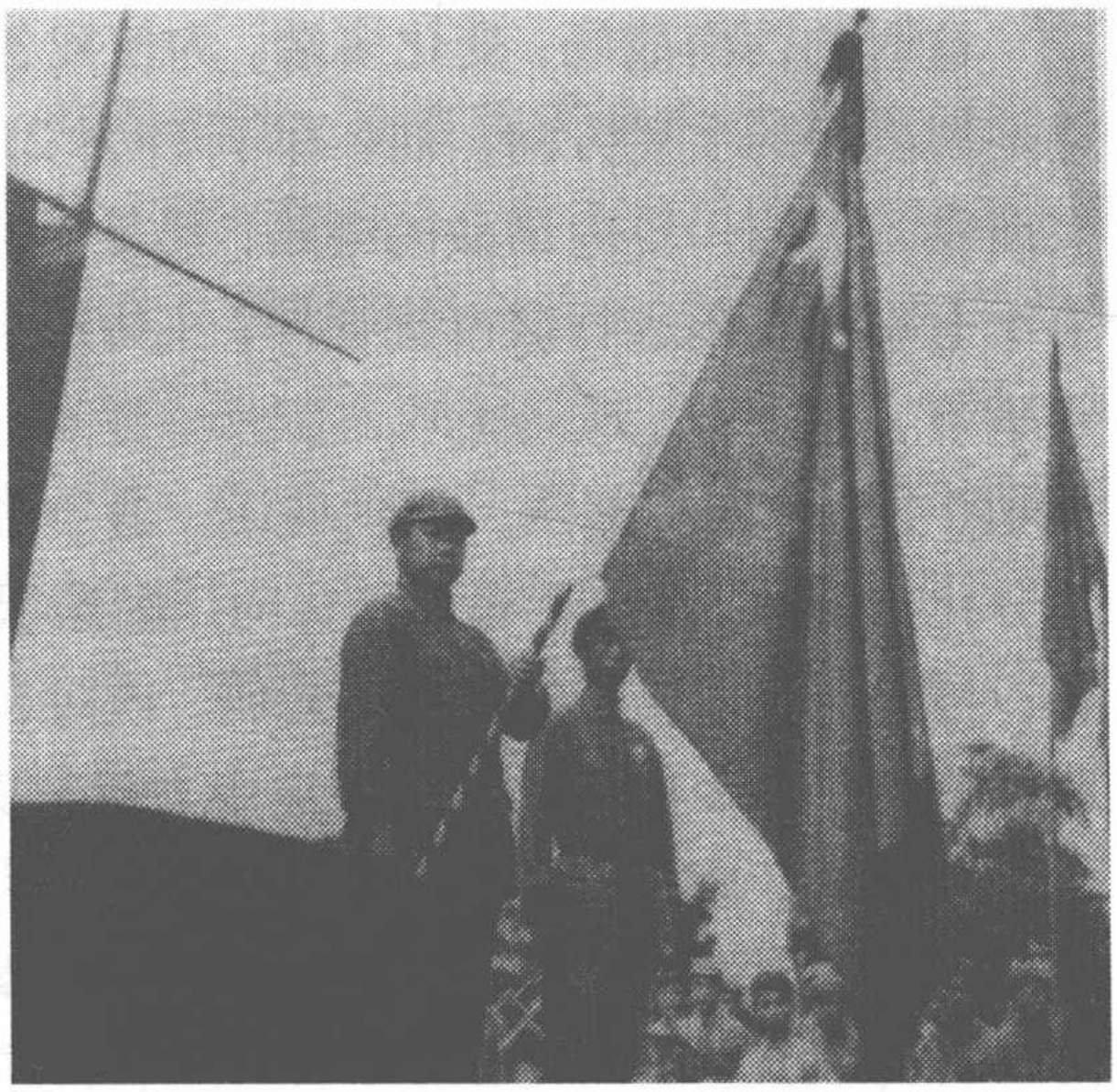
根据敌人的部署，在向西南进军前，中央军委和和毛泽东就做出“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的指示，并制定了“对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作战方针。1949 年 7 月底，中央军委向第二野战军下达了向西南进军的命令。这时，二野所辖 3 个兵团不在一起。第 5 兵团配合衡宝战役后正由湘南向湘西开进。第 4 兵团仍在四野指挥下进行两广战役。只有第 3 兵团在完成渡江作战和追歼逃敌任务后，移师当涂、溧水地区休整。有鉴于此，军委决定二野率主力第 3、第 5 兵团和暂归其指挥的四野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军和湖北军区部队向川黔边进军，第 4 兵团完成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作战任务后向云南挺进，继续担任西南大迂回的作战任务。

刘伯承、邓小平接受任务后，在第 3 兵团进行了深入的动员教育，还针对进军路上地形特点，组成了以小组、班、排、连为主的山地战术训练和爬山、攀崖锻炼。对长途进军中的行政管理，物资保障、伤病员治疗和转运等

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充分准备。部队经过教育训练和准备后，情绪高涨，信心倍增，为胜利完成进军西南的任务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进军时间定在南北两头打响的时候，即南面四野打响了围歼白崇禧集团的广西战役，北面一野为抑留胡宗南不使其过早南逃而发动的攻击，趁此机会二野向川黔边进军。在野司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刘伯承叫参谋长李达讲解了进军西南的作战部署。李参谋长说概括起来是六个字：三迂回三围歼。就是：首先由第 3 兵团分两路由湘鄂黔边进入川东，合围重庆，歼灭以宋希濂集团为主的川东之敌，其次由第 5 兵团迂回贵州，主力迅速北上入川与第 3 兵团会师成都以南，然后与由陕入川的第 18 兵团合围成都，歼灭以胡宗南集团为主的川中之敌；第三是第 4 兵团分两路远程迂回，一路沿边境线西进，一路由广西直出滇东，然后合围歼灭滇南之敌。参谋长说，三迂回三围歼的作战部署，是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向西南进军的一系列指示的具体化，各部队必须认真学习贯彻执行。

为了迷惑敌人，保证这一部署行动的突然性。毛泽东还为二野进军施了三计：在二野进军之前，由一野和原华北第 18 兵团等部对敌人的秦岭防线发动攻势，造成从北面入川的声势；由活动在鄂西的湖北军区部队积极佯动，叩击从东面入川的门户巴东；要二野第 3 兵团由南京乘火车西进郑州，然后公开露面，由刘伯承在车站举行欢送大会，发表讲话，佯示西进。这三条计策有效地隐蔽了我军的战略意图，给二野主力突然从湘黔边迂回敌后，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陈锡联(左一)向进军西南部队授八一军旗

10 月中旬，陈锡联、谢富治率第 3 兵团从郑州悄悄乘火车南下，在孝感花园下车徒步西进，经沙市进入湘西北，与四野第四十七军等部会合后，然后兵分两路前进。部队在开进中发现敌宋希濂有西撤征象。陈锡联与副司令员兼十二军军长王近山研究决定，派出一支能跑

能打的部队，迅速断敌退路。王近山令所辖第 36 师并附属一个团，全部乘汽车沿川湘公路向彭水疾进，自己亲率主力紧跟。车运 36 师如虎添翼，一路势如破竹，先后解放了花垣、秀山等县城。后因公路桥梁被敌破坏，他们便徒步轻装，克服崇山小道、雨天路滑等困难，挺进到酉阳，歼灭了阻我军前进的敌第 263 师一部。随后，王近山率主力赶至酉阳，逼近彭水，堵住了宋敌西撤的道路。

再说后续两路大军。左集团中的十二军前出后，另两个军——第十一和第四十七军，陈锡联令他们担任正面攻击，这时也进到鄂湘边的来凤、龙山。右集团的第四十二、第五十军和湖北军区部队攻占恩施。接着两个集团对位于恩施以南至咸丰一带的宋希濂集团主力发起攻击，敌人向川东黔江地区撤逃，被我军堵截包围。11 月 8 日，将敌第 14 兵团 2 万多人围歼于咸丰以北地区。至此，湖北全境解放。这一胜利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川湘鄂防线，打开了川东门户，而且将敌人的“大西南防线”拦腰斩断。与此同时，迂回贵州的第 5 兵团解放了贵阳，打破了敌人西撤云贵的企图，有力配合了四野广西作战，并且威胁到胡宗南的南退之路。

我二野向西南神速进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一下子打乱了他的部署，急令胡宗南南撤，并令他的第一军空运重庆“护驾”，令孙元良第 16 兵团由万县西撤，令宋希濂第 20 兵团和罗文广第 15 兵团在川南及其以东地区布防，企图利用乌江天险阻止我军前进，并掩护胡宗南撤退。

这时的西南战场，变化多端。为使我各路部队在复杂纷纭的情况中明确并把握战斗的主要方向，刘、邓于 11 月 21 日向部队发出指示：迅速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诸敌的退路，仍是当前作战的关键。要求第 5 兵团除留第十七军于贵阳进行城市接管外，主力第十六、十八军和 3 兵团第十军在占领毕节、遵义后，应迅速攻占叙永、赤水、宜宾、泸州一带，断敌退路；第 3 兵团主力和四野部队，强渡乌江，力争合围宋、罗两敌于南川以东地区。为分化瓦解敌人，刘、邓于同日向川黔康滇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奔光明，改过自新，立功赎罪。要求我军注意争取瓦解敌军和乡保武装，以便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敌人。

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陈锡联、谢富治命令第十一、十二、四十七军，分别攻占龚滩、彭水、白马等地，强渡乌江，以钳形攻势向南川以东之敌进行合围。

乌江又名黔江，发源于贵州北部，从龚滩入川向北流去，在涪陵附近注入

长江，是四川境内长江南岸唯一一条大支流。乌江两岸，山势陡峭，峡谷悬崖，水流湍急，险滩暗礁丛生，过江全靠索道或熟练的船工摆渡。宋希濂从湘鄂边逃过乌江时，将索道破坏，沿江船只没收，给我军过江造成困难。第十一军副军长郑国仲专门去访问当地老百姓，请他们帮忙解决渡江问题。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 我到老百姓中调查访问时，他们告诉我当地流传的一些民谣，说“乌江是个白虎星，落水难逃生。”“烧板岩，像把刀，砍断万人腰。”“梯子洞中拿根棍，万人不敢进。”乌江、烧板岩、梯子洞都是入川必经之地。他们还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民国十八年川黔军阀打仗，一个外号“邋遢鼻子”的军阀，想从这里过乌江出川去打贵州，攻了七八天，满江漂着尸体，没有打过江去。讲完他们又说出一个歌谣：“梯子洞，烧板岩，天铸铁锁打不开。要想打开这铁锁，除非神兵下凡来。”他们说，国民党军队在前面拉夫、抢粮、杀人、放火。你们从后面赶来帮我们灭火，抢救财物，医治被打伤的人。你们就是神兵下凡，定能打开这天铸铁锁，会顺顺当当地通过乌江、烧板岩、梯子洞的。我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揭露敌人的罪行，发动群众支援我们渡过江去消灭敌人。老百姓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对我军的感激之情纷纷表示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还帮我们选择渡口，我们很快就做好了强渡乌江的准备。

22 日，陈锡联用正面牵制，两翼包抄，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办法，发起突破乌江的战斗。第十一军在彭水正面牵制敌人，第十二军在彭水以南，第四十七军在彭水以北分头渡江。23 日，晨雾弥漫，能见度极差，我军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及时抢渡，边渡边打边前进。王近山指挥十二军和十一军一个团直插敌人纵深，在罗卜垭歼敌一部，攻占了江口镇。郑国仲带 11 军两个团设伏于中营、竹坎，将向武隆撤逃的敌第 9 师师直及第 25 团全部歼灭。第四十七军控制了彭水至南川的公路。就这样第 3 兵团一举突破乌江天险，敌人全线溃退，纷纷向白马山区逃去。

24 日，陈锡联令第十一、十二、四十七军分三路向白马山区进击。

白马山，上下 60 里，高山深谷，山路崎岖。虽有川湘公路由东向西盘旋而去，但路况极差，走起来很费力气。沿途荒无人烟，部队给养供应困难。当时的任务不但要打破敌人的节节抵抗，将其歼灭，更主要的是迅速进

入敌纵深的后方，钳击南川，切断退路，把敌人围歼在南川以东地区，完成野司下达的作战任务。要实现这个战略包围，就要走路。在崎岖山路中走路和打仗一样艰苦。部队日夜兼程追击 20 多天，睡眠不足，供应跟不上，体力下降，十分疲惫。但每天仍以一百五六十里的速度前进。有的人边走边打瞌睡，稍事休息就酣然入睡。鞋磨穿了，脚板磨破了，马掌磨掉了，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依然旺盛。为了鼓舞士气，第 3 兵团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德庆，从物资供应和政治鼓动方面想了很多办法，他提出要爱护脚，并让搞宣传的同志创作了一篇《爱脚》的快板词，很受指战员们欢迎：

两只脚，有功劳，一举一动离不了。
听说行军我高兴，立功机会来到了。
第一走路要把我放平，不要西歪又东倒。
第二万一起了泡，挑破挤水皮不能撕掉。
宿营让我洗个澡，痛痛快快睡个觉。
明天继续又行军，照样能走又能跑。
总结作战经验时，莫忘给我记一大功劳。

听了这段生动风趣的《爱脚》快板，指战员都乐了，忘了疲劳和脚板的疼痛，大家都鼓起劲来向前追击，一下子就打破了敌人在白马山的抵抗，然后就在山上露营。

11 月的山区，北风呼啸，雨雾蒙蒙，山高不胜寒。稍作休息，指战员们背靠背地坐着取暖，挡风御寒。磨破了的脚板被脚好的同志塞进自己的裤内暖起来。革命战士互帮互爱，战胜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崇山峻岭。走出了白马山区，直扑长坝，捣毁了敌人一个营部，然后进至水江，将敌一个团包围起来，敌不战而降。

25 日，陈锡联令第十一军攻占南川，切断敌西逃綦江的道路，然后第十二、四十七军和十一军将宋希濂第 20 兵团和罗文广第 15 兵团，分割包围于南川以北地区，经两天激战，歼敌大部，计 3 万多人。我军乘胜解放了重庆外围的綦江、江津和涪陵等城镇。蒋介石在川东南的防御被我军彻底粉碎了。

宋希濂、罗文广两敌主力被歼后，重庆外围只有胡宗南集团第一军守卫。刘、邓向陈锡联、谢富治发出指示，要迅速歼灭长江南岸之敌，乘胜渡

江，夺取重庆。陈、谢接到命令后即令第十二军从綦江地区追歼罗文广残部第四十四军，直逼顺江场，准备渡江；第十一军以一部出老厂监视重庆之敌，主力出鱼洞溪，准备渡江；第四十七军准备从木洞镇的东西两侧渡江。

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会合处，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和长江上游水陆枢纽。市区依山建筑，江水环绕，风景优美。放眼望去，山中有城，城中有山，故称“山城”。又因多雾，雅号“雾重庆”，又曰“雾都”。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将首都从南京迁到这里，又称重庆市为“陪都”。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被人民解放军打得狼狼大败。现在他和他的政府就麇集在这里，妄图再以此地为“陪都”苟延残喘。被蒋介石紧急调来“护驾”的胡宗南第一军，尚未遭我军重大打击，建制完整，装备精良，有一定的战斗力，表现出一股子傲气，以为不可一世。陈锡联决定第十一、十二、四十七军各派一支劲旅与敌接触，杀杀他的锐气。郑国仲带领 31 师作前卫，进至渔洞溪以东与敌第一军一个营遭遇，我 31 师 91 团先头部队两个连，激战半天，将敌击溃，其中大部被歼，并乘胜进占了渔洞溪，俘敌 300 多人，缴获汽车 80 多辆。这一仗探出敌人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不堪一击。于是，第十二、第四十七军各自向渡江地点猛烈推进。到 29 日，我 3 个军控制了西起江津、中经渔洞溪、东至木洞镇长约 100 里的长江南岸。在重庆的蒋介石见此情况慌了手脚，于当天下午乘车直奔白市驿机场，坐飞机逃往成都。胡宗南也令第一军开始撤退。重庆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成了惊弓之鸟，竞相逃命。夜幕降临，陈锡联下令渡江，3 颗信号弹飞向夜空，摆在百里江边的千百只渡船一齐竞渡。满江星火，闪闪烁烁，从南岸绵延到北岸，像繁星闪耀在银河一样壮观。我军渡江未遭到敌人大的抵抗，很快顺利过江。夜已深了，人民解放军露宿街头巷尾，毫不惊动老百姓。在惶恐中度过一夜的市民见到这样好的军队，人人惊喜不已，自发地出来欢迎，有的还端着茶水、食品慰问。就这样，重庆在没有过多的枪炮声和硝烟中解放了！这座美丽的山城从此回到人民的怀抱。

看着重庆老百姓迎接解放欢愉的情景，第 3 兵团的首长们高兴极了，感慨也多。陈锡联说，毛主席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真是英明极了！谢富治讲，刘、邓用兵如神，使我们少费好多周折！王近山说，有毛主席、刘司令、邓政委掌舵，我们这次入川作战，有点像猫耍老鼠，步步走在敌人前面，着着使敌人听我们摆布。这样打仗虽然苦一点累一点，但牺牲小，胜利大，越打越有劲。首长们的胜利感言，充满了自豪与自信。

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所辖部队举行入城仪式，威武雄壮地开进重庆。3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二野副政委张际春任主任，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任副主任兼重庆市长，第3兵团副司令、十二军军长王近山兼重庆警备司令员。第十二军每师抽一个团作为重庆警备部队。

重庆及川东、川南地区的解放，使逃至成都的蒋介石如坐针毡。为保全胡宗南集团，他连下两道命令：一令从重庆及其以北地区向西撤退的各部队，在正面边阻击边撤，以迟滞共军向成都前进；二令胡宗南加速撤至成都地区，集中兵力抵抗共军进攻，如支持不住再向西康、云南撤退。

针对蒋介石的撤逃企图，毛泽东电示刘伯承、邓小平，除重申继续执行大迂回包围战略方针外，要求刘、邓主力迅速切断敌人西逃康、滇的道路，会同贺龙率第18兵团聚歼胡宗南集团于成都。刘、邓根据这个指示，作出了成都战役的具体部署：

以杨勇第5兵团第十六军和配属第十军自富顺、纳溪地区向西进击，迅速占领乐山、青神、蒲江等地区，第十八军作二梯队，占领犍为。

以陈锡联第3兵团第十一、第十二军自铜梁、内江地区继续西进，首先攻占彭山、籍田镇、简阳等地区，尔后第十一军主力攻占新津及以东各要点，第十二军主力向邛崃、大邑迂回，截断敌人取雅安南逃之路。

以四野第五十军（第四十七军解放重庆后奉命返湘西剿匪）进至遂宁为战役预备队。

各部队在占领上述指定地区后，迅速构筑工事，准备会同由陕入川的华北第18兵团及一野第七军，围歼四川境内之敌。

形势日趋日紧。蒋介石眼看大事不好，责令胡宗南加速南撤。又令正向川西撤退的第15、第16、第20兵团撤到沱江、岷江地区，依托高山大河阻击我军前进，以掩护胡宗南部撤到成都进行抗击。企图在西南保存一块地方作为将来反攻的桥头堡。

我军各部在向成都进军时，一直按毛泽东的指示，用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去解决国民党各地的军事力量，争取他们站到人民一边来。国民党西南军政当局中一些愿意弃暗投明者表示，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起义。

12月8日，从湘西进入贵州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南线我第5兵团第十六军和配属第十军由毕节、赤水河、南溪向北进击。刚被蒋介石提拔担任第22兵团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和川南警备司令的郭汝瑰，率部据守宜宾，认为

解放军即将到达有利起义，就派人与我联系。刘、邓决定延后几天，待我军完成对成都的包围后再行宣布。9 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在昆明、雅安、川西等地起义，云南、西康两省遂告和平解放。12 日，郭汝瑰在宜宾率一个军部和一个师共 25000 人起义。

我军四面进逼，敌军纷纷起义。面对壁垒森严的共军，处于四面楚歌的胡宗南怎能坚守成都？他只好向校长报告。蒋介石说要尽力守住，万一不行也要全部撤出，保存兵力。胡宗南只有唯唯诺诺，走一步看一步。

胡宗南能否守住成都或从成都撤走，现在的关键不在蒋介石的命令，而在我军的行动。因此，刘、邓令杨勇第 5 兵团迅速向成都西南出击，陈锡联第 3 兵团向成都以西出击，将胡宗南集团紧紧兜住，不让他们逃出成都地区。15 日，第 5 兵团十六军渡过岷江攻占乐山，控制了乐山、夹江、峨眉三角地带，17 日抢占洪雅。同一天，配属该兵团第十军攻占了眉山、丹棱，19 日又解放了蒲江，先后歼敌第 15、第 20 兵团第 104、106 师大部，迫敌 135 师投降，共 1 万多人。

在这次追歼战斗中，第十军 30 师师长马忠全带领全师指战员猛打猛冲，战绩突出。这支部队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3 纵队第 8 旅，1947 年挺进大别山，被留在皖西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始为皖西独立旅，后发展成独立师。渡江战役前夕奉命归建，编入第十军。马忠全带领这支部队从野战军到地方军，又由地方军到野战军，历经大小战斗无数。留在皖西后就没有参加重大战役。所以全师指战员都鼓着一股劲想打大仗。但渡江战役他们是预备队，没有上前线。向西南进军，担任大迂回任务，也没遇上大仗。成都战役打响在即，全体指战员纷纷请战，要求上级交给他们最艰巨的任务。第十军军长杜义德和马忠全在红军时期就在一起战斗，马忠全作战勇敢，喜挑重担，淮海战役没能参加，渡江战役参加了没上前线，心里的遗憾结着疙瘩。为了帮马忠全化解这个疙瘩，杜义德就让 30 师在向北进击中担任主力，果然在攻占丹棱、蒲江等战斗中表现突出，战绩不菲。

就在第 5 兵团所率两个军进占丹、蒲地区后，20 日第 3 兵团第十一军攻占了籍田镇和新津以东地区，第十二军攻占彭山后直插邛崃、大邑。这样一来，胡宗南集团逃往西康和云南的道路全被切断。在此之前进入遂宁作第 3 兵团预备队的四野第五十军，在成都东面展开包围架势。至此，南线我军从东、南、西三面完成了对胡宗南集团的包围。

此期间，北线由贺龙指挥第18兵团和一野第七军，根据中央军委“先慢后快”的指示，现进入快的阶段，兵分三路：18兵团六十二军和第七军为右路，18兵团六十军为中路，18兵团六十一军为左路，分别从甘肃和陕西入川，日夜兼程，破剑门关、越大巴山、渡嘉陵江，一边歼灭沿途残敌，一边压缩包围圈，提前10天于12月21日到达包围成都的集结地江油、绵阳、巴中地区，作围歼敌主力的战斗准备。

被围于成都的胡宗南集团辖有6个兵团，其中第5、第7、第18兵团战斗力较强，第15、第16、第20兵团是残部，都布置在成都周围。第5兵团位于新津，第18兵团位于新津与成都之间，第7兵团在成都北的德阳，第16兵团在成都东的金堂，第15、20兵团在成都西的彭县、郫县。胡宗南害怕我军分割围歼，以成都为中心抱成团，如突围不成就在此作困兽斗。

我军积极做两手准备：一手是选好要点，构筑工事，做好打堵击战的准备；一手抓政治宣传，促敌动摇分化瓦解。

被围敌人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内部极为混乱，军心早已涣散，更加分化动摇，纷纷秘密与我军联系准备起义。12月21日，敌第16兵团在金堂宣布起义。兵团司令官孙元良不愿起义，只身逃走。这是他第二次战败逃跑。第一次在淮海战役中他的16兵团全军覆没，只身逃脱，回到四川老家后又拼凑了一个16兵团，没想到还是难逃覆没的厄运。胡宗南见势不妙，急于22日召开军长以上军事会议，确定向雅安、西昌方向突围，但多数军官已丧失信心，连胡宗南自己也把指挥权交给了绥署副主任兼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23日便乘飞机逃去西昌。这时有些兵团司令官和军长便发出不满和怨声。他们说：“奋斗几十年，在两个老东西（指蒋介石和胡宗南）指挥下，全部休矣！”表示前途无望，不愿再打。

但也有死心塌地跟着胡宗南走的。谁？此人就是傅作义在北平起义时，痛哭流涕要求傅作义放他回到蒋介石身边去的李文。蒋介石马上又将他派到胡宗南手下任第5兵团司令官。为了表示对蒋校长效忠和对胡长官的服从，12月24日，李文亲率本兵团7个军，从新津、崇庆等地出动，沿川康公路向邛崃攻击前进。

在这里担任堵击的第十二军，过去打阻击时不论遇到多少敌人都无所畏惧。现在出现了一个新情况：一是重庆解放后，遵照党中央和刘、邓首长的指示，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和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军军长王近山，因要接管重庆不能随军指挥；二是为了重庆市区的治安，从十二军

所辖三个师中各抽一个团组成重庆警备部队。这样一来，一些主要指挥员不能上前线，兵力减少，战场形势对我不利。但久经战火洗礼的副军长萧永银当机立断，收缩战线，将大邑的兵力集中起来固守邛崃，采取先在阻击中挫敌锐气，而后转守为攻，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24 日下午，敌人以第十七、第六十九、第九十军各一部作先头部队，向邛崃以东的固驿镇猛烈进攻，我 34 师两个团轮番抗击，战斗从下午打到晚上，敌人未能前进一步。25 日，李文改道北上，企图从高山镇迂回，夺路西逃。我 35 师依托高山镇有利地形，与敌展开激战，同时派出一个营对敌进行迂回侧击，打退了敌人进攻。26 日，敌人继续以高山镇为攻击重点，先以连进攻，不行以营，最后以团以师发起连续攻击，我前沿阵地几次失而复得。情况十分紧急，萧永银令 36 师火速增援。刚刚打退从邛崃东南配合李文进攻的敌保安团之后的我 36 师，师长和政委留下一个团和师直机关继续坚守，由副政委李少清带一个团火速赶去，34 师咬紧牙关也抽一个团驰援。第十二军 3 个师现在只有 6 个团，投入高山镇战斗就有 4 个团，占全军兵力三分之二。

萧永银为了阻敌西逃，大胆集中兵力，一般人认为会顾此失彼，不敢这样做，而他做了。这位在黄安出生和参加红军的勇将，有着同王近山一样敢打敢拼、果断顽强的性格和作风。不然，从抗战后期到现在前后五六年的南征北战中，他和王近山就成不了好搭档。重庆解放时，上级确定由王近山兼任重庆警备司令员，并从十二军抽 3 个团作警备部队，然后由萧永银带领十二军去参加成都战役。当时王近山对萧永银说："老萧啊，兵不在多而在精。我们十二军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一能当十，十能当百，只要充分发挥指战员的积极性，少三个团同样能完成任务，同样打胜仗。你就认真大胆指挥吧，我等候你们胜利归来。"这一席送别话，经常萦绕在萧永银的耳边，战斗吃紧的时候，他觉得王近山就在身边，是王近山决定这么用兵的。所以萧永银让增援的两个团不在正面阻击，而是出敌不意，迂回到两边对敌人进行猛烈的侧击。李少清带领 36 师 108 团迅猛插向敌人中间，打他个四面开花，有的连队还与敌展开白刃战。敌人的前锋部队冲不过去，中间又有我军冲杀过来，本是惊弓之鸟，现在就更惊了，纷纷不战自溃。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敌人对高山镇的重点进攻被打退了。

邛崃鏖战激，岷江战亦酣。第十一军和第十军在籍田镇以西至岷江岸边也正猛烈阻击南逃之敌。第十一军副军长郑国仲指挥 33 师与马忠全带领的 10 军 30 师协同作战，击退敌人的多路进攻后，死死堵住了敌人南逃之路。

成都战役本来安排在稍后的时间发起，为了围歼向西逃跑之敌而提前打响。我军将计就计，采取西南堵，东北压的战法，迫敌进一步动摇分化，以达到不战而屈人的目的，果然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4 日，敌第 5 兵团等 7 个军突围不成受创后，第 15 兵团司令官兼第一〇八军军长罗广文和第 20 兵团司令官兼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即带领他们的残部，在彭县宣布起义。25 日，贺龙指挥第 18 兵团第六十军解放了德阳。敌第 7 兵团第三十八军军长姚国俊早已与我军联系起义。当他的上司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犹豫不决时，姚国俊竭力劝他顺应潮流，26 日裴昌会率第 7 兵团官兵宣布起义。裴昌会是胡宗南逃走时指定的最高指挥官，他的兵团是主力部队之一。现在他宣布起义了，消息传出，另一支主力部队——第 18 兵团司令官兼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立即派人到简阳，与据守在此的我第十一军 32 师 94 团联系准备起义。该团团长向上级请示，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先志、副军长郑国仲等研究后又及时向刘、邓首长请示。在二野参谋长李达直接过问下，由 94 团团长作我方代表与李振派出的代表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27 日，第十一军 32 师在简阳接受了敌第 18 兵团起义。

这时，麇集成都地区的敌人绝大部分已瓦解，我第 18 兵团除第六十一军留守巴中地区外，其他部队和四野第五十军都向成都推进，随后第 18 兵团第六十军解放了成都。然后各路大军向围困在新津地区的李文兵团步步逼近。李文在我军前堵后击，层层包围情况下，为挽救即将覆灭的命运，一面派人与我军谈判起义，一面继续令第九十军向我军进攻，玩弄两面手法进行投机。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第十二军 34、35 师向敌第九十军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战，歼其大部。与此同时，第十二军 36 师逼近敌第 5 兵团部，李少清指挥政工人员对敌展开宣传和战场喊话。在我军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李文被迫放下武器，27 日在新津缴械投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胡宗南手下有 6 个兵团司令官，其中有 5 个识时务，在战场起义，受到人民的欢迎。唯独一个李文不识时务，顽抗到底，落个身败名裂。

成都附近的战斗结束了，成都以外的战斗仍在继续。从陕南入川的第 18 兵团第六十一军，辖有 181、182、183 师，军首长决定由军参谋长胡正平与 181 师师长王诚汉率领该师做前卫，快速追击前进。他们以 3 天时间走完敌人 8 天所走的路程，在南江地区追上了逃敌。乘敌不备，夜袭南江城，歼敌第五军 14 师大部。尔后，与 182 师和师副政委赵绍明所在的 183 师一起从三面包围巴中，迫使由川东窜到此地的敌第一二七军缴械投降。这时，隔

在阆中、南部地区的敌第九十八军进退不得，被迫宣布起义。12 月 29 日，第六十一军 3 个师将麇集在三台地区的敌第十七、第七十六军等部一举围歼。至此，成都战役才算全部结束。在六十一军奋战川东北的系列战斗中，胡正平、王诚汉、赵绍明三位红安籍将领，率部从陕南打到川北，历时 26 天，行程两千多里，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仅 181 师就解放了 6 座县城，歼敌（包括起义）21000 多人，缴获各种枪械近万支（挺），火炮 140 多门。这些战绩都是他们和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得来的。

成都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它的解放具有重要意义。成都战役结束后，决定 12 月 30 日举行庆祝大会和解放军入城仪式。事前，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商定，同时刘、邓跟自己的各部属打招呼：二野各部队原地待命，不进成都，让第 18 兵团和一野第七军参加入城式。这是一种荣誉。刘、邓将荣誉让给远道奔驰参加成都会战的兄弟部队去分享，体现了部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也包含了浓厚的人情味。

至此，除西藏外，西南地区均已解放。但西康和云南是和平解放的，境内尚有成建制的敌军据地顽抗。从四川逃到西昌的敌军有近 3 万人，在胡宗南指挥下，叫嚷要在这里建立反攻的桥头堡。云南卢汉起义时，以开会名义将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中的顽固分子李弥、余程万等拘禁起来了。但他



1981 年 9 月，原二野 4 兵团 14 军军长李成芳（前左二）跟作者（前右一）讲大迂回解放西南的情况。

们用花言巧语骗取卢汉信任又获释放。回去后，敌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指挥所部，于12月18日进攻昆明，破坏起义，企图重占云南。蒋介石得知，马上派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飞到云南，将两个军5万多人编为第8兵团，由汤尧兼任司令官。汤尧到达后，与李弥一起决定要打下昆明，将整个云南作为反攻基地，便集中两军主力进攻昆明。卢汉没有退路，只有坚守。他一面组织所辖部队和警察顽强抵抗，在昆明地下党动员起来的市区群众大力支援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昆明保卫战，使敌人无法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向刘伯承、邓小平告急求援。

此时，成都战役进入紧张阶段，无法分兵增援。刘、邓将这项任务交给担任大迂回的第4兵团和第5兵团第十七军去完成。令第十七军以一部沿滇黔公路快速驰援昆明。令第4兵团迅速由桂入滇，继续贯彻毛主席大迂回的战略思想，以一部绕到边境线上兜击，不让敌人逃往境外，另以一部直出云南进行围歼。第十七军入滇增援部队由第4兵团统一指挥。

陈赓、郭天民接到命令时，刚打完围歼白崇禧集团的广西战役，部队来不及休息又要出发。两人研究决定：以第十三军和配属第三十八军各一部沿边境线对敌实行先兜后击；以第十五军入滇后伺机入康兜住西昌敌人，与友邻部队协同将其全歼；第十四军随兵团西进，围歼汤尧第8兵团。部署就绪，郭天民具体组织实施。

12月20日，第十七军49师师长汪家道和政委况玉纯奉命率部驰援昆明。为了早点到达，军部将缴获的汽车集中起来送他们出征。但车辆有限，一次只能运载一个多团。况玉纯主动请缨带领145团先行。进入滇东的沾益、曲靖，即与敌人外围部队遭遇。况玉纯命145团就地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等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再发起攻击。不久，第二批部队运到。况玉纯与师长决定145团从正面，146、147团从两侧一举攻占曲靖，继又打下沾益，歼敌一个多营。此战震慑了围攻昆明的敌军。汤尧认为昆明久攻不下，对己不利，主张撤退，余程万也同意撤军，但李弥坚持再攻。李弥之所以一再坚持要打下昆明，是因蒋介石已委任他为云南省主席。他早就想当云南王，现在虽是省主席，但不进昆明算没到位。只有打进昆明才算正式履新。这块肥肉眼看快到嘴边了，他愿放弃吗？

事情的发展不以李弥的意志为转移。自昆明被围后，老百姓和他们的子弟兵——桂滇黔边纵队，不断袭扰敌人，破坏他们的粮弹供应，弄得敌人很是头痛，有效地配合了昆明保卫战。另外，我军在滇东突然出现，本已惶恐

不安的敌军更加恐慌，战斗力一天比一天下降。不管李弥怎样下命令，怎样奖赏，都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李弥只得按汤尧的安排，从昆明撤退南下。在此之前，蒋介石专召李弥去过台湾，为表彰他破坏云南和平有功，给了三条出路由他选择：一留在云南，二撤到海南岛，三撤到台湾。近几年国民党战败将领很多，受蒋介石如此恩惠的极少。蒋对李弥可说是另眼相看。李弥有这“三个方案”任选，趁撤退之机跑到台湾去了。这个曾在淮海战役中侥幸逃脱的我军败将，避免了再当俘虏。

第 4 兵团率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三十八军从广西出发，各军分头前进，因交通不便，行军速度不快。郭天民得到情报，说敌人已从昆明撤退南下，觉得这样的行军速度达不到原定歼敌于运动之中的目的。他决定让担任迂回兜击的部队——第十三军第 37、38、39 师，第三十八军第 114、151 师，将所有重武器留下，全部轻装，然后分左右两路快速前进。左路第 114、151 师和边纵第 1 支队，沿中越边境山岳丛林地带，直奔马关、河口、金平，控制敌人外逃的陆上通道；右路第 37、38 师为一梯队，第 39 师为二梯队，经岘山、文山向开远、蒙自疾进，夺取蒙自机场，断敌空中逃路。这两路部队到达各自的目的地，近则有千多里，远则有近两千里。郭天发要求必须在 10 天之内赶到，从此拉开了滇南战役序幕。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各师将兵团部命令传达后，经过广大指战员讨论，认为还可以轻装简从。每师派出先遣团从不同的道路前进。这样既可避免人多碍事，又可隐蔽目标。郭天民同意了这个办法。结果左路只用 7 天就到了河口，卡住了主要通道。右路虽远也只用 8 天时间到达了蒙自。这些先遣团的指战员，日行路程都在 120 里以上，有的达到 150、180 里，最高达到 200 里，成了名副其实的“飞毛腿”。

在高山密林、羊肠小道上神速进军，不独是指战员忙累，后勤人员更是忙累。他们不能轻装简从，物资运得越多越好。他们不能用车载船运，只能靠人背马驮。二野后勤部根据这个情况，提出在滇黔桂边地区的作战部队实行统一供给，后勤人员统一使用，充分调动了所有后勤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 5 兵团后勤部副部长程绍祥，请边纵支队帮助找了些既熟悉地形又比较可靠的马帮作运输主力，将物资运到最难以到达的绕边境线迂回的部队手中，保障了部队的粮弹及时供应。第三十八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李其华，创办山林救护所，解决了伤病员急救和转运等困难。有了后勤保障，迂回部队士气更旺。

第十三军37师先遣团赶到蒙自机场附近，侦察得知，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已开始从空中逃跑。运了两三天，因飞机小，载人少，只有余程万带他的护卫部队逃走了，其余尚在蒙自城和个旧一带等候。机场原由敌二十六军控制，现准备交给第八军掌握，不过尚未正式交接，机场警戒不是很严。先遣团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即大胆迂回，迅速隐蔽地绕过敌人的警戒部队，于1950年1月13日夜晚突然向蒙自机场发起围攻。战到第二天早晨，占领了机场，歼敌第二十六军93师一部，俘敌1200多人，缴获飞机3架，山炮11门及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切断了敌人空中逃路。

这时，我第38、39师赶到，在边纵部队配合下，分别围歼了蒙自东北和开远以东的敌人，然后转兵向西追击逃敌。与此同时，第三十八军114师在边纵第1支队协同下，突然攻占了红河下游的主要渡口曼耗，歼敌4个工兵连，控制了新架的浮桥，并乘胜向红河上游推进；第151师解放了曼耗以东的屏边，完全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通道。这样一来，我左右两路军就形成了对个旧、开远、建水等地敌人的钳击之势。

我军行动如此突然，有如神兵天降。敌人大为震惊，有的西撤，有的南逃，狼奔豕突，极为恐慌。针对敌人的恐惧心理，陈赓、郭天民令各参战部队抓住战机，大胆追击穿插，围歼敌人。两天之内，南线我军便推进到金平及其以北地区，北线我军也进至个旧、开远，将敌人主力紧紧咬住。郭天民来到十三军前线指挥所亲自参加指挥战斗。前线传来战报说，第38师有位叫郭春生的排长，为追歼敌第二十六军237师，带领全排攀悬崖走峭壁，拣最近最难走的山路前进，抢在敌人前面占领了山口要道阻击敌人，先后打退了敌人11次冲锋，并将亲自指挥夺路逃跑的敌少将师长击毙。郭天民抓住这个典型，号召参战部队向郭春生排学习，像他们一样机动灵活、敢打敢拼，更加大胆地穿插到敌人中间去，实施分割围歼。经两天激战，到20日歼敌第二十六军军部及其所辖93师、161师各一部和193师残部，第八军237师大部。在我军强大军事攻势和政治争取下，敌第八军副军长田仲达见逃跑无望，在建水以东率部两千多人向我军投诚。

21日，我军进占了建水、石屏，控制了个旧至石屏的铁路全线。这时候，敌第8兵团司令官汤尧率领他的兵团部和第八军主力第42、170师、教导师和第3师1个团，共计将近2万人，向石屏西南的元江方向逃跑。

石屏至元江，山高路窄，不宜我军大部队作战。怎么办？周希汉提出以团、营为单位，对敌人进行多路多方向的猛追猛打，郭天民同意了这个临时

应急的作战方案。于是，我第 37、38、39 师和边纵都以团、营为单位分头追击。第 37 师 109 团第 2 营追击速度最快，在营盘山附近追上了敌人的后卫部队。该营长足智多谋，马上伪装成一个连的敌军，利用夜晚越过敌人的行军队伍，抢占了营盘山制高点，将敌拦腰截断。然后全营分路出击，歼敌 1700 多人。前面先逃到元江附近的敌人，在边纵支队的截击下，除前卫部队第 170 师和教导师一部，通过元江铁索桥西逃外，教导师主力和第 3 师 1 个团纷纷向我军投诚。

22 日下午，敌第 8 兵团司令汤尧率兵团部和第 42 师逃到元江东岸，准备渡河西逃。第 37 师 109 团 3 营依托有利地形顽强阻击。第二天上午，我各路部队纷纷赶到，立即将敌人包围起来。24 日拂晓，周希汉下令对敌人发起总攻。困兽犹斗的敌人，拼命反扑和突围。汤尧发出最后的嚎叫，要与我军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到这时，谁肯听他的。包括他的精锐第 42 师都缴械了，这位蒋介石派来不久的陆军副总司令兼第 8 兵团司令汤尧和刚刚接替李弥担任第八军军长的曹天戈成了我军的俘虏。

敌人的主力部队被我军歼灭了，但以师或以团、营为单位的残部仍在逃。这些残敌如不趁热打铁将其全歼，后患无穷。陈赓、郭天民向各级指挥员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提醒大家不要因消灭了主要敌人而松懈自己的斗志。于是，兵团司令部命令：第十三军 37 师追歼西逃的敌第 170 师残部及其流散敌兵；第 38 师和边纵第 9 支队以及卢汉起义部队两个团，追歼逃向墨江地区的教导师残部；第 39 师和第三十八军 114 师，追歼逃至澜沧江以西临近中缅边境的南桥地区敌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残部。命令下达后，以追歼散股逃敌为主的新一轮作战开始了。从 2 月初开始，仅用半个月时间，我军各部队便完成追歼任务。第 39 师师长黎锡福带领部队第一次进入热带雨林的西双版纳作战，既感到这地方的神秘与新鲜，又感到祖国的边疆如此的遥远，这次追歼战斗结束后，如不迅速布防，敌人卷土重来是多么的容易。鸣金收兵以后，他向军长和兵团陈、郭两位首长谈了自己的看法。不久，第 4 兵团向野司和中央军委报告在云南边境地区成立三个边防区，很快获得批准。黎锡福被派往西双版纳担任边防司令员。

滇南战役是第 4 兵团担任大迂回大包围的最后一战。该战役从 1949 年底打到第二年 2 月中旬，历时 1 个半月，行程 3000 余里，歼灭蒋介石嫡系第 8 兵团 26000 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盘踞云南边境地区以图东山再起的阴谋，解放了云南各族人民，对保卫祖国边疆，巩固国防，都有非常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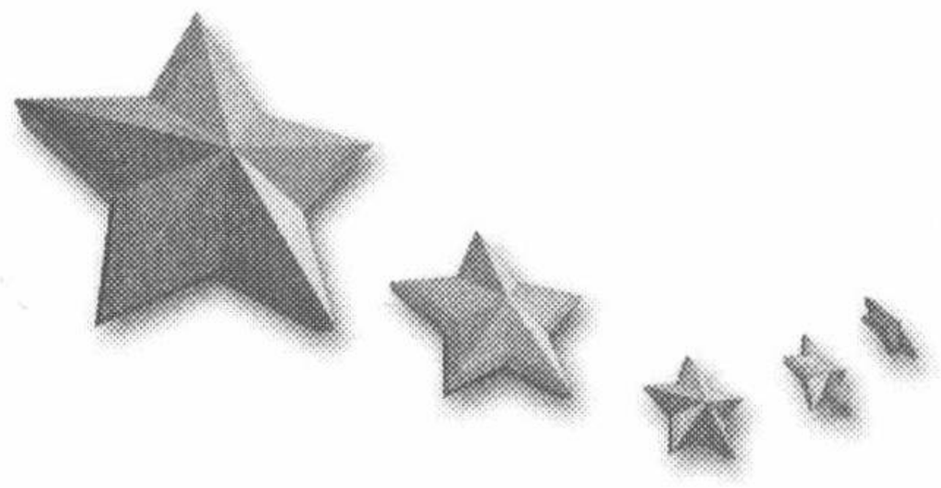
意义。蒋介石煞费苦心派他的亲信汤尧到云南，妄图借边境地区特殊地理条件“反共复国”，没想到被他的两个黄埔学生陈赓和郭天民连苗带根全刨掉了，在台湾气得直骂“娘希匹”。

有人忧愁有人喜。毛泽东接到陈赓报告说云南全境之敌已基本歼灭，大规模战斗结束，现正转入剿匪。毛泽东原来最担心的是广西和云南的敌情复杂，恐不易得手，没想到陈赓收拾得这么利索，甚为高兴。他让人通知陈赓来北京一趟。他要当面听听陈赓讲广西和云南的情况，还有越南胡志明多次要求支援他们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也想听听陈赓的意见。最高统帅毛泽东召见陈赓，对执行战略大迂回大包围的第 4 兵团来说是最好的鼓励。

战事将完喜讯多。1950 年 3 月 12 日至 4 月初，以第 4 兵团第十四、十五军为南线，以第 18 兵团第六十二军为北线，对盘踞在西昌的胡宗南残部共 3 万余人，实行南北夹击。在我军两面进逼下，胡宗南仓皇逃飞台湾，残敌大部被歼。入秋后，第十八军于 10 月 6 日至 24 日发起昌都战役，将阻挠我军向西藏进军的西藏地方政府驻昌都地区的 8 个代本（相当于小团）歼其大部，解放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1951 年 1 月 4 日，西藏地方当局派阿沛·阿旺晋美等五人赴北京谈判，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 5 兵团第十八军于 8、9 月间先后出发，10 月底相继到达拉萨、日喀则、阿里、察隅等地。12 月 20 日，双方谈判代表与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由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和西藏组成的祖国西南地区全部解放了。



第十五章　朝鲜战争功勋著

麦克阿瑟夸海口，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大话变成空话。“旋风将军”韩先楚不信邪把侵略军赶回三八线以南。周纯全赴朝慰问，彭德怀不让他走留下管后勤。张竭诚率部穿插敌后创下歼敌新纪录。反空降张仁初的办法是来一个收拾一个。反“绞杀战”、细菌战周纯全费尽心机。秦基伟坚守上甘岭打出军威和国威。王建安建议发起战役性多点进攻促使敌人坐下来谈判。张天云最后回国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出师三捷　扭转战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公然以其海军和空军直接入侵朝鲜，同时派遣其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挠中国统一、解放台湾。30日，美国陆军第8集团军直接参加了朝鲜的地面作战。

7月7日，在美国操纵下成立了“联合国军”的“联合司令部”，由美军远东总部统帅麦克阿瑟任司令官，统一指挥侵朝各国军队。所谓“联合国军”，除美国和由他扶植的南朝鲜伪军以外，还有英国两个步兵旅，加拿大、土耳其各一个步兵旅，新西兰一个炮兵团，法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希腊、荷兰、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各一个步兵营，卢森堡一个步兵排，南非一个空军中队。另外，瑞典、挪威、丹麦、意大利、印度五国派出了战地医疗队。

开战后，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于6月底占领汉城，8月初占领了朝鲜南部90%以上的土地和人口，迫使对方退守洛东江以东的大邱、釜山一隅。美军乘朝鲜人民军主力南下后方空虚之际，以其海军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工兵第2旅、空降兵第187团和南朝鲜海军陆战队4个营等共约7万人，在260余艘舰艇和500余架飞机支援下，于9月15日由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交通，配合正面进攻。与此同时，退守洛东江的美伪军15万多人，在500辆坦克、400门大炮、1200架飞机支援下进行反攻，一南一北夹击人民军。处于两面作战的人民军不得不后撤。敌于10月1日越过三八线，接着占领元山、咸兴，19日占领北朝鲜首都平壤，妄图速战速决，侵吞全朝鲜。并多次派遣空军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一些城镇和乡村，还狂妄叫嚣：“鸭绿江并不是把两国（指中朝）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不仅威胁着朝鲜的生存，同时也威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威胁着世界的和平。



1951 年 2 月，红安青年踊跃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图为县城举行欢送新兵大会。

在此紧急关头，中国政府及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于 1950 年 10 月 8 日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 月 19 日，由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军，后又增加第五十、第六十六军组成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同朝鲜人民军（此时已失去战斗力）一道抵抗美国的侵略。先入朝的 4 个军，除第四十二军部署在东线，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都在西线。

首批入朝的志愿军中，红安籍将领有四位，他们是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第三十九军政委徐斌洲及其所属第 117 师师长张竭诚、第四十二军供给部政委聂洪国。

为协助彭德怀司令员实施统一作战计划，韩先楚带一名作战处长、一名参谋及一部电台，组成精干的前线指挥所，深入前沿阵地，直接指挥西线部队作战。韩先楚注意发挥我军优势。10 月 25 日，令第四十军一部设伏于两水洞地区，歼灭伪军第 6 师先头部队一个加强营，胜利揭开了战役序幕。

第二天，志愿军第五十军入朝作战，又多了一位红安籍将领——该军第 148 师代师长赵鹤亭。

25 日至 30 日，骄狂的麦克阿瑟指挥美军越过清川江向中朝边境方向疯狂冒进。31 日，美骑兵第 1 师进抵朝鲜北部的交通枢纽——云山地区。然而，老麦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对手韩先楚已令三十九军在敌行进中，神兵

天降般布防于云山周围的深山密林中，形成了对云山的严密包围。

11 月 1 日，第三十九军在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的指挥下，从三个方向向云山外围高地发起攻击。116 师先以两个团在炮火支援下，从西北方向攻击，逼近云山。我军攻入敌阵后，发现交战的均是美国军队，经审讯俘虏才知是美骑兵第 1 师。该师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号称“开国元勋师”，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军的“王牌”，火力和机动能力很强。说是“骑兵师”，其实没有骑兵，机械化程度很高，是为了部队荣誉而保留当年“骑兵师”番号的。

得知与美“王牌师”作战后，我军指战员更加斗志昂扬，攻击更加猛烈，三个师协同突击，进展神速。116 师攻占云山后，继续向东南上九洞方向进攻。117 师在师长张竭诚的带领下向云山以东的三巨里进攻，围歼伪军第 1 师 12 团一部后，于 2 日凌晨与 116 师会合。担负断敌后路任务的 115 师，在云山以南诸仁桥截住并包围从云山撤退的美骑兵第 8 团直属队和第 3 营共 700 余人。2、3 两日，被围之敌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数次突围无望而投降，云山战斗遂告结束，歼美骑兵第 1 师第 8 团和南朝鲜伪军 15 团大部，毙伤敌 2000 余人，其中美军 1800 余人，缴获飞机 4 架，击落 3 架，击毁和缴获坦克 28 辆、汽车 170 余辆、各种火炮 119 门，极大地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坚定了志愿军的战斗信心。

攻克云山的同时，我三十八、四十二军也进行了猛烈反击，并以一部兵力迂回到价川以北院里地区，使敌人受到严重威胁被迫撤退到清川江以南。至此，第一次战役遂告结束。

第一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第一次交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并未引起战争狂人麦克阿瑟重视。他认为中国不过是在保卫边境，“象征性的出兵，不会真正参加这场战争”。因此，继续坚持其军事进攻计划，叫嚷要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于 11 月下旬发起“总攻势”。敌人投入的兵力有 5 个军共 13 个师、3 个旅和空降兵 1 个团约 22 万人，比第一次战役多 8 万人，而且是以美英军队为主。其部署是，西线 4 个军 10 个师、东线 1 个军 3 个师，采取沿交通线分兵冒进，主要兵力用于一线。预备兵力薄弱，加之两线分离，指挥不一，形成后方空虚，侧翼暴露，协同困难，有利于我军各个击破。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巩固胜利，克服困

难，准备再战的方针。中央同意，并决定再派第 9 兵团入朝参战，准备打第二次战役。

11 月上、中旬，第 9 兵团所辖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和公安第 18 师先后入朝。第二十军 59 师师长戴克林、第二十六军军长张仁初、第二十七军 81 师师长罗映臣、公安 18 师师长兼政委张天恕，都是红安老乡，但入朝既不同时也不同路。

戴克林所在的第二十军原驻山东曲阜，7 日在兖州乘火车北上。车到沈阳，兄弟师下车换装，他们师奉命轻装到通化待命。到了通化又接到命令在火车上等待入朝。这时军政治部派人送来两名翻译和作战地图。夜晚火车驶过鸭绿江，在朝鲜江界下车。戴克林令部队迅速离开，到 5 里外的一个山沟里隐蔽。第二天拂晓，美军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小镇顷刻变成一片废墟，而 59 师毫发无损，都说师长有先见之明。

第 59 师急于入朝，以致暂时无法与军部和兵团部取得联系，戴克林只有向志愿军司令部请示下一步行动计划。志司复电，要他们迅速开赴长津湖地区，接替第四十二军在东线的防务。

江界距长津湖 200 多里，限 3 天赶到，每天得行军 70 多里。若是平时算不了什么，但在有敌机轰炸，不走径路走山路的情况下，日行 70 里很困难。59 师进入牙德岭山区时，山下是红叶遍野的秋天，山上是白雪皑皑的冬天。翻越牙德岭，开始大家感到新鲜，愈翻山愈觉得冷，人人都打起寒战。冬天就这样降临在这支来不及换装的志愿军身上。从此，他们不仅要面对强敌，还要面对朝鲜北部异常的寒冷。

11 月 13 日，第 59 师接替第四十二军的防务。该军后勤部政委聂洪国听说是戴克林师接防，特地去看望这位老乡。他们曾经一起战斗在川陕苏区和长征路上，又在浴血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共生死。自那以后分开有 13 年了，现在朝鲜相见该有多少话要说，但时间不允许，只好三言两语，互道一声珍重和再见。然后聂洪国随四十二军快速开赴西线。

为了打好第二次战役，彭德怀与志司首长反复修改作战计划，最后确定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首肯。战役分东西两线，同时进行。东线是第 9 兵团 3 个军对付敌 1 个军，西线是志司直属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五十、六十六军六个军对付敌 4 个军，战役重点在西线。

就在我军部署时，敌人已展开进攻，因受到我军正面节节抗击和朝鲜人

民军在后方袭扰，故进展缓慢，东西两线均未到达我预定歼敌地区。彭德怀于 16 日电令各军迅速北撤。敌见我一退再退，误以为“怯战”，便全力猛攻。23 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到朝鲜前线，次日亲自督阵向我军发起“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我军按计划继续诱敌深入。25 日，西线我军将敌诱至预定地区，形成 140 公里长的弧形突出地带。这时，敌人兵力已分散，右翼暴露，有利于我军反击。彭德怀于当日黄昏下令反攻。韩先楚仍率前线指挥所在西线指挥。他亲自坐镇担负德川主攻任务的三十八军军部，指挥三十八、四十二两个军实施突击。在听取了三十八军首长的汇报后，他决定兵分三路：一部越过大同江，插到德川以南，从敌后进行攻击；一部翻过海拔 1000 多米的妙香山，插到德川以西，切断敌西逃的道路；一部歼敌炮兵营后进到德川以北。三十八军侦察支队连夜急进 60 公里，插到德川以南的武陵桥，监视并阻击伪军第 6 师。从而形成对德川伪军第 7 师的包围。在我军行动的同时，敌土耳其旅、伪军第 6 师、美军骑兵第 1 师，分别从价川、北仓、顺川等地向德川开进。11 月 26 日夜，三十八军抢在敌援军到达之前，将德川守敌全部歼灭。这时，四十二军也将宁远之伪军第 8 师歼灭，打开了战役缺口，为进一步实施战役迂回创造了条件。

攻克德川造成了反攻的有利态势。韩先楚即令三十八军火速向主要敌人美第九军后方价川、三所里前进，断敌退路，配合我军正面进攻。该军将穿插任务交给 113 师，限其在翌日晨赶到指定位置，堵住美第九军。德川到三所里约 70 公里，部队连日激战，没有休息，干粮也不多，要在 24 小时内到达，困难重重。为了战役的胜利，韩先楚把电话打到 113 师指挥所，强调指出：“第一，你们必须保证在今天下午 6 点以前出发；第二，在路上不论遇到多大困难和伤亡，你们没有权力停下来；第三，到达三所里以后，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你们必须把敌人截住。”正在打扫德川战场的 113 师，接到命令后来不及全部收拢，只有集合一个团就出发一个团，向三所里猛插。经整整一夜的强行军，终于按时到达了三所里。当部队踏上自军隅里通往顺川的公路时，北方烟尘骤起，没过多久，敌人的坦克、汽车滚滚而来。113 师先敌占领了公路两侧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封锁了公路，关上了美国侵略军南逃的“闸门”。

接着，113 师又向龙源里穿插，堵住了敌人南逃和北援的另一通道。敌主力美第九军陷入志愿军各部队的三面包围之中。为摆脱志愿军的打击，美第九军开始全线撤退。其一部在大批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 113 师阵地猛冲。同

时，美骑兵第 1 师、英军第 29 旅北上接应。113 师在敌人南北夹击下连日激战，虽有大量战斗减员，仍坚守阵地，顽强抗击，使相距不足 1 公里的南北之敌始终未能会合。

敌人从三所里、龙源里突围无望，为摆脱被歼命运，遗弃大量辎重装备，拼命向安州方向突围。我尾追部队受阻未能截住，敌逃过安州，向肃州、顺州以南逃去。12 月 3 日敌人向三八线以南实行总退却。6 日，志愿军收复平壤。12 日，我西线 6 个军向三八线挺进。西线战斗至此告一段落。

再说东线。

志愿军第 9 兵团所属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除二十军 59 师先期到达外，其余各部于 11 月中旬隐蔽进入长津湖周边作战区，敌人尚未发觉。

11 月 27 日，美伪军为配合西线作战，继续向北推进，其中美 3 师和伪 3 师各一个团进至横川里、社仓里，美陆战 1 师进至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古土里，美 7 师一部进至元丰里，形成点状孤立态势。当天黄昏，彭德怀令第 9 兵团抓住有利时机对敌人发起进攻。9 兵团在宋时轮指挥下，二十七军从正面攻击，二十军从侧面进攻，二十六军作预备队，集中优势兵力打击美陆战 1 师。该部名曰师，实际比一个军的人马还多，二次世界大战曾出尽风头，这次侵朝更是不可一世。我军广大指战员听说是打美陆战 1 师，士气高昂，作战勇猛，两天时间就将敌人分割包围于新兴里、柳潭里、下碣隅里等几个孤立地区，造成各个歼灭的有利条件。但天公不作美，连日大雪纷纷，气温降至摄氏零下 30 多度，给作战带来极大困难。为防止柳潭里敌人向下碣隅里逃跑，上级令 59 师切断敌人退路。师长戴克林立即率部顶风冒雪，去抢占从柳潭里至下碣隅里交通线上的死鹰岭。该山积雪达一尺多深，一不小心掉进了雪窝就难以自拔。战士们衣服单薄，很多人的脚冻僵了陷在雪中拔不起来。戴克林号召大家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互相帮助，齐心协力翻过山岭，完成作战任务。战士们在师长的鼓动和带领下终于按时抢占了制高点，控制了交通要道。当 59 师在岭上架电线挖掩体时，有的战士脚下踩着肉团，扒开一看是睡袋，里面是美国兵。他们正躺在睡袋里睡觉，袋上覆盖厚厚一层雪，若不是踩上他们是发现不了的。200 多名美国兵惊醒后爬出睡袋就成了俘虏。事后得知这些美国兵是陆战 1 师派来固守死鹰岭的。他们的长官以为风雪交加，天寒地冻，行军困难，不会有共军袭来，就钻进袋里睡大觉。谁知神兵天降，他们在睡袋

里当了俘虏。

切断敌人退路后，兵团指挥部采取一个一个的歼灭的作战方针。首先围歼新兴里的敌人。担当此任的是第二十七军第 80 师的两个团、第 81 师三个团，共 5 个团，在军部炮兵支援下，用 4 个团进攻、1 个团作预备队，于 12 月 1 日拂晓发起攻击。第 81 师是主攻部队，在师长罗映臣的指挥下，与敌人激战两天两夜，最后敌人不支，除 200 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得以突围外，其余 1000 多人均被歼。接着围攻柳潭里，美军拼命突围南逃，在死鹰岭遭戴克林师阻击丢下辎重，转向他方逃去。最后围攻下碣隅里，美陆战 1 师师部驻此。各地逃来之敌集中在这里死守。此时，雪愈来愈大，气温愈降愈低，我军供给困难，又冻又饿，无力迅速歼灭被围之敌。敌人见此情况，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突围南逃。作为预备队的二十六军，在军长张仁初率领下，奉命追歼，与二十七军一起一直追到咸兴，敌人从海上逃走了。东线战斗遂告结束。

第二次战役，从 11 月 25 日开始至 12 月 24 日结束，历时一个月。共歼敌 36000 余人，其中美军 24000 多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全部地区，使麦克阿瑟叫嚣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变成总退却，沉重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夺取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迫使敌人暂时转入防御。敌人在三八线与三七线之间 200 公里宽的正面和 60 公里纵深构筑两道防线，以 20 万兵力固守，阻止我军越过三八线，争取时间再行北犯。

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中央军委和志司决定发起第三次战役。

这次战役开始后，韩先楚指挥志愿军右翼突击集团，在朝鲜人民军第 1 军团的配合下，于茅石洞至永平地区约 34 公里宽的正面地段实施突破。在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我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十军由指定地段先后突破敌人三八线阵地，向其纵深发展，仅一昼夜就前进了 15~20 公里。到 1951 年 1 月 2 日，各军已将敌人的部署打乱。敌军慑于被歼，开始全线撤退。韩先楚指挥部队向仁川、汉城、水原、杨平方向追击前进。1 月 3 日，第 148 师师长赵鹤亭所在的第五十军于高阳地区全歼英军第 29 旅两个连。1 月 4 日，第五十军及第三十九军一部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并肩作战，解放了南朝鲜伪政权的首都汉城。接着渡过汉江，继续向仁川、水原方向前进。1 月 6 日至 7 日，又在果川、军浦场歼美军和英军各一部，占领了水原、金良场里。1 月 8 日，志愿军的 4 个军，经过 7 昼夜的连续进攻，挺进了 100

余公里，前进至三七线附近。

与此同时，左翼突击集团两个军（第四十二、第六十六军），在第四十二军首长指挥下，不断突破敌人防线，追歼逃敌，进至利川、原州，敌人退至三七线附近。

我右、左两路大军齐头并进，势如破竹，大有将敌人赶下海去之势。此时，细心的指挥员总会从敌人撤退中发现蹊跷。当韩先楚看到敌人构筑的坚固工事弃而不守，认为必有阴谋。他向彭德怀汇报，彭总也觉得敌人的大撤退必是引我深入，于是下令停止追击。

第三次战役于1月8日胜利结束，历时7昼夜，歼敌19700人，将战线向南推进了80~110公里。是我军入朝以来打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这次战役中，张竭诚师第350团第8、第9连在进占汉城的作战中冲杀在前，为大部队开辟通道，被志愿军总部授予“开路先锋连”称号。

几经较量　戳穿纸虎

志愿军三战三捷，扭转了朝鲜战局。但也暴露出我军后勤工作十分薄弱，往往在紧要关头，粮弹供应不上，制约了战斗的胜利发展。为解决后勤保障问题，彭德怀正在物色后勤人选。想不到有个人出现让他眼前一亮。谁呀？周纯全。

1950年12月下旬，中南军区后勤部长周纯全在武汉住院治病，忽然接到上级通知去朝鲜前线慰问。他二话没说，按时登上北去的列车。上级之所以点名要他参加慰问，是因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军都是四野的部队，他是四野后勤部长。四野大军从白山黑水打到南海之滨，周纯全与他们一直相伴相随。让四野后勤部长去慰问原四野的部队当然最合适。

周纯全从丹东过鸭绿江，沿途看到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人来车往的补给站，激动不已，仿佛自己又置身于辽沈战役的补给线上。

志愿军总部设在一个矿洞里。当周纯全出现在彭德怀的面前时，彭老总的眼睛突然一亮，脱口而出：“哦，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参加抗美援朝，管管后勤！”

周纯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说要等回去交代完工作才能来。

“不！”彭老总挥挥手，“你现在就开始上任，其他事你不要管了，由我

向中央军委说去。”

说到这里，彭老总一笑：“你不要感到我强迫了你！其实我们都是被战争强迫的，我，还有洪学智副司令员都是这样！”

原来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一直没有成立后勤部，志愿军的后勤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志愿军后勤指挥所设在沈阳，离前线很远。到达前线的是几个后勤分部，力量太单薄，根本适应不了现代化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在志愿军后勤部尚未成立的情况下，调周纯全来抓这项工作，无疑是一个加强。就这样，周纯全走进了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行列。

周纯全的到来，使志愿军后勤战线的几位红安籍战友吴先恩、何德庆、毛普安、吴基荣分外欣喜。吴先恩任志愿军后勤指挥所第一副司令员，何德庆任志愿军后勤第 4 分部部长，毛普安任第 3 分部部长、吴基荣任第 3 分部第一副部长兼参谋长，他们都是先入朝的。吴先恩在入朝前，已是湖北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局局长，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时，他重返部队，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行列。看到他们，周纯全更加坚定了留下来做好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的信心。

既来之，则安之。周纯全带病投入了工作。经过一番调查研究，1951 年 1 月 5 日，他以彭德怀、洪学智和本人的名义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改善志愿军后勤组织机构和部队供应的建议。22 日至 30 日，周纯全在沈阳参加了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会议由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主持，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吕正操等，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东北军区后勤部和志愿军各军后勤部及各后勤分部与东北人民政府的有关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周纯全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如何加强组织领导和后勤力量、千方百计搞好后勤供应工作提出了建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肯定。会议针对后勤工作的薄弱环节，着重研究解决加强兵站线路和运输供应问题，强调“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要搞好运输，必须搞好防空，号召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会后，他把原来十几个人的后方指挥所扩编为 80 多人的指挥部，亲自担任总指挥。此时，部队进击神速，补给线的延长和敌人的疯狂轰炸，使本来就严重不足的后勤保障力量更加窘迫。为此，周纯全命令由华东军区组成的后勤第 6 分部和以西北军区组成的后勤第 7 分部先后入朝。同时，给

原来已在朝鲜境内的 5 个后勤分部各增加两个大站，使每个分部达到 5 个大站。他还确定由每个大军区各组建一个汽车团支援前线，使志愿军后勤的汽车团一下增加了 6 个。接着，又让 6 个大军区组建了 10 个人力运输团，每团 2000 人，每人携带推拉两用小车一辆，使志愿军后勤的人力运输达到 17 个团又 8 个营。2 月份铁道兵第 3、第 2 师入朝，担负抢修铁路任务，由后勤指挥部统一指挥调配。2 月 9 日，后勤指挥部将东北人民政府支前的公路工程总队改编成 3 个大队，分别配属第 1、2、3 分部担任道路抢修等任务。与此同时，周纯全还加强了车辆及武器装备的维修力量，使车辆和武器随坏随修。

后勤工作不但要保障供给，还要救死扶伤。在周纯全的领导下，入朝战地医院已达 39 个。另外作为后方的东北地区还有医院 91 所。2 月中旬，东北地区又组建了 11 个担架团计 33000 人进入朝鲜。每个作战师可分配担架 130 副，使伤病员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彭德怀留下周纯全办后勤留对了。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从此不断地在改进。

在此期间，朝鲜人民军经过休整和补充，恢复了战斗力。为了统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组成了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彭德怀任司令员。

再说敌人连遭我军三次战役打击后，被迫从鸭绿江边退到三七线附近，并丢失了南朝鲜伪政府的首都——汉城。这是“美国从未遭受过的最严重的失败”。但它仍不甘心，又卷土重来，企图将我军压回三八线以北地区，重占汉城。1 月 25 日，敌集中 5 个军 16 个师又 3 个旅、1 个团共 23 万兵力，由西向东逐步向我全线 200 余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了进攻。敌人吸取以往分兵推进被我军分割围歼的教训，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法。

我军打完三次战役，原计划是进行休整，有的部队已转入休整。今敌又攻，不能不战。中央军委和联司全面分析了战场形势，认为我军极度疲惫，减员很多，粮弹缺乏，只能打防御战。因此，决定采取西防东击的战略，即以部分兵力在西线组织防御，钳制敌主要进攻集团；而东线则让敌深入，待有利于我时集中主力进行反击，挫其锐气，迫使它停止进攻，以便我军转入休整。决策既定，部署很快完成，1951 年 1 月 25 日第四次战役打响了。整个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西线防守，东线反击。

在西线，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负责指挥第三十八、第五十军和朝鲜人民第一军团，简称韩集团，配属炮兵两个团，在西线进行坚守防御，抗击进攻汉城的美国侵略军主力。

西线防御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自三次战役后，志愿军各部队的人员、物资消耗均未得到补充，不仅装备差，而且由于连续作战，大量减员，在兵力的数量上也失去优势。为了有效地阻击敌人，在韩先楚的部署下，部队迅速进入防御区域。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展开于金浦、仁川和汉城地区，担任海防及汉城的守备任务；第五十军与第三十八军第 112 师，展开于野牧果以东、汉江以南和以西广大地区，依托高地、山峰等要点，构筑了两道防御阵地。自 1 月 25 日起，美第一军和第九军，在大量飞机、坦克、炮兵的支援下，发起强大的正面进攻，沿水原至汉城的公路两侧猛进，直指汉城。此时，韩先楚就在汉城指挥部队。面对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及其强大的火力突击，他镇定果敢，指挥各部队依靠一般的野战工事，进行顽强阻击，与敌逐山逐水反复争夺，艰苦奋战了 14 个昼夜。2 月 8 日，他将部队主力撤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留第三十八军在汉江南岸继续抗击敌人。由于西线韩集团的顽强坚守，牵制、打击了敌军主力，歼敌近万人，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东线部队的反击作战。

在东线，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指挥志愿军第三十九、第四十二、第六十六军，简称邓集团，配合炮兵 3 个营及两个连，在横城以北节节阻击，伺机反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金雄指挥第二、第三、第五军团，简称金集团，掩护邓集团，并在邓集团反击时从左翼实施反击。

敌在东线的兵力有 9 个师，向北发起进攻时在砥平里至横城一线的态势突出，且是伪军，有利于围歼。邓华决定采取两翼迂回与正面突击相结合的战法，先消灭横城西北的伪第 8 师，吸引美军第 2 师来援于运动中加以歼灭。实施这个战法，要派一支部队插入敌后切断退路。这项任务落到第三十九军第 117 师肩上。

该师师长张竭诚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奉命带领三位团长回国集训，学习陆空协调作战。因敌人大进攻，集训提前结束。他带领三位团长又从国内火速返回部队。军长吴信泉和政委徐斌洲向张竭诚交代说：1 月 25 日敌人就开始发起进攻了。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发起第四次反击战役，准备在横城地区消灭敌人一两个师，以挫败敌人的进攻。117 师暂时配属四十二军，担负横城穿插迂回任务。

横城位于汉城以东 90 公里，原州以北 16 公里，是敌人进退枢纽之地。117 师要从敌人结合部之间隙插入敌后，在位于横城西北 2~3 公里的夏日、鹤谷里一带的公路两侧，占领有利地形，切断敌人退路，阻击由横城出援之敌，配合正面反击部队的进攻。117 师的穿插里程为 35 公里，均系山地，上级命令务必于 2 月 12 日 7 时到达。在师部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张竭诚归纳了大家的意见，下达了师的部署与要求，于 11 日 17 时出发。

兵贵神速。部队翻山越岭，攀悬崖、走险路、取捷径向前直插。当时大雪刚过，漫山皆白，山路被掩埋，后半夜又刮起大风，气温在摄氏零下 20 多度，更增加了行军的困难。部队在疾进中，不时与小股敌人遭遇，能歼则歼，能过则过，以不误时间为原则，终于在 12 日 7 时前到达指定位置。各团抓紧察看地形，展开部署，做好战斗准备。8 时许，敌人有组织的突围和增援开始了。117 师所属各团同敌人展开了激战，整个战场险象环生：敌人围我，我又围敌。张竭诚时刻与各团保持联系，要他们沉着指挥，顽强战斗，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这场恶战直到晚间结束，毙伤敌 850 余人，俘敌 2500 余人，击毁和缴获汽车、坦克 200 余辆，各种炮 100 余门。创下一个师在一次战斗中歼敌最多、缴获最多的纪录。战后，117 师受到了中朝联合司令部、志愿军政治部的通令嘉奖，有两个团和一个营荣立集体三等功。117 师胜利完成穿插任务，有力配合了邓集团的横城反击战。东线我军这次共歼伪第 8 师 3 个团、美第 2 师 1 个营、4 个炮兵营等 12000 余人。伪第 8 师师部侥幸逃脱却心有余悸。美国第 8 集团军司令、后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在回忆录中写道：

> 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脚穿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的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李奇微还算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东线我军在横城反击战中虽胜，但不能遏制敌人进攻，故在战后即开始后移。西线我军也在 16 日至 18 日撤至汉江北岸。战役第一阶段便告结束，历时 25 天，歼敌 22000 多人。

第二阶段实行机动防御，掩护第二番部队开进、展开。

我军后移，敌军继续进攻。这时我一线作战部队十分疲惫，减员增多，补充兵员尚未到达；前来接替的第二番作战部队要到4月上旬才能够在三八线以北地区集结。有鉴于此，联司首长决定采取机动防御作战，争取两个月时间，掩护第二番部队开进、展开，同时改善交通运输，囤积物资，然后再发起新的进攻。为此，我军构筑两道防线，组织两个梯队进行抗击。

第一道防线在汉江北岸，以志愿军第五十、第三十八、第四十二、第六十六军和人民军第5、第3、第2军团共8个军（欠一个师）组成第一梯队，争取在此抗敌一个月。

第二道防线在西起汶山东至丰岩里一线，以志愿军第二十六、第四十、第三十九军和人民第一军团一个师，共3个军和1个师组成第二梯队，争取在此再抗敌一个月。

2月19日，敌在汉江以东发起进攻，遭到我军顽强阻击，进展缓慢。3月7日，敌集中5个军14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在强大火力支援下发起更大规模进攻。美军第九、第十两军企图从中央突破，转而围攻韩城。我军在天寒地冻、粮弹缺乏、不断减员、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依托一般野战工事，跟敌人展开逐山逐水的节节抗击，死守硬拼，伤亡很大。而在汉城南面防御战中的第五十军第148师，在师长赵鹤亭指挥下，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轮换抗击，尽量减少了伤亡。赵鹤亭师以较小的伤亡抗击敌军的事例，引起志愿军总部的重视，便以148师为例，综合各部队的经验教训，很快总结出防御战的作战原则：在敌人强大火力进攻下，我军防御作战“兵力配备要前轻后重，火力组织要前重后轻”。这一新的战术指导思想贯彻以后，部队的伤亡明显减少了。这个作战经验包含了赵鹤亭在内的许多指战员的智慧和鲜血。



1952年，第二十六军领导在朝鲜战场前线指挥所。左起：张仁初、李耀文、王前、曹普南。

第一梯队在第一道防线实行

节节抗击，到3月10日后移至预定地区。12日，第二梯队接替防御作战任务。

战场在变，双方的战法也在变。这时敌人除采取“主力靠拢，等齐发展”的阵势进攻，还用空降、机降突袭要点。我军则采取重点设防、梯次配置、扼守要点、以点制面，实行“兵力前轻后重，火器前重后轻”的战术，以阻击为主，结合反击、伏击、袭击等多种手段，大量杀伤敌人。

在这场多变的防御战中，张仁初可说是应对有方。

3月25日，美国空降兵第187团伞降4000多人和一些坦克、火炮在东豆川西南地区，随即对我第二十六军的侧翼进行袭击。军长张仁初即以部分兵力打退了敌人进攻。“天降兵力”在张仁初面前失去了作用。这天晚上，张仁初奉命率部转移至仙岩里、七峰山、海龙山、旺方山、云岳山一线继续防御。28日，敌进攻旺方山时，用直升机载兵在我阵地侧后实施机降，突然攻占了我两个班的阵地。张仁初正要收拾他们，七峰山、海龙山告急。这两座山头更为重要，必须迅速增援守住。他决定暂缓夺回旺方山两个阵地，重点关注七峰山战斗。此时，我军坚守这两座山头的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制高点多达11次，杀伤敌人1000多人，我军也有很大伤亡。在这次战斗中，有一个班以反坦克手榴弹击毁敌人坦克9辆，创造了一个模范战例。在张仁初指挥下，增援部队打退了敌人向七峰山的进攻。回过头来，张仁初又亲自指挥夺回旺方山的两个阵地，全歼直升机所降一个排的敌人。他从这两次反空降、机降的作战中得出各个歼灭的经验。

在这场防御战中，我军指战员不断地击破敌人的进攻新招，其目的是为掩护第二番部队开进。

4月上旬，新入朝的志愿军第3兵团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军，第19兵团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和已在朝经过短暂休整后的第9兵团第二十、第二十七军，先后进入预定地区集结。与此同时，新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野战炮兵第2、第8师，反坦克炮兵第31、第32师，火箭炮兵第21师，高射炮兵第61、第62、第63、第64师等也分别配属第一线部队作战或担负后方掩护任务。从国内抽调的4万老兵和8万新兵也在3月底以前补入部队。

这场马拉松式的防御战，打了近两个月。敌人虽然越过三八线，但伤亡严重，疲惫不堪。他们发现我军第二番部队集结，判断我军可能发动新的攻势时，便从4月18日开始转攻为守。本次战役第二阶段便告结束，历时59天，歼敌56000多人。

整个第四次战役前后 84 天，共歼敌 78000 多人，平均每天歼敌 900 多人。我军在又长又宽的防线上进行正面机动防御，使敌人每天前进不到一公里半。这每一天的伤亡数字和前进里程告诉敌人：中朝军队的防线是不好逾越的。

敌人用沉重的代价从三七线又反攻到三八线。欢庆声中，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应继续北进，占据有利地位，迫使我军订立城下之盟；英、法等国害怕长期卷入战争，影响欧洲稳定，不愿北进，主张在三八线停火；“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不仅主张北进，还要“把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沿海和内陆基地”。此言一出，加剧了美、英、法之间的矛盾。杜鲁门为缓和内部矛盾，于 4 月 21 日下令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由美第 8 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军总司令。老麦不但未得到主子赏识，反而成了替罪羊。

李奇微上台后，他的企图和部署是：新增美军 1 个军和伪军 3 个师，加强正面进攻；猛烈轰炸我后方交通线、物资囤积地和部队集结地；用海军轰炸和封锁海岸港口。企图从我侧后再行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实现其“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这个蜂腰部位于三九线以北的元山至南浦一线。

我军在第四次战役掩护下，抓紧时间对下次战役进行了准备。至 4 月中旬，第 19、第 3、第 9 兵团除各以一部分兵力担任一线防御外，其主力都已进入预定地区。炮兵、反坦克炮兵和高射炮兵等已配属到各军。为保证铁路、公路畅通，铁道兵第 3 师和 4 个工兵团分驻各路段，随时准备抢修。公安军第 18 师在师长兼政委张天恕指挥下，沿交通运输线设置防空哨，负责对空监视。为加强后勤保障，志愿军前方勤务指挥部司令员周纯全坐镇指挥 6 个分部，负责做好对第 19、第 3、第 9 兵团的物资供应。这时的后勤战线人员已达 18 万多人，基本形成了固定供应线，实行分段包运制度，提高了运输效率，改善了物资供应状况。到 4 月上旬，已囤粮 3000 万斤，弹药 3 至 5 个基数。后勤工作虽比以前有很大改进，但因部队增多，物资储备仍感不足，只能保障最低限度的补给。周纯全夜以继日地想办法改进后勤工作。

在第四次战役进行期间，毛泽东指示：在第二番作战部队入朝后，我军应在 4 月 15 日至 6 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伪军建制部队几万人，然后向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彭德怀根据这个指示，结合战场形势，决定乘敌在三八线地区立足未稳发起第五次战役。

我军分为右、中、左三个集团：右翼突击集团由 19 兵团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及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配属炮兵第 8 师组成；中央突击集团由第 3 兵团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军，配属炮兵第 2 师、反坦克炮第 31 师一个团组成；左翼突击集团由第 9 兵团指挥的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第四十、第三十九军，配属炮兵第 1 师、第 7 师、反坦克炮第 31 师一个团组成。三个集团中红安籍将领有：右翼集团的第六十四军第 191 师师长谢正荣；中央集团的第 3 兵团副司令王近山、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第六十军第 181 师师长王诚汉，他们是第一次入朝作战；左翼集团的第二十六军军长张仁初、第二十军第 59 师师长戴克林、第三十九军政委徐斌洲和该军第 117 师师长张竭诚，他们已参加了前面的四次战役。一直在前线指挥的韩先楚，因病不得不离开战场回国治疗。三个集团都采取正面攻击与迂回包抄相结合的战法。

4 月 22 日黄昏，彭德怀一声令下，三个突击集团像三支离弦的箭，向敌人全线发起猛烈进攻，打响了第五次战役。191 师师长谢正荣所在的六十四军是右翼集团的先遣队，他与兄弟部队一起，一举突破英军和伪军的防线，歼敌 4000 多人，然后继续向敌纵深突入。王近山指挥中央集团，在 15 公里宽的正面战场上实施突破，歼敌美 25 师一部，秦基伟率十五军勇猛突入纵深，歼敌美 3 师一部。左翼集团的徐斌洲与军长一起率三十九军，张仁初率二十六军、戴克林所在的二十军等部队，一举突破敌防线 20 公里，歼美军 24 师、伪 6 师各一部。战至 25 日，三个集团均突破敌第一道防线，全部越过三八线。26 日，继续向敌纵深进攻，当天又突破敌第二道防线。29 日，右翼集团前进至汉城近郊的北岳山地区。中央集团控制了汉江北岸，秦基伟部逼近汉城。左翼集团在打退敌人反冲击后，徐斌洲率三十九军夺占春川，保障该集团攻占金谷里、磨石隅里，也将逼近汉江。这时敌人判断我军会从中线突破，调集东西两线部队向中靠拢。彭德怀抓住敌人兵力西移、东线薄弱之机，迅速调整部署，转兵向东，取得了连连歼敌的机会。在第五次战役中，新入朝的四位红安籍将领王近山、秦基伟、王诚汉、谢正荣，分别在师、军、兵团三个不同岗位上指挥作战，大显身手，战绩俱佳。

先说第六十军第 181 师师长王诚汉。他的部队从四次战役的防御战到五次战役的进攻战，几乎是连接起来打的。参加这么长时间的战斗，对他来说，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而是急促上阵。

1951 年 3 月，正在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的王诚汉，奉命提前毕业，归队出征。4 月初即率部入朝，他的领导机关军部已先抵达。待王诚汉赶到即去前线接替防务。4 月 14 日，他从二十六军军长张仁初的指挥所里接受了该军所承担的防区，趁此机会他向这位同乡老大哥讨教了与美军作战的经验。从此，王诚汉部就拉弓上弦，战斗不断。16 日至 19 日，敌步兵在坦克、飞机的支援下，先后 7 次向 181 师防御阵地发起攻击。王诚汉在指挥这次战斗中，吸取兄弟部队的经验，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19 日晚，181 师奉命将已巩固的阵地移交 179 师，接替二十六军 78 师高台山以南 541 · 9 高地防御任务。其后敌人连续 4 天以 6 至 8 架飞机、10 余辆坦克、2 至 3 个炮群支持其步兵向 541 · 9 高地猛犯。王诚汉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 10 余次进攻后又将这个阵地巩固起来。

4 月 20 日晚，王诚汉接到第五次战役的进攻命令。兵团和军部赋予 181 师的任务是：担任六十军第一梯队，由高台山向加齿顶、地藏峰、釜谷里出击，割断美军第 25 师与土耳其旅之间的联系，并抗击美 25 师，不使其增援土耳其旅和美军第 3 师，配合兵团主力围歼土耳其旅和美 3 师。

22 日 18 时第五次战役正式打响。在军部炮火支援下，王诚汉命令第一梯队 541 团和配属的 536 团发起攻击，经激战，一举攻占地藏峰，突破了土耳其旅防线，541 团主力乘势向敌纵深釜谷里发起进攻，溃敌撤向加齿顶，企图掩护其主力向釜谷里、涟川一线转移。王诚汉抓住有利战机，迅速命令 542 团向加齿顶冲击，于次日 8 时攻占加齿顶，并随后攻占 713·2 高地。至 23 日拂晓，181 师攻占釜谷里以北土耳其旅全部阵地，歼敌一部，俘敌 90 余人。24 日 2 时，王诚汉奉命率部抢渡汉滩川，追歼南逃之敌，于 27 日率部进至釜谷里、龙井寺、退溪院里地区，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他利用战斗间隙，抓紧组织部队补充粮弹，总结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经验，进行再战动员。

10 多天后，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发起。181 师奉命配属第十二军歼灭自隐里、寒溪之美军与伪军一部。5 月 18 日晚，王诚汉率师指挥所冒着敌人的炮火爬上了加里山，观察到敌人在探照灯照明下乘汽车向东南撤退，敏锐地意识到敌人已被我军从东西两面包围，为摆脱其两侧受钳击的困境企图向东面突围。他当机立断，派作战科长给师前卫 542 团传达命令：避开正面之敌，由两侧插入松谷峰，截断敌人退路，歼灭法国营。542 团 3 营奉命直插松谷峰，在自洪公路东南福宁洞和松谷峰构成袋形伏击阵地。19 日 4 时，法

国营进入我军伏击圈，经激战大部被歼灭，生俘 83 人。542 团乘胜攻占了大小平川西南之 328 高地和福宁洞以南 369 高地，控制了自洪公路，与向东南突围之敌激战两昼夜。同日 13 时，541 团一部插至松谷峰，攻占寒溪之 505 高地。随即，王诚汉不失时机地电令 541 团过洪川江，沿积石山北麓向上下莲洞方向出击，夺取并守住了 530 高地。23 日，王诚汉奉命率部撤至春川以东之勿老里、插桥里地区待命，归建 60 军。王诚汉在第五次战役中，指挥他的部队从防御到进攻，穿插分割、设伏追歼，都有所斩获，显示出他灵活善战的指挥才能。

再说第 3 兵团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他入朝作战与别人不同，其他人是奉命，他是请缨。

1950 年 10 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消息传来，秦基伟的心立刻飞到了朝鲜战场。他三次请缨出征，最终获得中央军委批准，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 兵团第十五军军长。

第十五军是秦基伟的老部队，军领导班子成员：政委谷景生、副军长周发田、参谋长张蕴珏、政治部主任车敏瞧，是和他一起南征北战多年的老战友。他们在誓师大会上带头立下自己的誓言：“在朝鲜战场上，自己的名字不书英雄榜，便上烈士碑！”

1951 年 3 月 18 日，在祖国人民热烈欢送下，第十五军从安东（今丹东）雄赳赳地跨过鸭绿江。

当时，中朝部队正在积极准备发起第五次战役。第十五军初次上阵，任务紧迫。为了适应新的作战环境，打有把握之仗，秦基伟还是坚持“磨刀不误砍柴工”，派副军长周发田率领一批师、团指挥员到先期入朝的“老大哥”部队学习取经，结合本部实际抓紧时间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增强了“敢打必胜”的信心。在“打响出国作战第一炮，为祖国争光”口号的鼓舞下，全军指战员斗志昂扬地投入第五次战役，从 4 月 22 日到 6 月 10 日，连续奋战近 50 个昼夜，首挫美第 3 师、再创美第 2 师，从“三八”线一直打到汉江北岸，大踏步前进，又大踏步后退，发扬了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战斗作风，在运动中歼敌 9400 余名（其中全歼美第 3 师第 38 团），并开创了群众性的打敌机运动，击落击伤美机 40 多架，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第十五军被荣记集体功一次，并受到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表扬。秦基伟率领第十五军在五次战役所取得的这些战绩是初试牛刀，真正大显军威的日子还在后头。

再说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

王近山入朝作战前与王诚汉一样，正在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

1951年3月18日，王近山被任命为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作第二批参战部队，率部入朝作战。第3兵团由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军组成，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因病暂不出征，由王近山代司其职。这是中央军委对他的信任。他决心率新组建的第3兵团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再立新功。

王近山在朝鲜战场同美军交手是从第五次战役开始的。前面讲到他的部属第六十军第181师王诚汉部和第十五军秦基伟部以及整个第3兵团的战况战绩，说明在五次战役第一阶段进攻时，作为中央突击集团，王近山指挥第3兵团很好地完成了联司下达的作战任务。战役第二阶段进行东线歼敌，第3兵团的第十二军属第9兵团指挥。王近山指挥第十五、第六十两个军继续执行攻击任务。他用第六十军钳敌，第十五军攻敌，经连续激战，一举歼灭大水洞美第2师第38团两个营。美第7师企图救援，但在第六十军的钳制下，不能靠近一步。然后他指挥两军直逼地川江，将敌防线从中央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敌“联军司令”李奇微惊慌不安，忙调兵遣将将其堵住，继续与我军抗击。此时，我军连续作战近月，部队疲劳，粮弹也快用完，继续前进不利，联司决定停止进攻，战役第二阶段遂告结束，我军开始后撤休整。

就在我军胜利回师途中，由于没有做好轮番掩护后撤的准备，结果第3兵团第六十军第180师被敌人“包了饺子”，损失8000多人。打了胜仗折了兵，王近山领兵打仗二十多年从未有过，他痛心疾首。为了弄清事实，毛主席两次召他进京谈话，他主动承担全部责任。他是一个敢打敢拼、敢作敢当的将领，胜就胜了，败就败了，认胜不认败不是他王近山的性格。当兵败发生后，他的心里只有自责和内疚，除了承担责任，其他没有多想。毛主席知道这位战将从不掩盖自己的过失和错误。每次谈话适之有度。第一次谈话，王近山主动承担责任，毛主席说现在是调查不是做结论的时候，使王近山深感统帅的关怀。第二次谈话，王近山准备接受处分时，毛主席说问题现已调查清楚，你有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你回去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克服你那骄傲轻敌思想，把以后的仗打好！统帅的爱护使他很快从痛苦中走出来，明白了自己从思想到指挥上的不足。毛主席的教导好像让他洗了一次澡，身子一下轻松起来了，在以后的战役中，他指挥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

扬威天下　班师回国

志愿军自入朝参战以来，敌人对我后方交通运输线一直进行狂轰滥炸。后勤供应处于被动困难地位。到了第四、第五次战役期间，后勤工作进入了最困难、最艰苦、最复杂的阶段。其原因：一是参战部队人数到了近80万。据2月28日计算，每月需前运物资47486吨（尚不算特种兵物资），仅汽车就需要5600多台，而当时仅有1800多台，尚缺三分之二。二是战场南移，供应线由原来100多公里延长至500公里外，部队作战地区在三八线与三七线之间，此地原为敌人占领，是“三百里无粮区”，无法就地筹措。三是美军用他们1700架飞机的70%来轰炸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并大量使用定时炸弹、凝固汽油弹、四爪钉、蝴蝶弹等，从“梳篦式”轰炸到重点轰击，连一台车、一个人、一缕炊烟都不放过。不少铁路、公路桥梁都是炸了修，修了炸，反复无数次。志愿军的汽车平均每天损失30辆。4月8日，敌人向志愿军三登库区投下大量燃烧弹，一次就烧毁82节火车皮的物资，其中粮食287万斤，豆油33万斤，单衣衬衣41万套，胶鞋19万双。后方供应的物资，只有60%~70%的运到前线，其余部分都被破坏。



周纯全（右二）与彭德怀（右三）、洪学智（右一）等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合影。

怎样才能使后勤运输线打不断、炸不烂呢？经过周纯全等带领大家不断摸索总结，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概括起来有五条：

一是转入夜间行车。

二是设置防空哨。关于防空哨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1953 年 9 月 12 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抗美援朝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严重。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十四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

三是构筑防护工程。本着疏散、隐蔽的原则，沿途构筑了许多半地下式的仓库，使车辆、物资都能及时转入地下或掩体内。

四是加强防空力量。1951 年 4 个高炮师、5 个城防团和 58 个独立高炮营入朝，有力地打击了敌机的嚣张气焰。据统计，三年中志愿军共击落敌机 430 架，击伤 1950 架。其中后勤部队击落 109 架，击伤 698 架。

五是建设兵站运输网。西线由安东（今丹东）、长甸经安州、平壤、涟州到汉城，全长 650 公里；中线由辑安（今集安）经熙川、顺川、三登、铁原至加平，全长 800 公里；东线由宁边经德阳、元山、平康到洪川，全长 400 公里。这三条运输干线为保障供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建设运输线的同时，他们还在沿线接近前沿的地区开设了供应站。

1951 年 6 月，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洪学智兼司令员，周纯全任政委，开始全面加强后勤建设。到 10 月成立了 5 个分部、28 个大站、21 个警卫营、13 个汽车团、29 个辎重运输担架团、3 个公路工程大队、29 个兵站医院、4 个高炮营、3 个通信营、8 个运输营，共 14 万多人。另配属公安一个师、步兵一个师和 6 个工兵团、8 个高炮营，共 4 万多人。总人数达 18 万多人，还不包括军以下各级后勤人员。随着形势发展，之后逐步成为一支多兵种的后勤部队，将我军后勤建设推向新的阶段。作为主持后勤日常工作的周纯全，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

此时，美军的"绞杀战"开始了。他们在横贯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划定一个阻滞地带，一次出动数十架甚至上百架飞机，对重要目标进行长时间的毁灭性轰炸，叫嚣要阻断"所有的公路交通、铁路交通"，"摧毁各条线路上的每一辆车、每一座桥梁"。敌人为了炸毁志愿军的楠亭里仓库，在 13 个小时内竟出动飞机 28 批、367 架次，投掷各种炸弹 2040 枚。在朝鲜北部铁

路公路运输咽喉地带价川、西浦、新安州“三角地区”竟投下了38000枚炸弹，平均两米远有一枚炸弹。

“绞杀战”开始时，又遇上洪水的高峰期。这是朝鲜几十年未遇的暴雨，导致山洪暴发，河水漫溢，洪峰最高处达10米以上。志愿军后勤物资主要集散地三登附近成了一片汪洋，仓库、医院、住地及高炮阵地皆被水淹。后方运输线路遭到严重破坏，205座公路桥梁和94座铁路桥梁被冲垮，路面被冲塌冲裂，难以通行。

面对严峻局势，周纯全与洪学智带领全体后勤指战员，在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采取抢运、抢修、防空三位一体的方针，展开了反“绞杀战”的战斗。

“铁路不通用人通，桥断路断运输不能断！”周纯全向后勤人员发出号召。决定采取人扛、马驮、汽车拉的办法，把积压在江边的物资倒运出去。一声令下，各个大站的成千上万名指战员和5个汽车团的1000多辆汽车奔赴三条江的江边，夜以继日运走了西清川江桥头的600多个火车皮的物资、东大同江边的1100多个火车皮的物资和东沸流江岸270多个火车皮的物资。

9月中旬，志愿军抽出二线的11个军，再加上9个工兵团和3个工程大队，共数十万人，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抢修公路的热潮。周纯全派出有关业务干部分赴各地进行规划和指导，各单位采取分段包干和劳动竞赛的办法，使工程进度不断加快，只用了25天，就把被毁的道路全部修通了。炮兵部队在此期间击落敌机55架，击伤100余架，有力地打击了敌机的嚣张气焰，保障了物资运输。从此以后，做到了此断彼通、彼阻此畅，条条大路通前方。

到1952年6月，美军发动的为期一年的“绞杀战”被志愿军彻底粉碎了。美远东空军在对其“绞杀战”所作的最后分析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由于共军后勤系统的灵活性……绞杀作战未获成效。”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惊叹地说：“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与此同时，志愿军防疫人员和后勤医务人员组成一百多个防疫队，深入军营开展反细菌战的斗争，通过防疫宣传教育、注射疫苗，开展卫生防疫运动，1952年初敌人发动的细菌战至年内也被我军粉碎。

反“绞杀战”、反细菌战的胜利，除了前线和后勤中的红安籍指挥员外，

其他军兵种中的红安人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是：

志愿军铁道兵第4师师长闵学胜。他的部队以抢修铁路桥梁为主，修复了大量被毁工程，保障了铁路畅通无阻；

志愿军高射炮兵指挥所司令员吴昌炽。他统一指挥高炮部队，严阵以待，使敌机不敢贸然靠近交通线进行狂轰滥炸，掩护了物资运输；

志愿军空军第6师政委张志勇，他带领的空6师是由陆军转为空军，仅用一年时间，就能上天与美机作战，击落击伤敌机多架，充分发挥了年轻空军的威力。

更令人称道的是，只要战争没有停止，红安籍将领入朝作战的脚步也没有停止。

1952年4月，王建安奉命率华东军区部分师以上干部到朝鲜战场上学习，总结经验，研究战法，准备参战。8月21日，王建安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他迅速到职，带领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轮换第二十、第二十一军回国。当时朝鲜战局继续处于对峙状态，停战谈判也陷入僵局，战争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扩大，正处于转折关头。双方为争夺战场主动权，均在进行新的筹划和准备。王建安率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军布置于中线战略要地五圣山、五里亭一带，接替第三十八、第四十军的正面防务，与美军第3、第7师和南朝鲜伪军第2、第9师、首都师等精锐部队对峙，“联合国军”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同年5月，东北军区批准辽西军区司令员胡奇才入朝参战学习，指定他担任入朝参战实习团团长，率团前往战斗在朝鲜东线的志愿军第20兵团第八十军，任命他为八十军临时副军长，领导参战实习团成员更好地完成实习任务，为回国组建参战部队做好准备。胡奇才作为入朝作战的预备将领，在朝鲜战场上度过了为期半年多的战地生活。

前仆后继，没有间断。这是红安籍将领抗美援朝的最好概括。

我们再把目光移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战场形势。

经过前五次战役，中朝军队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朝鲜战局，共歼敌约23万人，其中美军115000人，月消耗物资约85万吨，人、钱、物损失巨大。美国报纸惊呼：“朝鲜的‘小战争’使美国损失的人员和金钱比1942年对日本进行的‘大战争’还多。”侵朝战争加重了美国人的负担，群众反战情绪日益高涨。英、法等国军队屡吃败仗，损失惨重，不愿增兵，与美国的矛盾加深。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强烈谴责美国侵朝，要求迅

速结束战争。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战争策划者不得不承认：只凭军事手段是不能解决朝鲜问题的，必须放弃战争计划，谋求政治妥协。因此，1951 年 5 月 16 日，美国作出决定：准备同我军进行停战谈判。企图通过谈判，使朝鲜战争“按美国条件得到解决”。

根据这一新的形势，毛泽东、周恩来于 6 月初邀请金日成来北京商讨。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也就是将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同时进行。按照这个方针，中央军委制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防御工事，依托阵地以防御与反击相结合，消耗战与歼灭战相结合的手段，采取“零敲牛皮糖”的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多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灭敌人，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为此，我军在前沿构筑绵亘不断有一定纵深的坚固防御阵地；组织部队轮换休整，补充兵员，加强训练；改善部队技术装备，加强特种兵建设；抓紧时间抢修机场、铁路、公路，改善运输供应。

6 月 30 日，美国政府令“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谈判在元山港外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7 月 1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电复李奇微，建议双方代表在三八线南我方控制的开城会晤。

7 月 8 日，双方谈判代表来到开城。10 日，朝鲜停战谈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从此，在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史无前例的长达两年零一个月的战略相持局面。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这个阶段中，我军先后发动了 1951 年夏、秋季防御战役，1952 年夏、秋季战术性反击作战和上甘岭防御战役。红安籍将领在这漫长、激烈而又艰苦的战斗中，谱写了一曲曲胜利之歌，其中最令人震惊和鼓舞的是上甘岭大捷。指挥这次战役的是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和第 3 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

1952 年 10 月初，美陆、海军头目纷纷到朝鲜前线与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策划新的进攻计划，以摆脱在战场和谈判桌上的被动局面。10 月 8 日，美方片面中止谈判，宣布无限期休会。14 日，即向我军发动了 1952 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金化攻势”。敌人的企图是，首先夺取五圣山前沿支撑点上甘岭以南的两个高地，然后再夺取五圣山主阵地，在我军中央防线打开缺口，迫使我军后退，用军事压力造成谈判有利地位，同时破坏我军战术性反击作战计划，为日后向我军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五圣山位于金化以北，为我 3 兵团十五军防御的重要阵地，海拔 1 千多

公尺，可瞰制被敌人称之为“铁三角”的金化、平康、铁原地区，是我中部战线的战略要点，是朝鲜中部要冲平康的天然屏障。五圣山前沿的上甘岭以南有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山高坡陡，地形复杂，便于我军开展小分队活动及开展狙击活动，有“狙击兵岭”之称。这两个阵地接近敌方，对敌人所在的金化地区威胁极大，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想攻占。

这次进攻是由侵朝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亲自指挥的。从 10 月 14 日到 11 月 25 日，敌人先后投入总兵力达 63000 多人，战车 118 辆，大炮 350 门，飞机 3000 多架次，向上甘岭前后两个总面积不足 4 平方公里的我军阵地轮番攻击，计倾泻炮弹 190 万发，炸弹近万枚，不仅摧毁了全部表面阵地工事，而且把山顶削低 2 公尺。敌人狂妄地叫嚷：“不让一个共军活在地平线上！”国际军事评论家也说，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战区，双方参战兵力之多，持续时间之长，火力之猛，不仅是朝鲜战场上第一次，也是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的。

我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是第 3 兵团第十五军和第十二军。上甘岭地区是十五军的防御阵地，当然是主要参战部队，十二军为战役预备队。指挥这次战役的除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志司首长外，还有 3 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王近山主要是观察战势，作出判断，把握战场主动权，在关键时刻投入预备队，进行决定性反击，夺取最后胜利，也就是说他看重的是战役指挥。秦基伟则坐镇前线，将上级的作战意图创造性地运用到战斗中去，直接而又具体地指挥每一天的战斗。代司令员和军长在指挥岗位上一前一后，一实一虚，相得益彰。

战役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残酷和惨烈。

秦基伟深知此仗打得好坏将对朝鲜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面对优势敌人的凶猛进攻，他虎气横生，毅然向全军发出号召：这一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为了实现朝鲜的和平，就是咱十五军拼光了也在所不惜！

军指挥所就设在距火线不远的地方，这里也不断遭受敌机空袭。艰难的日日夜夜，他和战友们倾注全部意志、力量和智慧，同敌人决战。

战役一开始，敌人就连续投入 17 个步兵营，在飞机、大炮和坦克支援下，向我上甘岭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一天竟达二三十次之多，把两座小山头打成一片火海。为避开敌人锋芒，减少部队伤亡，秦基伟决定使用少数连队，坚守前沿阵地，进行阻击。战士们面对优势的敌人，发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敌人展开英勇拼杀，反复争夺每一个阵地。危急时刻，不少



时任志愿军第 15 军军长秦基伟(左二)与军参谋长张蕴钰((左三)在上甘岭前线指挥所

战士奋不顾身，拉响手雷，冲入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气贯长虹。激战到第六天——10 月 19 日，更出现了以自己的身躯堵住敌人的机枪射孔，为反击部队开辟前进道路的特级英雄黄继光，他的伟大献身精神，更加激励了整个部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胜利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的阻击任务，7 天中歼敌 7000 余名。

从 10 月 20 日起，我前沿部队转入坑道作战，利用“地下长城”，保存力量，拖住敌人，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准备反击。

这是一场无比艰苦和顽强的坑道保卫战。此时，上甘岭前沿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的表面阵地已被敌人占领，他们得意逞狂，用飞机炸、大炮轰、火焰攻、毒气熏等种种毒辣手段，对我军的坑道实施破坏、封锁和围攻，使我军坚守坑道的部队日益陷入极端困难和艰苦的境地，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缺少弹药，缺乏医药，伤病员得不到治疗，烈士遗体得不到掩埋，更严重的是有的坑道已被敌人摧毁，形势极其险恶。是继续坚守坑道，还是弃守后退？十五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军指挥所里，秦基伟连续七天七夜几乎没合眼，每天全靠两三包香烟支撑着，他极力按捺住心头的怒火，保持冷静，沉着指挥。他和副军长周发田、参谋长张蕴钰等一起，悉心计算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千方百计地加强前沿坑道兵力和物资补充，及时组织指导坑道内外的部队密切配合，采取各种有效手段，积极打击敌人。

10月22日，转入坑道继续坚守597.9高地的某团八连，在苦战中只剩下15个人，而且粮弹将尽。秦基伟得知这一危急情况后，当即决定把身边的军部警卫连拉上去，对敌人实施反击，并同八连的勇士们一起守住了坑道。战斗到24日，身居火线的第45师师长崔建功，打电话向秦基伟军长报告了前沿坑道部队的严重减员和处境恶劣的情况。秦基伟听后深感已坚持了五昼夜的坑道战，越来越激烈和残酷，困难越来越大，坚守的部队越来越难以忍受了。但是他的决心绝不动摇。他深情地向这位英勇善战的师长说："老崔呀，你们的困难我知道。但守住坑道，拖住敌人，是全局胜利的关键。现在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胜利！"

崔建功用沙哑而坚定的声音回答说："请军长放心，就是我们师打到只剩下100人，我当连长，也保证坚守到底！"

连夜，军党委发出紧急号召："营无闲人，厩无闲马"，全军总动员，全力以赴，支援上甘岭。从军部和各级机关再抽调出1200名干部和战士，奔赴上甘岭，补充到45师的13个战斗连队，增强了坚守坑道的作战力量。同时大力加强后勤支援，由机关和后勤人员立即组成一支8500多人的徒步运输队，昼夜不停地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冲过一道道炮火封锁线，不惜流血牺牲，直接将包括饮水在内的各种急需物资送进上甘岭的坑道里，再把伤员和烈士遗体抢运下来。当秦基伟听说坚守前沿坑道的某团七连8个干部和战士，互相谦让轮流两遍才共同吃完一个苹果的动人事迹时，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当即决定把祖国和朝鲜人民慰问的苹果，全部送到前沿部队去，送进坑道去……

"支援坑道，解放坑道，争取决战全胜"已成为十五军全军的口号。由张显扬师长指挥的第29师，积极协同上甘岭方向作战，从地面上狠狠打击敌人。由向守志师长指挥的第44师，一面顽强地坚守上甘岭侧翼的西方山、斗流峰阵地，一面频频开展小部队出击，咬住了美军一个师。我参战炮兵部队也主动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宁愿自己作出牺牲，也要保护坑道战友的安全，并以准确的炮火，支援坑道部队向敌人进行反击。就这样，第十五军全军形成了坑道内外紧密团结、英勇奋战的整体，把美军范佛里特的主力，死死地拖在上甘岭两个山头上，如陷入泥潭一般。

第十五军打得最艰难的时候，也是王近山最为不安的时候。他时而亲自打电话询问前方的战况，时而在洞中不停地踱步，思考该不该用预备队。凭他的经验证明，凡是我困难时敌也同样困难，在最困难时使出杀手锏——预

备队，往往能置敌于死地。他觉得现在该派出预备队，但他还是想听听秦基伟的意见。

这天，王近山在西霞洞第 3 兵团指挥部等待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的到来，他也在等待上甘岭阵地到底能不能顶得住的回答。十五军已经进行了 7 个昼夜的鏖战，那是怎样的七天七夜啊！战斗是残酷和惨烈的。一出一进，一攻一守，十五军每天至少要打掉几个连队。军预备队都用上去了。这个秦基伟还吃得消吗？傍晚时刻，秦基伟赶到了 3 兵团驻地。王近山一见秦基伟，他不觉愣了一下，啊，好个秦基伟，几天不见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仿佛老了十岁，胡子拉碴的，憔悴得让人心疼。哎，也难怪，十五军的一个师快打光了，作为军长的他，能不消瘦吗？

王近山握住了秦基伟的手，又拍拍秦基伟的肩，说："老伙计，你瘦多了。"

"你不也一样吗？"

"给我一个实话，能不能顶得住？"

听到询问，秦基伟百感交集。他作为十五军的最高首长，这些天来根本顾不上思考这个问题，他一门心思扑在怎样守住阵地上。他深深地懂得：战争，对于战士来说枪对枪刀对刀，而对于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来说，则是智谋和意志的较量。

"我问你能不能顶住？"王近山用期待的目光凝视着秦基伟说，"要是不行，你就下来，我叫十二军顶上去。"

一听到十二军，秦基伟好像被什么尖利的东西刺了一下，他浑身的血管膨胀了，禁不住吼叫起来："我不下，不下！我要死就死在上甘岭！我死也不下！"

秦基伟的冲动是有原因的。他的个性决定了他从来不服输。他很清楚，十二军是王近山带出来的部队。解放战争时，十二军的前身 6 纵是中野的拳头，够风光的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曾发表《向六纵学习》的社论。而秦基伟的十五军，虽然年轻一点，但从来不是孬种。秦基伟视荣誉为生命，所以一下子在王近山面前炸开了，倔强地说："别看十二军是你的老部队，他们打仗呱呱叫，我十五军也不是吃素的！"

"好，就等你这句话！"王近山猛地一拍桌子，"一言为定，十五军不下来。不过，十二军也要上，我把十二军交给你指挥，怎么样？我再给你配些重武器，还有一个喀秋莎火箭炮团！"

"王司令……"秦基伟一时哽咽了。还能说什么呢？他马上立下军令状：



王近山(右)与战友们在朝鲜战场前线作战室

“保不住上甘岭，我提头来见！”

十五军经过 10 昼夜艰苦卓绝的坑道保卫战，终于赢得了时间，做好了总反击的准备。志愿军总部向上甘岭前线增调了近百门大炮和充足的粮、弹物资，3 兵团派出预备队，由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率领两个步兵师配属十五军，加强了总反击的力量。

10 月 30 日，在秦基伟直接指挥下，总反击开始了。

我强大炮群把成吨的钢铁炮弹砸向敌人，步兵指战员势如猛虎，首先对占领 597.9 高地之敌实施反击。敌人凭险固守，我军前仆后继，英勇拼杀，连续 7 昼夜，同敌人展开反复的阵地争夺战，并击退在飞机、大炮和坦克掩护下的美军 4 个多团兵力的多次反扑，毙伤敌 6000 余名，至 11 月 4 日全部夺回了这个高地。

当天，中朝联合司令部致电秦基伟嘉奖十五军：“你军与敌血战二十余日，敌军集中了优势的炮兵、飞机、坦克及大量步兵集团冲锋，不仅不能夺取我阵地，而且丧失了 15000 余人的有生力量及大量炮弹，你们则高度地发挥了坚忍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斗越打越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率逐渐减少，特别是 2 日毙伤敌 1500 余人，我仅伤亡 190 余人，这样打下去，必能致敌于死命。”

11 月 7 日，志愿军首长又转来了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内称：此次五圣

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的胜利，望你们鼓励部队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而奋斗。

这使秦基伟和上甘岭前线的指战员们受到极大鼓舞，决心用更大的胜利回报毛主席和祖国人民。

11 月 11 日，秦基伟乘胜把反击的铁拳又砸向了 537.7 高地。他仅用三个精锐的步兵连，在炮火掩护下，出敌不意，突然袭击，经过两小时拼搏，就全歼守敌一个营，恢复了该高地的全部表面阵地。虽然敌人不甘心失败，从第二天起每天都动用几十架次飞机进行轮番轰炸，并投入 6 个营的兵力不断进行反扑，但我军指战员越战越勇，经过 16 昼夜奋战，共击退敌人 130 多次进攻，又歼敌 1800 余人，终于全部收复和巩固了阵地，把敌人逐出了上甘岭。

上甘岭战役，自 10 月 14 日开始至 11 月 25 日结束，历时 43 天，我军共歼敌 25500 余人，击落击伤敌机 274 架，击毁坦克 14 辆，缴获大口径火炮 61 门。我军阵地屹立未动，创造了以坑道工事为主体的防御作战的光辉范例，被誉为“突不破的防线”。《人民日报》1952 年 12 月 18 日发表社论指出：上甘岭战役的辉煌胜利，“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无疑是一个巨大贡献”。

上甘岭战役使敌人的“金化攻势”遭到惨败，伤亡损失严重，但不甘心，不愿恢复谈判。“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知道再从正面进攻不会有效果，认为“要取得胜利，结束朝战”，只有实施两栖登陆。对此，已在我军预料之中并有准备，先已成立了东、西海岸指挥部，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加强了物资储备，加紧进行反两栖登陆军事训练，同时还加强了正面防御力量。可以说我军在东西海岸和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线，兵力充足，严阵以待，随时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敌人见无机可乘，又发出恢复谈判的建议。很明显敌人是玩弄假谈真打的把戏，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敌我双方的情况，为志愿军的行动定下明确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军队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据此，志司决定，以积极的行动配合停战谈判，采取“稳扎稳打”，“由小到大”进行战役性反击作战。于是从 1953 年 5 月 13 日开始至 7 月 27 日结束，先后发起三次反击战役，在宽 200 公里正面战场上，由小到大选择 110 个目标，进行了 139 次进攻，共歼敌 123000 多人，收复土地 238 平方公里，给敌人以严重打击，有力地配合谈判，并在有利于我军的条件下实现了

停战。7 月 27 日，停战协定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至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历时两年零九个月，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共歼敌 72 万多人，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从朝鲜撤军（在此之前有的部队已经回国），到 1958 年 10 月全部撤回。当胜利之师回国时，红安籍将领也相继载誉归来。

最先回国的是志愿军直属第三十九军政委徐斌洲。他是首批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1951 年奉命回国，任南京军事学院党委常委、干部部长，协助院长刘伯承管理学院人事工作。

接着陆续回国的有：

第 9 兵团第二十军第 59 师师长戴克林，1950 年 10 月入朝，参加了第二、第五次战役和金城阻击战，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1951 年 12 月回国，任 27 军副军长。

第 9 兵团第二十六军军长张仁初，1950 年 11 月入朝，参加了第二至第五次战役、1951 年夏、秋季防御战役和 1952 年春季巩固阵地的斗争，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2 年 5 月回国，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公安军第 18 师师长兼政委张天恕，1950 年 11 月入朝，在两千多公里运输线上日夜担任防空哨任务，荣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3 年春回国，任热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第 9 兵团第二十七军第 81 师师长罗映臣，1950 年 11 月入朝，参加了第二至第五次战役，1952 年 10 月回国，任安徽省军区参谋长。

志愿军直属第三十九军第 117 师师长张竭诚，1950 年 10 月入朝，参加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因横城反击战有功，升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后随部队调防西海岸至停战，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三枚，回国后任代理军长。

志愿军直属第五十军第 148 师师长赵鹤亭，1950 年 10 月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1954 年 4 月回国任副军长。

第 3 兵团第六十军第 181 师师长王诚汉，1951 年 3 月入朝，参加了第四、第五次战役。在第五次战役中有功，升任副军长，以后又参加了 1951 年夏、秋季防御战役、1952 年秋季反击作战和 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1953 年 9 月回国，任第六十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

第 19 兵团第六十四军第 191 师师长谢正荣，1951 年 4 月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马良山反击战，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1952 年 11 月升任副军长兼参谋长，1953 年回国后继续担任副军长兼参谋长。

志愿军直属第四十二军后勤部政委聂洪国，1950 年 10 月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荣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2 年 10 月回国后调任海军工程部副政委。

第 3 兵团第十二军后勤部副部长罗绍义，1951 年 3 月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金城防御战，1953 年停战后回国任江苏省军区后勤部长。

第 3 兵团第十五军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熊志生，1951 年 3 月入朝，1954 年回国任炮兵学校政委。

志愿军铁道新建指挥部副司令员兼铁道兵第 6 师师长闵学胜，1952 年秋入朝，参加了铁道、桥梁的建设抢修和反“绞杀战”，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1955 年 5 月率最后两个铁道兵师离朝，回国后任铁道兵副司令员。

志愿军铁道兵第一师干部部副部长杜青平，1951 年 4 月入朝，参加了铁路抢修和反“绞杀战”，荣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三级国旗勋章，朝鲜停战后回国任铁道兵第 4 师副师长。

志愿军工兵团政委沈先夫，1950 年 10 月入朝，是最先入朝两工兵团之一，参加了公路扩建抢修和反“绞杀战”，停战后回国，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公交局副局长。

志愿军铁道高炮司令员、中朝防空指挥所主任吴昌炽，1951 年 4 月入朝，参加了防空和反“绞杀战”，停战后回国，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志愿军空军第 6 师政委张志勇，1951 年入朝，与师长一起指挥该师进行空战，击落击伤敌机多架，荣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3 年 1 月回国，任空军航空工程部副政委。

志愿军空军通信团政委张俊，1952 年入朝，带领通信团出色完成通讯任务，荣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停战后回国，任空军工程兵总队政委。

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简称志后）是一支多兵种的后勤部队，配属的部队不算在内，仅直属部队有 14 万多人。在这支队伍中红安籍将领很多。他们入朝早，回国晚，陆续归来的有：

志后司令部政委周纯全，1950 年 12 月入朝，作为后勤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带领广大官兵克服各种困难，保障物资供给，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役和反“绞杀战”的胜利，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2 年因病情加重

回国治疗，后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

志后第一副司令员吴先恩，1950 年 10 月入朝，在保障物资供应的工作中做出了贡献，荣获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停战后回国，任北京军区后勤部长。

志后第三分部部长毛普安，1950 年 10 月入朝，荣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停战后回国，任后勤学院院务部副部长。

志后第三分部第一副部长兼参谋长吴基荣，1950 年 10 月入朝，荣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7 年回国，任湖南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志后第四分部部长何德庆，1951 年入朝，荣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4 年 12 月回国，任昆明军区后勤部长。

志后第一分部医院管理处处长李其华，1950 年 10 月入朝，荣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停战后回国，任军事科学院第五研究所副所长。

志愿军基地医院院长兼政委张克彬，1950 年 10 月入朝，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回国后任副师长。

上述这些指挥员，他们大都随部队一起撤回国内，但有几位高级将领是单独回国的。

第 3 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王近山，1951 年 3 月奉命率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军入朝作战，先后参加第五次战役、1951 年的夏季秋季防御战役、1952 年反击战役和上甘岭战役，荣获朝鲜一级国旗勋章。1953 年 4 月奉调回国，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第 9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建安，1952 年 8 月率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军入朝，轮换第二十、第二十七军回国。当时朝鲜停战谈判陷入僵局，美伪军妄图通过军事进攻取得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王建安指挥二十三、二十四军在中线防御地区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1953 年 5 月他向志司建议：发起大规模战役性的多点进攻，狠狠地打击敌人，促其回到谈判桌上来。志司将他的建议转报中央军委获得了批准。5 月中、下旬，我军接连向敌人发起了夏季攻势，仅 9 兵团两个军就歼敌近 6000 人。接着 9 兵团投入金城反击战役，又歼敌逾万人。收复 24 平方公里土地。战后荣获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因指挥战争劳累过度，王建安高血压病十分严重，同年秋彭德怀特派一名医生护送回国治疗。经过医治和休养，1956 年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1950 年 10 月入朝，身临前线直接指挥第一至第四次战役，连战皆捷，扭转了朝鲜战局，而后回到志司协助彭德怀指挥作

战并负责西海岸的防御任务。1952 年 4 月彭德怀回国休养，志愿军领导多次变动。8 月，韩先楚调任第 19 兵团司令员，指挥部队在西线进行秋季反击作战。这次战役打了 44 天，韩先楚带病指挥终于病倒，1953 年初不得不回国治疗。病情稍有好转，要求重返战场，走到丹东旧病复发，又返北京继续治疗。4 月，调任中原军区参谋长。在朝期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两次向他授勋，获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第 3 兵团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后不久奉召回国，先是应邀在东北各地作报告。第一个请他去的是陈赓，他比秦早回半年，负责领导成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是院长。他请秦基伟向全院师生员工（包括苏联专家）报告了上甘岭战役的作战情况，获得大家的热烈欢迎。接着东北军区、东北行政委员会等军队、机关、学校、工厂也请他去作报告。最后还去战犯管理所，跟末代皇帝溥仪和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等讲述上甘岭战役的作战情况和一些英雄模范事迹。当讲到我军的表面阵地被美伪军攻占后，就转入坑道作战，在缺粮、缺水、缺氧的情况下，指战员们忍饥喝尿、互相鼓励，坚持战斗，即使只剩下一个人也不放弃阵地时，这些当年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人物，也深为感动，有些人不禁流下了眼泪。秦基伟最后说："当初，也许你们中有人认为我们志愿军打不过装备精良的美军，美国军队可能会打进东北来；有人还可能迷信美国的武力，认为美国是不可战胜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事实已经证明了，美国军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中国人，也包括你们，应该重新认识自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完全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的！"话音刚落，台下全体起立，一片掌声。

秦基伟在东北的行程结束回到北京。一天，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他去见毛主席。

这是第一次受毛主席单独接见。主席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你秦基伟同志！"还递给一支烟。他不好意思在主席面前抽烟，便推说不会。落座后，主席询问了志愿军的情况，从干部战士的情绪到吃穿问题都问到。谈到对敌斗争，主席问："美国佬好对付吗？"

秦基伟回答说："刚入朝时，没摸到他们的活动规律，觉得有点不好对付。后来交了几次手，就感到美国佬没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美国佬有三个优势，也有三个劣势。三个优势是：机动快、有制空权、后勤保障及时。三个劣势是：怕夜战、怕近战、怕死。后面这三条注定他们要败在我们手里。"

主席笑着说："张牙舞爪要吃人的大老虎被志愿军战胜了，可见它确实是个纸老虎。"

秦基伟说："通过和美帝作战，更证实了毛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英明正确的。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就是靠贯彻毛主席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去扭转战局并夺取胜利的。"



朝鲜国家领导人金日成(右)为张天云佩戴勋章

主席说："你们打的也是铁老虎、钢老虎。他们凭钢铁多，凭武器装备优良，但貌似强大，里面空虚。我们是凭指挥员的智慧，凭战士的勇敢，凭正义去战胜他们。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毛主席从政治、军事和哲学多方面高度概括了上甘岭战役胜利的意义，使秦基伟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接见后，秦基伟带着无限喜悦和光荣的心情奔赴祖国边疆，就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红安籍指挥员韩先楚率部最先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巧合的是，在这场战争取得胜利后，最后率部回国的指挥员也是红安人张天云。他是最后走上抗美援朝战场的，也是最后班师回国的志愿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之一。

1950 年 12 月底，张天云奉命离开广西，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这是他继 14 年前入红军大学之后又一次踏进学校的大门。他被分到第三班，兼任班党支部书记。在班上，张天云的文化基础最差，但刻苦钻研的劲头最足。经过一年零六个月的学习，他较系统地掌握了联合兵种协同作战的理论知识和组织指挥要领，毕业考试获得全班第一名，受到刘伯承院长的表扬。

1952 年 7 月，张天云调任第四十七军军长。这时四十七军已入朝参战一年多。张天云稍事准备后，于同年 9 月到达朝鲜战场，指挥部队接替三十八军防务，参加秋季战术性反击。

1954 年 9 月，第四十七军圆满完成在朝鲜的作战任务后回国。张天云因工作需要留在朝鲜，后任志愿军第 19 兵团副司令员，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8 年 10 月 26 日，率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当部队跨过鸭绿江，踏上祖国的土地后，张天云代表最后班师回国的全体指战员，向前来欢迎的广大干部群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亲爱的祖国的亲人们，离开你们七年多，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的身边来了。我们向久别的祖国亲人们问好！向敬爱的毛主席问好！

亲人们，当我们的火车驰过鸭绿江桥踏上抚育和生长了我们的国土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无限兴奋和快乐，特别是祖国人民对自己胜利归来的儿女举行这样盛大热烈的欢迎，使我们万分感动。但是，我们也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尽了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应尽的义务。当祖国受到威胁，当邻邦遭到危难的时候，我们响应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跨过鸭绿江，同英雄的朝鲜人民和人民军一起，打败了侵略者，实现了朝鲜停战。停战以后，又共同维护了朝鲜的和平。志愿军所做的这一切，都不过是作为一个祖国的儿女所应该做的。而且，也都是祖国人民全力支援的结果，是我们的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的结果。志愿军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中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和荣誉，都应该归于伟大的祖国和人民，归于党和毛主席！……

我们在撤离朝鲜的前夕，向各地朝鲜人民告别的时候，到处都出现了中朝友谊的动人场面。在无数告别、送行的集会上，都是会散了又集合起来，送出去了又再送回来，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手握了一次又一次，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在分别的时候，是这样依依惜别，难舍难离，这不是寻常的友谊，这是在反抗外国侵略的并肩作战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劳动中，用鲜血、热汗和一颗颗炽热的心凝结起来的战斗的友谊。这种友谊是什么力量都拆不开的。它将像鸭绿江的流水、长白山的高峰一样万古长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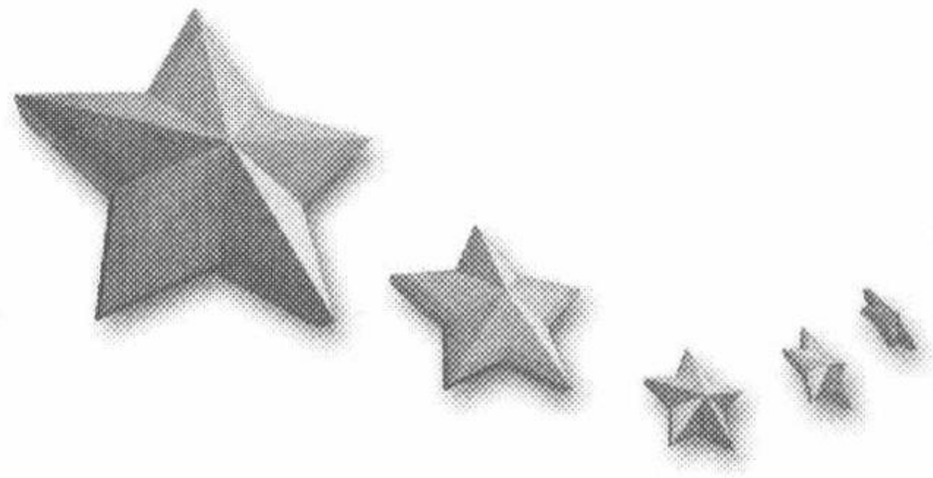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祖国，新的岗位正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全体官兵都有决心——祖国需要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祖国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我们一定保持祖国人民给予我们的“最可爱的人”的荣誉，在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继续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他的讲话代表了全体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将士的心声。

从朝鲜回国后，张天云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们凯旋归国了，但也有成千上万的烈士留在朝鲜国土上。红安人民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像当年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样，踊跃参军，全县有 6424 人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其中有 97 名干部战士在朝鲜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异国他乡埋烈骨，应当永远悼英灵。



第十六章　295 位将领遍中华

红安在同一历史时期涌现了 2 位国家主席，62 名授衔将军，90 名无衔之将，53 名转业将领，88 名牺牲将领，共计 295 名将领。乃世间少有的历史奇迹！

两位主席 开国元勋

两位国家主席，一文一武。董必武作为我党中央代表，长驻国民党政府，可谓身入“龙潭虎穴”，站在国共斗争的最前线，为争取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合法政治权利而奋斗。他不带一枪一兵，却胜过十万人、枪，是政治战线上杰出的领军人物。李先念从工人到军事家，功勋卓著，1955 年拟授大将军衔后因完全从政未授，是没有授军衔的大将军。

董必武（1886.3.5—1975.4.2），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人。湖北红安县城关镇民主街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4 年至 1917 年留学日本，学法律。回国后与张国恩合办律师事务所。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影响下，通过创办学校，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 年秋与陈潭秋等创建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 年 7 月作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同毛泽东等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会后回武汉负责建立和发展湖北共产党组织，任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湖北省委委员。多次回家乡红安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团组织。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作为跨党党员，负责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被选为常务委员，负责省党部工作。1926 年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代表国民党中央驻鄂指导湖北工作。同年秋，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长，主持省党部和省政府工作。在此期间，积极发展共产党基层组织，大力开展工人、农民运动，惩办反动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分子，使湖北的工农革命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在他的指导下，红安的工农革命运动更走在全省的前面。1927

年“四一二”和“七一五”事变后，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潜去上海，取道日本转赴苏联。1928 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32 年 3 月回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1934 年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同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抗大四大队政委，代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1937 年 9 月到武汉参与筹建中共湖北省委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创办《新华日报》，筹办军政干部训练班。12 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主管民运工作。1938 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武汉沦陷后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1945 年 3 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美，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同时，与章汉夫编译《中国敌后根据地实录》(英文)，帮助华侨和外国朋友了解中国人民在敌后的抗日斗争情况。同年 6 月被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代表参加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11 月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回延安，董必武领导中共代表团继续留在南京战斗，直到 1947 年 3 月撤回延安。之后任中央工委常委，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先后任华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财经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1948 年 9 月被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1949 年 8 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在全国政协一届会议上作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拟的经过和基本内容》的报告，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1954 年 9 月被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2 月被选为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9 年 4 月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2 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1975 年 1 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 年、1969 年和 1973 年被分别选为中共八、九、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在十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 年 4 月 2 日 在北京病逝，终年 90 岁。主要著作有《董必武选集》《董必武诗选》。

李先念（1909.6.23—1992.6.21），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湖北红安县高桥镇李家大屋人。1921 年在汉口学木工。1926 年 10 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武昌城，受其革命影响，回黄安县高桥区参加农民运动，任乡农民协会常务委员。1927 年 11 月，领导农民自卫军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参加工农革命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 31 师 5 大队副班长。后被派回高桥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曾任中共黄安县高桥区区委书记，高桥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陂安南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 年 10 月，带领陂安南县 300 余名青年参加红军。任红四军第 11 师第 33 团政治委员。参加西征转战，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反三路围攻。1933 年 7 月，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和反六路围攻。1934 年 8 月，在反六路围攻的关键时刻，支持徐向前总指挥关于大纵深迂回的正确决断，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率红三十军日夜兼程，兜抄逃敌，取得了黄猫垭歼灭战的重大胜利。1935 年 3 月，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6 月，奉命带领红四方面军先遣部队，翻越红桥山，攻克懋功（今小金）、达维，与中央红军首先会师。在懋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和军委领导的接见。8 月，参与指挥包座战斗，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9 月，南下转战川康边。1936 年 6 月底，在甘孜迎接红 2、6 军团后，率领先遣军第二次北上。10 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11 月，任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红三十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了一条山、八坝、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马草滩等战斗。1937 年 3 月，在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临危受命，任红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军事指挥，率领游击支队继续西进。5 月，经星星峡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领导骨干。同年底，由新疆回到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军事部长、军事委员会副主任，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 5 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率部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豫鄂边、湘鄂赣抗日根据地。1945 年 6 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了中原突围战役，参加了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与反攻中原的斗争，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

决斗争。1976 年 10 月，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1992 年 6 月 21 日在北京逝世。著有《李先念文选》。

授衔将军　全国第一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中的将军籍贯记载，1955 年至 1965 年，我军第一次授衔的将军中，属于湖北红安籍的有 62 名，位居全国各县第一。其中有上将 8 名（含后来授上将军衔 2 人），中将 11 名，少将 43 名。

王建安（1907.11.8—1980.7.25），军事家、功勋卓著的名将。红安县永佳河镇沙河人，1927 年入党，同年参加黄麻起义。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政委、军政委、军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志愿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 年授上将军衔。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顾问、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十二届中纪委常委。

王诚汉（1917.12.23—2009），高级将领。红安县二程镇烟炉山村王家大垮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3 年入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成都军区司令员。1955 年授少将军衔，1988 年授上将军衔。后任军事科学院政委。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

陈锡联（1915.1.4—1999.6.10），革命家、军事家、功勋卓著的名将。红安县高桥镇陡山彭家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0 年入党。历任班长、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副师长、师政委、师长、旅长、分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长、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东北局书记处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55 年授上将军衔。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周纯全（1905.10.8—1985.7.28），军政后全能著名高级将领。红安县八里湾镇中和司雷家田人，1926 年入党，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历任特委委员兼县委书记、边区工会委员长、省保卫局长、师政委、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川陕省委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抗大分校校长、四野后勤部长、志愿军后勤部政委、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1935 年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曾增补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55 年授上将军衔。一、二、三届国防委员，全国人大一、二、三届常委。

郭天民（1905.5.7—1970.5.26），军事教育家、功勋卓著的名将。红安县杏花乡郭受九村人，1926 年入黄埔军校，1927 年入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历任排长、连长、大队长、支队长、师参谋长、军区参谋长、军团参谋长兼师长、分区司令员、军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兵团副司令员、云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院校部部长。1955 年授上将军衔。第二、三届国防委员。

秦基伟（1914.11.16—1997.2.2），革命家、军事家、功勋卓著的名将。红安县七里坪镇秦罗庄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 年参加红军，1930 年入党。历任排长、连长、县军事指挥长、团长、师长、支队司令员、分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军长、志愿军军长、大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1955 年授中将军衔，1988 年授上将军衔。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第三届国防委员，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韩先楚（1913.1.30—1986.10.3），革命家、军事家、功勋卓著的名将。出生在红安县二程镇田店村田李家塝。1930 年由团转为党员，参加游击队，1933 年编入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旅长、分区司令员、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兵团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志愿军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建前线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1955 年授上将军衔。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中央军委常委、顾问，中共八、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谢富治（1909.9.26—1972.3.26），战争年代是功勋卓著的名将，新中国成立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开除党籍。红安县城关镇谢家垱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1 年入党。历任连支部书记、宣传队长、团、师、军专职党务书记，师、军政治部主任、旅政委兼分区政委、军区副司令员、纵队政委、司令员、兵团政委、省委书记、公安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55 年授上将军衔，第三届国防委员，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王近山（1915.10.11—1978.5.10），著名战将。红安县高桥镇许家田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入党。历任班、排、连、营、团长、副师长、师长、旅长、分区司令员、纵队副司令员、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政委、志愿军兵团副司令、大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顾问。1955 年授中将军衔。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刘　飞（1905.12.31—1984.10.24），著名战将。红安县八里湾镇罗家田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 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历任排、连长，营、团政委，师、军政治部主任，旅长、分区司令员、师长、纵队副司令员、军长、省军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1955 年授中将军衔。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昌毅（1914.11.2—1999.11.1），著名战将。红安县七里坪镇马鞍石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0 年入党。历任班、排、连、营、团长，纵队参谋长、分区司令员、纵队副司令员、海军基地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 年授中将军衔。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李天焕（1912.10.24—1986.5.19），著名政工将领。红安县永佳河镇大山岗人，1929 年入党，1930 年参加红军。历任区委书记、营政委，团、师、军政治部主任，分区政委、军区副政委、兵团副政委、政委、公安部副部长兼公安部队第二政委、第二炮兵政委。1955 年授中将军衔。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天云（1913.12.22—1980.7.8），著名战将。红安县觅儿寺镇周家田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1 年入党。历任排、连、营、团长，分区副司令员、旅长、师长、纵队副司令员、军长、兵团副司令员、志愿军兵团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后勤学院院长。1955 年授中将军衔。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张仁初（1909.12.20—1969.11.4），著名战将。红安县高桥镇张家塝人。1927 年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1932 年入党。历任排、连、营、团长、旅长、军区参谋长、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 年授中将军衔。

吴先恩（1907—1987.11.1），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 年入党，同年参加红军。历任营政委、团经理处长、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军区后勤部副司令员、湖北省人民政府财委会副主任兼财政厅长、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顾问。

1955 年授中将军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胡奇才（1914.9.28—1997.7.3），战将。红安县高桥镇李家田人。1929 年参加革命，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入党。历任排、连长，营、团、师政委，支队副司令员兼分区司令员，副旅长、师长，纵队副司令员、副军长，工程兵副司令员、顾问组长。1955 年授中将军衔。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徐深吉（1910.1.31—2000.8.8），红安县七里坪镇徐家河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 年参加红军，1931 年入党。历任排、连、营、团、师长，分区司令员、抗大分校校长、军区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 年授中将军衔。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一、十二届中纪委委员。

徐斌洲（1912.10.1—1996.12.27），红安县高桥镇徐家畈人。1929 年入党，1930 年参加红军。历任区委书记、团县委书记、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地委书记、师政委、军政委、志愿军军政委、军事学院副政委，一机部副部长、顾问。1955 年授中将军衔。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詹才芳（1907.9.12—1992.12.2），战将。红安县高桥镇黑石嘴人，1927 年由团转党，同年参加黄麻起义。历任排、连、营长，团、师、军政委，分区、军区副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军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顾问。1955 年授中将军衔。二、三届国防委员，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顾委委员。

马忠全（1914.4—1995.7.30），红安县城关镇大马贤人。1930 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海军副司令员。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甘思和（1915.12.7—1988.10.26），红安县七里坪镇王家塝人。1930 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北京军区干部部长。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卢燕秋（1914.5.13—1964.10.28），红安县上新集镇大庙村戴家河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4 年入党。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刘福胜（1914—1994.12.20），红安县华家河镇方刘家冲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江　波（1914.5.23—1987.10.10），红安县高桥镇西边村人。1928 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党。1961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陕西省军区副政委。

江腾蛟（1919.11.2—2009.5.8），红安县高桥镇江家塆人。1930 年参加红

军，1937 年由团转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被开除党籍并判刑。

李世焱（1909.9.23—1990.2.28），红安县上新集镇李家冲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 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

李定灼（1914.4.27—1987.9.5），红安县高桥镇薛家田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2 年由团转党。1961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

吴振挺（1916.6.27—1994.5.28），原名吴华昌， 红安县上新集镇吴家塝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1 年由团转党。1961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军事工程学院工程系副主任，工程兵工程部政委。

何德庆（1916.12—1993.7.7），红安县上新集镇余家岗村小河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由团转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军政大学副政委兼校务部政委，后勤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长。

邹国厚（1908.3—1999.9.18），红安县七里坪镇邹家岗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后编入红军，1928 年由团转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闵学胜（1914.1.29—2003.3.12），红安县七里坪镇闵家河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1 年由团转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军区顾问，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况玉纯（1913.10—1989.4.18），红安县华家河镇况家河人。1930 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总后勤部营房部部长、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政委。

汪运祖（1915.6.26—2015），红安县高桥镇汪家河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党。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顾问。

张天恕（1913—1985.2.12），红安县七里坪镇张李家人。1929 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

张志勇（1916.1.28—　），红安县华家河镇张家寨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4 年由团转党。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国防科委基地司令员、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

张竭诚（1917.7.10—2001.2.24），红安县七里坪镇张石河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军

区顾问。

陈炎清（1908.7.11—1996.11.2），红安县二程镇铁匠岗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由团转党。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陈美藻（1914.2.18—1989.1.9），红安县七里坪镇鸭公陈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4 年由团转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济南军区副政委、军区顾问，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应怀（1914.12.19—2010.5.17），红安县高桥镇独山寨村罗家垮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 年参加红军，1932 年由团转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北京军区副政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厚福（1909—1975.5.11），红安县华家河镇老屋罗家人。1929 年参加赤卫队，1930 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1961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金世柏（1908.1—2000.1.30），红安县华家河镇金家垮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2 年由团转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成都军区后勤部政委，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周世忠（1918.7.6—1992.10.9），红安县二程镇周家院子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5 年由团转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郑国仲（1913.7.9—1992.1.11），红安县七里坪镇郑家堂人。1929 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海军副司令员，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胡正平（1915.2.6—1994.8.26），红安县高桥镇汪家畈村张家垮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2 年入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宁夏回族自治区军区副司令员。

赵鹤亭（1914.9—1990.2.5），红安县七里坪镇东岳庙村老屋垮人。1929 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军区顾问。

贺　健（1911.10.6—2009），原名喻安良，红安县华家河镇喻家畈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0 年由团转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顾问，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秦光远（1913.10.31—2002.9.9），红安县七里坪镇观音阁村向家洼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党。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武汉军区

后勤部副政委、顾问。

耿锡祥（1909.10.8—1990.8.29），红安县杏花乡凉亭岗村西垮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 年入党。1961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四机部政治部主任、四机部顾问，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袁克服（1907.12.27—1982.11.5），红安县七里坪镇大余家村袁家洼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 年由团转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陕西省军区政委，兰州军区顾问，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徐绍华（1910—1978.6.29），红安县城关镇铁山村堰塘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3 年入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

殷国洪（1911.12.28—2009），红安县七里坪镇莲花背村殷家洼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34 年由团转党。1961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政委，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涂锡道（1916.5—1989.4.23），红安县华家河镇涂家垮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4 年入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总后勤部军械部副部长。

韩卫民（1903.10—1981.10.7），红安县二程镇田店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 年入党，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程启文（1915.4.14—1994.4.11），红安县七里坪镇傅家坳村谢家嘴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2 年由团转党。1961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顾问。

程悦长（1911.12.8—1961.5.1），红安县城关镇上程家垮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2 年由团转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程儒珍（1900—1963.4.26），红安县七里坪镇熊家嘴人。1927 年入党，同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湖北省军区后勤部长。

谢正荣（1918.9—1977.12.4），红安县太平桥镇谢家大垮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5 年由团转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位至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中共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

詹少联（1917.2—2003.10.15），红安县二程镇大堰村徐德进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5 年由团转党。1961 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海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海军后勤部顾问。

熊应堂（1911.9.9—1996.2.10），红安县华家河镇曾家村熊家垮人。1928年参加红军，1933年由团转党。1955年授少将军衔。位至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

黎锡福（1910.2.16—1976.5.29），红安县华家河镇山台村黎家坳人。1928年入党，同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位至山东省军区司令员。

戴克林（1913.5.29—1990.1.18），红安县七里坪镇长冲村戴家塘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由团转党。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戴克明（1915.6.20—1986.1.21），红安县七里坪镇长冲村戴家塘人。1929年参加赤卫队，同年入党。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位至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无衔将领　人数众多

从1966年取消军衔制到1988年恢复军衔的20余年中，解放军中有红安籍副军职以上干部（含享受同等待遇）90名，他们是无衔之将。

郑位三（1902.10.21—1975.7.27），无产阶级革命家、鄂豫皖红军与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高级将领。七里坪镇马鞍山人。1925年入党。1927年领导“九月暴动”拉开“黄麻起义”序幕。1928年参加创建根据地。历任县委书记、鄂东北道委书记、游击总司令、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2、第5师政委、中原局代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中共第七、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文献（1906—1992），七里坪镇典明万家垮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入党。先后任武汉军区法院审判长、湖北省军区法院院长，享受军职待遇。

王佑林（1914.11.1—1988.3.25），永佳河镇桃花望家冲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副政委。

王云清（1915.10—　），曾用名王继福。上新集镇高山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在新疆航空队学习。后任军委空军后勤航空器材部部长。

王成忠（1907—1996），二程镇桐柏集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副书记。

王积功（1902—1975），城关镇龚家冲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参加红军。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王尚德（1906—1997.1.8），七里坪镇八一村下畈人。中共党员。1927 年参加革命。后任安徽巢湖军分区司令员，享受军职待遇。

王兴友（1915—1980），高桥镇王才塝人。1932 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云南省文山军分区副政委，享受副军职待遇。

王辉友（1910—2000），城关镇王家畈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为师级干部，享受副军职待遇。

毛普安（1916.1—1996.12.16），太平桥镇毛岗岭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解放军后勤学院院务部长。

阮观华（1914—1979），华家河镇龙桥左家田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党。后任山西晋中军分区副司令员，享受副军职待遇。

江汉东（1914.1—1995.7.12）曾用名江传继。七里坪镇江朝二人。1927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参加红军。后任四野 12 兵团供给部政委、南海舰队后勤部副部长。

刘必正（1902—　），太平桥镇刘发塝人。1930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四川省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享受副军职待遇。

李质林（1910—　），华家河镇台南李家河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

李天德（1916.4.15—1996.5.20），永佳河镇叶河八叶家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4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李天忠（1913.6—　），永佳河镇叶河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7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国防科委第 21 基地后勤部长。

李　一（1912.11—　），原名张天华。城关镇丰岗人。1929 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炮兵工程学院物资保障部长，享受军职待遇。

李　奎（1916—　），永佳河镇李明二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空军第三研究所所长。

李其华（1918.6—　），高桥镇叶家田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6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总医院院长。

李振华（1915—1972），七里坪镇大屋塝人。中共党员，1928 年参加革命。后任浙江省金华军分区副司令员。

李少清（1917—2000），华家河镇台南独屋塝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6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省军区顾问。

李正清（1916—1996），永佳河镇桃花黑洼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浙江省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

杜耀青（1912—　），七里坪镇天台山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军区顾问。

杜青平（1916.8—2002），华家河镇西塝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宜昌军分区司令员，享受副军职待遇。

来　真（1913.9—　），七里坪镇来家河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后勤部长、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卫生部长。

来显吉（1910—1954），七里坪镇来家河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山东省临沂军分区副司令员。

吴怀才（1916—1998），二程镇桐柏大刘家塝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军区顾问。

吴大胜（1914.12—1994.8.6），七里坪镇天台山豆腐铺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江苏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

吴大奎（1917—），七里坪镇天台山豆腐铺人。中共党员。1928年参加革命。后任安徽省军区正师职，离休后享受副军职待遇。

吴庆海（1904—1983），高桥镇吴家嘴人。1928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辽宁省铁岭军分区副政委，享受军职待遇。

吴业家（1918—　），上新集镇吴子墩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6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成都军区后勤部直属供应部部长、后勤部顾问。

吴厚祥（1912.12—　），二程镇桐柏周家田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兰州军区后勤部部长。

吴昌炽（1915.12.25—2006），二程镇叶家田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防空军第一军副军长、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正军职）。

吴恒寿（1916.10—　），上新集镇吴家林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后勤部顾问。

吴基荣（1908—1991.7），城关镇桂花楼村郑家岗人。1930年参加红军，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志愿军后勤部第 3 分部第一副部长兼参谋长，后任湖南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享受副军职待遇。

吴林友（1914.11—　），七里坪镇李家河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济南军区空军后勤部副政委、后勤部顾问。

吴昌恒（1814—1988），高桥镇马家田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山东省惠民军分区政委，享受副军职待遇。

闵学文（1918—1978），七里坪镇闵家冲人。中共党员。1930 年参加红军。后任湖北省军区后勤部长。

余天生（1911—　），七里坪镇大余家人。1928 年参加革命，1936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广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邹新华（1908—1988），七里坪镇典明柏树塝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新疆阿克苏军分区司令员、新疆公安总队参谋长。

汪　浩（1917—），高桥镇汪家畈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沈阳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政委、后勤部顾问。

汪立强（1915—）七里坪镇莲花背村人。1930 年参加红军，中共党员。曾任成都军区某部师长，享受副军职待遇。

沈润生（1915—），高桥镇河头畈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6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总后勤部营房部政委、总后勤部政治部顾问。

张方明（1916.8—），七里坪镇张石河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河北省军区后勤部政委、省军区顾问。

张克彬（1916.9.18—　），华家河镇西张家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志愿军预 9 师副师长。后任国防科委第 22 基地后勤部长。

张鸣夫，生卒年不详，太平桥镇人。中共党员。1930 年参加红军。后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

张　俊（1919—1997），曾用名张前进。七里坪镇柳林河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空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顾问。

杨家泰（1910—1988），上新集镇郭杨家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吉林省军区后勤部政委、总参谋部 550 仓库政委。

杨世忠（1914—1971），华家河镇台南杨家冲人。中共党员。1929 年参加革命。后任江苏镇江军分区司令员。

杨兴忠（1918—1985），二程镇张杨家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5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军副参谋长，后任湖南湘潭军分区副司令员，享受副军职待遇。

林恺成（1914.9—1989），永佳河镇林家塝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湖北黄冈军分区政委，享受副军职待遇。

何子成（1914— ），上新集镇茶畈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鲁豫军区卫生部政治处主任。北京通县军分区副司令员，享受副军职待遇。

罗映清（1916—1989.12.12），高桥镇严家畈村罗家河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军电台台长、炮兵科技部副部长。

罗映臣（1918.12—1990.9.17），高桥镇栗林嘴村罗家塝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安徽省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安徽省军区顾问。

罗绍义（1918.8—2005.11），高桥镇严家畈村罗家河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36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江苏省军区后勤部政委，享受副军职待遇。

周明良（1903.8 —1983.7），七里坪镇周家墩人。中共党员，1929 年参加红军。后任河北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金仕华（1922.9—1988.4.30），华家河镇金家塝人。1937 年参加红军，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安徽省徽州军分区司令员，享受副军职待遇。

郑炳礼（1908—1984），七里坪镇袁河谢家嘴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辽宁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享受副军职待遇。

郑　强（1911—1973），上新集镇人。中共党员。后任武汉军区军械部政委。

郑　涛，生卒年不详，七里坪镇马鞍山人。中共党员。1930 年参加红军。后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

郑　重（1903— ），原名郑如星。七里坪镇袁家冲人。1927 年参加革命，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总后勤部华东管理局第一副局长。

赵绍明（1916—1981），七里坪镇七家畈人。1932 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总后勤部南宁办事处政委。

赵基全（1914—2000），城关镇倪赵家人。1928 年参加革命，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工程兵学院政治部组织部长，享受军职待遇。

胡裕文（1911—1987.12.27），城关镇胡家河人。参加黄麻起义。1931 年

参加红军，1932 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任太行军区卫生部政委，以后因病休养。

胡先祥，生卒年不详，杏花乡凉亭岗村人。中共党员。1930 年参加红军。后任北京公安总队医院院长，享受副军职待遇。

钟清长（1912—　），高桥镇庙咀钟家塝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通化军分区政委、吉林省军区政治部顾问。

钟光国（1918—1975），高桥镇钟家塝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

祝顺鹏（1913—1978），七里坪镇方家院村祝家塝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沈阳军分区司令员。

祝少安，生卒年不详，七里坪镇方家院村祝家塝人。中共党员。1931 年参加红军。后任四川内江军分区司令员，享受副军职待遇。

陶　励（1910—1985），华家河镇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

聂洪国（1913—2004.6.12），华家河镇蜘蛛店村大塘聂家人。1929 年参加革命，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海军第二炮兵学院政委、海军政治部顾问。

徐洪才（1908—1955），杏花乡徐家畈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副部长。

徐仕凯（1913.2—1955.12.1），七里坪镇方西河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海军卫生部政委。

徐青山（1904—1987.2），觅儿寺镇徐家楼村新屋塝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 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高级军械技术学校副政委，享受正军职待遇。

席绍先（1902—1967），七里坪镇罗畈冲村王家洼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参加红军。后任山西省军区后勤部政委。

夏　克（1914—　），觅儿寺镇柏树塝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江苏省扬州军分区副政委，享受副军职待遇。

黄宏伸（1904—1994.8.19），华家河镇熊家河村道人洼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黄崇述（1917—1987），城关镇张家畈村黄家岗人。1930 年参加革命，

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享受副军职待遇。

黄　华（1917—1973），上新集镇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南海舰队卫生部部长、后勤部副部长。

梅宏德（1904—1975），高桥镇王刘秀人。中共党员。1927 年参加革命。后任河北省军区后勤部政委。

梁业坤（1916.2—2006），城关镇季家冲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

程启学（1916—　），七里坪镇程维德人。中共党员，1930 年参加红军。后任粤西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程绍祥（1913.6—1989），七里坪镇程维德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二野战军第 5 兵团后勤部副部长、贵州省军区副参谋长。

阙启普（1918—1996.9.30），城关镇洪家田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36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辽宁省军区司令部顾问。

熊志生（1919—1989.8.21），华家河镇熊家河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6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第二炮兵副政委。后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熊心乐（1916—1987），永佳河镇熊子武人。1930 年参加革命，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熊友刚（1903—1969），七里坪镇盛家冲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

熊振武（1919.2—　），永佳河镇李家乌石冲人。中共党员。1930 年参加红军。后任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

戴觉敏（女）（1916.9—　），七里坪镇檀树上戴家人。1930 年任鄂豫皖苏区团委常委。1932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总后勤部管理局卫生处长、管理局顾问，享受正军职待遇。

戴修福（1911—1985.6.16），高桥镇黄土嘴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安徽省阜阳军分区副司令员，享受副军职待遇。

转业将领　名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大批红安籍军队干部脱去军装，转业到地方参加经济建设，其中有副省、部级干部（含享受同等待遇）53 名。这些在战场上

流血，在建设中流汗的转业将领，亦不应忘记。

方忠立（1916—1984），七里坪镇花园畈村轿儿石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 2 师供给部政委。铁道部工业总局副局长，享受副部级待遇。

王进前（1913—1986），城关镇金沙金家田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总经理。

甘良柏（1920— ），七里坪镇紫云余家边村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医疗器械工业总公司经理，享受副部级待遇。

石世良（1909—1980），七里坪镇联山石家塝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军分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 21 兵团干部部长，湖北省计委副主任。

叶再元，生卒年不详，城关镇铁山村人。中共党员。1927 年参加革命。后任商业部粮食局局长，享受副部级待遇。

叶英礼（1916— ），永佳河镇张店叶子冲人。中共党员，红军时期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机要处长。后任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享受副省级待遇。

包正堂（1917— ），杏花乡包家冲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委书记、武钢武装部长、武钢副总经理，享受副省级待遇。

刘保华（1904—1991.2.22），华家河镇方刘家田村人。1928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苏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委。安徽省粮食厅副厅长、顾问，享受副省级待遇。

刘友海（1913—1988），太平桥镇大伍墩人。1929 年参加革命，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享受副省级待遇。

刘克先（1914—1994.2.26），红安县太平桥镇刘家田人。1928 年参加革命，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军后勤部长。湖北省燃料工业厅副厅长、党组书记，享受副省级待遇。

阮官清（1911—1981），七里坪镇阮家店村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享受副省级待遇。

刘庆南（1912— ），华家河镇人。中共党员。1931 年参加红军。曾任红西路军骑兵师政委。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吴茂福（1907—1962），高桥镇人。1928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师供给部长，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厅厅长、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

沈先夫（1913—1993），七里坪镇东后街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师参谋长、志愿军工程兵大队政委。吉林省劳动厅厅长、省顾委会委员，享受副省级待遇。

杨子明（1909—1982.1.30），华家河镇杨家冲人。1928 年参加革命，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第 5 师第 3 纵队副司令员。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杨辉明（1904—1986），二程镇杨柏楼村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后任安徽省卫生厅厅长，享受副省级待遇。

李　质（1914—1975.8.14），红安县太平桥镇李西门岗人。1937 年冬参加抗战，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

李金德（1918—1997.11.23），红安县华家河镇李朝洼村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6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副局长、民政部副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享受部级待遇。

汪立勇（1913—1987），七里坪镇莲花背村人。1929 年参加革命，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 5 分部站长，军事科学研究所所长，后为南水北调领导小组成员（副部级）。

汪立波（1907—2002），杏花乡岗上汪家人。1926 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 月参加黄麻起义，任农民义勇队队长。曾任前中原军区驻华北留守处处长。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享受副省级待遇。

汪进先（1909—1988），杏花乡畈上汪家人。1927 年参加革命，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曾任陂安南中心县委书记、军事指挥部政委。后任湖北省交通厅厅长，享受副省级待遇。

汪　群（1916—1998），火连畈茶场团山村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武汉市江汉区委书记，享受副省级待遇。

张焕潮（1917—　），七里坪镇张石河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享受副省级待遇。

张天伟（1912—　），城关镇联山张李家人。1927 年参加农民自卫军并参加黄麻起义。1934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政委、二野女子大学政治部主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名誉院长，享受正部级待遇。

何仁堂（1900—1997），上新集镇三里桥人。1929 年参加革命，1930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贵州省水利电力厅副厅长，享受副省级待遇。

陈源深（1917—　），七里坪镇吴府七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5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国家计委储备局局长、国家计委顾问。

陈行庚（1914—　），城关镇鸭公陈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贵州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中纪委委员。

陈浩萍（1916—　），高桥镇杨二余家嘴人。中共党员。1930 年参加红军。曾任海军卫生部副部长。林业部办公厅副主任，享受副部级待遇。

况步财，生卒年不详，华家河镇况家河人。中共党员。1929 年参加红军。曾任师干部。江西省农垦厅厅长。享受副省级待遇。

金昭典（1912—　），华家河镇金家塝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福建省委书记。

周光坦（1901—1966.11.3），二程镇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四军 11 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郑祥勋（1910—　），二程镇郑家冲小塝人。1929 年参加自卫队，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供给部长。上海园林局副局长、顾问。

郑维孝（1899—1964），七里坪镇檀树马鞍山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曾任军分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

郑维家（1911—　），七里坪镇郑家畈人。1929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参加红军。曾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五军政治部民联部长。中国建材地质总公司党委书记。享受副部级待遇。

武世洪（1907.6.9—1990.1.7），城关镇武家田人。1927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 月参加黄麻起义。1928 年参加工农革命军。曾任红二十五军供给处处长、中原军区驻皖苏办事处处长。中南行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中国石油公司武汉采购供应站副经理。享受副省级待遇。

赵国威（1911—1995.1.29），七里坪镇紫云长塘边人。1928 年参加革命，1933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察冀军区雁北军分区副政委。公安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赵朋意（1919—2011.11），七里坪镇紫云村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二野特种兵卫生部长。贵州省卫生厅长。享受省长级待遇。

胡永连（1915— ），华家河镇赵河山下胡家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水电部西北电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副秘书长，享受副省级待遇。

秦　忠（1917— ），原名秦懋书。杏花乡两道竹林垮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湖北省交通厅厅长，享受副省级待遇。

秦　光（1917—2006），原名秦昌银。城关镇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空军第 4 师政治部干部部长。国家储备局河北管理局副局长、顾问，享受副部级待遇。

秦　振（1917—1967.5），原名秦辉灿。杏花乡徐家边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辽宁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湖南省检察院检察长。

涂其友（1903—1956），二程镇涂家垮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 年编入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军 88 师供给部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后勤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粮食局局长。

倪忠珍（1904—1978），城关镇倪赵家人。1927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贵州省遵义地委副书记。

黄宏儒（1900—1982.9.11），华家河镇枣林前垮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赤卫队。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康启华（1908—1984），高桥镇康家洼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四野战军第五十二军 214 师副师长。后任湖北省建委副主任，享受副省级待遇。

彭忠华（1903— ），高桥镇小彭家垮人。1930 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南军区后勤部长。广东省中药材公司总经理。

彭幼华（1917—2011），又名彭福金，高桥镇邓家垮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 年加入共青团，1931 年参加红军，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军卫生部部长，北京大学分校校长。

程启光（1902—1993.9.20），七里坪镇程维德人。1926 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曾任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

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办公厅秘书长、商业部基建储备局副局长、顾问。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副部级待遇。

曾　焜（1908—1976），八里湾镇卓旺村曾八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 74 师政治部主任、豫鄂陕军区野战纵队政治部主任。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曾传六（1904—1983.10.20），七里坪镇东彭家洼人。1925 年参加革命，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黄麻起义。曾任红四军 10 师政委、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商业部副部长、顾问（正部级）。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曾广泰（1910—1994.12），华家河镇柳林曾家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军 89 师政委、湖北孝感军分区司令员。湖北省林业厅副厅长。享受副省级待遇。

潘阳泰（1916—1984），七里坪镇潘家河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二野战军第 5 兵团卫生部长兼政委、西南军区卫生部长。四川省卫生厅厅长。享受副省级待遇。

戴季英（1906—1997.11.29），七里坪镇戴世英村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和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前曾任黄安县委书记、红二十五军 74 师政委、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新四军 4 支队司令员、八路军河南军区政委、前中原军区副政委兼第 1 纵队政委、河南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

牺牲将领　英名不朽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起，到全国解放战争结束的二十多年中，红安先后有 22552 名干部战士为革命捐躯，其中副师（旅）职以上的将领有 88 名。他们的英名和历史功绩将永垂不朽。

王秀松（1902—1931），高桥镇栗林嘴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从广州农讲所学习归来领导农民运动。1927 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1928 年任鄂东特委书记，向中央建议将湖北黄安、麻城，河南光山、商城，安徽六安、霍山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区，实行大别山武装割据。是提出创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人。1929 年任鄂东北特委委员兼黄陂县办事处主任，大

义灭亲，派游击队将其屡劝不改的恶霸地主兼反动民团支队长的父亲王见禄镇压。1930 年调任红军团政委。1931 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同年 9 月在肃反扩大化中被害于光山县白雀园。拘禁期间著有《红四方面军创建史》。

王吉文（1916—1948），高桥镇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军分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第 3 纵队第 8 师师长。1948 年 9 月 21 日，在济南战役攻城战斗中牺牲。

王海清（1911—1936.11），红安县人。中共党员。红九军第 25 师师长。1936 年 11 月，于甘肃古浪战斗中牺牲。

王建刚（　—1935），红安县人。中共党员。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1935 年，于四川作战牺牲。

王德安（1912—1935），七里坪镇王锡九村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长、营长、团政委，红三十三军第 99 师政委。1935 年 7 月，于四川理番杂谷垴战斗中牺牲。

王建南（1909—1934），高桥镇张董家田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皖西北道保卫局局长，红二十五军第 79 师政委。1934 年牺牲于霍山。

王基明（1908—1936），七里坪镇彭家洼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红军。历任营长、团长、师长。在陕西作战中牺牲。

邓义山（1900—1932），高桥镇何家田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三十军团长，红二十五军第 75 师政委。在六安战斗中牺牲。

甘良发（1905—1933），七里坪镇四方冲人。1928 年参加红军。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红四军第 10 师政委。1933 年冬，于四川宣汉县峰尘场作战中牺牲。

甘济时（1900—1932），原名甘绍财。七里坪镇潭畈河人。1926 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 月参加黄麻起义。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和鄂豫皖特委委员。1931 年任红四军第 13 师政治部主任、第 11 师政治委员。1932 年 10 月 9 日，在第 4 次反“围剿”时，于黄陂县长岭岗战斗中牺牲。

叶成湖（1907—1933），红安县人。中共党员。红四军第 11 师副师长。1933 年 11 月，于四川宣汉县登龙坪作战中牺牲。

叶道志（1910—1938），七里坪镇人。1928 年参加红军。1929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红三十一军第 93 师师长，红四军第 10 师政委，新四军第 2 支队 4 团副团长。1938 年 9 月被错杀。1983 年 10 月 2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刘理运（1906—1936），上新集镇龙井冲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红九军第 25 师副师长、第 26 师师长。1936 年 12 月，于甘肃永昌二十里铺战斗中负重伤，不久牺牲。

刘诚光（1914—1942），原名刘德福，红安县人。中共党员。1930 年参加红军。历任班、排、连、营长、团政委。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 37 团政委、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第 12 团政委。1942 年 4 月，在河北遵化铁厂西山与日军作战中牺牲。

孙玉清（1910—1937），高桥镇孙家塝人。1927 年参加工农革命军。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红三十一军第 91 师师长。1935 年任红九军军长。1937 年 1 月任红五军军长。同年 3 月红西路军失败后，率领游击支队一部在酒泉南山地区与敌军奋战，负伤被俘。4 月下旬，在青海西宁市英勇就义。

许草春（1912—1933），又名许革春。红安县人。中共党员。1927 年参加革命。曾任红四军第 10 师政治部副主任。1933 年，于川北作战中牺牲。

杨宏明（1910—1942），华家河镇杨家冲人。1927 年 11 月参加黄麻起义。1928 年参加红军。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冀南军区新 9 旅副旅长、第四军分区司令员。1942 年 4 月 29 日，在指挥临清战役粉碎日伪军“铁壁合围”时，于达布寨突围中牺牲。

李有庆（1907—1937），高桥镇高桥河人。中共党员。1931 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九军第 27 师 81 团政治处主任，红九军教导师政治部主任。1937 年 3 月，于甘肃临泽县梨园口战斗中牺牲。

李学宽（1902—1932），红安县人。中共党员。1927 年参加革命。曾任陂安南县赤卫军第 4 师师长、红军独立师政委。1932 年，于红安县两道桥作战中牺牲。

李思禄（1893—1931），七里坪镇余家塝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任黄安县农民政府副主席。历任县赤卫总队队长、红色补充师师长、红安县独立团团长。1931 年于八里湾作战中牺牲。

李隆兴（1904—1934），红安县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参

加红军。曾任红四军少共国际团团长、川陕省军事指挥部副指挥长。1934 年 5 月，于四川通江县泥溪场病故。

吴焕先（1907—1935），黄安县紫云区四角槽门人。1923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历任红四军第 12 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第 73 师政委、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重建红二十五军后任军长、政委。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长征途中，1935 年 8 月 21 日，在甘肃泾川县四坡村战斗中牺牲。

吴大明（1911—1946），原名吴俊生。七里坪镇天台山豆腐铺人。1928 年参加赤卫队。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参加红军。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委、冀鲁豫新编第 3 旅 8 团团长，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副司令员，鲁西南军分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7 纵队第 19 旅旅长。1946 年 10 月 5 日，于山东巨野章缝集战斗中负伤牺牲。

吴先保（1903—1934），七里坪镇枣林岗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军第 1 师 1 支队经理处主任、红四军经理处处长、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1934 年，于四川通江县病逝。

吴永达（1895—1932），七里坪镇吴顶河人。1927 年参加组建农民义勇队任队长，11 月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陂安南县独立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 1 师（又称红安独立师）副师长。1932 年，因肃反扩大化于河南新集被害。

吴恒富（1914—1946），华家河镇熊河村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2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指导员、抗大总校第 4 大队大队长、吉东军区警备 2 旅参谋长、第 3 纵队副司令员。1946 年，在长春战役中牺牲。

余天云（1906—1936），七里坪镇大余家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33 年 7 月任红三十军军长。1935 年调任红三十一军军长。不久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高级指挥科科长。1936 年 4 月，于四川丹巴县渡河时因故溺水牺牲。

邹洪盛（1905—1933），又名邹丰盛。七里坪镇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营长、团长、副师长、红三十军第 90 师师长。1933 年，于四川宣汉县土地堡战斗中牺牲。

邹俊亭（1903—1932），七里坪镇柏树塝人。1927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教导团长、红二十五军第 75 师副师长。1932 年，于光山璞塔集作战中牺牲。

汪加申（　—1934），又名汪家声。红安县人。1927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第 10 师 30 团政治处主任、红三十军第 88 师政治部主任、红三十军政治部宣传部长。1934 年 10 月，于巴中县恩阳河病故。

汪成功（1903—1934），又名汪立功。红安县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红九军第 27 师副师长。1934 年冬，于巴中县恩阳河病逝。

汪明国（　—1933），红安县七里坪镇人。中共党员。1928 年参加红军。先后任红四方面军独立第 3 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 74 师师长。1933 年秋，在肃反扩大化中被害。

汪烈山（1904—1933），七里坪镇刘家洼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参加红军。曾任营长、团长、红三十军第 88 师师长。1933 年于四川达县石鼓寨战斗中英勇牺牲。

汪奠川（1904—1928），原名汪世杰。火连畈茶场汪权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由武汉回黄安从事农民运动。1927 年春，参加组建黄安农民自卫军。不久，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回黄安，任黄安县农民自卫军指导员。同年 11 月参加与领导黄麻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参谋长、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参谋长。1928 年 3 月，于黄陂汪家西垮作战中牺牲。

张世谦（1897—1935），七里坪镇张家冲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乡支书、区农民政府主席。1930 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四军第 10 师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一军第 93 师政治部主任。1935 年 12 月，于川西病故。

张雨滴（1894—1935），又名张玉弟。七里坪镇许葛楼村山合洼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经理处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部长。1935 年秋，于四川马尔康大藏寺病逝。

张世海（1907—1932），华家河镇人。中共党员。1930 年任红安县总工会宣传部长，后调入红军工作。1931 年任红四方面军第 12 师政治部主任。1932 年，于华家河作战中牺牲。

陈少猛（1901—1934），红安县人。中共党员。1930 年参加红军。曾任营政委、团政委、红九军第 26 师政委。1934 年秋，在反六路围攻作战中于四川通江县牺牲。

陈伯稚（1914—1936），永佳河镇桃花黄土坡人。1928 年参加革命。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营政委、团政委、红九军参谋长。1936 年 11 月，在甘肃古浪战斗中壮烈牺牲。

陈定侯（1901—1931），又名陈飞、陈剑、陈善。七里坪镇檀树陈家洼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 9 月回黄安工作，任紫云区农民协会领导人。1927 年 8 月，为黄安县防务委员会领导人之一。11 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任黄安县农民政府委员。1928 年任红十一军第 31 师政治部主任。1931 年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同年 10 月因肃反扩大化于河南光山新集被害。

陈保青，女，（　—1937），又名陈宝庆。红安县人。中共党员。曾任团、师医务主任、红四军医院院长、红西路军医院院长。1937 年春，于甘肃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

陈桂清（1910—1936），红安县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一军第 91 师经理处主任。1936 年第 3 次过草地时病故。

陈光国（1907—1937），高桥镇冯家田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红四军第 12 师政委。1937 年北上抗日下落不明。

周光策（1896—1947），二程镇楼子周家人。1928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团长、八路军冀南军区第 2 军分区司令员、1946 年任豫鄂陕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1947 年秘密回家乡发动青年参军，不幸被捕，在红安县城教场岗英勇就义。

郑行齐（1895—1935），七里坪镇紫云人。中共党员。1927 年参加革命。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供给部部长。1935 年 8 月，于川西作战中牺牲。

郑行瑞（1893—1932），七里坪镇郑必高人。1926 年参加农民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7 月，组织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起义。历任红十一军第 31 师经理处主任、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 4 分校副校长。1932 年，因肃反扩大化被监禁，于狱中牺牲。

郑前学（1916—1943），红安县人。中共党员。1930 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抗战时任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参谋长。1943 年 5 月 26 日，在威县沙圪塔战斗中牺牲。

郑行福（1902—1943），七里坪镇檀树清水塘人。1929 年参加革命。1931 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政委、红三十一军供给部部长、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1943 年，在安徽与日军作战中牺牲。

武万扬（1912—1933），城关镇金沙武家田人。中共党员。1930 年参加

红军。曾任红四军师政委。1933 年，在四川作战中牺牲。

金传鉴（1904—1933），永佳河镇金家嘴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游击队队长，黄安独立团副团长，第四路游击师师长。在永河栗林店遭敌捕捉杀害。

赵义京（1912—1943），红安县赵家店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队长、副营长、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1943 年 8 月 30 日，在枣强县大江官村战斗中牺牲。

胡青山（　—1934），红安县人。中共党员。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 91 师政治部主任。1934 年，于四川南江县病故。

秦道贤（1912—1937），红安县人。中共党员。参加红军后，历任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师政委。1937 年 2 月，率部驰援在甘肃高台县城被围困的红五军，于战斗中牺牲。

秦敬军（1913—1934），城关镇金沙严家冲人。中共党员。1931 年参加地方武装。1933 年任第四路游击师副师长。1934 年，在七里江朝二作战中牺牲。

秦遵耀（1909—1934），二程镇秦家畈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代理师政委。1934 年在铁炉徐家畈作战中牺牲。

袁光焱（1899—1937），高桥镇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组织科长、团政治处主任、红四军第 11 师政治部主任。1937 年于甘肃作战中牺牲。

夏如银（　—1933），红安县人。中共党员。曾任独立第 7 师师长。1933 年，在战斗中被俘牺牲。

夏祖盛（　—1943），红安县人。中共党员。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红九军第 27 师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政委。1943 年 5 月 22 日，在河北枣强县大马村战斗中牺牲。

徐世奎（1911—1940），红安县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营长、团长、红三十军第 89 师师长、新四军第 4 支队 7 团政委。1940 年 9 月，在盱眙龙王山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徐朋人（1903—1932），七里坪镇高徐家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时，负责起草《土地问题决议案》等文件。1928 年 1 月到达木兰山，参加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的游击活动。

1929 年任鄂东北特委书记。同年 11 月，任中共鄂豫边特委书记。1931 年到上海列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因与王明的“左”倾错误作斗争，被开除党籍。后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税务局局长。1932 年 4 月，因肃反扩大化于河南光山县泼陂河被害。

徐绍恩（1916—1943），红安县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八路军第 129 师东进纵队第 1 团团长、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政委、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43 年 5 月 26 日，在河北威县沙圪塔战斗中牺牲。

徐海珊（1910—1948），华家河镇徐屋榨人。1929 年参加赤卫军。1931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赤卫军连指导员、河口特委组织部部长兼特委便衣队指导员，参与创建鄂豫皖第一支便衣队，新四军第 4 支队第 7 团 2 营副营长、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第 2 师 4 旅政治部主任、山东野战军第 2 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第 12 纵队 37 师政治委员。1948 年 9 月 24 日，在济南战役攻城战斗中牺牲。

徐仕贵（1904—1935），七里坪镇徐家塝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参加红军。历任团政治处主任、副团长、团政委、红九军第 25 师政治部主任。1936 年参加红西路军作战时下落不明。

徐盛礼，生卒年不详，红安县人。中共党员。曾任红三十军第 90 师师长，红三十一军第 93 师副师长。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在长征途中牺牲。

徐以德（1901—1932），七里坪镇徐家畈人。1927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连长、营长、团长、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副院长。1932 年，在安徽金寨作战中牺牲。

高厚祖（1916—1948），红安县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干事、股长、科长、八路军第 129 师团政委、晋冀鲁豫军区第 3 纵队第 7 旅政治部主任。1948 年，在河南病逝。

黄绪南（1912—1934），红安县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二十五军第 74 师团长、副师长、红二十八军第 84 师师长。1934 年 3 月 24 日，在商城杨山战斗中牺牲。

黄世长（1907—1933），七里坪镇大塘黄家人。1929 年参加红军，中共党员。红安独立师师长，1933 年在大坳口作战牺牲。

黄世德（1914—1946），华家河镇畈上人。1929 年参加革命。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鄂东第三路游击师师长、新四军第 5 师第 13 旅团长、

鄂皖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1946 年 9 月，在蕲春作战中牺牲。

梅宏华（1908—1934），红安县人。1929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红九军第 27 师政委。1934 年夏，于四川万源县作战中负伤牺牲。

曹学秀（1896—1931），七里坪镇刘家园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参加红军。曾任团经理处处长、红十一军第 31 师经理处处长、红四军第 10 师经理处处长。1931 年，因肃反扩大化于河南光山白雀园被害。

曹学楷（1898—1931），原名曹学凯。七里坪镇刘家园人。1925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七里区区委书记、黄安县农民协会负责人。1927 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任黄安县农民政府主席。后随起义部队转入黄陂县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务委员会委员，负责地方工作。1928 年春，汪奠川牺牲后接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参谋长，与吴光浩等率工农革命军返回黄麻老区，参与领导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同年 7 月，任红十一军第 31 师参谋长。10 月，任中共鄂东特委委员兼南区工作委员会主任。1929 年 4 月，任中共鄂东北特委委员。12 月，参加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1930 年 4 月，任红军鄂豫边总预备队政治委员。10 月，被选为红一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1 年 5 月，任红四军第 11 师政治部主任。7 月，任红四军第 13 师政治委员。1931 年冬，因肃反扩大化被害。

曹学珍（1904—1932），七里坪镇幺儿山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参加红军。1931 年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次年在浒墩战斗中牺牲。

韩继祖（1906—1934），红安县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乡支部书记、区委书记、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红四军第 12 师政治部主任。1934 年，因肃反扩大化于四川被害。

韩继能（　—1934），又名韩继伦。红安县人。中共党员。1933 年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经理部部长。1934 年，于四川通江县牺牲。

韩先模（1912—1933），二程镇汪家畈人。中共党员。1929 年参加赤卫军。先后任河口县赤卫军团长、河口特委副书记、第八路游击师师长。1933 年，在黄安佛塔山作战中牺牲。

程启波（1905—1933），曾用名陈启波。七里坪镇程维德人。中共党员。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第 75 师政治部主任。1933 年，因肃反扩大化被害。

程绍山（1901—1931），七里坪镇檀树岗后头塝人。1927 年参加黄安县农民自卫军。11 月参加黄麻起义。后随部队转入木兰山、柴山保开展游击活动。1928 年任红十一军第 31 师第 4 大队大队长，1931 年任红四军第 10 师副师长。1931 年 10 月，因肃反扩大化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被害。

程翰香（1894—1931），又名陈翰香。七里坪镇紫云区檀树陈家洼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曾任中共鄂豫边特委秘书长、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1 年 10 月，因肃反扩大化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被害。

阙华山（1904—1933），城关镇阙家塝人。中共党员。先参加赤卫队，后编入红军，曾任第七路游击师师长。1933 年作战被捕，在中徐家村庙岗就义。

焦福兴（　—1932），原名焦衡田。七里坪镇紫云人。1928 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陂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鄂东特委委员、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陂孝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陂安南县独立团政委、红安独立第 1 师政委。1932 年，于湖北黄陂县作战中牺牲。

蔡仁年（1909—1936），红安县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军政治部党务委员会书记、组织部副部长。1936 年冬，于甘肃武威四十里铺作战牺牲。

熊绪光（　—1935），红安县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组织股长、红三十一军第 93 师党务委员会书记。1935 年 4 月，于四川岷江作战中牺牲。

黎海堂（1906—1933），华家河镇山台村黎家坳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参加红军。曾任团长、第八路游击师副师长。1933 年，在二程江家河作战被捕牺牲。

戴克敏（1906—1932），又名戴道规。七里坪镇上戴家人。1925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入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县后任县委委员。11 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兼第 1 路党代表。1928 年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红十一军 31 师党代表。和徐向前等共同起草并经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系统总结了鄂豫边两年武装斗争经验，对鄂豫皖红军的建军与作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1930 年任红一军第 1 师政治委员。1932 年任红 75 师政治委员。同年夏，因肃反扩大化于河南光山县新集被害。

戴继伦（1904—1932），七里坪镇戴世英村人。1921 年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积极参加武汉学生运动。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春任黄安县委委员，组织农民协会，领导七里、紫云两区农民同土豪劣绅作斗争。同年 11 月参加黄麻起义。1928 年任鄂东特委委员、黄陂县委书记。1929 年任鄂东北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文化委员会主席。1931 年调任皖西北特委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书记，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火花》。1932 年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同年夏，因肃反扩大化被害。

戴道芝（1902—1931），七里坪镇戴家塘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军第十一军医院院长，红四军总医院院长。因肃反扩大化被害。

魏正兴（1917—1946），高桥镇魏家塝人。中共党员。1930 年参加赤卫军，1931 年编入红四方面军第 10 师，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1946 年任辽宁省宽甸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同年冬，在保卫宽甸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尾　声

走过战争岁月，
走近人民军队，
走遍各地战场，
走到红安籍将领中间……

我们看到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批又一批的红安儿女，踊跃参加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和志愿军，奋勇战斗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和友邦的国土上。他们在战斗中留下的印象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前仆后继，万死不辞。在那条充满艰苦、曲折、复杂而又漫长的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上，印满了他们的鲜血和足迹，在数不清说不完的战斗中，表现了他们的忠勇、传奇和无私奉献。

时势造英雄。那些战死和活着的红安英雄，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几百个。他们不仅是人民的功臣，还是人民军队的将领。他们都是革命形势造就的。像柴多火猛烈，雨大洪峰高一样，红安将领辈出，与红安的革命特点密切相关。

那么，红安革命有什么特点呢？概括起来是四个字：早、爆、大、多。

早，红安革命闹得早。革命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1922年就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1923年亲自领导建立了黄安共产党的组织。1925年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安就闹了个天翻地覆，影响极大，成为鄂豫皖地区革命的发祥地。

爆，红安革命最火爆。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会议，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张。会议精神贯彻下来，红安人执行最坚决，行动最迅速。9月即开始暴动，11月举行黄麻起义，成立了

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1928 年实行边界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1929 年向党中央提出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建议，1930 年就实现了这个愿景。红安也就成为了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的摇篮。

大，红安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县总动员参加武装斗争，故有“小小黄安（原县名），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歌谣流传至今。在国民党反动派连续进行五次残酷“围剿”中，不屈不挠，坚持到底。先后有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转战出境，开辟了川陕苏区和陕南苏区，并与红一、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一同创建了中国革命大本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留在根据地内的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组成了红二十八军和广大的便衣队，继续与群众一起战斗。为了保卫根据地，全县有 14 万多人献出生命。接近 1800 平方公里的县域，几乎每片土地被血染过，被火烧过，成了一片赤土。红安人的革命奉献精神，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彰。1932 年鄂豫皖分局就将黄安改名红安，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决定改名红安县。这个红字是全县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多，革命给红安造就的将领多。从 1925 年开展农民运动以来，中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红安先后有 65000 多人参军参干。他们在各个革命时期的血雨腥风中，战斗—牺牲—成长，再战斗—再牺牲—再成长，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全县先后有 22552 人在革命斗争中捐躯，成为光荣的革命烈士。其中有：

军职干部 12 名；

师职干部 78 名；

团职干部 267 名。

新中国成立后，幸存的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全县有 600 多人。其中有：

两位国家主席；

62 位授衔将军；

90 位副军职（含享受同等待遇）以上将领；

53 位军队转地方工作的副省、副部级（含享受同等待遇）以上干部；

若将过去牺牲的副师（旅）职以上 88 名将领和新中国成立后已授衔与未授衔（包括军队转业到地方）的 207 名将领以及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合计在一起，红安将领共有 295 名。

当年起义谁料得，脱颖将才如此多。一位军旅作家来红安采访以后，无限感慨地说：红安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将军的摇篮。

在红安这块深红色的土地上，曾经有许多红色歌谣广为传唱。其中有一首非常经典，歌名叫《八月桂花遍地开》。歌词中唱道：

站在斗争前线，
不怕牺牲冲上前。
为的是政权，为的是政权，
工农专政如今已实现。
……

“为的是政权”是当年所有参加闹革命人的共同目标。今天，革命胜利了，成立了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了。我们不能忘记当年为人民打江山英勇奋战的将士，不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健在与否，不论他们授衔与否，也不论他们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与否，他们都是新中国功勋卓著的开国功臣。我们应永远记住他们。

20 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英雄辈出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红安人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将领，遍及当年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后来的人民解放军各大部队，遍及全国各地，形成一个红安将领群。故 1985 年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亲笔题写了：“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这个题词不是随意写的，而是因为他了解情况熟悉这个将领群的产生过程。

徐帅题字是对红安人民最真切的褒扬，也是红安人民的无上光荣！

横空出世。从此，全世界都知道湖北红安是著名的“中国第一将军县”。

奇迹啊，奇迹！红安人创造了中国第一，世界仅有，历史空前的不朽奇迹！

2004 年动笔，2010 年 12 月写成于湖北红安，
2011 年 6 月定稿于美国麻省

为何如此执着？

——写作心迹

20世纪60年代初，领导让我负责主持编写红安革命斗争史。在查阅历史资料时，看到民政部门一个统计资料：红安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牺牲的县团级以上烈士有30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在解放军中授衔的将校官有180多人，在中央和地方工作的地级以上干部有200多人，共计700多人。这可能是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但这两个数字使我大吃一惊：红安在革命战争年代出了这么多的人才，真了不起！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的英勇斗争事迹。我本打算在史稿完成后，以演义形式将他们写出来。谁知革命史尚未脱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批判所谓“文艺黑线”时，我被揪住不放。一些人将我所写的文章、新闻报道和史稿统统翻出来“清算”。我被打成“黑线人物”，关进“牛棚”，批来斗去，没完没了。时患脊髓炎，卧床不起。我被从病床拉到批斗会场，站立不住，让人架住两膀进行批斗。第一次遭受“莫须有”的“文字罪”，告诫自己今后不要舞文弄墨。写演义的愿望就这样打消了。

人生如戏。真有戏剧情节在我身上发生。

改革开放后，领导又安排我负责主持党史工作。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文革”教训记忆犹新，不想再干这件事。但领导的决定不能不服从。再说让我继续编研红安革命历史是一种信任，也是对“文革”批判我的一种否定，这差事没有不接受的道理。不过还是心有余悸，做了再遭“文字罪”的思想准备。随着政治局面越来越好，思想顾虑慢慢消除了。盛世修史。全国出现了修史编志高潮，我也爱上了这项“编写历史，继承传

统，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的工作。

党史工作，顾名思义，是要将一个地区、一个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政权建设，以及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情况和一些主要人物活动弄清楚，求实存真，写成信史，教育后人。看起来是为他人提供读物，其实自己首先受到了教育。特别是查阅历史资料，访问革命前辈，所见所闻，耳濡目染，无不使人感动。故乡红安，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地方。这里有“早、爆、大、多”（革命闹得早，斗争最火爆，为革命做出贡献大，革命造就将领多）四大革命特点和“一要三不要”（要革命，不要财，不要家，不要命）、“一图两不图”（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的革命精神。在这些革命特点和革命精神激励下，涌现了数以万计的革命烈士和数以百计的将领。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革命凯歌，响彻大地，震撼人心。接触了解多了，众多英烈与将领的事迹和形象，浮现脑中，挥之不去。于是，当年想写他们的愿望又悄悄地在心里萌生。但因任务太多，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动笔。

退休之前生病了，一病几年。未等痊愈，到了退休年龄。无事一身轻，身体好多了。那些英烈和将领们的事迹又现脑际。鬼使神差，握笔以书。大病方愈，伏案用脑，颇感吃不消。掂量一下身体，再掂量一下写作量，只好作罢。

事情很凑巧。红安卷烟厂的《红烟报》开辟宣传红安栏目，约我为该报撰稿。每篇千字左右，篇数与时间不限，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发表。自己选题，自由写作，不急不催，宽宽松松。想一想这事对练脑练笔都有好处，就答应了。

写什么？前后在党史园地耕耘二十余年，可写东西很多。英烈和将领们的事迹自然成为首选。将所掌握的资料梳理一下，觉得以将领为主题，可把牺牲和健在的革命英雄人物事迹统括起来。反复斟酌后，拟定以《神州第一将军县》为题展开写作。表现这类题材，纪实比演义更为合适。用纪实手法叙事述人，让读者了解那一件件革命斗争事实里的英雄们是如何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和不断成长，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所撰文稿都从大局着眼，小处着笔，千字左右，有事有人，独自成篇，前后衔接，在一个总标题下组成系列文章。1995 年 4 月《红烟报》开始连载，登了近三年，1997 年秋天因出国探亲辍笔，共发表近 50 篇，5 万多字。全文虽未写完，但已勾画出红安将领辈出的轮廓。《神州第一将军县》是我最先提出来的，后被一位到红安

采访的作家拿去改成《中国第一将军县》。他不知原创是一位退休老头用心斟酌的，更没打声招呼。人要能包容。对此我不介意，反而高兴他为红安做宣传。

文以意重。《神州第一将军县》刊出后，不少人向报社索取连载稿。该报负责人祝尚斌建议我写完后结集出版。好意难却。2004 年即以连载稿为基础，进一步谋篇布局，增删改写，充实提高。原作因受篇幅字数所限，是从局部着笔，所写人物和事件是些片断。这次改写不受限制，乃从整体入手，大中见小，小中窥大，所写人物和事件就系统多了。但不是平铺直叙，泛泛而谈，着重是写红安，写红安籍将领，写将领事迹中闪闪发光的东西。然后，按革命历史时期，依战争发生顺序，循着红安籍将领的战斗足迹，展现一定背景下，两军对阵前，数百红安将领，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攻防打斗，流血牺牲，过五关，斩六将，走麦城，奏凯歌的英雄风采。彰显他们从同一个故乡走出来，在中国革命的全进程中，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夺取胜利的革命精神。同时不忘戴帽穿靴——战斗中的上级指挥，同级协同，下级效力。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体现红安籍将领与党政军组织血肉相连，他们的成长与各级领导培养教育分不开。这样改写，比原作更为全面、翔实、生动和大气，书名为《将星灿烂》，“红安籍将领征战风云录”，作副书名。

凡事简单易做，复杂难为。红安籍将领从参加黄麻起义开始，就为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而奋斗。他们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参加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打过不计其数的大仗小仗。写出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活动，光凭创作灵感虚构不了，必须“四了解、一弄清”，才能说出人物和事情的真实情况。“四了解”就是了解过去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历史，了解红安将领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和志愿军中服役情况，了解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重要战役、战斗有哪些红安将领参加，了解在这些重要战役、战斗中敌我双方战略部署、战斗经过和结果。“一弄清”是弄清红安籍将领在何时何地何部队参加何种战役的具体情况。脚踏实地，摸着石头过河，获取实在材料，搞清上下左右的关系，写出有根有据的东西，才算得上真正的风云录。这样一来，自然工作量大。有如从堆积如山的沙粒中淘金，写红安籍将领也要从浩繁的各种战史、专著、名录、回忆录和调访材料中认真查阅，才能得到所需要的东西。

然而，淘金不是一淘就有，查阅资料也不是俯拾即是，往往十日九空，

有点使人灰心丧气，想打退堂鼓。但一想到红安闹革命死了十四万人，其中革命烈士有两万多人。他们能为革命献身，我们为他们收集资料花时间、费精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在西进川陕途中，在三过雪山草地的长征路上，在浴血苦战河西走廊的日子里，红安籍将士上刀山，下火海，血拼血战，万死不辞的悲壮情景，惊天地，泣鬼神，叫人潸然泪下，一种应把他们崇高的革命献身精神传承下去的责任感，激励着我不顾年事已高，身体多病，心甘情愿为他们树碑立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厌其烦，查阅资料，调查访问，埋头伏案，反复易稿，全书大修改达三次之多。有人问我，你整天关在房子里，泡在书稿中，累不累？烦不烦？说句实话，年过七旬，精力有限，没完没了地看书写字，不累是假，不烦也做不到。但写书是自己许下的愿望，累了，烦了，又怎样？怨谁去？只有忍耐，忍耐，再忍耐，自我调节。不断提醒自己端正态度，继续收集资料，继续握笔。人老如老牛，不能奋蹄疾步，只能慢慢走着。勉励自己做老牛，做不了老牛做蜗牛，慢慢向前爬吧，总有一天会爬完格子，走出斗室，跟其他退休无事的老年人一样悠哉游哉。

爬完格子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2011 年春节前夕带着书稿赴美探亲。美国东北天降大雪。女儿家所在地麻省威士波尔雪积两三尺深。山川原野全被冰雪覆盖，只有树木、房屋和铲开的道路露出地面。不见飞禽走兽，很少见到行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意展现在眼前。人们都待在有暖气的家里，上班、上学、购物全靠汽车。清静的环境，视听思维不受半点干扰；暖和的屋子，好做各种事情。按照中国传统过完元宵节，我又摊开出境前匆草而成的初稿，在静谧、舒适、新鲜的环境里改写、补正、增删，有些地方做了大手术。终日如斯，不急不怠。光阴荏苒，转眼到了 4 月天。春天虽然姗姗来迟，毕竟来了。流水潺潺，鹿鸣鸟唱。枯萎的草地变绿了，杨柳飘着金黄色的柳丝，各种鲜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放眼望去，大片大片原始森林中的各种树木正在发芽。其中以枫林最耀眼，那繁枝密梢上散布点状红蕊，整个树冠如桃苞初放一般红艳。原来只知秋天的枫叶红如二月花，没想到北美有种枫树春天开红花。一棵棵高大的枫树，像一支支高大的火炬，很是壮观，在春光的照耀下灿烂极了。我的《将星灿烂》初稿，就在这灿烂的春日里修改完了。外景的灿烂与心里的灿烂交织在一起，愉悦至极！我为自己祝贺：马拉松式的写作终于完成了。高兴之余，又将全稿仔细再阅一遍。跟往常一样，请老伴当第一个读者提提意见，再做一些改动。自己觉得

差不多了，就暂告一段落。

这一本书，从下笔到收笔前后花了七年时间，加上写《神州第一将军县》三年，合起来十年。可以说“十年磨一剑”。联系到创作意图的产生，到现在有五十年了。五十年来，念兹在兹。十年伏案，笔耕未辍。如此执着追求是为哪般？或曰可否不做。这个问题也自问自答过。结果是：不为别的，就为宣传故乡红安的光荣革命历史和革命英雄人物。了解红安的人不宣传红安叫谁来宣传？能写文章的人不写红安革命历史和革命英雄人物叫谁来写？于是自己对自己也不好意思说不。就是这个理念，使我无法推卸这无形的社会责任，并不断地感到这责任越来越大。经常告诫自己：文章千古事，一字一言须慎重，不能马虎；写人写事须弄清，宁缺毋滥。人物入书也得立个规矩，凡属县团级以上干部或烈士都在关注之内。想方设法收集他们的资料，生怕遗漏。实在找不到材料，弄清他的经历之后写上他的英名。这样做了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否则不安。老伴对我说，你不仅是写书，还在为死难烈士英灵进行祭奠啊！是的，是有这么一层意思在内。可惜篇幅有限，只能写到县团级，不能写出两万多烈士，十万多群众。但我在书中反复提到群众的牺牲、贡献，也是对群众的悼亡和祭奠。英烈们如九泉有知，将是一种告慰。

本书题材广，时间长，范围广。表现主题既要一脉贯通，又不能面面俱到。从贴近历史，贴近战斗，贴近红安籍将领出发，采取时经事纬，横向截取，重点展开。然后按革命历史时期，分成若干章节来写。最后的结果，土地革命战争写了4章13节，抗日战争写了3章10节，解放战争是重点写了7章22节，抗美援朝战争写了1章3节，大结局写了1章5节，共16章53节，另加引子和尾声，合计50余万字。分章节看是各个时期主要斗争和战事的分镜头，合起来看是红安籍将领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征战的全记录。

这50余万字，吸取了近400万字有关参考书刊资料中的营养，汇集了150多位老干部访谈中的精华。虽非精品，确系真品。得党史工作之便，在“抢救活资料”中，我有幸访问了“三老”（老红军、老八路、老干部），“四将”（上将、中将、少将、无衔之将），其中聆听了两位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的谈话，党和国家领导人陈锡联、秦基伟、韩先楚，以及王建安、王诚汉、刘昌毅、张天云、吴先恩、胡奇才、徐深吉、徐斌洲、周世忠、闵学胜、张竭诚、陈美藻、罗应怀、郑国仲、马忠全、吴大胜、李其华、吴昌炽、戴觉敏（女）、曾传六、李金德、黄宏儒等老将军、老干部接受了访问。

工作期间，我先后访问了5位上将和两位上将夫人及儿女，7位中将和4位中将夫人及儿女，26位少将和7位少将夫人及儿女，33位无衔将领，42位在地方工作的老干部。此外，还访问了郭述申、伍修权、陈再道、李成芳、林维先、周志坚、钱钧、熊作芳、萧德明、高志荣、吴战行、李世安、李长如、徐明德、高林、顾循、林轩（女）、黎竟平、伍坤山、毛耀华等20多位外县外省的老干部、老将军，总计共访问了156人，得到了他们提供的宝贵资料，是本书得以完成的重要支柱，他们所谈的内容也是本书的亮点。

尤其使人受感动的是，他们不仅热情接谈，积极支持，还亲自帮助解决写作中遇到的困难。为弄清1955年至1965年红安籍将领授衔情况，原北京军区副政委罗应怀亲自领我去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处查阅有关资料。总政干部部徐部长派当年授衔处、干部处和档案处三位处长一同查对，弄清了过去从未弄清的授衔问题。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程启文同我有过八次谈话。他将自己所知有关红安籍将领的事迹都讲出来，这才了解到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是怎样牺牲的，“七七事变”后郑位三是怎样从延安到七里坪以及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后东进抗日的情况。当他得知1964年红安烈士陵园为吴焕先烈士建墓，因未迎回烈士遗骸而不能树碑时，他不顾年事已高，亲往陕西泾川县四坡村调查，才知红二十五军离开四坡村后吴焕先烈士被反动派毁尸灭迹。他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红安。红安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只有带着无限的悲伤为烈士树碑，请李先念主席为他题写了碑名。也使我写到吴焕先牺牲后的情况有一个真实的交代。原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张志勇，不厌其烦地为我查证、核实并复信告诉我刘理运在红西路军中的任职及牺牲情况。原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李世焱，多次与我面谈，提供了多篇有价值的回忆录，使我了解到红安和鄂豫皖苏区第一支便衣队是怎样产生的。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黄宏儒先后七次接受我的访问，详细讲述了他的革命经历，“仙居区事件”和红安五区便衣队成立与活动情况。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张竭诚每发表一篇回忆录就寄我一份，使我知道新四军第三师怎样从山东向东北进军和在东北地区如何站住脚跟并取得胜利的。原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与我交往甚密。我曾去北京访问他四次，他回红安看望过我两次。一次他听说我生病住医院，就去医院看望。嘱我先治好病，然后再写作，回北京后他亲笔写信勉励我把有关红安将军的书写好。每当我忆起老干部、老将军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就产生一股力量去完成这一艰巨的写作任务，成为推动我写作的第二动力（第一动力是英雄烈士们的光辉事迹）。

本书的写成与老干部的支持分不开，我的心里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

写作属个体劳动，比较自由，但要环境好，集中精力，才能够写下去。我退休后的写作是在家中进行的。老伴为我营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不让我分担家务，并从生活上加以照顾和调理；不让我承担家用，让我将退休金用于写作开支，保障我的写作顺利进行。我的子女多半在外地工作，他们经常来电话问安和帮助解决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在身边工作的时珍，除了在生活上关照我，还帮助收集、整理、打印一些文稿。十多年来他们一直这样做，我才得以完成一百多万字的初稿。我写书不是为己为家，而是为社会，长时间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不容易。有这样的好家风我心甚慰。

文难尽其美。虽尽力而为，错漏难免，望读者指正。

2012 年 4 月 26 日 于湖北红安

附录一

原黄安籍授衔将军

刘华清 （1916—2011），湖北黄安县二程区刘家院人（今属大悟县禹王镇）。1929 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1 年参加红军，1935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1988 年授上将军衔。曾任红军指导员、大队长兼政委，八路军 129 师司令部秘书主任、冀南军区组织部长、军分区副政委，解放军旅政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

聂凤智（1914—1992），湖北黄安县仙居区聂家塝人（今属大悟县禹王镇），1928 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9 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授中将军衔。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伍瑞卿（1911—2004），湖北黄安县仙居区小河人（今属大悟县禹王镇），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解放军政治学院院务部部长。

严　光（1915—2002），曾用名严志贵，湖北黄安县二程区严家冲人，出生于大悟县宣化店。1931 年参加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南京军区后勤部长、军区顾问。

吴　杰（1914—1997），曾用名吴书普。湖北黄安仙居区河湾人（今属大悟县禹王镇）。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1963 年晋升少将

军衔。解放军后勤学院院务部政委。

吴永光（1919—1982），曾用名吴祖德。湖北黄安县仙居区四姑墩左家人（今属大悟县禹王镇）。1930 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1 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吴林焕（1915—1979），原名吴基荣，曾用名吴济云。湖北黄安县仙居区龚家边人（今属大悟县禹王镇）。1929 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1930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军区顾问。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吴世安（1912—1984），湖北黄安县紫云区箭厂河新湾人（今属河南新县箭河乡）。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 年加入中国共青团，次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

何辉燕（1913—1991），湖北黄安县仙居区何家冲上湾人（今属大悟县禹王镇）。1929 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铁道兵副司令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潮夫（1908—2005），曾用名张朝富。湖北黄安县仙居区郑家冲人（今属大悟县禹王镇）。1929 年参加赤卫队，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江苏省军区副政委。

周明国（1914—2005），曾用名周传文。湖北黄安县仙居区周家湾人（今属大悟县禹王镇）。1929 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0 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

姚运良（1912—1980），湖北黄安县仙居区四姑姚家湾人（今属大悟县禹王镇）。1928 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1931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解放军第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

黄立清（1914—1988），湖北黄安县仙居区江家田人（今属大悟县禹王镇）。1931 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3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空军副政委。中央纪委委员。

徐明德（1916—2007），出生于河南光山县卡房乡新屋湾（今属河南新县），幼随父母迁居湖北黄安县七里区天台乡观音塘。1931 年在黄安参加红军，1935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海军副参谋长。

高厚良（1915—2006），湖北黄安县紫云区箭厂河乡萧家洼人（今属河南新县）。1928 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2 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空军政委。中共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萧永银（1917—2002），湖北黄安县紫云区箭厂河乡萧家湾人（今属河南新县）。1930 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5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萧志贤（1913—2000），湖北黄安县紫云区箭厂河乡萧家湾人（今属河南新县）。1929 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青团，1932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兰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

萧德明（1912—2010），曾用名萧永全。湖北黄安县紫云区箭厂河乡萧家湾人（今属河南新县）。1927 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9 年参加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61 年晋升少将军衔。湖南省军区副政委。

附录二

红安年轻一代授衔将军

王小军　1959年出生，红安二程镇人，王诚汉上将之子。中共党员，少将军衔，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本科毕业，军事科学院军事管理硕士。历任联合国驻科威特军事观察员、联合国西撒哈拉特派团战区指挥官、中国驻巴西、瑞典、美国、印度大使馆武官。现任联合国西撒哈拉特派团部队司令。

江建曾　1949年1月出生，红安高桥镇人，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空军中将。1966年入伍，历任空军飞行员，副大队长、大队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军参谋长、副军长、大连基地司令员、军长、特级飞行员。2001年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现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五次。

陈再方　1952年4月出生，陈锡联上将之子。红安高桥镇人，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4年晋升少将，2011年晋升中将军衔。1968年入伍，历任班长、副连长、团部参谋、国防工办参谋、国防科委参谋、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总装备部局长、副部长、军兵种装备部部长、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大军区副职）等。

刘晓琨　1950年1月出生，红安七里坪镇人，刘昌毅中将之子。中共党员，1969年入伍。历任团部参谋、团参谋长、团长、师副参谋长、广州警备区参谋长、司令员、广东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广西军区司令员。2002年授少将军衔。

阮成友　1950年3月出生，红安觅儿寺镇人，1969年入伍，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央警卫团战士、副区队长、政治部组织科长、大队政委、中央警卫团常务副政委、总参谋部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2004年授少将军衔。

吴晓恒　女，1932年出生，红安八里湾镇人。1950年入伍，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军医大毕业。曾任军医、科室主任、第一军区大学副校长。1988年授少将军衔。

李　平　1952年4月出生，红安高桥镇人，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子。1968年入伍，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历任军情报部部长，副军长、天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参谋长。1999年授少将军衔。

罗　毅　1948年1月出生，红安高桥镇人，罗应怀少将之子。1965年入伍，196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副指导员、军政治部干事、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副政委、北京卫戍区警一师政委、军事教育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94年授少将军衔。

罗　刚　1953年7月出生，红安高桥镇人，罗毅之弟。1968年入伍，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军副参谋长、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2005年授少将军衔。

胡先贵　1944年6月出生，红安城关镇人，1964年入伍，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大队参谋长，作战科长、海军基地副参谋长、海军第21支队支队长、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1988年授海军大校军衔，1994年晋升海军少将。2011年逝世。

秦卫江　1955年12月出生，红安七里坪镇人，秦基伟上将之子。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历任第65集团军坦克旅旅长、集团军副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第27集团军军长。2000年授少将军衔。2010年12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2012年晋升中将军衔。现任东部战区陆军司令员。

秦　天　1957年5月出生，红安七里坪镇人，秦卫江之弟，中共党员，少将军衔。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副科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防化研究院副院长、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国防大学科研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2016年晋升中将军衔。现任武警部队参谋长。

黄俊峰　1940年5月出生，红安高桥镇人，196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

学学历。1970 入伍，历任总后军需生产部副处长、处长、副部长。1994 年授少将军衔。

程　晟　1952 年 4 月出生，红安七里坪镇人，程启文少将之子。中共党员，1968 年入伍。历任广东武警边防总队教员大队大队长、广东武警边防指挥学校校长、广东武警边防总队副队长、福建边防总队总队长、公安部边防总局参谋长。现任广东边防总队政委。2005 年授少将军衔。

红安年轻一代高级别文职军官

程　志　1946 年 10 月出生，红安七里坪镇人，程晟之兄。1962 年入伍，中央音乐学院毕业。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男高音歌唱家。2001 年授文职将军。

张胜兰　女，1948 年出生，红安高桥镇人，张仁初中将之女。1968 年入伍，196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三军医大学毕业。历任济南军区总医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内分泌科主任、国家药物临床试验室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 年晋技术三级，2005 年晋文职一级。

张南征　女，红安高桥镇人，张胜兰之妹。1969 年入伍，山东医学院毕业，后入第四军医大学深造，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军区第 97 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南京军区内镜诊疗中心主任、徐州医学院附属淮海医院内科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2006 年晋技术三级。

周书明　女，1950 年 5 月出生，红安二程镇人，周世忠少将之女。1968 年入伍，197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 年第七军医大学毕业。历任战士、学员、医师、主治医师、科室副主任、主任等。现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干部一科主任、主任医师，全军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军区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北方老年医学会副秘书长。荣立三等功三次，技术三级，文职二级。

陈守明　1949 年 12 月出生，红安永佳河镇人。1966 年入伍，196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学员、译电员、仪表师、参谋、教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二炮指挥学院专家督导组成员、全军教育技术专家，技术三级，军职。曾任中央电视台军事部高级记者，独立摄制反映军队和二炮有重大价值的新闻图片资料 830 多幅，拍摄电视资料片和策划编导电视片 260 多部，其中部分片子分获全国全军一、二、三等奖。发表学术论文 40 多篇，科普文章 300 多篇，图片 1200 余幅。2011 年退休。

附录三

更深层次诠释红安

——读郭家齐同志的《人杰地灵》和《将星灿烂》

王辉淼

当代很多人知晓红安是全国第一将军县；知晓这里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地，是红四方面军等四支红军主力的诞生地；知晓这里曾走出两位国家主席和295位将领，这里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了14万英雄儿女……的确，这里是一片热土。

而我，作为生活、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的红安人，耳闻目睹，总觉得光凭现有的历史资料尚不能透彻地了解红安。毫不夸张地说，小小红安，堪称一部厚重深邃的大书，正史之外，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譬如，当年在这面积仅1795.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为什么会发生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数十万土生土长的农民当年为什么能那么广泛而热烈地接受和实践无产阶级革命理论？295位将领各自经历了怎样的成长、战斗历程？正史未曾记述的一些烈士们留下些什么？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这里还广泛流传当年的许多革命轶事？这块地方除了将星灿烂还有无光彩夺目的文化巨星？这许多问题困惑我多年。这次有幸读到郭家齐同志的两本书，一本是《人杰地灵——红安名人与大事聚焦》，一本是《将星灿烂——红安籍将领征战风云录》，读读想想，身不由己，一步步被其导入红安革命历史和精神的深处。

有道是，“文章最忌百家衣”，郭家齐同志的两本书言人之所未言，书里

补写了红安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鲜为人知的人和事，进一步揭秘了红安。如书中所写三个红安人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关系，红安农民运动对全省农民运动的影响，革命处于低潮时红安人独创便衣队斗争形式，295 位红安籍将领各自在哪些战役中如何指挥千军万马……书稿中还据实评价了那些因革命早逝的将领，也为一些普通革命烈士客观定位等。这诸多问题，正史是不可能详尽记述的，许多专家学者正在穷源溯流，而郭家齐同志却用翔实的史料一一作了回答。可以说，这两部书的内容进一步完善了红安籍将军的英雄形象，也是为那些史书遗漏的烈士英灵进行祭奠，书中大量鲜为人知的人和事，不仅补充了《红安县革命史》，丰富了红安红色文化，也为代代红安人提供了传统教育的新教材。

郭家齐同志的两本书，使人进一步理解红安，理解红安人。文章难得的是精神，两部书中没有空话、套话，坚持时经事纬，贴近历史，贴近当年生活，主旨明晰。所记所叙皆真人、真事、真史、真话、真感情，反映了在那漫长而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人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一要三不要”，即要革命，不要家，不要财，不要命。是“一图两不图”，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血与泪铺成今天的幸福大道，他们燃起的战火硝烟锻铸了今天的朗朗日月。如今，血与火的历史已成过去。但历史从来是现实的教科书，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是红安精神赢得了红霞漫天，那么今天在建设红安的新时期，更要靠代代红安人发扬红安精神，才能在洒满烈士鲜血的土地上绘出锦绣宏图，以慰先烈在天之灵。

本书作者郭家齐同志，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收集编写红安革命史，除“文革”期间外，在革命史园地耕耘直到退休。他先后行程两万余里，走访老红军老干部 156 位，收集资料 400 余万字，正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正是凭借丰富的红安革命史料，在职时曾主编了《红安县革命史》《黄麻起义》《红安革命歌谣选》等书。如今他已年过八旬，身体状况差，本该好好颐养天年，但他总认为仅凭一本《红安县革命史》并未写完红安革命，担心随着时空的变化，正史之外诸多感天动地的人和事将被湮没，那就愧对先烈，就对后代人欠下了债。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他退休近 20 年仍不休不止地研究和撰写有关红安的革命历史和人物。读其文知其人，在当前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充斥社会的情况下，他缘何如此执着？归根到底，源于他对革命前辈无限的崇敬，源于他强烈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源于他一个老党员的良心，更源于他在身体力行地实践革命前辈“一图两不图”

精神。

古人云："言文而不得理，是天下无文也。"郭家齐同志文中之理，不仅为当代人进一步诠释了红安，更为后人深入研究红安打下了基础。

行文至此，话犹未了，谨以拙诗一首，以续抒万端感慨：

笔秃百支书乃成，
非人磨墨墨磨人。
万里求真填史阙，
毕生沥血写风云；
字落黄麻铜锣响，
文行华夏战马骋。
但求壮心旨宏远，
何须身后千载名。

2015 年 12 月 10 日

（王辉淼，湖北红安人，当过中学教员、行政干部。现供职于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高级计量工程师。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通俗故事、报告文学、随笔、小品多篇。同时发表关于质量管理、工业计量、标准化管理以及老年心理保健的理论文章 110 余篇。先后出版《铜墙铁壁》故事集、《企业的质量、计量与标准化管理》论文集、《父母应当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做快活老人》《做幸福的老人》等著作。现为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后　记

在出书的日子里，最难忘的一天是2016年10月10日。

这一天，我收到了湖北人民出版社邓涛同志的一条手机短信，称："郭老，报告您一个好消息，《将星灿烂》和《人杰地灵》两本书，已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审批，可以正式出版了。恭贺您！"

我抑制不住兴奋，当即回复："听到这个好消息如同服了灵丹妙药，我的病一下子好了许多。太感谢省委办公厅和省党史研究室、省新闻出版部门各位领导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圆满履行完出版程序，终使我这个年过八十身染疾病的人，从出书困境中走出来了。"

这番兴奋与感慨缘于今春以来，我所患的前列腺疾病日趋严重，痛苦不堪。在县里反复住医院，疗效不佳。8月中旬转至武汉同济医院治疗，经检查诊断为前列腺癌，并有骨转移，医生决定手术治疗。为保持精力继续完成出书任务，我放弃了手术，去上海寻求保守疗法。在此情况下，听到这个好消息，怎不令我高兴啊。

我写的《将星灿烂》和《人杰地灵》，早在2011年夏天就脱稿了，盼望能尽快与读者见面。哪知这一盼竟长达6年。

这6年是怎样走过的呢？

2011年秋，将两本书稿送北京新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一切谈妥后因缺经费而中止运作。

2013年春，将两本书稿送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因上送审查毫无结果，不得不收回。

2014年秋，将两本书稿送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因该社忙于出版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读物，个人出书被推迟，还不能一次出齐，无奈之下又只得收回。

我费心费力费时费资写两本书，宣传红安革命名人、大事和295位将领的事迹，向社会提供正能量，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理应顺利出版。就因为经费不足、送审程序难走和非官方（属个人出书）等一些非主要问题，遭到三次送出、三次收回的厄运，使我心灰意冷，于是将书稿收藏起来，不再找也没法找出版社出版了。

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2015年8月，我应邀参加一个关于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工作的座谈会。与会者来自北京、省、市、县的有关领导和专业人士。其中有湖北省委办公厅综合二处副处长何兵同志，怀着试探的心情托何兵处长给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傅德辉同志带去一封信，没想到这封信得到了秘书长的高度重视。傅秘书长站在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亲自处理这件事，在信上批复：“转红安县委学武书记阅示。郭主任为红安革命史的宣传作出了贡献，退下来后又自觉自愿，亲自调查挖掘珍贵史料写成两本书，其精神更令人敬佩，所反映困难，请予以支持重视。”红安县委接到批复后，研究决定赞助一部分出版经费10万元，解决了出书经费不足的问题。

在傅德辉秘书长和肖伏清副秘书长（现已调任黄冈市委副书记、市长）过问下，何处长与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和湖北人民出版社联系、沟通、协调，同意将两本书纳入出版计划，由湖北人民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解决了就近出版问题。

最后进入送审阶段，更是共同发力。两本书稿均属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按照有关规定，必须上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查批准，才能正式出版。这个必走的程序，一般都要半年以上。如何缩短出版周期，省新广局与国家总局沟通协商后达成一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初审上报，湖北省党史研究室负责审读评估，最后报国家总局核准。经三方互相配合，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对两本书稿的审查作出了定论，国家总局予以特批，同意正式出版。

我认为“大家一起努力不放弃”才是获得正式出版的主要因素。因此，我要特别感谢省委傅德辉秘书长、肖伏清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何兵副处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王潞、周凤荣处长，省党史研究室何光耀副主任、王诚处长，湖北人民出版社邓涛编辑。没有这些上级单位和这么多领导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的书稿命运堪悲。是他们帮助我将书稿起死回生，华丽转身，堂皇问世，圆了我的出书梦，了却一生的愿望。

这里，还要感谢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党史学家石仲泉。他最先审阅我的书稿并作序，对两本书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还写了推荐出版意见。他的勉励与支持，使我放心大胆地将书稿送出版社出版。感谢积极推动《将星灿烂》写作的红安卷烟厂修志办祝尚斌、石生林、陈美玲、彭时珍，他们协助收集整理过三大战役、渡江作战和朝鲜战争的资料，夏燕和潘宝珍为打印书稿付出了辛劳。感谢耿协楠、周少怀、夏红胜、阙和荣分别审阅将领名录，提供了宝贵意见。感谢原县委办公室李国斌、王积谦，县档案局刘中华，县教育局原负责人张安洲，县作协江长深、张际春、王辉森等给予的支持。感谢我原工作单位县委党史办公室周少怀、陈向东、辛向阳、郭红芝等，他们为我写书出书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两本书是在红安写成的，没有县领导的支持帮助难以出版。因此，特别感谢前任县领导吴海涛、郝爱芳、耿纪谦、陈少敏、陈再新、现任县领导余学武、田胜辉、方思意、陈敦学等所给予的关心和支持。

即将来临的2017年，是黄麻起义90周年，特将《将星灿烂》《人杰地灵》两书向黄麻起义90周年献礼，以此纪念在这块红土地上战斗、牺牲、成长的先烈们和英雄们，让人们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以此报答生我养我的光荣革命故乡；以此感谢为实现我的初衷圆我出书梦而辛勤付出的亲人、朋友、同事和领导们！

不幸的是，当本书和另几本拙著即将出版问世、收藏喜悦之际，曾为此付出很多辛劳的吾妻吾师吾友陈凤良尚未分享喜悦，2017年1月4日，因车主停车未拉手刹离去，车子迅速滑行将走在人行道上的她碾压成重伤，送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噩耗传来，我躺在医院病床上，如五雷轰顶、万箭穿心，陷入悲痛深渊。我们是耄耋之年的空巢老人，相依为命，顿失一方，何其痛苦！所幸的是，出版分社领导、编辑和朋友们将我的几本拙著校编完毕，付印出版。书事告罄，将告慰吾师吾友吾妻于九泉，请她在分享喜悦中安息！

文难尽其美。虽努力为之，错谬难免，望读者指正。

作　者

2017年2月26日于红安

将星灿烂

红安籍将领征战风云录

041HG0318671

选题策划　邓　涛
责任编辑　曹新哲
封面设计　汪　汉

ISBN 978-7-216-09047-6

9 787216 090476 >

定 价：108.00 元